/下卷/

红色陕北

历史见证了西北红军用生命和鲜血浇铸的这块红色土地，对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1919-1937

李建雄 著

史诗性历史纪实作品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始末的详尽解读

HONGSE SHANBEI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下卷/

红色陕北

李建雄 著

1919-1937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七部 ★

SHANGAN
HONGJUN

陕甘红军

·下卷·

目　录

第七部 陕甘红军

第四十三章 三嘉塬改编

第四十四章 红旗插上旬邑成

第四十五章 靖远二次起义

第四十六章 挥师北上

第四十七章 两当起义

第四十八章 西华池起义

第四十九章 周旋在“围剿”的缝隙中

第五十章 “左”倾错误是罪魁

第五十一章 红二团南下渭华

第五十二章 返回照金

第五十三章 严峻的形势

第五十四章 重聚照金

第五十五章 扭转被动局面

第五十六章 再振军威

第五十七章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第八部 陕北红军及第一、二次反“围剿”

第五十八章 镇米事变

第五十九章 红一支队分散隐蔽

第六十章 红二、三、四支队成立

第六十一章 谢子长回陕北

第六十二章 南梁会师

第六十三章 第一次反“围剿”

第六十四章 红军发展壮大

第六十五章 根据地建设

第六十六章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第六十七章 第二次反“围剿”

第六十八章 保卫苏区

第六十九章 两支红军归一统

第七十章 三战三捷

第七十一章 两块根据地连一片

第七十二章 红军陕北上威震三边

第七十三章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第九部 第三次反“围剿”及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

第七十四章 陕北来了个“代表团”

第七十五章 不听“左”倾瞎指挥

第七十六章 红十五军团首战告捷

第七十七章 从鄂豫皖带来的“肃反”利刃

第七十八章 黑云总是遮不住太阳

第十部 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第七十九章 长征的落脚点

第八十章 毛泽东命令刀下留人

第八十一章 “我们对党是忠贞不贰的”

第八十二章 红军东征

第八十三章 打通神府苏区

第八十四章 第三路东征军

第八十五章 西进三边

第八十六章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第四十三章

三嘉塬改编

谢子长受命赴南梁

两支游击队会师后，刘志丹旋即派人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请示部队的整编和今后行动问题。在等待省委指示的期间，两支游击队暂驻南梁、林锦庙一带，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土匪，救济群众，积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这时，谢子长、李光明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正在甘肃平凉了解刘志丹离开后陈珪璋部队里党的兵运工作情况。

刘志丹从合水脱险后，陈珪璋部平凉教导团发生了杀害政治教官刘耀西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打入陈珪璋部许多共产党员的再度恐慌，不少共产党员先后离开陈珪璋部。

刘耀西，陕西葭县人，生于 1904 年。1924 年秋考入绥德四师。1926 年加入共产党。1927 年毕业后到内蒙古大汗太吉部队当兵，再转神府高志清部。1930 年，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往宁夏苏雨生部，在谢子长的新编第十一旅开展兵运活动。苏雨生平凉兵败后，刘耀西与谢子长、刘志丹失去联系，通过关系先打入驻平凉的陈珪璋部，担任该部教导团的政治教官，并以此合法身份作掩护，在教导团秘密成立了中共军团委，担任军团委书记。

刘志丹在中共陕北特委工作时就与刘耀西十分熟悉。刘志丹在陈珪璋部组建第十一旅期间，刘耀西利用教导团政治教官的身份为刘志丹尽快拉起队伍的事情忙碌地往返于宁县和平凉。贺晋年、史法秩等在苏雨生兵败平凉后，先到定西县，后得知刘耀西在陈珪璋部，又从定西县到该教导团，与刘耀西及同为教导团政治教官的傅宝珊在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刘耀西事件起因是他一次给士兵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人告密。陈珪璋派人搜查时，从刘耀西的身上又搜到一份中共秘密文件，即将其逮捕下狱。刘耀西的身

份暴露后，傅宝珊、贺晋年、史法秩等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教导团。贺晋年前往靖远，史法秩返回陕北。

刘耀西被关入监狱后，陈珪璋先以利诱，后施酷刑，企图从刘耀西的嘴里获得共产党打入该部的全部活动情况。刘耀西守口如瓶，宁死不屈，最后被杀害，用生命换来了陈珪璋部的全体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的安全。

张秀山

谢子长、李光明到平凉时，陈珪璋对原第十一旅已进行了改编。第十一旅的张秀山、王世泰、张文元、杨植本、杨彦麟、魏长顺、王廷光、常佩青、马福吉等18名共产党员均被编入刘保堂部队的第一营，除张秀山在营里任排长外，其他共产党员都是士兵，但他们的活动仍十分活跃。

张秀山、王世泰等在部队里建立了中共支部，张秀山任支部书记，王世泰、曹化民(一营营部书记官)为委员。他们在第一营利用体育活动、教士兵唱歌、教士兵学文化、帮写家信、记口令等方式，广泛联络，与非党的班长、副班长交朋友拜把子，不到两三个月工夫，第一营的三个连里就新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兴起抗日高潮，谢子长指示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在刘保堂部队中要隐蔽好，继续秘密开展兵运活动，积蓄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举行起义；同时指出当前的任务是要在陈珪璋军阀部队里加强抗日宣传。

这时，原留在刘保堂部队的白冠五、刘景范已离开平凉，到保安找刘志丹去了。

不久，谢子长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受命调往南梁，领导陕北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的整编事宜。临行前，谢子长留下李光明协助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在刘保堂第一营开展兵运活动。

暂归陈珪璋

1931 年 11 月上旬，谢子长离开平凉，在赶往南梁的途中，先后遇见高岗、马云泽。高岗也是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南梁协助谢子长整编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的。

谢子长一到南梁，首先把陕北游击队中的原土客队伍作为整顿的重点，又派出共产党员雷恩钧、陈玉清等到师储杰部担任指导员，以加强政治工作。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整编后，中共陕西省委没给番号，也没设总指挥机构，只成立了新的游击队队委会。根据省委的任命，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胡廷俊、白锡龄等为委员。

在谢子长主持下，召开了新的队委扩大会议。在讨论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和今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时，大家一致认为：阎红彦在近一年的晋西、陕北游击战争中，坚决果断，勇敢机智，显示出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在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工作方法简单粗糙，缺乏民主作风。决定由阎红彦带 12 名战士，另行组织一支游击队，到桥山北段开展游击活动。

庆阳、环县、三边一带，是甘肃、陕西、宁夏三省交界半农半牧地区，土地、牛羊多为地主豪绅所有，劳苦大众受尽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盘剥，生活十分困苦。阎红彦领导的游击队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抗捐、抗款、抗粮，群众逐渐认识到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便主动给游击队带路，报告敌情，有不少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尤其扩大了骑兵，增强了战斗力。

这时已是冬天。南梁一下聚集 800 多人的部队，除吃饭外，保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寒冷的天气里，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此时，陇东的军阀陈珪璋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派人前来商谈对游击队的收编。为解决冬天部队的给养，谢子长、刘志丹派出马云泽、刘约三到平凉，与陈琏璋商谈部队改编事宜。

马云泽、刘约三到平凉后，正好杜斌丞也在那里，二人遂去拜访。见面后，刘保堂向杜斌丞介绍马云泽，杜斌丞摆摆手说：“我认识，不要介绍。”

杜斌丞早在 1927 年秋就认识了马云泽。那时，马云泽、张慕时、崔仲英等几个共产党员在冯玉祥部，正遇冯玉祥在郑州“清党”，无法立足，决

定返回陕北到榆林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井岳秀的第九路军中开展工作。准备动身时，得悉杜斌丞住在洛阳，他们几人虽不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但对杜斌丞关心、爱护青年学生的事迹早有耳闻，便去找杜斌丞帮忙。马云泽等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店找到杜斌丞后，杜斌丞问明原委，表示愿意举荐，但叮嘱他们返回陕北后要格外小心，井岳秀和冯玉祥都是军阀，井岳秀“清党”的真面目也会暴露出来的。他们回到陕北，有四人到井岳秀第九路军政治处工作。1929 年 4 月，马云泽脱离井岳秀部，随谢子长到地方组织武装斗争。

1931 年 2 月间，谢子长派马云泽到西安去见杜斌丞和呼延立人(与谢子长同学，时任杨部参谋处长)，准备通过他们的关系向杨虎城要一个合法的军队番号，以便开展兵运工作。杜斌丞说：“你们的工作情况我清楚，打算很好，要个番号也可以勉强办到。不过你们以后要另打旗帜，我和杨虎城是朋友关 系，那时就不好说了。”并建议说：“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干起来再说。”

马云泽离开西安前，正与艾德生、杜理丞一起交谈，军法处的便衣队以“涉嫌在商洛勾结土匪”的罪名将艾德生抓捕，连同马云泽、杜理丞一并抓走。杜斌丞得知后，亲笔写出证明信：“马云泽是我的乡亲，到西安找工作的。我可以证明他是个好人。”马云泽被保释后，杜斌丞又给盘缠路费，使他安全离开西安。

杜斌丞听说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合兵一处，已有 800 多人的队伍，即大加鼓励，赠给马云泽一支手枪，并促使收编谈判顺利完成。陈珮璋派刘保堂等前往南梁负责部队的改编。部队仍沿用原刘志丹在陈琏璋部时第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杨琪为副官处长。陕北游击队编为第一团，师储杰任团长，供给主任马云泽，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阎红彦，二营营长吴岱峰，三营营长雷恩钧，四营营长白锡龄；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刘志丹兼任团长，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赵二娃，二营营长杨培盛，三营营长唐青山，四营营长贾生财。

当得知谢子长、刘志丹组建的游击队子弹匮乏、无越冬棉衣的困难情

况后，杜斌丞立即把他准备送给石子俊旅的几箱冲锋枪子弹和手枪子弹交给马云泽、刘约三带去，并促成陈珪璋给游击队发了一批棉衣和军饷，解了燃眉之急。刘保堂也筹到200块银洋，交给马云泽、刘约三，表示对游击队的支持。

刘保堂到南梁后，为了同心合力拧成一股绳，与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廷俊、雷恩钧、白锡龄、陈玉清、师储杰、杨琪、杨培盛、赵二娃、唐青山等18人举行拜把子香堂会，表达志同道合的革命心愿和意志，由刘志丹亲笔写了《金兰谱》：“我等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叛等情，天诛地灭。”这是谢子长、刘志丹利用民间习俗团结同志的一种政治策略。刘保堂要求跟着谢子长、刘志丹一起干，他说：“你们都是大人物，跟着你们干一定会有出息。”

刘志丹认为刘保堂原是陈琏璋部的军官，利用公开身份，有利于开展兵运工作，便劝说道：“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待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

刘保堂接受了刘志丹的意见，后受谢子长、刘志丹的派遣离开南梁，打入西北军阀队伍，秘密进行兵运工作。1941年因身份暴露被张廷芝活埋。

陈硅璋表面对收编这两支游击队大为高兴，其实企图将这两支游击队吃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对此早有防范。

不久，果不出所料，陈珪璋秘密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兵分三路，亲自挂帅，偷偷朝第十一旅的驻地包围过来，企图一举歼灭陕北、南梁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立即率领两支游击队在柳林村对陈硅璋部发起袭击，攻其不备，歼灭了陈硅璋部的两个营，大获全胜。

柳林村一战后，谢子长、刘志丹旋即率领两支游击队离开陈珪璋的防区，开拔到正宁县北柴桥子休整。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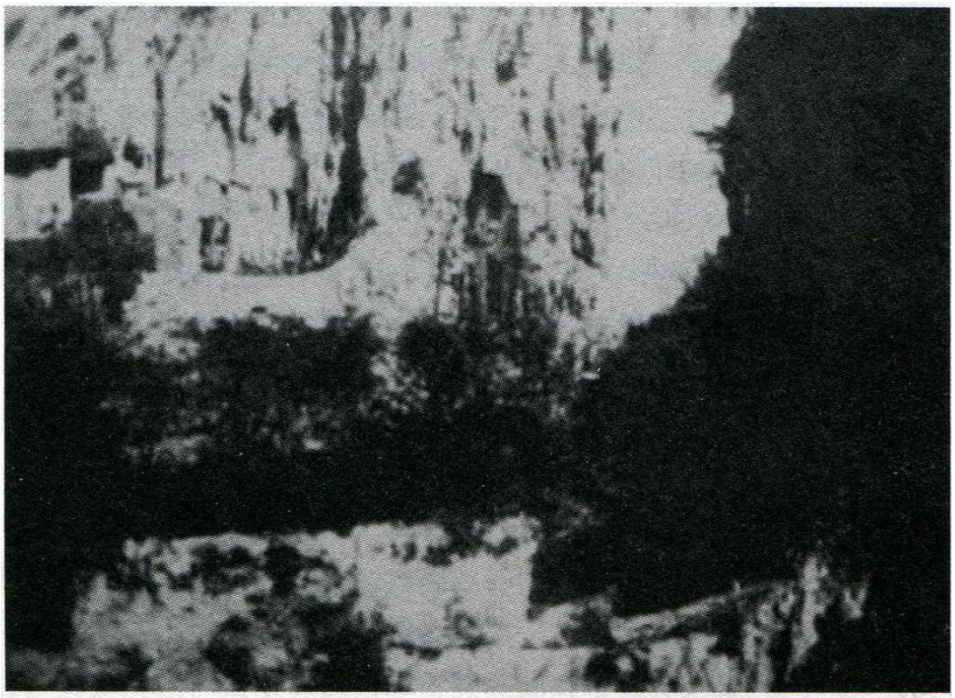
1931年11月，杨虎城派出孙蔚如师人甘讨伐雷中田。陈珪璋部与杨虎城部孙蔚如师第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组成联军北上。

12 月 1 日，联军攻克兰州。

1932 年 2 月，杨子恒部下将陈珪璋杀害。随之，孙蔚如对陈珪璋部在兰州、平凉、泾川各处的驻军发动进攻，将陈所部全部收编。

在进攻平凉时，张秀山、王世泰、曹化民等共产党员正试图从第二团起义拉出一支武装，但由于战斗发生突然，起义准备工作又不充分，致计划流产。在攻打平凉的战斗中，王世泰与十几名共产党员被俘，编人孙蔚如部一个机枪连当了兵。王世泰在机枪连瞅上了四挺重机枪，准备在部队与谢子长、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交战时，与其他共产党员发动火线起义，将这四挺重机枪拉到游击队。结果王世泰由于身份暴露，只得孤身离开孙蔚如部队。其间，张秀山脱离孙蔚如部队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平凉再次起义失败的情况。省委认为张秀山过去曾在王子元的部队，有组织策划该部起义的条件，决定派他再打入王子元部开展兵运工作。

这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三个月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3000 万东北同胞成了亡国奴。日本得寸进尺，向内地发动了进攻。



三嘉塬锦章村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旧址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在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奋起抵抗。上海总工会根据党的

指示发布了总同盟罢工命令，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全力以赴与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经激战两昼夜，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为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甘肃正宁县，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将陕北、南梁游击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简称反帝同盟军）。

1 月底，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陕北、南梁两支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由荣子卿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正式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杨琪任副官长，强龙光任骑兵队长。同时，成立了反帝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任委员。

陕北、南梁游击队原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由师储杰任第一支队司令，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一大队队长阎红彦，二大队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龄；由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司令，朱侠夫(一说朱理凯)为参谋长，马锡五为军需官，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一大队队长赵二娃、副大队长刘景范，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三大队队长唐青山、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贾生财。

突起的枪声

反帝同盟军成立几天后，在合水县歼灭国民党暂编第十三师两个连。随后部队经南梁到子午岭，又向正宁县三嘉塬一带转移。当时，部队给养、弹药十分紧张，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地主以解决供给是常有的事。在部队路经任家堡时，遇到了地方反动土豪武装的抵抗。

任家堡的土豪武装只有十多支枪。当地老百姓不了解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一听说有队伍来了，便都聚集到堡子里。在堡子里的老百姓由于受土豪的蒙骗都协助土豪武装一起从堡子里扔出砖头、石块，袭击游击队。

这时，第二支队赵二娃所带的一大队还未等部队领导命令，就已经一

窝蜂地攻打起来，并很快将堡子打下。队伍一冲进堡子，由于部队组建时间不长，内部成分复杂，纪律松弛，鱼目混珠，即在堡子里开始打、砸、抢，把堡子里弄得一片狼藉，还把受蒙骗的老百姓打死打伤不少。尤其是赵二娃还带人抢了老百姓的牲口和财产。群众纷纷找到谢子长告赵二娃等人的状。

为了挽回游击队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部队开到三嘉塬，谢子长立即召开有关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动员，下决心对队伍进行整顿；决定“清洗部队不纯分子”，解决赵二娃问题。谢子长在会上说：“我们这个部队纪律很坏，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用不了几天就会失败。”刘志丹同意整顿部队，但提出从缓教育。

谢子长认为，刘志丹是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司令，在其支队属下的赵二娃所带队伍如此作为，刘志丹有直接领导责任，并且顾及赵二娃原是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带过来的人，担心刘志丹会袒护，所以在研究处理赵二娃的问题时，一直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刘志丹对荣子卿、李杰夫、谢子长的处置意图一无所知。

2 月 6 日，谢子长命令部队全体集合。谢子长、刘志丹都腰插短枪，站在一个高土台子上，谢子长首先向部队讲话。他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为人民打天下。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

接着，谢子长果断地发出命令：“现在，下赵二娃的枪！”

赵二娃不服刚要反抗，谢子长预先在赵二娃的身后布置了阎红彦、白锡龄两人，一人抱住赵二娃的双臂，一人举枪将他打倒在地上。与赵二娃一起在堡子里违犯了纪律的人，一听说要缴他们的枪，吓得丢下一二十支枪拔腿就跑。第二支队三大队的谷聚山、一个姓王的中队长和战士周毛牛见势不妙，慌忙准备跑走，荣子卿命执法队立即将三人当场开枪打死，才使混乱将起的部队恢复了秩序。

谢子长命令执法队当即缴了刘志丹的枪，第二支队的武器全部被收缴，并宣布解散二支队，限定当日离开部队。

第一支队司令师储杰一看游击队的军纪如此严明，自己恶习一身，说不定哪一天犯了毛病，也会跟赵二娃和谷聚山等的结局一样，当场吓得直

冒冷汗。师储杰所部人人自危。于是，当天夜里(一说是第三天)师储杰拉走近 200 人的队伍，偷偷离开反帝同盟军，投奔杨虎城部去了，使得游击队蒙受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深明大义，沉着冷静，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毅然维护了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稳定。对“三嘉塬事件”，在长达半个世纪里，一直有着争论，直到 1986 年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同意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对这一历史问题作出结论：“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刘、谢两位主要领导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多数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刘志丹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在“三嘉塬事件”中，白冠五也负了伤，后被朱侠夫护送到西安治疗。在白冠五临行前，刘志丹语重心长地说：“到了西安如有条件，你就作长期潜伏的打算。革命工作需要有隐蔽于敌人内部的无名英雄。在那个环境里，你将要单人独马战斗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这比对付苏雨生、陈珪璋、高广仁要复杂得多。这个任务是我安排的，由我负责，你要发挥聪明才智，去适应一个全新的战斗环境。”白冠五伤愈后在国民党省警察局供职，1936 年刘志丹牺牲后，即与中共组织失去关系。

被谢子长勒令离开反帝同盟军的马锡五、刘景范等人，从三嘉塬走到旬邑县职田镇时，正好碰上高岗。高岗是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正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从西安返回反帝同盟军指挥部。马锡五、刘景范见到高岗，就“三嘉塬事件”给高岗作了汇报。

高岗得知此事件引发的严重事态和游击队面临的困境时，不敢懈怠片刻，快速赶回部队，将刘志丹的枪交还本人，并协助谢子长、刘志丹整顿和收归了一部分离开部队的战士。

马锡五回忆说：刘志丹开始闹革命，初建革命武装，是经过一定的锻炼考验后再提升为工农红军，对收编的土匪，先编为义勇军，经教育改造

后才编人红军。部队当时的纪律十分严明，“有的同志如有了钱，就考察他钱是哪里来的，贪污 20 块就枪决，贪污 10 块开除党籍，贪污 5 块开除军籍”。

成立陕甘游击队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要部队尽快公开打出红旗，将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要求部队改编后向渭北平原进军，在西安附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威胁西安。

当时，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对部队改编没有意见，但对省委决定要这支刚诞生的红军部队向平原地区进军分歧很大。由于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迟迟没有动静，中共陕西省委又派来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到部队监督执行省委对反帝同盟军的改编指示。

1932 年 2 月 12 日，反帝同盟军指挥部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在成立大会上，高岗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建立陕甘游击队的指示。由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和编制，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杨重远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警卫队队长白锡龄。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李杰夫、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等 20 多人为委员。谢子长在大会上讲了话。游击队成立后，刘志丹即到西安向省委汇报游击队的改编情况。

1932 年 2 月 12 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旧址

在成立陕甘游击队的这一天，近千红军战士整齐地排列在细嘴子村的旷地里，一眼望去红旗招展，刺刀、红缨枪闪闪发光，每个红军战士脖子上系着红领带，战马头上挽着红绸子，昂扬的战歌和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显得威武雄壮。正宁、旬邑一带的农民群众成群结队，有的抬着猪羊，有的吹着唢呐，从四面八方赶来庆贺。

当中共旬邑县委第五伯昌代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标志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字样的红旗授给谢子长时，只见谢子长高举起红旗，当空一展，群情更加激昂，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和掌声。

人们仰望着这第一面在陕甘高原上升起的飘扬着的革命红旗，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莫大的兴奋和鼓舞。这次部队的改编，标志着西北革命的发展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第四十四章

红旗插上旬邑城

阳坡头战斗

陕甘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即离开正宁县的三嘉塬细嘴子村，决定南下，出兵攻打旬邑县的职田镇。

1932 年 2 月 13 日夜，陕甘游击队主动出击，摸进职田镇。杨琪带着一支骑兵队，抓捕了国民党区公所区长、民团团总和不少土豪，并歼灭了镇上民团。

待天亮后，由警卫队押着国民党区公所区长、民团团总以及土豪游街，发动群众，开仓放粮。镇上成立的农民协会组织群众焚烧了区公所的文书、账簿、地主的契约，熊熊火焰高蹿天空，穷苦百姓扬眉吐气，奔走相告。

游击队攻占了职田镇后，杨虎城急调驻守旬邑县城的警备团三营与彬县、旬邑、淳化三县的民团武装约 1000 余人，向职田镇开来。在警备团三营有个共产党员叫李明轩，是七连的连长，谢子长曾派马佩勋与他接上关系。李明轩连夜派人赶到职田镇送信，将警备团三营和民团攻打职田镇的作战部署全部告诉了游击队。

谢子长得到情报后，决定抓住战机，将计就计，当即命令部队连夜撤出职田镇。红军在镇子以东 20 里的阳坡头埋设伏兵，筹划与李明轩里应外合歼敌。

2 月 15 日拂晓，警备团三营和三县民团在职田镇扑空后，即向阳坡头方向进发。路上李明轩故意牵着马徒步行走。士兵们问李明轩：“连长，你怎么自己牵着马走？”

李明轩故意吓唬士兵们说：“打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自己牵着马，走起来方便得多。”

警备团三营和民团行至阳坡头，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谢子长一声令下，顿时四处枪声大作。谢子长身先士卒，从隐蔽的土坎中跃出，带领战士如同猛虎下山，冲人敌群，并集中火力杀伤了先头主力。

李明轩见时机已到，跳上马勒转马头就朝后跑，并高声大喊：“红军来了，快跑!”

警备团三营后边跟着的民团队伍见李明轩带着连队后撤，不知游击队的虚实，顿时军心大乱，不战自溃，争相逃命。谢子长急令游击队跟踪追击，一直追杀到旬邑城下，战斗才结束。

阳坡头一战，警备团三营的两个连及一个民团几乎被陕甘游击队全歼，游击队活捉了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毙俘 300 余人，缴枪 300 余支。这一战斗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迅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阳坡头战斗结束后，陕甘游击队返回到职田镇召开了庆捷大会。会后，杨重远给俘虏士兵做宣传工作，问士兵们谁愿意留下当红军，但他们因深受国民党对红军“妖魔化”的谣言蛊惑，都支支吾吾不说话。指挥部在面对第一次俘虏到这么多士兵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李杰夫认为，俘虏中查出一个连长和一个排长，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对当军官的人应一律杀掉，把普通士兵放走；谢子长等认为，连长和排长都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杀一两个也可以，但怕产生不好的效果，从俘虏士兵的情绪看，他们对红军还不了解，不如把他们全部送回去，可为红军优待俘虏做最好的宣传。经一番争论，李杰夫见大家是多数意见，也未再争辩下去。

当天夜里，先打发走被俘的连长和排长后，游击队派杨重远为代表，把被俘的士兵伤员送到旬邑城下。警备团长张汉民(共产党员，后为杨虎城部旅长)派出城外的接收代表正好是七连长李明轩。李明轩装出不认识杨重远的样子，特意向杨重远献上团长张汉民赠送的两箱“礼物”。

返回的路上，大家把“礼物”打开一看：全是子弹!有人愣着神说：“张汉民真是个死心眼，给咱们这么多子弹，还让咱们再打他!”他们哪里知道张汉民就是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自己人呢。

两打山河镇

1932 年 2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离开职田镇，沿着旬邑县马栏方向行进，南下到清水塬、土桥塬一带。这时，杨虎城部的两个团受命由淳化进至旬邑，准备同游击队再次交锋。

谢子长避敌锋芒，率部队转到耀县照金镇。在照金镇驻守着一个民团，未有任何防备，红军就将这一民团武装全部俘虏。

2 月 21 日，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镇，开到了位于耀县境内交通要道的柳林香山寺。

香山寺是陕西有名的庙宇，从沟底一直修筑到山巅，地势十分险要，还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牛羊，囤积大批粮食、金银财物，并有不少大烟土。寺庙里的和尚处处欺骗、坑害老百姓，不但长年出租土地：雇工剥削群众，而且当群众到香山寺烧香时，每次还要交两块银洋。谢子长通过交涉，将寺庙里许多粮食分给了附近的贫苦饥民。在香山寺，谢子长主持召开了陕甘游击队队委会议。在会上，谢子长总结了这段时间的作战和发动群众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并结合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在陕甘交界的照金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当部队离开香山寺时，在阳坡头战斗中负伤的胡廷俊因腿部伤口恶化，谢子长决定通过党组织将其送到西安去治疗。胡廷俊先到西安，后又转上海治疗，并锯掉一条腿，但他仍利用所装的假腿，把文件装在假腿里，为党积极工作，后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发现逮捕，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3 月，陕甘游击队离开香山寺，东跨桥山，在宜君县包围了焦家坪民团。

当游击队的骑兵冲进焦家坪时，30 多个团丁还在睡觉，光着身子全部被俘虏。

接着，游击队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并先后击溃富平、同官、耀县三县民团及国民党一个营的两次进攻。之后，部队经桥山进入中部县的上畛子，然后返回正宁县三嘉塬一带的寺村塬、湫头塬。

这时，陕军与甘军在陇东发生混战。谢子长根据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的《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和《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决定乘此有利时机，以寺村塬为中心开辟游击区域，武装农民，扩大红军影响，实

行土地革命，建立一块新苏区。

寺村塬位于山河镇以南的一个小高原上。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发动群众，成立赤卫军、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牲畜、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由于青年农民积极踊跃参军，红军队伍也有了很大发展。

3 月 19 日夜，陕甘游击队兵分东西两路奔袭山河镇。此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谢子长带着 200 多人的东路部队走错路，等赶到山河镇的城东时，天已大亮。高岗带着的西路骑兵部队和 600 多农民赤卫军，夜行至柏树坳，遭国民党骑兵的阻拦，赶绕道东南到山河镇城下，已到中午时辰。

先到山河镇的谢子长部队与国民党第十三师驻守山河镇的两个连交战时，因高岗带着的骑兵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投入战斗，造成部队欲攻不能。在山河镇寨堡内事先有 30 余内应人员也被暴露，遭守军连长刘西坤、刘湘林抓捕，致第一次攻打山河镇失败。此后，陕甘游击队退驻寺村塬。

4 月上旬，谢子长、高岗、杨重远、阎红彦领导和组织了七十二村的代表在寺村塬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张静元为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为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为副总指挥。在游击队的支持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将西城刘西昆、于家庄赵元亨两个大土豪的全部土地、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大土豪赵元亨。

在寺村塬通过选举成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是陕甘交界建立起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给中国西北地区革命的前途带来了曙光。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活动 20 多天，这个红色政权维持时间虽不长，但这次创建根据地的尝试和实践为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提供了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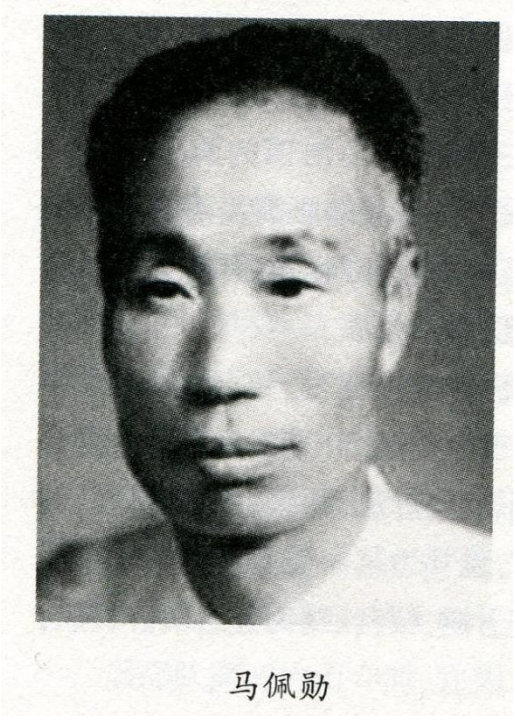
4 月 1 日，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和农民千余人的配合下，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镇。山河镇是一个堡子，里面没有水源。游击队围困了十余天，堡子里已经断粮断水，消灭镇上守军的有利时机已经成熟。当游击队分兵三路即将发起进攻时，正宁县的援兵赶到，双方展开一场激战。

在激战中，白锡龄带着郝金标、马佩勋等战士将冲出堡子的一股守军骑兵队包围在一个农家院子里。郝金标、白锡龄是有名的神枪手，两人端

枪瞄准，撂倒了不少骑兵，打得骑兵队叫喊着要缴枪投降。郝金标没有经验，冲进院子要缴骑兵队的枪，不料被诈降的骑兵队开枪打死，骑兵队乘隙从院子里冲出去。第二次攻打山河镇失败后，部队被迫退到离山河镇 10 里外的一个村庄。

首夺旬邑城

陕甘游击队撤出山河镇后，赶到山河镇的国民党援兵误以为游击队被击溃逃窜，即返回县城。谢子长决定在援兵返回县城的路上埋下伏兵。


马佩勋

1932 年 4 月 2 日，陕甘游击队秘密进至西坡坳，在国民党援兵返回时必经的一个高原坎下设伏。在战斗打响之前，谢子长命令：正宁援兵的马队走不到距设伏之地 30 米的地方，任何人不得开枪。

这时，只见由远而近的骑兵队，黑马、红马、白马、海骝马，黑压压的一片渐渐走近。走在最前的是一个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神气十足。游击队的每个战士都手压扳机，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前方，等待发起攻击的命令。

在马佩勋的身边伏着两个 50 多岁的红军战士，两人的枪法十分准确。谢子长还没发出攻击令，一个战士说：“我一枪非把那个当官的打下马来不可。”话音没落，他已经扣动扳机，只听“叭”的一声，远处的那个指挥官应着枪响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

谢子长见前方国民党援兵已发现埋伏，即从隐蔽的土坎下跃出，一马当先，发起冲锋。骑兵队的指挥官一死，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游击队英勇冲杀，越打越猛，打得国民党援兵溃不成军，纷纷夺路而逃。红军战士一路追杀，一直追到正宁城下。这一伏击战歼俘 200 余人，缴获数十匹战马和许多枪支弹药。

西坡坳伏击战后，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寺村塬休整。此时，旬邑县党组

织派人向部队报告：旬邑县城内只有国民党两个连及民团一部分驻防，警戒疏忽，防守不严。于是，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商量，决定奔袭旬邑县城。

4 月 12 日夜，风雨交加。游击队从寺村塬出发，踏着泥泞的道路，整整行走一夜，到第二天的天亮时，赶到了旬邑县城下。部队虽然经一夜的急行军，战士们疲乏得浑身发软，但一到旬邑城下，人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立即投入战斗。

部队原计划在拂晓前趁着天黑开始偷袭攻城，由于天气原因，部队到达旬邑县城外时天色已亮，使得偷袭变成强攻。谢子长组织好火力，随即下令部队攻城，他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带着云梯和突击队冲在最前头。

谢子长带着突击队的战士冲到城下，迅速搭起云梯，命令连环枪掩护战士登上城墙。登上城墙的第一个战士，因西城楼未攻克，城上守军火力密集，无法立足，被迫从城头纵身跳进城里。

接着，马佩勋第二个登上城墙。他一纵身跃进城墙豁口，端起冲锋枪，对准西城楼连打几梭子弹。西城楼的守军士兵被打死好几个，剩余的守军士兵惊慌地逃下城墙。此时，第一个跳进城里的那个战士迅速打开城门。城外的攻城部队一拥冲入城内。西城楼被突击队完全占领，一杆红旗插在城楼上空。城内守军如同惊弓之鸟，经不住游击队的冲杀，守军两个连和民团武装全被歼灭，国民党县长和警察局局长被杀，游击队打开监狱放出犯人。

这次战斗毙俘 300 多人，缴枪 200 余支，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首次打下一座县城。这一重大胜利在西北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震慑了国民党军队，鼓舞了红军士气。

第四十五章

靖远二次起义

起义刻不容缓

1932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决议指出，陕甘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日益壮大起来，陕甘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与胜利，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这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起义发展区域，使这些起义配合当地的农民与工人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完全正确和适时的。

刚攻克旬邑县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从西安赶到陕甘游击队。刘志丹也随同回到部队。杜衡一到部队，就与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唱起反调，对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全盘否定。杜衡将“三嘉塬事件”和部队由于作战经验不足而两次攻打山河镇失利的责任全部推给谢子长、杨重远，错误地批判谢子长、杨重远，并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当时，杜衡一意孤行，谁不听他的、谁反对他的意见，他就随便抓谁。

谢子长离开部队到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即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县的军阀队伍中发动起义。于是，谢子长、焦维炽受命从西安动身，向甘肃靖远出发。

在甘肃靖远县的驻军是孙蔚如部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王子元第三旅是在中共陕北组织支持和协助下扩充的一支杂牌军。这支军队原是苏雨生部谷莲舫旅第十五团，1930 年秋西北“五马”与苏雨生开战，苏雨生兵败平凉，王子元第十五团、石子俊第九旅脱离苏雨生部，开驻甘肃靖远县。

1930 年底，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入驻甘肃，靖远县由马鸿宾部一 0 五旅

接防。于是，王子元、石子俊这两支军队开到定西县，由军阀雷中田改编为第八师第三旅，石子俊任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王子元任团长，王子庄任旅部书记官。曹又参和王子庄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同情革命。

在定西，第三旅内石子俊与王子元不和，雷中田遂将王子元部改编为工兵营，调驻兰州。当时，王子元团驻定西宁远镇，石子俊暗中勾结王子元部下的一营营长陈国宾密谋搞掉王子元，企图把王子元团完全掌握到手中。王子元团的学兵大队中一批来自陕北的共产党员从学兵大队分配到各连已经当了连长、排长、司务长或文书，张秀山在二连当了排长。一天晚上，陈国宾召集二连连长柴明堂和一连连长沈毅民(共产党员，后叛变)到营部开会，策划收缴王子元的枪，把王子元搞掉后，由陈国宾当团长。会后，沈毅民立即向张秀山报告了情况。张秀山和二连党支部的委员高昆山、王明贤开会讨论，认为如陈国宾的阴谋得逞，就会撤换掉许多共产党员军官，不利于保存共产党在部队中的力量，决定由张秀山向王子元报告这一消息。王子元得到消息，立即带着护兵从后门逃走，才避过一大劫难。由此，张秀山成了王子元的救命恩人。不久，张秀山离开定西到平凉，经高岗介绍与刘志丹接上关系，在陈珪璋部的刘志丹第十一旅当了手枪队队长。王子元部到兰州不久，被雷中田改编为第三游击支队，由王子元任司令，毛仁义为副司令，张东皎为大队长，张国威为副大队长，驻靖远一带。

1931 年冬，陕军孙蔚如入甘讨伐雷中田。甘军陈珪璋、石子俊、王子元等部都表示脱离雷中田，响应陕军，并协助孙蔚如在会宁、定西两个战役中击溃雷中田。

12 月初，陕军攻占兰州。后在陇东一带交战月余，雷中田战败，经陇南逃往四川。雷中田所拥护的吴佩孚与马文车仓皇渡过黄河，向宁夏方向逃走。

王子元部被孙蔚如收编为甘肃警备第三旅，由王子元任旅长，张东皎任副旅长，孙作宾任参谋主任。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毛仁义，一营营长吕振华，二营营长沈毅民，三营营长汪新民；第二团团长牛化东，一营营长王治邦，二营营长王儒林；第三团系地方民团改编，团长杨梓材，一营营长钱继承，二营营长周维邦；旅部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教导队长苏醒

民，旅部副官长李罕言，军法主任王儒林(兼)，军需主任窦子章。

王子元部总共不到 1000 人，设有三个中共支部，直接受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张东皎是团委(又称中共军委)书记，部队内有共产党员张东皎、孙作宾、牛化东、吕振华、王儒林、苏醒民、李罕言、张国威、高昆山、乔霞波、杨林、贺晋年、石子建、常焕章、张秀山等近 100 人，其中连以上共产党员军官有 30 余人。

在谢子长、焦维炽未到靖远县之前，中共陕西省委以张秀山在王子元部关

系熟悉派其至第三旅策动起义。同时，中共陕北特委派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到了靖远县，了解王子元部的情况，相机策动起义。这次张秀山到第三旅后，王子元要他当连级军需官，他请求要带兵。王子元因欠张秀山人情，

只好答应他到一营一连当排长。在一连当连长的徐子猷是共产党员，自娶了个老婆后就思想消极，对连队懒于军事训练，甚至连早操都不出。张秀山乘机着手抓带兵权，每天早上带着全连出操，进行野外训练，和士兵们打成一片。

1932 年 4 月 28 日，谢子长、焦维炽到靖远县，张秀山和王子元部党的负责人张东皎、石子建在县城里找了一间民房，秘密安顿二人住下。因为在王子元部有很多军官都认识谢子长，谢与王子元是同学，又是拜把子弟兄，不宜出面公开活动。焦维炽在王子元部没有人认识，故由焦维炽到各教导队和各连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召集党组织会议。当时，在海原驻有王子元的一个炮兵营，营长是沈毅民。谢子长派出王兆卿先去海原县，联系沈毅民在炮兵营发动起义，以配合靖远县王子元部的起义。不料，王兆卿到海原县后，因沈毅民蜕化反动，不但未能促成起义，反被沈抓捕。

这时，王子元部的司令部是共产党的势力。王子元住在公馆里，几乎很少到司令部里来。公馆对面驻的是旅部警卫连，由王子元的侄子、一营营长王治邦兼连长，是王子元的主要势力。第三团是收编地方杨梓材的民团，虽属王子元的势力，但队伍不多。

谢子长、焦维炽首先改组了原王子元部中共团委，由焦维炽任书记，

教导队长苏醒民及石子建、高尊德、张秀山等组成新的中共团委。在中共团委召开的会议上，谢子长、焦维炽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立即发动起义的指示。在会上，张东皎检讨了自己原任中共团委负责人时是机会主义，没有马上发动起义的思想准备，总以为条件还不成熟，想等到将来力量大了再打红旗，没有认识到现在发动起义的重要性。谢子长听后道："这不能说是机会主义，是省委过去没有指示。"

接着，谢子长向大家讲了这次组织起义的重要性：现在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影响，而且也是配合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会上讨论到起义的计划和时间时，有的同志提出利用教导队开毕业典礼时扣留王子元，缴警卫连的枪；有的同志建议如王子元不来教导队参加毕业典礼，就打王子元公馆和警卫连，把王子元的第三旅大部分带走。因意见分歧，这些行动计划都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具体的行动时间也没有定下。

正当谢子长、焦维炽周密组织准备起义的时候，不知什么人走漏了消息，王子元知道了谢子长秘密来到靖远县，引起了怀疑。王子元的亲信杜相庭挑拨道："子长这次到靖远，只见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防止东皎把你吃掉。"

在 5 月 5 日夜，王子元突然将张东皎扣押，缴了执法队的枪，又扣留了营长王儒林，并缴了全营的枪。

6 日早晨，张秀山带着一连上完早操，饭后到张东皎的住处，只见门上站着王子元的护兵，不准进去。张秀山立感不妙，马上转到司令部书记室，找到机关秘书、共产党员崔继浩问："出了什么事?"

崔继浩说："你还不知道?昨晚闹了一个晚上，把执法队的枪也收了，在司令部里到处搜查。"

张秀山离开司令部，又转到第一团一营打听情况，幸好一营还未发生事故，便立即跑到谢子长、焦维炽的住处，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并提议道："在今天夜间必须立即行动，如再迟误，把我和五连连长曹炳奎等扣押了，就连一个兵也带不出去了。"

向海原进发

谢子长、焦维炽采纳了张秀山的意见，立即通知石子建、苏醒民等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在天黑以后行动，把能带出去的队伍全部带走。当时，估计有把握带出去的是一连、五连、教导队，争取骑兵营的一部分，并决定起义部队举事后，先到东湾子缴了驻守在那里的一个连的枪，再向海原县行动。黄昏时分，石子建先领着谢子长、焦维炽出了东门，住在一个小店内等候起义部队。

曹炳奎的五连驻守在靖远县城的东城门上。傍晚，一营营长吕振华和张秀山先后来到东门城楼上。张秀山见五连都准备好了，对曹炳奎、吕振华说：“我回去带一连，等我来后，咱们一起走。”

张秀山随即回到一连驻地。这时，一连的连、排长都已躺下睡觉了。张秀山将连长徐子猷及几个排长的枪收缴后，然后按照每晚点名的习惯吹哨子集合队伍，士兵们全副武装站好队。张秀山站在队前向士兵们说：“今晚咱们当红军去，红军总指挥谢子长来了，已经到了靖远城。全城的许多队伍都要去当红军，大家愿意不愿意?”

士兵们齐声答道：“愿意!”

随后，张秀山即喊口令：“向右转，持枪常步走!”

队伍从驻地出发时，站岗的哨兵问张秀山：“张排长，我走不走？”

张秀山连忙道：“你跟上走。”

张秀山带着一连走到城东门时，城门已经大开。一营五连的队伍已由曹炳奎、吕振华带着先走了。张秀山立即带着队伍出了东门，到城外小店里去找谢子长、焦维炽、石子建三人。不料走进店里，却不见一个人影。张秀山以为谢、焦、石三人一定跟着五连队伍一起走了，从小店出来带着队伍沿大路直追而去。

在路上，张秀山发现五连未向东湾子去，却向海原县方向进发了，随即决定改变收缴东湾子所驻一个连队之枪的计划，向海原方向追去。追到半夜时分，在打拉池川里与五连会合。参加起义的两个连队会合后，张秀山就立刻询问谢子长、焦维炽、石子建是否随五连离开靖远，曹炳奎、吕振华说没有碰到他们三人。此时，大家才知道谢子长、焦维炽、石子建三

人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络。同时，张秀山亦弄清楚了五连从靖远县城东门走得匆忙的原因。原来张秀山回一连驻地后，曹炳奎、吕振华等候时间较长，以为张秀山在一连驻地起义未成功，疑被王子元扣留，即与汇集到的教导队一部分从东门出发。在行进中，怕王子元的追兵赶到，于是改变了到东湾子收缴所驻连队之枪的原定计划，向海原县方向进发。

在靖远县城王子元部起义之时，负责给谢子长、焦维炽带路的石子建把谢、焦二人带出小店，出了县城东关，走不远看到南山方向有火光，误以为是起义部队的手电光，就往南山方向追去。等他们追到跟前，一看才知是老乡抽烟点火，即又返回大路，向东湾子方向追去。三人赶到东湾子附近，发觉东湾子那个连的驻地一片寂静，估计一、五连起义后朝打拉池方向开发，又转向打拉池方向追赶而去，因怕大路有王子元的追兵，便避开大路走山路。三人寻找了几天，没有得到起义部队消息，只好回到兰州等候。

一、五连起义后，沿大路连夜向海原县方向行军。于次日天亮时到达打拉池。吃过早饭，把队伍集合起来，由张秀山代表部队中共团委讲了话，并按预先计划把起义部队改编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红四支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因谢、焦二人失掉联络，暂时不在部队，总指挥由吕振华代理。五连编为第一大队，曹炳奎任大队长；一连编为第二大队，张秀山任大队长；教导队编为指挥部的直属队。

这支新的红军队伍一诞生，吕振华即下命令向海原县出发。部队从打拉池出发前，吕振华派出一名战士（共产党员），骑他的战马给驻在海原的炮兵营的共产党员连长高昆山、王明贤送信。信中要求高昆山、王明贤等立即把海原炮兵营和已掌握的队伍拉出来，配合起义部队的行动。

但送信的战士骑马赶到海原县城门就被守军扣押，从身上搜出吕振华给高昆山的密信，被送往靖远县城关押起来。当时，由于炮兵营长沈毅民的叛变，致炮兵营的不少党员被捕。

红四支队由打拉池出发，行至郎山村休息。当部队正准备吃午饭时，王子元派出的骑兵就追来了。部队打退骑兵的进攻，退到了崛冥山。到了崛冥山最高处时，太阳已经落山。

张秀山负责断后，又因要照顾伤员，远落在红四支队的最后边。吕振华、曹炳奎带着先头撤退部队分成两路，一路沿山梁前进，一路顺山沟前行。张秀山率断后的部队顺山沟追赶红四支队没有追上，在第二天被追击的骑兵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张秀山被捕，被押送到靖远县城。

吕振华，甘肃定西县人，即与曹炳奎带着红四支队辗转到定西县一带打游击。游击队在定西坚持一月之余，终因王子元及各军阀派兵围追堵截，遂告失败。

张秀山被押回靖远，戴着脚镣，关在特务连。在王子元部未暴露的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给王子元施压放话：张秀山可是救过王司令的人，把他杀了，就太不讲义气了，以后谁还再给司令卖命呀。王子元对处理张秀山左右为难：杀了吧，怕下面人骂他忘恩负义，不杀吧，又怕别人来效仿搞起义。半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王治邦带着几个士兵给张秀山卸去脚镣，换上一套便服，说：“王司令让我把你放了，我就说你是自己偷跑了，这样对外人好说些。”张秀山被释放后，与曹华山一起离开靖远，后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靖远起义失败的情况。

水泉堡再举红旗

在靖远县城被王子元扣押的张东皎、王儒林等，经王子元部中的其他共产党员积极营救，终于获释。张东皎、王儒林等获释后，立即离开靖远县，到兰州去找谢子长。

谢子长、焦维炽、石子建三人离开靖远到兰州后，正值杜斌丞也在兰州，和常黎夫在一起。杜斌丞引荐谢子长与时任行营驻甘行署主任的邓宝珊会面，对反蒋抗日等问题进行了交谈。邓宝珊当面送给谢子长两支手枪、百余发子弹。

1932 年 5 月中旬，适逢王子元旅特务连连长杜鸿范到兰州来领军装及其他军需物品，见到谢子长和焦维炽。杜鸿范是杜斌丞的长子，黄埔军校四期学生。这批军需物品是孙蔚如、邓宝珊送给王子元旅的，其中有花筒手提机关枪 3 支、步枪 200 余支、子弹 2 万发，还有 1500 套军服及印信等。谢子长向杜鸿范讲了准备建立红军游击队、需要枪支弹药的情况时，杜鸿

范当即表示说：“这次我不回靖远了，把枪拿上跟你打游击去。”随之，杜鸿范将领到的全部军需物品都交给谢子长。

杜斌丞不赞成谢子长轻率地搞起义，但他对谢子长在王子元部二次发动起义是默许的。杜斌丞曾当面向谢子长表示，对中共组织在旧军队中无把握地进行起义的举动很有看法，他以神木起义为例，认为中共组织拉垮了高志清的手枪连，等于帮了井岳秀的忙，高志清被迫出走，而起义拉出去的好枪好马却被张鸿儒、张廷芝父子夺走，是很不合算的。但他对杜鸿范这次参加起义，却不仅不予干涉，让杜鸿范把领到的军需物品全部带走，还让杜鸿范把他身边四个副官身上的子弹几乎全部拿走。

当二次起义在水泉堡再次失败后，兰州曾谣传杜鸿范阵亡的消息，许多同志的心情都很沉重，并为杜斌丞的健康担心，而杜斌丞却神情自若。几天后，证实阵亡的是杜聿厚，杜鸿范的手部受了伤，已赴西安治疗，大家才放心了。

这时，刚从国民党监狱获释的杜润滋，与邬逸民一起也从宁夏的银川赶到兰州。

杜润滋，陕西米脂县人，生于 1903 年，是杜斌丞的族叔(比杜斌丞小 14 岁)。1921 年春考入榆林中学。在榆林中学上学期问，学生会公布学生洗澡名单时，将杜润滋排到了后边，他以为伤了自己的面子，血性高傲地撕掉名单，并抢先进人浴室洗澡。当时，学生会负责人刘志丹主持讨论杜润滋违反学校纪律的行为，他拒不参加，激起广大学生的不满，曾在全校引发一场学潮运动，要求开除杜润滋的学籍。学潮发生之时，杜斌丞正好不在榆林中学，待回到学校后，对杜润滋严肃批评，责令其退学，一场学潮始得平息。由杜润滋引发的学潮事件，不但使他深感内疚，也受到深刻的教育。1925 年杜润滋入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等人革命思想的熏陶，同年秋加入共产党，并被推举为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担任了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先后担任中共北京东城区委书记、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1930 年，由于叛徒出卖，北京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杜润滋的身份暴露，由中共北方局派往宁夏的银川开展党的工作。到了银川后，杜润滋利用杜立亭的社会关系，在宁夏中学以教书作掩护，

与共产党员邬逸民、江瑞青等发展了一大批学生共产党员，使学校呈现出一派革命的景象。同年冬，杜润滋在宁夏中学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银川当局的注意;、杜润滋、杜立亭被逮捕入狱。在狱中，杜润滋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并以特有的机警与监狱看守长的儿子交上了朋友。看守长的儿子经过杜润滋的争取和教育，思想进步很快，同情革命，尤其促成其父出力，其问经杜斌丞多方周旋，使杜润滋 1932 年春获释。

杜润滋到兰州后，得知甘肃的地方势力石子俊、王子元、李贵清(李递红帖子拜为杜斌丞的门生)三个旅长极力拥护杜斌丞。同时，孙蔚如急于进兵新疆，顺应民心，要新编一个师，也有让杜斌丞统率的意思。杜润滋、谢子长、常黎夫共同力劝杜斌丞出来掌握武装。杜润滋讲得很激动，争得面红耳赤，但杜斌丞坚决不答应。杜斌丞认为，甘肃地方武装只能归邓宝珊管，任何人不宜插手，这是有关西北大联合的大局问题；自己若给孙蔚如新编师当师长，一无干部、二无经费，且旧军队很难变成新军，其结果势必加重老百姓负担。谢子长、杜润滋、常黎夫没能说服杜斌丞。谢子长、焦维炽、张东皎、杜鸿范筹集到 1000 余块银洋，又通过邓宝珊、杜斌丞等人的关系购买到 20 余支枪和近万发子弹。接着，谢子长、张东皎、杜润滋等经研究决定：派人秘密到靖远县，组织王子元部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起义；新组建一支红军游击队后，在靖远、海原一带进行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建立游击根据地；游击队成立后的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紧张的筹措工作，在兰州很快聚集了 70 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官兵。由谢子长、张东皎、王儒林、邬逸民、杜润滋、吴景敖、王世昌、姜耀等将筹集的枪支装入麻袋，弹药箱外边贴上商品标签，雇了几辆轿车送到兰州广武门外，然后装上皮筏子，顺黄河东流而下，直奔靖远县方向。皮筏子到了河口，他们为防止意外，由水路改为旱路起运，翻山越岭来到靖远县的来家窑。在来家窑，将一部分子弹和军装存放在窖洞里。第二天，他们经吴家川，从安宁渡过黄河，向水泉堡进发。

水泉堡离靖远县城 90 余里，是兰(州)银(川)公路的咽喉之地。水泉堡在南北两座大山之中，依山傍河，住有百十户人家。

5 月 30 日，在谢子长的主持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二、三支队在水泉堡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炽（尚在兰州），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第三支队司令王儒林，大队长姜耀，副大队长朱子休，经济委员吴景敖、王世昌。

这支游击队一经成立，附近北湾、大庙等地的农民群众闻知即成群结队赶到水泉堡，纷纷要求参军。几天工夫，游击队很快就发展到 200 多人。

游击队的成立使驻甘陕军孙蔚如大为震惊，急令王子元派兵“剿歼”。王子元慌忙派出骑兵营和二营，由周维邦为总指挥，梁占胜为副总指挥，前往水泉堡进行“清剿”。

王子元部共产党员李发荣在周维邦、梁占胜两营队伍出发之前连夜派人到水泉堡，向游击队报告了王子元派兵出动“清剿”的消息。谢子长得到情报后，立即召集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和部署，命令王儒林带领第三支队占领南面山头，控制制高点，防止周、梁两营队伍偷袭；杜鸿范、张东皎带领第一、二支队占领前沿大山峁，正面阻击；杜润滋和姜耀带领的一部分人坚守堡子，保护指挥部的安全。

6 月 2 日，周维邦、梁占胜带着两营队伍，沿沙河向水泉堡发起猖狂进攻。周维邦营经寨儿泉沙沟而上，向大山峁发起强攻。杜鸿范、张东皎凭借有利地形，等周营走近，霎时一片枪声。战斗进行良久，周营始终不能向堡子前进半步。周维邦气得要命，重新组织队伍向大山峁再次发起强攻。杜鸿范、张东皎不畏强敌，一边指挥一边向周营射击，打得周营士兵抱头鼠窜，溃不成军，龟缩在一道山梁背后不敢抬头。战斗持续到黄昏时，谢子长抽调部分精干战士，绕到寨儿泉背后，两面夹击周、梁队伍。周、梁队伍腹背受袭，周维邦被游击队击毙，梁占胜也被击伤，周、梁两营队伍乱作一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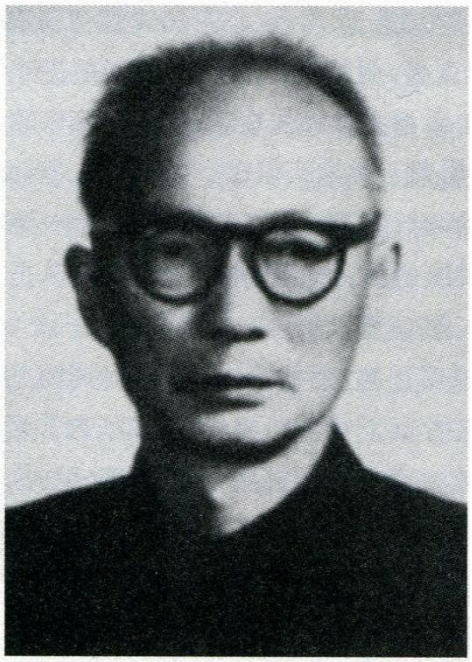
这时，张东皎临阵发动政治攻势进行策反瓦解，促使周、梁两营士兵倒戈起义。他一边向前冲一边喊：“打倒刮地皮的王子元!弟兄们不要为王子元卖命!”当看见旧部张丙辰在对面时，张东皎大声喊道：“张丙辰，我在这里，你快过来!”

就在这时，张东皎不幸被溃散的乱军打伤了左大腿，但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动员溃兵投降。他左手按住伤口，一跛一颠地继续深人周、梁阵营，结果被敌军所俘。梁占胜抓住张东皎后，百般威胁、利诱，让张东皎叫游击队缴枪投降，张东皎严词痛骂。梁占胜无计可施，当场将张东皎杀害。

是夜，谢子长在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将游击队撤离水泉堡，即向海原进发。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游击队到了海原县的园子河进行整编，将原三个支队合编为第三支队。这时，谢子长、焦维炽接到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要奉命调回陕西，游击队即交由王儒林任支队司令，杜润滋任支队政委兼参谋长。部队在海原一带休整了一段时间，在王儒林、杜润滋的带领下，重返水泉堡。

王儒林、杜润滋带领游击队返回水泉堡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并发动当地的铁匠赶制大刀、长矛，武装群众，有不少青年前来参加游击队。如汉沟的杨汝霖，糜子滩的杨培林，红柳沟的郭映珠，石门川的高步林、张宝卿等各带一些人和枪，到水泉堡参加了游击队。

此时，王子元旅参谋主任（中共团委负责人）孙作宾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离开王子元部来到水泉堡；宁夏的李志和、孙绍堂及李天才、梁大钧也先后带着人马来到水泉堡，游击队由原来的200多人很快发展到400多人，声威大震，遂扩编了第四支队，由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



孙作宾

7月初，王云山带领装备精良的一营队伍，向水泉堡再次发动“清剿”。王云山的一营队伍将水泉堡围攻一天一夜，孙作宾、杜润滋、王儒林指挥游击队坚守堡子，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块从堡子的寨墙朝下甩，并与冲上来的士兵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天黑后，突降倾盆大雨，王云山才被迫撤军，停止了进攻。王云山和士兵们个个淋得落汤鸡一样，正忙于在堡子外寻找宿营地。孙作宾、杜润滋、王儒林等当机立断，速带领游击队冒雨转移，在王云山的眼皮底下从

水泉堡消失。

第二天，王云山眺望水泉堡，寨墙上依然红旗高插，迎风飘扬，再命全营人马向堡子发起猛烈进攻。打进堡子，不见游击队的踪影，王云山大吃一惊，只好 撤回靖远县城。

游击队被迫撤离水泉堡，转移到石门地区的宋家梁、黑石山、扎巴岗一带。孙作宾、杜润滋、王儒林等经研究：决定将游击队分为两部分：由王儒林带领少部分，在石门地区活动，发动群众，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基础；由孙作宾、杜润滋带领游击队主力从黄沙湾过黄河，到来家窑取原来存放的武器和军装，准备进入景泰、靖远两县交界处打游击。不料，当孙作宾、杜润滋赶到来家窑时，藏在窖洞里的武器和服装早已被国民党发现拿走了，只好再折回石门地区活动。不久，孙蔚如部旅长冶成章又率骑兵前来“清剿”，游击队历尽艰难与其周旋，在扎巴岗被冶成章旅重兵围困。由于游击队弹药匮乏，损失惨重，孙作宾根据当时的严峻形势，决定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待机重新集结。至此，靖远起义又一次失败。

水北门起义

1932 年 8 月，靖远起义再次失败后，孙作宾、杜润滋返回兰州。此时，中共兰州支部已在孙蔚如、邓宝珊的部队里发展了不少共产党员，迫切需要在这两支部队里加强党的领导工作。孙作宾和杜润滋商量后，决定由杜润滋回陕西向省委请示。

9 月初，杜润滋化装成商人离开兰州，历尽艰辛到西安，参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工作。9 月上旬，被派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举办的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期满回到西安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不久，因受时任省委书记杜衡的排挤，被撤销省委军委书记的职务，贬为省委巡视员。

12，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杜润滋对甘肃革命形势的汇报，派吴鸿宾、王建三到兰州，与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杨嘉瑞等接上关系，传达了省委指示，很快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区委员会(简称甘宁青特委)，由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常黎夫任特委秘书长，马豫章任组织部长，李慕愚任宣传部长。当时，由于斗争环

境险恶，特委机关分别以广武门菜根香酱园、辕门印依轩照相馆、木塔巷山东会馆等处为活动据点。

贺晋年

1933 年 3 月，甘宁青特委将靖远起义失败后隐蔽在宁夏的王儒林调回兰州，通过葛霁云、续范亭、杜汉三、邢肇堂等人的关系，在邓宝珊掌控的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谋得招募专员一职。王儒林利用其公开身份到靖远招募新兵，将靖远起义中的骨干吕振华、史悟亭等重新聚集起来，与曾有联系的国民党团长薛宝山、张子明、杨得胜(藏族)等各率的人马在靖远园子岔组成西

北抗日义勇军(简称义勇军)。一时，这支由汉、回、蒙、藏多民族组织的革命武装发展到近 400 人，由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

3 月底，甘宁青特委在印依轩照相馆召开会议，决定在孙蔚如的军官学校、邓宝珊的学兵队和水北门驻军中举行起义。在起义前，考虑到兰州水北门在起义中的重要军事位置，派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等共产党员负责策动水北门驻军起义和起义后控制水北门。

4 月初，起义的当天，由于组织联系工作失误、准备不足等诸多原因，只有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石子建等七人以看戏为名集中在一个剧院里。午夜时分，贺晋年等登上水北门城楼，与倾向革命的驻军排长柳明山说明来意，柳明山当即表态：“我一定跟你们走。”

水北门被控制后，贺晋年即派崔仰亭、李培青前往水北门不远处的桥门楼缴守军的枪。桥门楼守军一发现，立即开枪。顿时，兰州全城响起一片枪声。双方在桥门楼的战斗相持两小时许，仍没有等到军官学校和学兵队的起义队伍赶到。贺晋年分析其中有变，不敢再等下去，立即带着水北门起义的 20 多人绕过桥门楼，从铁桥过黄河直奔靖远，与义勇军在皋兰县会合，被增编为义勇军的一个步兵大队，贺晋年任大队长。

义勇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震惊了甘肃国民党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即令兰州驻军和马鸿逵、马步芳等组成甘宁青三省联军，“限期剿歼”。在三省联军步步紧逼下，义勇军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小，最终被包围在靖远县的红砂岘。三省联军以优势兵力向义勇军发起进攻，王儒林率一个中队在前山抵抗，孙作宾、李慕愚率主力据守后山。义勇军从清晨一直打到午后，子弹打光，伤亡惨重。在突围战斗中，有 200 多战士牺牲，孙作宾、贺晋年、王儒林、李慕愚等 30 多人被俘。在被押送兰州途中，三省联军袁福昌团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拴在马尾上，到晚上怕他们逃走，又把他们装进口袋，锁在房子里。除贺晋年、王儒林趁士兵疲惫疏忽之际先后脱险外，其余全部被关人兰州监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孙作宾、李慕愚等获释，但大部分被杀害，其中有史悟亭、吕振华、赫新亚、崔仰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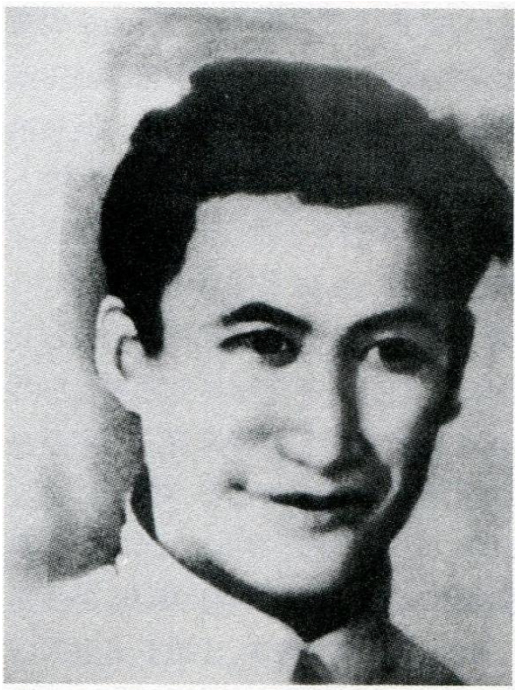
这期间，蒋介石向杨虎城施加压力，破坏杨虎城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不仅免去孙蔚如的宣慰使，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而且收买驻天水的杨虎城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迫使孙蔚如撤出兰州。邵力子挽留杜斌丞在省政府任秘书长，被婉言谢绝，杜斌丞称病回陕。

1933 年初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借驻陕南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换防甘肃天水之名，把孙蔚如的驻甘陕军派到陕南“剿共”的最前线，与进入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

第四十六章

挥师北上

刘志丹临危受命


刘志丹

杜衡到陕甘游击队撤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勒令其离开部队之后，在旬邑县的马家堡亲自主持对陕甘游击队进行改编。他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政委李杰夫，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政委黄子文，杨重远任参谋长。命令游击队到永寿、耀县、三原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932 年 5 月初，陕西国民党调集重兵，分兵八路向永寿、耀县、三原、旬邑、正宁一带的陕甘游击队发动了“围剿”。井岳秀调出高双城部的几个团从扶施南下；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十七师四十九旅、十一旅西出甘肃；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的几个团从三原、耀县由东而进，企图将游击队一举歼灭。

5 月 10 日，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中共陕西省委急令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原来的编制，并决定成立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刘志丹临危受命，分析敌我力量后，提出要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须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和“游击运动”的战术，机动灵活地穿梭在国民党军队的缝隙里。

在部队开到清水塬集结时，队委会召开会议，分析了敌情，认为北面

国民党军队分散，又距西安、肤施较远，指挥迟缓，增援不易，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地区，有利于游击队作战。队委会决定部队向国民党军队空虚的北面转移，寻机打击薄弱之敌。作战策略和方向确定后，刘志丹即率领部队从清水塬出发，向宜君、中部、洛川、都县、宜川等地挺进。

这时，以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正处创建之初。照金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小镇，坐落在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五县之交界处，北连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问山岳绵绵，十分便于红军活动，大有发展前景。

在照金的西南是三原武字区。大革命时期，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陕西的乔国祯与唐玉怀、庞诚斋等首先在武字区发动了农民运动，成立农协会；后因乔、唐、庞被冯玉祥部驻军王少猷抓捕，农民运动一度受挫。但不久，唐玉怀、马先民等十余人又秘密成立“抗敌委员会”，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队伍，由黄子文任总指挥，以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近两万之众，举行“交农”斗争，冲入三原县城，国民党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当年粮款全免。渭华起义爆发后，黄子文等为配合渭华起义，发动农民武装围攻三原县城，因马仙舟叛变告密，冯玉祥部驻军缴了武字区农民武装的枪支，黄子文、雷展如等被扣押，致起义失败。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建立陕甘根据地之初，三原武字区保存的中共组织和农民武装积极出人出枪，并很快在照金、武字区及陕甘边雨后春笋般组织起了几支地方游击队。

九战八胜

1932 年 5 月 15 日，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主力进入中部县。当天，部队乘夜袭击了马栏镇，歼井岳秀部五一一团两个连及部分民团，毙俘 200 多人，缴枪 200 余支。

5 月 17 日，游击队主力沿马栏镇经转角镇朝宜君县前进。在宜君县，部队向桥山主峰凤凰山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歼守军两个连，大获全胜。当日，部队乘胜挺进焦家坪和五里镇，歼两地民团武装。在一天之内，游击队在凤凰山、焦家坪和五里镇接连三战三捷，共歼俘国民党地方武装 500 多人，缴获长短枪一 400 多支。在五里镇这一带有个土豪叫杨百万，是五

里镇的民团团总，家有酒坊、钱庄和大量土地，平素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游击队打开五里镇，活捉了杨百万，并召开大会进行公审，后开仓放粮，救济穷人，使当地群众热情高涨，有许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报名参军，红军很快扩大到 1000 余人。

5 月 22 日，根据地方群众反映，白水县尧禾镇的民团团总是个大地主兼商人，无恶不作。游击队主力从五里镇出发，向东挺进，决定在白水县境歼灭尧禾镇民团。部队赶到尧禾镇，镇上民团闻风而逃，游击队开仓放粮，救济穷人，使红军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在尧禾镇，刘志丹召开队委会讨论了游击队的行动方向，确定部队继续向北运动。部队离开尧禾镇，又急转北上进人中部县隆坊镇。

隆坊镇地处一个小平原上，土地肥沃，盛产小麦，但由于大部分土地被土豪地主霸占，老百姓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游击队主力一到隆坊镇，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分地分财产的活动，家家户户一下子有了好日子。当地群众热情拥护红军，又有许多穷苦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使游击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游击队在这里稍事休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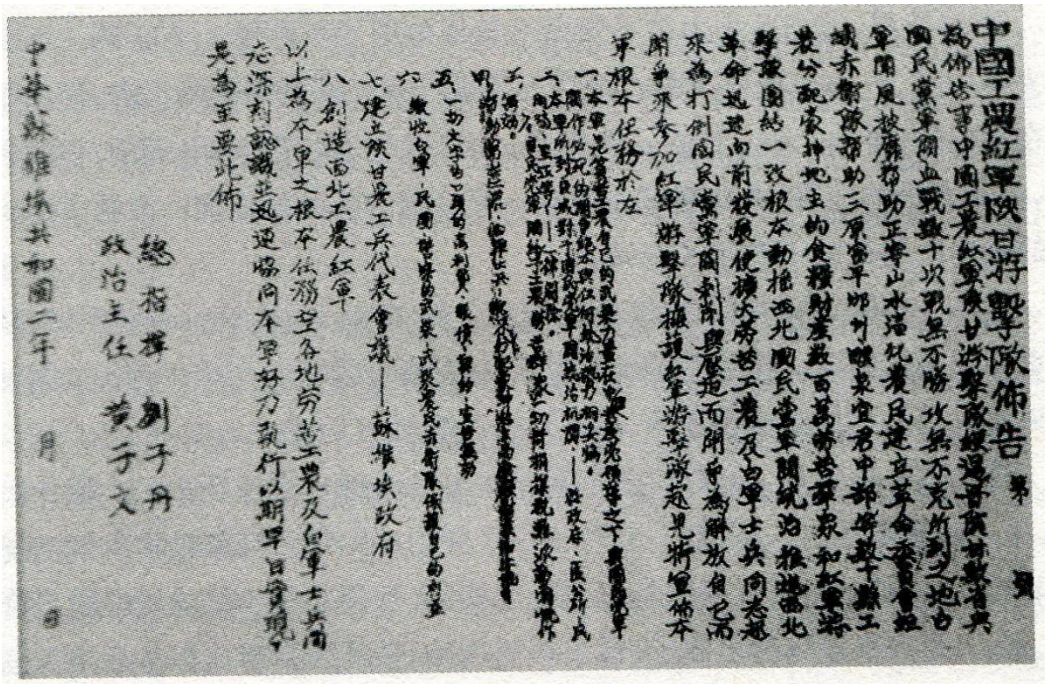
5 月 27 日，游击队主力离开中部县隆坊镇，向鄜县吉子岘进军。行军途中，许多农民群众跟着到吉子岘镇去斗争土豪分粮。这时，因连打胜仗，指战员产生麻痹思想，致使尾追在后的杨虎城部孙友仁的便衣队混入群众之中。

吉子岘镇地势险要，人口集中，是一个大堡子，游击队开进吉子岘镇的当天，孙友仁军队距吉子岘镇还有 20 多里，便衣队未敢轻举妄动。游击队在镇子上忙碌地开仓放粮，宣传队活跃地进行文艺演出，全镇一派热闹气氛。

第二天清早，游击队正准备开饭，发现孙友仁军队。此时吉子岘镇已被包围。孙部与便衣队里应外合，向游击队发起进攻，使游击队面临被消灭的险境。刘志丹当机立断，立即集合部队，并主动舍弃所带的辎重，命令迅速撤出吉子岘镇，抢渡洛河，向东突围。同时，命令侯风孝等带着一个大队，掩护大部队撤离。

侯凤孝等先与冲入镇子的孙友仁军队短兵相接，怕死的士兵被打得四处乱窜，纷纷躲进老百姓的院子里。接着，孙友仁大军冲入镇子，并很快将镇子占领。

刘志丹率领游击队刚渡过洛河，天空突然雷鸣电闪，骤降大雨，洛河水涨，将孙友仁军队隔在河对岸，使游击队脱离险境。但是，侯凤孝带着的后卫掩护大队一部分和未及撤出的少先队却被隔在了河对岸。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陕甘游击队布告

侯凤孝带着少数游击战士和少先队员从一条岔路向西面撤去，结果退到一个断崖绝壁之处。侯凤孝的子弹打光、身上负伤，宁死不肯当俘虏，毅然从崖壁高处跳下沟底，有不少战士和少先队员也跟着跳下去。侯凤孝摔成重伤，夜里从水坑中爬出，被老百姓发现，后由群众送回部队。未及从崖壁跳下去的战士和少先队员全部被俘虏，关押到镇子上一座庙宇的厨房里。

是夜，被关押的战士和少先队员一个个从烟筒里钻出来，经群众帮助，渡过洛河，回到了部队。在吉子岘镇这次战斗中，红军伤亡很大，减员不少。

游击队主力从吉子岘渡洛河，于第二天撤到洛川县三道塬。在三道塬休整时，击溃高双城部一个营。在三道塬，游击队召开了队委会，刘志丹等认真地总结了吉子岘战斗的教训，认为部队不能只顾躲避，应随时掌握

敌情，一有机会就歼灭国民党的零散力量。

30 日，游击队主力转移到洛川、郎县、宜川三县交界的牛武镇。刚到牛武镇，获悉井岳秀部董卓五(一说陈仲威)的一个营已到英旺，企图截击游击队东进，刘志丹决定趁董卓五立足未稳，出其不意歼灭这个营。

是夜，刘志丹先选派熟悉英旺镇地形的一个姓王的中队长带领 30 多名精干战士组成奋勇队，先行出发，偷占英旺镇的东山制高点，观察镇上敌情。随后刘志丹率领部队急行军，翻过一座大山，向英旺出发。

31 日凌晨，游击队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英旺镇。英旺镇三面有三座大石山拱卫，山上梢林茂密。董卓五营虽没有修筑坚固碉堡工事，但由于镇子在半山腰，半山半城，下临一条川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部队一到英旺镇，经刘志丹的部署，由高岗首先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与连夜已占领了东山高地的奋勇队居高临下控制了全镇。

战斗一打响，高岗带着的队伍从东山上压下来。阎红彦带着骑兵队，从川道直冲到英旺镇前。镇子里的守军慌乱中从城门洞冲出，企图突围，被阎红彦的骑兵队迎头打得缩进镇子里，骑兵队快马紧随其后直冲人城内。

骑兵队一进镇子，马佩勋、刘明德就带着几个战士快速跃上一个墙头。这时，从一座庙里传出一阵枪声，刘明德被子弹击中牺牲。马佩勋愤怒地向躲进庙里的一股顽军冲去，从窗外扔进几颗手榴弹，炸得庙里士兵纷纷缴枪投降。

有一股守军拼死冲出镇子，慌不择路逃跑，被高岗带着队伍从后山压到沟底，又被阎红彦带着骑兵队堵住沟口将其团团围困，被迫全部缴枪投降。被俘虏的士兵惊奇地说：“怎么神不知鬼不觉你们就来了，难怪老百姓说你们红军是神军。”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歼俘董卓五营 3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300 余支、子弹 2 万多发，还有大批军需物资，并救出在探亲途中被国民党抓到英旺镇的游击队员唐青山。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陕甘游击队在刘志丹、高岗、阎红彦等的指挥下，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走一处打一处，九战八胜，歼俘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武装 14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1200 多支，粉碎

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

临真镇失利

陕甘游击队在英旺镇一仗后乘胜前进。刘志丹决定继续北上，奔袭甘泉县的临真镇(今属延安市)。临真镇位于肤施县以东百里地外，是一个山区小镇，云岩河由西向东从镇子南边流过，镇上驻高双城部的一个营。镇子的东山边有一个山寨，可以控制全镇。

1932年6月3日，部队急行军一夜，没吃没喝，赶到临真镇时天近凌晨，战士已十分疲劳了。刘志丹立即部署战斗，命高岗指挥第二支队攻打守军东山的山寨阵地，阎红彦指挥大部队从东、西、南三面迂回，掩护高岗的主力进攻。高岗按指定位置攻占了守军山寨旁的东山制高点，刘志丹等不及高岗发起进攻，即一面派人打探高岗在东山的情况，一面命阎红彦正面打进镇子内。

镇子里的守军已经发觉游击队的动向，组织起200余人的队伍像蜂群一样突然向冲进镇子的游击队反扑过来。由于守军来势猛烈，进了镇子的游击队员被冲散。刘志丹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边打边退，向东撤去。当撤至一个高畔处，被前面的一处断壁挡住退路。为摆脱险境，刘志丹命令随撤战士全部从断壁跳下，始甩掉守军的追击。

临真镇守军乘机集中火力，向高岗占领的东山阵地上发起攻击。高岗被迫放弃东山制高点，撤退时所带领的第二支队亦被守军冲散。高岗还要继续组织兵力反击，中队长党益山认为再继续打下去，非但不能攻下东山寨子，还势必使游击队伤亡更重，但高岗不听党益山的劝谏。无奈之下，党益山命战士强行缴了高岗的枪，硬拉着高岗退出战场。这时，游击队主力已向东撤去，高岗和党益山仅带19名战士向西撤出，与刘志丹失去了联系。

这次战斗，临真镇守军是被动的守势，游击队处于主动的攻势。按兵力，我强敌弱，歼灭临真镇一营守军应有把握，但由于游击队在取胜后有轻敌思想，加之高岗与阎红彦在发起进攻时配合不好，未能分散守军火力，且守军事先已有准备，使得临真镇不但没有攻下，游击队反而减员四分之

一。

陕甘游击队攻打临真镇失败后，转移到宜川县集义镇休整。休整期间，在阎红彦的提议下，刘志丹于 6 月 4 日召开了队委会。在会上，大家讨论认为，

高岗对临真镇战斗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决定开除高岗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光杆司令”

高岗在攻打临真镇时所指挥的陕甘游击队第二支队被临真镇守军冲散，高岗与党益山仅带着 19 个战士向西撤出，当晚到麻洞川东面的梢沟村南山歇息。

夜里，高岗派党益山从南山下到梢沟村，想打听一下游击队的去向，好寻找刘志丹很快归队。一进得村子，正好碰到高朗亭带着的先锋队。先锋队也是遭国民党军队袭击后撤到这个村。党益山被高朗亭扣了起来，并被缴了枪(正是高岗的短枪)。党益山说自己是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长，大队长是高岗，在临真镇被高双城守军打散，现住南山，是下梢沟村打听寻找大部队，并说：“正好是你们，是自己人。”

高朗亭的先锋队里一个战士叫刘益三，1929 年在延安中学念书时认识高岗，知道高岗在肤施搞过学运、兵运。高朗亭听后仍不相信，让党益山空手上山，通知高岗下山来相认。不多时，党益山带着高岗来了，高岗身上只挂个空枪套子和子弹带。刘益三告诉高朗亭，来人确是高岗。

高岗将他和党益山被临真镇守军冲散的过程及刘志丹领导陕甘游击队的情况向高朗亭详说一遍后，询问高朗亭：“你们游击队受哪里领导?”

高朗亭听人们说过是第三还是第四国际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但又说不明白，心想“四”一定比“三”大，便说：“我们是受第四国际领导。”

高岗问：“怎么受第四国际领导?”

高朗亭不知所措地忙作解释说：“第四国际比第三国际更革命。”

高朗亭的一番话，把高岗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经高岗动员，高朗亭同意和高岗联合行动，一道去寻找刘志丹率领的

陕甘游击队。高朗亭把收缴党益山的短枪亲手交给了高岗，并将高岗、党益山带的 19 个战士编入先锋队。

高岗、高朗亭把先锋队分为三个中队，高岗和党益山带来的 19 个战士编为一个中队，原先锋队 80 多人编为两个中队。由高岗、高朗亭带领先锋队向西转移，寻找陕甘游击队的去向，但一直没有得到音讯。先锋队行至扶施县城南的马不踏河红市村时，因高朗亭在延长县与国民党军队的遭遇战中受伤，伤势严重，无法行军，只得留在地方治病，决定由高岗和参谋长杨作栋带领先锋队，继续向甘肃的盘克塬方向开去。沿途经杜甫川到安塞县的高桥，一路打土豪斗地主，筹集经费，开仓放粮，避敌锋芒，打其弱小，缴获了小股民团的一些枪支和七八十头骡马及军用物资。

这时，扶施县城驻军高双城旅发现先锋队的行动，派出一营军队尾追而来。当先锋队行进到安塞至保安两县交界的安条岭深山处时，已埋伏在安条岭的保安县民团 150 多人将先锋队团团包围，顿时枪声大作。高岗指挥先锋队英勇作战，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被动。

正当危急关头，先锋队带着的几十匹骡马一听枪响受到惊吓，扭头朝着安条岭的山下狂奔而来。尾追的高双城旅一营军队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骡马惊驰之势就把队伍冲乱，先锋队战士乘隙躲入右侧梢山里隐藏起来。党益山带着的 19 个战士被打散后，埋枪散伙；参谋长杨作栋带着的两个中队撤到扶施县蟠龙，后转清涧一带。

高岗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跌入深沟的灌木丛中昏迷过去。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保安县民团和高双城旅一营军队已全部撤走，先锋队也不见了人影，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高岗折根树枝做拐杖，一拐一拐地找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随后辗转到西华池地区，住到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的家里养伤。

香山突围

1932 年 6 月 8 日，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离开宜川县集义镇，转入韩城县境。在韩城县上官庄，游击队与党组织第一次取得联系，并与中共韩城特支在这里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在韩城县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带，唐澍、李象九、白明善、谢子长等领导的清涧起义部队曾进行过革命活动，群众基础好。游击队一到这里，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打土豪斗地主，建立了赤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

当部队从西庄镇出发，西进开往西原村，途经韩城县城外时，县城内的国民党守军紧闭城门，不敢放一枪一弹，只是趴在城墙上惊恐不安地张望。

西原村群众基础好，部队以西原村为中心，配合地方农会积极开展抗粮抗税斗争，分了前清状元王杰家的粮食。召开群众大会，让妇女代表第一次登台讲话，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会问，国民党派出便衣特务数十人混入会场，企图破坏捣乱，被赤卫队全部抓住。

为了在韩城县境内外扩大红军的影响，刘志丹派出马佩勋、刘约三带领骑兵大队，到沿黄河两岸、芝川镇等地开展群众活动十多天，一时革命形势十分高涨。

6 月下旬，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向韩城县扑来，步步朝陕甘游击队逼近。部队决定集中兵力，在禹山、香山布阵待敌。

6 月 22 日，冯钦哉军队向禹山、香山发起进攻。驻守在禹山的游击队首先被冯钦哉军队分割包围。刘志丹派强龙光带着援军赶到禹山时，在那里坚持战斗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已被迫撤离，禹山已经被冯钦哉军队占领。

冯钦哉军队占领了禹山后，又向香山扑过来。刘志丹被迫把部队集中在香山。冯钦哉军队逼近香山，派出先头部队化装成便衣冲上山来，企图偷袭。刘志丹识破其阴谋，命杨琪带着骑兵队抄其后路，经几个回合的冲杀，虽打得冯钦哉先头部队溃逃下山，但骑兵队长傅有余不幸中弹牺牲。后来，冯钦哉的大军从四面分散展开，向山上发起总攻。

刘志丹刚登上香山庙楼嘹望，突然逼近山上的冯军打来一排重机枪子弹，刘志丹身边的马佩勋脸部负伤。刘志丹用望远镜观察山下，只见冯钦哉军队在山下黑压压的一片，已形成一个包围圈。固守香山阵地已不可能，如延误突围时机，只能坐以待毙。

天近下午，刘志丹决定赶天黑前率领部队突出冯钦哉军队的包围圈，把游击队撤到黄龙山一带。在突围前，刘志丹根据部队骑兵、步兵的战斗

优势，命令游击队突围后，骑兵从川道撤退，步兵退人山里的梢林，以摆脱冯钦哉军队的追击，然后在黄龙山会合。

据有关史料记载，游击队在这次禹山、香山战斗中失利，尤其在香山突围战斗中损失惨重。游击队突围后，经过澄城、蒲城、白水、宜君等县向西转移，由于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当退至甘肃正宁县盘克塬时仅剩下200余人。

部队退至正宁县盘克塬的麻子掌、梁掌堡一带，干部中出现悲观情绪，战士思想发生动摇，士气十分低落。在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上，游击队领导成员中发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人主张到三原一带打游击；有的人主张北上桥山。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主张南下的游击队领导人李杰夫提出“愿意南下的跟我南下，愿意北上的跟刘志丹走”。由于李杰夫这种错误的鼓动，游击队领导成员形成两派，部队一时出现争人、争枪、争马的混乱情况。这时，在黄龙山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阎红彦、杨琪正好返回。杨琪见此情景，伤心得落了泪。

阎红彦

在这种情况下，阎红彦建议召开党委会，解决这一分歧。在会上，阎红彦陈述利害，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制止了部队“南北分家”。同时，为了克服部队中悲观失望的情绪，统一思想认识，大家总结了香山突围战斗，一致认为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游击队也很难立足，仍应在陇东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建立根据地。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游击队的领导进行改组，撤销了刘志丹的总指挥和李杰夫的政委职务，推选阎红彦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第四十七章

两当起义

王德修营换防

在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将要挥师北上之时，习仲勋、刘林圃等领导发动的两当起义部队在岳御寺遭遇失败。

习仲勋，陕西富平县人，生于 1913 年。1925 年初小毕业，次年进入胡景翼创办的立诚高小，因成绩优异成为该校少数公费生之一。入学不久，由宋文梅、武子缜介绍加入青年团。该校校长严木三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学时参加青年团，在这里还发展唐玉怀、宋光龙、白振江、惠忠德、严守约、贺廷璋、赵承琨等十多人为青年团员。1926 年秋，因严木三在立诚高小多次发动学生运动，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仇视，学校政治形势和学习环境发生变化，习仲勋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小。不久，严木三也被聘任为这所学校的校长，此时，他已是中共富平特支书记兼共青团特支书记。这所学校成为中共富平县党团组织领导中心和培养发展革命骨干的阵地，习仲勋成为学校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1927 年底，习仲勋高小毕业，次年春考入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校训育主任魏海是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到学校监督学潮运动的反动分子，他掌握到学生中有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王秉衡、李彦仓、华岳重、董子平、习仲勋等 9 人是共青团员，即列出黑名单。此事引起中共三原县委的高度重视，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廷俊召集宋文梅、习仲勋、程建文开会商量对策，决定采用投毒的方法除掉魏海。结果因巴豆等投放量小，毒杀魏海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暴露行动。“三师毒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国民党三原县长马润昌带着军警百余人将学校包围，按照魏海

提供的黑名单，把习仲勋和李彦仓、王秉衡、董子平、华岳重、刘继锷、高天作、刘全中、惠贞祥逮捕。次日将武廷俊和程建文逮捕，后除程建文被送往西安模范监狱外，习仲勋与其他人被关在县衙的看守所。此间习仲勋经武廷俊介绍加入共产党。

6 月，武廷俊、习仲勋等 10 人被押送到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军事裁判处处长萧振瀛看见习仲勋等 9 名学生都是些衣衫破烂、身体瘦弱的孩子，遂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报告。据说那天宋哲元推门步入办公室时，正好一阵风来，把摆放在案头的一沓公文吹落地下，他捡起一看，原来是关于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呈文。宋哲元认为此案“一风吹”是天意使然，遂下令将习仲勋等 9 名学生释放。

8 月，习仲勋从西安军事裁判处被释放回家后，父母相继病亡。在此期间，习仲勋在中共武字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黄子文、唐玉怀等组织的农民抗粮运动，在乡间的伙伴中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发展周冬至、胡振清、姚铭路、刘铭世等人加入共产党。

1930 年春，中共三原武字区组织派习仲勋、郭明效打入长武县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个支队长叫王德修，与习仲勋相识。王德修是三原县大程人，早年参加青年团，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政治部担任过由党组织办的“廿八书报社”主任。1929 年全陕大旱，灾民四起，王德修在乡邻中组织青壮年打土豪“吃大户”，后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发展起一支 300 余人的队伍，受时已树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后在三原、富平一带成立了“渭北灾民自救队”，王德修部被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

同年 6 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山因不满冯玉祥的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成立了西北民军并任总司令。王德修的队伍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此时，毕梅轩部正在扩军，部队里已有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共产党员在开展兵运活动，李秉荣时任第二支队第三连副连长。习仲勋到了长武，原认为这支部队兵运基础好，对王德修抱着很大希望，但他很快发现王德修胆小怕事，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甚为消极。王德修见习仲勋年纪虽小但机警干练，有意让习仲勋担任支队的通讯排长，因习

仲勋要求下连队，即派到唐万寿的第二连任见习官。

王德修的第二支队因是地方杂牌武装，队伍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官兵待遇低下。由此，军官经常克扣军饷，士兵生活十分艰苦。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三人组成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党小组工作，决定以第二连为兵运工作的重点，利用同乡同里关系，在士兵中联络感情，与士兵结成拜把子弟兄，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发展共产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完全控制第二支队。

不久，习仲勋随第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在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王子轩为人豪爽，讲义气，好结交，骡马店便成了他们开会接头的联络点。同时，习仲勋与王子轩、刘士荣、刘警天及第二连连长唐万寿结为拜把子弟兄。

习仲勋

秋冬之交，杨虎城任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对地方杂牌军进行了收编。在收编中，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山拘押枪杀，并命孙蔚如师剿办甄师，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收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二营营长王德修，习仲勋时任二营二连特务长。改编后的二营随苏雨生驻防彬县。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经过一年时间的活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发展，全营党员已达 30 余人，成立了中共营委会，李秉荣为营委书记，后由李特生继任。

1931 年 4 月，苏雨生叛杨。杨虎城得悉后，派出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对苏部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只留第一团协同王德修二营守护

城防。苏雨生出逃时，王德修曾生随苏逃跑之念。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营委最后决定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王德修的赞同。于是，二营官兵在中共二营营委的发动下，趁其不备，迅速发起攻击，缴了第一团的枪械。待杨子恒率部进入彬县城内时，战斗已告结束。后王德修二营归编为唐嗣桐旅第二团第一营，王德修仍当一营营长。

5 月，王德修一营奉命转移到凤翔县整训。此时，不满 18 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入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带，马青苑部和唐嗣桐旅第二团奉命南行攻打川军。部队到达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交锋。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第一连、机枪连驻风县城内，第二连驻双石铺，第三连驻甘肃境内的两当县。

当时，全营班排长多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有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分别担任班长和副班长；二连有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有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有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还有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机枪连是进驻凤县后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而刚组建的一个连，习仲勋、刘书林经常有意接近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

根据王德修营党的力量不断壮大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特别重视这个营兵运工作的开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省委曾先后派省委委员焦维炽、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到王德修营与中共营委讨论起义的事宜。习仲勋等

在王德修营的活动引起第二团团长曹润华的注意。曹润华将王德修营中的四个连长撤换了三人，以防不测。同时，曹润华作出决定，即令一、二营互换防地，王德修一营由两当县调迁到甘肃徽县、成县一带驻防。

成立红五支队

1932 年 3 月，王德修营接到换防命令。徽县、成县地处边远，山大沟

深，全营士兵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到那个艰苦的地方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顿时在全营蔓延开来。习仲勋紧急召开中共营委会议，商讨对策。经一番讨论，营委会决定因势利导，利用换防之机立即举行起义，把王德修的一营队伍拉出去，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中共陕西省委同意营委会的报告，并派出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直接指挥这次起义。

4 月初，王德修受命带着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向甘肃徽县、成县新的换防驻地方向开去。途经双石铺，二连人列继续前行。天黑不久，队伍到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宿营。营部驻县衙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衙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负责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负责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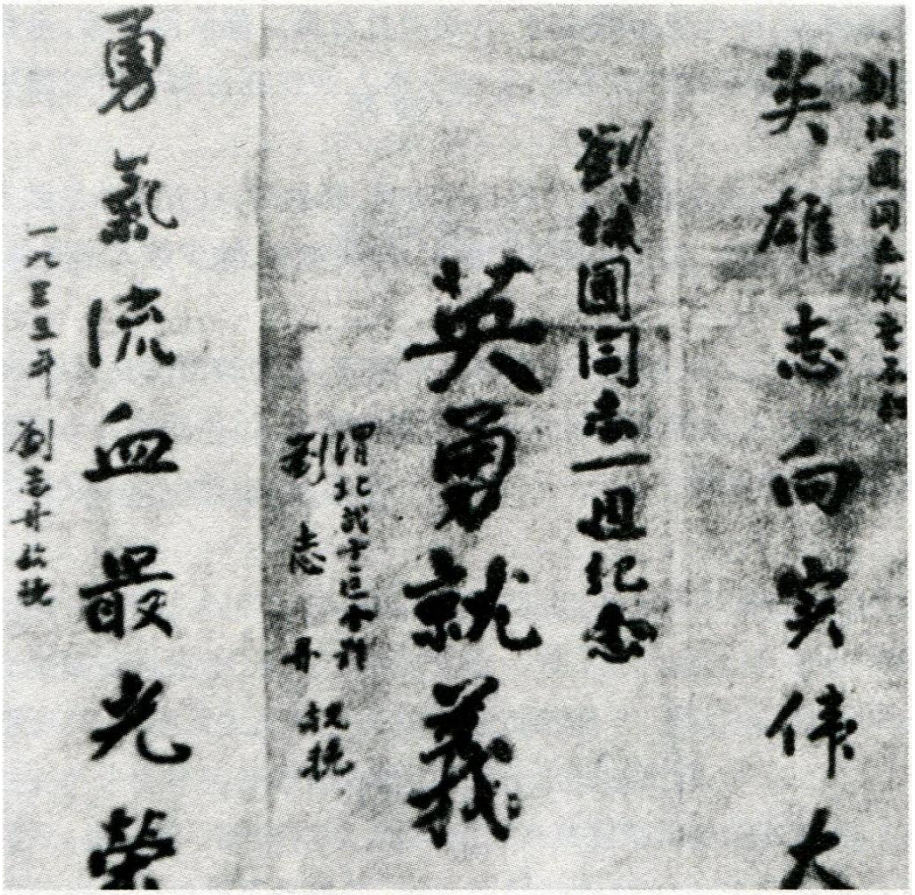
当晚 9 时许，在北街一个骡马大店内，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由刘林圃宣布省委关于举行起义的决定。遂决定起义在当夜 12 时举行。具体分工是：对一、二、三连的连长，起义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对非共产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随队伍行动待处；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武器；营部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合撤离。会上，决定由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午夜 12 时许，一、二、三连按照预定时间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非共产党员排长的枪支。三连的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一个营部副官一并处死。营长王德修听得午夜枪声大作，惊慌地带着警卫班翻墙而出，向凤县方向逃走。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但因机枪连已有防备，一连士兵连续进攻几次未果。鸡叫时，集合号响起，各连赶到县城北门外集合。

在这次起义中，除机枪连一部分未能拉出外，其余三个整连约 300 人均参加到起义的行列。天亮前，刘林圃、习仲勋带着起义队伍离开两当县城，顺着一条小河向北开去。

起义队伍一夜急行军，于第二天中午时赶到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始生火做饭。饭后，营委开会决定将队伍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

队第五支队(简称红五支队)。由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委，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在红五支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上，营委会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向长武县亭口镇方向移动，与谢子长、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



刘志丹为纪念刘林圃烈士牺牲一周年题写的挽联

红五支队离开太阳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涉水过了渭河后，在赤沙、香泉遭到土寨子民团的袭击。部队又前行 30 余里，到达一个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又遭地方武装伏击。队伍冲出通洞峪，几天后赶到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

从高崖镇向东北方向前行时，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的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路，截断队伍北去通道，红五支队多次发起进攻，队伍严重受挫，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习仲勋立即召集队委会紧急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讨论决定：一、部队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

武县亭口镇找关系，给部队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通过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部队接受改编，以争取抢渡泾河的时间；四、红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进抵岳御寺待命。

红五支队按照队委会的决定，在许天洁、李特生的带领下撤离蔡家河，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待赶到岳御寺时，已是次日清晨。部队刚宿营，未料到宿营之地正好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的底角村。

上午 10 时许，当发现王结子的几百步兵、骑兵时，红五支队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激战数小时，红五支队伤亡惨重，弹药殆尽，除少数人逃脱外，其余均被缴械。

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到西安，旋即被国民党逮捕，刘林圃英勇就义。习仲勋、左文辉赶到长武县亭口镇的第三天，始获悉红五支队在岳御寺全军覆没的不幸消息。

第四十八章

西华池起义

曹又参和他的新编独立营

在刘志丹、高岗、阎红彦率领陕甘游击队北上外线作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在正宁县盘克塬一带的部分游击队和红军留守后方总指挥部机关，处境日见危急。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杨重远、马云泽随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主力从香山突围后，先行返回盘克塬。

杨重远、马云泽一到盘克塬，就得到曹又参营第一连连长高鹏飞派出连文书苏杰如前来后方总指挥部送信，报告西出的孙蔚如军队已逼近盘克塬形成对游击队的“围剿”态势。根据高鹏飞所报告的情况，杨重远、马云泽认真分析后认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爱国军官，特别是进逼正宁的石子俊第十一旅曹又参营，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很忧虑，从思想上不愿意打内战，可以利用这些爱国军官的抗日热情缓和与游击队的正面交战。

曹又参，又名汉杰，陕西横山县人，生于 1901 年。1921 年至 1925 年在北京平民大学上学期间，与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交往甚深。1925 年大学毕业后，应杜斌丞之聘，到榆林中学执教并任训育主任。1926 年，通过关系在靖边县柠条梁当了县佐。1927 年秋石谦被井岳秀谋杀后，曹又参曾联络石子俊、王子元、张润民、杨子显等 30 多个连的部队，欲与清涧县李象九营和神木县高志清骑兵旅一起举兵“倒井”。10 月，李象九起义部队从宜川突围，曹又参派王子元到韩城联络李象九，才知李象九因起义兵败，已被王保民收编。曹又参派人到神木联络高志清举事，高志清借口杜斌丞去平津未回，按兵不动，致这次“倒井”运动未果。

1930 年，苏雨生在宁夏大扩军，中共陕北特委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苏

部开展兵运活动，曹又参也投到苏部，在石子俊第九旅当了参谋长。不久，苏雨生被西北“五马”打得兵败陇东，曹又参随石子俊第九旅被雷中田收编为第三旅，后陕军孙蔚如入甘，驱逐雷中田，第三旅又被孙蔚如收编为第十一旅。

同年冬，曹又参辞去旅参谋长之职，搞起一个新编独立营，下辖四个连。1931 年，中共陕北特委派胡立亭到曹又参营开展兵运活动，负责中共陕北组织与曹营的联系。

这时，孙蔚如命石子俊第十一旅为前锋部队，曹又参营的一、二两个连已开拔到西华池，对西进的陕甘游击队形成截击之势。曹又参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营里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在活动，所以，部队一到西华池就按兵不动。

在曹又参营第一连任连长的高鹏飞是中共陕北特委最早派遣打入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的共产党员之一。在高鹏飞的活动下，第一连已完全控制到共产党的手里。

高鹏飞 1929 年受中共陕北特委派遣人苏雨生部王子元第十五团学兵队，从学兵队毕业后不久分配到曹又参营第一连当了第一排排长。当时，李仲英是第二排排长，曹华山是第三排排长。由于第一连的三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连里很快建立了党支部，由高鹏飞任支部书记，并发展了康建明、苏世杰、苏杰如等不少党员。

第一连原任连长叫芦子元，是个贪污腐化、克扣军饷、抽大烟嫖女人、暴虐士兵、无恶不作之徒。高鹏飞、李仲英、曹华山、曹盛荣等为了揭露连长芦子元的罪行，组织士兵查账，查明了连长芦子元贪污公款、克扣军饷的事实，并查获其抽大烟的烟枪和大量烟土。芦子元的丑恶行径一经揭露，他又怒又羞，自感无地自容，欲自杀未遂，即悄然离队出走。高鹏飞接任第一连连长后，曹盛荣接任第一排排长。从此，高鹏飞、李仲英、曹华山、曹盛荣等把共产党的活动渗透到曹又参营的各个连。

1932 年 6 月间，谢子长在甘肃靖远县王子元部领导发动起义失败后，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途经隆德县时与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璧等几个共产党员相遇。谢子长为了加强曹又参营共产党的力量，

将他们派到曹又参营，协助高鹏飞在第一连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璧等受命到曹又参营后，高鹏飞立即把他们派到各班排，成为这个连武装起义的骨干分子。

潘立夫磨刀霍霍

1932 年 6 月下旬，杨重远、马云泽通过高鹏飞的关系对石子俊第十一旅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决定首先与石子俊取得联系，做争取石子俊的工作，以分化瓦解孙蔚如军队的“围剿”锐势，使红军留守后方总指挥部机关和西进的陕甘游击队摆脱险恶处境。

石子俊和曹又参都有爱国思想，又与马云泽是老相识。马云泽即给石子俊写信，信中建议石子俊停止内战，与游击队联合抗日。马云泽送去的鸡毛信，传到高鹏飞之手。

高鹏飞因与曹又参是同乡，两人关系甚密，即拿着信直接去找曹又参营长。曹又参看信后，在高鹏飞的促成下，表示赞同游击队的主张，并同意由红军派出代表，到营部驻地进行谈判。杨重远、马云泽得讯后，与李杰夫从正宁县盘克塬出发，迅速赶到曹又参的营部驻地西华池。

此间，在安条岭战斗中负伤的高岗辗转到陇东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郑德胜家养伤，伤情未愈，也到曹又参部队进行兵运活动。曹又参既是高岗的同乡，又是高岗在榆林中学上学时的老师。高岗在争取曹又参与共产党联合并坚定其与红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高岗为方便出入曹营，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便让曹又参营中的共产党员李树林搞来一身军装换上，扮作军人模样亲自到曹又参家，要求曹又参排除石子俊部中一些顽固分子的干扰，对游击队给予支持。同时，他与高鹏飞、曹盛荣等党员一起商讨部队起义事宜，并派人到盘克塬联系，要求游击队主力接应起义后的队伍。

杨重远、李杰夫、马云泽在与曹又参营的谈判中，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为重，宣传共产党的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曹又参和曹营一些爱国军官深表赞同，愿意停止内战，与红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但是，曹营中的顽固势力坚决反对曹又参与红军联合抗日，特别是营附潘立夫勾结该营二

连，秘密将曹又参

与游击队代表的谈判情况上报，并准备对曹又参及赞同联合抗日的军官秘密夺权。

正在此时，曹又参有要事去了兰州。在曹又参离开西华池的第四天，高鹏飞发现潘立夫勾结顽固势力磨刀霍霍。这时，高鹏飞第一连二排、三排的排长李仲英和曹华山均已调往他处，唯一排排长曹盛荣是共产党员。高鹏飞认为若不抢先采取紧急措施，曹营中的革命势力就可能遭到暗算，使许多革命者人头落地。在这紧急关头，高鹏飞来不及与红军留守后方总指挥部取得联系，经曹营的党支部研究，与曹盛荣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在西华池发动起义。

操场举义

1932 年 7 月 8 日，曹又参营的部队要操练，高鹏飞和曹盛荣等决定乘机举行起义。高鹏飞派曹盛荣带领第一连的士兵，全副武装，佯装在操场上练刺杀。在同一操场上操练的第二连本来枪支就很少，高鹏飞派几个党员秘密活动，叫把枪支全部架在一起，让士兵们做徒手操。这时，营附潘立夫全副武装，来到操场上观看操练。潘立夫一到操场，高鹏飞和两个党员马上迎过去，对潘立夫说：“天气太热，操练事小，用不着营附操劳，请到凉窑里去打麻将。”

潘立夫想进一步摸清高鹏飞“通共造反”的底细，也随机应变，跟着进了操场边第一连连部的窑里。麻将刚打一圈，潘立夫就皮笑肉不笑地说：“高连长，听说共产党活动得厉害，你可要注意呀!”

高鹏飞看看门外，见第一连的士兵提枪挥刀，练得正勇，就针锋相对地说：“营附，你不要眼睛光盯着共产党，也要看看祖国，看看山河，看看受苦的老百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最近又占了上海，多少同胞被残杀，多少百姓在受难，我们不能当汉奸呀!”

潘立夫恼羞成怒，厉声大吼道：“啊，你这不是给共产党宣传吗?”

高鹏飞手起枪响，“叭、叭”两声，击毙了潘立夫。随即提枪出门，大声喊道：“大家注意，破坏抗日救国的潘立夫已被枪毙，谁再破坏，也不客

气!”

这时，曹又参营第一连的曹盛荣、杨林、高昆山、高照璧、郝维新、康建明、苏世杰、苏杰如等和联系好的士兵，听到枪响，立即提刀亮枪，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控制了整个操场。第二连的士兵惊慌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的跑去提枪，枪支已被高鹏飞事先安排好的第一连几个党员全部收缴了。

曹盛荣等把第二连士兵队伍整顿好，安定了他们的情绪后，由高鹏飞登上一个土台子讲话。高鹏飞说：“士兵弟兄们，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的儿子，都是有良心的血性男子汉!可是，大家看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东北都占了，最近又占了上海。红军是救国的、为民的，是帮助穷人翻身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打红军？我们不能昧着良心干事，我们不打红军，要抗日救国，要和红军一起去抗日救国!愿意当红军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当红军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第二连的连长、排长和士兵们都表示愿意当红军。于是，高岗、高鹏飞、曹盛荣等带领曹又参营第一、二两个连全体官兵起义，离开西华池，浩浩荡荡地开到正宁县盘克塬。高岗也随起义部队回到盘克塬。

时值陕甘游击队最困难的时刻，高岗、高鹏飞在西华池成功地发动起义，不仅补充了游击队的兵员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使得国民党军队对正宁县盘克塬红军留守后方总指挥部的“围剿”及对陕甘游击队的截击之势松弛下来。

高岗、高鹏飞、曹盛荣等带领西华池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主力会合后，刘志丹高兴地对高鹏飞说：“在红军很困难的时候，你带领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补充了红军的兵员和武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贡献很大!”

西华池起义成功，由于高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游击队党委会认为高岗有功，取消了在攻打临真镇时对他的处分。

与此同时，马济人、卢纪民等在甘肃定西县蟾口甘军第五十旅补充团第一营也发动起义。起义部队离开定西县峻口，到达会宁县城南，暂编为一个团，由马济人任团长，卢纪民任副团长，下辖两个营。后从会宁出发，

转入陕西旬邑县境，与陕甘游击队会合，被编为人民革命军，由马济人任司令，卢纪民任副司令，下辖两个支队。9 月初，人民革命军进入清水县关山，遭国民党的千余骑兵部队包围。在突围中，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第四十九章

周旋在“围剿”的缝隙中

“新路线”

高岗、高鹏飞等带领起义部队来到正宁县盘克塬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后，由于这支起义部队武器精良、装备齐全，陕甘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斗志大振。部队在湫头塬进行了整编，阎红彦继续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第二大队队长刘志丹，第三大队队长高鹏飞、副队长曹盛荣，政委阎润品，还有一个骑兵队，队长强龙光。游击队总兵力达 500 多人，红军声威再起。

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塬稍作休整，决定恢复寺村塬七十二村这块红色区域。自 4 月下旬游击队主力撤离以后，寺村塬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占领，原革命委员会、赤卫军的骨干被捕，曾轰轰烈烈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全部解体。

这次游击队主力挺军北上，辗转 10 余县，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折转南下返回寺村塬，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寺村塬七十二村的革命委员会和有关组织很快恢复起来，并开展了根据地的建设活动。

这时，李杰夫的南下主张，不但没有得到陕甘游击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而且游击队党委会连他的政委一职也撤去。李杰夫借口回西安给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灰溜溜地离开部队。没几天，省委派李艮来做政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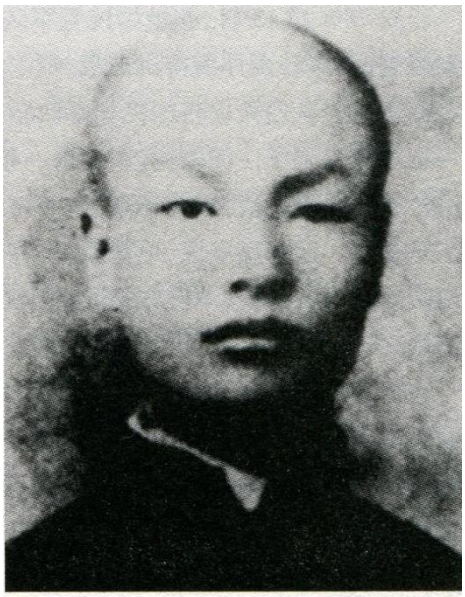
1932 年 7 月 23 日，李艮一到部队，完全不听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人的正确意见，一意孤行，强行宣布取消寺村塬刚建立的七十二村革命委员会，然后坚持要游击队到只有几户人家的正宁县五顷塬一个村进行建

立革命委员会的试点，并限令 20 天内将此村地主的 500 亩土地分配给农民。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仅在一个几户人家的村庄搞土改试点，条件不成熟，分给农民的土地没人敢接受，即使有人敢要，因国民党军队随时准备进攻红军，部队经常转移，其革命成果也很难得到保护。李艮不但听不进去这些正确的建议，反给他们扣上“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的帽子。

同时，李艮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出兵强攻国民党军队的坚固据点；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拉拢一派排挤一派，致使游击队战斗连连受挫，损失很大，把陕甘游击队推向危险的境地。

李艮一到部队，不顾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首先把游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集中起来，令部队停止一切游击活动进行整顿，强令游击队贯彻他推行的所谓“新路线”，传达省委关于“为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批判游击队领导人过去“完全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在右倾机会主义泥坑里”，“在军事上采取了可耻的游而不击的逃避路线”；提出要“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机会主义的领导”等等。就这样，会议一天接一天，进行无休止的争辩，使一些正常的工作陷于停滞状态。

李艮在会上声色俱厉，滔滔不绝，连讲几天话，刘志丹只是一声不吭地听着。最后，李艮朝刘志丹喊：“你怎么不说话?”刘志丹说：“你把话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李　艮

李艮说：“我想听你反对我，我可以和你辩论。”

刘志丹笑着说：“你真是个心直的同志。”

李艮，陕西长安县人，生于 1908 年。1926 年在西安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加入青年团。同年转入共产党。1928 年任中共长安县委组织部部长期间被捕入狱，在法庭上坚决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气概，后经党组织营救出

狱，工作更积极。李艮出狱后先后担任过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西安市委书记，可惜实际斗争经验太少。刘志丹看到他那赤诚之心，觉得又可爱又可恨。所以刘志丹虽一时不能说服李艮，但认为他是个没有私心的人。

当国民党军队的枪声在寺村塬、湫头塬之间的许多地方响起时，李艮主持的整训会议才被迫停止下来。这时，游击队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转入了又一次的反“围剿”战斗中。

“战略进攻”

李艮对战争一窍不通。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建议用游击战术迂回作战，抓住国民党军队的空隙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在灵活机动的运动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可与国民党军队硬拼，更不可打“阵地战”。但李艮主观武断，自作主张，强令游击队“按照各处的险要地形，动员当地广大群众起来……修筑工事”，要“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实行“战略进攻”。

1932 年 8 月 13 日，在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游击队内线作战条件受到限制，本应转出外线待机破敌，但李艮主张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并命阎红彦带领游击队白天攻打国民党军队坚固的据点——王郎坡土围子。

王郎坡土围子三面临沟，东面由一条窄崾峻和湫头塬相连，东寨门口有一个吊桥。战斗打响后，土围子里的守军把吊桥抽掉，居高临下，用火力严密封锁了东寨门。因寨堡坚固，地势险要，在守军强大的火力阻击下，阎红彦带着的部队连攻两天两夜，不仅守军的寨堡未被攻克，反而使部队伤亡严重，弹药消耗殆尽。

8 月 18 日，李艮继续强令游击队攻打王郎坡寨堡。部队还未及出击，马鸿宾的骑兵团和王郎坡寨堡的守军就已经发起了猛烈进攻，游击队反被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经一天激战，游击队奋力拼杀，才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围困，但受到惨重的损失。

当晚，游击队撤出战斗，被迫转移到五顷塬。这时，李艮仍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又强令部队“死守五顷塬，不让国民党军队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土地”，继续要游击队以阵地战保卫根据地。

8 月 19 日，国民党军队向五顷塬发起猛攻。游击队在李艮的瞎指挥下，四面布阵与国民党军队硬拼。国民党军队的步兵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击队奋起反抗，且打且退，一直退到三嘉塬的菜头湾。国民党军队的骑兵已堵死退路，游击队被包围，腹背受敌。

部队激战一天，在全军面临覆灭的危急关头，真可谓“天无绝人之路”，天空原本好端端的一轮艳阳，骤然间下起暴雨，大雾腾起。游击队趁着大雾弥漫之际，突出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向马栏方向转移。

8 月 24 日，部队到马栏集结。李艮到游击队短短 20 多天，由于瞎指挥，连打几个败仗，陕甘游击队锐减到 100 多人，损失惨重，寺村塬根据地丧失殆尽，不少战士流泪离开部队。

在马栏，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吴岱峰等召开游击队队委会，对李艮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可李艮不但没有认识，反而对游击队队委会产生怀疑，遂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和排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并在部队清除“阶级异己分子”，诬蔑阎红彦是“反革命”、杨重远有“反革命阴谋”、吴岱峰是“地主和旧军官出身，有反革命嫌疑”。同时，决定开除吴岱峰，并处罚刘志丹“做饭三天”。

面对红军的严重挫败，李艮仍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所致，还强词夺理指责部队打败仗的根子全在“右倾”，要集中部队训话。阎红彦不让李艮讲话，李艮却非讲不可。刘志丹、杨重远看见两人争执，勉强同意了李艮讲话。当队伍集合起来，李艮刚要开口，下面就哄闹起来。杨琪含着眼泪站起来质问李艮：“你看，你把部队搞成啥样子了?”

其他同志也都愤然站起来和李艮据理争辩。后经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耐心劝解，一场风波才得以平息。对会场上同志们的尖锐批评，李艮并不认错，反而认为“部队中有反革命闹事”。

李艮匆匆离开马栏，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说游击队不信任省委代表。鉴于李艮所犯错误后果严重，省委严肃处分了他。但是，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基本认识并没有改变，仍然强调“改变游击队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

习仲勋到照金

两当起义部队300多名官兵整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在岳御寺溃败，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19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勋来说，精神负担十分沉重。他经长途奔波，体力消耗，心力交瘁，最终病倒。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搜捕，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消息。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周到，因而习仲勋身体恢复较快。白天他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有时帮助饭馆做些拉风箱或挑水之类的杂活，急切地盼望得到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期待着早日回到照金苏区。

1932年6月上旬，习仲勋由长武县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家，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表姐家的后院有一个土窑洞，他便在那里藏身。在这里，习仲勋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系，了解到国民党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起义的其他领导人，他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习仲勋立刻到富平县城找党组织，准备再设法去找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

7月初的一天，习仲勋约了好友宋杰生一同到县城，试图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系。两人趁天色未亮步行十多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原打算在清晨城门一打开就进入县城，却不料太阳升起后很长时间，城门依然紧闭。习仲勋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怎么还不开城门?"那个人只是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习仲勋预感到情况不妙，给宋杰生使个眼色，迅速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这时，只见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勋灵机一动，对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石仲伟，陕西富平县美原镇人，生于1902年。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后加入共产党，是习仲勋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1929年被派人武汉新编第一师做兵运工作，与柯庆施等在湖北宜昌策动部分士兵起义，组

成红七军，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红七军失败后，在中共武汉军委领导下与程子华等又发动大冶起义。1930 年到河南杨虎城部第十七师从事兵运工作，任中共京汉军委委员。1932 年任富平县教育局长。

宋杰生离开瓜园后，士兵盘问习仲勋：“你是干什么的?”

“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在外面做生意的，回来想寻我的老师，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勋回答。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勋被士兵带进县城的驻军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勋的话，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勋即提笔写道：

石仲伟老师：

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学生习仲勋

富平县城的驻军是杨虎城部第四十二师的一个营，营长鲍从汉是一位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年轻军人。这天富平县城的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士兵发生哗变，所以县城里才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习仲勋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与士兵哗变有关。

宋杰生见习仲勋被士兵带走，飞快地跑到教育局，只见营长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石仲伟听完宋杰生的话，即质问鲍从汉：“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

鲍从汉愣了一下说：“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请石仲伟派人拿着名片去营部要求放人。

习仲勋一被放出，就去见石仲伟。石仲伟告诉他说：“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住在抗日救国会，你可和他们联系。”

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先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表达了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

几天后，习仲勋在县城与程建文相遇。此时，程建文已是省委派往渭

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习仲勋激动地说：“这下可好了，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程建文正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当天，习仲勋和程建文各戴一顶大草帽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第二天，在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

秋日的一天，周冬至的叔父周明德和习仲勋推着一辆装满锅板盐的独轮车从武字区出发，向北行走，终于来到百里之外的照金苏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住。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

谢子长重任总指挥

1932 年 8 月底，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向陕甘游击队发起“围剿”。第一路是何高侯(何全升)部 1000 余人，由旬邑县土桥经安子洼向照金进发；第二路是井岳秀部一个营配合民团 200 余人，由宜君县进占马栏，企图切断红军退路；第三路是胡景铨带领富平、耀县、同官三县民团 400 余人，以素有恶名的耀县团总柴子发为首，由耀县进攻照金。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粉碎这次“围剿”，将在靖远县起义失败后回到西安的谢子长速调回游击队。

与谢子长到西安的焦维炽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省委根据党在蒲城县地方民团中的活动情况，决定派焦维炽前往蒲城县领导发动起义。8 月初，焦维炽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化名赵仪三来到蒲城，准备在晋王、永丰两地民团同时行动。

8 月 6 日，焦维炽亲自指挥永丰民团起义，缴获团总赵振南的短枪。孙镇民团被起义的枪声惊动，即出动前来增援永丰。因焦维炽与负责指挥晋王民团起义的李仲霄、曹木海联络出现失误，晋王民团尚未能举事，致使永丰起义人员力量不足，焦维炽在激战中不幸被俘，后遭杀害，其他起义人员退至陈古塬，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晋王民团因未能及时起义，曹木海等人被民团包围，被俘后亦遭杀害。

8 月 30 日，谢子长回到陕甘游击队，重新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一到任，首先整顿部队，稳定军心，并通过中共陕北特委和三原、旬邑等县中共组织动员了一大批青年农民前来参军，使部队得到了扩大。谢子长在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的协助下，率游击队在马栏略作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地区。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谢子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实击虚，以退为进，与国民党大军周旋，使部队连打几个胜仗，振奋了士气，扭转了游击队的逆境。

9 月 11 日，富平、耀县、同官三县民团 400 余人猛向照金扑来。游击队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速从照金撤出。经急行军，先向宜君、同官方向后撤 80 里，诱三县民团进入照金镇，然后绕道返回照金镇北山，决定趁夜袭击进入照金之敌。

三县民团进入照金镇扑空后，十分骄横轻狂，竞不做任何战斗准备，高枕无忧地睡觉了。当晚，在谢子长指挥下，游击队折返冲人照金镇。三县民团从睡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乱作一团，争相逃命。

激战一个多小时后，游击队全歼三县民团，击毙三县民团总指挥胡景铨，生擒副总指挥党谢芳及耀县民团团总柴子发，缴获长短枪 300 余支。

照金镇一战后，游击队向西转移，三天后进至淳化县境。谢子长率领部队在安子洼设伏，激战一天，击溃了何高侯部。入夜撤出战斗，向北进军。部队刚到达刘家店子，遭到甘军警备旅一个团的袭击。部队迅速摆脱，转入合水县境。

在陕甘游击队撤离照金向北进军时，正好习仲勋来照金北面的地母庙汇报工作。

一月前，习仲勋第一次见到谢子长、刘志丹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群众领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奠定了他跟随谢子长、刘志丹一起闹革命的信念。当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仲勋详述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起义失败受挫的情况后，刘志丹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对习仲勋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起义时你还是队委书记。”并恳切地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 70 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

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这次习仲勋到地母庙，汇报了这段时间在农村发动群众运动的工作。谢子长就给习仲勋交代任务：“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殷切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临行，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的特务队留到照金，并指示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陕甘游击队的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政治坚定，很能打仗，曾在 1928 年句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第五伯昌也参加过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

谢子长、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北上后，留在照金的特务队有一个中队长叫陈克敏，因原是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企图带着自己的中队叛变。特务队队长程双印察觉到陈克敏预谋后，便带着人到陈克敏的中队驻地碌碌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当程双印刚踏进一孔窑洞时，即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军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

习仲勋带着特务队转到武字区，与黄子文指挥的渭北游击从会合，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亦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由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指导员；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由马志舟兼任支队长，金天华兼任指导员。习仲勋、程国玺带着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穿梭在渭北地区一带，广泛开展分粮分地的群众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11 月，三原、耀县、富平国民党驻军及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县民团纠集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共产党员、团员和群众五六十人惨遭杀害。

在此形势下，渭北游击队各支队被迫分散活动。习仲勋和时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的李杰夫带着第二支队，急向心字区转移。第二支队刚到心字区，立足未稳，国民党的“清剿”部队又向心字区扑来。第二支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由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第二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

习仲勋、李杰夫到了照金，国民党的“清剿”部队正到处捕人杀人，只好又折回心字区。习仲勋、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的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一天，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把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李杰夫未被发现，幸免于难。

李杰夫脱险后，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李杰夫回到省委，不久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叛变。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他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在习仲勋的影响下，岳强明加入共产党，并与姚万忠等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联，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岳强明、姚万忠、刘鸣凤等人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任书记。接着，以党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 20 人的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不久，康尚武带着武字区前区游击队来到淡村一带开展工作，习仲勋即任政委。

12 月的一天夜晚，习仲勋、康尚武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西刘堡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总刘玉琪的住宅。这二刘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二刘脱逃。游击队冲进二刘宅内，收缴了两家囤积的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将其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在分粮斗争中，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

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富平西区游击队的活动很快遭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天，淡村游击队负责人岳强明由耀县返回唐家堡在唐开礼家开会，县保卫团团长李宏才闻讯带着团丁赶来搜捕，岳强明与唐开礼一家仓促躲入地窖。李宏才点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烧，致使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昏迷，被团丁带走，唐开礼妻儿四口被活活熏死，岳强明 17 岁的小弟岳强隆被枪杀。

1932 年底，中共渭北特委撤销，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后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王兆相、杨文谟寻找游击队

1932 年 9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北上转入洛河西。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出的王兆相、杨文谟、王进修、王金泉等先后来到部队。王兆相、杨文谟、王进修、王金泉、王兆贤都是陕北神府地区党组织的骨干分子。5 月初，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到神府地区巡视工作，根据神府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派他们南下陕甘边，到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为尽快组织地方武装取得经验。王兆相与杨文谟为一路，先随马明方到米脂县城北的姜兴庄，后与马明方分手进入安定县。

一天，王兆相、杨文谟走进安定县的一个村子，遇上一个保长带着几个人在路口盘查过往行人。这个保长一听王兆相、杨文谟说话不是本地口音，不容分说，就认定他俩是坏人，要送到村公所拘留审查。这时，正好遇上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走过，央求保长放他俩走，并愿为他们作保。

这位农民把王兆相、杨文谟领到家里吃了饭，还留住了一宿。第二天，这位农民又把王兆相、杨文谟送出村外，还热心地把几个窝窝头塞到他们手里当做路上的干粮。王兆相、杨文谟身无分文，只好把带着的一条被单留下以表谢意。1941 年，杨文谟随部队驻安定川时曾两次看望这位农民。这位农民说：

“那年，你们一进村，我就看出来你们不是坏人，可保长专门抓捕外地人，说不清楚，非搭上性命不可。”

出了安定县，二人向肤施方向走去。这时，听沿途群众传说刘志丹、

谢子长带领红军向宜川南去了，王兆相、杨文谟走到蟠龙镇的大川里盲目寻找两个月，渴了喝泉水、雨水，困了歇山洞、树下，终未找到陕甘游击队，遂返回米脂向特委汇报。

8 月，王兆相查访到陕甘游击队转战保安县以西一带，他和王金泉离开神府地区寻找刘志丹、谢子长的红军部队。几天后，杨文谟也告别父母，先到米脂县姜兴庄找到特委交通员，由化名“老康”的陕北特委给刘志丹、谢子长写了介绍信，随后向保安的洛河西赶来。一路行走，一路打探陕甘游击队的消息。

杨文谟赶到保安县洛河西的一座山上，在一个村子住下。这个村子的群众告诉杨文谟，两天前红军还在这里驻扎过。他自信红军没走远，还在附近活动，连夜按照群众所指点的方向追去。

第二天，杨文谟正在赶路，见远远的山上有一支骑马的军队走过。附近山梁上有个老乡在地里干活，杨文谟连忙赶过去打问。老乡说：“那些骑马的人就是红军。”

这时，杨文谟又看见一队骑兵走在山路上，他激动地一边朝前奔跑一边大喊：“红军，红军，等等我!”

杨文谟找到的正是谢子长、阎红彦带领的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谢子长、阎红彦看了中共陕北特委的介绍信，当即把杨文谟收在骑兵大队里当战士。在骑兵大队里，杨文谟一眼就认出早已参加陕甘游击队的王进修等人，他们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十多天后，王兆相、王金泉也赶到部队，与杨文谟分到一个班里。不久，王兆相在红二团任警卫队长，杨文谟在骑兵大队先后任第一连指导员、团部技术书记。

会合黑慕塬

1932 年 10 月 16 日，陕甘游击队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这时已进严冬季节，部队在这里召开了游击队党委会议，决定攻打保安，以解决过冬军需。

10 月 25 日拂晓，游击队奔袭保安县城，不料守军有所察觉，临时增调了两个连，加强了防守。游击队行军途中又因迷路延误了时间，直到天亮才兵临城下，原计划的奔袭成了白昼攻坚。当阎红彦、强世清等组成突击

队，冒着枪林弹雨发起冲锋时，谢子长发现敌情变化，即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渡洛河南下。

保安县城守军见游击队撤退，趁势尾追而来，一直追到墩儿梁。由于部队抢先据守了有利地形，才将追兵打退。游击队退至八卦寺，再遭高双城部张子英团和高玉亭营的袭击，部队损失严重。

10 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追击下，屡战失利，被迫撤退到甘肃合水县，在以华池县为中心的豹子川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国民党大军压境，陕甘游击队的处境极其危险。部队住在梢山的破窑洞里，没有粮食，没有棉被，衣衫褴褛，部分干部和战士情绪低落。谢子长鼓励大家说：“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

针对当时的困难局面，谢子长、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高岗等决定发动群众，依靠各地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开展游击战争，发展革命力量。按照队党委会的决定，部队分成四路，由刘志丹、高岗带领一个大队(约 70 人)到甘肃合水县塔尔塬一带活动；由黄子文、杨森带领一个大队(四五十人)深入三原县武字区一带活动；由杨重远、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大队到照金、耀县一带游击，与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由谢子长及吴岱峰带领 30 多名战士和一些伤病员活动在平定川、瓦子川一带，一面负责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一面指挥整个陕甘游击队。

杨重远、阎红彦、杨琪带领骑兵大队转战到照金以北，与刘约三、白雪山等在老爷岭打了大土豪，除将部分粮食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外，还为游击队筹得大量经费。10 月底，谢子长与杨重远、阎红彦、杨琪带领的骑兵大队合兵北上，在安塞县真武洞又打了大土豪，获 20 余匹马和大批大烟土，扩大了 80 多名骑兵。谢子长还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将筹得的一批钱款送往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北方局。

11 月，高鹏飞在正宁县的一次战斗中身中数弹，受了重伤。谢子长、刘志丹很关心他的伤情，立即派人护送到上海治伤。后高鹏飞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牺牲在苏州的监狱里。

12 月上旬，分散活动在陕甘各地的各路陕甘游击队避过国民党大军追

歼，经过两个月的休养生息，渡过了难关，并得到了发展，在甘肃合水县黑慕塬地区胜利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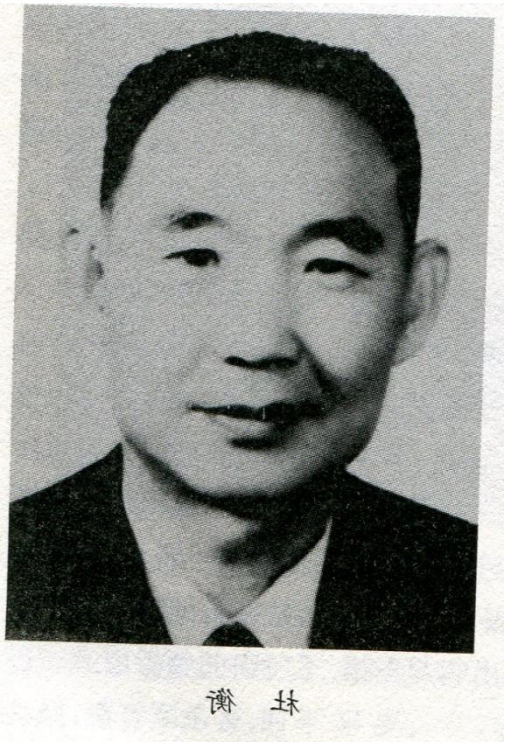
第五十章

“　　”

杜衡“大清洗”

1932 年 12 月 18 日，陕甘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的黑慕塬地区会合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正准备挥师南下照金时，接到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命令游击队立即开往宜君县转角镇进行整编。

转角镇是宜君、正宁、旬邑三县交界处一个古老的小镇，西距五顷塬六七十里路。游击队刚到转角镇，杜衡及黄子文等就从西安赶来了。


杜　衡

杜衡一贯是个“左”倾空谈家。这次，他一到就以省委代表的身份(杜衡离开西安，由孟用潜任中共陕西省委代书记)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拒绝任何统一战线，反对一切，打倒一切；对土匪、民团不加任何区别，一律从肉体上消灭，对倾向和支持红军的民团、土匪也是如此；对国民党军队内进步的军官拒绝谈判合作。他在部队内大肆进行宗派活动，无端指责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的错误，采取“左”的惩办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第一，诬蔑红

军游击队中成分不纯，领导人中有“反革命阴谋”；第二，要在部队里“彻底反掉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一次“大清洗”。

于是在转角镇再次错误地批判斗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人，并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军内领导职务(给谢子长、阎红彦留党察看处分，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撤销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再度离开部队，调回西安由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刘志丹虽经谢子长、阎红彦、王世泰等人劝说，仍坚持继续留在部队，但杜衡对他根本不信任，让其担任政治处长，杨重远担任参谋处长。同时，杜衡认为阎红彦、白锡龄、万福林等人过去曾是国民党军的旧军官，不宜在陕甘游击队干事，免去他们的职务，驱逐出部队。

当时，陕甘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对杜衡强加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的罪名和不公正处理，难以想通。特别是跟随谢子长、刘志丹多年的老战士，深知二人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不满。谢子长、刘志丹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家服从党的决定，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高岗被排挤出部队，先回到西安，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用潜召集下学习中共中央、省委有关起义文件，后被派往甘肃武都，到胡宗南部鲁大昌师搞兵运。高岗到鲁大昌师后，由于国民党防备极严，条件不成熟，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

谢子长、阎红彦被强令离开部队回到西安，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往上海中央局受训，后由中共北方局派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白锡龄被驱逐出部队后，即东渡黄河到山西晋西一带。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与中共山西省委取得了联系。中共山西省委认为，白锡龄在晋西一带人地熟悉，关系较多，群众基础好，便派他到吕梁山区重新组建游击武装。白锡龄接受省委指示，到汾阳、离石、柳林等县一带，与景阳春等很快组建了一支新的晋西游击队。游击队成立不久，一次白锡龄带着队伍到王池村活动，因叛徒告密，晋军突然将游击队驻地包围。白锡龄率领游击队突围，不幸腿部负了重伤。景阳春要背他冲出去，白锡龄为了使队伍安全转移，拒绝随队伍同行。在白锡龄的掩护下，游击队冲出了晋军

的包围，但他打退晋军几次进攻后弹绝，遭晋军杀害，时年 24 岁。

红二十六军成立

1932 年 12 月 24 日，杜衡在陕甘游击队中进行所谓“大清洗”和“大整顿”后，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指示精神，在宜君县转角镇的杨家店召开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西北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简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号称一个军，其实只有一个红二团。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郑毅(郑毅清)为参谋长。杨重远任参谋处长，刘约三任经理处长，杨琪任管理处长，师克寿任共青团书记。部队下辖三个连，李亚夫为步兵连连长，李秉荣为指导员；曹盛荣为骑兵连连长，张秀山为指导员；王有福为少年先锋连连长，魏武为指导员。全团计 400 余人、长短枪 200 余支。

宜君县转角镇杨家店红二十六军成立大会旧址

王世泰原为陕甘游击队的一个班长，一下子被选为红二十六军二团团长，自认为冲锋陷阵还可以，但无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实难以胜任。杜衡听后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王世泰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王世泰做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民主选的，不干怎能行!”

王世泰提出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想了半天，问道：“你看留下谁合适?”

王世泰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刘志丹留到部队，但不予重用，不许管军事，只给了个政治处处长的职务。

火烧香山寺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下达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是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苏区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红二团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为扩大和巩固照金根据地，决定拔掉照金周边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据点。

宜君县焦家坪的国民党据点距红二团驻地较近，守军防范严密，山梁上设有岗哨。红二团成立后的第一仗首先在这里打响。

1932 年 12 月 25 日，王世泰等按照刘志丹的建议，率领红二团从转角镇的杨家店出发，先向焦家坪的反方向马栏的国民党据点进军，摆出一副攻打马栏守军的架势。焦家坪据点的守军得知这一情报，误以为红军西撤，便放松警戒，撤去山梁上的岗哨。当部队西行 20 余里地后，即连夜返回奔袭焦家坪守军。

12 月 26 日凌晨，红二团迅速将焦家坪据点包围，并发起突然的进攻。步兵连先与守军接火，紧接着骑兵连一个猛冲，猝不及防的守军阵脚就被打乱，民团团总仓皇逃窜，守军 60 余人被歼，缴枪 60 余支，首战告捷。

焦家坪一战后，部队进入香山寺一带。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的笔架山，地势险峻。时值灾年，近万灾民流落此地。

杜衡一到香山寺，就提出该寺庙近距照金 30 余里，是照金苏区的要隘，

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国民党军队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建议焚烧寺庙，撵走尼姑、和尚，开仓放粮，拯救灾民，并在万人灾民大会由饥民举手表决通过。

杜衡派红军负责焚烧寺庙，渭北游击队组织饥民开仓分粮。可惜杜衡的一个决定，点燃熊熊大火，顿时把一座古朴宏伟的香山寺烧成一片残垣断壁。香山寺内 300 多尼姑、和尚失去栖身之地，成了红军的死对头。

攻打庙湾镇

焚烧香山寺后，红军向西开进，又在旬邑县消灭民团一部，使薛家寨成为照金苏区的中心。从此，红军部队得到发展，红二团又扩建步兵第二连，由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同时，红二团创办了随营学校，培养军事干部，李杰夫任校长，汪锋任政委，有学员 30 余人。

这时，杜衡看见照金苏区刚有发展，头脑很快就开始发热，提出“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主张红军攻打庙湾镇夏老幺(夏玉山)民团。

夏老幺是照金地区最大的一股民团武装，驻守在庙湾镇，手下拥有四五百人马。这个民团驻守在庙湾镇的一个靠山的寨子里，明碉暗堡，工事牢固，防守十分严密。谢子长、刘志丹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之初，经常派人给庙湾镇夏老幺、小石崖罗礼臣送烟送酒，与这些民团搞统战联合，约定双方互不开战，和睦相处。当时在这些民团里有些军官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与红军有密切联系，经常暗中给红军运送枪支弹药，用刘志丹的话说就是“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我们多争取一分力量，国民党就少一分力量”。但杜衡给谢子长、刘志丹等戴上“勾结军阀”的帽子。当刘志丹、杨重远等陈述暂时不打夏老幺的理由时，杜衡根本听不进去。

1933 年 1 月 17 日晚，红军分两路向庙湾镇进发。原制定的作战计划是由杜衡、刘志丹、郑毅带领主力部队走捷径，在拂晓发动突然袭击；王世泰带领骑兵连绕道走庙湾镇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之敌。但由于事先对山路难行估计不足，步兵赶拂晓前未能到达庙湾镇，而骑兵已按时进入阵

地。

直到次日天亮，因红二团骑兵连等待步兵连的到达，战斗一直未打响，偷袭机会显然已经错失。突然，庙湾镇据点传出一声枪响(据点里一个士兵的枪走火)，已进入阵地的骑兵连误以为主力部队与据点守军交火，王世泰一声令下，即向据点发起进攻。骑兵连长曹盛荣和指导员张秀山身先士卒，带着战士一个冲锋，就打进庙湾镇的街里，直逼据点碉堡之下。此时，红军主力部队赶到庙湾镇，听见枪声大作，很快从山上压下来投入激战。夏老幺见红军来势猛烈，立即放弃两个碉堡，率部退入第三个碉堡中，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战斗一直进行到中午 12 点。由于红军缺乏攻坚能力，虽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部队伤亡严重，骑兵连长曹盛荣牺牲，指导员张秀山身负重伤，还有几个班长、排长也牺牲了。

面对红军作战不利的形势，本应立即撤出战斗，但曾在冯玉祥部当过营长的参谋长郑毅与杜衡错误估计了红军的实战能力，仍坚持强攻硬拼，又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每次都被碉堡守军的手榴弹炸得退下来。到下午 4 点，部队被迫撤出庙湾镇。

庙湾镇一战，由于红军损失惨重，部队的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意见很大。杜衡被迫向部队总结陈述失败原因，他把自己的错误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让参谋长郑毅去当替罪羊，将郑毅的参谋长职务撤掉，降为步兵第一连连长。

后郑毅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在红二团严重受挫的情况下，杜衡对部队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不得不让刘志丹继任郑毅之职、强世清补任骑兵连连长、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兼任指导员。

保卫陕甘根据地照金苏区

1933 年 1 月底，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调动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及各地民团，在总指挥孙友仁的指挥下，开始对红二团发动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志丹等认为，部队应避敌锋芒，转出外线，寻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杜衡则强令红军坚守照金地区，打防御战，抗击来敌。结果使红

军坐失良机，致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局面。在杜衡四面树敌的情况下，敌人越打越多，八方受损，照金苏区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区薛家寨孤独地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使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红军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

照金苏区的薛家寨

2 月 4 日，国民党的骑兵、步兵各一个营及庙湾镇夏老幺民团分三路向红二团驻地芋园发起突袭，将红军包围。红二团奋起还击，在激战中部队伤亡很大，处境万分危急。这时，多亏?胃北游击队及时赶到，从外打乱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才使部队乘机冲出重围，转入照金中心区。

回到照金不久，杜衡见刚建起的红二团在他的瞎指挥下连打几个败仗，部队伤亡严重，苏区越缩越小，眼看红军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甚感形势严峻。

这时，杜衡不顾红军陷入危险的处境，首先想的是自己如何脱离险地，即借口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慌忙离开红二团。

照金苏区少了杜衡“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后，3 月 3 日，在刘志丹、杨重远等积极支持下，红二团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以照金、旬邑等游击队为基础，组建起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后为黄子文、吴岱峰)，习仲勋任政委(后为张秀山)，史进才任参谋长，指挥部先后

下辖一、三、五、七、九、十一支队和妇女游击队。

当时，由于陕甘边各地游击队发展快，不少地方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一经成立，李妙斋、习仲勋等即对各县游击队进行整编，清除坏分子，增派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改善成分，加强党的领导，对稳定和发展照金苏区起到极大的作用。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简称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由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师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中共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加强党组织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为巩固发展照金苏区、壮大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月下旬，刘志丹和王世泰决定将部队转出外线，向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在同官以北打开金锁关，歼当地民团 30 余人。随后进入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在心字区北塬全歼国民党军队一个排。

4 月初，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在三原、泾阳两县交界处，俘国民党的护渠队和美国水利工程师安立森，缴获枪支和部分炸药。杨虎城闻报急派 一团兵力乘汽车围堵。部队占领有利地形，进行了伏击。此时正值早晨大雾，红军乘机后撤，登上西凤山。

红二团由西凤山过泾阳县境，翻过一座大山到达淳化县南村堡宿营。在南村堡住有一个民团，伺机出来偷袭时，刘志丹命令二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带着战士向堡子发起进攻，一举将堡子的民团全歼。

红二团离开南村堡，继续向西行进。4 月 13 日，在旬邑土桥镇歼国民党河工队 30 余人。接着在彬县龙马、高村消灭了几股民团后，红军安全返回照金。在返回照金的途中，原想利用安立森为条件，向西安国民党政府交换一批物资，但由于带上他实在拖累太大，便派人把他送到三原放走。

红二团外线作战，拔掉了照金地区边缘国民党军队的据点，为巩固照金苏区打下了基础。至此，照金苏区发展到东至耀县高山槐、胡家巷，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王家沟、断头川，南接老牛坡、高儿塬，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陕甘根据地面积已达 5000 平方公里，人口三四

万。

4 月 5 日，由中共陕甘边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赤卫军总指挥部设在照金，红二团后方基地设在薛家寨，并先后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红军有了地方政权的支持和后勤保障，使伤员得到医治，军需得到供应，武器得到维修。

照金苏区的巩固和扩大，红二团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使国民党惶恐不安。国民党再次调集五个团的兵力，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分四路向红二团发起围攻。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会议，决定由习仲勋、李妙斋带领苏区游击队，坚持地方斗争，红二团转出外线，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作战。

红二团跳出照金，向西进击。在旬邑地区歼灭了一些民团，后转北上。到正宁县盘克塬武洛堡，遭到驻守西峰镇的国民党军队两个营和几个民团的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情况下，刘志丹力避交战，主动撤离险地。在撤退时，由王世泰带着骑兵连，负责后卫阻击。在阻击战斗中，刚到骑兵连任连长的李光明不幸中弹牺牲。

李光明，毕业于延安中学，先在陈珪璋部搞兵运工作，后在彬县组建彬县游击队。游击队被彬县民团打散，他只身闯进西安城。在西安一家饭馆吃饭时，不巧被他拦截过的一个国民党军队汽车兵认出，叫来警察。他冲出饭馆，穿大街、钻小巷、翻院墙、人民宅，与尾追群警周旋。他英武多智，孤身无畏，拔枪抗击，闹得西安城一片混乱，全城戒严，到处喊叫：“红军进城了!”但他早已乘着夜幕悄悄爬上东城墙，跳出城外了。刘志丹曾这样说：“这个李光明，一个人闯西安城，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5 月上旬，红二团进入子午岭的阳坡头时，已回陕北任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队长的强世清受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带领着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与红二团会合。

强世清向刘志丹汇报了他回安定县探家期间搞武装的情况，并把带来的马匹交给骑兵连。刘志丹给强世清带来的红九支队战士每人配上一支枪，补足了子弹，把红九支队的番号改为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简称红

一支队，一说红一支队的番号是中共陕北特委改编的)。为了加强这支游击队的领导，刘志丹决定派杨重远任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返回陕北安定县继续开展游击区的斗争。

红一支队走后，红二团继续西进。部队行至长武县金庙村，驻守长武县的何高侯部一个连哗变，也到了附近。刘志丹便派人前去谈判，这个连表示愿意接受收编。部队派出许多干部试图加强思想工作、改造这支队伍，但因队伍里兵痞意识很浓，根本无视红军的纪律，并企图逃跑摆脱红军的控制。一天早

上，刘志丹、王世泰只得突然下令缴了他们的枪，给不愿留部队的士兵发放路费，打发回家。

5 月中旬的一天，习仲勋、黄子文带着政治保卫队 20 多人，驮运些征收到的粮草，从党家山出发，准备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的北梁去开会。当行至房村，刚吃过早饭，发现在房村以东陈家坡南边的高梁上有四五个人形迹可疑。习仲勋看到情况异常，立即将随行人员分成两路，习仲勋、黄子文带着的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长王金宝带着的一队绕到陈家坡北进入村内，并由三名保卫战士组成尖兵组，负责两队的联系。习仲勋、黄子文带着的一队刚行至半坡，坡顶上骤然枪响。原来高梁上是一股地方民团，习仲勋、黄子文等正好中了他们的埋伏。黄子文立即令半坡处的队伍撤退，习仲勋坚持要承担掩护任务。当地方民团逼近他们七八米远的地方，习仲勋只觉得头上“嗡”的一响，随即倒地，鲜血顿时染红衣衫。地方民团将习仲勋和四五个受伤的战士团团围住，连喊：“缴枪!缴枪!”

习仲勋被俘后，由地方民团的一个叫周致祥的头目押着。周致祥好奇地问习仲勋：“我看你是个大官，我放你跑。”

习仲勋听了这话，还不知是真是假，便硬鼓起劲朝沟外跑去。刚过陈家坡村，后面追来 10 多个团丁。前面是一条大沟，习仲勋顺着大沟坡势滚下。追来的团丁以为坡陡沟深，人摔下去一定没命了，便胡乱朝沟底开了一阵乱枪离开。习仲勋滚下大沟坡后，正好被半坡一棵树挡住，幸免于难。

第五十一章
红二团南下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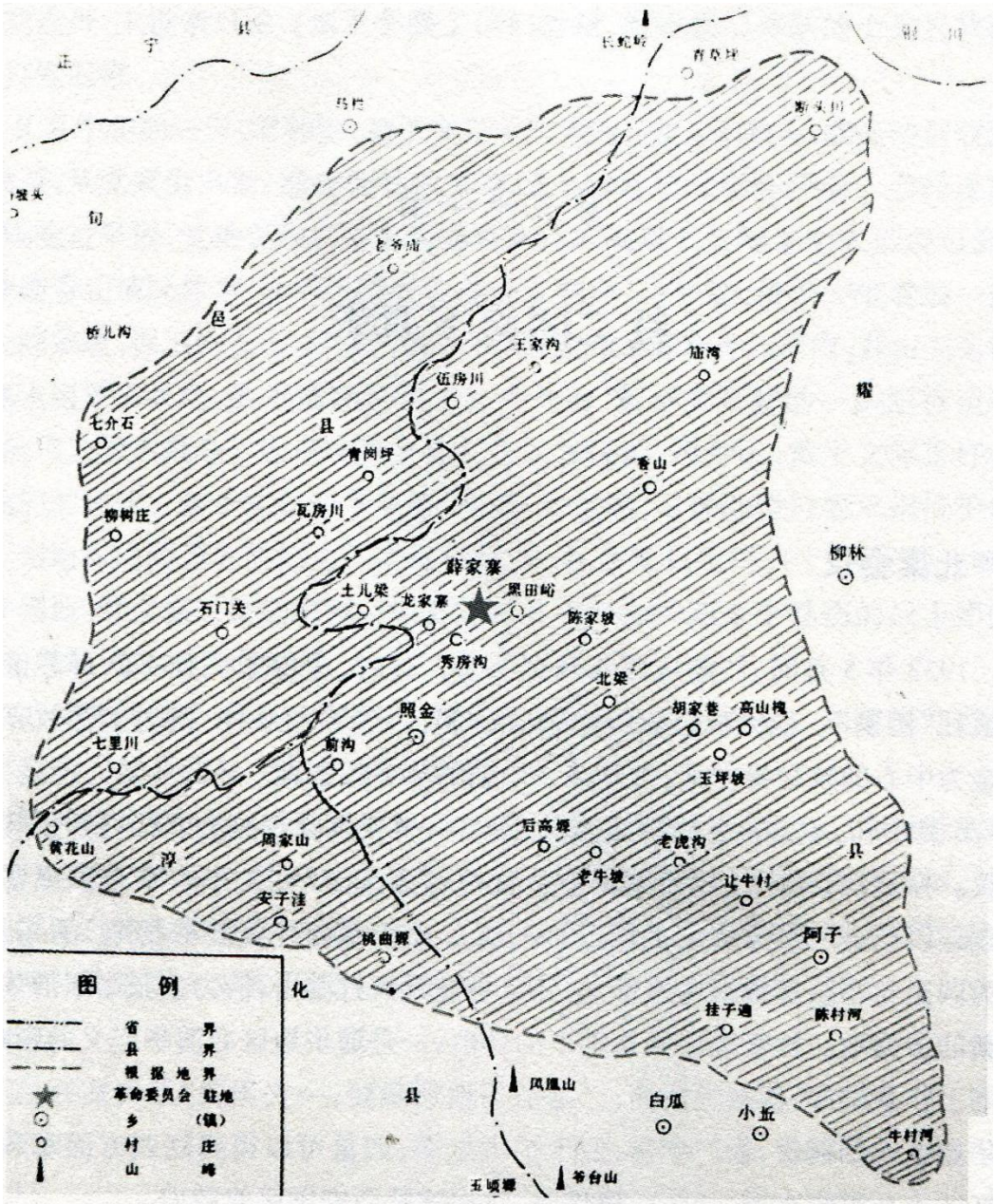
北梁会议

1933 年 5 月问，杜衡从西安回到照金。这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疯狂“围剿”。他无视已取得的初步胜利，夸大不利条件，极力主张放弃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去开辟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6 月中旬，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团和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了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杜衡不顾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根据地”的指示，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力量大，部队不能天天打游击，极力主张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杜衡提出四条南下的理由：一是渭华地区有渭华起义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二是渭华地形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是渭华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四是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的支援，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国民党政府。

刘志丹、金理科、习仲勋等竭力反对。习仲勋因正养伤行走困难不能出席，但他的意见由金理科带到会上，认为红二团力量薄弱，照金一带群众基础好，易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发展武装力量；在渭华地区，虽群众基础较好，但因地处平原，部队不宜隐蔽。刘志丹竭力劝谏道：“我们费尽心血，才搞起这块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只要我们坚持创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形势是会好的。红军离开了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

己!”



1933 年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图

杜衡还没等刘志丹把话说完，就批评刘志丹是“老右派”，并将红军南下行动夸夸其谈地说成“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一见杜衡又拿“大帽子”压人，都被他整怕了，吓得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说话了。最后，杜衡不顾大家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当时在红二团任随营学校政委的汪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汪锋在后来的回忆中内疚地说：“我在会上表示支持部队南下的这个意见。后来证明杜衡说的有些条件是不存在的，我的支持也是不对的。”

会后，刘志丹的心情非常沉重，为红二团南下的命运十分担忧，以低沉的语调对王世泰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这简直是开玩笑。”

当时，王世泰对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的错误决定认识不足，认为只要刘志丹是参谋长，给他这个当团长的出谋划策，部队到哪里都一样是为革命打天下，还鼓励刘志丹说：“你领导过渭华起义，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

南下出发前，为确保红二团南下保持精锐的作战力量，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到照金，把多余的武器也留给地方游击队，并对部队做了必要的调整。

杜衡擅自离队

1933 年 5 月底，杜衡亲自带领红二团 400 多人，选配精良武器，还有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离开照金苏区。

当天下午，部队到达淳化县桃曲塬。桃曲塬的西边有一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一座小寨长久无人居住。红军在这座小寨里刚要生火做饭时，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地方保安队 100 余人偷偷占了村南的寨子，向红军猛烈地开了火。刘志丹、王世泰等立即组织各连反击，将保安队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塬上俯冲下来，截断退路，俘保安队 80 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全部转送给地方党组织，武装了淳化游击队。

汪　锋

5 月 30 日，红二团由桃曲塬出发，经风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穿过，南行近 100 里地，进入三原县二台地域，与黄子祥、张秀山带领的渭北游击队会合。

在这里，由杜衡主持召开了红二团和渭北游击队联席会议。会议在一户人家大门外的大树下召开，参加会议的

有杜衡、王世泰、刘志丹、汪锋、李杰夫、黄子文、张秀山、黄子祥及高锦纯等一些连队指导员。在会上，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再次提出反对红二团南下的意见，尤其张秀山的反对意见最为激烈。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仍令部队继续南下。

6月初，红二团进入三原县长坳。长坳守军是富平县张德润的保安团，部队决定配合渭北击队攻打长坳，营救被张德润抓捕的苏维埃政府主席孙平章等人。战斗打响，红军和游击队用少数兵力正面攻击，骑兵连侧翼攻击，以吸引保安队的注意，一部分游击队乘机营救被捕同志。当游击队冲入监狱，发现张德润已将被捕人员转移，营救未果。

在二台的联席会议上，张秀山对杜衡“匆匆离开渭北，急于南下渭华”的错误做法，心里极为不安。在长坳战斗结束后，他连夜写了一封密信，通过交通员，送往西安交给陕西省委。

当天黄昏，红二团撤出战斗，进入寇家庄。杜衡提出要召开会议，并提出由汪锋任红二团代理政委，说自己要回西安给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诡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道来追赶部队。指战员们对杜衡的突然举动都感到非常意外，红军刚南下还未达?胃华，杜衡怎么就要离开部队?大家虽心有疑惑，但都怕他又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扣“帽子”，谁也不敢去细问。

临行，杜衡从经理处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几十块银洋、20多两大烟土，还有一匹蓝绸子，只身离开部队。谁知杜衡离开红军后，并未去西安，而是到三原游逛去了。

中共陕西省委闻得红二十六军南下，立即决定由时任省委书记的袁岳栋到三原一带，阻止部队南下这一错误行动。袁岳栋在三原没有遇到红二团，却恰好碰到了杜衡。

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由袁岳栋召集中共三原县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游击队负责人杨声(刘映胜)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袁岳栋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对杜衡这种擅作主张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决定由赵伯平亲自负责，通知中共高陵县支部，立即派出联络人员，查找红二十六军行动方向，紧急传达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阻止部队南下。中共高陵

县支部派出联络人员四处打听时，红二团早已渡过了渭河。

东进箭峪口

1933 年 6 月初的一天早晨，红二团抵达渭河的渭桥渡口。这里是通往西安的一个大渡口，渡口高崖有一座炮楼，驻守 20 多个团丁，盘查渭河两岸的过往行人。这些团丁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从天而降。有一个团丁漫不经心地刚从大门走出，就被抓去叫开大门。炮楼里驻守的其他团丁，枪还整齐地挂在墙上，就全部当了俘虏，渡口被红军悄然控制。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渭桥渡口的岸边只有两条船，要渡过几百人，在短时间内难以办到，且这个渡口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旦被国民党高陵县城守军发现，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正在这时，只见河对岸划过一只船来。船头坐着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腰里还斜挂盒子枪的人。来人毫无戒备，船一靠岸，就趾高气昂地从船舱跳上岸，原来他就是这座炮楼的团总薛兆兰。薛兆兰在岸上还没落稳脚，就被几个战士一拥而上缴了枪，五花大绑地捆起来。

红二团有了三条船，又及时找到了几个船工。先由骑兵连乘马过河，到对岸占领滩头阵地，然后掩护大部队渡河，仅用两个小时的时问，红军就全部顺利地乘船渡过了河。红军渡过渭河后，为感谢几个船工，给他们送了两头骡子。

渡过渭河，红二团从耿镇南下，途经灞桥时，骑兵连歼灭国民党驻军一个连。之后，又拦截国民党的 10 辆军用运输汽车，缴获大量急需军用物资，使部队得到了补充。

两天后，部队经急行军 200 多里地，进入东骊山地域。这里距西安城 50 里，是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之地；距临潼 20 余里，有国民党的驻军封锁。

这时，红军行动盲目，孤军深入到一个陌生地区，如同聋子和瞎子。在这紧要关头，汪锋、刘志丹、王世泰等决定召开党团紧急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干部思想认识，坚定斗争信念，稳定军心。

此时，杨虎城警备一旅唐嗣桐部与临潼保安队向红二团发起进攻，企图夺取东骊山，将红军围歼在此地。红军指战员个个奋勇当先，展开一场

激战。为迅速冲出包围，王世泰担任掩护任务，由刘志丹、汪锋率领主力部队突围。日经五战，杀出一条血路，始突出重围。后部队急行军 100 余里，转移到蓝田县的流峪口。骑兵连挺进流峪口，因流峪口有一个民团把守，不利攻占，部队即放弃从流峪口进入商洛的原定计划，迅速转入厚子镇的穆家塬。

部队在穆家塬欲翻秦岭山南下受阻，遂东进渭南县的箭峪口。途中遭到民团伏击，展开一场激烈的肉搏战，由于黄罗斌带领随营学校学员一个班抢先占领制高点，始击溃设伏此处的民团，部队继续东进。

不久，红二团经周楚庙进入箭峪口。箭峪口纵深 60 余里地，道路崎岖，石山林立，是当年渭华起义部队血战过的地方。部队到达箭峪口的当天夜里，刘志丹便派人向渭南党组织联系，打听活动在陕南地区红二十九军的消息。部队找到党组织一经了解，才知道红二十九军于 4 月间就在马儿岩惨遭失败，全军覆没。

被围终南山

红二团由箭峪口进入青岗坪后，始摆脱国民党军队。在青岗坪，部队休息两日后，又进入坝龙王地域。

6 月底，红二团进抵蓝田县张家坪。张家坪位于西安至商县的交通要道，四面环山，梢林茂密，只有十几户人家。部队刚休息一夜，国民党军队就尾追到张家坪。红军在大青石下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不少同志说，听志丹同志的话，本来就不会犯这次错误。

刘志丹说：“现在不是说谁正确的时候，先设法保存好我们的力量。”

但是未等到部队开始行动，国民党军队分兵三路已将红军部队团团包围。王世泰立即带着步兵第二连迅速抢占无名山头，以树木为依托，进行抗击。刘志丹率一部沿公路向西突围，汪锋率一部向南突围。在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把王世泰、刘志丹、汪锋各带的部队截成三段，相互之间失去了联络。

汪锋一部从界牌沟突围后，穿越北沟、新店子、鸭峪、半沟、野竹坪进入葛牌镇。汪锋在突围战斗中负伤，藏人乡民家，其他战士全被国民党

军队打散。

王世泰一部突围，先进入两岔河，部队虽损失惨重，但还保留着步兵第二连的番号。在转入秦岭山与国民党军队战斗一个多月后，所带部队最后仅剩 18 人。

刘志丹一部沿公路向西突围，进入南山兰桥后，向北转入山林。部队刚到山林里，还未及编好队伍，国民党军队就又冲来了。经过一场恶战，100 余人的红军队伍被国民党军队打得七零八散，只有刘志丹等十余人退到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想冲出包围，派人侦察敌情，发现国民党大军正在四处搜查，只得再钻入山林躲藏起来。

此时，正值盛夏多雨，山林外重兵封锁，山林里没有村庄和山民，他们只能露宿雨地，靠采摘野果子充饥，处境十分艰苦。在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之时，刘志丹鼓舞身边的战士说：“月亮有圆有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一边!”

为摆脱困饿死亡之境，刘志丹率骑兵连指导员惠泽仁、一连二排排长贺彦龙等十余名战士突围，但在通过石头峪的封锁线时，遭到国民党封山军队的袭击，贺彦龙和大部分战士牺牲。刘志丹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死里逃生，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冲了出来。

一天夜问，刘志丹只身在深山行走，不慎从一个险峻的高崖上滑下去，摔成了重伤，又遇一场暴雨，几乎丧生。幸好遇到被打散的先锋队战士蒲永胜，扶他下山，与失散的王世泰、曹士荣会合。

第五十二章
返回照金

找到刘志丹

王世泰和吴岱峰、高锦纯带着队伍突围到两岔河后，对队伍重新整编，保留步兵二连番号，补充了战士，仍由吴岱峰当连长，高锦纯当指导员，余下人员直属团部领导，由杨文谟负责。在这里活动约一个多月，队伍经常没有吃的，没有宿营地，非常困难。

两岔河驻着的一个民团，企图乘机收编步兵二连。民团先派出两个团丁前来联系，后来又来个小头目。当时步兵二连有 100 余人，因不知道刘志丹、汪锋两部分队伍突围后的下落，一时没有方向，所以决定拉上关系，暂渡难关。

王世泰派高锦纯去与两岔河民团谈判，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双方保持友好；二是民团负责给二连供应粮食和物资；三是若国民党军队来了，要迅速通知二连。民团很快答应了，随即送来粮食、大饼和一些日用品。时隔不久，民团发现二连按兵不动，没有接受改编的迹象，就不再送东西了，并龟缩寨堡，加强了戒备。王世泰为了赢得暂时的安全，也没有主动出击。

此期间，王世泰曾先后派出十数人次，寻找刘志丹和汪锋的下落，都没有一点消息，心中万分焦急。这时，二连中出现悲观情绪，有不少人偷偷离队，甚至有一个排长悄悄带走六七个意志不坚定的人，跑到两岔河的民团去了。

面对严酷的现实，王世泰和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商议，决定埋枪

后分散出山回照金。王世泰把队伍集合起来，宣布说：“这次失败，是我们领导上的路线错误，让大家吃尽苦头。如果继续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藏在山中，就会全部冻死饿死在这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分散回照金，再树大旗。”接着，王世泰又讲了如何出山、如何过封锁线的具体办法。

战士们听了王世泰的讲话，流着泪离开队伍。最后，王世泰身边只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马宜超等 18 人，大家把战士们留下的枪支分两个地方埋入地下。为了防止被搜山的国民党军队挖走，将枪身和枪栓各埋一处。

随后沿石头峪方向，继续寻找刘志丹、汪锋。在石头峪后山整整转了四五天后，一天，王世泰等在后沟两户农家正要做饭吃，有个哨兵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北山豁口有人影活动。王世泰立即派一个班长带着两个战士前去侦察。一位战士朝北山豁口高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

北山豁口出现两个人，但无回应。

“我们是王世泰的人，是自己人你们就下来。”这位战士又喊道。

北山豁口的两个人向山下走了一段，大声说：“如果是王世泰的人，请王世泰出来答话。”

此时，王世泰已赶来，当即向对方喊话，并用望远镜观察。结果真是令人喜出望外：原来山上的人正是刘志丹和蒲永胜。

在老乡家，大家赶紧给刘志丹二人做了包谷糊糊。刘志丹一连吃了几大碗。在深山老林辗转的刘志丹身体完全垮了，多亏蒲永胜找吃找喝，搀扶行动，他才活了下来。刘志丹指着蒲永胜对王世泰说：“我能活着下来，全凭这个娃娃了。”

王世泰向刘志丹详细汇报了步兵二连埋藏枪支、遣散战士出山的情况。刘志丹叹口气说：“我也是这样做的。”

刘志丹找到了，汪锋还没有下落。经大家一起分析，认为汪锋带着的队伍在突围时与刘志丹、王世泰两路的行进方向相背，一时恐怕不容易联系上，但汪锋是当地人，对这里的地理比较熟悉，关系也多，可能会安全脱险的。因此，刘志丹决定带聚集起的人员返回照金。

坝龙庙脱险

刘志丹领着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一行 20 人，朝着华县方向行进。行走两天，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这里有不少路人避雨的小窑，大家便到里面休息。这时，只见远处有两个人走来，一个挑着担子，一个背着背篓。

王世泰担心这两个人是密探，便上前拦住搜查，发现有百余两大烟土，原来是大烟土贩子。王世泰向两个贩子解释说他们是红军，不是土匪，要借些烟土作路费。两个贩子见面前站立的几个人个个都挎着枪，连声说："行，行。"

一两大烟土值一块多银洋，有了大烟土就等于有了回照金的路费。当天，一行人从沟里走出，准备在附近找个村子宿营，听说附近有国民党的驻军，又退至半山坡露宿。

傍晚，天气突变，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滂沱大雨足足下了几个小时。山洪裹着泥石，发出惊人的巨响，倾泻而下。为了躲避山洪，刘志丹、王世泰等在山坡上爬来滚去，浑身水淋淋，个个成了泥人。暴雨过后，又转为中雨，山风骤起。夜色里，大家冻得浑身发抖，全身血液好像凝固住似的。劳累、饥饿、寒冷一齐袭来，人们麻木了，连说话都没有气力了，索性横倒竖卧在山坳里。

过了一会儿，王世泰强打精神，活动着冻僵的双腿站起来。他想，这样躺下去，不等天大亮非冻死人不可，就让几个年轻战士起来拾柴架火。提起架火，大家才想起随身携带的火柴早已被雨水淋湿了。幸好马宜超的火柴用油布裹着。几个人从山坡上拾来些碎柴，折些松树枝堆到一起。雨不停地下着，大家用布遮着点火，却因柴太湿只冒烟不着火。马宜超急中生智，撕下几页地图，点着几顶破草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火引着了。火越烧越旺，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紧紧围在火堆旁取暖、烤衣服，都情不自禁地说，一堆大火，救了十几条命。

天亮后，刘志丹、王世泰等继续西行，三天后又转回到坝龙庙一带。几天来每走一处，刘志丹就打发几个人分头出山返回照金。在马宜超临走时，刘志丹写了个条子，让他顺路带给坝龙庙民团团总薛增平。最后，只

剩下刘志丹、吴岱峰、高锦纯、曹士荣、杨文谟和王世泰等人朝坝龙庙赶来。到坝龙庙北山后，刘志丹又动员吴岱峰、高锦纯两人出山返回照金。

当刘志丹、王世泰等走到坝龙庙北山的一个山头上时，马宜超领着薛增平及两个团丁找上山来。薛增平原是渭华起义时的大队长，与刘志丹早就认识，渭华起义失败后，转到坝龙庙安家落户。红二团南下到青岗坪时，薛增平曾找过红军，刘志丹让薛增平带一连二排排长高照去找地方党组织，并给了些大烟土和钱，让他给红军买些日用品，结果他一去不回。这次，刘志丹让马宜超送信给薛增平，还是想通过他了解些地方情况，争取尽快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薛增平听后，连忙说找关系好办，让大家先到他家休息。刘志丹和王世泰不同意，薛增平拍着胸脯担保，说绝对不会出问题。因刘志丹身体太虚弱，加上两条胳膊上长有毒疮，确实需要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最后同意去薛增平家。马宜超不愿先回照金，要与刘志丹、王世泰一起走。经刘志丹和王世泰再三说服，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傍晚，薛增平领着刘志丹、王世泰等到沟底一户人家吃饭、住宿。当时，大家以为这里就是薛增平的家，便将吴岱峰、高锦纯走时留下的两支驳壳枪、一个望远镜、30 多两大烟土交给薛增平暂时保管。多日来，大家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躺下一觉就睡到大天亮。

吃早饭时，王世泰见几个招待的人非常殷勤，不像普通百姓，便问薛增平：“这里到底是谁的家?招待我们的人是谁?”

薛增平说是庄户百姓，招待的人是这里的民团分团总和两个团丁。王世泰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抓住枪柄厉声问道：“你说到你家，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薛增平慌忙回答：“这个分团总是我的好朋友，不用害怕。”说着就把分团总叫来，当面介绍刘志丹是参谋长、王世泰是团长。

王世泰一听非常生气，心想：这个薛增平哪像个自己人，自己人怎么能随便暴露刘志丹和他的身份呢?便向刘志丹、曹士荣递出做好应急准备的眼色。正在这时，从坝龙庙民团来了个排长，说是要买大烟。不一会儿，坝龙庙总团总的大儿子也来买大烟。这个总团总的儿子一进门就冲着刘志丹、王世泰叫“参谋长”“团长”，说是在坝龙庙的群众大会上认识他们的。

他们相继离开后，王世泰感到问题严重，建议刘志丹马上离开。刘志丹说：“这里的人大多都是红枪会的人，不能打出去，只能用计走。如果枪一响，周围村庄的人会很快把我们包围起来的。”

刘志丹和王世泰商量了一番后，王世泰把薛增平叫到另一问房子，对他说：“你是个党员，又参加过渭华起义，刘志丹和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做出违背党的利益的事。”

薛增平听出王世泰话中有话，急忙解释说他没有叛变革命，分团总是他的朋友，把二人介绍给他是出于礼貌和习惯。

这时，坝龙庙总团总打发团丁来找薛增平，薛增平即向刘志丹、王世泰告别。自此，刘志丹、王世泰再没有见到他。薛增平一走，刘志丹把身上仅有的十多块银洋交给两个团丁，让他们出去给买些衣服和鞋，趁机把团丁支走。

午后，晴天无云，赤日高照，房内像蒸笼一样闷热。刘志丹和王世泰的心情比天气还要火烧火燎，急得浑身冒汗。这家主人看见王世泰时出时进，坐立不安，说：“天这么热，村后有棵大核桃树，你们可到那里乘凉去，这里有张席片，拉去铺在树下就行。”

“好，好!”王世泰向老乡点头，随手拉着席片转到村后，把周围的地势看了看，即返回向刘志丹汇报。大家立即作了分工，决定由刘志丹和杨文谟对付分团总，曹士荣掩护，王世泰断后，设法离开这里。

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杨文谟前脚刚出门，分团总后脚就跟出来。还没等走到村后核桃树下，刘志丹和杨文谟就将分团总制伏。分团总直喘大气，挣扎着想要分辩，王世泰警告他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决不伤害你，只要你把我们安全送出村。”

分团总连连点头，嘴里“哼、哼”应诺。刘志丹顺手递给分团总一把水烟袋，让他拿着，装出送客的样子。在这个地方人们有个习俗，凡是有身份的人都讲究抽水烟，一般总是水烟袋不离手，即使迎送客人时也是如此。

正朝前走着，迎面有两个青年学生走来，他们看见刘志丹、王世泰等手提着枪，吓得撒腿就跑。刘志丹、杨文谟怕这两个学生走漏风声，紧追

上去拦住，让他俩也一起走。分团总是个聪明人，他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走村过户时大摇大摆，还不时和路边的熟人点头招呼。

过了几个庄子，走到一山豁口。大家暗自庆幸脱离虎口。刘志丹、王世泰要了两个青年学生的两把雨伞、两顶草帽、两件棉衣、一个褡裢和几十个馍馍，给两个青年学生和分团总各送五块银洋。这些东西还真救了急，馍馍充饥，雨具挡雨，一件棉衣给刘志丹穿，另一件棉衣由王世泰、曹士荣、杨文谟三人轮流穿或放哨时穿。

获救出山

在终南山辗转两个多月，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杨文谟四人仍无法脱离险境。刘志丹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当务之急，就是北出高塘塬，寻找地方党组织。

刘志丹、王世泰等先由山间的一条大道下沟，转而登上西山，再顺山梁向北走。行走两天之后，碰见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武和队长苏四，一行共六人在山中又转了五六天，最后在箭峪后沟东山坡上找到一户人家。说是一户人家，其实只有一位 60 多岁的老大爷。老大爷知道来人是流落在山里的红军，非常热情。他虽然孤身一人，生活清苦，但仍想方设法给大家找吃的，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大爷”。

几天后，老大爷对刘志丹、王世泰说：“两天来，前塬山上总有人，样子像打柴，又不打柴，总是这儿看看、那儿转转，好像是在找人。” “您老碰见过他们?”刘志丹急忙问道。

“今天还见过。”老大爷说。

“他们问你啥来着?”

“问有没有看见红军。”

刘志丹告诉老大爷，以后再碰见这些打问的人，就说有几个红军来无踪，去无影。当天夜里，为了防止意外，刘志丹、王世泰等离开老大爷家，转移到了另一座山上。

第二天晚上，刘志丹、王世泰等返回到老大爷家。老大爷一见，说当天他又见到那些人，并把刘志丹、王世泰的话给来人转告了。那些人说，

他们想见一见红军，明天还要来。根据老大爷提供的情况，刘志丹判断八成是自己人，当然也不排除是国民党的密探。因此，决定见一面试探试探。

次日，老大爷带着山上的来人与刘志丹、王世泰等见了面。来人说他们是地方党组织派来营救红军出山的。刘志丹提出要来人回去，由负责人带上组织介绍信再来联系。

不几天，地方党组织果然派出一个负责人带着介绍信和上次来人一起来到老大爷家。介绍信中写的是奉陕西省委和渭南县委的指示寻找刘志丹和王世泰等。

与中共渭南县委派来的人接上头后，刘志丹、王世泰等六人连夜下山，天亮前到达黄辘口。在地方党组织的照顾下，他们剃了头，换了衣服，都像变了个人一样。

刘志丹、王世泰等住在一个共产党员家的板楼上，每天由他的家人端吃端喝。刘志丹、王世泰等都是些饥饿过度的人，每一顿都要吃四五碗饭。一天，听到女主人埋怨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吗，吃得这么多。”那位地下党员悄声说：“都是好朋友，以后再不准胡说，没粮我想办法。”

在黄辘口住了十几天，刘志丹、王世泰曾派人到山上寻找红军掩埋的枪支，但只找到掩埋的枪栓，枪支找不到了。在此期间，黄子文奉省委命令前来与刘志丹、王世泰接上关系，先后把魏武、苏四派回照金。

当时，在黄辘口宋家斜有个叫宋宗武的人，是当地一霸。民国初年，这一带称为“光修里”，他当过里绅，后来当上团总，人们仍称他为里绅。他欺压百姓，鱼肉乡里，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特别是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带领团丁到处抓捕参加起义的农民，迫害他们的家属，累累罪行令人发指。刘志丹、王世泰等应地方党组织要求除掉了这个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当天晚上，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杨文谟、黄子文五人由地下党员王杰带路，离开黄辘口，到达赤水镇。在赤水镇，刘志丹、王世泰等见到了外号“王货郎”的渭南县委书记赵文魁，由赵文魁派人护送杨文谟去西安，向省委汇报红二团失败的情况和刘志丹、王世泰准备返回照金重建红二十六军的设想。

由于红二十六军的失败，此时到处谣传说刘志丹和王世泰等遇难，也有谣言说刘志丹、王世泰等上华山当了和尚。国民党利用这些谣言，大肆诬蔑红二团，蛊惑人心。

巧过渭河

在赤水镇，刘志丹、王世泰等要渡过渭河，但赤水一带已被国民党严密封锁，且到处张贴着布告，悬赏捉拿刘志丹和王世泰等人。渭南县委反复研究，决定找几名水性好的地下党员，夜间护送刘志丹和黄子文、曹士荣渡河闯过封锁线，由王世泰和黄子文的爱人假扮夫妻，携带枪支从渡口过河。

黄子文的爱人叫李胜云，是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妇女，在刘志丹、王世泰等商议怎样把枪带过河去时，她主动提出和王世泰假扮夫妻通过渡口的计策。刘志丹怕她年轻又有孩子，不同意冒险。黄子文说：“咱这老婆，胆子大着哩，没关系，让她去。”

王世泰和李胜云扮着去给娘家老母做“周年”的模样来到渭河国民党设的卡子。李胜云挎着篮子，内装香、纸钱以及献馍等供品，下边藏着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王世泰怀里揣着一支驳壳枪，抱着李胜云的两岁孩子北平。为了万无一失，王世泰和李胜云花费两天时间，教北平叫王世泰“爸爸”，还编出一套骗国民党士兵的说法。李胜云特意在剪发后扎上假发髻。上船时，二人相互照料，镇静自若，没有引起国民党士兵的注意。过了渭河，王世泰和李胜云一口气跑了十多里，才在路旁树林里歇息。

当王世泰和李胜云走到自家庄时，刘志丹和曹士荣、黄子文三人早已住在地下党员张文华的家里。他们在白家庄住了将近半月，一切食宿和活动都由党支部书记张我公安排。

白家庄有个恶霸团总，外号“猪嘴”，势力很大，横行乡里，抢占民田，霸占民女，百姓无不痛恨。地方党组织请求刘志丹、王世泰把这个祸害除掉。时值村庄里唱大戏，刘志丹、王世泰决定趁看戏的机会干掉他。结果这个“猪嘴”在看戏时，带着几个保镖坐在群众中间。刘志丹、王世泰因怕开枪误伤群众而作罢。

几天后，潼关方向过来两只装着面粉、大米的军需船，在东滩附近搁浅。地方党组织要求把这批粮食截下来，分给当地群众，动员了 300 多人要去抢粮。刘志丹提出，这样大搞恐怕会惊动国民党军队前来“清剿”，给群众带来祸患。地方党组织认为“法不治众”，官府也奈何不得。当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开枪打跑押船的团丁后，群众一哄而上，一夜之间搬走两只军需船上的所有粮食。刘志丹、王世泰等离开自家庄后，国民党真的派出军队前来“清剿”，杀害了共产党员白思堂等人，不少群众为此倾家荡产。

北上洛川

刘志丹、王世泰等急于离开白家庄，北上照金。正为筹措经费的事情发愁的时候，张我公来找刘志丹和王世泰，说他媳妇刚从娘家回来，夸耀她的堂兄在平凉做生意发了财，从北平给家里兑回 300 块银洋，已用了 20 块，家里还放着 280 块。

张我公媳妇的堂兄家是一座深宅大院，外有高大厚实的围墙。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带着七八个人，搭人梯上了房顶，从房顶再跳进院子，发现其家人都从后门逃出。打开柜子，280 块银洋不多不少地放在里面。刘志丹、王世泰等返回后，留下 80 块银洋，其余全部交给地方党组织、分给群众。随后，刘志丹派人用 80 块银洋买了一副货郎担和一些日用小百货，并亲自动手把货箱改成夹层，下边藏枪，上面放货，做好了返回照金的准备。

返回照金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但沿途国民党军队哨卡林立、封锁严密；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邠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绕道回去，沿途比较安全。最后，刘志丹、王世泰决定舍近求远，绕道返回照金，并根据每个人对沿途的熟悉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北由王世泰负责，保安以西由刘志丹负责。

第三天天黑时，到达洛河边。洛河里正发洪水，浑浊的泥水裹着山柴杂草，咆哮着向南奔流。刘志丹、王世泰等急着要过河，但河岸上不见一

条船。

大家在河岸边摸黑徘徊，最后总算找到一位船工，这才乘船渡过洛河。

渡过洛河，上了朱牛塬，行走一天，到达北月合村。在北月合村，王世泰遇到在土基镇烟膏局当雇员的侄子王奉勤，随即询问了土基镇民团和家里的情况。当晚，刘志丹等随王世泰到了黄连河。

黄连河有一条小街，王世泰的家在西街一条小巷子里。王世泰的父亲兄弟俩一直没有分家，两家侄儿侄女共有 20 多口人住在一起。王世泰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加之父亲去世早，母亲特别疼爱。老母思儿心切，近几天来一直用土蛋蛋卜卦，见人就说王世泰要回来。兄长们一见到刘志丹，都高兴地连连同他握手。在陕北，刘志丹领导穷人闹革命，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人人都敬重他。王世泰的兄长们当即邀请刘志丹到村里的土寨子里居住。

母亲见到王世泰，扑过来抓住他看个不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哽咽地诉说几年来思儿的苦心。王世泰望着老母的满头华发，难过地流了泪。母亲深明大义，含泪连声嘱咐儿子出门在外，要好自珍重。

兄长们怕刘志丹和王世泰等住在寨子里太招人耳目，决定把他们转移到杨家河。杨家河山大沟深，灌木丛生，山上多有防匪的石崖窑。

一天，老母打发人来叫王世泰回家，说是有事商量。王世泰一回到家，才知道洛川县民团团总雷在阳要见他。洛川县民团的势力很大，王世泰与雷在阳早年相识，雷又是他五哥的至交，就决定见一面。

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王世泰坦诚地讲述了红军这次南下失败的情况，并说红军大部队仍在根据地和渭北一带活动，让雷认清形势，今后争取中立，不要同红军为敌。雷在阳当场表示，他不会干出对不起红军的事，并说：“老弟，好好干，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帮助你。事干大了，不要忘记洛川人。”自此王世泰再未见到雷在阳。听说后来雷在阳当上国民党军队的旅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后率部开往前线时在神木县被人暗杀。

走进薛家寨

在黄连河住三四天后，王世泰辞别母亲，与刘志丹等向保安县方向出

发。途中经洛川县的浩衣村、鄜县的田厢村，在地下党员赵耀荣、王树山、王树勋等人的保护下，安全到达甘泉县。

甘泉县是北进肤施的大门，县城很小，只有几十个民团团丁驻守。县城内有王世泰的几个延安中学的同学，他决定进县城了解情况。

王世泰进城后，先找到在县中学任教的李树禄，问道：“城里还有几个党员?”

李树禄说：“有薛泰来、郑维平、张荣增。薛泰来当中学校长，郑维平当团总。”

“他们现在表现咋样?”

“革命很坚决。”

“你快去把他们找来，设法把志丹他们接进城里。”

李树禄一听说刘志丹来了，立即派人找来薛泰来和郑维平。大家见面，顾不上寒暄，王世泰就让薛泰来、李树禄二人到饭馆订饭，自己同郑维平一起出城去迎接刘志丹等人。

李树禄、薛泰来、郑维平三位共产党员是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大家在一片亲热的气氛中吃了饭。当晚，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郑维平亲自布置警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黄子文住在城外的杨家砭。李树禄、薛泰来、

郑维平与刘志丹等一直畅谈到大半夜。刘志丹嘱咐甘泉县的地方党组织，要鼓励每个共产党员坚定革命信心，利用合法身份，积极发展组织，为党多做工作。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王世泰等本来打算顺洛河川而上，后听说沿川到处有民团设的卡子不好通过，便改道从洛河西岸上山向西行进。

行走两天，到达刘家老庄北面的苍沟。在苍沟找到哥老会“大爷”马海旺。此人为人耿直，很重义气，在周围二三十里都有很大影响。他早年就同刘志丹熟悉，关系密切，十分器重刘志丹的学识和人品。

刘志丹、王世泰等一到苍沟，马海旺立即杀猪宰羊款待。同时，布置警戒，打探消息，使刘志丹、王世泰等了解到照金苏区的许多好的消息。在离开苍沟时，马海旺专门派人一路护送。到了曹家沟，这里是曹士荣的

家乡。曹士荣没有进村，大家住在离村二三里路的一个石崖窑里，由曹士荣的哥哥送来了吃的。距曹家沟十多里地就是旦八寨子。刘志丹急于了解周围情况，通过曹±荣哥哥找来旦八寨子内一位小学教员。这位教员是共产党员，见到刘志丹后，回到寨子就高兴地告诉其他共产党员，却不慎走漏了消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刘志丹和王世泰几个人在石崖窑里休息。突然“扑通”一声响把王世泰惊醒，见一只狗叼着羊腿从洞口窜出。他想到这里地形不好，一旦被旦八寨子的国民党军队或民团包围，要想逃脱比登天还难。于是连忙叫醒大家，提出立即转移。刘志丹同意王世泰的看法，几人迅速离开石窑，由后山向合水方向行进。事后得知，他们离开不久，国民党队伍的一个排和民团七八十人就把石窑包围了。

刘志丹、王世泰等离开曹家沟，经大风川，行走两天到达合水县的包家寨，住在高世清家。刘志丹有个习惯，每到一地，不管再忙再累，总要找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群众生活、敌我情况等。在这里，他了解到国民党军队驻合水县的一连，抓了不少当地的共产党员，杨培盛也被关押在这里。杨培盛媳妇一见到刘志丹，就哭诉国民党军队残暴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罪行，要求设法营救被关押的人。

从包家寨出发，进入子午岭。刘志丹、王世泰等途经五亭子、芦保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历经四个月的千难万险，终于走进照金的薛家寨地界，大家这才长长吁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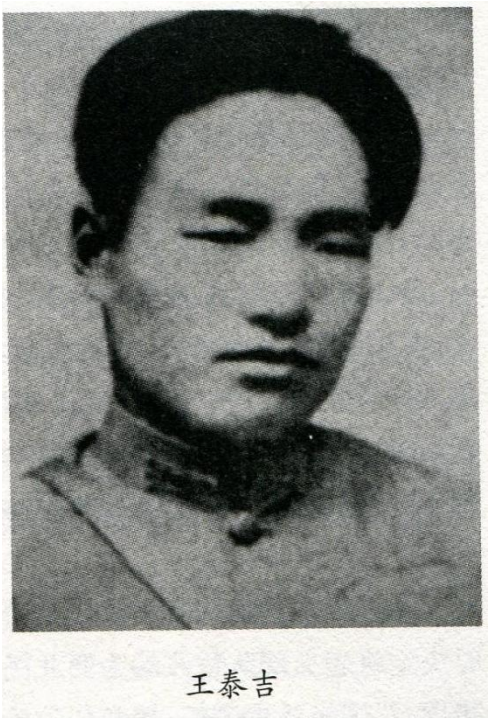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三章

严峻的形势

王泰吉耀县起义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期间，杨虎城第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正紧锣密鼓地策划着一场起义。

王泰吉，陕西临潼县人，生于 1906 年。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8 年任甄寿山部营长，与刘清和、魏书林、赵希仲、高儒庵等八名共产党员在麟游县乘甄寿山部主力调往陕甘边境剿歼王友邦股匪之机，率营中五六十名士兵起义起义部队从麟游东进南坊镇，遭到南坊镇地方民团阻滞，队伍被迫缴械。王泰吉脱险后，同年 6 月参加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转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监狱，从此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后利用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由杨虎城具保营救出狱，投其部下。他一直惦念着共产党的事业成败。



王泰吉

1933 年 4 月，王泰吉的骑兵团移防耀县。他通过挚友何寓础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率部起义的打算，并要求省委、派人来领导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何寓础曾在绥德四师执教，1928 年任中共渭南县委组织部部长，参加过渭华起义。

5 月间，红二十六军南下，中共陕西省委为促成骑兵团的起义成功，派余海丰以省委军委特派员身份到耀县与王泰吉联系。

不久，余海丰、何寓础一起到耀县，与王泰吉接头。王泰吉热情地接待了他俩，汇报了部队起义的个人意见，召开了有关军官会议，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商讨。

此后，王泰吉积极筹划起义的军用物资准备工作，亲自到西安杨虎城司令部领取了一批军用物资。原打算将杨虎城派出护送军用物资的一个运输车队也一并拉出参加起义，但在途中路经灞桥附近时，遭红二团的突然袭击，杨虎城派出的运输车队被击溃，全部军用物资被截获，王泰吉回到耀县。

截击事情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怕王泰吉心生疑虑，在耀县的起义有变，迟疑数日，未派军委负责同志赴耀县。其实，王泰吉并无二心产生，但省委并不知情。他等了数日不见中共陕西省委来人，遂派他的侄子王振民(共产党员)去西安联系。王振民途经三原县，正好碰到杜衡。杜衡速派杨声到骑兵团领导起义，但杨声被杜衡派到耀县领导王泰吉骑兵团起义一事省委并不知晓。当中共陕西省委派出军委负责人高岗以特派员身份到了耀县时，王泰吉已按照与杨声的 商定在耀县举事。

中共耀县县委对骑兵团的这次起义也十分重视。为配合王泰吉举行起义，县委在耀县阿姑社村将几支分散的游击队组建成一支 100 余人的耀县游击队，由陈学鼎任队长，张仲良任副队长，张邦英任党代表。

7 月 21 日，王泰吉率领全体骑兵团官兵在耀县故城的药王山下宣布起义，石川河滨，号声嘹亮，红旗涌动。王泰吉、高岗、杨声领导起义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扫收拾了耀县城内的反动武装，收编了雷天益地方民团、公安局警察，还吸收了一部分农民参军，形成一支约 1200 人的队伍。同时，起义部队在耀县城内收缴了 1 部电台、4 门迫击炮、数百匹马，打开监狱放出了犯人。

高岗以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身份为王泰吉恢复了党籍(未公开宣布)，并临时决定将起义部队暂改编为西北民主抗日义勇军(简称义勇军)，由王泰吉任指挥，谈国帆任参谋长，杨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大队，一大队队长

郑子明，二大队队长任建民，三大队队长张龙韬，四大队队长周德民，五大队队长由谈国帆兼任，每个大队辖一个民团中队。

在耀县，起义部队召开了军民大会，发布了《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揭露了蒋介石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并号召大家奋起革命，抗日救国。在军民大会上，公开处决了民团团总和地主恶霸左善楚、朱瑞萱、左国鼎等。

义勇军决定暂驻耀县，先行整顿，然后向白水、黄龙山一带挺进，创建苏区。在义勇军整顿期间，高岗离开部队返回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部队起义后的改编情况和行动方向等。这时，雷天益假装进步，骗得王泰吉的信任。

王泰吉将收缴雷天益民团的二三百支枪全部退回，并任命其为第一路总指挥，派去攻打耀县附近王茂臣的民团。雷天益一离开耀县城，就把他的民团拉到西塬上脱离了王泰吉的起义部队。

经过整训后，王泰吉过高地估计了义勇军力量，也过分相信一些过去的同盟军，他急于迅速扩大起义部队，想争取旧友杨竹荪团驻三原县一个营参加起义，即挥师南下到三原县去接应。不料义勇军行至三原县辘轳把附近时，即与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孙友仁部相遇。

在双方激战时，由于义勇军中的三大队队长张龙韬突然叛变倒戈，带着叛军与孙友仁的军队内外夹击，王泰吉不但没有争取到驻三原县一个营队伍的起义，反而未能及时挺军北上，贻误时日，给了国民党军队足够的准备时间。

这一次战斗中，王泰吉的义勇军损失惨重，有的叛变，有的逃跑，有的被打死打伤。当王泰吉带着残部冲出孙友仁军队的包围到达照金时，部队仅剩 100 余人。

王泰吉率义勇军到了照金的秀房沟时，习仲勋、张秀山、李妙斋等早在等候迎接。习仲勋疾步上前，紧紧拉住王泰吉的双手说：“泰吉同志，欢迎你!党和同志们都欢迎你和抗日义勇军!”

“今天我总算回到党和革命的怀抱了!”王泰吉眼里涌出了泪花，指着身后的义勇军士兵，充满内疚和自责地说：“你们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儿

人。”

福盛楼事件

这时，由于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国民党成立“渭北剿匪司令部”，刘文伯任司令，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向渭北地区发动了“围剿”。国民党军队配合地方民团，挨家逐户搜捕共产党员、革命骨干及革命群众，逮捕六七百人，杀害 400 多人。

中共陕西省委派出贾拓夫赴渭北，将渭北几支游击队改编为照金红军第四团(简称红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与王泰吉的义勇军配合作战，以挽回照金苏区的危局。

1933 年 7 月 28 日，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在西安市福盛楼以吃饭为掩护召开省委会议。这次会议有袁岳栋、高岗、贾拓夫、杜衡等参加。在会上，省委听取了高岗汇报耀县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情况，讨论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受挫后行动方向的问题，并研究派出一些骨干去耀县加强起义后王泰吉的部队 (当时不知王泰吉兵败三原的情况)。同时，会上准备对杜衡“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批评。

会议正在进行中，由于叛徒程建文告密，一股特务突然持枪冲入会场。袁岳栋、杜衡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贾拓夫从后门脱身。高岗从来胆大力大，临危不惧，举起板凳砸倒一个特务，乘混乱越过窗户冲出饭店脱险。

当晚，袁岳栋叛变，带着国民党的警特把省委全部文件搜抄而去，次日又在大街上盯梢捕捉共产党人。没几天，杜衡在国民党报纸上登出了可耻的自首书，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积极提供中共陕西省委及各地党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住址和活动线索，并带着国民党警特到三原县城内外和渭北各地疯狂捕捉共产党人和革命积极分子。

由于袁岳栋、杜衡的叛变，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被出卖，使得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的破坏，后几经努力，成立了临时省委，直到 1936 年 12 月周恩来率中共中央红军代表团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时，才重新恢复了中共陕西省委。

福盛楼事件发生后，陕西省各地中共组织多数被摧毁，被捕人数达 200

多人。同时，由于叛徒的出卖，甘肃党组织亦遭到破坏(甘肃地区党的组织隶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甘肃、关中一些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之下自首。

中共陕西省委派吴鸿宾、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张德生、梁干臣等在甘肃建立的中共甘宁青特委也被破坏，特委负责人梁干臣被捕，遭国民党杀害；张德生转到静宁县石子俊部躲避；常黎夫先到清水县，因不能立足，后翻关山、经陇县转入凤翔，遇杜斌丞始得保护。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派往青海的这批中共党员全部被迫转移，特委组织停止活动。

在西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很快缩小，群众革命情绪陷入低潮，红军游击队几乎在农村没有了立足之地，只能暂避梢山深沟。这一时期是西北中共组织和革命形势遭受空前破坏的最低潮时期。

高岗潜出西安城

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后，省委领导之中只有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贾拓夫和省委军委委员高岗逃脱。他们并没有被恶劣的环境束缚手脚，首先主动担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重任。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只要中共陕西省委还存在，陕西、甘肃及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焰就会永远燃烧不熄。

1933 年 8 月上旬，贾拓夫、高岗脱险后，在西安立即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及时通知中共陕西省委和省委军委有关同志及其他各地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活动，做好应付国民党特务破坏的准备。这次会议由贾拓夫主持，决定由贾拓夫、刘宗沛赴上海，向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汇报工作；派高岗速去照金，领导义勇军、红四团及几支游击队进行重建红二十六军的工作；派杨声代表省委负责中共三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

会后，贾拓夫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亲自写信，派高岗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立即前往照金开展工作，整顿党的组织，拉起红军队伍，坚持武装斗争。贾拓夫、刘宗沛火速赶往上海去了。

高岗欲出西安、北上渭北，但城里贴出公告重金悬赏通缉他，一时无法出城，只好暂避在杜斌丞公馆，等待时机。杜斌丞公馆在西安市大湘子庙街，是一栋二层小楼。杜公馆里因来往人多，在白天的时间，高岗既不

敢走出大门，也不敢在公馆里公开露面，只好藏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小房子里，由杜良明送水送饭，甚至倒屎倒尿。

有一天，国民党省政府肃反委员会头子宋志先的保镖马大个来杜斌丞家，与杜斌丞谈话时间有点长。这时，高岗正好尿憋了，又不敢走出小房，就从小房内向窗外撒尿。巧的是冯大个也要离开公馆，路过小房门前发现了高岗。冯大个走后，杜良明把这一情况报告杜斌丞。杜斌丞得知后，认为高岗身份已暴露，如在自己的公馆再留下来，随时可能发生险情。为了高岗的安全，杜斌丞当机立断，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高岗化装成上坟烧纸的人，从公馆护送出城。杜斌丞把高岗安排在马拉轿车里，亲自带杜良明随车护送，使高岗安全出了西安城。

高岗出城后，到三原化装成一个木匠，挑着干木活的一套工具，急着向北赶路。高岗路过一个村子，正好遇到一个土豪真还以为村里来了个木匠，挡住非要让他做木活不可。他无可奈何地跟着这个土豪到家里。正是吃饭时辰，他吃完饭后，突然假装肚子痛，借着要出去买药的机会，把木匠工具丢在土豪家，朝渭北照金方向直奔而去。

对高岗的这段惊险往事，杜斌丞之子杜鸿范每每谈及，记忆犹新，后来特意在高岗藏身的那问小房墙上写下“避难斋”三个大字。

第五十四章

重聚照金

陈家坡会议

中共陕西省委遭严重破坏和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使得照金苏区处于极度险恶的困境之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向照金发动新的“围剿”，陕甘根据地的负责人束手无策，党的干部忧虑重重，这时，高岗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到了照金，立即受到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秦武山等的热烈欢迎，大家都感到中共陕西省委还在，心里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高　岗

在照金地区，王泰吉的义勇军是唯一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经中共陕甘边特委研究，决定由高岗出任这支部队的政委，并负责对义勇军进行整顿。高岗到义勇军的这天，王泰吉特意集合起穿着整齐的军装、肩扛长枪的义勇军全体官兵列队欢迎。高岗向义勇军全体指战员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鼓舞大家说：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革命的前景是光明的，大家只要坚定信心，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最后

的胜利是属于劳苦人民大众的。高岗善于演讲，他那具有鼓动性的讲话激起了全体战士一阵阵响彻云霄的口号声。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刘志丹生死未卜、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使照金苏区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报纸上登载了重金悬赏捉拿高岗的通缉令，通缉令称：“活捉高岗赏 5000 大洋，割头者赏 3000 大洋。”

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队伍里一些人被吓破了胆，认为革命没有出路了，渭北地区有几支地方游击队解散了，甚至把枪支也埋藏了，活动转入地下。

张邦英

1933 年 8 月 14 日，高岗听取了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汇报，为了迅速改变人们的悲观情绪，排除右倾分散主义的影响，扭转当前的局面，在陈家坡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高岗、习仲勋、李妙斋、秦 武山、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杨森、 王柏栋、陈学鼎等及义勇军、红四团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参加。

会场在一个简陋的草棚里。习仲勋和秦武山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会议重点讨论当前严峻的形势、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二十六军的问题。会议一开始，高岗首先提出成立红军临时指挥部，对红四团、义勇军及各个游击队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提议会议讨论。

时任红四团团长的黄子祥认为，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不存在了，关中、甘肃的各级党组织被杜衡搞光了，不少共产党的负责人叛变的叛变、自首的自首，有的逃往外地下落不明；眼前苏区红军队伍除王泰吉的义勇军外仅是几支游击队，国民党军队大过红军队伍总数几十倍，因此极力主张各支红军武装分散到各个地区，把红四团拉到辛武区一带，转入地下做

秘密工作。

在讨论中，各武装队伍是否统一起来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问题，成了会议激烈争论的焦点。大家吵得面红耳赤，争论了一夜。

高岗认为，当前形势严峻，当务之急是红军重新整顿、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形成拳头，以少胜多，打几个胜仗，击退国民党军队对照金的“围剿”。眼前我们只有 300 多人，只能集中领导，统一指挥，避敌锋芒，避实就虚，相机打击国民党军队弱点，壮大自己，为恢复二十六军打下基础。否则，我们就全完了。高岗的主张获得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

陈家坡会议旧址

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严厉地批评了分散活动的想法。张邦英带着警示的口气说：“咱们耀县、三原是老邻居，不能为坚持个人意见连组织也不服从了，军队不听党的指挥，闹分散主义，是很危险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根据表决结果，大多数同意成立指挥部，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会议宣布：“同意集中统一领导的是多数，不同意的是少数。”

根据习仲勋、高岗的提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义勇军、渭北红四团、耀县游击第三支队。但是，在总指挥人选的问题上，

又发生激烈争论。大家都主张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而黄子祥、王柏栋不同意。特别在总指挥的人选上，黄子祥、王柏栋认为，若要叫王泰吉当总指挥，那就是义勇军领导红军。最后，习仲勋、秦武山、

杨森、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大多数人的意见占了上风，选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会议从头一天下午开始，当确定正确的路线时，已到第二天太阳东升的时候。这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处于低潮严峻形势下召开的，对挽救陕甘边地区革命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意义，将永远载入陕甘边革命的史册。这次会议史称“陈家坡会议”。

50 多年后，习仲勋回忆陈家坡会议时写道：“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古城川会合

陈家坡会议后，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下，不仅从形式上、领导上和军事上统一了照金苏区的红军指挥机构，更重要的是使从领导到干部、从战士到群众的悲观情绪大为改观，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战斗的凝聚力。

当时，照金红军队伍的力量状况是：王世泰的义勇军 100 余人为主力战斗部队，渭北红四团有 120 余人，耀县第三游击队近 100 人(陈学鼎任队长，张邦英任指导员，有枪 60 余支)。在国民党军队占绝对优势、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王泰吉、高岗避实就虚，寻机作战，连连打了几个胜仗，使国民党军队企图歼灭照金地区红军游击队的“围剿”、摧垮苏区革命政权的梦想未能得逞。

1933 年 8 月 17 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次出兵攻打后沟寨子民团。高岗、王泰吉率部队从照金出发，包围了后沟寨子，用土制迫击炮向寨子里连放几炮，就吓得民团胆战心惊。高岗乘机又向寨子里喊话谈判，民团被迫走出寨子举手投降。首战告捷后，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战斗胜利。高岗、王泰吉把寨子里堆积的粮食分给群众，群众高兴地说：“打开寨子分粮食，土豪财物分个光。”

8 月 18 日，红军主动出击，围歼庙湾民团一部。

8 月 21 日，红军击溃高山槐雷天益(一说张万礼)民团。

8 月 24 日，红军歼灭让牛村民团一部，并偷袭了柳林民团。

9 月 3 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部队西进，在彬县的马龙、高村等地打击民团，折转北上甘肃宁县境内消灭了一批地主武装。同时，在高岗的策划和领导下，何炳正发动了正宁县农民起义，杀团丁，夺武器，成立了 40 余人的平子游击队，后改编为第三路游击区三支队。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不到一个月，王泰吉、高岗率领部队集中兵力，力避强敌，采取奔袭的游击战术，在运动中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不仅恢复了部分根据地，还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迅速扩大了红军队伍。

9 月中旬，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除照金先后组建起的几支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外，王泰吉、高岗率部队主力进入合水县与国民党军队寻机作战。当部队行至合水县古城川，与强世清、马佩勋、李成荣带领南下的陕北红一支队不期而遇。在这个时候，红一支队的到来，对王泰吉、高岗来说，如同雪中送炭。从此陕北红一支队与照金的红军队伍协同作战，扩大外线，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在照金的“围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陕北红一支队南下照金前，是马明方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洼召开的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在安定县经过整顿的一支较有实力的游击队伍。8 月间，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炮兵营李含芳向活动在安定的红一支队发起“围剿”，游击队在周家硷战斗中失利。当时敌众我寡，为暂避锋芒，红一支队决定南下照金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当时并不知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情况)。红一支队除留白德胜、贾仰青的一个分队在安定县北区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根据地活动外，主力部队由强世清、马佩勋、李成荣带领南下。

红一支队主力从安定县出发，经安塞县真武洞到宜君县石门子、转角镇，到达甘肃合水县古城川。南下途中，一路打土豪斗地主，获得 30 余匹骡马，使部队得到发展，又成立了骑兵分队。

红一支队与王泰吉、高岗率领的部队在合水县古城川会合后，使得照金红军如虎添翼，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红一支队南下照金后，暂归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被派到后方所在地薛家寨驻防留守。

在薛家寨时，红一支队因领导之间意见不统一曾发生矛盾。强世清、马佩勋采取粗暴态度将李成荣抓起来。后经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后方留守处负责人出面调停，李成荣只身返回陕北。

再破旬邑城

1933 年 9 月 17 日，王泰吉、高岗率部队和红一支队出击外线进行游击战争。

9 月 21 日，开进旬邑县境内，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攻打旬邑县城守军。

当部队行至底庙塬村时，正好遇上县里民团 50 余人要去北塬搜索红军。强世 清、马佩勋带着红一支队的骑兵分队作前锋，突然冲入敌群，民团措手不及被全部俘虏。

在这个民团里有个团丁叫宋飞，是共产党员，高岗认识他。通过宋飞摸清了城里的情况后，即由红一支队战士换上民团的服装，宋飞带路，继续向旬邑县城进发。到了旬邑城下，县城里的守军以为外出北塬的民团回来，大开城门。

当红一支队接近城门时，城上守军发现不是民团，但已经来不及关上城门了。当冲人民团总部朱鸿章的房子时，朱鸿章和他的太太还在炕上躺着抽大烟，被一枪打死。城内的守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活捉了国民党县长谢骞。部队连夜开仓放粮，释放犯人，没收物资，烧毁国民党档案，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县长谢骞等 13 人。这次战斗共歼俘守军 150 余人，缴枪 120 余支、物资 20 余驮。

当年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打开旬邑县城，这次王泰吉、高岗率陕甘红军主力和红一支队第二次打开旬邑县城。红军占领旬邑县城后，立即发动群众，把富豪地主的粮食、棉花、布匹及其他物资一部分分给贫苦群众，一部分运回照金。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慰劳红军，青年农民踊跃

参军，陕甘游击队一下子发展到六七百人。

当王泰吉、高岗带着战利品回到照金，慰劳中共陕甘边特委机关和留守部队、欢度中秋节时，恰好刘志丹、王世泰等一行四人从终南山脱险，也辗转回到了照金。

中秋佳节，老战友团圆，大家由衷高兴。刘志丹、王世泰等与高岗、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李妙斋、张仲良、张邦英等百感交集，交谈了一夜。张秀山把杜衡叛变后登在报上的《自首书》拿来让刘志丹看，刘志丹气得骂道："这个王八蛋，他早就动摇了，还装腔作势地说去创建渭华根据地。待部队一出发，他自己就先溜掉了。"当刘志丹听了高岗、王泰吉、习仲勋关于陈家坡会议和最近打了几个胜仗等情况介绍后，对大家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回到了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随后，又有红二十六军南下兵败被国民党军队打散的杨琪、吴岱峰、高锦纯、惠泽仁、王兆相、牛刚、苏四、黄罗斌、刘约三、魏武、康建民、吕占彪等相继辗转回到了照金。

第五十五章

扭转被动局面

“梢山路线”还要走

刘志丹等回到照金，苏区军民的精神顿时振奋起来。人们奔走相告：“刘志丹回来了!”

部队在照金休整了几天，大家就红火热闹了几天。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及中共陕甘边特委的负责人也连着开了几天的会议。会议由高岗主持，刘志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与大家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清楚地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给陕西党组织和党所创建的红军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灾难。

刘志丹深有感触地说：“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断送了，他叛变投降了国民党，这是给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事情未经历过，总是不深刻，这下子我们就知道‘左’是什么东西了。”

大家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讨论，一致认为：在敌强我弱、敌明我暗、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梢山路线”还要走，不走“梢山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刘志丹、高岗提议，红军应在桥山中段的庆阳、合水、华池、保安等几个县交界处创立革命根据地，那里是陕甘两省的交界，国民党统治较薄弱，属两省军阀“三不管”的地方，山大林深，红军游击队易于隐蔽；虽然那里哥老会势力很大，又有很多非法武装的“山大王”，但只要争取与他们联合，就是一股很了不起的潜在力量。与会同志完全赞同刘志丹、高岗的意见。

行动方向确定后，高岗主动要求辞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一职，并

提出刘志丹已回到照金，由他担任政委更为合适。王泰吉、张秀山等也提出让刘志丹担任总指挥。刘志丹坚决不接受。

刘志丹诚恳地说：“这些日子，我随红二十六军南下兵败，历时三个月之久，对好多事不了解，你们这段时间把部队搞得很好。你们把职务让给我，既不利于红军部队的团结，又会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产生猜疑，人们会说我刘志丹一回来就搞夺权。若指挥部还需要我，就先搞点参谋、文书工作。”

最后，在高岗的提议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刘志丹任指挥部参谋长。

10 月上旬，国民党纠集了几千人向照金发动新的“围剿”。驻耀县小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部，驻中宜(中部、宜君)、旬邑、淳化、庆阳一带的冯钦哉、何高侯、赵文治等部虎视眈眈，伺机向照金地区发起进攻。

攻破合水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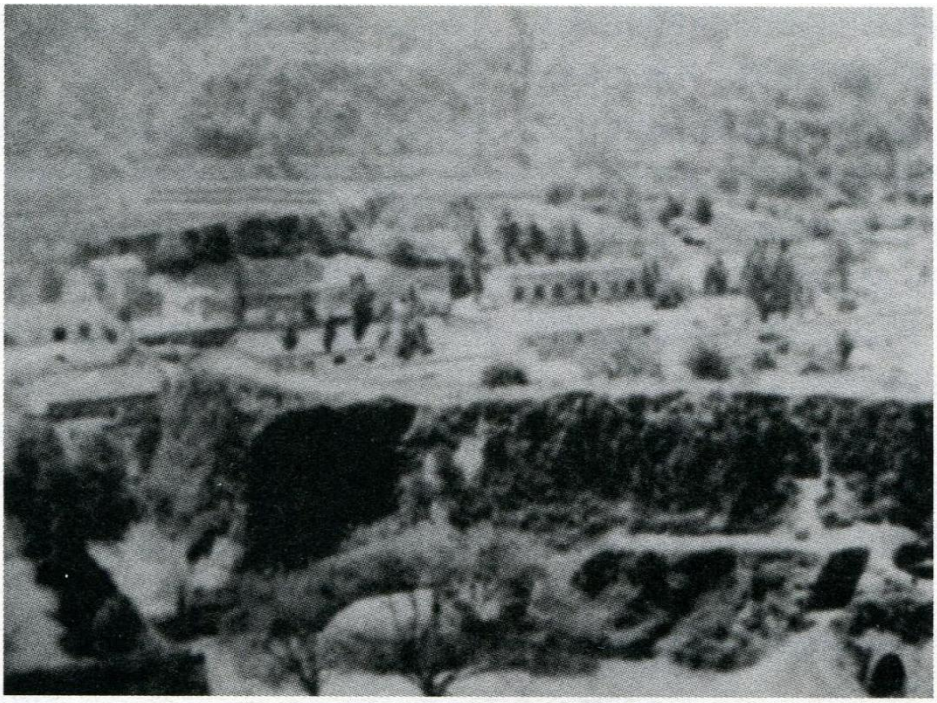
在国民党军队的强大攻势之下，红军临时指挥部面对强敌，决定留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领导照金游击支队和陕甘游击队后方留守人员坚持地方斗争。义勇军、红四团、耀县第三支队、陕北红一支队由王泰吉、高岗、刘志丹带领，从照金出发，挺军北上，长途奔袭，转出外线作战。

1933 年 10 月 12 日，部队从照金出发，横穿马栏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北上，行程 300 余里，于 10 月 15 日开到合水县黑水塬。

在黑水塬，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打掉合水县城这个据点，既可以为部队向西进军扫清障碍，又可以使南梁地区与照金苏区连接起来。为了保证打好这一仗，部队隐蔽在大梢林里，先做演习攻城的作战训练，并赶做登城需要的云梯。

10 月 18 日，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率领部队，冒着绵绵秋雨夜间急行军，在拂晓之前，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赶到合水县城下，把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合水县城位于子午岭的城关川，是个跨山城池，形如葫芦，故又叫葫芦城，葫芦头部临川，葫芦尾部依山，葫芦把子是城内的最高点，筑有坚固的明碉暗堡。城外左右是两条深沟，崖陡壁峭，十分险要。城墙上东西



攻打合水城战斗遗址

有两个城门楼，是国民党守军的城防重点。城防要害部分有里外双层城墙，城墙都用大砖砌筑。东南城墙的里墙和外墙之间，每隔几丈还筑有隔墙，要想从隔墙穿过去，只能通过里墙仅容一人出入的洞。当时，城里驻有赵文治团的一个连和一个保安队及一个民团近 300 人。据此，红军部队要攻占全部城墙，就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样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要强打硬攻是不行的。于是，红军部队采取了趁夜奇袭的作战方案。

攻打合水县城的战斗一开始，王世泰带着手枪队、强世清带着红一支队组成主攻先锋。王世泰和强世清挑选了 20 余名机智勇敢的战士，组成爬城突击队，由王世泰带领指挥。王世泰把突击队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由王安民负责，第二组由陈国栋负责，第三组由张明吾负责。在王世泰带着突击队进入城北部沟里的预定地点，其他部队也都进入预定阵地时，城里守军毫无察觉。

当突击队抬着做好的云梯架上城墙时，发现城高云梯短，云梯离城上还差一丈多的距离。在这紧要关头，要是贻误战机，将会给战斗带来不可

估量的损失。

这时，有一个叫柴正祥的战士对王世泰说：“让我先试着上!”

柴正祥向王世泰要了一把驳壳枪、几颗手榴弹和三把刺刀，带着一根绳，迅速登上云梯。只见柴正祥把三把刺刀依次使劲插入城墙的砖缝里，敏捷地爬上城头。柴正祥一爬上城头，立即把带着的绳子从城上吊下来，城墙下的战士顺着绳子，一个个很快地登上城头。

突击队上了城头，快速扑向葫芦把的最高点。突击队摸到葫芦把的碉堡前，碉堡里住的一班士兵正在酣睡，遂被全歼。

突击队攻占了全城的制高点，用手电光在夜空画了三个圈。偷袭成功的信号发出后，突击队的第一、二组迅速攻占东城门楼。此时，强世清带领的主攻先锋队大部分已登上城墙，分别向城内守军的连部、民团团部和县政府发起突袭。

突击队第一、二组在王世泰带领下，摸到东城楼时被哨兵发觉。哨兵大声喊道：“什么人?口令!”

“查哨的!”话音未落，几个战士猛扑上去，捏住哨兵的脖子。其余战士立即奔到东城楼守军睡觉的房门口，大吼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

东城楼有一排守军，在睡梦中惊醒，光着身子跪在地上求饶。有几个顽固的家伙企图负隅顽抗，被红军战士举枪击毙。其余守军乖乖地举手投降。

东城楼被占领后，城内守军顿时一片混乱。强世清听到东城楼枪声，即向城内守军展开全面攻击。经一小时的激战，城内守军大部被消灭，但西城楼还未攻下。

这时，王泰吉、高岗、刘志丹带领的后续部队到达东城门外，亟待攻入城内，但城门上吊着一把大铁锁无法打开。王世泰心急如焚，举枪对准铁锁，“叭”一枪将铁锁打个粉碎。东城门一打开，部队大队人马一拥而进，很快将西城楼攻下，红军占领了合水县城。

这一战合水县城守军全部被歼俘，只有少数几人逃脱。部队攻占县城后，从监狱中救出被关押五个多月的杨培盛及其他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8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5 月间，刘志丹派杨培盛与王世泰等几人到合水一带，准备从地方民团熟人手中购买一批子弹，以解决红军弹药匮乏的问题。当时，一行人化装成商人，进县城后被城内国民党军特发现。城内正有一个戏班子在唱戏，几个人乘机混入看戏的人群，驻军随即包围了戏场。王世泰侥幸脱逃，杨培盛当场被捕，另一个同志被驻军士兵开枪打死。驻军把杨培盛吊在一棵大柳树上，脚上绑了一扇大磨石，用马鞭抽打，以酷刑要他供出给谁买子弹、买了多少。杨培盛脚上绑的磨石拉得全身骨头咯咯响，浑身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一口咬定根本没有买过子弹。驻军见问不出实情，就令一个士兵拿刀把杨培盛右足跟韧带割断。那个士兵同情他，持刀只割破杨培盛足跟的皮肉。后将杨培盛关入县城监狱。

杨培盛被救出后，一见到刘志丹，就说自己没有完成好任务。刘志丹说：“你受苦了，不要怕东西丢，只要人回来就比什么都好!”

打开合水县城后，高岗、刘志丹组织政工人员进行了政治宣传，在大街的十字路口显眼之处张贴标语和安民布告。在县衙大院，收缴的粮食、棉布和许多物资堆积如山，群众纷纷跑来驮粮背布，拿分到的东西。

指挥部在城里召开群众大会，处决恶霸，对俘虏宣布愿参军的留下，不愿者发给路费回家。国民党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李炎思想进步，表示愿意参加红军，经高岗亲自审查批准了他们夫妻俩一同参加革命，李炎担任合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在 1935 年冬陕北错误肃反中被杀害。

打开合水县城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革命群众，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庆阳、合水等地区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合水县一仗后，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率领部队北上庆阳，击溃了谭世麟的骑兵队，连谭世麟的坐骑也被缴获。

薛家寨失守

红军刚打开合水县城，苏区来信称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朝着照金开来，要求火速救援。部队正要回兵时，又传来照金薛家寨失守的消息。原来是孙友仁团探得红军游击队主力北上，照金红军后方机关留守的部队不多，乘苏区空虚之机，勾结耀县等民团进占老爷岭，对红军后方机关所

在地薛家寨形成包围之势。

1933 年 10 月 13 日，孙友仁团包围了薛家寨党、政、军后方驻地。孙友仁令几门大炮轮番发射炮弹，但未击中寨内工事和重要目标，特别是由秀房沟通往山寨陡峭坡道上修筑的“石门工事”更是毫发无损。孙友仁遂改变战术，指挥士兵几次试图登山攻击，遭到游击队前沿阵地布设的地雷、土炸弹的杀伤，只好退回原地。

当时，薛家寨只有照金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后勤人员 200 余人，但寨内的边区领导和红军上下团结，同仇敌忾，士气旺盛。习仲勋看到敌我力量悬殊，坚持防守困难很大，便向特委建议不能死守，从寨内把部队全部撤出，来个空城计。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后作出决定：由习仲勋先出寨在适当地带做好部队撤退和转移的准备。

10 月 15 日，孙友仁团向薛家寨发起猛烈的进攻，薛家寨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红军后方机关负责人李妙斋、张秀山、吴岱峰等身先士卒，凭借着薛家寨的险要地形，打退孙友仁团和耀县等民团连续多次的疯狂进攻，使其伤亡很大，但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牺牲。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化名李华锋，山西汾西人，生于 1903 年。高小毕业后，在陕北驻军高双城部当兵，曾任营长。1928 年加入共产党。1932 年 10 月，与李艮等组织领导了蒿店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陕甘游击队任第七支队政委，参与领导了创建陕甘根据地照金苏区的斗争。李妙斋牺牲后，由吴岱峰继任总指挥。

10 月 16 日，孙友仁团发起更疯狂的进攻。吴岱峰、张秀山指挥游击队战士和后勤人员连续打退孙友仁团的数十次冲击，守住了阵地。

是夜，投敌叛变的陈克敏带着特务团 100 余人，利用夜色掩护，由薛家寨“石门工事”和后山崾峻阵地之接合部的一条陡峭石缝攀登而上，进入寨内埋伏。拂晓，孙友仁向游击队阵地发起进攻。在孙友仁与陈克敏的内外夹击之下，薛家寨阵地被突破。边区军政领导果断决定：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

张秀山、吴岱峰带着寨内游击队主力首先冲出阵地，且战且退，在党家山作短暂停留后，又向照金以北七界石一带进发，途经榆林镇，除掉民

团数十人。

秦武山、惠子俊和刘约三保护特委和红军后方机关及其他人员向薛家寨以东的黑田峪方向突围成功。后在高岗、刘志丹率耀县三支队和义勇军的接应下，即向宁县盘克塬方向转移。

国民党军队占据薛家寨后，在寨内及周围地区纵兵数日，劫掠群众财物，屠杀革命群众。反动民团和逃亡地主也疯狂进行反攻倒算，残杀未来得及转移的红军伤病员。

在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苏区后，照金笼罩在白色恐怖下，习仲勋仍留在地方坚持革命活动。后因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加紧搜捕和“围剿”，在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他才转到七界石与张秀山、吴岱峰等带着的游击队会合。

不久，习仲勋突患伤寒病，难以随军行走，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养病月余。病未痊愈，又随郭锡山的南梁保安队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的莲花寺。

吴岱蜂、张秀山带着薛家寨撤出的游击队与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后，当晚在宜君县杨家店宿营，指挥部驻在杨家店以西二里路的一个小村庄。

次日拂晓，尾追的高双城部李得荣营偷袭杨家店。当部队发现时，李得荣营已经进村。由于李得荣营来得突然，好些战士在反击中牺牲。住在指挥部的刘志丹、高岗得此消息，刘志丹登上一个小山，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和敌情后，立即命令王世泰带着义勇军由南山根绕道抄李得荣营后路，黄子祥带着红四团从正面发起进攻。但由于李得荣营的大部队伍很快登上北山，义勇军无法抄到后面去。刘志丹立即命令王英带着 30 多名精干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以小目标和快速行动的办法，从杨家店西边荆棘丛生的峡谷穿过，踏荆棘、抓树枝、攀岩石，终于很快绕到李得荣营背后突然袭击。王英带着突击队占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红军在山上山下形成合围之势，歼俘李得荣营一个加强连 100 余人，击毙一个连长，缴枪 100 余支。

痛击赵文治

红军攻克合水县城后，甘肃国民党当局立即命令驻在陇东的甘军杨子恒部对西进红军出击，企图将红军歼灭在陕甘交界一带。红军在合水县城歼灭赵文治团的一个连后，心高气傲的赵文治一直伺机报复。他带着全团800多人，倾巢出动，气焰十分嚣张地向红军主力扑来。

在赵文治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召开有王泰吉、高岗、刘志丹、杨森等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甘军对红军的“围剿”。经讨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击赵文治团，以挫败其他几股国民党军队的锐气，然后各个歼灭。于是，部队采取疲劳战术，牵着赵文治团的鼻子转了几个圈，以瞅准作战时机将赵文治团消灭。

赵文治果真上当，对红军紧迫不舍。红军在庆阳、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周旋十余天，直把赵文治拖得疲惫不堪时，选择了庆阳县毛家沟门村(现属华池县)的有利地形，准备歼灭这股甘军。

毛家沟门有几个村子，位于东西方向的一条深沟中间，南北两面是大山。红军一到毛家沟门，就占领了地势险要的北山。

1933年10月28日拂晓，赵文治带着一团人马紧跟着红军到了毛家沟门。一进村子，留在村里的少数红军部队先跟赵文治团交了火，然后佯装被击败的样子朝着北山上撤去。赵文治认为红军部队不堪一击，沾沾自喜地手提短枪命令士兵：“咬住!不要放掉一个人!”

赵文治亲自指挥全团士兵像一窝马蜂似的朝北山坡上爬。骄横的赵文治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一直追到半山坡。这时，埋伏在北山上的红军主力听得王泰吉一声令下“打”，像猛虎下山一样冲下，发起反击。顿时山坡上黄尘腾起，冲杀声和枪弹声响成一片。

当王泰吉、高岗率领部队向半山坡的赵文治团发起反击之时，突然发现谭世麟的部队出现在北山后，正蠢蠢欲动地集结，有从红军主力背后运动的迹象。由于形势发生变化，负责督阵指挥的刘志丹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强世清带领红一支队抢占北山后的有利地形，以防谭世麟的部队从背后对红军发动攻击。

这时，在红军战士猛冲猛打之下，赵文治一团人马完全失去战斗力，

转身连跑带滚，争相朝山下沟底逃命，一时溃不成军，在山坡上抛下一片尸体。赵文治魂不附体地骑上马，比谁都跑得快，生怕被红军俘虏。红四团骑兵连趁势追击十余里，赵文治所带残部的枪支、辎重、物资丢撒一路，抱头鼠窜。高岗由于在冲锋中扭伤脚腕，当战斗结束时疼得一步也走不动了。

这次战斗中，赵文治团损失惨重，红军将其 800 多人打得落花流水，击毙 200 多人，俘虏 100 多人，缴枪 300 余支，还获大量弹药、战马等军用物资，粉碎了国民党甘军的“围剿”。

潜在北山后的谭世麟，看见赵文治的一团人马被打得丢盔弃甲、人仰马翻、狼狈逃窜，吓得慌忙逃跑。原来，赵文治与谭世麟是合谋要在毛家沟门一带集结，两股军队合歼红军。已插到北山背后的谭世麟曾与红军交战多次，尝过红军的厉害，怕自己的队伍再吃红军的亏，一开始就心怀鬼胎，打好了自己的算盘：如赵文治团胜了红军，就从红军的背后乘胜进攻，以得到一份战功；如赵文治团战败了，就溜之大吉。

当天晚上，谭世麟与赵文治会兵一处，狡猾的谭世麟趁着赵文治惊魂未定，谎称“红军又打来了”，赵文治像惊弓之鸟拔腿就撤，队伍乱成一团跟着溃退。谭世麟趁火打劫，借机收拾了不少枪支和军用物资，发了一笔横财。赵文治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惨重，一团人马逃到庆阳城时仅剩 300 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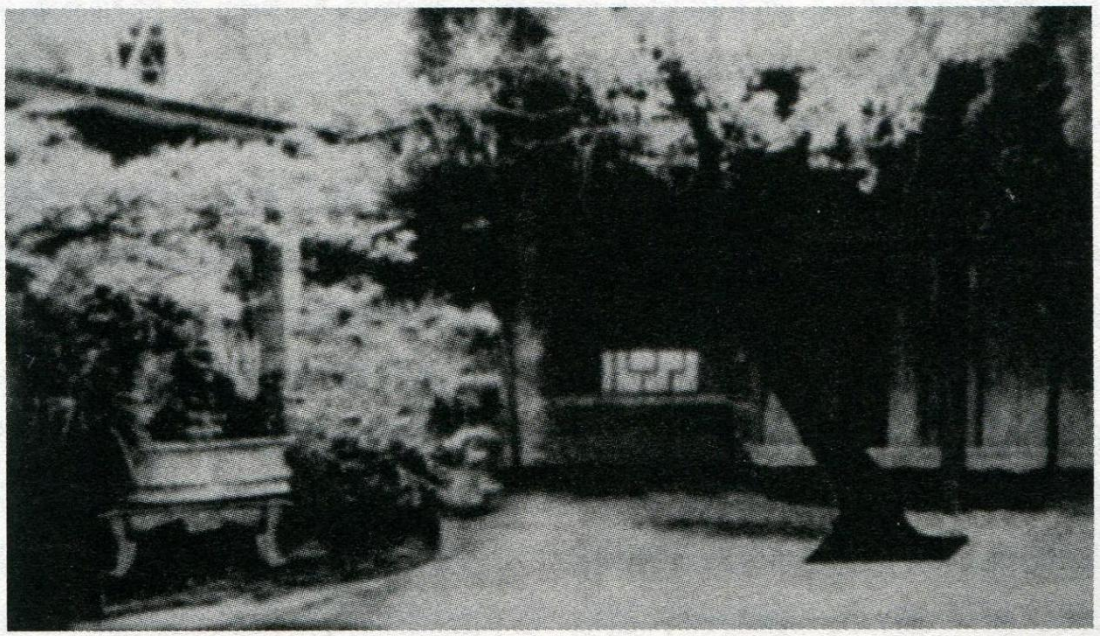
毛家沟门一战重创赵文治团，再次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大振了红军军威，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造成的被动局面。

第五十六章

再振军威

包家寨会议

自陈家坡建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以来，红军取旬邑、破合水，连夺两座县城，后又激战毛家沟门，击败赵文治一个团。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几次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部队的“围剿”，扩大了红军在陕甘边的影响，使红军队伍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包家寨会议旧址

1933 年 11 月 3 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

刘志丹的提议，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习仲勋因养病未参加。这次会议总结了照金苏区的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统一了思想，对当前陕甘党组织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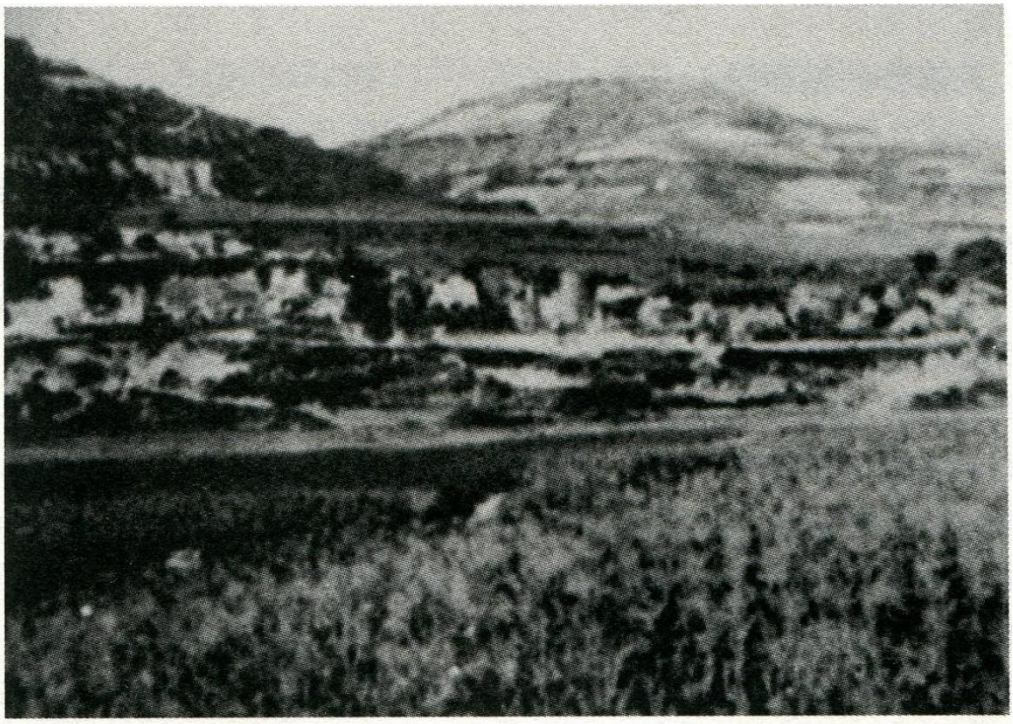
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高岗作报告，然后转入讨论。经过畅所欲言的研究讨论，会议认为在红军暂时撤离照金、部队失去后方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以保证主力红军的休整和生存，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根据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桥山山脉，东靠肤施、西接庆阳、北连保安、南临原照金苏区，四周地形复杂、国民党统治薄弱、回旋余地大、便于开展游击战争的地理环境和有利条件，按照“狡兔三窟”的设想，作出三项重大决议：

第一是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第四十二师，任命高岗为师政委，任命王泰吉为师长，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第二是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游击区以陕北安定县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强世清任队长，魏武任政委，带领陕北红一支队逐步向四周发展；第二路游击区以陕甘交界庆阳、合水、保安一带为中心，由杨琪任三县游击队的总指挥(开始没有政委)，开展游击战争；第三路游击区继续以照金为中心，由张明吾任总指挥(一说王安民为总指挥)，张仲良为政委，带领照金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第三是在陇东一带建立南梁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大后方。根据包家寨联席会议精神，11 月 8 日在合水县平定川口莲花寺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高岗任师政委，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处主任，刘约三任供给处主任。当时，四十二师下辖两个团。以耀县三支队、义勇军为基础改编为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编设三个连，第一连连长赵国卿，指导员王柏栋，第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红四团与原红二十六军照金留守保存的部分队伍扩编为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后为张秀山)；编设两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志柏，第二连连长高占胜。全师共 500 多人和枪。同时，为了加强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在

师、团、连建立了党支部。师党委书记为张秀山(一说杨森)，因张秀山暂不在部队，由高岗代理主持师党委工作。红二十六军的重新建立及师党委的成立，使陕甘红军加强了集中领导，统一了指挥，打破了国民党叫嚣“中共陕西省委被捣毁了，红二十六军被消灭了，照金‘匪巢’被摧毁了，红军再闹不起来了”的造谣宣传。



合水县莲花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大会会址

包家寨会议和重建红二十六军是西北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和新起点，标志着陕甘党组织走向成熟，红军的武装力量建设步入健康发展。

包家寨会议后，陕北红一支队根据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指派，从葫芦河川的东华池镇出发，挺军北上，返回安定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这支从陕北中部地区南下时仅 70 余人的游击队伍，在照金、陇东一带多次协同配合陕甘游击队的作战，有力地策援了陷入困境中的照金苏区，为恢复红二十六军作出重大贡献。同时，红一支队经过锻炼提高了战斗力，补充了武器装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快发展到了 100 余人，战士的革命情绪极为高涨。

在红一支队北上时，红二十六军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骑兵团的负责人杨森代表四十二师讲了话，勉励红一支队回到陕北安定县一带后，根据

包家寨会议精神积极开展第一路游击区的活动，扩大根据地。由四十二师派任红一支队政委的魏武，在大会上表示要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的决议，发扬红军勇敢作战的作风，打好第一路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刘志丹把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亲手交给红一支队。

在强世清、魏武、马佩勋的带领下，红一支队离开南梁。途经高桥川一带时消灭了一个民团，辗转到达陕北安定县境内。

开辟新的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后，红二十六军把照金后方机关移到了南梁。红军部队进入南梁地区一带，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杨森率骑兵团向西活动，打击地方民团；一路由王泰吉、高岗、刘志丹率红三团向东挺进，在咸（阳）榆（林）公路沿线消灭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以建立和发展南梁新的革命根据地。

南梁地区是指葫芦河各支流川道，有平定川、豹子川、大风川、林锦庙、二道川、荔园堡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方圆百里之地。当时，在南梁地区有大小民团十多股，还有谭世麟的骑兵营、张廷芝的新兵营，他们勾结官府，占山为王，称霸一方，尤其是各民团名为保境安民的地方武装，实为地方的土匪强盗，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百姓痛恨至极。

红三团东进中，先消灭道佐铺民团几十人，后偷袭甘泉县城未克。部队由洛川河北行到葡萄沟门，准备设伏歼灭扑来的高双城二五六旅一个营和 200 多民团队伍，后虽伏击计划未实现，但经一场激战，迫使高双城军队和民团队伍东退，再不敢轻易举兵西犯。骑兵团西进中，先在荔园堡、阎家洼子、赵家沟门一带肃清了小股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与东路部队会合二将川。红军部队这次东西出击，对南梁周边的小股民团震慑极大。有不少小股民团或偷偷逃窜，或投降红军接受收编，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这次东出奔袭战斗中，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牺牲，时任班长的孔令甫在洛川刘老庄战斗中左腿骨被打断负了重伤。当时，部队只有两三匹战马供刘志丹几位领导使用，由于伤员较多，刘志丹和王泰吉不但把自己的

坐骑让给重伤员，而且还亲自为伤员抬担架。孔令甫就是由刘志丹和王泰吉用担架抬着行军的。

这时，骑兵团政委杨森在战斗中也负了伤。当部队在二将川林锦庙休息时，有一个同志带着悲观的情绪问刘志丹：“红军什么时候才能打出个局面来?”

刘志丹胸有成竹地回答：“不出三五年。”

这话虽然很短，但预言完全正确，真的没三年时间，即到 1935 年，红军不断壮大，陕甘、陕北两支红军统一指挥，解放陕北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为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在陕北立足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

1933 年 12 月底，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陕甘边各级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庄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起农民联合会，并新建立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五个赤卫队，约计千余人。赤卫队配有长矛、大刀、猎枪和少量枪支，担负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员等任务，积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在这一带有许多哥老会成员，刘志丹利用自己在哥老会中特殊的“大爷”身份，与这一民间组织结成统一战线，将哥老会作为革命的外围力量。行军所到之处，哥老会的成员一碰到刘志丹，就都叫他“刘大爷”，并要给他行哥老会的“拜礼”，但他对哥老会始终有自己的正确认识。一次，部队在二将川的平定川口宿营，附近一位哥老会“龙头大爷”给孩子做满月，请刘志丹去吃饭，他借口有事没有去。当时，张策不解地问刘志丹：“你们的大爷请你，你为什么不去?”刘志丹以鲜明的党性原则对张策和在场的龚逢春毫不含糊地说：“哥老会里的坏事多着哩，应付是要应付一番，靠他们是成不了事的，但要争取团结。”

有一次，刘志丹带着司务长王西林到南梁北面秋林子村找党的联络员侯得才了解改睛。这一带是高其宝民团的防地。刘志丹、王西林一进秋林子村就被民团发现，立即有一群团丁赶来将村子围住。秋林子村很大，侯得才家住的房子三面靠崖，只有一条出村之路，四面都是梢林。团丁们持

枪隐蔽在路口两侧，秘密监视着侯得才家的住房。

刘志丹、王西林硬冲出去是不可能的。刘志丹急中生智，叫侯得才把妻子和女儿的花衣裳拿出来，两人各换一套女人服装。为保护侯得才身份不被暴露，刘志丹、王西林用一条麻绳把侯得才捆在桌腿上，嘴里塞上一块毛巾。然后，二人装作喂猪和抱柴火的农妇，出院子后三转两拐，迅速从后院的高崖跳下脱身。当团丁发现开枪时，刘志丹、王西林早已钻入村外的梢林里。

红四十二师在华池县一带休整时，梁沟门召开了师党委和师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乘战斗空隙组织部队、干部配合帮助发展地方游击队，拔除国民党军队据点和清除散兵游勇，开展根据地建设。同时，决定把部队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派一支留守队看护；部队以连、排为单位，配合干部到平定川、豹子川、大风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宣传和发动群众，迅速组建第二路游击队，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村发展共产党员。

当时，在南梁的荔园堡（亦称南梁堡）驻着张廷芝属下一个头目叫梁邦栋，号称有一营的兵力，直接威胁着红军部队在这一带立足。

刘志丹、高岗一到南梁，就策划要消灭掉梁邦栋这股队伍。经派人侦察荔园堡的地形和敌情后，刘志丹、高岗亲自指挥红军部队包围了荔园堡梁邦栋营，在几分钟内将其一举歼灭，活捉了恶贯满盈的营长梁邦栋。在荔园堡召开公判大会，群众历数梁邦栋的罪恶后，将其就地枪毙。从此，荔园堡成了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后来成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打开荔园堡后，红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接到一封密信，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刘桂堂写来的。刘桂堂外号叫刘二黑子，声称带着万余人马在豫陕边境活动，要求王泰吉前去协助带部队。

王泰吉接信后，向刘志丹、高岗提出要到河南搞兵运，争取刘桂堂起义，壮大红军力量。刘志丹、高岗认为刘桂堂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信中之言不可轻信，不宜去河南。但王泰吉主意已定，坚决要去争取刘桂堂起义。

1934 年 1 月 8 日，经师党委研究（张秀山时任师党委书记），批准了王

泰吉的请求，决定由刘志丹接任王泰吉的师长一职。同时，决定刘志丹、高岗率红四十二师从南梁出发，南下帮助第三路游击区扩大游击队，同时护送王泰吉走出红军游击区。

王泰吉随部队由南梁出发，经连家砭、古城川，沿宁县、正宁县山边南下，直抵淳化县蒋家山、马家山一带，与刘志丹、高岗等分手。离开部队后，王泰吉化装成农民，走到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日相识的民团团总马云从认出。由于马云从的出卖，王泰吉被捕押送西安，于 1934 年 3 月 3 日遭国民党杀害，年仅 28 岁。

高岗到第二路游击区

刘志丹、高岗率红四十二师南下送走王泰吉后，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帮助整顿了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队组织，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恢复了三原、耀县、淳化等苏区。

部队在耀县时，了解到有许多地主豪绅逃到位于耀县县城附近的寺沟南堡，堡子虽然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只有少数地方民团据守，遂决定攻打寺沟南堡。当部队赶到寺沟南堡准备偷袭时，因行动暴露，堡子里突增国民党军队，即撤到北塬，决定攻打生义堡。

生义堡位于北塬沟畔的一个山嘴子上，三面临沟，一面靠塬，地势险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志丹经一番周密部署，决定智取，令红三团隐蔽行动，先抢占寨门，得手后红军一齐进攻。这次战斗由于准备充分，行动迅速，仅用半个小时就将堡子攻下，缴获大量物资。

部队撤离生义堡后，从耀县策军北上。行进到正宁县湫头塬的南邑堡村时，天色已晚，部队当晚宿营在该村。南邑堡村有一户大豪绅，在村子的沟畔修筑寨堡，四周临沟，只有一个吊桥能进入。这个大豪绅在堡内豢养着少量的地方武装。师部决定派高岗带着红三团夺寨子、打土豪。

高岗带着红三团部分战士化装成农民混进堡子，消灭了这股地方武装，缴获了十几支枪，没收了豪绅的财产。战斗结束后，红四十二师政治处主任黄子文向刘志丹报告，称高岗打开堡子后有违纪行为。

部队离开南邑堡村后，经三天行军，到达南梁的连家砭。一到连家砭，

红四十二师决定召开师党委会。在会上，对高岗有损部队形象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撤销了高岗的师政委职务，由杨森接替其职（一说是张秀山接任），并令高岗带上几支枪，到第二路游击区组建一个团的武装队伍，立功补过。

高岗到了第二路游击区后，与第二路游击区总指挥杨琪在保安、安塞、合水、庆阳一带组织整顿各县的游击队，很快使第二路游击区指挥部所辖各县的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和壮大起来。

当时，庆阳游击队的队长是杨培盛，政委是王宝珊，游击队只有 8 个人、3 支枪。在高岗、杨琪的组织指挥下，奔袭二将川刘家坪堡，收缴民团枪 30 支、手榴弹 70 多颗。接着，又将二将川民团团总赵富奎家眷抓起来做人质，迫使赵富奎交出 60 多支枪。紧接着，积极发动逃荒饥民 60 多人参军，使庆阳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为 100 多人的游击武装。到夏季，庆阳游击队发展到 170 多人，扩编为两个支队、一个骑兵队。

合水游击队队长是张振东，政委是孙帝国，游击队只有 5 人。高岗、杨琪首先组织合水游击队机智地缴获了东华池民团 25 支枪，摧毁了反动据点，吸收了一部分新队员。接着，又在太白、连家砭、葫芦河川、李家坡、新堡等地收编民团 1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到夏季，合水游击队发展到 180 余人，扩编为三个中队，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游击武装。

安塞游击队只有七八个人。高岗、杨琪在洛河川胡皮头对游击队进行组织整顿，很快扩大到几十人的游击武装。同时，组织指挥刘景范带领的保安游击队，在金鼎山歼灭张廷芝部一个排，夺得 30 多支枪，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后改称红四支队，由王子长任队长，吴亚雄任政委。

不久，高岗在第二路游击区任政委。一时，高岗、杨琪领导的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县的四支游击队很快发展为 1000 余人的地方游击武装。在第二路游击区，高岗、杨琪组织指挥各县游击队先后歼灭东华池、林锦庙、高台、刘家砭、阎家洼子等地九股民团，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发动群众分土地、分财产。同时，高岗注意和善于利用南梁地区许多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关系，收编民团、土匪为我所用，扩大了红军的武装力量，减少了南梁根据地的后患。

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总指挥张明吾的指挥下，各游击队也发展很快。不久，张明吾被叛徒出卖遭暗杀，由王安民继任总指挥。在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牺牲，由陈国栋继任总指挥，张仲良任政委。由于主动出击，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队先后消灭了柴场子、淳化桃园等地民团，既配合了红军主力的作战，又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 1934 年，第三路游击区在正宁、宁县、赤水、淳化、耀县、邠县、中部、宜君等县的游击队发展到 500 多人。

第五十七章

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

1933 年冬至 1934 年春，以南梁为中心东至平正川、南至莲花寺、西至老爷岭、北至黑水坡方圆百余里的陕甘边根据地很快形成，红军和地方游击武装力量迅速得到发展。陕甘边红色区域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都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同官、宜君、中部等 14 个县的部分地区，新的根据地初具规模。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创办的《红色西北》报

1934 年 2 月 25 日，在南梁地区小河沟四合台召开工农兵大会，成立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改为苏维埃政府)，推举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临时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委员张步清)、劳动(委员牛永清)、财政(委员武生秀)、粮食(委员呼志禄)、肃反(委员贾生秀)、军事(委员边金山)、文教等委员会。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开展土

地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推动了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发行的布币

与此同时，成立了红军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由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马文瑞等兼任教员，为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发展和扩大新的根据地，还派出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到庆阳以北一带开辟庆北苏区。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政权一建立，刘志丹就对习仲勋说：“民众自己选出的政府，党和红军都要支持拥护，使革命政府有威信。”一次，刘志丹在军政干部学校给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走来，立即向全体学员喊了一声“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欢迎习仲勋以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给大家讲话，一时弄得习仲勋不知如何是好。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习仲勋对这件事的印象颇为深刻，在 60 年后还回忆说：“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 20 多岁的青年，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

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刘志丹把党政军中的廉洁视为头等大事。刘志丹说： “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为倡导党政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廉洁行为，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制定出一条严厉的法令：凡贪污 10 块大洋的人就要枪毙。

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武装的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惧。3 月，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即调集陕西冯钦哉的两个团，从耀县北上进击；甘肃杨子恒调集仇良民、王子义、谭世麟三个团的兵力，从正宁、庆阳、合水出发，向陕甘边界包围；陕北井岳秀调高双城部一个团，从扶施、保安西进配合进攻，向南梁根据地发动了大“围剿”。

红四十二师为了避其锋芒，击其弱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决定留第二、三路游击队坚持地方斗争，以牵制国民党各路军队的兵力，由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由南梁出发，从正宁、宁县南下转出外线作战，寻机消灭国民党军队。

当红军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立即调整“围剿”部署，急令南线军队正面堵截。红四十二师挺军南下虚晃一枪，随即东转向同官、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出击，先后袭击姚曲、大石板、五里镇民团 100 余人。还未待国民党南线军队查明红军去向，部队又折转向西北，涉过沮水，在店头消灭民团一部，沿槐树庄经张村驿挺进黑水寺。

黑水寺坐落在河川中矗立的石山上，上边驻守着一个民团，凭借险要地势，挡住红军北上去路。部队到达黑水寺石寨下时，为争取这个民团保持中立，刘志丹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上石寨，言称：“红军路过此地，不打你们。”

民团团总一听刘志丹带领的红军不是来打自己，要借道而行，即命团丁们架好枪炮，一边告知准许红军通过，一边摆出一副临战的架势。双方未发一枪一弹，红军主力浩浩荡荡从河川的街上顺利通过，经太白镇回到南梁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

这期间，高岗、杨琪带着第二路游击队在南梁地区钻山沟、绕山岭，坚持进行游击战争，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敌来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弄得国民党军队心惊胆战、四面楚歌。同时，习仲勋、白天章在陕甘边组织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使国民党军队断粮断物，陷入“聋”“瞎”之状，难以在根据地立足。

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武装进入南梁地区后，在习仲勋、白天章配合高岗、杨琪组织指挥第二路游击队进行的频繁袭扰和神出鬼没的打击下，节节败退，有力地支持了红军主力从外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高岗、杨琪带着第二路游击队先打下古城川，消灭民团 100 余人，又配合平子游击队在正宁县王郎坡消灭一个民团，后在正宁县打开南邑子，歼灭民团数十人。第二路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曾为红四十二师

选送战士 200 余人、战马 50 余匹。

3 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合兵一处，从南梁北上，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由保安游击队佯作进攻保安县城，诱敌增援。待国民党援兵赶来时，红军主力突然从金鼎山暗渡洛河，西进小蒜川、三道川。

3 月 27 日，红四十二师在第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一天内连打两个胜仗。在三道川的蔺家砭，先歼灭张廷芝一个新建营 100 多人，后刘志丹派出张秀山带领骑兵团沿川道迅速奔袭官庙，歼灭张廷芝一个骑兵连 50 多人，夺得战马 50 多匹。

3 月 28 日，红四十二师在第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乘胜进发庆阳县高桥。这天，高桥的国民党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正在为其父过祭日，请来许多客人。刘志丹、高岗先派出几名战士，化装成乞丐，身上暗藏短枪，将区长高明山派守三道门的哨兵一举抓获。当高明山和客人们发现时，山上已冲下一支队伍。人们惊呼：“红军来了!快跑!”

一时院内大乱，人们拼命想从三道门涌出，伪装乞丐的红军战士拔出手枪喊道：“不准动!”没费一枪一弹，将区长及几个豪绅地主抓起来，缴获 30 多支枪，还有大批银洋和物资。高明山给客人备好的酒席，也成了红军战士的一顿美餐。

饭后，部队西进园城子，与谭世麟的一个骑兵连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歼俘骑兵 1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还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

当时，谭世麟的司令部驻在园城子对面的刘家堡子，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的一个骑兵连驻在园城子的下川李家梁村。刘志丹兵分两路，一路将刘家堡子包围起来，一路直奔李家梁村。谭振武的骑兵连没有防备，一触即溃，缴获枪支 50 余支，俘获战马 50 余匹。

西华池战斗

由于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在外线连打几个胜仗，部队士气十分高涨。根据战斗情况，红四十二师骑兵团长一职决定由杨森兼任，张秀山为政委。同时，为了打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部署，决定进军合水县。

于是，部队离开李家梁，经五蛟堡、悦乐、城壕川进至赵家塬。

赵家塬距合水县城很近。驻守合水县城的国民党守军突然发现红军兵临城下，城内一片慌乱，慌忙派人向庆阳告急。驻守在庆阳的王子义闻报，亲率两个营和一个直属机炮连近 1000 人，连夜向合水县奔来。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即牵着王子义的鼻子，从合水县城外向南撤去，决定寻找战机歼灭。

1934 年 4 月 2 日，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退至西华池。西华池是个不大的旧城。红三团驻北城内，骑兵团驻东门外骡马大店，第二路游击队驻城东沟畔。部队刚住下，师指挥部正在开会，第二路游击队派出的侦察员报告称王子义部已随红军部队尾追而来。

王子义十分狂妄。直接指挥这次战斗的副团长在出发时嚣张地令每个士兵必须要抓一个红军战士回来，并给每个士兵发了一条绳子，都系在骑兵的马鞍前。

红四十二师指挥部紧急研究战斗方案，确定由刘志丹和高岗共同指挥这场激战。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王世泰等一起登上城头，观察敌情。望远镜里只见王子义部排成几路纵队，杀气腾腾，沙尘滚滚。王子义部到西华池附近，就与第二路游击队交上火。

当时，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共有七个连 1000 多人，敌我兵力相当，虽王子义军队武器精良，但红军斗志旺盛。刘志丹、高岗根据王子义军队进攻的兵力布置隋况，决定由赵国卿带红三团从正面出击，张秀山带骑兵团抄侧后，第二路游击队（庆阳、合水游击队）从中出击，将来敌截成两段，然后分而歼之。

当第二路游击队将王子义所部截成两段时，王部负责指挥的副团长并不以为然，认为小股游击队是骚扰之举，目的在为掩护红军主力撤退，仍命前卫营长整队齐行继续往前赶。

此时，红三团、骑兵团、第二路游击队三面合围而来。红三团、第二路游击队从正面拦住，迎头痛击。骑兵团从背后猛杀过来。高岗率第二路游击队一马当先，东砍西杀，勇猛无比。只听得敌群内外枪炮声、马蹄声、呐喊声、刀枪拼搏声混成一片。

王子义部貌似人多势众，实不堪一击，顿时乱成一团，溃不成军。王子义的人马还未及展开阵势，就全部被压到沟底，黑压压的，像挤成一堆乱麻似的，前后不得动弹。枪声稍停，听得红军战士齐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王子义部完全丧失战斗力，士兵们举起双手缴枪投降，只有指挥作战的副团长带着少数人侥幸脱逃。

这一仗打得真痛快，不到一小时的工夫，战斗就结束了。红军部队以较小的伤亡取得了一场空前的胜利，毙俘王子义军队达 700 余人，缴长短枪 700 余支、追击炮 2 门、机关枪 2 挺、战马 80 多匹、弹药数十箱，还有其他军用物资。这一仗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国民党军队再不敢轻举妄动，使得南梁地区有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安定。

红军主力和第二路游击队在西华池一战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后，刘志丹的声威和高岗的"高麻子"绰号一下子在南梁地区不胫而走，他们在战场上的气魄越传越神，许多小股军队一听说刘志丹、"高麻子"的部队就闻风而逃。

南下第三路游击区

国民党反动派总是不甘心失败的。当刘志丹第三次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帮助三原、耀县、淳化等地第三路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时，国民党军队又蠢蠢欲动，乘机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仇良民、谭世麟、张廷芝等狼狈为奸，纠集匪徒，向南梁扑来。他们一进入南梁地区的老爷岭以西，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每到一村，就烧房子、抢粮食、赶牛羊，抢劫一空。

仇良民的军队窜入南梁地区，到处破坏新建立的革命政权，抓捕地方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人员，先后用铡刀杀害农委会主任杨珍、土地委员会干部曹思忠以及军械所人员李青山等 6 人，在阎家洼子等地活埋红军伤病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在老河庄一次烧毁粮食十余石。

张廷芝更是坏到极点，派匪徒北上到保安，烧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家的祖坟，声称掘地三尺也要抓尽杀绝刘志丹家十余口亲属，达到穷凶极

恶的地步。

仇良民、谭世麟、张廷芝的残忍无道激起了陕甘边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军队极大的憎恨和愤怒情绪，大家同仇敌忾，决心与国民党军队战斗到底。留守在南梁地区的高岗、杨琪决定避其锋芒，趁国民党军队后方空虚，开展迂回的游击战争，即带着第二路游击队潜入庆阳，攻寨堡、打民团、斗土豪，闹个天翻地覆。

这一招真灵验，甘肃国民党的后方一起火，加之王子义在西华池一战惨败，杨子恒急命仇良民、谭世麟赶快回撤，使得南梁地区得以安宁。

1934 年 5 月初，刘志丹第四次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作战，国民党调集兵力，跟踪而来。部队攻打马栏未克，即进抵耀县。在耀县，部队决定攻打位于耀县至同官中间的黄堡寨子。刘志丹命令王世泰、张邦英各带红三团一部，向黄堡寨子发起进攻，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寨子攻下，全歼守军，缴获了大量物资。

驻守黄堡寨子的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过去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枪法很准，看见红军冲开两道寨门，寨子已难守住，便从寨子北面的树上吊绳子溜到寨外逃走。部队攻入寨子后，发现这个大地主逃跑，即派人跟踪追击，将其击毙在咸榆公路上。

攻克黄堡寨子后，红四十二师两天急行军，到达淳化县境内。刘志丹决定由红三团担任主攻，一连从南门攻城，二连从东门攻城，三连和先锋连做预备队，对淳化县城发起进攻。当部队赶到淳化县城下时，天快要亮了，被县城守军发现，原计划的偷袭变成了强攻。

淳化县城守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红军多次发起进攻未克，即改变攻城计划撤出战斗。在撤退时，县城守军凭借有利地势，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二连在东门的退路。经一场激战，部队始从城下撤离，向十里塬、马家山一带转移。

部队从十里塬、马家山进至三里塬后休整一天。第二天，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派人送来情报，说何高侯的两个连从土桥出发去淳化，要路过三里塬的甘家嘴村。刘志丹、杨森决定将何高侯的两连队伍歼灭在甘家嘴村。

甘家嘴村的东西两面是陡峭的深沟，南北方向是个半截塬。何高侯的

两个连一到甘家嘴村，骑兵团和第三路游击队就从两侧把甘家嘴村包围，红三团从马家山跑步赶来投入战斗。战斗开始后，何部两连队伍利用村里的一个四周筑有围墙的场院负隅顽抗。部队进攻受阻，红三团有十多个战士伤亡。师政委杨森率骑兵团在冲锋时不幸中弹负伤。红军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勇猛地突破围墙，冲入场院。何部两连队伍顿时土崩瓦解，大部分士兵缴枪投降，有一小部分企图逃跑，从高崖跳到沟底一个大水坑中，被一排手榴弹炸死。这次战斗中杨森负伤，师政委由张秀山继任，骑兵团由赵国卿任团长，高锦纯任政委。

在甘家嘴村一战后，红四十二师撤离三里塬，向直罗镇、黑水寺进军，沿途遭到马弘章骑兵团、冯钦哉团一个营和几个县民团的堵截。由于敌情紧急，形势严峻，刘志丹决定北上，避敌合围。

部队由淳化出发，经香河山、油房沟、黑牛坳，与马弘章、冯钦哉的军队几经交锋，到退至五顷塬时，红军全体指战员身上的子弹几乎打光了。

在红四十二师到达五顷塬的当晚，红三团二连有个班长乘部队士气低落之机煽动七八个战士持枪叛逃，被二连连长陈学鼎发现，将为首者抓起，经审问后，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就地枪决。部队在五顷塬休整两天后，经石底子、上畛子到达丁字川上川。

刘志丹举家到南梁

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受挫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打仗返回南梁。他看到南梁地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再次“围剿”，第二路游击队还发展壮大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欣慰万分。

张廷芝烧了刘志丹的家后，刘志丹一家老小分散逃入深山老林。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带着年仅四岁的女儿力贞躲进一个偏远的山水洞里，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就用石缝中的滴滴渗水和炒面充饥。后来带的干粮吃完了，一家人饿极了，同桂荣和婆母在一天晚上趁着天黑走出山水洞，准备到附近人家讨点吃的东西。婆媳二人刚到山上，正好碰到搜山的国民党军队。

这些军队士兵不知道她们是刘志丹的亲人，就逼着要婆媳俩给他们带

路。婆媳二人趁着夜黑，一起滚下路边的山崖，宁愿摔死在山崖下，也不肯被国民党军队抓到。那些士兵以为她们必定摔死，就扬长而去。幸好被山崖问的树权挡拦，她们才保住了性命。

习仲勋知道刘志丹一家人的遭遇后，找刘志丹说："伯父和嫂子下落不明，我们应当派人把他们找来。"

刘志丹不同意："我们现在很困难，带家属不好，不要带这个头。"

习仲勋认为，刘志丹的家属是国民党军特残害的对象，在白区很难存活，坚持派人四处打听，终将其一家人接到南梁。刘志丹的家属一到南梁，刘志丹就把妻子同桂荣派到被服厂做工，并叮咛说："咱们不能给红军增加负担，你要多干活。"

同桂荣心灵手巧，针线活出众，在被服厂不仅学会了做军服，还学会做军旗，谁的衣服破了，她就马上给补一补，同志们都亲切地叫她"刘大嫂"。有一次，刘志丹回到家看见妻子同桂荣做好一个新棉背心，马上穿到身上，左右打量一番，觉得背心有点长，就对同桂荣说："这不是浪费了布料?"

同桂荣笑着说："是给世泰做的，哪是给你的。"

刘志丹忙脱下说："你咋不早说。"

同桂荣到南梁后，曾给刘志丹生了一个儿子，夫妇二人十分疼爱。一次，女儿刘力贞和儿子均发高烧，找来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来看病。这个军医给刘力贞吃了一粒药丸，给他们的儿子打了一针。当天下午，儿子就死去了。刘力贞吃了药丸后也头昏恶心，浑身无力，但无大碍。同桂荣怀疑那个军医有意害死孩子，后来再去找那个军医时，他早已溜跑了。

此后，同桂荣再未生育。力贞经常跟母亲同桂荣在严酷的环境里随部队行军转移，居无定所。

刘志丹在南梁第一次见到父亲刘培基(后为陕甘边区参议员)时内疚地说："儿子不孝，叫父亲受惊了。"

刘培基并无责怪之意，反而对刘志丹说："我过去不了解共产党，反对你革命，后来我知道革命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把咱家抄了不算啥，你好好干你的事，不要为我操心。"

刘志丹想起过去父亲骂他把家里人和长工张万银的两个儿子“勾引”得参加了革命，把几个堂兄弟也“勾引”去了，全不顾家，现在看到父亲这样开明，思想进步这样快，对父亲更为尊敬。

当时，在张廷芝部下有个姓同的连长，是刘志丹之妻同桂荣的同宗兄弟，他被张廷芝派在九嘴坡的一个寨子驻守，由于土匪成性，祸害百姓，恶名甚大。一次，刘志丹命令部队攻打九嘴坡，将这个同连长活捉回来。

刘志丹一见同连长，立即命令把他杀掉。刘志丹的家里人劝说，刘志丹不听。王世泰等再三劝说：“教育教育放了他，若不悔改，下次捉住再杀也不迟。”

刘志丹思索一番，即对同连长说：“你回去再不要给张廷芝当走狗，如再捉住非杀不可。”

但这个同连长本性难改，一放回去又继续替张廷芝卖命。张廷芝又给他拨枪 50 支，让他再拉起土匪队伍去守九嘴坡。刘志丹知道后，恨铁不成钢地说：“这种人教育不成，见了就打死，留下就是害!”

部队又一次攻打九嘴坡，同连长再次被活捉，刘志丹命令就地枪决。刘志丹秉公无私、为民除害的大义灭亲之举，在陕甘边军民中广为传颂。

荔园堡会议

1934 年 5 月 28 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的荔园堡召开了党委会议。在会上大家通过多年来血与火的斗争实践，肯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既定方针是正确的，并决定正式恢复中共陕甘边特委(因撤出照金再未正常活动，边区党的工作一直由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代行)。特委由刘志丹、张秀山、高岗、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等组成，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后由惠子俊担任)，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张邦英任组织部长，张静元任宣传部长，杨在泉任秘书长。

在会上，大家认为高岗自撤职后革命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毫不灰心丧气，对发展和壮大第二路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卫陕甘边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调整四十二师领导班子，

由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杨森任师长。同时，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高岗等 12 人为军委委员。高岗再次回到陕甘主力红军的领导岗位。

南梁荔园堡

6 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作短暂休整后，刘志丹率领红三团进军保安。在保安驻着高双城旅高玉亭营和一个保安团，高玉亭营组成的一支敢死队是陕甘边根据地周边的一个“钉子”。部队经三天急行军，进至保安县的马子川。

马子川位于旦八寨子和金鼎山之间。这天早晨，大雾弥漫。高玉亭带着敢死队，每人身挂一长一短的枪支，趁着浓雾，企图前后夹击红军。刘志丹判明高玉亭的企图，立即命令红三团二连跑步抢占了一个高山头。敢死队见红军先抢占了有利地势，个个脱掉上衣，赤膊没命地向山上冲来，妄图抢夺制高点。

刘志丹、王世泰组织火力，从山头正面、侧面阻击。好一场恶战，虽敢死队凶悍不怕死，可红军的枪弹也不认人。敢死队发起数次冲锋，均被红军打退，山坡上留下一片死尸。

这一战，歼俘敢死队 100 余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从此，这支敢死队一蹶不振，高玉亭营元气大伤，再不敢轻易出来挠扰红军。

从 1933 年冬到 1934 年夏，刘志丹、杨森等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在第二路游击区和第三路游击区游击队的配合下，从南到北参加大小战斗 30 余次，歼俘国民党军队、民团 3000 余人，拔掉成百个国民党军队和民团据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先后成立了 14 支地方游击队，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兵政权，陕甘边苏区得到巩固发展。

第八部 ★

SHANBEIHONGJUN
JIDIYIERCI
FANWEIJIAO

“ ”

第五十八章

镇米事变

永坪事件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进而侵占热河占据华北。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加紧对江西中央苏区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围剿”。中共陕北特委在排除党内几次“左”倾错误干扰后，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

马万里

陕北中部地区红九支队组建不久，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驻扶施的高双城旅立即派张建南营与清涧、延川、安塞、安定各县出动的地方民团形成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在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中共陕北特委为了第八部陕北红军及第一、二次反“围剿”保存、发展这支刚诞生的革命武装力量，决定让红九支队避敌锋芒，向南转移，向活动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靠拢。

4 月，红九支队队长高朗亭养伤还未归队，工作由副队长强世清、政委

马万里负责。这时，白德胜、王志明两人打死地方土匪侯登堂，夺得两支短枪，前来投奔红九支队。因白德胜、王志明原来在侯登堂手下干过事，支队领导内部在是否接收这两个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

马万里认为，在大敌当前、队伍处在危境之时，绝不可轻易接纳来自非法武装方面的人员，一定要纯洁红军队伍的革命性；而强世清则认为，要干革命，就要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尤其是队伍处在危境，更要多搞几条枪、多拉些人，以扩大革命的武装力量。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还是决定接纳白德胜、王志明参加红九支队。

在接纳白德胜、王志明的问题上，马万里总认为强世清的做法不妥，事关重大。经与在延川县养伤的高朗亭取得联系，高朗亭也觉得应慎重对待地方非法武装的收编问题，即通知强世清、马万里将队伍带到延川县进行整顿。

红九支队到了延川县永坪镇，在高朗亭对队伍进行整顿时，因白德胜与强世清都是安定县人，误认为此次整顿是故意排挤游击队中安定县籍人员的派系之争。于是，强世清、白德胜、姬振之等对高朗亭、马万里的意见很大，遂联合安定县籍的战士，一气之下缴了高朗亭、马万里的枪，逼着二人离开队伍。人们把这一事件称为“永坪事件”。

“永坪事件”发生后，高朗亭、马万里离开永坪镇，到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红九支队的情况。这时，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已调离陕北，由马明方代理书记。马明方觉得事态严重，派出特委巡视员马文瑞到红九支队整顿队伍。

马文瑞赶到安定县西区，当找到红九支队时，强世清因病得严重，已经离开队伍回家养病去了，游击队由强世清暂交给白德胜带领。白德胜刚从侯登堂手下投到红九支队，且不是共产党员。马文瑞很担心由中共陕北组织创建的这支红军游击队会在白德胜的带领下变坏，甚至叛变投敌。经马文瑞的争取工作，白德胜坚定地表示：一定接受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决不投降国民党。

马文瑞走后没几天，中共陕北特委派出常学恭到红九支队当政委，以加强党在游击队的领导。常学恭一到红九支队，因工作方法简单，与白德

胜存在许多意见分歧，引发了队伍中战士的情绪波动，常学恭被迫离队。接着，特委又派出李成兰、王兆庆到红九支队。此时，强世清病愈归队。

红九支队波波折折的内部纠葛刚平息，高双城部张建南和地方民团数百人已逼近红九支队活动的安定县西区。面对险恶形势，中共安定县西区区委书记谢德惠催促红九支队，立即执行中共陕北特委指示，南下靠拢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红九支队准备南下向陕甘边行动时，白德胜、王志明又与强世清的认识产生分歧。白德胜、王志明认为，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应执行，但安定县游击区的地盘也不能丢，主张少部分队伍开到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大部分队伍应留在安定县境内打游击，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强世清因原是红二十六军骑兵队长，认为活动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人多枪多、势力强大，竭力主张红九支队尽快脱离险境，将全部队伍带到陕甘边，既能从红二十六军那里得到枪支弹药的援助，又可保存队伍实力，以图后举。两种意见各不相让。

强世清无奈之下，准备甩开白德胜、王志明等持不同意见者，强令红九支队全部拉出安定县。当强世清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中共安定县西区区委书记谢德惠时，谢德惠十分震惊。

谢德惠严肃地批评了强世清，认为红九支队已经在“永坪事件”中折腾得散去不少战士，人员锐减，如再这样一直折腾，其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平息红九支队南下陕甘边的这场激烈的争论，谢德惠征得争论双方的同意，决定由白德胜、王志明带领一个分队，留在安定县一带坚持游击活动，由强世清带领两个分队南下陕甘边。

谭家硷战斗

1933 年 5 月中旬，强世清带着红九支队主力离开安定县。在南下途中，经龙嘴河打击民团，缴获几十匹骡马和一些枪支后，在旬邑县阳坡头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当时，红二十六军的大权把握在杜衡的手里。谢子长、阎红彦被勒令离开部队，经由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被杜衡

贬为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刚任团参谋长)，杨重远被贬为红二团参谋处长，白锡龄等被勒令逐出部队不知去向，高岗被排挤出部队，派往陇南搞兵运。红二十六军部队内弥漫着一派紧张的气氛。

红九支队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后，刘志丹听了强世清的汇报，对红九支队的到来表示欢迎。根据强世清的汇报，为在陕北开辟出一块红军游击活动的区域，刘志丹决定把红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简称红一支队)，强世清任支队长，并为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从红二十六军派出杨重远任支队政委。同时，由红二十六军送给红一支队一些枪支弹药，充实了装备，即命红一支队返回安定县一带，在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杨重远、强世清带领改编后的红一支队，离开红二十六军北上。路经平顶山时，红一支队与马佩勋带着的一支南梁游击队 20 多人相遇。这支游击队是马佩勋受刘志丹的派遣和尹云山一起到南梁新堡收缴了一个民团的枪而初创建起的一支游击队。红一支队和马佩勋的这支游击队合兵一处，由马佩勋补任红一支队副队长。同时，红一支队成立了队委会，杨重远、强世清、马佩勋为队委会负责人。

5 月 28 日，红一支队北上返回陕北。刚开进安塞、安定两县交界的董家寺，与高双城部的一股巡逻队迎面相遇。双方一接火，杨重远、强世清立即将队伍分成两路，一路迎着巡逻队的正面交锋，一路绕到巡逻队的背后包抄过来。在游击队的前后夹击下，将这股巡逻队全歼，俘虏十余人，缴枪 20 余支。

不料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国民党驻军。高双城部张建南带着两个连，朝红一支队撤离的方向追来。

5 月 29 日，红一支队转移到安定县的谭家硷，刚要休息，张建南的人马尾追而至。张建南派出的便衣杀了游击队在村外设的站岗哨兵，偷偷将村子包围起来。待游击队发现敌情，四面已枪声大作，张建南的两连队伍向村子里冲来。

杨重远机智果断，临危不乱，立即指挥红一支队合力反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打退张建南两个连向村子里的几次进攻中，杨重远的腿部不

幸负了重伤，被战士们背着指挥战斗，边打边撤到杨家沟村。刚到杨家沟村，张建南又带着两个连蜂拥追来。

在这危急时刻，杨重远觉得自己腿负重伤难以行走，如随队伍一起撤退，必然会影响到行动速度，红军将陷入重围。为使队伍能安全撤出杨家沟，杨重远令强世清速带领红一支队撤离险境，他留下来作掩护。杨重远凭借村里的断墙为依托，掩护红一支队撤出村子。队伍安全转移后，张建南才发现上当受骗，村里竟只有杨重远一个人。

此时，张建南才壮着胆子朝杨重远冲过来，叫喊道：“抓活的!”杨重远轻蔑地冷笑一声，举起手里的枪，将枪膛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胸膛倒了下去，时年 39 岁。

张建南未能活捉到杨重远，便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运回安定县城，高竿悬挂城楼示众。是夜，安定县的群众趁着守城士兵防守不严，偷偷爬上城楼把杨重远的头颅取下，然后秘密运出城外，交给党组织，对杨重远进行了安葬。1934 年中共陕北特委为纪念杨重远烈士，曾将他牺牲的地方，即安定、安塞、肤施三县交界的几个乡镇合并，命名为重远县。

谭家硷一战后，强世清带领红一支队转移到杨道峁。在杨道峁与留在安定县的白德胜所带的分队会合，对红一支队进行了改编休整。其间，派出张承忠到中共陕北特委，汇报了红一支队北上受挫的情况。

此时，中共陕北特委正在积极地筹备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由马明方留在葭县筹备会议文件，毕维周去北路神府等县巡视工作，崔逢运去绥德、清涧、安定各县巡视工作。崔逢运先到绥德县，与中共绥德县委负责人崔田夫、崔田民等见面，了解绥德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又转到清涧县，与中共清涧县委负责人白如冰、唐洪澄等见面，然后化装成商人躲过了折家坪镇国民党驻军检查，到了安定县任家砭。在任家砭，通过中共安定县西区区委书记谢德惠与红一支队的全体战士见了面，传达了特委指示。

红一支队经过改编休整后，强世清任队长，李成荣任政委，马佩勋任副队长，张承忠任经济员。游击队下辖四个分队，一分队队长白德胜，二分队队长李胜堂，三分队队长王孝增，四分队队长谢绍安，共 80 余人、80 余支枪。崔逢运以中共陕北特委巡视员的身份，决定红一支队以安定县李

家岔为中心建立小块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

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1933 年 7 月 23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高起家洼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进而侵占热河、占据华北，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国民党政府坚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方针，加紧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进行“围剿”的形势下召开的。

当时，中共陕北特委已经历和排除了几次“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共陕北的各级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陕北地区各县党的支部发展到 72 个，共产党员已有相当数量。同时，在刘善忠等用付出生命为代价所建立的陕北游击武装于安定、安塞、延川、清涧、绥德等县开展的游击活动以及红二十六军于陕甘边开展的活动的影响下，陕北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只有广泛发动群众、扩大游击武装力量，才能在陕北创造出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崔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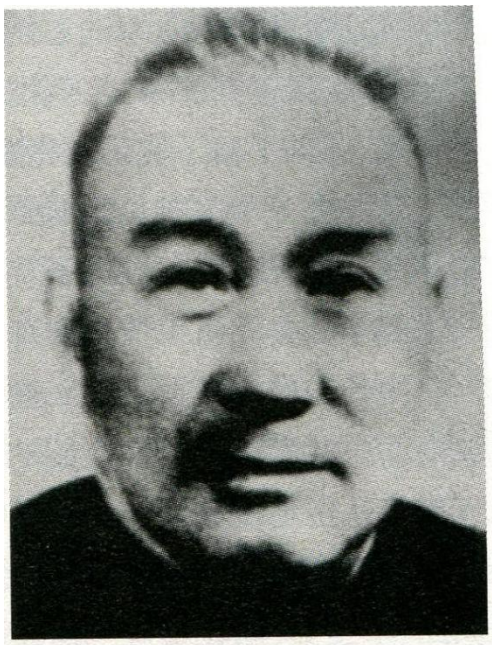
高起家洼位于葭县城西 30 里外的偏僻山沟里，村里有十几户人家，多为贫苦农民。会址选在中共陕北特委交通员高禄孝的家。高禄孝的家是个革命的家庭，他祖父高振烈是有名的老中医，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儿子和孙子闹革命；三叔父高钧仰、堂兄高禄忠都是共产党员；堂弟高禄贤虽年纪小，也参加了团组织。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开会是很安全的。高家有孔窑洞，里边是一个套窑，套窑门用柜子、木板遮盖着。参加会议的同志，白天隐蔽在套窑里开会，到夜里才走到套窑外，活动身体和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参加这次会议的特委成员有马明方、马文瑞、毕维周、王兆卿、常学

恭、鲁贲、崔逢运，各县代表有崔田夫、崔田民、贾怀智、张达志、高长久、张岗、高禄孝、唐洪澄，还有游击队代表高朗亭及其他代表王国昌、赵福祥等共 22 人。会议由马明方主持并作了工作报告，崔逢运传达了中共北方局对陕北工作的指示。与会人员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陕北具备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迅速在神木、府谷、葭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安定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安定县红一支队，在绥清建立红二支队，神府建立红三支队，创建出一块革命根据地。

这次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在会议选举前，已经酝酿选举马明方为党的特委书记，但当时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刚从中共北方局请示工作回到陕北的崔逢运传达说：中共驻北方代表指示，强调使用工农干部，书记要选工人当，因马明方是知识分子，不能当选，并提出绥德县有个木匠叫贺牛，按照上级使用干部的标准，应选这个人当书记。


崔田夫

会上，大家不同意崔逢运的提名，经讨论同意选举工农干部崔田夫为书记，因为他是雇农，又是老共产党员，且阶级觉悟高，革命意志强，勇于对敌斗争。会议选举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毕维周、王兆卿、崔逢运、鲁贲、第八部陕北红军及第一、二次反“围剿”崔田民、张达志、高长久等 11 人为党的特委委员，由马明方任宣传委员(一说组织委员)，毕维周任组织委员，崔逢运任秘书长，王兆卿任军委书记，张达志任农运委员，鲁贲任团特委书记。

会后，特委决定各特委委员立即分赴各县视察工作和传达落实会议精神。先后派出毕维周、王兆卿到安定县对红一支队进行整顿，并任命毕维周为红一支队政委；派出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三人到清涧县东区(这次

会议将绥德、清涧合并为绥清中心县委)组建红二支队；派出贾怀智回神府一带，与马万里等组建红三支队。

无定河畔六烈士

1933 年 7 月下旬，毕维周、王兆卿由特委交通员高禄孝护送前往安定县。三人一行离开葭县高起家洼，赶赴安定县，路经榆林县镇川堡，夜宿崔明道家。崔明道是中共米脂县委书记，几人见面格外高兴，大家谈话到夜深方才人睡。

黎明时分，突然有一群国民党队伍破门而入。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崔

明道在睡梦中惊醒，虽奋起反抗，终被抓捕。原来是有叛徒告密。米脂县的驻军是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姜梅生团的一连。在连里有个司务长叫董培义，陕西渭南县人。董培义谎称自己参加过渭华起义，要求加入共产党。米脂县党组织一些同志认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这样一个人，有利于开展兵运活动，没经严格审查，就把他接收入党。董培义入党后，参加了党组织一些活动，逐渐了解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和有关领导人的行迹。后来，董培义的老婆和连里的一个大排长鬼混时告发了董培义。那个大排长为了立功领赏，将董培义的情况报告连长李子宜。李子宜把董培义捉来一审问，董培义就把所知道的米脂县党组织情况和盘托出。

团长姜梅生根据董培义提供的情况制定了搜捕计划，首先派兵将米脂县城内的中共米脂县委宣传员王守义和工作人员高庆恩逮捕。然后，连长李子宜领着队伍连夜到镇川堡将崔明道的家包围。李子宜领着队伍在镇川堡搜捕崔明道时，正好将当晚睡在崔明道家的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也一同抓捕。接着，李子宜又根据董培义的口供，领着队伍到郝家坪抓共产党员常学恭。常学恭不在家，李子宜扑了个空。李子宜领着队伍急忙朝姜兴庄奔去，企图抓捕共产党员姜好兴。

姜好兴的家在姜兴庄的沟底，有两孔土窑洞，院子很小，院前矮墙外面就是一条小河。这时，马明方、马文瑞从高起家洼开完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会议刚到姜好兴的家(当时中共陕北特委机关设在这里)，正和常学恭、姜

好兴在窑里整理特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在门外放哨的姜好兴的母亲猛一抬头，发现李子宜的队伍进了村。她不敢疾跑，怕引起进入村子的队伍注意，赶忙拿着一把扫帚跪到地上，一面装着扫地向前移动，一面朝着窑洞里面低声喊：“白匪军来了!”

马文瑞急忙收拾好文件，顺手塞到炕洞里。这时，李子宜领着队伍已走到了姜好兴家院外。李子宜误以为特委在侧旁的一孔窑洞里开会，带着手下蜂拥般地直冲了进去。

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姜好兴四人乘机跑出窑洞，纵身跳过矮墙外，顺着小河后沟的方向跑去。李子宜一发觉，便命士兵随后紧追，开枪射击。李子宜带着士兵追到一个岔路口，不知该向何处。

这时，正好有一个农民在路口干活，李子宜上气不接下气地打问马明方、马文瑞、常学恭、姜好兴逃走的方向。那个农民用手一指，李子宜立即顺着所指追去。追了半天，终没见到一个人影，这才知道上了当。

马明方、马文瑞等从姜兴庄脱险后，先到镇川堡去找崔明道。谁知刚到镇川堡，就听说崔明道、毕维周、王兆卿、高禄孝等人于当天凌晨被李子宜带着的队伍抓走了。马明方、马文瑞等深感事态严重，急忙分路转移到葭县南坬村，通知各特委委员召开紧急会议，以采取应急措施。

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崔明道、王守义、高庆恩六人被捕后，被关押在李子宜连部所在地米脂县城内财神庙里，经拷打审讯无果，便又被押送到国民党县政府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国民党军特继续威逼利诱，酷刑折磨，烙铁烧，杠子压。王兆卿、毕维周等六人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他们坚定地说：“要吃张口，要杀开刀!要我们背叛共产党，办不到!”

国民党从六人的嘴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又怕红军游击队来劫狱救人，团长姜梅生决定以押往绥德县为名，在半路上将其杀害。

8 月 3 日早晨，米脂县城内国民党军队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王兆卿、毕维周、崔明道、高禄孝、王守义、高庆恩被五花大绑，由副团长高治凯和排长万振业带领着一排士兵押解，离开米脂县城南下绥德。行至城南十里铺官家湾路口时，高治凯、万振业命令士兵强迫

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崔明道、王守义、高庆恩六人离开南行大道，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无定河畔。他们知道国民党要下毒手了，横眉冷对，大义凛然，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口号。

王守义

高治凯、万振业慌乱中急令士兵开枪王兆卿、毕维周、高禄孝、崔明道、王守义、高庆恩在一阵乱枪中相继倒下去。急骤的枪声唤来了革命者的家属和周围村庄赶来的群众。他们不顾士兵的刀枪阻拦抢回毕维周、崔明道、高庆恩三位烈士的遗体。王兆卿、王守义、高禄孝三位烈士的遗体被抛入无定河中，烈士的鲜血顿时染红了河水。

这就是史称“镇米事变”的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文瑞曾写了一篇《无定河畔六烈士》的纪念文章，以寄托深切的哀思。

第五十九章

红一支队分散隐蔽

二次南下

1933 年 8 月中旬，为保证陕北党组织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的有关决议，中共陕北特委在葭县寨子沟就当前的形势问题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由特委书记崔田夫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常学恭、高长久等。会议分析了镇米事变发生后的形势，认为虽然毕维周、王兆卿两位特委委员和四名同志遇害，但陕北党组织没有遭到严重破坏，并在继续积极活动。与会特委委员一致表示：要以对国民党更大的仇恨坚持斗争，坚决执行高起家洼扩大会议的各项决议。

会议决定：派特委新任组织委员崔逢运、军事委员常学恭和青年团负责人鲁贲三人到北平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工作；派张毅忱、贾仰青、樊文德护送马明方去安定县整顿红一支队；派马文瑞到神府地区巡视工作，并组织游击队的活动；留张达志、高长久在葭县和吴堡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寨子沟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米脂县姜兴庄转移到葭县南坬村。

马明方到安定县后，对红一支队进行了整顿，并依靠地方党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农民参加游击队，使游击武装得到很大发展。他离开时，将张毅忱、贾仰青、樊文德留到红一支队，以加强游击队党的力量。

8 月下旬，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炮兵营李含芳向活动在安定地区的红一支队发起“围剿”。游击队在周家硷、李家岔与李含芳营战斗失利，分队长王

志明被俘杀害。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红一支队根据中共陕北特委指示决定避开强敌，二次南下与活动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会合。

这次南下，红一支队除留白德胜、贾仰青带一个分队在安定县北区以李家岔为中心的小块根据地坚持活动外，其余游击队主力三个分队，由强世清、马佩勋、李成荣带领离开安定县。

红一支队从安定县出发，经安塞县真武洞到宜君县石门子、转角镇，然后到达甘肃合水县古城川。游击队在南下途中，打土豪斗地主，获得 30 余匹骡马，成立了骑兵分队。

当红一支队辗转到照金时，由谢子长、刘志丹创建的红二十六军被杜衡强令南下渭华地区遭遇失败。这时的照金地区已处险恶之境，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后改编的义勇军只剩一个连的队伍，由渭北游击队刚改编的红四团也仅 100 余人，加上耀县第三游击队，与红一支队合起来，红军武装不足 400 人。

在这紧要关头，中共陕西省委又遭国民党特务破坏，照金局势更是雪上加霜。高岗从西安脱险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照金，及时在陈家坡召开了中共陕甘边特委扩大会议，成立陕甘边红军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将义勇军、红四团和耀县第三游击队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气焰，以巩固和扩大照金苏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先后歼灭了几股民团和地主武装，采用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略战术，不仅恢复了部分根据地，而且扩大了红军武装，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

在此期间，红一支队与陕甘红军游击队合兵一处，接受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先坚守照金根据地后方机关所在地薛家寨，后与义勇军、红四团、耀县第三游击队浴血奋战，攻克旬邑、合水两座县城，歼灭赵文治近一个团，为保卫照金苏区建立卓著战绩。

在保卫照金苏区的数次战斗中也锻炼了红一支队，使这支红军游击队从南下时的 70 余人发展壮大到 100 多人，武器装备得到了极大补充。

埋枪散伙

1933 年 11 月中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恢复红二十六军建制，刘志丹从红二十六军选派魏武任红一支队政委，由强世清、魏武带领游击队返回安定县。红一支队到安定县后，还未及与留在安定县的白德胜、贾仰青取得联系，强世清贸然决定攻打枣树坪张建南部的一连守军。

枣树坪的守军工事坚固，地形险要，并筑有碉堡，易守难攻。当时，红一支队虽在二次南下后改善了武器装备，曾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一起打过几个大仗、硬仗和胜仗，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游击队刚返安定县，立足未稳，对敌情尚不十分了解，在敌我力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下，攻打枣树坪尚有诸多不成熟条件和不利因素。

惠泽仁是随红一支队回家探亲的红二十六军骑兵连指导员，他熟悉枣树坪的地形，认为攻打枣树坪是冒险行动。强世清不听劝谏，命令红一支队在拂晓前即向枣树坪发起进攻。

战斗开始后，虽突破枣树坪守军的外围阵地，但守军凭借着村内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红一支队因没有重武器，又没有内应，在几次强攻中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战斗。

在枣树坪的攻坚战中，惠泽仁牺牲，强世清负了重伤。李胜堂的嘴被子弹打穿，牙齿全部被打掉，但还坚持把强世清背下战场。强世清负伤后，转移到王家庄群众家养伤，并由其弟强世光前往护理。

枣树坪战斗失利后，红一支队在转移中行至温家坡，与折可达的民团相遇，遭到民团的突袭，战斗再次失利。在这次战斗中，政委魏武和数名战士牺牲。

红一支队在枣树坪、温家坡的两次战斗相继失利，队长强世清负伤，政委魏武牺牲，副支队长马佩勋在刚到安定县时即被派往吴堡县开展武装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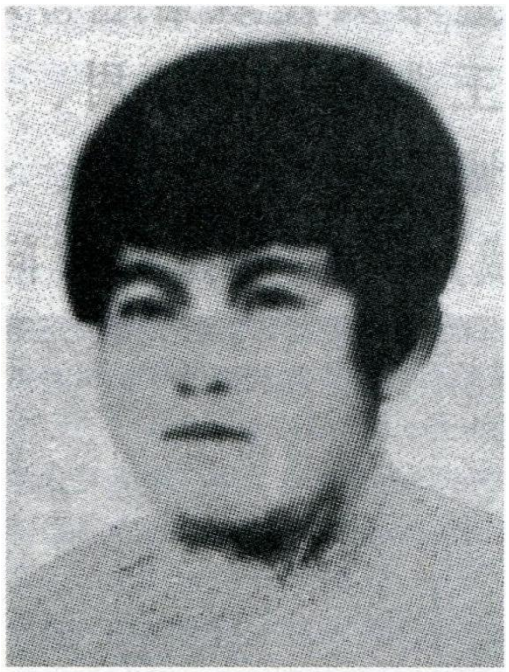
游击队在失去主要领导的情况下，转移到安定县西区，与留在安定县的白德胜、贾仰青带领的红一支队分队会合。会合后的红一支队，由白德胜代理支队长，马乘启任政委。

马乘启，原名马光裕，陕西绥德县人，生于 1906 年。1923 年考入绥德

四师。1925 年加入共产党。1926 年，由徐梦周带着与白雪山、崔仲英等考入冯玉祥部在兰州的政治训练班，后在吉鸿昌军队开展兵运活动。1927 年，随军参加北伐，曾任连长。1931 年从河南返绥德，以吉镇高小校长为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这时，因红一支队伤亡重大，为保存实力，便于游击活动，减小行动目标，分散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白德胜决定把部队分成两个分队，由王孝增、贾仰青、刘明山带领一个分队，到横山、绥德、吴堡县一带活动；由白德胜、马乘启、张承忠带领一个分队，在安定、延川、清涧县一带活动。

王孝增、贾仰青、刘明山带领的游击分队到吴堡、绥德县一带后，在吴堡县晓寺则村杀掉国民党两个收税爪牙，又转到周家嫣去打劣绅霍含章。霍含章闻讯出逃，游击分队放火焚烧了他家的放债账簿，砸毁屋下挂的牌匾，没收粮食、财产分给群众。



任志贞

游击分队从周家堰转移到绥德县刘家川，闻得刘家川有个大地主叫刘俊德，是国民党义合镇区长，绰号霸王，血债累累。他的大儿子刘汉光参加中共工作，刘俊德发觉后，竟与其三儿子刘汉杰残忍地将刘汉光杀害。游击分队了解到这些情况，于凌晨冲入刘家大院，刘俊德惊恐万分，赤着身子钻进厕所，从后墙水道脱逃。刘汉杰被游击分队从被窝里揪出，当即枪决。

游击分队离开刘家川转移到土地岔村时，与一股国民党军队遭遇。因敌我悬殊，游击队战斗失利，在吴堡、绥德县一带难以立足，即返回到安定县任家砭。

白德胜、马乘启、张承忠带领的游击分队到延川县关庄后，遭到姜梅生团 100 余人的包围。在突围激战中，由于敌众我寡，死伤惨重。白德胜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马乘启中弹牺牲，只有张承忠带着少数战士奋勇冲杀

突出重围，艰难辗转回到安定县。

红一支队的两个分队在安定县会合到一处时，仅剩 60 余人。当时，由于红一支队与中共陕北特委和安定党组织失掉联系，加上国民党军队到处围追堵截，游击队被迫整天躲在大山深沟，白昼夜晚不敢进村，战士没饭吃，也没棉衣穿，队伍情绪十分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当部队转移到安定县北区苏家堰村时，在党组织负责人魏怀礼、张宗孝和红一支队临时负责人栾新春、李光胜的主张下，决定埋枪、暂时分散活动，待形势好转后伺机再起。贾仰青、张承忠、王孝增、刘明山等表示坚决反对。

当李光胜宣布“这是组织决定，谁都要服从，等形势好转再集中”的命令后，贾仰青气得带着七个战士，离开安定县寻找中共陕北特委去了。张承忠也坚不从命，硬拉出五名战士和六条枪离开安定县，转到清涧县一带打游击去了。

红一支队解散后，被疏散回家的栾新春、贺吉祥、任益亭、任玉林和白德胜之妻任志贞等先后被国民党搜捕。后经党组织负责人魏怀礼、魏国亮的批准，栾新春、贺吉祥、任益亭、任玉林打入地方民团当了团丁，在民团中秘密进行策反活动。

任志贞，原名海棠，陕西安定(今子长县)人，生于 1914 年。七八岁时在父亲任广盛的教育下读书识字。1928 年加入青年团。1930 年秋，其父任广盛因带头抗粮抗税，被县衙差人迫害致死，她即召集乡邻扣押了两个县衙差役，并受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指示带数百名群众，押着两个差役到县衙门示威，要求县长给父亲开追悼会，里纪念碑，还要严惩凶手，免去全县当年追加的税款。县长迫于众怒难犯，只得答应全部条件。1930 年冬转入共产党，不久，奉命到杨苏家沟创办冬学，后到县立第三高小、瓦窑堡女子高小以当教师的公开身份，任党的地下交通员。1931 年秋，晋西游击队转战到安定后，瓦窑堡国民党驻军要派兵去“追剿”，由于她及时给游击队传送情报，使游击队做好了伏击准备，将国民党骑兵 30 多人全部歼灭。1933 年 6 月，参加红一支队任指导员，在战斗中与白德胜建立感情结婚。在延川县关庄突围战斗中，带领分队部分战士突出重围，丈夫白德胜

身负重伤被俘。红一支队解散后，调往绥德县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被捕。

在狱中，国民党以委官加重金招降，任志贞斥之为“蠢人多美梦”。国民党继以酷刑，她坚定地说：“打、杀，都由你们，这说与不说就由我啦。要从我嘴里掏出你们需要的半个字，比要我的命还难!”国民党把她妹妹焕焕押进牢房，用骨肉情义逼降。任志贞向妹妹讲解革命斗争形势，安顿了家事，然后装出气愤的样子，冲着妹妹大骂：“我还以为你来看我，没想到你替敌人当说客，还不快滚!”把妹妹推出牢房。国民党又带来叛徒戴宗智劝降，任志贞上前就是一个耳光。国民党把任志贞带到关押白德胜的牢房，任志贞对丈夫平静地说：“他们安排咱们一起就义，也不枉夫妻一场。”

红一支队解散没几天，由于叛徒吴化周和柳主元出卖，正在养伤的强世清和其弟强世光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强世清、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被国民党杀害于瓦窑堡。任志贞是陕北红军中的第一个女战士，年仅 19 岁。她同丈夫白德胜一起走上刑场，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贾仰青就义

贾仰青

1933 年 12 月间，贾仰青离开安定县，带着七个战士来到绥德县辛店，决定先与县城内党组织接上头，然后去找中共陕北特委汇报红一支队的情况。当他身藏手枪、穿上长袍、化装成商人只身进入绥德县城时，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贾仰青被捕后，吴堡县的劣绅和绥德县刘家川的大地主刘俊德等闻讯，纷纷跑到绥德县城告状，控诉贾仰青是共产党。国民党绥德驻军团长姜梅生视其为要案，企图从贾仰青的嘴里获得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活动的重要情况，便亲自出马审讯。审讯一开始，贾仰青没等姜梅生开腔，就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贾仰青，是红军、共产党员!”

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弄得姜梅生不知所措。接着，贾仰青又喝道：“有啥事快说!”

姜梅生在惊恐中嚷道：“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枪藏在哪里!”

贾仰青冷笑一声，说：“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秘密，不能让你这号人知道!”

“上刑!”姜梅生气得浑身发抖，直着嗓子高叫。于是，刽子手用压杠在贾仰青的腿上压，烧红铁锨在背上烫，把竹签插进十指里，但贾仰青在酷刑面前视死如归。

深夜，贾仰青忍着剧痛和寒冷，在石板地上挪动，铁镣声打破了牢房里的寂静。这时，有一位看守低声问贾仰青：“听说你家是财主，有吃有穿，你为甚当红军受这大罪?”

贾仰青笑着说：“老兄，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是为天下穷苦人得解放，不是为自己享清福，为革命杀头也心甘情愿。你更要起来闹革命，不要再给反动派卖命了。”

看守唉声叹气地说：“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在这里受气了，只要弄得一两百块银洋，把我的家安顿住，咱俩一块找红军闹革命去。”

一天，贾仰青提出要笔和纸。姜梅生以为他要写自首书，连忙将笔和纸送来。贾仰青先写了两封短信，一封是给家里人的，一封是给中共陕北特委的。然后，他写了一封长长的告姜梅生书，指出国民党日暮途穷，痛骂姜梅生一伙末日来临。两封短信由探狱亲属贾明林和贾仰青的舅父带回吴堡。一封转交给中共陕北特委，特委立即派人与绥德县城里的党组织联系，积极组织营救工作；一封交给贾仰青的父亲贾世雄，贾世雄看见信中要家里送去 200 块银洋(贾仰青准备策反看守投红军用)，竞视之为“忤逆之子”，痛骂而拒绝。

姜梅生见用硬的一套不行，便改变手段用软的一套。姜梅生命令看守卸了贾仰青的“双镣”，从牢房押到词部，摆下酒席，并以给“团长”职务为诱饵，引诱贾仰青投降。贾仰青早已识破姜梅生的诡计，一进门二话没说，飞起一脚，将满桌子摆好的酒菜踢翻在地，大声喝道：“别耍这一套鬼花招!”

姜梅生自讨没趣，气急败坏地命令刽子手押着遍体鳞伤的贾仰青走上刑场，路上仍不死心地对贾仰青道：“贾仰青，老话重说，你还很年轻，好好想想，现在回头还不迟。只要你当众宣布脱离共产党，能供出游击队的秘密，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如还不悔，剜眼杀头!”

贾仰青昂首挺胸，怒斥道：“你别做梦，要杀就杀，共产党和天下的穷百姓是杀不完的!”

姜梅生气得高吼：“给老子跪下!”

贾仰青轻蔑地冷笑说：“老爷爷是共产党员，岂能向杀人魔鬼下跪!”

姜梅生狂叫：“把他剁成肉馅!”

一个刽子手拿鬼头刀残忍地向贾仰青的后腿乱砍。顿时，贾仰青皮开肉绽、鲜血飞溅，但他毫无惧色，仍挺胸高呼道：

“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刽子手急忙用刺刀扎进贾仰青的喉咙，另外两个刽子手用刺刀在贾仰青的腿部乱捅。贾仰青满口喷血，两眉直竖，目光似剑，毫无惧色。姜梅生从一个不知所措的刽子手的手里夺过屠刀，向贾仰青的头部砍去。贾仰青英勇就义后，姜梅生残忍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悬挂在绥德县城南门示众。

第六十章

红二、三、四支队成立

黑窑沟取枪

1933 年 8 月，崔田夫、崔田民和高朗亭三人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前往绥德、清涧县一带组建红军游击队。三人经绥德县南区铁茄坪，赶到清涧县东区王家山村，与共产党员王聚德取得联系。

清涧县一带的革命斗争发展较早，特别是东区的群众基础好，党、团组织健全，革命力量雄厚。当地在唐洪澄、白如冰、黄石山等的领导下，先后发动过几次大规模的农民抗粮、抗捐、围城冲击县衙门的群众运动。此时，中共陕北特委把绥德、清涧两县委合并为中共绥清中心县委，崔文运为书记，白如冰为秘书长，张家修为组织部部长，王士英为宣传部部长。

崔田夫、崔田民、高朗亭来清涧县之前，清涧县东区由白锡龄、黄石山组建的黄河游击队已东渡黄河编人山西晋西游击队，并转陕甘边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合编为陕甘游击队，且已扩编为红二十六军。这时，由王聚德、崔正冉组建起一个游击武装小组，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王聚德，陕西清涧县人，生于 1909 年。毕业于绥德四师，曾在山西冯玉祥部做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返回清涧县和中共东区组织接上关系，与崔正冉一起打入山西境内一支土匪队伍中开展兵运活动。这支土匪队伍里有一个山东籍的士兵叫罗永宽，还有一个士兵叫王根兴，均曾在冯玉祥手下当兵，后因部队哗变，一起落入这支土匪队伍。王聚德、崔正冉联络

罗永宽、王根兴密议，四人夺得土匪队伍的三支驳壳枪(王根兴被土匪头子贾武逵打死)，返回清涧县东区。

王聚德

8 月 5 日，以王聚德、崔正冉、罗永宽组建的游击武装小组为基础，由崔田夫主持，在王家山村正式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简称红二支队)，任命罗永宽为队长，高朗亭为政委，王聚德为经济员。当时，红二支队只有崔正冉、白玉光、李宝才、贺胜等六七人。

8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的白雪山因部队南下渭华地区失败回到清涧县。高朗亭、王聚德与白雪山在东区袁家沟相遇。白雪山向红二支队领导人介绍了红二十六军的武装斗争经验，并向中共东区负责人表示愿意留在红二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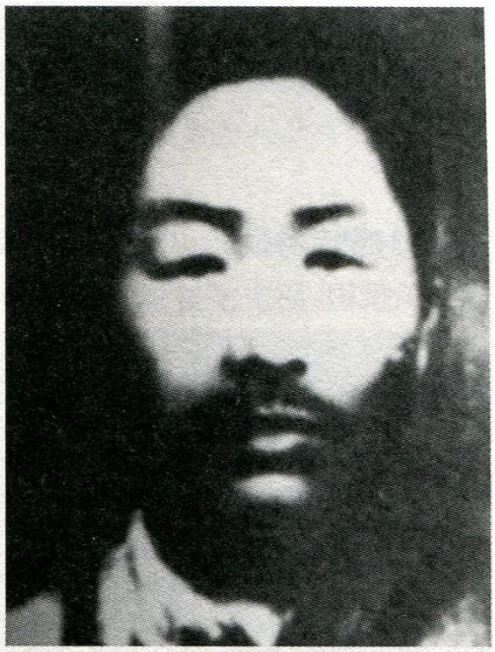
白雪山，陕西清涧县人，生于 1905 年。1924 年考入绥德四师。1926 年人西安军事学校，后又到兰州政治训练班学习，随冯玉祥部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因部队“清党”潜回陕北，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 年，打入师储杰的土客队伍，成功地策动以师储杰为首的几支土客队伍归编晋西游击队，开赴甘肃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曾任陕甘游击队经济员。

罗永宽

不久，红二支队转移到绥德县南区，在薛家峁杀了国民党区长薛运统，为游击队筹集到一批经费，后又转移到安定县永坪镇一带活动。

9 月下旬，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神府一带将原有的临时特务队正式改编为特务队，调高朗亭前往神木县。同时，特委决定将清涧县红二支队仅有的三支

驳壳枪调出，交给正式改建后的神府特务队。当时，红二支队许多人想不通，但最后还是服从了特委的决定，由高朗亭带着三支短枪，在罗永宽的护送下，离开清涧县交到特委。


白雪山

红二支队的三支短枪被特委调走后，清涧县党组织为了稳定战士的情绪，使刚成立的游击队不致赤手空拳散了伙，决定筹集钱款到外地购买武器。钱款一筹好，派出王聚德、崔正冉到山西通过一些社会关系从民团购回长枪一支、短枪一支。不久，又从地方土匪陈海娃手里缴到一支短枪。第八部1陕北红军及第一、二次反“围剿”白雪山

12月间，张承忠带着红一支队散伙后的五名战士和六支枪，辗转到清涧县小岔则村与白如冰、白雪山相遇，被编入红二支队。同时，为了迅速壮大红二支队的武装力量，清涧东区党组织又相继选送曹三、张汉周、白成武、李富、王德银、申培等一批青年农民到游击队里。

在红二支队战士不断扩充之下，枪支匮乏成了一个大问题。为解决游击队的枪支装备，根据张承忠提供的红一支队埋枪的情况，白如冰、白雪山决定派人到安定县，将红一支队埋藏的枪支取回，武装红二支队。为了准确找到埋枪的位置，又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清涧东区党组织派出张家修、苏利厚、李向海三名共产党员(一说四人，还有崔正冉)，化装成卖唱艺人，由张家修拉四胡，苏利厚弹三弦，李向海唱道情，前往安定县寻找红一支队埋枪的地方。

张家修、苏利厚、李向海三人从清涧县出发，到达安定县后意外地碰到已打入地方民团的原红一支队临时负责人栾新春和战士任玉林(一说与黄家湾的黄秀英接上关系)。任玉林为三人带路到黑窑沟，在埋枪的地方顺利取得长枪12支、子弹百余发。

张家修等三人取得枪支后，因怕暴露目标，日宿于无人的山林深沟，

夜行于兽禽出没的崎岖小路，迅速赶回清涧县。在清涧县东区呼家洼村，红二支队进行了整编，中共陕北特委任命白雪山为队长，王聚德为副队长，王怀德为政委，马义为经济员。至此，这支红军游击队活动在绥德、清涧、延川、安定等县一带。

神府特务队

张达志

原在神府南区建立的临时特务队，队长是王宝珊(后为王宗光)，有长枪四支，队员六七人。在中共南乡区委的领导下，神府南区是革命形势发展最快、革命热情也最高涨的地方。以贾家沟村为中心，南至西豆峪，北至沙峁镇、石角塔，东到采林、刘家湾，西到贾家阳崖、张家沟，建立农村党支部 19 个，发展共产党员、团员已达 400 多人，为在这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北部苏区打下了组织基础。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及马明方在 1932 年先后到这里视察工作。神府中共南乡区委负责人贾怀智、贾怀光、乔钟灵等根据马明方的指示，派出王兆相、温治景、王金泉、王兆贤、王进修(又名温治恭)、杨文谟等共产党员到陕甘边参加了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扩编为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后，这些共产党员从终南山脱险，相继返回神府，为这一地区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条件。

1933 年初，中共陕北特委派张达志以特派员身份来到神府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南区，整顿党组织和建立红军游击武装。中共南乡区委派杨恩本先到葭县，作为张达志北上神府地区的交通员，从葭县出发，徒步两天到达神木县柳林滩的乔钟灵家。张达志在柳林滩听了乔钟灵对神府党、团组织活动情况的介绍，相互交换意见后，第二天赶到贾家沟的贾怀忠家。

当时，特委向神府南区派来不少人，有张毅忱、韩生杰、樊锦堂、雷

合、高家德等。为了隐蔽身份便于活动，张达志与杨恩本、李登万等人在沙峁头通往神木县城大道的自家川开了个小饭铺，张达志以饭铺掌柜为公开身份，其他同志以当雇工作掩护，建立了秘密联络站。

张达志一到神府南区，就在贾家沟、贺家川、温家川、白家川、采林、刘家湾、呼家庄、杨家沟、王家洼、柳林滩等十几个村庄对农村党支部、团组织进行调查和整顿，分别召开党、团会议，健全党、团组织的学习和生活制度，吸收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建立贫农会、儿童团、互济会，强调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广泛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提高农村共产党员的思想觉悟。

3 月初，张达志从神府南区转到高家堡镇。高家堡镇是陕北四大名堡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贩很多，是蒙、汉民族商业交易的大集市，镇子里住有不少商贾富户，并驻有国民党的一个骑兵排和一个民团。张达志在党员康明礼家住下。当晚，召集高家堡镇党支部负责人史仙洲、刘长杰、康明礼等开会，讨论了康恭庵、史仙洲(后被国民党杀害)的民团如何掩护党的工作人员问题，并提出应在适当时机把民团拉出改编为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次日，张达志离开高家堡镇，向神木县城出发。行至半路，昕沿途群众说县城外有杨侯小部的土匪经常出没，城门口的士兵对进城人员搜查甚严。张达志携带着不少文件和宣传品，要交给县城党组织，便化装成卖羊小贩，但一说话是满口葭县腔，一听就不是本地人。快到县城时，路遇一个收款的衙役也要进城，张达志有意向这个衙役献殷勤，唠家常，两人很快熟悉起来。有了这个衙役作掩护，张达志走到城门口未经搜查就顺利地进了城。

在城内，张达志找到县城党组织负责人李文芳，把特委的文件和宣传品交给他，并传达了特委的口头指示。

张达志从神木县城返到神府南区自家川时，张毅忱、马万里在高家堡镇的史仙洲家已搞到了一支驳壳枪和 50 发子弹，还搞到一支折腰子小枪(打不响)。为了扩充临时特务队的武器，张达志决定夺取国民党沙峁区助理员王雨亭家的两支长枪。

张达志先派出一个叫侯赖的队员去侦探王雨亭藏枪的地方，谁知侯赖竟给王雨亭泄露了消息，王雨亭提前将枪支转移出去。当张达志带着临时特务队队员化装成收款人员进入王桑塌王雨亭家中，他正和老婆躺在炕上抽大烟。

临时特务队把王雨亭吊起来，拷问藏枪支的地方，王雨亭死不承认家里放有枪支。

正在这时，村里有一个反动分子纠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趁着天黑围在院墙外，向院里乱扔石头、砖块，并喊：“快打土匪!”临时特务队匆忙撤离。

不几天，接到高家堡镇党支部的来信，信中说史仙洲在民团里可搞到两支长枪借给临时特务队。当张达志赶到高家堡镇，因有变故，民团的枪支查得很严，枪无法借出。张达志想到了高家堡镇不能空手回去，决定带着临时特务队到龙尾峁去打土豪。

傍晚，临时特务队赶到龙尾峁，准备斗争大地主李能成，刚进村，全村人都跑光了。当时，因这一带常有土匪骚扰，老财们时有准备，把值钱的东西早已全部藏了起来。临时特务队闯入李能成的住宅，家内空无一人，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

不久，张达志调回特委。行前，决定张毅忱、马万里、雷合、韩生杰等继续留在神府地区。在此期间，特委曾派出崔田民(一说崔田夫)来神府视察工作，刚进神木县南区万镇时，就被镇上的民团扣押。万镇西豆峪共产党员李含惠得知此情后，为营救特委派来的同志，通过关系说情，佯称崔田民是自己的同学，民团信以为真，才将崔田民释放(其实李含惠并不认识崔田民)。

6 月的一天，高家堡镇党组织报告，区公所劣绅郝逸卿准备派人给国民党神木县政府送交一批大烟土税款。中共南乡区委决定派韩生杰、雷合、高家德三人携带史仙洲给的那两支驳壳枪夺取这笔税款。高家德先到高家堡镇与镇党支部取得联系，商定在柏林堡行动。但韩生杰、雷合二人没等到高家德返回，未在预定的地方行动，而提前在距高家堡镇仅 15 里的李家洞动手。

韩生杰一枪打伤送款人，缴获 700 多块银洋，很快撤离现场，但因受伤的送款人跑回高家堡镇报告，遂被驻军一个骑兵排追击。韩生杰、雷合为摆脱骑兵排，边跑边丢撒银洋，可一路上银洋全部丢光，骑兵排仍拼命地追赶。他俩一直跑到新寨子高望升(共产党员，后叛变)家里，隐藏在洋芋窖中。骑兵排随后追来，围住洋芋窖口烟熏火烧，最后将韩生杰、雷合二人逮捕，并拴在马尾巴上拉走，当天黄昏在高家堡镇东门外杀害。

7 月间，杨恩本、李登万在白家川开办的小饭铺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他们先把店里杨恩本的三弟抓起来，其三弟经不住拷打审讯，就供出小饭铺是共产党秘密联络站。

杨恩本、李登万被捕，受尽各种酷刑，军特残忍地用烧红的铁锹放在杨恩本的肚皮上，直到烧破肚皮露出肠子，把浇上油的裤子围到李登万的脖项处，点燃后直烧得脸部和前胸粘连在一起，但杨恩本、李登万二人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后李登万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获释，杨恩本被杀害。这次白家川小饭铺事件，使中共南乡区委再次遭到破坏，临时特务队停止了活动。

王兆相

为了尽快恢复神府南区中共南乡区委的正常工作，在杨恩本、李登万被捕后，对南乡区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和补充，由贾怀光任书记，王善继任组织委员，贾令德任宣传委员，贾怀忠任军事委员，冯道任团委书记。

这时，王进修从红二十六军返回神木县。在神府南区以王进修、马万里为首，再次组建、恢复了临时特务队。王进修、马万里为筹集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在杨家沟斗争了杨继杰，收缴大烟土百两、元宝 10 个。王进修、马万里将 10 个元宝转送特委以资活动经费，带上所剩大烟土，和贾怀礼、王维章、温三小到太原购买枪支武器。五人到太原后，卖掉了大烟土，但钱到手却一时买不到

枪支弹药。于是，马万里、王进修先返陕北，留贾怀礼、王维章、温三小三人在太原继续联系购买枪支弹药。

经一番联系，贾怀礼、王维章、温三小只买到一支手枪。他们想利用随身所带的钱贩卖衣服再赚些钱，多买些枪支，就买了些衣服到大街上卖。国民党发现王维章、温三小后将他们抓住，杀害于太原。贾怀礼脱身回到神木县。

8 月间，已在红二十六军任警卫队长的王兆相，经习仲勋、张秀山的批准，与高照、牛岗带着介绍信回到陕北。三人经甘肃庆阳地区进入三边，王兆相回到神府南区。

9 月，中共陕北特委派马文瑞到神府地区，传达高起家洼扩大会议精神，组建游击武装。

10 月 18 日，神木县温家川西山一个小山坳的刘景新家里，由中共南乡区委书记贾怀光主持，将临时特务队改编为神府特务队，由李成兰任队长，王兆相任政委。当时，战士只有贾兰枝、李成荣、高家德、乔六十、刘增杰等七人，枪四支。贾怀光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说：特务队是一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斗地主、拉豪绅、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红军队伍，还要准备与国民党白军打仗。为了祝贺特务队的成立，刘景新专门宰杀了家里的一只羊，盛情款待。

特务队成立的当天晚上，准备在温家川抓土豪温士尚，结果没抓到，战士刘增杰的枪走火，不料打死温士尚的女儿。阎家堡有个劣绅叫阎守仁，得知特务队在温家川活动，偷偷跑到盘塘镇向国民党军队告密。

盘塘镇驻有刘润民部的一个连，连长鲁仰尼派出两个排前来抓捕王兆相。

没有抓到王兆相，就将王兆相的父亲和党员刘文祥的伯父抓走，并放火烧了两家的窑洞和财产，诬蔑特务队是“土匪”，扬言要斩草除根。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表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革命宗旨，特务队决定到贾家沟镇压多次向国民党告密并带着国民党军队搜捕共产党员的贾凤隆、贾正官。

那天，贾凤隆家张灯结彩，他妹子出嫁，家里宾客满堂，人来人往，

热闹非常。游击队派人到贾凤隆家，佯称发现了共产党，要贾凤隆带路去抓。

贾风隆一听说抓共产党，高兴得把妹子的婚嫁撂在了一边，跟着就走。贾凤隆刚到贾正官家，游击队就将二人捆绑起来，历数其罪行后，就地处决。游击队为了扩大影响，还张贴了红军游击队的第一张布告。

镇压二贾之后，特务队化装成国民党队伍，直插窟野河东的阴寨子村，决定斗争大地主乔世元。不料乔世元不在家，只抓到他的弟弟乔世清。经向村内群众了解，得知乔世清为人开明，并无劣迹，即对乔世清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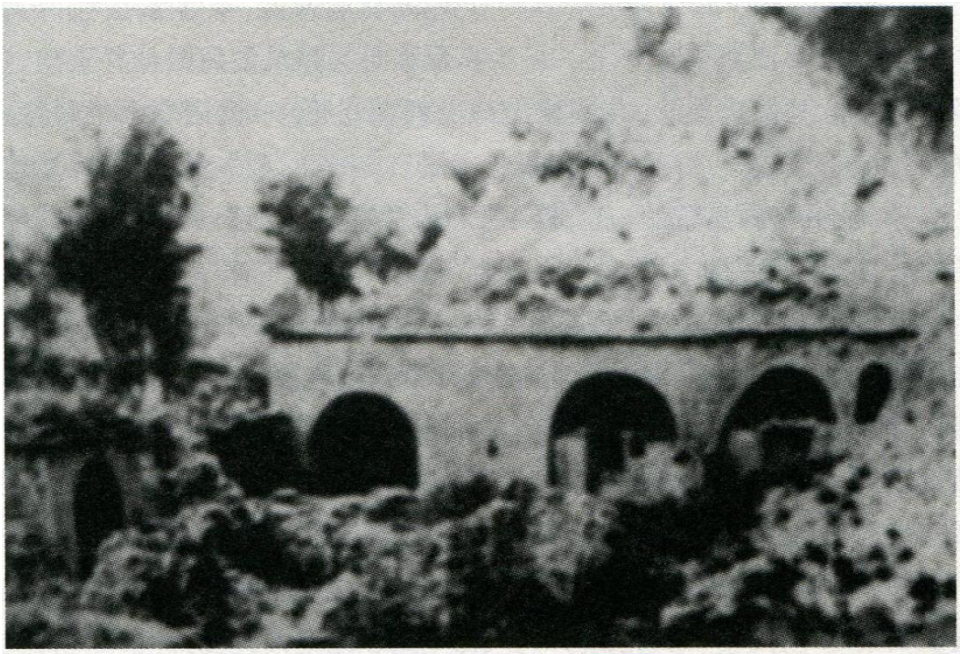
两天后其家人送来赎金，特务队就把乔世清放了回去。乔世清回到家后，逢人就讲：“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好，讲道理，有本事。”

神府特务队成立不久，一次，中共南乡区委派贾兰枝出外送信，不慎将信件丢失，落到国民党的手中。信件里有南乡区委领导成员的名字，国民党派出盘塘镇驻军来贾家沟抓人。结果贾怀光脱身，贾怀忠、贾令德被抓走。贾怀忠、贾令德都是学生出身，很会讲道理，被带到盘塘镇后，拒不承认党员身份，据理力争，加之群众从旁评理支持，二人被放回。

不几天，盘塘镇驻军又来贾家沟把贾怀忠、贾令德抓走。两家花了不少钱，贾怀忠、贾令德始获保释，但贾怀忠的一只耳朵却被国民党军特残忍地割掉了。

中共神木县委成立

中共陕北特委十分重视神府红军游击武装力量的发展。特务队成立不久，先派高朗亭、罗永宽到神木县，传达特委决定将神府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指示，要求神府南乡区委做好改编前的准备工作。



1933 年 11 月 7 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松树峰村成立

1933 年 11 月间，中共陕北特委马明方相继派出马佩勋、马万里、张衡前往神木县。他们三人不仅是组建游击队的骨干成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把清涧县红二支队调到特委的三支驳壳枪安全交到神木县特务队的手里。

马佩勋、马万里、张衡接受任务后，从吴堡县出发，化装成买大烟土的商贩，途经万镇，穿过国民党的封锁据点，走到神木县南区的张家沟。

李成荣

张家沟驻有刘润民部的一个骑兵班，当马佩勋、马万里、张衡进村走入一个老乡家里喝水时，有一个士兵歪戴着帽子闯进门来。那个士兵一边盘查问话，一边动手抢夺张衡肩上背的顺顺(陕北人行路装东西的口袋)要搜查，欲从这几个声称是大烟土商贩的人身上打劫些大烟土和银洋私落腰包。张衡的顺顺里装有两支驳壳枪，另一支驳壳枪带在马佩勋的身上。张衡越是百般躲避，双手紧按住两支枪，那个士兵越是发疯般地扑上前，定要查看个究竟。马佩勋见状，立即拔出身上的那支枪，一枪把那个士兵打死在地。

一声枪响，把村里驻的一个骑兵班和农民都惊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是土匪，立即手持木棍、铁锹及农器等围来，大喊：“来了土匪!”

骑兵班闻讯，一边赶来，一边胡乱鸣枪。马佩勋、马万里、张衡匆忙离开张家沟，在附近山上藏身几天后，终于在五九会找到神府特务队。

11 月 7 日，在神府南区松树峰村，由中共南乡区委领导人正式宣布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红三支队)，由王兆相任支队长，高朗亭任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时有队员 20 多人，七八支枪。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龙尾峁斗争了大地主李能成，没收一些银洋、大烟土。游击队离开龙尾峁、转移到虎头峁时，马佩勋的手枪走火，误伤了李成兰的腿部。

李成兰因之不能行走，留在虎头峁村养伤，游击队指定由李成荣负责护理。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李成兰、李成荣兄弟被国民党杀害。红三支队成立后不长时间，罗永宽提出要返归山东老家。红三支队尊重罗永宽的请求，赠给他一匹马和路费，让他离开游击队。

此间，为解决红三支队枪支匮乏的问题，中共南乡区委派出贾怀智到山西购买枪支。贾怀智在山西临县经过短时间的活动，与白文镇盐务局秘密洽谈好购买九支冲锋枪，并验看了枪支。但由于贾怀智的身份暴露，在他与送款的王德润、王全喜、冯振刚三人到约定的一个旅馆里付款取枪时，盐务局串通国民党临县驻军突然把旅馆包围，将贾怀智等四人逮捕。后押到临县县城，贾怀智、王全喜、冯振刚三人受尽酷刑，英勇就义。

12 月底，红三支队在神木、葭县两县交界的沙坡、西沟、尚家峁、红教寺、呼家庄等地先后杀了六个群众最为痛恨的税收衙役，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称赞红三支队是“穷人的队伍”，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三支队，群众主动为红三支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红三支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恐慌，许多地方的豪绅纷纷逃往神木、府谷两县县城，衙役们不敢到神府南区下乡催租收税。

国民党神木县长李少儒和第八十六师刘润民旅五一四团团长罗德新很快派兵进驻贾家阳崖村，并联合府谷、葭县两县国民党军队以及民团对红

三支队进行“清剿”，企图将这支新生的红军游击队一举歼灭。但由于红三支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处都有群众掩护，群众一见红三支队进村，怕狗叫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家家户户把狗的嘴用绳子捆住，用扫帚和树枝把游击队走进村里的脚印扫掉，国民党军队搜寻不到红三支队的踪影，只能疲于奔命。

红军游击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队伍，群众有个认识的过程。一开始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下，群众把红三支队视为与土匪同类，不敢拿分得的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和财产，更不敢让游击队员吃住在自己的家里。红三支队每到一个村庄，只能在共产党员家里食宿，很容易暴露党员的秘密身份。后来王兆相想出个好办法，每到一个村庄，红三支队就干脆吃住在地主豪绅的家里。这个办法还真有效果，地主豪绅再不敢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告红军的行迹了。

有一次，红三支队到高家塌村一个独户人家时，罗德新的队伍突然开来了。这家主人不慌不忙地把罗德新的队伍领进另一孔窑洞里，殷勤地递烟倒水。罗德新的队伍转了一圈就走了，他们哪知红军游击队就藏匿在隔壁的窑洞里!

红三支队成立后，围绕活动方式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游击队力量弱小，缺乏经验，不能跟国民党军队硬拼，不能让党组织和群众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和损失；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干共产党、闹红军，就不能怕这怕那，应该和国民党军队公开大干，不要怕群众受损失，群众受到了损失会被逼得起来造反。据王兆相回忆，由于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当时确实“影响到本地和外来干部以及支队领导之间的团结”。

1934 年春，中共陕北特委派出高长久到神府地区。在高长久的主持下，中共神木县委成立，由贾怀光任书记，贾令德任组织委员，乔钟灵任宣传委员，

王善继任军事委员，冯道任团委书记。神木县委成立后，神府南区以窟野河为界，分设东西两个区委，后划为四个区委。一区沙峁一带，书记王善继；二区马镇以东，书记王全旺；三区贺家川一带，书记崔明岭；四区太和寨一带，书记张智慧。

张承忠

在此期间，陕北特委为解决红三支队中两种意见之争，采取了组织调整措施，决定由高朗亭任支队长，张毅忱任政委，调马万里、王兆相回特委工作(后王兆相未去)。不久，王兆相复任支队长，贾怀光任政委。同时，中共陕北特委派来张承忠，以特派员身份接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贾怀光的职务，高朗亭、张毅忱调回特委。

据有关资料证实，在这期间，神府地区由于红三支队扩大活动的影响，各地穷苦农民效仿红军，发生了许多自发组织起来打土豪的行动。如农民十几个人自发组织的“棒榔队”，借红军之名，以“打富济贫”的口号，在马镇杀了国民党收款员牛司务长，在仓上村抢了富户乔振东，在马镇、漫塌、陈家堋等村杀了六七人。

当时只要正确组织和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本来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潜在力量，但神府党组织未能正确看到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国民党把这些农民视为“土匪”，加以残酷镇压；共产党为了证明自己与这些农民有着本质区别，也把他们当做真“土匪”错杀。

时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的贾怀光回忆说：“特别是 1934 年党提出一项笼统的规定，即自由行动者处死。结果一些失去土地迫于生计起而斗争的穷人被我们处决了，其中有的还是党员，如李登万、白浩义、温红则、呼之生等都是不应该杀而被杀的。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张承忠到神府南区后，在整顿神府党的组织时，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同样错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当时甚至把新设一区的区委书记王善继也冤杀(1952 年平反)。

4 月 15 日，沙峁镇来了一队县警带着几支枪。红三支队得到消息后，决定去夺取他们的枪支。是日晚，先派出刘德带着几个队员，约定好除掉哨兵后，朝天放枪一声为号，埋伏在镇子外的红三队即发起进攻，冲入县

警住的院子。当刘德和几个队员快接近哨兵时，被哨兵发现，哨兵拔腿向院里跑去。刘德慌忙中朝哨兵开了一枪。埋伏在镇子外的红三支队听到一声枪响，以为是行动信号，一拥冲入镇子，将县警住的院子包围起来。当时的红军武器不好、子弹少，只是向院里的县警喊话，令他们赶快缴枪。

一开始，县警们不摸外边底细，龟缩在院子里不敢往外冲。队员白明千刚爬上窑顶，向院里喊“缴枪不杀”，即被县警开枪打死。双方隔着院墙一直对峙到天亮，红三支队撤出沙峁镇。

撤出后，红三支队总结了这次未能取胜还伤亡一个队员的教训：一是没有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动员赤卫队参战；二是当时的游击队拿着几颗手榴弹，只要往院子里扔出一颗，就可迫使县警投降，可惜队员们竟连手榴弹如何使用都不懂得。

6 月，王达成经王文亮的介绍，通过王聚德的关系，由山西辗转到陕北。王达成，化名张润明，山西柳林县人，1926 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山西转入地下活动。王达成到陕北后，由中共陕北特委委以特派员派到神木县，领导中共神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夜袭木头峪

陕北的红二、三支队相继成立后，中共陕北特委为了向上级党组织汇报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派出常学恭、崔逢运、鲁贲到中共北方局接受新的指示。常学恭、崔逢运、鲁贲三人从陕北出发，东渡黄河，取道山西，于 1933 年 12 月 11 日到达北平。

他们到北平后，住在西城平安公寓，随即与中共北方局取得联系。中共北方局看了中共陕北特委的报告，认为中共陕北特委犯有“富农路线”的错误，始派李华生、郭洪涛、李铁轮接见常学恭、崔逢运、鲁贲三人。

中共北方局代表李华生和时在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郭洪涛、李铁轮首先听取了常学恭、崔逢运、鲁贲的口头汇报，然后传达中共北方局的指示。李华生除纵谈国际国内形势外，对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充分估计，要求陕北党、团特委抓住有利形势，普遍发动群众开展抗捐税、分粮、吃大

郭洪涛

户的斗争，并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根据地。对中共陕北特委的工作，除指出成绩外，还错误地批评了红一支队埋枪、红二支队调给红三支队枪支等是“代表了富农路线”“领导游击战争消极怠工”“忽视了城市工人运动与抗日斗争”等。同时，决定将常学恭、崔逢运、鲁贲三人留下，由中共北方局另行分配工作；派郭洪涛、李铁轮去陕北工作。

12 月底，中共北方局派郭洪涛、李铁轮从北平出发到达陕北的葭县。通过张达志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在葭县南坻村召开了中共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明方、崔田夫、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李铁轮、郭洪涛等。会上，由郭洪涛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听取了与会同志的汇报，研究了进一步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等问题。

在会上，郭洪涛在传达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批评中共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对开展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马明方、马文瑞和与会同志进行了抵制。

这次会议肯定了陕北红一、二、三支队的经验，决定在扩大和发展三支游击队的基础上，米脂、绥德、葭县、吴堡各县分别建立健全中共地方党、团组织，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少先队、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声势。

在这次会议上，按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精神，郭洪涛被任命为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李铁轮为共青团陕北特委宣传部部长。会后，中共陕北特委派马明方到米脂县组建中共米东县委；派马文瑞去三边做兵运工作；李铁轮、高长久、郭洪涛到绥德、米脂、葭县、吴堡等县筹建游击武装。

李铁轮、高长久、郭洪涛从葭县出发，行至吴堡县的樊家圪垛村，派人找到交通员宋四瞎子。通过宋四瞎子又找到胡海江、马佩勋、郭育仁、王华亭、宋平生。这时，马佩勋已打人当地的一个土客武装中，与胡海江、

郭育仁建立关系。通过胡海江的说服，终于争取到宋家川薛武栓、王兴元所带领的土客武装倾向革命。

12 月 30 日，马佩勋将薛武栓、王兴元的土客队伍带到樊家圪垛。当时，由于土客队伍中成分复杂，不宜用红军番号，在李铁轮、高长久、郭洪涛的主持下，将薛武栓、王兴元的土客队伍改编为抗日义勇队(简称义勇队)，薛俊山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队员 14 人，短枪两支，活动在吴堡、绥德、葭县一带。

义勇队成立后，首先开到绥德县东区狮子塄斗争了一个大地主，筹集到一批活动经费。后由郭洪涛、高长久、李铁轮带领义勇队，北上葭县南区。

1934 年 1 月问，已打入葭县木头峪民团任教练的共产党员刘子义派人向高长久报告：国民党葭县反共清乡委员会准备于农历腊月间在木头峪召开绅士代表会议，其目的一是动员全县衙警、民团配合各乡绅士催收捐税欠款，二是要在除夕秘密出动，到店镇、木头峪、神堂沟一带捕杀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高长久得到报告后，立即向中共陕北特委反映了这一情况。特委认为情势紧迫，决定乘绅士代表到木头峪开会之机，由义勇队进行武装袭击。

2 月 4 日，由高长久带路，马佩勋指挥义勇队赶到距木头峪五里地的石寨子隐蔽。在石寨子，马佩勋派人到木头峪与刘子义秘密接头，掌握了张东蛟民团和绅士代表的活动情况，对攻打木头峪作了具体部署。

2 月 6 日夜，天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义勇队从石寨子出发，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木头峪。木头峪位于黄河的沙岸上，张东蛟民团住在木头峪的一个商铺大院里。义勇队一到木头峪，刘子义以买东西为名，骗得老板打开商铺大门。大门一打开，紧跟刘子义身后的义勇队一拥冲入院内。此时，民团团丁和大部分绅士正在窑里饮酒作乐、猜拳行令，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一枪未发就收缴了民团队长杜庆甫和民团的全部枪械，并将在场的绅士扣押起来。

接着，义勇队迅速包围了团总张东蛟的住宅。张东蛟拼命抵抗，被义勇队当场击毙。木头峪战斗粉碎了葭县反共清乡委员会企图捕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的阴谋，义勇队星夜赶到吴堡县。

2 月 7 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派出刘子义、张益山、张岗、刘耀等共产党员充实到义勇队里，以改变人员成分，加强队伍中党的力量。在樊家圪垛，由高长久主持，将义勇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简称红四支队)，薛俊山为队长，马佩勋为政委，刘子义为经济员兼支队书记，郭育仁因原在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常瑞楼营当过班长，担任军事教练。红四支队很快发展到 60 余人。

5 月中旬，红四支队从吴堡县开进绥德县南区，在苏家圪垛村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焕士、娜起几个为非作歹的土匪，从土匪手中缴得短枪两支。

红四支队成立不到几个月，很快就在葭、米、绥、吴四县交界处开辟出一块游击根据地。

第六十一章

抗日同盟军失败

谢子长回陕北

1932 年 12 月，谢子长被杜衡再次贬出红二十六军后，与阎红彦到西安，由中共陕西省委派往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谢子长、阎红彦受训期满，由上海中央局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东三省后在东北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作为长期霸占东三省的傀儡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山海关和长城各口。日军先后出兵占领山海关、承德、秦皇岛、通州，三面包围了北平、天津，正准备大规模进犯华北地区。中共北方局为了促成国民党的爱国将领走向积极抗日，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到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领导的坚持抗日的军队中去工作。

谢子长、阎红彦到了天津，由中共北方局派到热河前线，分配在一个绰号口圹老北风八千岁”的领导的抗日义勇军里。由于这支部队人员复杂，鱼龙混杂，澍子长、阎红彦处处受到监视、排挤，无法开展工作，两人返回张家口。

在张家口期间，谢子长与尤祥斋结婚。尤祥斋，原名尤芝兰，陕西米脂县人，生于 1912 年。原在安定县城当小学教员，与谢子长结识，后转北京宏文中学上学，秘密做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任北京宏文中学训育主任的白超然，是谢子长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十分密切，许多人写信给谢子

长，都是先邮寄到宏文中学，再由白超然转交。

1933 年 5 月 26 日，在中共的帮助和促成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尤祥斋

抗日同盟军的旗帜揭起后，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盟军很快发展到 10 万之众。抗日同盟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区，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和信心。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跟随谢子长、阎红彦一起到抗日同盟军的强龙光英勇牺牲。

5 月 31 日，在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高涨呼声之中，国民党政府不但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步步退让，严禁守军抵抗，还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冀东、察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并规定日军可以驻守“长城线”。这实际上承认了长城以北归日本占领。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对抗战有功的抗日同盟军不仅不予支持，反而勾结日军加以消灭。国民党给抗日同盟军横加种种罪名，一方面切断交通，断绝粮食、弹药，配合日伪军夹击抗日同盟军；一方面施展各种阴谋从内部分化瓦解，致冯玉祥于 8 月初被迫离开，抗日同盟军处于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前敌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共产党所影响的部队全部撤往张北县。

8 月 9 日，约有万余部队撤至张北县。谢子长、阎红彦被编入许权中的第十八师。许权中自渭华起义失败后几经周折，投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部任第十八师的师长。

8 月 27 日，抗日同盟军前敌指挥部在张北县北部的二泉井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了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坚持抗日路线”，首先将

部队开赴商都县会合高树勋部，然后由商都县出平地泉、蔚县，向南发展，建立北方新苏区和新红军。

次日，谢子长、阎红彦随吉鸿昌部进抵商都县。当离开商都县西行时，被晋军赵承绶所阻，遂转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

9 月下旬，抗日同盟军进入滦东地区后，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在高丽营附近，抗日同盟军与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五师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抗日同盟军终因弹尽粮绝完全失败。1934 年 11 月，抗日英雄吉鸿昌被国民党逮捕后杀害于北平。临刑前吉鸿昌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下悲壮的诗句：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阎红彦等大批共产党员陆续潜至平津。这时，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惨遭失败，中共陕西省委亦遭国民党破坏。当谢子长、阎红彦到北平时，中共陕西省委委员贾拓夫也辗转来到北平，向北方局汇报工作。

贾拓夫遇到谢子长、阎红彦，即要求谢子长、阎红彦重回陕西开展斗争。中共北方局研究后决定，委任谢子长为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杨璞为政治特派员返回陕北，派阎红彦到孙殿英部做兵运工作。

12 月间，谢子长、杨璞从北平出发，取道河北、山西，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清涧县东区。在东区袁家沟 i 谢子长与白如冰、白栋材接头后，向中共东区组织传达了中共北方局有关指示，并听取了东区党组织的工作汇报和红二支队的游击活动情况。当时，因谢子长急于要到安定县重新恢复红一支队，由白雪山、张承忠带着红二支队的王德银、李富、贺牛等护送，连夜坐船过了无定河，到达安定县。谢子长到安定后，就很快恢复了解散后的红一支队。

当时，在陕北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谢子长接受中共北方局

派遣，离开北平一路赶回陕北。当到晋陕交界的黄河边时，河上的船只全被陕北井岳秀的河防军扣封在河西，无法找到船只，只好住到一个小村庄等待时机渡河。不料第二天谢子长再到河边察看，头一天还是浪涛汹涌的河水却在一夜之间冰封如铁，变成一片白茫茫的冰川。他顺利地踏着封冻的黄河回到陕北。由此可见陕北群众期盼他归来之心情。

恢复红一支队

一回到安定县，谢子长先落脚在共产党员刘存元家里。当天夜里，谢子长找到原红一支队分队长谢绍安和几个游击队战士，了解了红一支队失败的详细情况，他鼓励大家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大家知道，我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失败过多次，又受过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挤，反正我总要革命!古人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关键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坚持再干啊!”

过了几天，谢子长找回薛兰岗等原红一支队五个战士，一起讨论了恢复红一支队的准备工作。这时，安定县的苏区被国民党摧垮，建立了保甲制度，各乡镇要冲设驻重兵，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在这种情况下，谢子长不能公开在村里住，就领着原红一支队的失散人员到山沟的土窑里进行整训。

这年冬天，风雪特别大。谢子长穿着破棉袄、单鞋袜，为恢复红一支队到处不停地奔波，先后找到原红一支队的李胜堂、南贵成、崔玉瑚等。谢子长派刘明山和崔玉瑚出去筹集经费，在横山县境内抓了一个大地主，搞到一些大烟土和钱。同时，谢子长除派谢绍安继续寻找红一支队解散后分散到各地的干部和战士外，又派南贵成带上他的亲笔信，到陕甘边的南梁与刘志丹取得联系。

刘志丹得知谢子长回到陕北，立即派人送来 200 块银洋的活动费用，并派高岗、杨森带一支骑兵队，北上策应安定等县游击队开辟游击区。高岗、杨森到陕北安定县后，谢子长要求高岗留骑兵队继续策应游击队开辟游击区，高岗认为陕北游击队力量弱、游击范围小，带这支骑兵队的目标大、不便活动，只给谢子长援助了些枪支弹药，即与杨森带着骑兵队返回

南梁。骑兵队回到南梁后，刘志丹又派出王宝珊、刘约三再次北上，带着庆阳县游击队开到陕北。

1934 年 1 月 3 日，经中共陕北特委批准，在安定县刘家圪坊村由谢子长主持，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正式恢复，任命李胜堂为队长，谢绍安为副队长，刘子清为政委，刘明山为经济员。在会上，谢子长讲了话，他说：“扩大红一支队的方针是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兵员要依靠原来的老战士，适当招收一些政治上可靠的人。枪弹要从国民党军队手中夺。对地方上的国民党保长、乡长、镇长和特务人员，要打击坏中之坏，要坚决消灭张建南和李丕成民团。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当务之急，要以李家岔为中心，成立革命政权，建立赤卫军、农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红一支队恢复后的第二天，队伍转移到李家砭山上，将胡家洼的乡长姬占富抓捕镇压。胡家洼是游击队的活动中心，这个村只有 9 户人家，就有 17 人是党组织发展的活跃分子，群众基础好。姬占富被镇压后，县民团团总李丕成就带着 100 多人，将村子包围。

李丕成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恶性如狼，绰号“大狼”。他企图将村里活动的游击队一口吃掉，但一进村子连游击队的人影都没找到，就把八名农民抓到县里审问。李丕成在他们的嘴里没能获得任何有关游击队的情况，即扣押刘志旺等两名人质，要村里人找回姬占富的尸体，始可放人。谢子长为了迷惑李丕成，采用迷信的方法，让村里群众从关帝庙抬起“神楼子”，假借神灵“指路”，抬着到处转了半天，以关帝老爷“显灵”为名找到了姬占富的尸体，蒙骗过愚蠢的李丕成，将扣押的人质换回。

接着，谢子长亲自指挥红一支队，在李家岔、梨树台、石湾镇打了几个小胜仗，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十人。

4 月，经侦察得悉高双城部张建南带着营部和一个连，在窑则峁河修筑碉堡。这时，刘志丹派王宝珊和刘约三带着庆阳游击队来到安定县。谢子长决定带领红一支队，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攻打窑则峁河张建南营的据点。

窑则峁河距李家岔不远，四面依山。村里有个反动大地主贾生金，请了张建南在村里修碉堡，建起国民党军队的据点。谢子长带领红一支队和

庆阳游击队刚进村子，就把贾生金的院子包围，与张建南营部一个排交起火来。经一场激战，张建南被迫撤出村子，急忙去占村外的西山制高点。谢子长命令红一支队李胜堂、谢绍安、刘明山、陈文保组成突击队，对西山发起攻击，几经冲击未能攻下。

这时，只见谢子长将裤腿卷到半腿上，袖子挽在胳膊弯，手提一支驳壳枪，带头冲锋。在各个山头赤卫军助威之下，谢子长带领红一支队和庆阳游击队很快攻克西山，歼俘张建南营一个排，缴枪 20 支，摧毁了张建南营在窑则峁河的碉堡据点，巩固和扩大了以李家岔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这一战，红一支队一下子发展到 100 多人。至此，红一支队又在安定县壮大了声威。据抓获的俘虏说，战斗结束时，营长张建南也被红一支队俘虏，但由于战士们不认识张建南，又没有抓俘虏的经验，这个狡猾的家伙竟换上便衣逃走了。张建南从窑则峁河狼狈逃回县城后，还惊魂不定地说：“红军尽是老百姓娃娃，打仗勇敢，不怕死，拼命冲，真厉害!”

解家沟镇“闹腊八”

1933 年 8 月，红二支队成立后活跃在清涧、绥德县交界一带。红二支队打土豪、斗地主、分财产、开辟红色村庄，农民群众连声叫好。由于游击队在一些村庄对最反动的坏分子采取了公开或秘密的镇压手段，许多民愤极大的地主、劣绅惶惶不可终日，或逃到县城和民团驻点，或渡过黄河避难山西。在绥德县南区和清涧县东区的黄河沿岸，红二支队一时声威大震。

白如冰

1934 年 1 月 22 日(农历年腊月初八)，红二支队转移到清涧县东区安家山，派出侦察员白玉华到 15 里外的解家沟镇了解敌情。这天，正逢解家沟镇集日，国民党的催款衙役和地方绅士趁着群众赶集的机会正在镇上到处向群众催捐逼税。凡交不出捐税的人，立即被捆绑起来，勒令取保，否则就被抓去坐牢。

白玉华见此情景，立即赶回安家山，向红二支

队报告了情况。白如冰、白雪山、崔玉瑚、张承忠、马义、王聚德等经研究后，决定趁夜赶到解家沟镇，在年关之前将这些国民党的县、区催款衙役和作恶多端的劣绅铲除掉，让老百姓过个痛快年。

是夜，红二支队由白玉华带路，从安家山赶到解家沟镇。这时，催款衙役和地方土豪劣绅在集日收缴到许多钱，正在国民党区公所的窑洞里得意忘形地摆着酒宴，狂欢暴饮，并商量年关前的催捐收税之事。

在一片震天的喊杀声中，红二支队破门冲人，国民党区公所的窑洞里一群催款衙役和地方劣绅顿时吓得呆若木鸡。红军游击队战士将六个催款衙役和四个绅士统统五花大绑，当场宣布他们的罪状，拉到一座桥头处决。其中一个绅士被砍了数刀未致命，从桥上跳入沟底逃走。

红二支队在清涧县东区杀死衙役绅士九个半，大长了老百姓的革命志气，四乡群众把红二支队的这次行动传为红军解家沟镇“闹腊八”的佳话，并编成歌谣宣传：

民国二十三年半，
起了红军闹共产，
领头人叫白雪山，
队伍开到黄河畔；
白天扎在安家山，
夜里到解家沟公事办，
桥头杀人九个半，
他叫穷人把身翻。

则塌山缴枪

红二支队在解家沟镇严惩衙役绅士之后，决定攻打店则沟李成善民团。李成善民团人多枪好，工事坚固，很难攻克。为保证战斗取得胜利，红二支队派白如冰、白雪山到中共陕北特委要求调吴堡红四支队到清涧县，与红二支队协同作战，攻打李成善民团。特委采纳了红二支队的建议，即调薛俊山、马佩勋带红四支队，从吴堡县转移到清涧县东区。

红二、四支队会合后，确定了具体的攻打日期，但正在积极部署之时，

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与谢子长从中共北方局来到陕北的政治特派员杨璞，由于缺乏游击斗争经验，在清涧县曹家洼被国民党逮捕，押到县城又经不住皮肉之苦叛变投敌。因杨璞知道攻打李成善民团的战斗计划，红二、四支队采取应急措施，临时改变攻打李成善民团的时间，提前两天行动。

1934 年 3 月 21 日，红二、四支队在数百名赤卫军的配合下，击溃店则沟李成善民团，缴枪十余支，李成善只带着十几个人逃走。李成善民团被红二、四支队击溃后，极大地动摇了驻守在清涧县东区花岩寺的韩子丰民团。

韩子丰原是清涧县的一个民团团总，后加入共产党，归编石谦部队，曾在李象九营当连长，参加过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脱党，返回清涧县，利用地方社会关系又拉起一个民团。红二、四支队在店则沟击溃李成善民团不久，打人韩子丰民团中的共产党员王堆保等乘机策动民团起义，瓦解韩子丰民团武装，拉出几个团丁、扛出一挺机枪投奔红二支队。

韩子丰见李成善民团被红军游击队击溃逃到县城附近，自己的民团孤处东区，民团中又被共产党员拉走一些人和枪，自感随时有被红军吃掉的危险，不打自退，也从花岩寺撤到县城附近去了。

李成善带着民团残部离开店则沟后，红二支队为全歼这股民团武装，又通过党组织秘密将李成善的独生子李眼明抓获，当做人质，胁迫李成善交出全部枪支。白如冰、白雪山经研究后，决定派马义(原名白炳忻)亲自到李成善民团进行交涉谈判。

马义(白炳忻)

马义接受任务后，带着一把短枪，在一个姓蒋的内线保长陪同下，孤身闯入李成善民团。马义一踏进李成善的团部，就把随身带的短枪盒子从容地挂到墙上，向李成善说明此番来意，并陈述了利害。这时，李成善的老婆正为红军抓走儿子哭得死去活来。李成善在马义和内线保长的劝导下，终于答应交出民团全部枪支。但李成善因恐缴枪行为引起上司的追究，便与马义商定，在县城附近的楼则塌山口假借双方遭遇将民团枪

支全部交给红二支队。

当红二支队埋伏在楼则塌山口的预定地点时，李成善果真带着民团前来。一到伏击圈，白雪山下令战士一齐朝天鸣枪，高喊：“缴枪不杀!”李成善趁势命令团丁全部缴枪，各自逃跑。

至此，清涧县东区东至黄河沿岸石盘、二郎山，南至老鸦关、高杰村，西至东拉河、店则沟，北至崔家湾、定仙墕，东西 130 余里、南北 150 余里的区域内，许多农村相继发展为红二支队的游击根据地。在这片土地上，村连村，户连户，建立了农协会、妇女会、青年团、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并创建了陕北中部地区最早的红色革命区域，迅速在黄河西岸向东扩展到绥德、吴堡县境，向西扩展到延川、安定县境。

红四支队在店则沟一战后，从清涧县返回吴堡县。这时，正值国民党纠集警察、民团，在葭县螅镇国民党驻军的配合下，先后捕杀了参加木头峪战斗的张炜、乔沛、张衡三名共产党员。为打击国民党的气焰，红军游击队决定对木头峪的反动分子和告密者进行镇压。红四支队在薛俊山、马佩勋的带领下，进入木头峪大造革命声势，杀了给国民党告密的张东蛟老婆及其他两个反动分子，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接着，红四支队撤离葭县木头峪，回到吴堡县活动，先后在吴堡县镇压了国民党区长贾玉泰，恶霸劣绅贾拴牛、寇泰以及收税衙役霍玉刚、霍艾元等十多个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从此，葭县南区至吴堡县慕家塬一带被开辟为红色革命区域，党组织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的活动逐渐地由秘密转向公开。

与此同时，中共陕北特委根据绥德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以中共王家沟支部为主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红五支队)，任命崔正冉为队长，马万里为政委，活动在绥德县一带。

马文瑞在三边

根据葭县南坬村召开的中共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精神，马文瑞于 1934 年 2 月奉派到三边开展兵运工作。当时，驻三边的是杨虎城新编谷莲舫骑兵旅。谷莲舫原是冯玉祥部苏雨生骑兵第四师第八旅旅长。1930 年春，

苏雨生与西北“五马”开战，兵败后谷莲舫随苏雨生投归杨虎城，被编为陕军警备骑兵旅，任副旅长。1931 年秋，苏雨生在彬县背叛杨虎城，带着叛军向宁夏开去，谷莲舫未从苏雨生的叛军，由杨虎城将所部编为新编骑兵旅，任旅长。

在谷莲舫的骑兵旅里，中共陕北特委派入一批共产党员做兵运工作，有旅部文书辛树荣、参谋杨公辅(后脱党)及薛毓瑞、史法秩、王治岐、张宗孝、杨彩彬、薛振昌、姬振元、李登瀛、赵福祥等。原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已脱党)也在该部，任旅参谋主任。杜嗣尧、苗从式、张宜高、高希陈等以县高小教师身份在地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马文瑞到谷莲舫旅，以寻朋友找事做为名住了下来，与打入旅里的共产党员接上头。谷莲舫旅有三个团，一团团长段幼庵驻定边，二团团长张廷芝驻安边，三团团长张廷祥驻靖边的柠条梁。马文瑞指定王治岐、史法秩、薛毓瑞分别负责一、二、三团的兵运工作，把所有党员编为两个支部，因多数共产党员在张廷祥的三团，所以决定把兵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三团。同时，注意对杨国栋的争取和团结，从他那里获知谷莲舫部的动向，以便做好各种应对工作。

3 月至 4 月初，蒋介石命孙殿英部到青海屯垦，又暗中密令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和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途中予以围歼。孙殿英取道宁夏，首遭马鸿逵部的阻击。这时，打入孙殿英部的共产党员南汉宸、葛霁云即派艾稚卿、刘天鸣(陕西府谷县人，已脱党)前来与谷莲舫部中共组织联系，共商联合攻打宁夏的马鸿逵。艾稚卿、刘天鸣找到马文瑞说明来意，马文瑞即写信给刘志丹，建议与孙殿英取得联系，利用这一地方军阀混战的机会发展党的武装。刘志丹接信后，立即派曹士荣为红军代表前去与孙殿英联系。

曹士荣，又名福胜，陕西保安人，生于 1909 年。先在旦八私塾读书，后人永宁高小。1928 年加入青年团。1929 年转入共产党。同年考入延安中学，后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1931 年考人榆林中学。1933 年春参加陕甘红二十六军。

曹士荣接受任务后，即与王文昌一同前往宁夏。在路过家乡旦八寨子时，被民团的赵怀玉认出，谭世麟下令将曹士荣、王文昌杀害。

孙殿英自恃拥兵 7 万之众，对马鸿逵据守的宁夏城发起进攻。宁夏城防守严密，孙殿英久攻而不克，此时部下旅长杨干臣、于世铭等又阵前倒戈。孙殿英欲退出宁夏，阎锡山出兵断其归路，蒋介石趁机明令撤销孙殿英所兼各职。孙殿英被迫退到包头，后前往太原晋祠暂时隐居，残部被阎锡山收编。

孙殿英兵败后，杨虎城命令谷莲舫旅开赴西安整编，一团段幼庵即率全团叛逃。新的情况打乱了马文瑞在该部策动起义的兵运计划。谷莲舫旅的起义条件尚不成熟，马文瑞本可以返回特委复命，但他心有不甘，决定随谷莲舫所剩二、三两个团同行，以便见机行事。

马文瑞与三团从驻地柠条梁出发，随旅部南行。部队行至甘肃庆阳停下来休整。马文瑞利用部队休整的机会，化装潜入薛毓瑞连。他提出，沿途只有庆阳距陕甘边根据地的南梁苏区最近，如果部队再向前开拔，策动起义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而举行公开起义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只能采取“偷兵”的办法，把部分士兵秘密拉出去，送到南梁。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由史法秩带着加多名起义士兵、10 多支枪，按预定计划从庆阳城墙上拽着绳子溜下来，连夜直奔南梁。史法秩等人到南梁后，被编为合水游击队，史法秩任队长。后史法秩调任安塞游击队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马文瑞没有离开谷莲舫的部队。他去找薛毓瑞商量，能否由薛毓瑞把所带领的一个连也拉走。薛毓瑞经反复考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决定在部队到西安整编时再作计议。这时，因史法秩在部队里拉走 20 多人起义一事，谷莲舫对马文瑞产生了怀疑，派人秘密调查他的身份。马文瑞获悉后，不得不先行离开部队赶往西安。

到西安，马文瑞住进了榆林客栈，见到了马云程的弟弟马健翎，还有朱侠夫和常应晨等。马文瑞一直等待薛毓瑞前来联系。6 月，薛毓瑞派王治岐来，将从谷莲舫旅一个军官处得到的一把手枪送给马文瑞，并说谷莲舫旅开到西安，被杨虎城改编成一个小团，还把部队里大部分共产党员整编出去。马文瑞立即在城东门外的八仙庵召开部队党员会，决定让这些党员回安定县参加游击队。薛毓瑞等人回到安定县后，不少人成为游击队的骨

干。薛毓瑞先后在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任连指导员、团政委等职，1936 年在西征战斗中壮烈牺牲。

马文瑞离开八仙庵，刚到住处附近，朱侠夫、常应晨等早在路边等着他。他们一见到马文瑞就焦急地说：“你不能回去了，国民党特务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留下人正要抓你哩!”这时，马文瑞看见住处看门老太太的儿媳拿出手帕，远远暗示他赶快离开。

马文瑞立即转到大湘子庙杜斌丞公馆。在杜斌丞的家人掩护下住了一个多月，躲过了风头，即找老乡周梦熊借了点路费，准备回陕北。当时回陕北有两条路：一条走咸榆公路，虽经肤施到陕北是捷径，但井岳秀曾通缉过他，很危险；一条走陇东，虽绕道路远但很安全，且可顺路到南梁苏区看一看几年未见面的刘志丹。马文瑞决定走陇东这条路。

从西安坐汽车到了宁县，马文瑞通过熟人找到一个回家探亲的红军战士常冠英，由他带路，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走了两天，终于到达陕甘边根据地。

从此，马文瑞离开陕北特委，留在了陕甘边南梁苏区。从 1934 年秋开始，在刘志丹创办的南梁红军军政干校任教，后任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神堂沟会议

白治民

1934 年 4 月 4 日，中共陕北特委根据陕北游击战争日益发展壮大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在葭县南区神堂沟召开了中共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明方、崔田夫、高长久、张达志、崔田民、李铁轮、郭洪涛等。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陕北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队伍，提出创建一师红军的奋斗目标；组织突击队，武装突击开辟农庄，扩大已有的游击根据地，并进而将分割的几个红色革命区域连成一片；成立

各种群众团体，普遍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各地应根据不同情况发动群众斗争，进而实行分配土地革命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次会议还确定，召开一次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对这次会议精神进行具体的部署。会后特委同志立即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4 月上旬，根据神堂沟中共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精神，崔文运在绥德县王家沟主持召开了中共绥清中心县委会议，决定绥德、清涧分设县委。中共绥德县委重新恢复后，由崔文运任书记。崔田民到清涧县东区周家山，主持重新恢复中共清涧县委，由刘玉春任书记，李景林任秘书长，唐洪澄任组织部部长，李光白任宣传部部长，张家修任军事部部长；团县委恢复，由高鹤龄任书记，白志明任秘书长，自治民任组织部部长，贺生祥任宣传部部长，贺建山任青工部部长，白凌云任青妇部部长，贺治华任农委委员，康五任军委委员；县工会恢复，贺开全任主席。中共吴堡县委在横沟成立，丁茂义任书记，魏岗任组织部部长，慕生贵任宣传部部长，王国昌任军事部部长。

5 月 2 日，在葭县南区王家畔召开了游击队和游击区代表联席会议。中共陕北特委和团特委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明方、崔田夫、高长久、李铁轮、郭洪涛等 10 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县游击队的领导人。会议传达了神堂沟会议精神，并形成了决议。

高长久

会后，特委同志又分赴各县开展工作，协助组建和发展游击队。同时决定将特委机关由葭县转移到清涧县东区。不久，特委机关增加白如冰、马佩勋为特委候补委员。

6 月，中共北方局要中共陕北特委派人汇报工作。特委决定由特委书记崔田夫去天津。临行，崔田夫与马明方商量，到中共北方局除汇报陕北党组织的工作和陕北游击战争的情况外，

还要求中共北方局派出领导干部到陕北指导工作，对统一陕北和陕甘边的领导作出指示，并要求中共北方局给陕北红军一个番号。

自葭县神堂沟会议之后，陕北的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异常。各县相继建立了红军游击武装，葭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六支队(简称红六支队)，府谷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七支队(简称红七支队)，横山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简称红八支队)，延川县重新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安塞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支队(简称红十支队)，神木县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一支队(简称红十一支队)，游击战争和群众革命斗争扩展到十余县境。

同时，在绥德、清涧、吴堡、葭县、安定等县一带开辟了大片苏区。在这些县的村庄里，反动分子被镇压，普遍建立起党支部以及青年团、农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游击小组等群众武装组织，农协会负责代理一切行政职权。由于苏区不断扩大，红色村庄逐渐增多，红军游击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群众掩护，国民党军队到处碰壁受到打击。尤其是在清涧县的苏区，红军游击队和各村庄群众打成一片，形成红色的壁垒，国民党队伍所到之处，军民齐心歼之，使他们寸步难行，心惊胆战。

一天，红二支队半夜进入清涧县小岔则村。小岔则村距县城 20 余里，是东区通往县城的必经大道。一进村后，将哨位布置在村前沟口朝县城的方向，忽视了村后沟方向会发生敌情。

次日早饭后，红二支队的战士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擦枪，队长白雪山和政委张毅忱与村里的几个共产党员谈论工作。突然，一个叫惠生荣的少先队员无意中发现，河口镇回县城换防的国民党驻军一个排从村后沟的河口镇方向开来，他立即朝村里跑来，喊：“白军队伍来了，快跑!”

当红二支队得知时，国民党队伍已经发现了游击队，正向村里开枪。红二支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匆忙冲出村子，朝后山方向撤去，国民党队伍尾追上山。战斗相持了一小时许，由于红二支队占据山头有利地势，

击毙国民党士兵数人，国民党军队自知难以取胜，即返回村子开始大搜查。

红二支队住过的一家的房东大婶发现游击队在撤出之时，竟把队旗和一支长枪丢在窑里，急中生智地把队旗和枪支藏到草垛里，使国民党士兵什么也没有搜到。

第二天，国民党区长贺君瑞以为村里刚发生战事，红军游击队一定跑个精光，便带着两个团丁来村里，想趁村里群众惊魂未定逼收税捐。

不料，红二支队的侦察人员仍然留在村里。侦察人员和村里的党支部商量后，把贺君瑞和两个团丁诱到村子对面的一个偏僻地方，发动群众一拥而上，用镢头和乱石把这个四乡百姓憎恨的国民党区长打死。跟在贺君瑞后边的两个团丁，一见势头不妙，朝天慌乱地放了两枪，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撒腿没命地跑掉了。

第六十二章

南梁会师

第一次“围剿”

1934 年夏，随着陕北革命形势暴风骤雨般的发展，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红色苏区迅速扩大，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陕北的统治。陕北军阀井岳秀调集其第八十六师为主力，纠集各县民团约 1 万之众，以班、排为单位，向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各个游击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将陕北的革命斗争扼杀在摇篮之中。

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是：在北线以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围剿”神府苏区，截断神府与葭县、米脂之间的联系，分割包歼红三支队；南线是井岳秀的主攻方向，以第八十六师高双城二五六旅和刘润民二五八旅一部配合地方各民团武装，对安定、安塞、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葭县一带地区形成马蹄形包围圈；以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手段，摧毁红军的群众基础，歼灭苏区红军游击武装力量。

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围剿”的重点是安定、绥清、葭吴、神府苏区。国民党军队每到各县城和要镇之处，即设驻重兵，修堡筑寨，构建工事，并设立保甲制，家家户户实行联保，如有一人通共，祸及连坐，企图将陕北红军游击队置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不战自乱，进而歼之。

国民党军队一到村庄，杀畜宰禽，烧杀抢劫，百姓遭殃，鸡犬不宁。由于国民党军队来势凶猛，又有地方民团和地主豪绅为虎作伥，一些地方游击区未趋稳定或党组织未及防范，加之没有反“围剿”的斗争经验，不

少县的地方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围剿”之初，在党组织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清涧县，中共清涧城区区委和中共高杰村区委负责人及党团骨干周纪丰、惠金瑞、霍建国、白志强、白振纪、惠志儒、白家荣、惠生荣等一大批革命志士惨遭杀害。白振纪烈士的遗属刘景如愤然率先带领本村的白云凡、白茜、白凤梧、白烈飞、白健、白凌云、白国英、白怀英、白守春等九名姑娘，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开家庭，参加了革命，史称“十女闹红”。

当时，在她们的影响下，又有黄敏、黄光明、白青山、惠玉秀、王景云、刘海莲等一大批妇女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甚至献出年轻的生命。如白守春参加革命后担任交通员，不幸被高桂滋部的驻军抓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被高建白杀害于清涧县城南，时年仅 20 岁。

6 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根据这种险恶形势，领导各县地方党组织和各支红军游击队及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革命群众，与国民党军队展开第一次反“围剿”的斗争。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特委决定陕北游击队红三、四、六等支队继续分散在各县，坚持地方游击战争，将红一、二、五支队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统一指挥，形成一个拳头，寻找战机，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队，粉碎军阀井岳秀对苏区的“围剿”。

7 月 8 日，安定县红一支队、清涧县红二支队和绥德县红五支队约 600 人在安定县杨道峁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马义任总经理处长。

攻打安定城

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决定首先攻打安定县城。这时，驻守安定县的高双城部张建南营和李丕成民团四处破坏地方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采用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残酷手段，在安定县城内已关押 300 多名所谓的“政治犯”，100 余人惨遭杀害，尚有 200 余人继续关押在监狱，亟待营救。

1934 年 7 月 16 日，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从东沟出发，于次日凌晨赶到安定县城外。战前，谢子长作动员讲话。他说：“我们今天攻打安定

城的主要目的，是打开监狱，救出狱中的同志。我们这是第一次攻打县城，是虎口拔牙，不能轻敌。”

安定县城是一座古城，石头垒墙，地势险要，背靠西山，三面临川，城内西面是国民党守军的制高点，山顶有个大炮楼，驻着折可达的民团。红军游击队在薛兰斌带领的赤卫军、少先队四五百人的配合下，由红二、五支队作掩护，红 一支队担任主攻，开始攻城战斗。

刘明山

在谢子长的亲自带领下，红一支队从县城南偷偷摸到城墙根下，迅速架起云梯，登上城头。战士们一上城头，对准山顶炮楼一阵开火，就把炮楼里毫无防范的守军打得逃下城墙。红一支队速占炮楼制高点，谢子长在炮楼上指挥战斗。李胜堂带着一个分队用火力牵制住把守在东门的守军；贺晋年带着一个分队冲进国民党县衙门，把监狱的看守人员打散。刘明山冲到监狱门口，一枪打开监狱门上的大铁锁，大声喊道：“我们是红军，老谢领人救你们来了!”

监狱内的人们一听呼唤，立刻开镣砸铐，在谢子长的指挥下，分批由城外赤卫军安全接走。监狱内的人全部转移完时，天色已经发亮。这时，城内守军看清楚冲进城的红军游击队不多，始大胆发起反攻。

红一支队完成劫狱任务，边打边退，顺利撤出城外。这次攻打安定县城，红军游击队进城不到 100 人，利用黑夜城内守军难察实情之机，震慑住县城内张建南两个连和民团共 300 多人的军队，从城内监狱成功救出 200 多人。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陕北群众的革命斗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拉开第一次反“围剿”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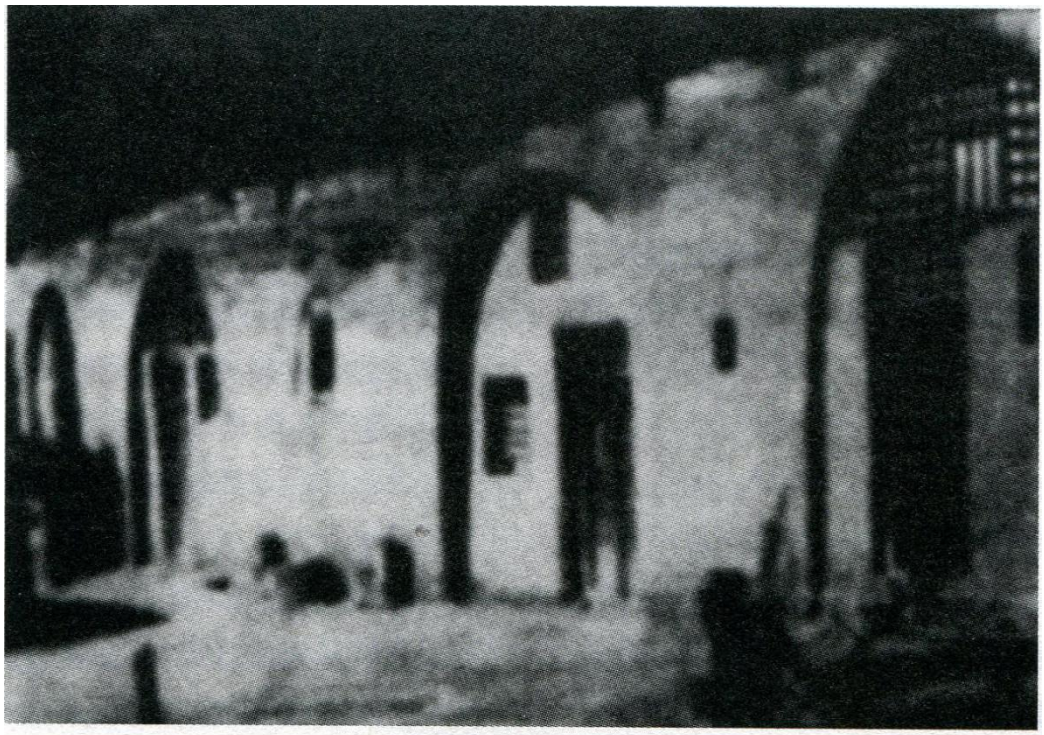
陕北红军游击队攻打安定县城后，井岳秀急派重兵向安定县一带合围而来。谢子长决定避敌锋芒，率部队向南转移，向活动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靠拢，并先派出王聚德前往陕甘边，与刘志丹接洽。后王聚德留陕甘

边，由刘志丹派往安塞县开展地方工作和组建游击武装。

7 月 22 日，谢子长、郭洪涛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 600 余人，从安定县出发，在甘肃南梁地区阎家洼子与刘志丹、高岗率领的红二十六军胜利会师。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

刘志丹、高岗等自合水莲花寺恢复红二十六军后，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分配土地、发展经济等工作，正搞得轰轰烈烈，并在陕甘边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这时，保安县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在队长郑发旺、副队长黄万发的带领下，由洛河川转到靖边、定边一带活动，开辟了三边新的游击区，并改编为西靖边游击队，渐有向陕北苏区靠拢之趋势。



阎家洼子联席会议旧址

至 1934 年 7 月间，陕甘边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获得解放，许多县也相继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自 1933 年 7 月起，由于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破坏一直处于瘫痪状态，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中共陕甘边特委及红二十六军近一年来与上级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在创建南梁苏区的艰苦斗争中，非常渴望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得到领导

和接受新的指示，曾派秦武山到西安寻找中共陕西省委，一去无回音，事后得知秦武山到西安后被国民党逮捕；又派一个叫王锦全的府谷籍战士前往上海找中共中央，一去不复返，事后得知，那时中共中央已迁到江西苏区，王锦全由于找不到中共中央，就一边在上海滩拉人力车，一边坚持继续找党；还派崔廷儒回关中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

春夏之交，谢子长派人赴陕甘边联系红二十六军，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知道谢子长从中共北方局回来，高岗、杨森立即带着陕甘游击骑兵团到安定县，见到谢子长，才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这次，谢子长率领着陕北红军游击队三个支队，来到陕甘边的南梁苏区，刘志丹和高岗等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精神振奋，心情激动，热烈地表示欢迎。

7 月 28 日，两军胜利会师后，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陕北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惠子俊、郭洪涛、龚逢春、贺晋年、杨森、赵国卿、王世泰、张秀山等，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连以上干部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谢子长以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研究商讨了陕甘边、陕北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会上，杨森代表四十二师汇报了建师以来部队发展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意见，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扬。杨森在汇报中把高岗被撤职和因创建南梁苏区、发展第二路游击队有显著贡献而后复职的情况也如实说了一遍。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局的两封指示信完全不顾客观事实，以王明“左”倾错误观点对红二十六军横加指责。指示信中说：红二十六军实行“逃跑主义”“钻梢主义”；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下的结果”；退出照金苏区的行动是“逃跑主义”；建立游击队和收编、改造绿林武装的方针政策是“带着浓厚的土匪色彩”“招兵买马的土匪流氓的发展”；等等。总之一句话，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否定得一干二净。谢子

长、郭洪涛根据这两封信的内容发了言。

会上，大家对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局的两封指示信争论得非常激烈。不少同志说：这指示信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上级组织从没有人来调查过，中共北方局依据什么指责我们的工作?难道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开创了，倒有罪了吗?

高岗说：杜衡的那一套，造成二十六军覆没，在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围剿”下，红军剩下不足千人，只能退出照金苏区，到这里来重建新的根据地；目前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无异于叫花子想抱新娘，穷做梦”；谁愿意钻梢山，都是因为平原站不住脚才走的这条路；批评“枪杆子万能”是错误的，枪杆子就是万能，不万能为啥要搞兵运?“有枪就是‘草头王’，没有枪，放屁也不响”，蒋介石又不给发枪，赤手空拳能打下共产党的天下吗?什么犯了“右倾路线错误”“梢山主义”，这“梢山主义”今后还得走，毛泽东不是也上了井冈山，难道井冈山比大城市还好吗?

习仲勋、惠子俊等说：咱盼着要跟上级组织接上关系，结果盼来上海中央局和中共北方局的两封指示信，都是一瓢冷水；我们宁去找中央，也不能接受指示信的指责。

刘志丹对两封信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是个十分有组织原则的人。尽管两封信对红二十六军的很多批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但他认为可喜的是红二十六军能跟上级组织取得联系，这比什么都重要。他相信上级组织对红二十六军的批评指责是在不了解真实情况下盲目地作出的，日后只要了解了真实情况，这些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总会被纠正的。红二十六军绝不是哪个人的军队。这两封指示信是上级组织写来的，谢子长仅是以中共北方局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进行了宣读，围绕指示信阐述了自己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不是谢子长的本意。参会的人都瞅着刘志丹，不少同志以为他一定会跟谢子长翻脸。没想到刘志丹的党性很强，他极力地控制会议的紧张气氛。

对两封信中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和错误说法，刘志丹申辩说：红军不到梢山地区就无法生存下去，新的根据地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游击战争就是在运动中作战，在强敌面前不跑就不是游击；抓革命的枪杆子，建立革命

的武装，坚持武装斗争，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并使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同时，他以大局为重，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与谢子长的友谊为重，对谢子长提出的一些意见表示尊重。

根据谢子长的提议，会议免去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并一致同意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由谢子长担任，杨森担任师长。会上还决定由贺晋年接任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郭洪涛兼任政委。

会上，谢子长还提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时间不长，力量单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又派重兵进行“围剿”，可调四十二师红三团，由团长王世泰、政委黄罗斌率领，协同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刘志丹欣然同意，并答应另派些干部和战士，给一批枪支、弹药和钱物，支援陕北发展武装。王世泰、黄罗斌带红三团离开南梁时，刘志丹再三嘱咐：“老谢是四十二师政委，红三团北上，要坚决执行任务，严格军纪，和陕北苏区的人民紧密团结，英勇作战，完成任务，夺取胜利。”

两军会师后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的陕甘、陕北联席会议，由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龚逢春作了记录并上报。后郭洪涛回到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两封指示信精神和会议记录写了一篇《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从根本上否定了红二十六军的功绩，刊登在《西北斗争》刊物上，也送到中共北方局。

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一文中，称红二十六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把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失败的责任加到后来的陕甘边特委领导头上，把红四团在国民党军队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三原武字区说成是“逃跑主义”，把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起义说成“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极端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苏区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把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所建立的游击队说成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还说“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并说陕甘边特委“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等。不久，陕甘边特委接到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说“张秀山成分不好”，不能担任特委书记一职。于是，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张秀山任庆阳游击队政委。

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两支红军在南梁阎家洼子的会师给陕北和陕甘边人民带来了希望，为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尽快连接、创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永远值得人民纪念。当时，南梁苏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
下到南梁堡，见到刘志丹。
老乡亲热说，欢迎歇几天。

事实证明，南梁阎家洼子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一道活动是正确的，对于陕甘边和陕北两支兄弟红军部队进一步加强团结、亲密协作、统一步调，共同对国民党军队作战以及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六十三章

第一次反“围剿”

景武家塌战斗

1934 年 8 月 15 日，谢子长率领统一指挥的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约 1000 人，从南梁北上，返回到陕北安定县，立即展开了反“围剿”的战斗。陕北根据地安定苏区的群众一听说谢子长回到陕北，带来了南梁刘志丹的红三团，人们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像迎亲人一样，又是腾窑烧炕，又是杀猪宰羊，到处都是迎接的群众，使得红三团的许多指战员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表示：一定要打垮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军队。

8 月 17 日，第八十六师高双城部姜梅生团的一个连从横山县石湾镇窜人安定县的景武家塌，企图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

景武家塌离石湾镇 20 余里，住有十多户人家，周围有五座名山：大郎山、二郎山、三郎山、四郎山和五郎山。村庄就坐落在二郎山和三郎山之间北大沟的半山坡上。谢子长决定利用有利地势，抓住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深入到根据地内的孤立之敌。谢子长召集红三团和红一、二、五支队的负责人研究战斗部署后，命令王世泰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贺晋年带领红一、二、五支队助攻。谢子长的总指挥部设在三郎山，其他山头都有赤卫军占领。谢子长在五座大山设兵布阵，严阵以待。当地群众都预言道：“好汉访英雄，大将把名山。红军连把五座山，这仗一定会打胜。”

8 月 18 日晨，战斗打响。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带领下，首先从三郎山

俯冲直下，重兵压到景武家塌村的脑畔山上。贺晋年带领陕北红军从东南方向朝村里发起进攻。一见红军占领了有利地形，姜团一连连长急得大声命令士兵：“往山上冲，不敢下沟!”

姜团一连企图抢占脑畔山的制高点，拼命朝山上冲来。红三团居高临下，甩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姜团一连人马狼嚎鬼哭。带队的连长见山上火力猛烈，难以冲上山去，又命令全连士兵向北突围。北边是红一支队设伏，一阵乱枪扫射，把那些士兵打回村里。连长带着士兵要上山冲不上去，向北突围又被打回，像一群受惊的兔子在村里到处乱窜。

此时，谢子长命令部队开始冲锋，几路红军像潮水一样涌进村里。红三团击毙带队的连长，溃散的士兵夺路冲出村子，只得向南大沟奔命。红军几路夹击，在南大沟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使姜团一个连无一漏网地全部被歼灭，除击毙者外，生俘 80 余人，缴获长短枪 100 余支。

景武家塌一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谢子长在会上说：“这次胜利的原因，首先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各部队团结战斗。其次是打了人民战争，有几千赤卫军和少先队参战。景武家塌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我们要乘胜前进，继续寻找战机消灭国民党军队。”

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陕北群众的胜利信心，小股国民党队伍吓得再不敢出来活动，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许多村庄都成片地“红”起来。不少村庄的贫苦农民自发地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送物送粮，高兴地跑来告诉谢子长：“老谢，我们那里也红了!”

至此，安定县的党组织活动公开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农协会、儿童团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的八个区，除少数被国民党驻军占据外，大片都成了红色的土地。

张家圪台战斗

景武家塌战斗告捷后，部队在安定县玉家湾稍加休整，即由谢子长率领挥师东进。途经安定县北区强世清被俘的地方时，谢子长命令部队停下，下马肃立，静默三分钟，向英勇牺牲的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白德胜、任志贞等同志致哀。谢子长深情地向战士们说：“强世清、强龙光、强世光

弟兄三人，还有白德胜、任志贞同志，都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好战士，他们为革命牺牲。今后革命胜利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部队离开安定县北区，向清涧县方向进军。安定县与清涧县之间是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重兵把守的地带。在南沟岔、老君殿等几处地方，高双城部设立许多据点，属国民党管辖严密的白区，老百姓因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大多跑散，躲到大山、深沟“藏反”去了。为争取白区的群众，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谢子长命令部队，凡吃了老百姓的粮食等，一律都要在锅里留下银洋和信。当部队走后，群众到处传说红军是“天兵天将”。

部队进入这段白区地带，绕道避开国民党据点守军，先进入绥德县南区与清涧县交界处的张家圪台。驻守刘仙嘴的高双城部两个排，发现红军骑兵分队派出的九名骑兵在峪口党家川所设的哨卡出现，以为是小股游击队的活动，两排守军倾巢出动，向党家川方向开来。其实，这是谢子长所设的诱兵之计，刘仙嘴的两排守军果然上钩了，一路追击，进入红军的伏击圈。

1934 年 8 月 22 日，刘仙嘴的两排守军在红军骑兵战士且打且退的引诱下，一直尾追到张家圪台。刚到张家圪台村边，只听得谢子长一声令下，设伏的红军四处出击，枪声大作。由于红军占领了各制高点有利地形，仅一小时许就将两个排一个不剩地全部歼灭。

驻守薛家峁的高双城部一个连，得知刘仙嘴两排队伍向张家圪台开去，一个姓魏的连长也带着全连队伍从东边赶到张家圪台前来增援。谢子长得到情报，立即命令除部分人员清理战场外，组织红一、二支队为突击队，由路文昌带领出击。

魏连长到张家圪台，不闻枪响，才发觉刘仙嘴的两排队伍已被红军全部吃掉，惊慌地打算撤军返回，但为时已晚，在红一、二支队的猛烈攻击之下，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魏连长心中慌乱，不敢恋战，带着一连残部沿着无定河畔南逃，许多士兵慌不择路，落入无定河中淹死，魏连长只带着少数人脱逃。

河口镇战斗

张家圪台战斗后，部队遂进入清涧县东区的苏区。在清涧县东区的河口镇，设有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一个河防据点，驻守着高双城部五十五团三营的一个连及一些地主民团武装。

河口镇位于无定河与黄河的汇流之处，南与山西隔河相望。该连守军利用黄河沿岸的险要地形，在一座山顶筑有一个大碉堡，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易守不易攻，是清涧县东区的苏区边上一大障碍。为铲除这个据点，谢子长决定出兵攻打河口镇。

1934 年 8 月 26 日，谢子长调集附近几县的游击队和赤卫军 1000 余人，配合红军夜袭河口镇。苏区群众听说红军要攻打河口镇都非常高兴，许多人积极要求参加战斗。河口镇战斗遗址

河口镇战斗遗址

这天夜里，天降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当带路的向导把红军带到河口镇，已近凌晨。谢子长立即指挥部队，分兵两路包围了河口镇守军据点，打响进攻的枪声。红二十六军红三团从河西山顶上向守军据点大碉堡俯冲强攻。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从黄河渡口堵击，截断守军的退路。在红军四面夹击下，守军被迫放弃外围据点阵地，全部撤退到山顶的大碉堡里。守军连长姓董，凭借山顶大碉堡的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集中火力，负隅顽抗。红军数次发起冲锋，均未能攻克。

天色未亮前，由于地形复杂、敌我难辨，在红军几路部队进攻大碉堡时，因部队之间协作不好曾发生了一场误战。有一部分部队首先冲到守军挖设的战壕，后续的赤卫军接着冲到跟前，误以为已到战壕的部队是碉堡的守军，双方激战起来。当双方知道是自己的队伍时已误伤了许多人。战

斗打到天亮，驻守河口镇的守军虽损失惨重，处在既无援兵又无退路的穷途困境，但仍凭借山顶大碉堡的险要工事横下心要背水一战。

这时，谢子长亲自到前线，重新组织力量，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再次向碉堡守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不幸一颗子弹穿过谢子长的前胸，把他打了个趔趄，但他忍着疼痛，继续指挥战斗。当时，谢子长穿一件深紫色的夹衣，血涌出来后，一时不易被人发现，直到鲜血浸透夹衣、越流越多时，才被周围的郭洪涛等察觉，硬把他从火线搀下。

正在这时，群众送来情报，说高双城派出的援兵快赶到了。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王世泰等分析了情况，认为不宜再战，决定撤出战斗，部队转移到王家沟。

部队撤出河口镇后，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河口镇守军早吓破了胆。没几天，守军主动放弃河口镇，董连长带着残兵败将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告解放。

谢子长负伤后，因流血过多，身体很虚弱，同志们都很难过和忧虑。为稳定红军部队和群众的情绪，谢子长传出命令，对他负伤之事严加保密，不许声张。在行军途中，他坚持步行，把自己的马让给其他重伤员骑。同志们为给他补身体，搞到一点好吃的东西，他也送给重伤员。同志们劝他离队养伤，他固执地不肯离开战斗岗位，谁也说服不了他。谢子长说：“这点伤不要紧，随队比离队好。”

土黄梁山、董家寺战斗

9 月 2 日，高双城部驻守河口镇的一连守军逃回清涧县城。谢子长即派出白雪山带领红二支队，决定在河口镇守军必经的土黄梁山设伏，歼灭溃窜之敌。

土黄梁山距清涧县城不足 30 里，山大沟深，坡陡路险，草木茂盛。当红二支队赶到土黄梁山时，不料董连长带着一连队伍已经抢先爬上山头占领了山上有利地形。白雪山带领红二支队立即向山上发起冲锋。

激战正烈，突然山下大沟里又拥来 100 多人的一个民团，正好把游击队夹在半山腰。红二支队腹背受敌，战斗失利，白雪山带领队伍被迫向山

下突围。在突围战斗中，白雪山身负重伤，战士们背着他且战且退，赶到天黑转移到白李家河。

红二支队到了白李家河后，白雪山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于次日不幸牺牲，时年 29 岁。安葬白雪山后，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派兵掘墓扬尸，残忍地将白雪山的头颅割下运到清涧县城，高挂东门城楼示众。

9 月上旬，谢子长决定将红二、五支队留在绥德、清涧县一带，保卫苏区，开展游击战争，由红一支队和红三团挥师西进。谢子长不顾身负重伤，率领红军主力进入安定县，途经横山县董家寺时与高双城部高玉亭营遭遇。部队迅速抢占山头，以优势地形与高玉亭营激战数小时。红一支队和红三团虽有伤亡，但高玉亭营受到重创。天近黑时，高玉亭畏战自退，扔下满地尸体和武器带着残部逃走。

董家寺战斗后，谢子长率领红一支队和红三团途经咸榆公路时，发现高双城部的一个排从关中道抓来 200 多名壮丁，正要押送回安定县城。谢子长命令部队左右迂回，前后夹击，立即将押送壮丁的一个排包围。

此次战斗只进行了很短的时间就结束，押送壮丁的一排队伍和 200 多名壮丁当了俘虏，缴枪 20 余支。谢子长对所俘虏的 200 多名壮丁，在教育后当即释放回家。事后得知押送壮丁的该排排长正是在通润镇出卖王泰吉的马云从，可惜没有抓住，让他逃跑了。

陕北红军在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红三团的有力配合下，协同作战，仅用一个月的时问，歼俘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军队 300 多人、地方民团数百人，从军事上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9 月上旬，红三团配合陕北红军取得陕北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后，谢子长即令红三团暂返陕甘根据地。红三团从安定出发，经保安县穿过张廷芝控制的白区，奉命到达甘肃陇东的庆北地区，与庆北一带活动的庆阳游击队会合，开辟和扩大了庆北新的苏区。

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陕北根据地各地党组织由于准备不足、思想麻痹、经验缺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横山、绥德两个县委。中共横山县委书记吴志祥等七人被国民党杀害，县委瘫痪；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等被国民党杀害，县委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随着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安定、清涧、神木、葭县、吴堡、绥德六县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后称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主席分别为：安定县刘光显(后为薛兰斌)，清涧县白世杰，神木县呼子威，葭县王好明(后为高长直)，吴堡县李庆玉，绥德县王学善。

太和寨战斗

1934 年夏，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二五八旅刘润民部对神府红军的“围剿”之势，派杨文谟回到神木县，接替贾怀光任红三支队政委。

杨文谟，陕西神木县人，生于 1912 年。1928 年加入共产党。1929 年春考入榆林中学。1931 年由中共陕北特委派往陕甘游击队任骑兵连指导员。随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从终南山潜回西安，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出狱后，因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在西安未与党组织接上关系，遂返回陕北，一度留中共陕北特委机关工作。

6 月 9 日，红三支队正在孟家蠕村，得到共产党员黄进山的报告，称贾怀德民团的大队长王全誉带着五个团丁回到九洼村家里。王兆相、杨文谟得到报告后，立即带着游击队赶到九洼村，将王全誉的家包围，打死团丁一人，俘虏三人，缴枪五支，只有王全誉脱逃。战斗结束，杨文谟向三个被俘团丁宣传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各给一块大洋打发回家。

6 月 30 日，红三支队决定奔袭太和寨王进成民团。王进成是个恶霸地主，手下共有 22 个团丁，多是地痞、流氓和大烟鬼。这个民团驻地没有防御工事，距周围国民党的几个驻军和民团据点也很远。在拂晓之前，王兆相、杨文谟带着游击队，经 40 里急行军赶到太和寨，将王进成民团驻扎的一座庙宇包围。

这座庙宇叫三官庙，坐落在太和寨村的中央，北面依山，山坡上有块场院，庙南是高墙，有南北两个门。山坡场院一个放哨的团丁发现有响动，刚喊出“谁”字，王兆相已快步蹿到他跟前，双手抓住哨兵的枪低声喝道：“不准喊叫，再喊就打死你!”

这时，不知是哪个队员放了一枪，庙里的民团顿时乱成一团。王兆相

带着一路游击队冲下山坡，堵住庙宇的南门；杨文谟带着一路游击队直冲到三官庙的后墙，架起准备好的梯子很快登上庙宇的房顶；王进修带着一路游击队堵住庙宇的北门。团总王进成企图争夺庙宇房顶的制高点，却被房顶上杨文谟带着的游击队员一排子弹压下去，民团只好死守庙宇里边，负隅顽抗不出来。

这样对峙好长时间，直到太阳跃出了东山。王兆相、杨文谟、王进修共商后，决定放开庙宇的北门，利用民团溃逃之机将其消灭。

果不出所料，庙宇的北门刚一放开，团总王进成先让两个团丁冲出北门试探，接着把民团分成几股，三五成群地拥出北门。红三支队立即发起冲锋，枪声齐鸣，没等民团逃出村子，就缴了十几个团丁的枪。有四个团丁没命地逃上山坡，正好有几个农民在挖地，个个举起手里拿着的镢头，对着团丁们喊道："要想活命，就把枪和子弹放下!"几个团丁只好乖乖把枪和子弹放到地下。经过一场激战，红军俘虏团丁 20 人、缴枪 20 支，只有王进成带着一个马弁逃走。

战斗结束后，太和寨的群众为红三支队召开了庆功会。乡亲们端出热气腾腾的窝窝头和红枣稀饭慰劳红军，高兴地说："红军这下子可给咱老百姓除了一个大害啦!"

刘鸿飞阵前起义

1934 年 8 月 8 日，红三支队正在刘家洼村休整，菜园沟村的党组织派人来报告：地方赤卫队在几天前截获了国民党派兵送往县城的一批布匹物资，分给贫苦农民和赤卫队员，刘润民旅驻盘塘镇的连长鲁仰尼非常恼怒，派出一排长张崇俊为代连长，带着一、二两个排到菜园沟报复，已将全村百姓围困在一个崖窑里，正准备架柴放火烧死。

此时，王兆相得了伤寒，病得不能起床，即由王进修代理队长，当即与杨文谟带着红三支队朝菜园沟赶去。游击队一到菜园沟村北山梁上，周围几个村庄的党组织发动的上千名赤卫队员和群众闻讯赶来，配合红军作战。一时菜园沟村外的各个山头红旗招展，刀矛林立，爆竹齐鸣，喊杀声四起。游击队趁势向村里逼近，向张崇俊带着的两个排展开冲锋之势。

正在这时，张崇俊的阵地上有人喊道：“王兆相、杨文谟在不在?”

杨文谟听出是在盘塘镇驻军当二排长的共产党员刘鸿飞。刘鸿飞又名刘征西，陕西澄县人。杨文谟便大声喊：“刘征西，你现在还不起义等什么啊!”

杨文谟带着二中队顺着北山梁的地坎以几座乱坟作隐蔽，靠近刘鸿飞二排阵地。

不一会儿，刘鸿飞把自己的驳壳枪扔了过来，他所带的二排士兵见排长不战主动缴了枪，立即全都把手里的枪放下。

张崇俊见刘鸿飞所带的二排阵地起义，自感势孤力单，难与红军抵抗，被迫带着一排士兵乖乖举手投降。

菜园沟一战，对沙峁头、盘塘镇的驻军威慑不小，使其全部撤走，迫使刘润民对神府红军的“围剿”松弛下来。至此，红三支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100余支枪，并在神府地区形成一块长200余里、宽100余里的红色革命区域，普遍建立了农村基层党、团组织和革命政权。

神府党组织除在府谷县建立红七支队(队长张子玉，政委韩峰)、在神木县高家堡一带建立红十一支队(队长刘德)外，又在葭芦区组建起红二十一支队(队长王子杰)。同时，在神府各个区还成立了特务队，神府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空前高涨。

“扯包皮”斗争

1934年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红三团粉碎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第一次“围剿”的战斗期间，陕北各个苏区的群众，在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除组成赤卫队、少先队配合红军作战之外，还采取和利用各种斗争形式袭扰国民党军队。苏区的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特别对国民党的保甲制进行了一种釜底抽薪式被称为“扯包皮”(陕北方言。扯，撕裂，“包皮”即包袱皮)的斗争，粮草没人给、情报没人送，使国民党军队变成了“瞎子”和“聋子”，

李合邦

造成国民党军队的极大恐慌。

在清涧县东区的苏区，国民党军队强迫合并村庄、建立保甲制度，由于共产党的基础好，从表面看那些保甲长都是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而实际上多数是通过党组织秘密打进去的共产党员和开明绅士。未经党组织批准，根本没人敢当保甲长。有些反动分子和坏人误认为出头露面“反水”的时机到了，未经党组织批准当了保甲长，随时可能被农协会等革命组织拉出去秘密处决。因此，苏区的保甲长实际是为共产党干事，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得到的都是假情报，疲于奔波，见不到红军的影子。

清涧县东区的苏区，为把国民党军队撵出去，东二区区委书记李合邦和李景林、黄石山、李广业、贺占成、贺鸿应等采取“扯包皮”的做法：选择同一个晚上，通过农协会等革命组织发动群众，在各乡镇村庄统一行动，抓捕所有的保甲长，把共产党打入的保甲长藏起来，把那些死心塌地给国民党军队干事的坏保甲长统统拉出去秘密处决，再让家属到国民党那里告状要人。据崔田夫回忆，在绥德县南区(与清涧县东区连接)一次就秘密处决坏保长、甲长 36 人。

这一招使得国民党军队震惊非常，不敢在苏区久留，慌忙从清涧县的苏区撤出，转入国民党统治的白区。

由于红军部队与苏区群众团结一致，协同作战，共同抗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粉碎了井岳秀妄图歼灭陕北红军的全盘计划，并使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余县，红色村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9 月问，陕北地区已经形成村村相连的四块苏区和游击根据地：神府边区，绥、米、葭、吴边区，绥、清、延(川)边区和安定(包括横山、米西、绥西等地区)一带。

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扩大了党在陕北地区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并积累了反“围剿”的丰富斗争经验。井岳秀承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他在榆林《上郡日报》上这样坦白道：

近日陕北驻军多被赤匪缴械俘虏，驻军虽全力剿除，惟匪出没无常，时而千百成群，时而三五分散，难以奏效。

第六十四章

红军发展壮大

寺塌里会议

第一反“剿”胜利后，中共陕北特委认为，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巩固和大苏区，发展壮大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有田耕，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巩固农村阵地，使分割几县的红色苏区连在一起，把陕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十几个县扩展为红军游击根据地。

1934 年 7 月上旬，在清涧县花岩寺由马明方主持组建了一支特务队，高朗亭任队长，马佩勋任政委。特务队的主要任务是担负中共特委机关的警卫和筹集经费等工作。

8 月 28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嫣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寺塄里距清涧东区解家沟镇 10 里地，位于山上，村里有 20 余户人家，虽大多是富豪户，但户主均开明进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崔田夫、马明方、崔田民、郭洪涛、张达志、李铁轮、唐洪澄、自如冰等。当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的领导干部也出席了会议。谢子长因河口镇战斗中负重伤未参加。

这次会议上，中共陕北特委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陕北、陕甘边红军部队统一指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粉碎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围剿”的成绩。会议一致认为，扩大陕北红军力量、建立正规红军部队、保卫陕北苏区已是陕北党组织面对

的当务之急。会上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关于冲破“围剿”决议案》，并根据陕北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决定在苏区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分配(也叫土地革命)，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加强党与农民群众的凝聚力，军民同心，做好苏区的巩固发展工作。

同时，会议决定派人赴天津，向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请示，要求上级党组织派干部加强陕北工作，并给陕北红军颁发番号(后派崔田夫赴天津汇报请示)。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上级党组织未给陕北红军番号前，陕北红一、二、三支队在“最短时间内，各完成扩大一团红军的任务”，暂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二、三团，撤销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新的“围剿”做好思想上和战略上的准备。这次会议无论是对陕北红军扩大建制还是推进陕北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史称“寺嶝里会议”。

寺嶝里会议后，特委派郭洪涛和刚从中共北方局回陕北的鲁赍一起前往安定县，与谢子长先将红一支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简称红一团)。郭洪涛、鲁赍赶到安定县时，红一支队在谢子长的率领下，刚攻打安定县城取得胜利，游击队正处士气旺盛之时。

再打安定城

白应奎

陕北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苏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红军力量迅速壮大，红色村庄不断涌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这时，安定县城变成一座孤城，城内守军陷入一片惊恐。根据这一形势，谢子长决定率领红一支队攻打安定县城，消灭城内驻守的李丕成民团，以威慑驻军张建南部。在攻打安定县城之前，谢子长先通过打入李丕成民团的共产党员白应奎和刘光汉掌握了县城内敌情，并决定由白应奎和刘光汉做内应，以保证红军的顺

利进攻。

1934 年 9 月 15 日，谢子长带着重伤率领红一支队，从东沟村出发，午夜时分到达安定县城外。攻打县城前，谢子长在城东石公寺大庙院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他说：“我们攻打安定城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李丕成民团。每个战士都要明确打胜这一仗的重要意义，只要把李丕成民团消灭掉，安定县的其他几股民团就冰消瓦解了。”

随即，谢子长分兵三路：命谢绍安带领一个分队，直接摸到东城门前，与县城内的白应奎、刘光汉接头，设法打开东城门；命刘明山带领一个分队，在东城门打开后，冲入县城内直插后城，顶住张建南的队伍；命李胜堂带领一个分队准备阻击援兵，支援入城队伍。

谢绍安首先带领着分队摸到东城门前，按照预先约定的联络暗号，拍了两下手，早已在城上等候的刘光汉拍一下手，城内外接上头。接着，刘光汉偷偷打开城门，谢绍安、刘明山的两个分队相继潜入城内。

李丕成民团驻守在县城东门城楼。谢绍安、刘明山进入县城后，由刘光汉带到东门城楼上。这时，白应奎为稳住“大狼”李丕成、“二狼”李丕胜，正和二人在东门城楼里睡觉。

李丕成听到城楼外有响动，猛地坐起大声问道：“什么人?”

刘光汉把门帘一揭说：“不晓得怎么回事，来了许多人。”

李丕胜一听隋况不妙，举枪要朝门外开枪，谁知枪膛里的子弹早被白应奎卸掉。李丕胜慌忙提着空枪，一蹿从门里钻出，沿城墙逃跑了。

李丕成慌忙从被子底下抽枪，谢绍安一个箭步跨进门来，一跃跳上炕，骑在李丕成身上。白应奎扑过来，夺下李丕成手中的枪。谢绍安朝李丕成身上连打两枪，刘光汉又打一枪，李丕成当即毙命。驻守东门城楼的民团见李丕成被击毙，全部缴枪投降。

驻守在后城北门上的张建南听到城东门枪响，急忙派兵前来增援，但因天黑摸不清城东门的情况，刚出动就遇到刘明山带着的红军阻击，被一阵乱枪打得退了回去。谢子长和贺晋年率领大部队从城东门冲进城内，命令火烧东门城楼，然后胜利撤出城外。

部队撤出县城时，战士们还不解恨，用老麻油浇到李丕成的尸体上，

同东门城楼一起焚于大火之中。红一支队再次攻打安定，使得张建南和城内四大绅士心惊胆战，不敢在安定县城停留，弃城而逃。

9 月 18 日，部队集结到安定县崖窑沟村，在谢子长的主持下，将红一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简称红一团)，任命贺晋年为团长，马佩勋为政委，路文昌为参谋长，下辖两个连，一连长陈文保，二连长李仲英，全团共 100 多人、枪不足百支。在改编大会上，郭洪涛代表特委讲了话，鲁贲代表中共北方局讲了话。谢子长亲自给红一团授了军旗。

安定民团起义

不久，栾新春、贺吉祥领导的安定临时红八支队归编为红一团第三连。对于临时红八支队的组建，在此略作介绍。

1933 年 11 月问红一支队战斗失利埋枪散伙后，栾新春与贺吉祥等打人安定县折可达民团。栾新春利用与团总折可达的儿子折广结为拜把子弟兄的关系，取得了折可达的信任。在栾新春、贺吉祥等秘密活动下，民团里发展了吴化周、苗海水、高贵明、李贤成等共产党员。

贺吉祥

1934 年 6 月间，栾新春、贺吉祥等接到安定县党组织的指示，要他们在民团中立即发动起义。当时，折可达民团有 50 余人，除留守寨子的十余人外，大部分人外出未归。栾新春、贺吉祥原准备拉出的团丁中就有十几人不在寨子里。

栾新春、贺吉祥等经研究，决定不再等待原准备参加起义的外差人员，在寨子里立即举行民团起义。栾新春带着组织好的 5 人，在民团里提走长枪 3 支、机枪 4 挺，并将民团在寨子内的子弹全部带走。正当起义人员要离开山寨时，被留守的民团队长李维俊发觉，李企图阻挡，被起义人员打伤后逃跑。

7 月 15 日，栾新春、贺吉祥带着起义队伍到了贺家湾，与魏国亮、刘

明山接上头。魏国亮、刘明山暂将起义队伍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八支队(简称临时红八支队)，由栾新春任队长，贺吉祥任副队长，刘明山任政委。

时隔不久，继续留在折可达民团的共产党员李广胜、李贤臣、苗海水、封治忠等，在党组织派人民团的王凤宽等策动下，二次举行了起义。这次民团起义，王风宽等将民团中剩余的 30 余人和 20 余支枪全部拉出，先暂编到临时第八支队。从此，折可达民团一蹶不振，折可达几乎成了个“光杆团总”。

紧接着，通过安定县民团团总黄天喜的女儿黄凤莲的关系打人黄天喜民团的共产党员冯俊德及白奇娃、魏学清等，经一番策反活动，在黄天喜民团内举行起义的条件成熟。一日，冯俊德、白奇娃、魏学清等随黄天喜带着 20 多个团丁外出，到十里铺时，乘机打死团总黄天喜，带领民团起义，投到红一团。红一团在短短时间内兵力猛增，全团很快发展到 200 多人、100 多支枪。

9 月 18 日，活动在神府一带的红三支队集结在神木县王家庄。在王家庄召开了神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呼子威为主席。在会上，宣布将红三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简称红三团)，任命王兆相为团长，杨文谟为政委，刘鸿飞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一连连长王进修、指导员贾如胜，二连连长刘德、指导员马尚前，三连连长贺伟、指导员刘镇华，骑兵连连长柴瑞。

11 月 4 日，活动在清涧、绥德、吴堡等县一带的红二支队集结在清涧县东区小马家山村，由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一说郭洪涛)主持，将红二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二团(简称红二团)，任命郭育仁为团长，马万里为政委，惠世良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步兵连、一个学兵连，有 300 余人。

万镇起义

1934 年红三团成立不久，刘润民部高锡耿营和杨相枝营合举重兵，向神府南区发动“围剿”。红三团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突出刘润民部的

包围圈，转出外线，挺军北上。

9 月下旬，红三团直插府谷县境内的新民镇，长途奔袭，全歼镇上驻守的民团，缴枪十余支。后部队与韩峰、张子玉带领的红七支队在木瓜堡一带会合，继续北上至府谷县北区重镇哈拉寨。

哈拉寨地处陕蒙交界，镇上住数百户人家，店铺很多，是蒙汉通商的重要集市。在镇上驻守一个民团，红三团采取奇兵奔袭的战术，一举将这个民团消灭，并处决了联保主任赵智。部队在哈拉寨斗了几家豪绅地主，把他们的粮食、牛羊分给了当地群众。

红三团进入哈拉寨后活动了几天。一天，抓住闯入镇上的五个蒙古族骑兵，一盘问才知道他们是准格尔旗一个蒙古骑兵营的人。这个骑兵营距镇子不足 10 里路，经常来哈拉寨购买日用物品。红三团为了避免与该骑兵营发生冲突，便将扣住的五个骑兵全部放回，并给骑兵营长捎去一封信，说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称红军不打他们，也希望他们不干扰红军。

不料这几个骑兵被放回去后，却引来更多的骑兵。他们不敢闯入镇子，只在哈拉寨外的山头上不停地放枪，进行试探。红三团坚持不还击、不理睬的姿态，那些骑兵闹腾了一阵子，这才放心地自行撤走。后刘润民派兵尾追红三团北上至哈拉寨时，红三团巧妙甩开追兵，绕回神府南区。

11 月间，在驻守万镇的刘润民部五一二团张孝先连中担任文书的张德超通过万镇交通站的马世超与毛凤翔接上关系，联络了十几个士兵准备起义，约定好时问，到时要红三团前往接应，并策划好里应外合歼灭张孝先连。

起义的当晚，张德超设法将连长张孝先等安排在一个窑洞里，让他们尽兴地打麻将，暗中派人秘密监视，又派人把存放武器弹药的窑洞控制起来，等待红三团前来接应。

张德超，陕西葭县人，受特委派遣一直在该连开展兵运活动，与特委负责人张达志单线联系。当时，红三团的领导人对张德超的真实身份不了解，担心上当受骗。当红三团开到万镇山上，一时犹豫不决，不敢下山到镇上去接应 (一说因红三团路线不熟，行军延时而迟到)。原约定半夜发动起义，张德超一直快等到天亮，眼看着张孝先等人打麻将也准备散场了，

还不见红三团前来接应。这时，张德超果断发出起义信号。参加起义的吴振东向打麻将的窑前甩出一颗手榴弹，但未将张孝先炸死。

张德超立即控制队伍，将张孝先连的半数士兵拉出万镇。但由于红三团未能及时接应，拉出的士兵途中大部分又跑回镇里。起义队伍开到了石牛墙，得到红三团的接应时，张德超只带出姜安雄、薛云祥、石玉山、高育才、吴振东等十几个人和 20 余支枪。

在万镇的这次起义把张孝先吓成惊弓之鸟，他慌忙把镇上的一连驻军撤出溜走。刘润民部设在神府南区几处据点的军队也不敢在南区久驻，纷纷北迁到神木县城附近。至此，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刘润民部对神府南区第一次的“围剿”被粉碎。

开辟新局面

1934 年陕北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各地革命形势出现空前的新高潮。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寺嫣里会议精神，除原红一、二、三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独立师的三个团，初建起一支较有规模并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红军部队外，各县游击武装力量如同燎原之火，从数量、规模上迅速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时，红色苏区扩大，原处于国民党军事割据局势中的几块红色苏区也迅速连接在一起。

陕北红军独立师一、二、三团成立后，在安定、清涧、神府又相继组建新红一、二、三支队。安定县新红一支队，队长姬占庭，政委刘明山，活动在安定、安塞两县一带。清涧县新红二支队，队长惠永康，政委惠自安，活动在清涧、延川两县一带。神府新红三支队，队长贾兰枝，活动在神木县一带。

在陕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已成立十多支游击队的基础上，绥德县五区成立了红十二支队，队长梁凤鸣，政委马龙飞，活动在绥德县梁家甲、深沟、前后坪、郭家坪一带；靖边县青阳岔成立了红十三支队，队长王锦秀，政委贺树槐，活动在靖边、横山两县交界一带；绥德县六区成立了红十四支队，队长吴创业，政委刘九宫，活动在绥德县北区一带；米脂县东区成立了红十五支队，队长高尚乐，政委白宝山，活动在葭县、米脂、吴堡三县

交界处；延川县成立了红十七支队，队长杨兴元，政委高志安，活动在延川、清涧、安定三县交界处；同时，在陕蒙交界处成立了骑兵游击队，队长曹动之，活动在乌审旗、鄂托克旗及陕北长城脚下。

新建立的红十三支队，由王锦秀领导的游击队和李应祥大刀队及地方部分赤卫军骨干组成，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游击武装。在组建红十三支队之前的 9 月中旬，王锦秀的游击队在王治邦、王志福、顾老九组织 200 多名赤卫军的配合下，曾先后攻打靖边县张家崖窑郭长林民团和沈家圪崂崖窑沈桂芳民团，两仗皆胜。在攻打郭长林民团时，缴得 7 支长枪；奔袭沈家圪崂崖窑沈桂芳民团采取火攻战术，除团总沈桂芳躲在厕所逃脱外，其余团丁均被大火烧死红十三支队成立后，与横山红八支队活动在靖边、横山两县交界。11 月中旬，在王干沟子与反动神团“义拳道”遭遇，一场激战全歼神团队伍，活捉神团团总张步格，就地处决。

至此，红十三支队和红八支队将靖边、横山两县交界的畔沟、高家沟、杨桥畔、龙洲、海则滩一带开辟为红军游击区域。后红十三支队和红八支队归编第三纵队。

根据中共陕北特委寺蛓里会议精神，陕北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神木、府谷、米脂、横山、葭县、吴堡、绥德、清涧、安定、赤源(在绥德、清涧、安定三县交界处)、延川、靖边等 14 个县相继建立县、区、乡革命委员会政权。苏区不断扩大，除神府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在榆林之北外，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

当时，陕北北部和中部地区的苏区大概分四大区域：安定、延川苏区，绥德、清涧苏区，葭县、吴堡苏区，神府苏区。

安定、延川苏区主要范围是安定、赤源(赤源又划分为赤源、秀延、重远三县)、横山、延川、安塞、肤施等县一带；绥德、清涧苏区主要范围是北接绥德县义合、吴堡县宋家川，南连延川县东区一带；

葭县、吴堡苏区主要范围是米脂县东部，北起葭县店头，南至绥德县吉镇、吴堡县慕家塬一带；

神府苏区主要范围是神木、府谷两县境内沿黄河岸边，南连榆林县建安堡、葭县通镇以北一带。

第六十五章

根据地建设

清涧县土地分配试点

1934 年 8 月寺塬里会议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在清涧县东区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基础好的袁家沟、疙坰洼等几个村庄(一说在鱼家塬、白家塬等村庄)首先搞分配土地的试点(又称土地革命)，以便取得经验，在整个陕北苏区内广泛推行。特委派出郭洪涛、马明方等人具体领导分配土地的试点工作。

当时，在清涧县东区的二郎山举办了干部训练班，王士英担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每期 10 天，每期 20 余人参加，学习党有关政权建设、土地分配的指示和法令等。训练班连续举办四期，培训干部近 100 人。到 1935 年 1 月，这个训练班正式改为中共陕北特委党校，校址迁到安定县，后又迁至永坪镇。

由于根据地不稳定、共产党的政权不健全、红军队伍力量弱小且流动不定，许多地方虽然曾轰轰烈烈地搞打土豪斗地主，但开展给贫苦农民分田分地的运动实为一种革命口号而已。因为当时陕北党组织既没有形成较完整的土地分配政策，群众又怕分到的土地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权来保证耕种，红军走后遭到国民党的报复，所以，多数地方红军来了分土地，红军走了退土地，有不少农民名义上分到了土地，却暗中向地主租种，形成明分暗租的土地耕种关系。如在清涧县东区有个大地主叫李德茂，家有数百亩良田，地方农民协会把他的土地分给农民，家藏的几百石粮食也被分个精光，但到次年，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再次去他家时，发现因分到土地的农

民心理上的恐惧感没有根本消除，与他形成明分暗租的土地耕种关系，仅农民用黄豆缴去的一年的租子，他家就添人粮仓达 60 余石。

这次在分配土地试点工作中，把农村的阶级成分划分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红军战士和革命分子等几个层次。地主是全家人的生活完全靠剥削、土地出租、放高利贷、雇佣人、不劳而食者；富农是全家人的生活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收入、少部分土地出租、放有少量高利贷、雇佣长短工两人以下者；富裕中农是自己有土地、全家人生活全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在农忙季节雇有少量短工者；中农是自己有土地、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自劳自足者；下中农是自己有土地而不足、还少量租种土地者；贫农是自己有少量土地、大部租种和伙种土地、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者；雇农是自己没有土地、全家人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者。

在袁家沟，分配土地的主要政策和做法是：①没收地主豪绅和富农的土地；②中农土地不动；③红军、贫雇农分好地；④参加革命的富农子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⑤参加革命的地主子女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⑥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娶妻)。

在分配土地中，把贫农、雇农和可靠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贫农会，专门负责分配土地工作，其权力很大。贫农会根据分配土地政策，按照农村阶级成分、家庭人口、年龄和性别等情况，经研究讨论后将土地分配给每家每户，然后张榜公布，并给分配到土地的农民颁发由县级革命政府印制的土地证。广大贫农、雇农得到土地，拿着土地证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地庆祝获得革命胜利果实。

通过试点取得了经验，然后组织培训干部，把训练后的干部派到各县帮助分配土地的工作。在试点推广工作中，吴堡、绥德、葭县、神府等县苏区学习清涧试点经验期间，虽然由于缺乏经验，出现过一些不妥的做法，有些村庄也发生过偏差，如在销毁地主、富农的文约和账簿时，连同商人、中农、贫农的一切文约和账簿全部烧毁，影响了商人与农民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债权利益等等。但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土地革

命运动，它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解除了反动政权强加给广大农民的苛重捐税，废除了高利盘剥等。特别是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直接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广大贫苦农民庆幸自己当上了土地的主人，他们通过分配土地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思想觉悟，增强了为革命斗争的积极性，把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参军参战、站岗放哨、肃反锄奸等都作为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自觉行动，对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当时，陕北苏区传唱着一首歌谣：

哥哥当兵挎上枪，
妹妹捎信队伍上，
家里分地又分粮，
分回耕牛还有羊；
地富账簿全烧光，
男女老少喜洋洋，
哥哥前方打胜仗，
妹妹在家革命忙。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对陕北根据地的这次土地革命运动的成果给予了肯定。尽管一些县在分配土地中出现极“左”的错误做法，中共中央做过政策方面的调整和纠正，但仍批判了一些别有用心者诋毁“过去一切都错了”的谣言。由于多数县分配土地的政策对、做法妥、社会效果好，苏区农民分到的土地一直稳定地延续到 1947 年至 1950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农民土地变化情况重新进行第二次土地登记分配的时候。

打破经济封锁

陕北根据地在粉碎了井岳秀的第一次“围剿”后，出现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井岳秀由于在军事上失败，损兵折将，显得束手无策、慌乱不堪，一边向蒋介石告急，请求调集国民党大部队到陕北对陕北红军进行围歼，一边对陕北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

当时，群众把国民党占领的统治区叫做“白区”，把苏区称做“红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武装加强了红白区交界处的军事布防措施，割断与苏区的一切经济、物资交往甚至农民群众之间的往来，凡从红区进入白区或从白区进入红区走亲访友的老少男女均予严加盘查，稍有嫌疑就关起来，严刑拷打进行审讯，有不少人被冠以“赤匪分子”横遭杀身之祸。

刘玉春

井岳秀的经济封锁，使得陕北红军在武器弹药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无法从外购买运进武器，子弹用完得不到补充，严重影响到部队战斗力，许多红军战士仅能配到几发子弹，有的红军战士甚至扛的是全无一粒子弹的空枪。

为了解决红军部队武器弹药不足的问题，清涧县苏维埃政府从河南聘请铁匠赵文方、姚文德二人，又通过此二人动员来河南铁匠 17 人，并赶着骡子运来两驮钢管原料，在清涧东区办起了兵工厂，自制步枪四五十支，还打造了许多大刀、长矛。

兵工厂办起后，仅有大批铁匠不行，有许多技术问题无法解决。时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的刘玉春打听到阎锡山部太原兵工厂一个技工探亲回到山西乡下家中，即派几名共产党员划着牛皮筏子，偷渡到黄河东岸，像抢宝贝一样把他从家里“抢”到兵工厂。兵工厂里的其他工人吃的是小米饭和咸菜，给这个技工是特殊待遇，吃的是白面和猪羊鸡鱼肉。这个技工刚来时对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共产党非常害怕，后来他风趣地说：“早知共产党待人这样好，不用你们‘抢’，我自己就找上门来了。”

刘玉春，化名工人，陕西清涧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念过几年冬书。1927 年由唐洪澄介绍加入共产党。1930 年任王家坬村党支部书记。1934 年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1936 年在保护群众转移中不幸牺牲，时年 26 岁。

在这个技工的技术指导下，兵工厂越办越红火，为红军部队粉碎国民党第二、第三次“围剿”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这个兵工厂一直办到

1936 年春才转移到瓦窑堡，组合成中央供给部兵工厂。

中共吴堡县委派出刘义维、贾治华从河南聘请来郑、黄两位技术人员和十多名铁匠，在吴堡县李常家山村的一个石洞及几个村庄办起兵工厂，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赶制大刀、长矛 1000 余把，并制造长短突角牛枪 100 余支、木头盒子枪 200 余支、手榴弹 100 余枚、地雷 50 余颗、子弹 3000 余发。1934 年 10 月这个兵工厂遭国民党军特破坏停办。

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给苏区群众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小到日用的火柴、食盐，大至穿用的棉花布匹和医治疾病的药物，都成了禁运物资。没有火柴，群众就到河边捡一种含磷的卵石，再找些小块生铁，家家户户用卵石与生铁摩擦取火造炊；没有食盐，有的群众就到沟河湿地把渗出的硝土取回，将过滤后的苦涩之水当食盐使用，不少人因食用过量，出现头疼、目眩、呕吐、腹泻的中毒症状。

为了摆脱经济封锁给苏区人民带来的物质困难，陕北各县苏维埃政府除利用开明地主和商贩通过社会关系到绥远、宁夏等地筹购生活日用物资外，运送各种物资的主要通道是苏区葭、吴、绥、清四县黄河沿岸的水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虽然在黄河东岸派有重兵把守各个渡口，禁封了两岸过往船只，配合陕北井岳秀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但苏区沿黄河弯弯曲曲数百里长的河岸一线，居住的农民多是泅渡黄河的好水手，他们划着牛皮、羊皮做成的筏子，避开晋军驻守重兵的渡口，在黄河两岸任意选择起渡和落渡的地方。

苏区政府将这些水手组织起来，把大烟土和银洋装入牛皮、羊皮筏子里，利用夜问泅渡到河东的山西境内，从太原、汾阳等地筹购物资，再用牛皮、羊皮筏子运回陕北苏区。

另外，为使经济封锁下盼农民群众之问在物资上互通有无，苏区在开放搞活集镇贸易市场的同时，鼓励农村中的小商贩和货郎设点摆摊，走村串户，灵活多样地进行小型贸易活动，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谢子长带病工作

1934 年 10 月 5 日，刘志丹派杨森率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二次

北上陕北，协同刚改编的陕北红军独立师作战。红三团首挺延川县，在延川县红九支队配合下，与驻守安定县交界湫峪沟高双城部一个新兵连交战，将新兵连击溃，乘胜追至清涧县折家坪镇全歼其残部。

10 月 10 日，杨森率红三团与陕北红军独立师红一团合兵一处，在安定县长蛇湾打击了高双城部一个连。由于两军协同不周，该连虽受重挫，但有一部分逃跑。此一战后，杨森即率红三团返回陕甘边苏区。

10 月 13 日，陕北红军独立师红一团在玉家湾伏击二五六旅张云衢的炮兵营时，因计划不周，虽击溃炮兵营，但在战斗中团长贺晋年和政委马佩勋都负了伤。

这时，谢子长虽身负重伤，仍一直坚持工作。一天，谢子长在安定县涧峪岔参加了自卫军成立大会，刚转移到新庄塬，就接到红一团送来的一封信。谢子长打开一看，吃了一惊：贺晋年在玉家湾战斗中负了重伤，住在玉家渠养伤。

谢子长不顾自己的伤痛，第二天立即骑马赶到玉家渠看望贺晋年。

一见面，贺晋年连忙支着胳膊坐起来。谢子长便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得很紧张。”

贺晋年非常激动，因谢子长负了重伤，还骑马走好长的路来看望他，十分感激地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打伤肠子，你放心吧。”

当谢子长看见贺晋年用白开水洗伤口时，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锰氧。”

其实贺晋年知道，这时井岳秀对陕北苏区正在实行经济封锁，别说红军战士负伤得不到药物治疗，就是谢子长负了这样的重伤，也没弄到点药，都是用农村传统的土办法，把南瓜瓤贴在伤口上解毒消炎。

村民们听说谢子长来了，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望他，把院子都挤满了。房东见谢子长来了，更是亲热得不得了，一定要给他做荷包鸡蛋面条吃。老乡家里没有纯麦面，拿出家里最好的麦面掺豆面，做了两碗端给谢子长和贺晋年。谢子长边吃边说：“面条硬了点。”

贺晋年知道谢子长有胃病，说道：“吃着不舒服，就不要吃了。”

谢子长感情真挚地说：“老乡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不吃，老乡会难过的，他们会说老谢连面条都嫌不好吃，这就不好了。”

贺晋年还想劝谢子长少吃点，谢子长用筷子指了指面条，说：“它就是铁条，我也要把它吃下去。”

谢子长离开玉家渠时，对贺晋年再三安慰，嘱咐要他好好养伤。在返回路上，谢子长对贺晋年的负伤很是惋惜，向随从人员说：“这个人很能打仗。这一下，要恢复又得一个时期了。”

史秀云

有一次，在安定县湫滩沟召开赤卫军大会，谢子长又不顾重伤去参加。到了湫滩沟，大家听说老谢来了，都要求见他，但他已躺在窑洞里的炕上不能起来，只好让妻子史秀云代他到会上给大家讲话。在这个会上，赤卫军请来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原是红枪会的在会上给群众宣传“硬肚术”，说什么有了“硬肚术”，就可以“刀枪不入”。

谢子长听说后，让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会上向群众解释，说：“这个玩意儿骗国民党可以，可不能骗自己人。咱们共产党不能讲迷信。”

高岗到会上向群众一解释，那个教练不服气，硬要当场试给群众看。高岗将情况报告谢子长后，谢子长很为难：若不试，赤卫军会相信这个人的“硬肚术”；若要真试，一定会把那个教练打死的。最后，谢子长、高岗和在场的一些负责人商量再三，决定当场验证，以教育大家。结果一枪打在那个教练肚子上，他当即死了。在场群众这才不相信什么“硬肚术”了。

10 月底，贺晋年的伤逐渐好了。一天，谢子长和贺晋年骑马到村外散心。两人边说边走，当谈到井岳秀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情况时，谢子长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部队来陕北。这样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就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

必然给我们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高桂滋。”

当谈到陕北根据地近两个月来的大发展，尤其是在寺塄里会议后，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穷苦老百姓分到土地，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革命情绪高涨，谢子长兴奋不已。他谈到自己伤养好后如何带领红军、打破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等时，对革命充满希望，对未来充满憧憬。谢子长对贺晋年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我看不然。历史上陕北出了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像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我看陕北倒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主，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

不久，贺晋年伤愈，到灯盏湾向养伤的谢子长告别，重返红一团。临别时，谢子长交给贺晋年一个任务，要贺晋年到安塞县吊儿沟找薛应昌，要薛应昌把安塞县民团拉出来，公开打出红旗。当时，薛应昌的父亲是这个民团团总。

11 月间，贺晋年回到部队，带领红一团到安塞，驻扎在离吊儿沟 20 里的一个村庄，派人把薛应昌找来。贺晋年当面给薛应昌传达了谢子长的指示。薛应昌满口答应，表示在春节时一定把民团拉出来。但薛应昌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先借口说肤施高双城给民团的 20 支枪还没有运到，后又找其他借口，一直不行动。

黄翰视察陕北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陕北特委根据寺蛵里会议精神和具体实施情况，向中共北方局报告陕北“已争取到神、葭、吴、绥、清、安六个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两团红军(报告之时，仅组建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三团，第二团还未组建)、11 个游击支队的创造，农民斗争的潮流已经普遍地扩大到十数县的县境内，陕北党正在为打通几个苏区与完成一师铁的红军而斗争”，并派崔田夫亲自去天津汇报工作。

10 月 22 日，中共河北省委给陕北特委送来指示，错误地批评陕北党组织的工作跟不上形势，指责陕北特委有“浓厚的富农路线，阻碍党彻底坚

决普遍去开展群众的斗争”“这种严重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着”等等。

11 月，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到天津给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了陕北党组织的工作。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听了汇报后，认为陕北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决定派黄翰到陕北考察。

黄翰作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所派巡视员与崔田夫从天津到陕北苏区。在清涧找到中共陕北特委机关，由黄翰代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向陕北特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陕北苏区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将陕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并将陆续给陕北苏区派遣一批文化干部。

当时，留守在中共陕北党、团特委机关的只有郭洪涛、李铁轮两个委员，其他委员都到各县视察工作去了。郭洪涛、李铁轮与黄翰就如何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向黄翰汇报了在陕北苏区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农民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

根据陕北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陕北苏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郭洪涛向黄翰建议：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迅速调来陕北，协同陕北军民开展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黄翰采纳了这些建议，并写信给中共陕甘边特委，指示统一陕北、陕甘边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红军，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

黄翰在陕北苏区视察工作十多天，即返回天津。不久，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彭飞来到陕北。

第六十六章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第二次“围剿”

陕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政府在陕北地区的统治。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陆续调集了陕、甘、宁、晋、绥 5 省国民党 6 个师 30 个团约 5 万人的兵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马鸿宾

这次，蒋介石的“围剿”部署是以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两个团进攻神府苏区，五个团由保安、横山、靖边出大理河，在安定、绥德、清涧的左翼构成包围线；又调高桂滋第八十四师的四个团，从山西西渡入陕，分别深入吴堡、绥德、清涧、安定苏区一带形成右翼包围线；调山西孙楚第七十一师三个旅和李生达第七十二师两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并派二 0 六旅先行占据吴堡、绥德一线；调第十七路军冯钦哉一个师四个团，到宜君、中部、洛川、鄜县、延长、延川、宜川地区一带，构成南线包围之势；调绥远傅作义一个骑兵师，到府谷、神木、横山沿长城一带堵截。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集马鸿逵第十五路军、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七个团从甘宁西出，进驻陕甘边曲子、合水、庆阳、华池，杨步飞第六十一师六个团分别南上，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一带，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蒋介石采取分区“围剿”的方针，企图使陕北、陕甘边两支红军部队相互不能顾及，分而隔之，隔而围之，围而歼之。

国民党吸取了在陕北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围堵结合、分区“清剿”的办法，部队一进苏区就修堡筑垒，合并村庄，步步为营；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推行保甲制度，成立“反共清乡团”“反共肃反委员会”“铲共义勇队”等，加紧反共宣传。

高桂滋的军队一马当先，率先开进陕北。高桂滋所部骄横狂妄至极，根本就没把中共和中共所领导的陕北红军看在眼里，以为不用数月工夫，即可全歼苏区红军。

高桂滋部的“围剿”区域是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四县。高桂滋把师部设到绥德县城后，即命高建白旅把清涧县东区作为区域重点，采用地毯式的搜索，从清涧县东区黄河沿岸开始，勾结地方民团和反动组织，不漏一村一庄、一家一户，满山遍野地像蚂蚁一样向西围歼而来，故当地群众称之为“漫漫军”。高桂滋部在经过的石盘、高杰村、解家沟、店则沟等地设立据点，派出重兵把守，并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清涧县城南门外，一次就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42 人，史称“清涧血案”。

这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又得到了扩大和发展，在甘泉、邠县、宜君、中部、洛川、肤施、西靖边七个县新组建起七支红军游击队，积极地配合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陕甘边及陕北南部地区的作战。在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鄜县、甘泉等 18 个县相继建立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委员会政权，各县都有自己的游击队。红四十二师时已发展到 1500 多人，由原来的两个团扩编到五个团。即原有红三团、骑兵团外，又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直属特务队为基础新编红一团，陈国栋为团长，张仲良为政委，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以第二路游击队为基础新编红二团，刘景范为团长，胡彦英为政委，孔令甫为副团长，王生荣为参谋

长，朱奎为政治处主任，下辖两个连、一个少年先锋队；还有以郭宝珊为司令、任浪华为政委的义勇军(团建制)。

在各县游击队的配合下，红四十二师主力先后打退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几次进攻。10 月 26 日，红二、三团在头道川的新寨、白家屯消灭王希清、王定邦民团后，不但使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为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之间国民党军事分割、迅速连成一片奠定了基础。

11 月 1 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根据地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工人、农民、红军代表 100 多人参加讨论，决定将临时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政权机关，即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通过选举产生了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政治秘书蔡子伟 (后为张文华)。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土地委员李生华，劳动委员张钦贤，财政委员杨玉亭，粮食委员呼志禄，肃反委员郝文明，工农监察委员惠子俊，文化委员蔡子伟(兼)，妇女委员高敏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 18 个县革命委员会，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兼)，副主席李彦；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兼)，秘书张策；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副主席高世清等。

在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赤卫军总指挥朱子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会上，讨论了根据地建设方面的许多重大问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形成了苏区根据地法制建设的雏形。

11 月 7 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宣布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讲话后，军委主席刘志丹也讲了话，他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这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流血牺牲取得的。我们虽在耀县、保安、华池等许多县建立了县、区、乡政府，但国民党还没有完全被摧毁，我们的政府还在

乡村。过去受剥削受压迫，就因为没有自己的政府。”

大会上，刘志丹、高岗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在河川平台举行了阅兵仪式。红四十二师各团及一、二路游击队，还有地方赤卫军、少先队等武装队伍，列成十多路纵队接受检阅。河川草坪上，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生和来自各地的群众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阅兵结束后，红二团和保安游击队互相配合，袭击了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金鼎山寨和旦八山寨。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的中共陕甘边党组织已经走上逐步成熟的道路。在陕甘边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布质苏票流通、禁赌、放足、禁烟的同时，为稳定陕甘边根据地，在联合、分化、瓦解、镇压地方民团和土匪势力的问题上实行了不同策略、区别对待，团结了一大批可能联合的地方民团和土匪队伍，使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郭宝珊起义

值得一提的是黄龙山的郭宝珊。郭宝珊，河南南乐县人，幼年随父逃荒到陕北黄龙县，1929 年投洛川县张金贵部当兵，后投冯玉祥部。1930 年冬，随冯玉祥部出兵河南，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回到陕北黄龙县，但因反动派的剥削压榨，家破人亡，即挑头组织义勇军，被逼上黄龙山，当了“山大王”，打富济贫，除暴安良。他上黄龙山后，由于严格约束部下，不欺侮百姓，部队发展很快，不长时间就聚集到四五百人。

郭宝珊

当时，黄龙山势力最大的土匪头子贾德功、梁占魁预感郭宝珊的 “山头”

发展太快，必将损害他们的利益，便以诱骗等手段打击郭宝珊这股新生的“山头”势力。郭宝珊深知贾、梁二人心狠手辣，如自成体系，不入贾、梁之伙，就随时有被吃掉的危险，只得表面上投靠梁部，当了个营长，但心里对贾、梁十分憎恶，一直貌合神离。

早在 1931 年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在陕甘边闹革命时，曾多次通过哥老会的人捎书带信，争取郭宝珊弃暗投明。郭宝珊当时也有同情红军的思想倾向，虽让其部下也效仿红军，只打“富户老财”，不准祸害百姓，但对共产党的性质一无所知，只是避免跟红军打仗而已。

1934 年夏，陕甘边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军威大震。刘志丹分析郭宝珊的出身、经历和所作所为，认为他是一个有可能争取到革命阵营的对象，便派黄罗武到黄龙山，策动郭宝珊投奔红军。

当时，正值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子恒部威胁利诱匪首贾德功、梁占魁归编，郭宝珊被卷在贾德功、梁占魁的队伍里，开到甘肃庆阳县接受杨子恒的收编。路经太白县一带短驻时，刘志丹又派人同郭宝珊联系，并赠送了些慰问品。郭宝珊通过哥老会的关系给红军捎来信，虽表示愿意投靠红军，但仍因对共产党和红军不太了解，怕投靠了红军会像杨谋子一样被杀掉，心里举棋不定。

杨谋子也是黄龙山的一个土匪头子，曾经刘志丹、高岗的争取归编了红军。杨谋子的土匪队伍里有一大群大烟鬼，怕吃苦，贪享受，昼夜行军嫌累，冲锋陷阵怕死，整天到处侵犯群众利益，搜刮钱财买大烟抽。红军有严明的群众纪律，所以，刘志丹最后下决心在合水县以东的蒿嘴铺一举将他们歼灭，枪毙了杨谋子等首要分子。

贾德功、梁占魁的队伍开到合水县一带，刘志丹又派马锡五去与郭宝珊联系谈判。当时，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作战，南梁苏区只有第二路游击队留守。贾德功、梁占魁等准备乘隙袭击游击队，妄图向杨子恒邀功。后因游击队事先有防备，加之郭宝珊极力出面制止，袭击事件未发生。

10 月中旬，国民党杨步飞第六十一师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三个旅兵力将贾德功、梁占魁的队伍包围，强行收编。这时，经刘志丹、高岗等联

合做工作，郭宝珊最终选择脱离贾德功、梁占魁的队伍。

10 月 20 日，郭宝珊毅然决定起义，率所部 120 余人进入庆北苏区的柔远川张湾。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将郭宝珊的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简称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后由黄罗斌任政委)，于振学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陶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任队长。

一天早晨，刚收编的郭宝珊义勇军正待开拔时，部队借宿的一家房东突然抱住郭宝珊的腿大哭起来，说家里有一个锡铁酒壶丢了。郭宝珊听后即对义勇军的每个人搜查。结果在两个跟他十几年的随从身上搜出了房东的锡铁酒壶，还有几个锡铁酒杯。郭宝珊把锡铁酒器归还房东后，立即下令将这两个随从开除出队伍。高岗对郭宝珊的这两个随从的偷盗行为很气愤，骂了声“匪性不改”。这一下激得郭宝珊失去理智，立即骑马追上两个随从，用马拐枪毙杀。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狠狠地批评了郭宝珊的这种粗鲁的做法，说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有军法军纪，不能个人处置，士兵犯错误说明教育不够，不能用过去旧军队旧军阀那套来管理。刘志丹亲自用毛笔在黄表纸上写了西北红军义勇军纪律九条，要求按此抓部队教育。

刚到红二十六军的郭宝珊，还有大烟瘾。当时，义勇军内抽大烟的人为数不少，这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习仲勋对郭宝珊说：“红军不允许抽大烟，我们只有一支枪，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不能有两支枪。”郭宝珊立即表示：“我坚决只要一支枪，坚决不要大烟枪，从现在起，我一口大烟不抽。”于是，郭宝珊开始了艰难的戒烟过程。为了戒掉大烟瘾，他把自己捆在炕上，让别人看守，用了几天时间，就把抽大烟的坏毛病戒掉了。他又鼓励整个部队的军官全部戒掉了大烟瘾。在红军严格的纪律要求下，郭宝珊带领的义勇军逐步成长为真正的红军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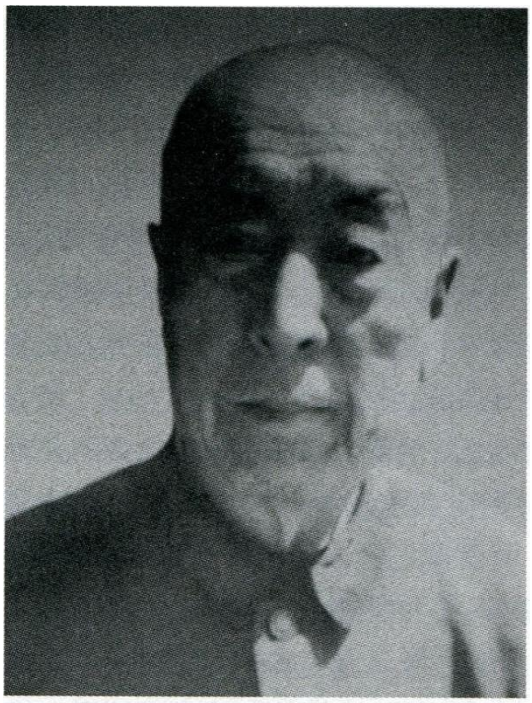
由于郭宝珊的这支部队内部成分复杂，各游击队又抽调一些共产党员充实到义勇军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义勇军的战斗力不断增强。郭宝珊在党的教育下，由习仲勋介绍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后任三边分区司令员和青海省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郭宝珊从黄龙山的“山大王”转变为红军将领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

和证实了陕甘边党组织和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和联合了许多可能被推向对立面的潜在力量，对壮大红军队伍、扩大陕甘根据地十分必要，很有历史借鉴价值。

打开环县县城

1934 年冬，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和晋军第七十一师及傅作义骑兵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首先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进攻。



高锦纯

刘志丹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马鸿宾军队的嚣张之势，决定陕甘边红军主力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转出外线作战。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在吴堡川、楼坊坪以设伏诱敌深入的战术击溃了庆北地区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两个团，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战马和其他物资。

11 月下旬，红四十二师又挺军环县，攻打环县县城。环县县城设在曲子镇。刘志丹令张自孝、王宝珊带领庆阳县游击队，与红四十二师主力在茅野川会合，形成优势兵力，采取奔袭的办法，出其不意地将国民党曲子镇守军一举歼灭。

当时，曲子镇驻有六个区的民团和一个骑兵连及县大队近 1000 人，民团总指挥为李恒太。部队根据刘志丹的作战方案，先派赵国卿、高锦纯带着骑兵团，急行军赶到县城曲子镇附近，秘密将马匹隐蔽起来，由部分战士扮成商人和农民的模样混入城中，决定与随后赶到的红军主力和庆阳游击队里应外合，发起攻城战斗。

赵国卿、高锦纯带着骑兵团赶到曲子镇时，天刚发亮。赵国卿、高锦纯选出 20 多名精干的战士，由一连蔡排长带队，化装进了城内。这时，城内驻军毫无察觉，戒备松懈，民团的团丁刚起床伸懒腰，待骑兵连吹哨子

才开始早操。

突然，城门口枪声大作，只见一队骑兵像箭似的从城外直冲而入，马嘶人喊，刀光闪闪，杀声一片，向城内守军驻地发起猛烈进攻。顷刻间，全城一片大乱。猝不及防的民团和骑兵连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不战即溃，丢盔弃甲，各自逃生，有的士兵在街上乱窜，有的士兵逃人民宅躲了起来。

接着，红军主力及庆阳游击队入城，经一小时的激战，攻占县城曲子镇，全歼国民党六个区的民团和一个骑兵连，俘虏 100 多人，缴枪 300 多支、战马 100 余匹和其他物资，处决了民团头子李恒太、民团队长景崇富、盐务局长等民愤极大的地方恶霸。

环县解放不久，刘志丹接到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信和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的信。孔原的信大致内容是：要求陕北、陕甘边党组织加紧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及两支红军部队在军事上的统一指挥。马明方来信的大致内容是：谢子长受伤后病重，要刘志丹速来陕北处理有关事宜。

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连夜召开了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会议，研究讨论了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确定刘志丹先行北上，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由高岗、张秀山、刘景范等负责。

刘志丹北上

1934 年 12 月底，刘志丹在红二团和安塞县游击队的护送下，离开陕甘边的南梁地区，经安塞到达安定。在北上途中，为尽可能避免跟国民党沿途驻军交锋，绕开据点驻军前行。从胡平头动身，行至安塞县高桥镇的拉平川时，天色尚早，但因前边就是高桥镇，部队只得暂停下来。

高桥镇是肤施通往保安的一条大道，是刘志丹北上陕北苏区安定县必经之路。高桥镇寨子修在镇子的西山畔，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寨子里驻守民团 100 余人，寨堡上守军的火力可封全镇街道和千米通行大道。

高桥镇距肤施县城四五十里路，如果硬打，一旦拖长时间，不但会延误北上日期，而且会引来肤施县城国民党军队增援，那就麻烦了。

刘志丹与红二团政委胡彦英商量后，决定在天近黄昏、视线模糊不清的时候，先派出一连队伍，把寨堡守军唯一的寨门包围起来，摆出一个迷魂阵，趁着寨堡里一时未能弄清红军虚实，保证大队人马安全通过。

夜幕刚一降临，早已隐蔽在高桥镇对面小树林的一个连，即向镇子方向的大路开来。寨堡守军以为红军要攻打寨子，顿时一片慌乱地叫喊："红军来了!"

守军连忙在寨墙上架起枪炮，向走近寨堡的红军摆出一副作战的架势，准备开枪。寨堡下的红军立即喊话："我们是借道通过，如果伤我人马，那真的就要攻打寨子了!"

寨堡守军一听说红军是借道，不是攻打寨子，不敢开枪了。

刘志丹一声令下，红军大队人马紧随前锋连之后，浩浩荡荡开进镇子，顺利通过。部队走出镇子好远，寨堡上的守军才乱放一阵枪炮。刘志丹笑着说："这是国民党驻军交差和报功的枪炮声。"

离开高桥镇向北行走两天，到了安塞县的李家塌。李家塌寨子是国民党军队在安塞县境内的一个坚固据点，寨堡里驻守着唐海鳌的民团 200 余人。

部队原打算在拂晓前通过这个据点，因路途耽误，赶到李家塌寨子时，天已大亮。

这时要举兵强攻通过这个据点，队伍太少，绕道行走路程又太远，刘志丹沉思一番，最后决定强行通过。他先派出一连队伍，沿西山向寨堡包抄过去，安塞游击队顺河沟直插山寨城门。

寨子上的守军突然发现山沟里有两路红军开来，慌忙开了枪。抢先逼近寨堡城下的红军先头部队向守军喊话："不要开枪，我们是路过此地，要你们团总说话。"

几分钟后，寨墙上出现一个人说："我是营长，请说话。"

先头部队的连长严厉地说："我们是路过此地，你们马上停止打枪，如果敢伤我一人一马，就要十倍百倍讨还，红军就要攻打寨子!"

这时，刘志丹率领的大部队有意隐蔽在先头部队后边，战士们的呐喊声响彻沟谷。寨墙上那个营长听得真切，连忙一边指挥守军往寨墙上搬运

滚木礌石，防备红军攻打寨堡，一边在寨墙上回话：“你们通过可以，但我们要打枪，不然不好交差。”

刘志丹明白了那个营长的意思，命令号兵吹起前进的军号，大部队在寨堡守军朝天鸣枪的“欢送”中，高举红旗井然有序地从李家塌的寨堡城墙之下横穿而过。部队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进入安定县境苏区。

当晚，部队在一个村庄里宿营休息，有一个名叫杨成森的青年学生跑来要求参加红军，但部队一个管人事的人员听说杨成森的父亲是个地主，一口拒绝。

刘志丹一贯主张主要打击土豪劣绅，但对非罪大恶极的大小地主都不斗争，还可以分给一份土地；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能工作的，尽量吸收进来为革命工作。他得知此事后，便对那个管人事的人说：“阶级社会是几千年形成的，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可以选择。杨成森既然愿意革命，就应该接收他。”

杨成森入伍后，开始当粮秣员，后来从事后勤工作和党政工作。由于本人表现好，工作积极，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政部部长助理等职。刘志丹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中，不少人后来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红军领导骨干，杨成森只是其中一例。

刘志丹对革命阵营中犯错误的同志从来都主张采取挽救教育的办法。在陕甘边时，一次有个小红军战士因怕到远地方打仗，跑到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亲戚家躲了起来。红军里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大家都很生气，有人建议派部队去捉拿他。

刘志丹知道后说：“咱们到他家，先和他父母谈谈。”

这个战士的父母一见刘志丹就说：“孩子年纪小，没出过远门，恋家，我们叫他回来。”

这个战士最听父母的话，果然回来了。父母当着刘志丹的面对儿子说：“红军革命是为了让穷人翻身的，你还逃跑，太没出息了。”

这个战士说：“我离不开爹妈。”逗得大家都笑了。

刘志丹说：“好了，可免处分，今后可要好好干!”

这件事情发生后，刘志丹十分注意一些战士的想家情绪，部队打仗每

到一个地方，如果有战士的家在附近，他就让战士回家看看父母老小，还给带上一块银洋送给家人。

灯盏湾会面

1935 年 1 月初，刘志丹到安定县，就遇到中共陕北特委负责人马明方，两人交谈了陕北苏区工作的情况。而后，刘志丹在马明方、白坚等陪同下，急切地去探望老战友谢子长。刘志丹骑马到灯盏湾，一进门就急着询问：“老谢，你的伤怎样了?”

谢子长半躺在炕上，伸出一只无力的手握住刘志丹的手好久不放：“老刘啊，我早就盼望着你来哩，估计你一定快来了!”

刘志丹和谢子长眼里涌出激动的泪水。这两位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西北革命领袖，面对革命的艰巨任务和未竟事业，多么期盼能在一起继续战斗，直到革命红旗从西北飘扬到全中国。刘志丹见谢子长病得很重，难过地说：“老谢，你病成这样，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捎个信呢?”

“给你送信去了，但送信的人至今还没有回来。”后来才弄清楚，谢子长派出给刘志丹送信的交通员南贵成途经保安县时被国民党驻军抓住。南贵成为了不泄机密，把给刘志丹的信吃进嘴里吞下。国民党驻军一无所获，竟残忍地将南贵成活埋。

谢子长说：“我的伤看样子好不了了，陕甘边和陕北的军事工作要完全靠你领导，这个担子真不轻啊!我看这个任务也只有你能承担。”

“老谢，你要有信心把伤养好，党和人民正需要你，你可别瞎想，我们离不开你呀!”刘志丹与谢子长谈及统一陕北、陕甘边两支红军，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时，刘志丹一定要谢子长担任军委主席。

谢子长忙说：“不成，不成!我以中共北方局驻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指定你为主席。”

刘志丹的到来，使谢子长思绪万千。他谈到风云岁月的战斗往事，由衷地希望自己在“三嘉塬事件”和“阎家洼子会议”中的某些冲动做法和过激的意见能得到刘志丹的原谅。刘志丹连忙摆手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老谢，当紧的是要好好安心养伤。”

临行，刘志丹摸着谢子长身上盖的被子，关心地说：“你的被子太薄，这冬天怎么行，叫给你换一床。你这个人我知道，一贯为别人着想，就是不想着自己。”

谢子长笑着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差点不要紧。”

谢子长目送着刘志丹出了门，高兴地对身边的护卫人员说：“老刘来了就好了，我全放心了。”

刘志丹离开灯盏湾的两三天后，谢子长的病情恶化，伤势加重，又染了肺痨，呼吸困难，气短得昼夜坐着不能睡觉。他一天天消瘦，身体越来越虚张连马都不能骑，走路也困难了。

一天，同志们抬着谢子长向柳沟转移，路过小界墙村，谢子长要喝水，便到了续殿革家。续殿革家很穷，窑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几个孩子光着身子坐在炕上。谢子长心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小声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太可怜了。把我的那床棉被给老乡留下。”

白占玉

身边的人知道谢子长只带着这一床棉被，在大冬天没有了棉被，他那虚弱的身体是撑不住的，便说：“就这一床棉被，给了老乡，你怎么办?”

谢子长指一下担架上的皮袄说：“我好办，还有这件皮袄能防寒。老乡没有棉被盖，你们说一个长冬怎么过去?”

同志们说服不了谢子长，只好照他的话把棉被送给续殿革，续殿革坚决不收，经谢子长的一番劝说，才含着感激的眼泪收下。谢子长露出满意的笑容。谢子长紧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感染着他周围的许多同志。

不少人记着谢子长曾说过的话：“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革命是为了老百姓。要尊重老百姓，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如果狗肥

不认主的话，我们就要失败。”

在谢子长病重期间，陕北党组织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又步叛徒杜衡之后尘，企图兴风作浪，乘机迫害谢子长。中共陕北特委有人在清涧东区的苏区效仿苏俄，搞集体农庄，失败后到安定县老调重弹，说谢子长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梢山主义”等等，要时任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白占玉收缴谢子长的枪。

白占玉向谢子长汇报了情况。谢子长气愤地说：“我是四十二师政委、军事特派员，谁敢收我的枪!”

对谢子长的“缴枪事件”虽未成为事实，但说明陕北党组织内“左”倾机会主义仍占着一席之地，一遇时机，就有可能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

第六十七章

王家圪坨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

在蒋介石调集各路国民党军队相继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包围之势时，中共陕北特委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正在抓紧筹备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积极筹组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为保证这次会议开好，拉开陕北军民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中共陕北特委经研究决定，陕北红军独立师一、二、三团，分别在各自活动的区域，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避强击弱，袭扰和歼灭国民党军队。

1935 年 1 月 19 日，陕北红军独立师一团团长贺晋年伤愈归队。贺晋年刚到部队，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红一团，寻找战机，拔掉苏区周边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据点，以保证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此时，正值延川县民团总指挥高善亭纠集起全县民团 200 多人，跟踪追击红九支队。贺晋年即率红一团在延川、安定两县交界的楼儿，与高朗亭带领的延川县红九支队会合，决定乘高善亭带着民团与红九支队决战之机，将高善亭民团一举歼灭。

1 月 20 日午夜，红一团和红九支队向延川县青坪川进军。夜里大雪纷飞，寒风凛冽。部队先派出一个尖兵侦察小队，到王家圪坨村了解敌情。尖兵侦察小队到了距王家圪坨村二里路的官庄，村里赤卫队告诉他们，在一顿饭左右工夫之前，有几百穿黑军装的民团在王家圪坨村的南北山上布

了埋伏，正等着红九支队走近。

根据高善亭民团的设伏情况，高朗亭、路文昌立即命令前行的红九支队原地休息，等待后续红一团主力部队赶到，再作决定。

贺晋年、马佩勋率红一团一到官庄，根据高朗亭、路文昌汇报的敌情，决定利用高善亭的伏兵分布情况，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从部队抽调出 40 名作战勇猛的战士，组成一支突击队，以出其不意的快速行动，先攻占龙王庙，然后向王家圪坨高善亭民团主力方向发起冲击；红一团一连由官庄登山，先向王家圪坨北山发起攻击，然后由北向南朝王家圪坨村逼近；红一团二连由李家河登山，向王家圪坨南山发起攻击；红九支队向高善亭民团右侧的李家河岔、官庄大沟插进，阻断民团西逃的退路；红一团三连作为预备队。

作战命令下达后，各连队和红九支队分别作了十多分钟的战前动员和作战准备，立即投入了战斗。顷刻问，几支军号齐鸣，各路红军在茫茫雪地上如同猛虎似的冲向民团阵地。

高善亭布设在几处的伏兵，在风雪交加的夜里，弄不清楚来了多少红军，都慌得乱成一团。向龙王庙发起攻击的红军突击队，个个勇猛冲杀，首夺龙王庙，活捉民团团总刘光汉，全歼其民团武装，随即向王家圪坨村冲去。

王家圪坨村住的是民团总指挥高善亭，他听得村里枪声响成一片，仅带着十几个团丁，向南山方向逃去，以为南山有民团伏兵，那里凭借山高可以固守顽抗。这时，一连、二连在南山、北山的战斗同时打响。北山的民团一发现红军冲来，像打惊了的鸭子，狼狈向南逃窜，正好被红九支队分段割截。南山的民团一听见枪响，不打自溃，像暴风中的沙子从南山连滚带爬地朝山下王家圪坨村的方向逃去。

经过五个小时的激战，全歼了高善亭民团，红九支队活捉了民团总指挥高善亭。这次战斗，红一团和红九支队共缴获长短枪 200 余支、子弹数千发，活捉各民团团总五人。红一团只牺牲一名排长和一名战士。

王家圪坨一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红一团和红九支队的士气，改善了红军部队的武器装备，对国民党军队震动很大，使延川县的民团武装从

此一蹶不振，再也组织不起武装反扑的力量，只能孤守在县城和永坪镇两个据点里，不敢出动半步。

谢子长在养伤中，听到红一团和红九支队在延川县打了胜仗，红军以很小的伤亡歼灭了200余众的民团，高兴得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这一战，红一团和红九支队拉开了陕北军民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高善亭在王家圪坨一战中被俘获后，在押解途中乘隙逃脱，跑到安定县国民党的据点。安定县国民党怀疑高善亭投降了红军，是红军故意释放出来的，将高善亭拘押起来，并向井岳秀发电报告：延川县保卫团团总高善亭被匪缴械，目前逃回安定，只恐有别情，且有控案，现一并羁押绥德县府云云。

不久，陕北红军独立师二团巡视员杨琪从清涧县带领红二团西进安定县。路经延川县的延水关，在红一、二、九支队配合下，乘夜奔袭阁连民团，除团总冯康年带着一个团丁跳沟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俘，缴枪30余支、子弹数千发。

红二团、红一团在安定县会合后，组成'700余人的一支红军部队，集中力量，捏成拳头，统一指挥，主动寻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5年1月25日，中共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指示精神，在赤源县白庙岔召开了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玫府(又称工农民主政府)。大会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催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设秘书处，先后由张毅忱、吴居第负责，财政部由艾楚南负责，教育部由彭飞负责，土地部由王子文负责，劳动部由祁明珍负责，经济部由惠子明负责，贸易部由白树标负责，粮食部先后由高耀先、罗成德负责，保卫部先后由崔正冉、刘子义负责。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团巡视员有强晓初、白栋材等。陕北省总工会主席为高长久，共青团陕北省特委书记为慕纯农。

与会代表100多人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等法令。同时，大会讨论了新的省政府如何组织和建立各级苏

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保卫发展革命根据地、扩建红二十七军及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等问题。

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省政府成立后，在各县很快建立起县、区、乡工农民主政权，继续开展土地分配，给农民颁发土地证；肃清地方反革命，纯洁内部，巩固苏区，扩大游击区域；发展文化教育，破除迷信，实行婚姻自由；推动集市贸易，发行苏区货币(纸钞)，组织农民生产；号召群众扩军、优军，支援红军前方打仗；宣传抗日救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办党团训练班，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等，为苏区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经济基础，有力地配合了红军在军事上粉碎蒋介石第二、三次“围剿”，形成摧之不垮的牢固后方保障。

白栋材

1 月 30 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白庙岔将陕北红军独立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简称红二十七军)，任命杨琪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团。红一团由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红二团由郭育仁任团长，马万里任政委；红三团由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是陕北苏区正式创建的正规红军部队，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军事上的有利条件。

周家硷联席会议

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郭洪涛、白坚、惠子俊等。会议决定：为粉碎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陕北、陕甘边两

块根据地的两支红军。

在决定成立西北军委的同时，就产生了西北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经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以领导陕北和陕

周家硷会议旧址

甘边两个苏区的党政军的工作。在会议上，经推选由谢子长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一说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在推选中，有的同志考虑到谢子长身负重伤，不能到职，建议由刘志丹当军委主席。刘志丹当即反对，他深情地表示：“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只要他在世一天，就应当选他，我协助他完成任务。”所以，这次会议上，根据谢子长的身体状况，由刘志丹主持军委工作，高岗为军委副主席。

谢子长、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杰出领导者，在艰苦的斗争中，他们都能从革命利益出发，从大局着眼，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创建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他们的革命友谊和无私奉献精神，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西北工委成立后，由惠子俊任书记，未到任之前由崔田夫代理。刘志丹负责军委，高岗负责宣传，郭洪涛负责组织，惠子俊等为委员。西北工委一经成立，中共陕北特委随即撤销，原由中共陕北特委所领导的组织直接隶属西北工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仍然保留，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管辖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组织。从此，把原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别领导的两个

苏区统一为西北工委领导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白　坚

在会议上酝酿西北工委书记的人选时发生过分歧。刘志丹、高岗等提议由惠子俊任工委书记，理由是他在中共陕甘边担任特委书记期间工作很有成效，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郭洪涛等提议由崔田夫任工委书记，理由是崔田夫是工农干部，阶级出身好，革命思想纯，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多少，连讲话都有困难，但他是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对象，代表着广大劳苦群众。最后还是选举惠子俊为中共西北工委书记。

在讨论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作战方案时，大家采纳了刘志丹、谢子长在灯盏湾见面时共同商讨确定的反“围剿”战略方案，决定集中两块根据地的红军主力，在陕北地区作战，重点打击深入苏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先打击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等县国民党军队，再向西南发展，打通陕北与陕甘边及神府苏区的联系，结束两块根据地长期分割的局面。调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和义勇军，从陕甘边北上到陕北，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地区机动作战，由各县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消灭小股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武装，以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周家硷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对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汇成一片、统一两支红军的领导、确定集中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的正确方针、推动西北革命大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至此，结束了陕北党组织开辟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直接隶属中共北方局、陕甘党组织开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直接隶属中共陕西省委的管辖格局，两块根据地统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

周家硷会议之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西北军委于 2 月 7 日在冯家梢堰村由刘志丹主持召开了西北军委会议，宣布军委正式开始办公。军委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为白坚，参谋长为朱子休，作战训练科长为雷恩钧，侦察科长为高朗亭，总务处长为刘汉武，经济部长为张成武，总会计为王彩文。

西北军委会议一结束，刘志丹就亲自起草发布了粉碎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和全体人民群众为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而英勇斗争。

动员令下达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红军所到之处，得到群众广泛有力的支持。少先队主动站岗放哨；赤卫军积极带路送信，传递情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妇女们踊跃给红军战士缝补衣裳、送军鞋和看护伤病员。整个根据地壁垒森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使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谢子长英年辞世

谢子长得知西北工委、军委成立后，心里由衷地高兴，恨不能立即与刘志丹等奔赴反“围剿”的战斗最前线。这时，他的病越来越重。一天，马佩勋等去看望谢子长。谢子长躺在床上气喘得十分厉害，他拉着每个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你们看……我们住的这个山圪坊子……国民党都不给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不行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战斗，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继续战斗……”同志们见谢子长已经病得危在旦夕，都难过地流下眼泪。国民党特务时刻在侦察着谢子长的行迹，到处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同志们抬着谢子长，先后转移到杨道峁、周家硷、灯盏湾、柳沟、磁圪湾等地。在这期间，先后有刘志丹、高岗、马明方、郭洪涛、白坚、贺晋年、马佩勋等多次来探望谢子长。谢子长也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好了。

谢子长病危期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群众来看望。谢子长每转移到一个村庄，院子里就围满了人群，大家争着要看他最后一眼，人们不敢出声，怕惊动他的休息，可怎么也按捺不住哭泣声。有不少人到柏山寺、石

公寺，虔诚地祈祷诸神显灵，并许愿说只要谢子长早日康复，即“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一天，谢子长转移到韩河村，国民党安定县驻军李少棠的两个营跟踪到距韩河村十余里的水晶沟。谢子长对随行护卫他的薛兰岗说：“这次李少棠‘清剿’的目的，是要抓我，万一情况紧急，你们抬不动时，那就干脆把我一枪打死，扔到水渠去，你们逃命，绝不能叫国民党的阴谋得逞。”

薛兰岗含着眼泪回答说：“总指挥，你放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背也要把你背出去，绝不能让你落到国民党手里……”

李少棠把团部设到水晶沟，即令队伍搜山。李少棠带着队伍到韩河、周家硷一带搜山时，谢子长连夜转移到灯盏湾。灯盏湾位于一山岭上，离水晶沟只有几里路，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搜山的士兵。为了保证谢子长的安全，中共赤源县委决定调集红军部队、游击队、赤卫队及少先队，攻打水晶沟李少棠部。

在水晶沟住着十几户人家，其中有南、贾两大家族，南姓家族穷，贾姓家族富。南姓家族的贫苦老百姓受尽压迫和剥削，都心向红军，他们不分昼夜地把李少棠活动的情况报告给地方组织。于是，在完全掌握了敌情后，由张达志带领陕北省保卫队，与安定县新红一支队组成100多人的红军队伍，趁夜集结到水晶沟的附近。

午夜时分，乘着李少棠的队伍酣睡之时，张达志一声号令，英勇的红军战士朝着水晶沟村里冲去，向李少棠团部发起猛烈的进攻。李少棠在热被窝里正做着捉拿谢子长领功请赏的美梦，猛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和“活捉李少棠”的喊杀声，顿时惊恐万状，慌忙从炕上溜下，提枪跑到院子。院子里的士兵们挤成一团，不敢迈出大门半步，只是朝院外四处放枪。

这时，冲到团部窑顶的红军战士朝着院里甩下一排手榴弹，炸得李少棠和士兵们丧魂落魄，狼嚎鬼哭，仓皇跑出院子，朝村外逃去。李少棠由两个随身护卫扶着，狼狈地逃出水晶沟村藏到沟底。一个姓贾的反动地主朝着李少棠喊叫：“团长大人，你可不能跑呀!山峁上有个庙，快到那里指挥弟兄们，我给你带路。”

姓贾的地主把李少棠带到山峁的庙里，李少棠不知红军的虚实，吓得

躲在庙里不敢走出庙门。当一个姓吴的营长也要缩到庙里来时，李少棠用枪顶到他脑袋上，气急败坏地命令道：“给我冲出去，要是后退，老子就一枪毙了你!”

姓吴的营长只得带着一股队伍从庙里冲出，朝正面包抄过来的红军战士胡乱射击，负隅顽抗。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因敌众我寡，张达志在天亮前即带着红军队伍撤出水晶沟，转移到侯家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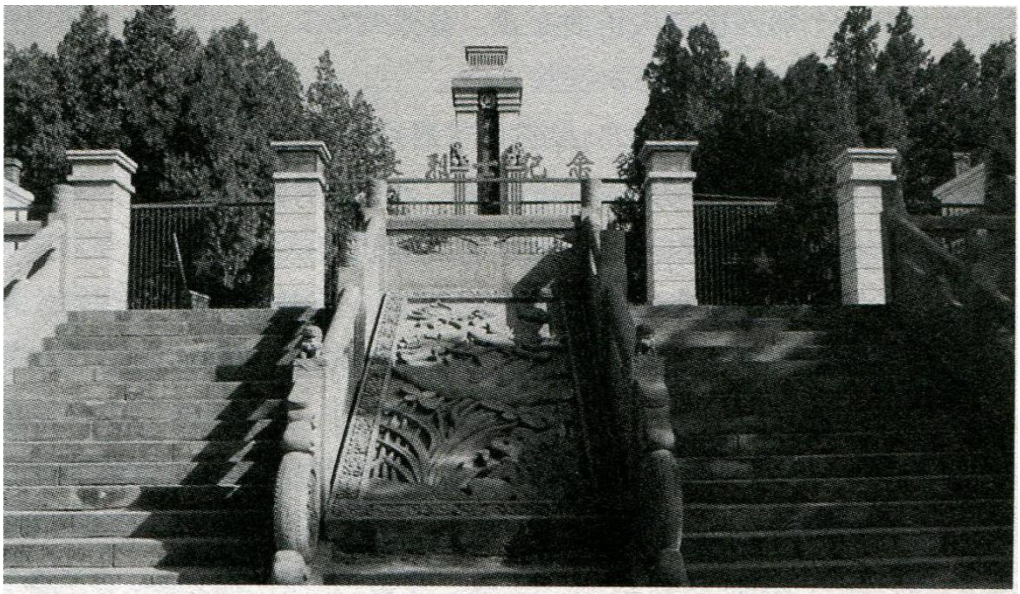
这一战给李少棠的惊吓不小，他急忙把队伍撤出水晶沟村，退到中山川。在中山川，李少棠再次遭到红军的袭击，赶忙带着队伍缩回安定县城。

水晶沟战斗中，刘明山因手部负伤转到一个村里养伤，正好见到谢子长。谢子长高兴地对刘明山说：“打得好，不然李少棠这个家伙不知又要杀害多少老百姓!这一仗给老百姓壮了胆、撑了腰。”

1935 年 2 月 21 日，谢子长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 39 岁。谢子长的一生是叱咤风云的一生，是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理想的一生。他的病逝是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巨大的损失，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革命品德永远铭记在后人的心中。

从 1924 年到 1937 年，谢子长家有 9 名共产党员，有 11 人投身革命，先后有 9 人在战场和刑场上壮烈牺牲，留下老少寡妇 6 人。谢子长生前曾给同志们说：革命是要花本钱、花代价的，国民党想多杀害我家几个人，逼迫我不革命，这根本办不到，国民党的暴行只能促使我革命到底!

谢子长的一生，不仅影响了全家人走上革命之路，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一个时代。1935 年，为纪念为革命献身的谢子长，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1939 年毛泽东两次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自为谢子长墓撰写了碑文。



今子长县谢子长烈士纪念碑

第六十八章

保卫苏区

南沟岔战斗

1935 年 2 月 2 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后，陕北红军主力红一、二团为粉碎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保卫苏区和刚建立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决定主动向东出击。部队进军安定县南沟岔，与抢先侵入苏区的高桂滋部四九九团一个加强连首次正面交锋。这是对红二十七军一、二团合兵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能力的首次检验。

高桂滋部自从山西开到陕北，虽然经常遇到一些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但还一直没有与陕北红军的正规部队有过接触。当时，高桂滋军队非常疯狂嚣张，分成多路由东步步向西进攻。高桂滋部四九九团的这个加强连，是西进开向安定县苏区的第一个前哨先锋连。从绥德开拔，一路经清涧县的淮宁湾、老君殿，一到安定县苏区边的南沟岔，就强迫群众修筑碉堡，构建了坚固的军事据点。

红二十七军一、二两团到南沟岔后，在高桂滋部驻军据点外隐蔽设伏。杨琪、张达志经严密部署，由贺晋年、马佩勋带领红一团担任正面攻击，由郭育仁、马万里带领红二团迂回到北山。战斗一开始，先派出游击队、赤卫队到驻军据点前进行袭扰。

据点驻军以为是小股“赤匪”，从碉堡里倾巢出动。游击队、赤卫队佯装败退，驻军尾追不舍。当把驻军诱入红军的伏击圈，红一团、红二团突然前后出击，将离开据点的驻军压入一条大沟之中。经过三小时的激战，

全歼据点驻军一个加强连，俘虏近 100 人，缴获 100 余支枪及部分弹药，其中有捷克式机枪两挺。

南沟岔一战使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成立后第一次缴获高桂滋军队的新式武器，装备了部队。这次战斗，仅红一团连长李仲英一人负伤，就拔掉高桂滋部企图设立在安定县苏区边的第一个军事据点。部队旗开得胜，士气旺盛，转移到路家寺一带略作休整，即东进转入清涧县境。

红二十七军一、二团在南沟岔首战告捷，对陕北广大群众反“围剿”的信心鼓舞很大，对高桂滋军队震动不小。高桂滋这时才慌了手脚，连忙向国民党总指挥部发电告急称：

近日刘、谢两匪被甘军压迫，突率伪独立师红一、二、三团 4000 余人，枪约半数，犯我防境。2 日南沟岔之役，匪以全力围我驻军一连，激战终日，猛烈状况戕伤之目：（损）兵 15 名，遗失步枪 15 支。刻仍盘踞安定西区，侦我兵力，零星有逐渐东犯企图。其余各县党匪亦遂纷纷响应，连日甚为紧。

阎王砭战斗

红二十七军一、二团东进清涧县境后，侦察到高桂滋部高建白旅有两个排的兵力驻守在东区高杰村。高杰村位于清涧县苏区中心。自高桂滋部高建白派出两个排驻守到这个村子里，以此村为据点，在当地白瑞珠民团配合下，频繁出兵“清剿”周边村庄，使得当地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5 年 2 月 13 日，经杨琪、张达志商讨策划，决定在离高杰村 20 余里外的川口镇以西阎王砭设伏，将高杰村驻军诱出歼灭。

阎王砭在两座大石山之间，山陡沟深，壁如刀削，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指挥部派出红二团参谋长惠世良带领清涧新红二支队和赤卫队进入高杰村，先行袭扰驻军。惠世良带领的游击队和赤卫队，大多拿着大刀、长矛，驻军误以为是小股游击队不堪一击，两排队伍倾巢出动，全力追歼。

惠世良带着游击队和赤卫队佯装败退，涉过冰封的无定河，退到河西的川口镇。驻军紧跟其后，一直追到无定河西。

当惠世良牵着高杰村驻军的鼻子退到川口镇，发现这两个排有返回迹象。惠世良即派出当地一名共产党员到川口镇诱敌追击(后这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杀害)。两排队伍一到阎王砭，埋伏在大石山的红军主力从山顶冲下，顿时枪声四起，将这两个排压人大石山的深沟之内，前后不能突围，形成瓮中捉鳖之势。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高杰村的驻军。在这次战斗中，红军虽伤亡不大，但惠世良不幸身负重伤牺牲。

南沟岔、阎王砭，红二十七军一、二团连打两个胜仗，苏区的群众高兴得奔走相告，传递着胜利的喜悦。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可见群众情绪的一斑：

打开南沟岔，
老百姓欢迎咱，
推上麦子把猪杀；
苏区扩张大，
开会计划清涧下，
白军高杰村扎；
布个“迷魂阵”，
叫二支队哄出来，
阎王砭消灭他。

3 月上旬，红二十七军一、二团北上绥德县南区，在与清涧县的交界处，侦得高桂滋部驻守张家圪台的一个连疏于修筑工事，防守不严。杨琪、张达志趁其麻痹之机，又迅速地歼灭高桂滋的一个连。

部队离开张家圪台，西折安定县。在行进途中，获悉驻守清涧县城的高桂滋部高建白旅派出一个连护送一批军饷到延川县去。杨琪、张达志当机立断，派出郭育仁、马万里带领红二团，赶到护送军饷队伍必经之地的贺家湾设伏。战斗一打响，护送军饷的一连队伍因无防备，一击即溃，丢

弃押护的饷金，各逃生路。这一战红二团缴获银洋 2000 余块。

红五团撤离吴堡县

在此期间，根据第二次反“围剿”的形势需要，西北工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对陕北根据地各县的十余支游击队进行有效的组合，编成第一、二、三、四、五、六纵队，形成优势兵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以四处袭扰国民党军队，消灭小股国民党队伍和地方民团武装。这次游击队的集中组合，有力地配合了红二十七军主力部队在正面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1935 年 2 月至夏秋，在安定县的新红一支队和靖边县的红十支队等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纵队(简称第一纵队)，任命高步仁为纵队长，刘明山为政委，约 170 人，活动在安定、靖边、安边、安塞等县一带；在清涧县的新红二支队与绥德县的红五支队等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第五纵队，因两个纵队实际一直未分开活动，故也称二五纵队，任命郭育仁为纵队长，马万里为总政委，活动在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县一带；在横山县的红八支队和靖边县的红十三支队等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简称第三纵队)，任命陈世恩为纵队长，惠艾申为政委，约 360 人，枪 270 余支，活动在靖边、横山两县及沿长城一带；在陕蒙交界的曹动之带领的骑兵队与横山县红二十二支队及吴亚雄带领的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四支队转战陕北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四纵队(简称第四纵队)，任命吴亚雄为纵队长，活动在横山、米西两县及沿长城一带。时隔不久，第一、第四纵队联合成立了总指挥部，由吴亚雄任总指挥，刘明山任总政委。

1935 年 2 月 15 日，中共葭县、吴堡两县委领导人和游击队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在吴堡县张家山召开。在联席会议上，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集中地方游击队形成优势力量，袭扰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经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高光祖和中共吴堡县委负责人慕生忠、慕生桂等研究，决定把葭县红六支队和吴堡红十五支队合编为陕北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简称红五团)。红五团成立后，任命王志杰为团长，慕生忠为政委，李启贤为副团长，樊文

德为参谋长，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王世保，二连连长薛英桂，三连连长李云青，100 余人，轻机枪 1 挺、枪 80 余支，活动在葭县、吴堡两县和绥德县南区一带。

吴堡县红十五支队的前身是红四支队。对红四支队改编为红十五支队以及红六支队和红十五支队合编为红五团，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团的整个经过，很值得一提。

慕生忠

红四支队在吴堡县成立后，主要在吴堡、葭县南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35 年 1 月，由于中共吴堡县委组织部长魏刚投敌叛变，县委遭到破坏。当时，打人薛家洼王子崇保安队的地下党员慕生忠、李启贤、薛英桂和火烧山保安团的地下党员薛俊高、王增才、李丕功等，因魏刚事件的发生，身份均被暴露。根据形势变化，中共吴堡县委决定打入薛家洼、火烧山两处保安团的共产党员立即举行起义。

1 月 23 日，慕生忠、薛英桂、李启贤等按照县委的紧急指示，在薛家洼王子崇保安队首先策动起义，杀死保安队解教练等，拉出 20 多人和 20 余支枪，然后速去接应火烧山保安团的起义人员。在火烧山保安团的薛俊高、王增才、李丕功等，事先与慕生忠、李启贤、薛英桂等取得联系，薛家洼的起义队伍一到火烧山，在外攻内应夹击之下，缴获了火烧山保安团的全部枪支。薛家洼、火烧山两支起义队伍共 30 余人、枪 30 余支，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支队合兵一处。

1 月 25 日，在中共吴堡县委的主持下，将红四支队和薛家洼、火烧山保安团起义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五支队(简称红十五支队)，由薛英桂任队长，慕生忠任政委。红十五支队成立后，在高桂滋部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先后数次策动起义，把一批士兵和枪支拉到红十五支队。

1 月底，驻绥德县梁家洼的高桂滋部刘世礼旅李云青等四名士兵起义，

带着四支枪投入红十五支队。

2 月 9 日，驻吴堡县慕家塬高桂滋部一个排的士兵张德胜和机枪手老杨两人打死排长梁正川后起义，从排里带出八名士兵和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投入红十五支队。

2 月 10 日，驻绥德县梁家洼的高桂滋部旅长刘世礼派出司务长王奎元带领一个排来到火烧山一带，假借起义之名企图一举歼灭红十五支队。薛英桂、慕生忠识破了刘世礼的阴谋，吴堡红十五支队与葭县红六支队细作安排。当王奎元的一排队伍与红十五支队一接触，红十五支队和红六支队立即发动说服教育的政治攻势，在王奎元所在排共产党员的促成下，使王奎元带领的一个排假起义成真起义，顺利地缴了枪械，全排投归红十五支队。

高桂滋部连续发生起义，削弱了对吴堡、葭县苏区的“围剿”气焰，使红十五支队和红六支队迅速扩大，并改善了武器装备。于是，红十五支队与红六支队组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五团(简称红五团)。吴堡县又新编红四支队，由薛英桂任队长。

2 月 18 日，刚成立的红五团首次出兵攻打吴堡县慕家塬高桂滋军队据点，歼灭据点守军十余人。

3 月上旬，红五团已成为一支颇具规模和战斗力的部队，决定主动出击，攻打吴堡县城。部队途经火烧山时，与高桂滋部一股队伍遭遇，经一场激战歼其部分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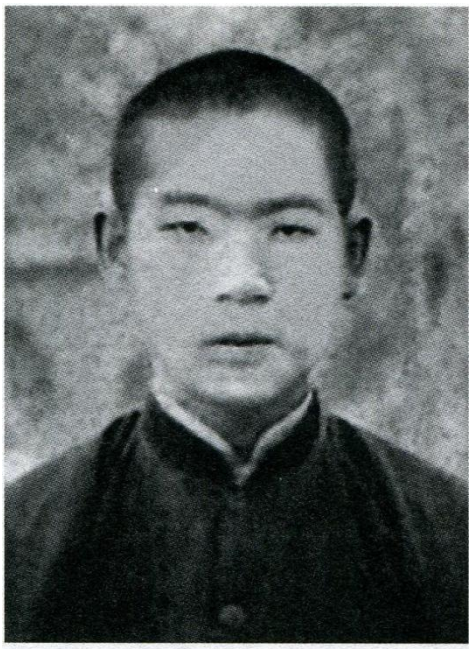
3 月 13 日，红五团和新编红四支队分兵三路，出击吴堡县冯家峁、王家塌等三个民团寨堡。慕生忠率部包围了冯家峁寨堡，采用火攻战术，歼俘寨堡民团 50 余人，处决了董学源、董学刚等民愤极大的地方恶霸豪绅。同时，中共吴堡县委发出最后通牒，限全县地方民团所筑的寨堡在三天内全部铲平。许多民团团总和反动分子慑于红五团的声威，纷纷主动拆除了寨堡据点。

3 月 15 日，高双城部张建南营侦得红五团转移到袁家山、侯家嫣一带活动，张建南亲自带兵前来围歼。红五团选择红山庙有利地势，对张建南营进行伏击，打死打伤张建南营 50 余人，张建南的腹部中枪负了重伤。这

一战，红五团弹药耗损甚大，优秀机枪手老杨牺牲。

3 月下旬，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在葭县螅镇的一营驻军，由营长艾亚春带着全营队伍倾巢出动，向红五团扑来。红五团和新编红四支队与艾亚春营在猪头山激战，战斗失利，部队遂退至红湾休整。

这时，由于叛徒告密，艾亚春亲自领着 100 余名敢死队员，在红湾将红五团包围。红五团立即抢占高地，据守险要之地，与敢死队展开一场激战。艾亚春指挥敢死队对红五团发起数次猛烈进攻，伤亡惨重。红五团也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伤亡不小。红五团根据战势的不利情况，经过一场激烈的血战，冲出重围，被迫撤离吴堡县，西进清涧县境。


高光祖

红五团转战到清涧，西北军委将红五团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直属第三团(简称红三团)，任命王士杰为团长，王国昌为政委，樊文德为参谋长。原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三团因被井岳秀的军队分割在神府苏区，一直处在孤军奋战之中，即改编为陕北红军神府独立第三团(简称独三团)。

红五团南下清涧后，国民党军队对葭县、吴堡苏区“围剿”之势更加疯狂。在葭县苏区，由于国民党驻军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葭县各级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据国民党公布的数据，截至 1935 年 4 月底，国民党驻军杀害革命群众 2000 余人、地方党政干部 100 余人。为保存革命力量，葭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部分转到吴堡，部分转入农村。

这时，白如冰来视察葭县的敌情，中共葭县县委书记高光祖汇报了葭县苏区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的严峻形势。白如冰即派高长久前往清涧县一带，准备找回红五团。当高长久赶到清涧县时，红五团已由西北军委归编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

西北军委为了支持葭县、吴堡两县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反“围剿”的斗争，提供 20 多支枪，让高长久带回葭县。高长久将这些枪支带回葭县

后，与高光祖、曹世华、马增前组建了葭县新红六支队，与吴堡新红四支队活动在葭县、吴堡两县一带。

葭县新红六支队成立后，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十人，与国民党驻军周旋作战。一天夜里，高光祖在李家圪坊村一个山窑里开会时，被叛徒李友仁告密。

国民党店镇驻军手枪连连长郭福堂带领队伍将会场包围。枪声一响，高光祖让同志们迅速撤离，自己最后离开，但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1岁。

随着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原来被红军游击队和农民协会撵至外地的地主恶霸又趁势威风凛凛地回来了。他们在各县组织“反共还乡民团”“铲共义勇军”“复仇肃反委员会”等反动武装力量，伙同国民党驻军大肆捕杀苏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破坏党的各基层组织。有些地痞流氓等认为苏区共产党“大势已去”，也纷纷出笼，为国民党军队通风报信、站岗放哨，成了国民党的一大帮凶。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陕北苏区，在配合陕北红军主力部队和红军游击队反击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的斗争中，除积极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瓦解地方反动武装势力外，还发动各基层群众组织和农民协会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苏区内进行肃反锄奸活动。各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肃反委员会，下设基层肃反行动小组，每个小组至少有三名共产党员。在反“围剿”斗争的特别而艰苦的恶劣环境里，行动小组的权力很大，有三名共产党员参加即可行使决定权。对那些反动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特务叛徒、地痞流氓坚决予以严厉的秘密镇压，对那些动摇分子和可挽救的人实行宽大教育的政策。

这场肃反锄奸活动确实有效，震慑了地方上兴风作浪一时的反动分子，有力地保护了各地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的隐蔽活动。但也有一些地方在肃反锄奸时政策掌握不严，扩大了肃反锄奸的范围，秘密镇压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动分子，也发生了错杀人的情况，造成个别地方形成红白拉锯式的屠杀局面，使一些农民群众成了无辜被杀害的对象。在一些村庄，甚至有个别人因个人之间的恩怨，假借行动小组的名义，纠集亲友杀害无辜

群众，在地方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第六十九章

两支红军归一统

玉家湾联席会议

1935 年 4 月，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陕北苏区、陕甘苏区逐渐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围剿”的军事指挥，协调各路部队之问的关系，监督各军阀的行动，派出毛侃率领的参谋团驻在绥德。

4 月 15 日，西北工委和军委在赤源县玉家湾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高岗、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高长久、张达志等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陕北红二十七军和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在陕北第二次反“围剿”的具体作战方案有两种不同意见。

刘志丹、高岗等认为，在陕北苏区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二十六军应以部分主力牵制南线国民党军队；调红二十六军部分主力和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各路游击队配合下，利用井岳秀与高桂滋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首击钻人陕北苏区之内的高桂滋部。刘志丹提出五点战略主张：一是高桂滋“围剿”重点在陕北苏区腹地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等县一带，首击高桂滋部，打乱其“进剿”战线，对巩固发展陕北苏区，进而挥兵南下，使陕北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具有战略意义；二是高桂滋初到陕北，部下士兵民俗不熟、环境不熟，更不适应山地作战，而红军正是占有这方面的优势；三是高桂滋部与红军打仗甚少，不懂红军游击作战规律，凭其精良装备狂妄骄傲，有利于红军充分发挥游击战术；四是首先消灭高桂滋部，可以补充和改善红军的装备；五是高桂滋和井岳

秀虽反革命立场一致，但他们之间有尖锐矛盾，红军有隙可乘，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在会上，少数人则提出不同的意见，主张两支红军组成主力兵团，集中优势兵力，与国民党军队打大仗硬仗，直插绥德、米脂国民党重兵驻守之腹地，首先夺取这两座县城。这种不切实际的错误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经讨论后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会议根据刘志丹、高岗等的主张，针对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兵力分布状况，分析了敌情，研究部署第二次反“围剿”的具体作战方案：集中兵力，首先打破高桂滋的“进剿”战线，而后部队向南发展，将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张秀山奉命北上

1935 年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在陕甘边苏区也进入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时期。根据刘志丹、高岗的战略计划，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在陕甘边红军主力保卫根据地的同时，抽出部分部队转出外线作战，袭扰国民党的后方。

1 月间，由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留守根据地，师长杨森率骑兵团挥师南下。骑兵团采取远途奔袭战术，一举攻破长武县城，歼俘国民党守军 100 余人。

2 月，杨森等率骑兵团东进扶施县，利用骑兵远距离作战的优势，在高桥镇川口歼灭国民党五。一团和扶施县民团 100 余人。后又在扶施县南川三十里铺以迅速的动作消灭民团数十人。

2 月下旬，杨森等率骑兵团先向宜川县奔袭，在松树林消灭民团 100 余人，后又转入扶施县东南，在金岔湾消灭民团 50 余人。

接着，杨森奇兵奔袭临真镇，全歼民团 100 余人，击溃宜川县云岩阻敌，俘虏 40 余人。骑兵团神速作战，声威大震，当转战到狗头山、后九殿，两地民团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自动缴械投降。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出击外线，在一个多月时间，纵横驰骋十余县，有

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牵制了“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南线、西线之敌，不但从军事上缓解了陕甘边根据地反“围剿”的压力，而且对刘志丹北上粉碎国民党军队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形成有利的局面。

同时，留守在南梁苏区的红四十二师二团、三团、义勇军和二路游击队，对国民党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重兵，采取迷惑、袭扰、阻击等战术，在老爷岭阻敌月余后，于 3 月奇兵突袭田崾峻，歼灭第三十五师一 O 五旅马殿邦一个营。

在此期间，由王富贵、张占华领导发动的彬县永乐镇起义民团 50 余人的部队进入陕甘边，编入留守南梁的红四十二师主力。

杨森率骑兵团返回南梁，刚与红二团、红三团、义勇军和二路游击队会师，就接到刘志丹、高岗从陕北送来的指示，命令四十二师主力红一团、红二团、骑兵团驻守陕甘边一带，由刘景范、杨森指挥，坚持陕甘边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红三团和义勇军，北上开赴陕北苏区。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接到指示后，决定在红三团和义勇军北上之前，再打几个胜仗。

4 月 29 日深夜，红四十二师主力到达六寸塬附近。在六寸塬驻有马鸿宾部的一个营，正在抢修工事。拂晓，义勇军首发攻入村里，先歼驻军 20 余人。

待天亮，大部队向据守山梁阵地的驻军发起攻击，红三团由东南方向主攻，骑兵团布置在左侧。红三团和义勇军多次冲锋，均因驻军火力猛烈受阻。

战斗持续到中午，红三团在骑兵团的配合下，虽又冲锋到驻军阵地前沿，但由于地形复杂，在驻军火力的封锁下，红军伤亡很大，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了重伤，部队被迫后撤。

此时，国民党一。五旅主力赶来增援，骑兵团在后撤中与红三团协调不周，冲乱红三团的队伍，战斗失利。这次撤退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负伤，吴岱峰代理三团团长，康健民接任骑兵团团长。

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从六寸塬撤出后，师政委张秀山根据刘志丹、高

岗的命令，即率领红三团、义勇军向北开进。沿途跟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辗转到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张家河一带驻扎。部队一到张家河，张秀山就立即派人送信给刘志丹、高岗。刘志丹、高岗得知红三团、义勇军进入陕北苏区，两人骑马赶到张家河。

在张家河，刘志丹、高岗召开了红三团、义勇军干部会议。会上，刘志丹向张秀山、吴岱峰、郭宝珊等介绍了陕北根据地二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传达了中共西北工委、军委周家硷会议和玉家湾会议的精神，并给张秀山通知了周家硷会议任命他为西北工委宣传部长的决定(当时张秀山未参加周家硷会议)。同时，正式宣布由高岗接任红二十六军政委。

寺儿畔歼灭战

1935 年 4 月 22 日，在陕甘边苏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和义勇军未赶赴陕北苏区之前，刘志丹、高岗亲率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主力北上横山县，在赤卫队和第三纵队的配合下，首先攻打井岳秀第八十六师高双城旅驻冷窑子李云发营。当时，李云发营在冷窑子、白狼城、寺儿畔各驻一个连，对苏区危害极大，经常窜入苏区破坏，捕杀共产党员和地方干部。

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部队到达黄家湾，了解到冷窑子的李云发营部驻在大民山的一座寺院里，四处筑有坚固的工事，其地形险要，不易攻打，随即改变作战计划，决定把红军主力部队埋伏在黄家湾、牛家沟一带，命令第三纵队队长陈世恩派出一个中队，把冷窑子李云发的队伍从据点诱出，待进入青阳岔附近一举歼灭。但是，当第三纵队将其诱至杨坪、总关口一带，狡猾的李云发就不再前行，立即龟缩回冷窑子据点，结果歼灭计划未能实现。

4 月 27 日，刘志丹、高岗决定攻打寺儿畔李云发营的一连驻军。当天傍晚，陕北红军主力部队从黄家湾向寺儿畔进发。出发前，刘志丹向参战的红军主力部队和第三纵队及赤卫队作了战前动员，他说：“冷窑子的李云发没有上钩，我们的计划没实现。今天晚上急行军，赶拂晓前到达寺儿畔，消灭这股国民党队伍，要做到打一点、解放一片。”

接着，刘志丹、高岗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在第三纵队和赤卫队的配合

下，连夜急行军，拂晓前将寺儿畔李云发的一连驻军团团包围。当哨兵发现时，红军前卫部队已摸到驻军所住的窑洞顶上，居高临下，占据了有利地形，堵住了退路。

战斗一打响，这一连驻军才惊慌地从炕上的热被窝钻出，有的急着穿衣服，有的慌得找枪，乱成一窝蜂。全连士兵从窑洞里冲出来，一排手榴弹在院中炸开了花，炸得个个抱头乱窜，到处躲藏。只用了几十分钟，战斗就胜利结束，除从高崖上跳下十余人逃脱外，连长被击毙，其余全部被俘。红军部队只有一人负伤。

战斗结束后，刘志丹把被俘人员集中在窑洞顶的场上，向他们宣传红军的革命宗旨和对俘虏的优待政策。红军部队到卧牛城，给俘虏们饱吃了一顿猪肉米饭，对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对愿意当红军的表示欢迎，有不少俘虏表示愿意当红军。

寺儿畔一战，使李云发营驻守在冷窑子、白狼城的两个连闻风丧胆，立即丢弃冷窑子、白狼城的据点，慌忙逃回石湾镇。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对第二次反“围剿”的必胜信心。当时，群众为寺儿畔的战斗胜利编了民歌：

千里雷声万里闪，
一块云彩来遮拦，
上来红军要共产，
共了安定共横山；
指挥就是刘志丹，
红旗打起一长串，
带着红军两个团，
夜里打进寺儿畔；
对准院里丢炸弹，
炸得白军胡乱窜，
白军一连全活捉.
当连长的炸成肉蛋蛋。

第七十章

三战三捷

白庙岔会师

1935 年 5 月 1 日，由张秀山、吴岱峰、郭宝珊率领的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二、三团在赤源县的白庙岔胜利会师。会师后的两支红军部队组成西北红军主力战斗兵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加上有巩固的苏区根据地，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以及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的密切配合，从军事上保证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白庙岔举行了万人联欢大会。高岗主持大会，刘志丹作了重要讲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也在会上讲了话。此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义勇军 900 多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一、二、三团 1000 多人，两支红军部队会师后形成 2000 余人的大军，士气高涨，斗志昂扬。

5 月 4 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开到赤源县玉家湾。在玉家湾由西北工委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敌总指挥部)成立，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白坚为总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为秘书长，统一指挥两支红军部队和地方各游击队，开展了对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战略反攻。

前敌总指挥部为了加强对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反“围剿”的军事领导，配合和协助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部队在陕北苏区与高桂滋

军队作战，决定在陕北、陕甘边成立两个军分会。

陕北军分会由马义负责，以绥德、清涧、安定几县为依托，统一指挥绥德、葭县、吴堡、清涧、米西、安定、赤源、横山等县游击队组编的几个纵队和其他地方游击武装，深入国民党军队后方，破坏国民党军队运输线、仓库和军事设施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红军主力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

陕甘边军分会由刘景范负责，在南梁、照金统一指挥两地区的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一、二团，做好根据地内坚壁清野工作，消灭周边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以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另外，前敌总指挥部指示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率领骑兵团，利用骑兵远距离快速作战的优势，轻骑戎装转到外线，直插成榆公路东侧的宜川、韩城、合阳等县一带，袭扰国民党后方，牵制国民党军队北上。

在赤源县玉家湾，西北工委还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有刘志丹、高岗、崔田夫、惠子俊、张达志、张秀山、郭洪涛等。在会议上，决定对西北工委班子进行调整，由惠子俊接任西北工委书记，由李生华接任惠子俊原陕甘边特委书记一职。张秀山仍负责宣传工作，崔田夫负责组织工作，郭洪涛为秘书长。

一日两捷

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后，获悉高桂滋部所谓的王牌军郭子封营进入苏区安定县杨家园则及附近几个村庄，妄图维护清涧至瓦窑堡一线的交通道路，以保证控制杨家园则煤矿，并经常出动，在周围“清剿”，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敌总指挥部根据高桂滋部的行动，决定趁其立足未稳立即部署兵力，坚决消灭郭子封营，杀出个威风给高桂滋看看。

1935 年 5 月 6 日夜，前敌总指挥部按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将西北红军分兵三路，红二十七军一团为一路，由魏家岔出发，直奔杨家园则西街，攻占郭子封营驻地野战工事；红二十七军二团为一路，从冯家岔出发，经过丹头直插杨家园则东街，攻占郭子封临时营房；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

军为一路，攻打墩山寨子，并抽出一部分兵力，配合游击队阻击清涧县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各路部队按照指定位置隐蔽起来，向外封锁消息，对郭子封营构成掎角攻势。

当刘志丹亲自带领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赶到杨家园则东山，在前沿察看地形，准备发起进攻时，发现墩山寨子的筑墙很高，山势险要，两侧又是深沟峡谷，兵力无法展开，据点易守难攻，如坚持发起强攻，势必会造成红军的很大伤亡。刘志丹当机立断，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后撤 15 里到魏家岔。

这时，担任先锋突击队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和部分骑兵，由贺晋年带领运动到杨家园则以西，距杨家园则只有几百米，刚与郭子封营接了火，发现那里的寨子壁垒坚固，不好攀登，如发起强攻，可能会造成对红军不利的战局。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前敌总指挥部传来撤退命令，贺晋年命令由一个排做后卫掩护，部队向吴家寨方向撤去。

5 月 7 日，天刚亮，郭子封自恃其营武器精良，士兵善战，竟然傲气十足地带着全营人马倾巢出动，兵分两路：一路尾随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一路尾随后撤的红二十七军一团。

红一团与郭子封营追兵且打且退，一直退到吴家寨。在吴家寨，部队刚摆脱郭子封营，准备吃早饭时，瓦窑堡方向的群众观察哨传来消息说，从瓦窑堡出发的高桂滋部五 00 团一个连押送一批“犯人”，准备送往绥德，正向吴家寨方向开来，距村子只有六里的路程。

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贺晋年带领的红一团和部分骑兵迅速赶到吴家寨西数百步远的铺儿设伏，先将从瓦窑堡方向开来的一连队伍歼灭。

铺儿是一道平川，两边是高坡，长满灌木林。红一团接受任务后，立即兵分两路，由贺晋年带一路隐蔽在路北，路文昌带一路隐蔽在路南。为了准确观察敌睛，派出两名战士化装成农民，在周围游动嘹望。

这一连队伍进入了红一团的伏击圈。贺晋年举枪朝空连发三枪，埋伏在高坡灌木林中的两路红军战士如同猛虎下山，从两侧山坡上猛冲下来。对方还没反应过来，行进的队伍就被分割包围，前卫排首先全部当了俘虏。后续队伍惊恐万状，丢下押送的“犯人”，转身没命地朝瓦窑堡方向逃去。

贺晋年命令部队紧迫不舍，一直追到张家峁一带，只有几个士兵逃脱，其余 100 多人全部被歼俘，缴获机枪 9 挺、长短枪 100 余支，救出被押解的赵通儒等共产党员和群众。

郭子封营听得瓦窑堡方向枪声激烈，即朝吴家寨追来，占据了吴家寨和一些制高点。贺晋年命令部队尽快打扫战场，将俘虏交给赤卫队迅速转移，然后命令红一团一鼓作气向吴家寨冲去。

贺晋年一到吴家寨，先命令部队抢占吴家寨后山的制高点，与进入吴家寨的郭子封营展开激烈的战斗。在红一团的勇猛攻击下，郭子封营被迫从吴家寨撤出，退守到白家塬、王家坪北山，构筑野战工事，与红一团形成对峙状态。

这时，贺晋年派人向前敌总指挥部报告了战斗情况。刘志丹得知红一团的战况后，即命令贺晋年所带领的红一团在吴家寨、白家塬侧击郭子封营，并截断其向杨家园则的退路；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从魏家岔、蜜蜂峪出发，分两路向白家塬北山发起进攻。

郭子封营一离开杨家园则坚固险要的堡垒工事，虽利用白家塬北山的有利地势负隅顽抗，但经红军战士的几次勇猛攻击，终于在下午 1 时半被郭宝珊带领的义勇军突破了前沿阵地，后续梯队趁势攻人。接着，红三团在吴岱峰的带领下，也从左翼攻破了郭子封营阵地。在红军的连续突击下，郭子封营被迫退到娘娘庙台附近。营长郭子封率部左冲右突，又遭贺晋年带领红一团从西南方向侧击，最后缩在一条泥泞的山沟里全部被歼俘。下午 4 时，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共击毙营长郭子封等 50 余人，生俘副营长以下 450 余人，缴获机枪 27 挺、长短枪 500 余支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

马家坪大捷

1935 年 5 月 8 日，高桂滋部五〇〇团第三营和团直属机炮连 1000 余人，由营长左向桓带队，护送着军饷、武器、弹药和服装等 300 多驮物资，还有团长李少棠的太太等军官家眷，从绥德县出发，经清涧县向瓦窑堡方向开来。赤卫队设在各山头上的“传山哨”很快就将这一情报传到杨家园则

以东埋伏在丹头的红九支队。高朗亭与阎应娃(队长)、杨风岐(政委)立即带着红九支队和清涧、延川、安定三县的赤卫队 6000 余人赶来阻击。

左向桓带着第三营和机炮连刚到马家坪，就遭到红九支队和三县赤卫队的伏击，前卫尖兵十余人被击毙。红九支队和三县赤卫队为了虚张声势，威慑敌胆，与及时赶来参战的少先队在四面山上插上红旗，鸣枪呼应，形成一个浩浩荡荡的人海包围圈。左向桓不知虚实，进退两难，被迫停止前进，龟缩在马家坪不敢动一步。

吴家寨战斗胜利后，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撤到黄家川一带，正待休整时，刘志丹就收到红九支队派人送来的鸡毛信，紧接着，又收到中共秀延县中心区委书记陈克功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红九支队和三县赤卫队在马家坪将高桂滋部左向桓营和一个连包围，要求红军主力速往歼灭。刘志丹闻讯，当机立断，立即率领红军主力从黄家川出发，急行军向马家坪开去。

5 月 9 日，西北红军主力赶到马家坪。刘志丹登高观察了高桂滋部左向桓营和机炮连据守山头的态势，立即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向马家坪北山梁进攻；红二十七军一团向马家坪西山梁进攻；红二十七军二团从湫峪沟出发，向西侧发起攻击；义勇军从丹头向东迂回，从侧面攻击，形成四面包围的阵容。同时，命令红九支队与赤卫军、少先队在史家沟及其两翼布置天罗地网，伺机追捕溃逃的士兵和人员。

当各路红军部队吹响冲锋号，向左向桓营和机炮连在马家坪村四周布设的阵地发起攻击时，四处高山上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摇旗呐喊，用土枪、土炮、爆竹助威，与红军主力的枪炮声、喊杀声汇成一片，顿时响彻秀延河两岸的沟谷，吓得左向桓带着 1000 余人的军队，胆战心惊，乱作一团。左向桓带着溃无斗志的士兵企图突围，被红军乱枪击毙。士兵们见营长已死，都纷纷缴械投降。

这次马家坪包围战仅用两个小时，就很快结束了战斗，击毙五 00 团第三营营长左向桓等 40 多人，俘虏营副以下 450 多人及逃亡地主、反动分子和“铲共义勇军”等 100 余人，缴获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27 挺、长短枪 450 余支、八二迫击炮 2 门、军衣 2000 余套、银洋 10 万余块和大量药品物资。

西北红军主力在短短几天内三战三捷，重创了高桂滋军队的锐气。迫使驻守安定县城的国民党军队放弃防地，收缩战线，在瓦窑堡固守待援。安定县城没费一枪一弹遂告解放，成为西北红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从而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鼓舞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心。

铺儿、吴家寨、马家坪战斗结束后，前敌总指挥部重视教育争取俘虏，抓紧落实俘虏政策。由高岗负责对俘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许多俘虏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队伍，并为红军扩充兵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被俘国民党军官家眷，执行不加伤害的政策，由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赵通儒和团长李少棠谈判，商定了交接地点和时间，在安定县张家沟菜园放回国民党军官家眷。李少棠接收其家眷时，特意给红军送来武器弹药和白酒等礼物，以示感谢。

5 月 10 日，西北工委和军委在赤源县玉家湾召开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军民祝捷大会。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报告，高度赞扬了苏区人民帮助红军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贡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红军歼灭国民党整营以上建制军队的作战经验，并对下一阶段作战的方向、计划提出建议。

在祝捷大会上，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授予红二十七军一团“英雄红一团”的荣誉称号。刘志丹说：“这次消灭国民党军队两个整营又一个整连的胜利，意义重大。事实证明，红军主力兵团的拳头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仗打出了陕北红军的威风。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也不会吃掉我们，他来多少，我们就消灭他多少!”

刘志丹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长久地响彻天空。群众看见红军部队装备改观，除每个战士换上新军装、还有枪扛外，就连游击队员和部分赤卫队员也丢掉大刀长矛，背上了枪。人们奔走相告，穿着花花绿绿的节日服装来参加祝捷大会，光着屁股的娃娃们欢蹦乱跳看热闹，青年农民都积极踊跃要求报名参军。

祝捷大会一结束，西北工委和军委在玉家湾召开会议，决定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乘胜向东出击，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军队，以彻底

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同时，要求在“红五月打通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与神府苏区连成一片。

在这次会议上，批判了军事行动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批评了一些同志坚持攻坚战、进攻国民党军队防守坚固的城市的冒险主张。据张秀山所著《我的八十五年》回忆，会后，郭洪涛向中共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家塬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的对立。报告中还说：“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中共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造了红二十七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

不久，陕北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所红军医院，由刘志丹指定高朗亭任院长，李向富任政委。高朗亭把俘获的七个医生及司药、护士组织起来，又经赤源县苏维埃政府动员了十多个赤卫军战士，组成炊事班、饲养班，把分散安置在农村的伤病员集中起来治疗。医院分内外两科：内科以中医为主，由老崔大夫负责；外科以西医为主，由阎玉珊(阎红彦的长兄)负责。医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被俘医生的改造工作做得成功。

西北红军主力在铺儿、吴家寨、马家坪的三大胜利，使蒋介石派驻绥德由毛侃率领的陕北参谋团大为惊慌，分别在 5 月 16 日、5 月 19 日给蒋介石发出两份急电：

5 月 16 日电文：

陕北各县匪情，以高师(高桂滋八十四师)之安定、清涧为最。我军清剿开始后，匪即集中安定西北，企图抗拒，只以高师兵单，未能积极进剿。此次刘旅长奉命驻安定，匪或已先知，预伏 x 峰，地形峻险，援军被阻，弹尽力竭，遭覆没，损失有五连之众。顷闻匪向延川移动讯，企图犹待判明。安定县府随军移堡(瓦窑堡)，暂可无碍。

5 月 19 日电文：

高师刘旅左营本月 8 日由清涧赴安定行至杨家园则,遇匪接我不利，原驻该处之郭营长援战阵亡，左营长不知下落。损失在五连以上．辎重军服 1500 套、饷项 2 万余元、药品及客货百余驮，均被掳。安定县城已放弃，迁徙瓦窑堡。

第七十一章

两块根据地连一片

声东击西

铺儿、吴家寨、马家坪三战三捷，打得国民党军队心惊胆战，尤其是高桂滋撒在陕北苏区各据点的“围剿”部队，屡遭红军的打击，屡战屡败，更是惊恐万状。高桂滋一面严令各县驻军集中城防，不准出城，一面将兵力较小的据点撤去，集中到大的据点，并急请蒋介石速派兵增援。

前敌总指挥部根据西北工委赤源县玉家湾会议精神，适时把握战情变化，决定乘士气高昂、斗志旺盛，率领西北红军主力乘胜向南出击，攻打延长县城，在运动中寻机歼灭国民党军队。

1935 年 5 月 17 日，刘志丹、高岗率领红二十七军和部分游击队向东挺进，以声东击西的奔袭战术，扬言要攻打清涧县城和绥德县城，首先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错觉。高桂滋急忙调兵遣将，对清涧和绥德两县城加强防守。部队佯人绥德县，在晋军史泽波驻守的据点定仙墕进行一番袭扰，然后掉头西返。

5 月 20 日，在返途中，前敌总指挥部为使高桂滋确信红军主力正在实施东进作战的军事行动，决定在清涧、绥德两县交界将高桂滋部在张家圪台的一连驻军顺手牵羊地歼灭。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他亲带红军主力伏击可能从绥德方向来的增援之兵。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在王士杰带领的红三团的火力支援下，迅速冲进张家圪台村，没费工夫就歼

灭高桂滋部一个整连，缴获长短枪 80 余支、轻机枪 9 挺。

这时，高桂滋部驻苏家岩的一个连闻知红军出现在张家圪台，全连倾巢出动，急忙赶来增援。行至中途，因听不到张家圪台的枪声，料张家圪台驻军大势已去，便又龟缩了回去。

张家圪台一战后，红军主力移驻清涧县东区店则沟一带，摆出攻打绥德、清涧两个县城的态势，暗中却秘密运动到延长县的交口、拓家川一带集结。而此时，高桂滋误认为红军主力还要在自己的“围剿”区域作战，继续调集兵力到清、绥两县布兵设防，日夜赶修工事，严加戒备。米脂县守军也闻风丧胆，收缩外围据点，严加防御。而延长县城守军却高枕无忧，松懈了警戒。

解放延川城

延长县城北面倚山，南临延水河。县城内东西只有一条街，有两个制高点驻重兵把守，一个是城西北角的一座山岭，岭上有寨堡；一个是城东北角的碉堡。在延长县城的西门外，有一个官僚豪绅开办的石油厂，城东十余里的烟雾沟是延长油矿分局所在地，那里有高桂滋部骑兵连 140 余人，还有团总李鸣吾指挥的延长、延川两县民团 200 余人及延川县警队和矿警队各三四十人，总共 400 余人，形成延川县城守军的内外围防线。

刘志丹、高岗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诱外线驻军出巢，然后攻取孤城。于是，命令红二十七军二团和部分游击队担任诱敌任务，要尽量把县城外围之敌诱出百里以外。同时，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三团负责攻城。

1935 年 5 月 27 日，担任诱敌任务的红二十七军二团和游击队，装作在县城外山塬上打土豪，虚张声势。李鸣吾听说城外山塬上出现红军的小股队伍，急于抢功领赏，果真带着延川、延长两县民团 200 余人杀气腾腾地追来。

红二团和游击队与民团一交火，佯装败退。李鸣吾带着民团紧迫不舍，跟在红二团和游击队后，一直追到距延长县城百里之外的茹子崾。延长县城里的守军高兴地以为红军被李鸣吾带着民团赶走了，更放松了县城的防

卫。

29 日，红二十六军二团、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三团秘密运动到延长县城外。红二十七军一团的任务是由城东北角发起进攻，同时派一部协助义勇军从北面登城；红二十六军三团的任务是攻取城西北寨堡和西门外的石油厂。

是夜，天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刘志丹亲率红二十七军一团和义勇军摸到县城东城墙下，由贺晋年带着郭立本、贺柏平等组成的突击队，带着云梯偷偷靠近城墙。刘志丹立即发出命令，部队开始了攻城战斗。

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突击队长的栾新春带着突击队员搭起云梯，几分钟就有四五十人登上城头。突击队登上城头后，由郭立本带一部分队伍，立即向城东北角的守军碉堡发起攻击，碉堡里的守军很快被歼，迅速占领了守军北制高点；贺吉祥带一部分队伍，沿城墙经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即夺取了东门城楼，并打开了县城东门。

刘志丹、高岗、张达志、贺晋年等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杀声一片，由东门冲入城内，直奔国民党县政府。部队冲进县政府，只见屋内绣花被子乱摊在炕上，被窝里还热乎乎的，却不见了国民党延川县县长。战士们料定人不会跑得太远，撒开在院里到处搜索，果不出所料，在一堆柴垛里抓住狼狈不堪的“县太爷”董松寿。

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一团一部冲人县城，直扑骑兵连的连部。骑兵连拼死挣扎，负隅顽抗，使进攻部队伤亡较大，义勇军的常队长牺牲。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将骑兵连全部歼灭，生擒骑兵连连长汪镜河，俘获 100 余人、战马 100 余匹。

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三团亦经激战很快攻夺了县城西门西北角的制高寨堡，全歼寨堡守军。随之，红三团分成两路：一路攻取西门，一路向西门外石油厂发起进攻。在红三团的猛烈攻击下，石油厂的矿警队不得不缴枪投降。到次日天亮时，延长县城内外守军全部被歼灭。

延长县城守军被歼灭后，被红二十七军二团诱至茹子崾的团总李呜吾才发觉中了红军的圈套。李呜吾像个输光了的赌徒，气急败坏地带着跑乏的民团，朝延长县城回窜。红二团和游击队紧紧绊住李呜吾不放。

当李鸣吾带着民团赶到烟雾沟时，早有前敌总指挥部派出的红二十七军三团布下埋伏在等待。李鸣吾遭到前堵后截的夹击犹如一头困兽，负隅顽抗，急命民团占据了一个有利地形，拼死抵抗。这时，刘志丹又派出红二十七军一团两个连迂回到李鸣吾民团侧后。在红军四面攻击之下，反动团总李鸣吾被当场击毙，民团200多人乖乖缴械投降。

攻打延长县城的战斗是刘志丹、高岗妙用“声东击西”、诱敌出巢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打得非常漂亮的歼灭战。红军以伤亡十余人的代价，毙俘守军近500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战马170余匹、银洋数十万，还有大量物资、药品、被服，又一次改善了新扩编红军的装备。

打开延长县城，前敌总指挥部成立了城防司令部。中共延长县委和苏维埃政府迁进县城办公，中共延长县委书记自如冰和苏维埃政府主席苏成德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处决了国民党县长董松寿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刘志丹、高岗在镇反大会上分别讲了话。

刘志丹在大会上明确宣布：红军占领县城后，维护城市工商业，维护小商小贩以及群众的利益，只没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对其他任何人的财产不加以侵害。同时命令进城红军维持好县城秩序，要求部队严格军纪，不得随意上街，不准私人民房，对违法乱纪和行为不轨者予以严惩。会后，刘志丹、高岗和红军指战员及地方领导一起照相留念。红二十七军一团有一个战士，打土豪时私自拿了两件妇女服装，被查出后，不仅召开全团大会批评斗争，而且还被开除军籍。这一做法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戴。

延长县城的解放，使国民党军队胆战心惊。延长县西北甘谷驿民团四五十人闻得延长县城失守，自知不是红军对手，向红军缴械投降。延川县城守军势孤力单，不敢固守县城抵抗，连夜弃城逃到清涧县城里。延川县城未发一枪一弹，遂告解放。

安定、延长、延川三座县城一解放，国民党永坪镇的驻军四面受困，也不敢驻守，弃了据点逃回瓦窑堡。前敌总指挥部派出罗成德等相继前往甘谷驿收缴了请降民团的武器，到延川县接管了县城，并占领了永坪镇。

至此，宜川县以北，咸榆公路以东，经临真镇、延长、延川直到绥德

以南地区，除清涧、瓦窑堡两座县城孤守着国民党军队外，城外全境村镇国民党驻军的据点全部被铲掉。根据地和游击区大为扩展，中共地方组织和工农政府机关相继建立。

高桥镇战斗

安定、延长、延川三座县城解放后，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乘胜向西南挺进，拔除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之间的国民党军队据点，打通两个苏区的联系。刘志丹与高岗制定了先夺甘泉、孤立肤施、再打安塞的进军计划。

1935 年 6 月 4 日，红军主力从临真镇出发，昼夜兼程，按部署计划南下奔袭甘泉县城，准备在第二天拂晓前对县城发起攻击。

驻守甘泉县城的是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四十二师一个营。红军部队到了麻子掌，侦察员报告，红军意图暴露，甘泉守军正在抢修工事，戒备增强，很难得手。当时，由于部队急行军，走的是深山老林，沿途荒无人烟，许多战士喝了梢林的水，不少人腹泻不止生了病，连一些能打善战的同志都掉了队。前敌总指挥部根据县城的防御情况和部队的战斗力状况，遂改变原作战计划，在甘泉虚晃一枪，即率红军沿洛河西上，决定进入陕甘苏区的下寺湾作短暂休整。

下寺湾是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所在地(1935 年春迁此地)。这里已设立红军总医院，部队即把一些伤病员送到医院。

6 月 10 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张达志、贺晋年带领红二十七军一团挺进高桥镇。高桥镇驻民团数十人，团总姓白。在红一团未抵高桥镇时，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已经把高桥镇民团团团包围。红一团赶到高桥镇，即喊话展开政治攻势，要民团缴枪投降。寨子里的民团说：“你们是游击队，我们不投降。红一团来了我们就投降。”

红一团战士齐声喊道：“我们就是红一团。”

寨子里的民团不相信。张达志、贺晋年即集中了几挺轻机枪，向寨子里扫射了一排子弹。在红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民团听到机关枪的扫射，确定是红军正规军已到，便喊出话说：“保我们性命，优待俘虏，可以缴枪。”

并请红军进寨子受降。

张达志、贺晋年同意了民团的请求，但为了防止民团假投降，决定由贺晋年带领突击队进寨，张达志组织数挺机枪布置在寨墙外，万一民团诈降，就用火力封锁寨门，掩护突击队消灭民团。贺晋年带领突击队按规定时间进了寨门，顺利接收了寨子里已经排好了队、架好了枪，正等待受降的民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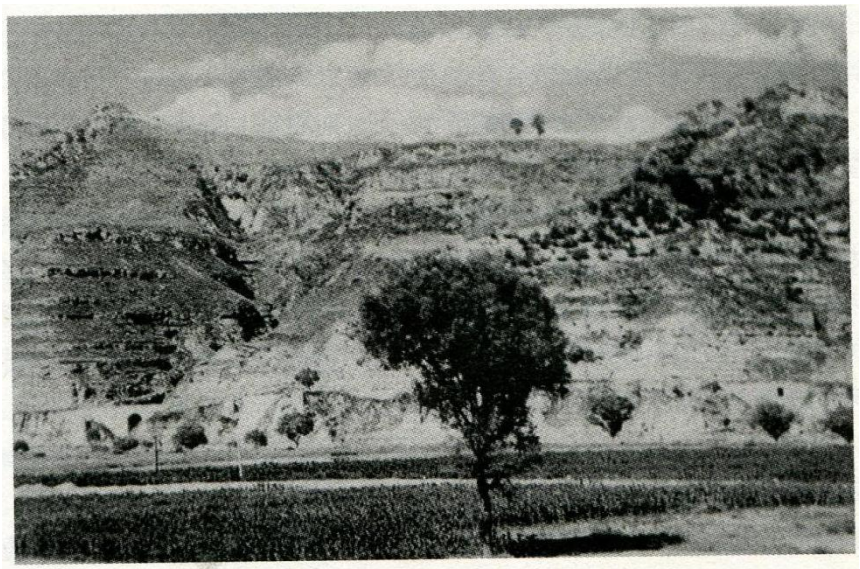
6 月 11 日，天刚刚亮，部队还在高桥镇寨子里休整，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有零星枪声。张达志、贺晋年派出一连连长冯德胜带队伍出去侦察。原来是肤施县民团总指挥李汉华带团丁 100 余人，前来增援高桥镇民团，因不明寨子里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寨，只好在寨子对面的山头上放冷枪试探。

冯德胜带着队伍一个冲锋，这股民团慌忙撤退。冯德胜紧追不舍，追至高桥镇小北泉村、温家沟之间，将民团包围，李汉华当场被击毙，歼俘民团 20 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支。

解放新安寨

1935 年 6 月 12 日，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出兵攻打国民党安塞县政府所在地——新安寨。

新安寨三面环沟，一面连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寨里驻守着一个连和民团 200 余人。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三团攻打寨子，红二十七军一团阻击肤施县方向可能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安塞县城新安寨

当时，西北红军没有炮兵，只靠机枪、步枪攻城夺寨，很难得手。因此，红二十六军三团几次发起强攻，都未能攻下寨子，部队伤亡很大。红三团团长吴岱峰发急了，报经前敌总指挥部同意后，决定组织红三团部分战士在寨外朝寨子里挖地道。

红三团连挖几天，一直把地道挖到寨子里守军的碉堡底下，并用一口棺材装满炸药，准备让守军坐“飞机”。地道挖好，把炸药安放进去，正准备引爆时，得知寨子里一连守军和民团趁着夜里天黑风疾，甩掉政府官吏，逃跑到肤施县城去了。

天亮后，红军冲入寨子，肃清了寨子内残留的军警，缴获国民党县政府全部公文档案、官方文书和大批物资，俘虏安塞县新旧两任县长，解放了第四座县城。

血战李家塌

1935 年 6 月 18 日，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率领红军主力乘胜前进，将安塞县国民党军队驻守的李家塌寨子团团包围。

李家塌寨子耸立在一个山岭上，东南西三面都是天然的大沟，沟壁陡峭，很难攀登，尤其南面是天险断崖，人兽绝迹。东面坡度稍缓，但守军已把它削成了峭壁。东北面连山，守军又挖了人工壕，与外界隔绝。寨子的东北角是守军控制的制高点，既可以指挥全寨火力，又可以俯瞰寨外。这个寨子北高南低，只有一个东门，不但在陡峭的崖畔上，而且四周墙上布满了滚木礌石，真可谓“万无一失，固若金汤”。

这个寨子是安塞境内国民党军队最后的一个据点，但却控制着陕北与陕甘边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寨子里聚集着全县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及其家属，守军有 200 余人都是反动民团，加上地主恶霸及家属共约 2000 人。寨子里这些守军经常外出抢劫群众财物，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破坏陕北苏区和陕甘边苏区的联系，危害极大，群众对其恨之入骨。

刘志丹下决心要拔掉这个钉子，打通隔离两块苏区最后的屏障，命令由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红二十六军三团阻击从保安县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二团在南山用火力支援红一团攻寨，红二十七

军三团为预备队。

李家塌寨子被包围后，红军连续攻打五天五夜，都未能攻克，大家十分着急，但又苦无良策。担任主攻的红二十七军一团曾效仿攻打新安寨的办法，从寨外向寨子里挖了一条地道，准备安置炸药爆破，让寨子里的守军坐“飞机”。

不料，寨子里的守军发现了红军行动，连夜挖深了外壕，将红军已挖开的通向寨子里的地道切断。

这天下午 3 时许，贺晋年、杨琪、张达志想不出攻打寨子的好办法，让警卫员买来一坛酒，正在寨外西南山下的一棵柳树下喝着闷酒，刘志丹的通信员跑来找贺晋年，说刘志丹有要紧的事情要见他。

贺晋年随着通信员到了寨外南山的山脚下，只见刘志丹、高岗在一起，刘志丹正聚精会神地用望远镜观察着守军寨堡南面山畔的地形。刘志丹观察许久，把望远镜递给贺晋年，让贺晋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观察，并说：“老贺，你仔细看，对面的石崖上有个裂缝，能不能从这里爬上去?”

贺晋年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一番，略加思索后回答：“可以。”

刘志丹指着寨子的南端说：“这个方向是国民党守军的薄弱部位，爬上去后，出其不意，抢占寨子南角，然后向东门发展，使红军主力从东门进寨。战斗打响后，义勇军和红二团可以用火力支援你们，封锁守军的主力南调。等守军发现我们的意图，再调整部署，他们就来不及了。”

贺晋年向刘志丹说：“老刘，你放心，这股守军我包了。”

刘志丹建议从义勇军、红二团抽调些兵力给贺晋年，贺晋年很有把握地说：“不用，这个任务红一团包了，保证今天拿下来。”

贺晋年回到红一团，立即将除前沿阵地的指战员外的所有战士集中起来，扼要地进行了战前动员。最后，贺晋年身先士卒地说：“敢上的站出来，我带队。”

声音一落，一下子就从队伍里主动站出好几十个战士，争着要随贺晋年去打先锋。贺晋年挑选了冯德胜、郭立本、白竞旺、冯连当、薛其昌、梁文郁、李四娃、杨玉清等 30 多名精干强壮的战士，每个人带上马枪、短枪、手榴弹，组成突击队，由贺晋年亲自带领随即出发。

刘志丹为了掩护贺晋年所带的30多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能迅速而隐蔽地到达寨南石崖下的预定位置，突然吹响发起总攻的军号，摆出攻打寨子的架势。寨里寨外顿时尘土飞扬，烟雾滚滚，枪炮声齐鸣，战士们一片喊杀声响彻山谷。寨子里的守军乱作一团，火力密集地向寨外扫射，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红军正面攻击的方向。

贺晋年趁势带领突击队隐蔽地运动，先偷偷摸到寨子南面山畔的断崖下。这里有个被洪水长年冲刷而形成的石罅。石罅的两边长满了山草和灌木，崖高十多丈。贺晋年指挥突击队顺着观察好的石缝，脚蹬石岩，手攀山草和灌木，奋力向上攀登。不多时，突击队30多人神不知鬼不晓地全部爬上断崖。贺晋年真佩服刘志丹细致人微的观察力。

突击队爬上断崖，前面是二三十米的高坡，坡上面就是寨墙。突击队隐蔽直到傍晚，战斗方才结束。刘志丹、高岗在指挥阵地上，清清楚楚地目睹这一激烈紧张的战斗。当部队打扫战场，贺晋年带着警卫员走下寨子时，刘志丹疾步迎上前去，激动地紧握住贺晋年的手说："红一团的同志打得英勇顽强。这些反动团匪死有余辜。"

这次战斗共毙俘守军600多人，缴枪300余支，但这次战斗中红军伤亡也很大，是红军自反"围剿"以来伤亡最大的一次。

次日，在李家塌寨子外的柳树下设了个1临时法庭，刘志丹亲自审判了被俘的团总唐海鳌等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头目，历数他们的罪恶，当场执行枪决。对其他一般随从人员和团丁，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每人发给路费，释放回家。

刘志丹在释放被俘团丁时，指着唐海鳌等的死尸，严厉地说："你们参加反动民团，危害革命，抢掠人民，本应严加惩处，但念你们是一般团丁，罪恶不大，我们从宽处理，这是红军一贯的俘虏政策。你们回家后，要改恶从善，不许再做危害革命和危害人民的事，如有再犯，就是这个下场。"

这次审判大会开得很好，震动很大，深得人心，四乡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李家塌一战，安塞县全境解放，从此，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后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一时地方上的群众要求参军的热情十

分高涨，十三四岁的少年儿童跟着部队几天不回家，缠着要当红军，群众杀猪宰羊，送粮送物，慰劳品堆积如山。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部队新组建一个少共营和一个教导队，以满足群众的参军愿望，并将肤施、甘泉等地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统一组织起来，成立了游击总指挥部，由李景林任总指挥，以牵制肤施、甘泉两座孤城之敌，配合主力红军率军北上。

第七十二章

红军北上威震三边

解放靖边城

李家塌一战后，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北上青阳岔、卧牛城一带休整，并将大批伤员送往下寺湾红军总医院。此时，陕北到了麦收季节，瓦窑堡、石湾镇国民党守军乘红军北上之机，四处抢收小麦，掳掠财物，扰害百姓，并举兵进犯赤源县、秀延县，危及西北工委机关。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派红二十七军二团返回赤源、安定县等地区活动，打击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保卫后方，以牵制国民党军队西犯。

同时，前敌总指挥部为了扩大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接地域的范围，扫清连接区域周边国民党军队据点的威胁，决定增强红军主力兵团的战斗力，再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留守陕甘边的红二团，北上随红军主力攻打靖边县城，并在青阳岔、卧牛城地区积极进行攻打靖边县城的准备。

靖边县城也叫镇靖城，坐落在毛乌素大沙漠的南端，西通安边、定边、宁夏，东连横山、榆林，北接内蒙古。这座县城依山面水，芦河水环绕城东、西两面向北流去。城西一线紧靠长城。县城四周城墙高筑，东、南、北有三个城门，东北角另有一个水门。城西耸立着一座山岭，岭上筑有寨堡，名叫西山寨。城内两条大街在钟鼓楼处相交，是全城的中心。

城内的守军是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第二营，营长叫屈志鹏，全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共 400 余人。另有安定、安塞两县逃窜来的民团、

县警队、保安队一百六七十人，总共 600 人左右。守军一部分兵力放在城西的西山寨门外，以防一有情况，即可上坡固守西山寨(寨子地形高，吃水困难，平时不能大量驻兵)，其余兵力分布在北门及城隍庙、钟鼓楼、南城门、东城门、东南城角等几个制高点。东南城角有一段城墙还没有来得及修筑，人可以攀登上去，其余地段的城墙很难登上。

这次红军主力参战的有红二十六军二、三团及义勇军，红二十七军一、三团及一些游击队，共 3000 余人。红军与守军兵力对比约五比一，红军占绝对优势。但是，屈志鹏营是井岳秀的一支精锐部队，人称“三枪牌”(即长枪、短枪、大烟枪)老土匪，战斗力较强，凭险据守。

1935 年 6 月 27 日，前敌总指挥部根据镇靖城的地形和守军的兵力部署，决定用奔袭的办法攻取。红军由青阳岔、卧牛城出发，急行军向镇靖城挺进。青阳岔、卧牛城距镇靖城约有一百四五十里路。次日凌晨，部队隐蔽地渡过芦河，逼近镇靖城。刘志丹命靖边游击队一部警戒柠条梁国民党守军增援，一部到芦河嘴一带阻击国民党横山县守军增援。

红军主力一到镇靖城外围，前敌总指挥部就对攻城战斗进行了具体部署，由义勇军攻打西山寨，红二十六军二、三团从东南城角突破，红二十七军三团攻打南城门，红二十七军一团为预备队。

6 月 28 日拂晓，红军各部做战斗准备，按照指定的位置展开兵力，向镇靖城运动。在义勇军向西山寨进逼时，因向导把皇府城误当西山寨，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直到天亮还未赶到西山寨。

红二十六军二、三团的突击队，在义勇军还未赶到之前，已经从东南城角发起进攻，攀登上城头，消灭守军十余人，并沿城墙向南城门突击。南城门的守军发现红军已登上城墙，遂向突击队开枪射击。顿时，全城枪声四起，红军原定的偷袭变成了强攻。

红二十六军二、三团的后续部队，由突击队控制的突破口迅速投入战斗。红二十六军三团一连，在团长吴岱峰的指挥下，首先夺取了东门。红三团二、三连向钟鼓楼发起进攻，但因城内街道地形开阔，部队不易隐蔽，受到南城门楼、钟鼓楼和西山寨等制高点守军火力的封锁，使红军前进受阻，伤亡很大。

红二十六军二、三团遂打通老百姓的院墙，穿过院落，向钟鼓楼逼近，在钟鼓楼附近与守军展开了巷道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守军在各制高点的火力掩护下，向红二十六军二、三团进行疯狂反扑，他们强迫城内一些妇女儿童走在前面，向前推进。红军不忍伤害无辜百姓，被迫后撤一段，双方暂时形成对峙状态。

战斗持续到中午，根据贺吉祥、栾新春奉刘志丹命令转到南门外侦察地形后的报告，待命集结在东门外的红二十七军一团决定投入战斗。

贺晋年立即带领红一团，由东门突进城内，避开开阔的大道，从路北打通老百姓的院墙，直插城隍庙，迅速消灭了城隍庙的守军。接着，贺晋年把红一团分成两路，一路攻击北城门楼，一路向钟鼓楼进攻。向钟鼓楼进攻的一路队伍，连续几次冲锋未克，即由贺吉祥带 18 人组成突击队，用手榴弹边朝守军方向甩着，边冒着守军密集的扫射向前冲去。当冲近钟鼓楼前时，一排子手榴弹扔进守军据守的工事里，工事里的大部分守军被歼。

这时，红二十六军三团也向钟鼓楼发起突击。在两个团的勇猛冲锋下，守军乱成一团，红军趁势攻占了钟鼓楼，歼守军一部，其余守军逃到祖师庙。

屈志鹏营据守的钟鼓楼被攻占后，红二十七军一团分成两路，集中向北城门发起攻击。

红二十六军三团刚离开钟鼓楼，城内守军有几发炮弹打到钟鼓楼上，钟鼓楼顿起大火。

这时，义勇军才赶到西山寨外。只见几杆红旗高飘，义勇军向西山寨发起攻击。在红军分割攻击守军据点的形势下，城内守军顿时大乱，有的向西山寨逃窜，有的退据房顶、墙角，负隅顽抗。

在持久的激烈战斗中，有很多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悲愤交集的红军战士怀着满腔怒火，奋勇地向城内残余守军猛冲猛杀。红二十六军三团与红二十七军三团内外夹击，很快攻占了南城门楼。

义勇军在攻打西山寨时，由于山寨守军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几次强攻均未打下。刘志丹急命红二十六军二团抽出部分战士，协助义勇军从城内向西山寨发起进攻。

在城内城外夹攻之下，郭宝珊派出张占魁等四人组成突击队，各带短枪、大刀、手榴弹，绕到山寨的西南城角下，利用多年失修的城墙缝，攀登上西山寨，只听得几颗手榴弹轰响一声，义勇军一拥而上。经少时激烈战斗，全歼了西山寨守军。

营长屈志鹏在北城门楼指挥残兵拼死抵抗。红二十七军一团经强打硬冲的一场激战，攻上北城门楼。屈志鹏见大势已去，只带几个士兵向西逃窜，其余守军被全歼。

战斗结束时近下午，红军各路战斗部队均未俘获营长屈志鹏，也未发现他的尸体。经询问俘虏，始知屈志鹏已经化装逃跑。贺晋年立即派出栾新春带七八个战士，骑上快马追击。栾新春等向西追了 20 多里，将屈志鹏击毙。

战斗刚结束，当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到，送来许多慰问品，并要求见刘志丹。有几个年纪大的乡亲来到刘志丹跟前，一听说面前站的就是刘志丹，把刘志丹围了起来。其他群众蜂拥而来，有的端着绿豆汤，有的拿着熟鸡蛋、鲜黄杏、荞面饼，递给刘志丹和周围的红军战士，请求红军打开镇靖城，驻扎下来不要走。

刘志丹双手接过一碗绿豆汤和几个黄杏，连声说：“你们要求共产党和红军不要走，这完全能办到，共产党和红军既然来了，就不会走。今天打开镇靖城，消灭了屈志鹏队伍，活捉了剥削人民的国民党县长、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吏，我们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还要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彻底摧毁。靖边县工农民主政府早已成立，今天随红军进城办公了，希望全县人民拥护自己的政府，协助政府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解放镇靖城的战斗中，共毙伤屈志鹏营 500 余人，俘靖边县长、县党部书记以下官员和土豪劣绅共 1000 余人，缴枪．500 余支、追击炮 6 门及大量弹药和其他物资。当时有的战士没经验，见了迫击炮弹不知是什么东西，往地上砸时造成误伤事故。

这次战斗中，由于屈志鹏营多系土匪、流氓，极为反动，因此生俘者很少，绝大部分被击毙，从安塞、安定两县逃窜到镇靖城的反动地主民团头目阎九登、沈桂芳等被一网打尽。在战斗中，红军部队也付出很大代价，

其中有红二十六军三团连长魏四儿、义勇军第二大队队长王东来等 50 多名英勇善战的同志牺牲，还有 100 多名将士负了重伤。至此，西北红军解放了第五座县城。

解放保安城

解放镇靖城一战中，西北红军指战员英勇战斗，全歼了井岳秀部的王牌营，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极大地震慑了三边一带的国民党军队。

驻守保安县城的是第八十六师高双城部张志英五一二团一个营及路登高、李建堂、李建康的民团。镇靖城一解放，保安县城完全陷于孤立无援之势。保安县城张志英的一营驻军和民团慑于红军威力，不战自退，仓皇弃城逃跑。保安县城遂告解放。保安县城守军逃跑时，国民党县长和一千政府要员们惊恐万状犹如鸟兽散，他们连装好银洋的袋子都来不及带上，仓皇出城逃命而去。当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队在白天章、刘景范等带领下冲入国民党保安县政府时，只见国民党县长和一干政府要员装好的一袋袋的银洋摆在炕上。

张志英营逃出保安县城后，红七支队靖边游击队与庆阳游击队乘胜追击，一直将张志英营和路登高、李建堂、李建康等民团追到靖边县柠条梁。保安县警察大队长景英贵走投无路，向红军投降。金佛坪守军张廷祥营慌忙逃回安边城的老窝。

1935 年 6 月 28 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经卧牛城、青阳岔由靖边县境开到赤源县的唐家川、李家岔一带休整。在李家岔召开祝捷大会，热烈庆祝西北红军连续解放六座县城的重大胜利。

不久，除甘泉、肤施、清涧、瓦窑堡、石湾、老君殿、柠条梁、旦八寨子等十多个据点和土围子由国民党军队占据外，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连为一体的苏区约 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飘扬起革命的红旗，在 20 多个县建立起工农民主政府，游击区域发展到 30 多个县，其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至此，人们把陕北、陕甘边苏区形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习惯地统称为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西北红军取得了空前辉

煌的战绩，总计歼俘国民党正规军 2000 多人，地方武装 3000 多人，缴枪 3000 多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各种炮数十门；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同时，红军主力发展到 5000 余人，游击队发展到 4000 余人。蒋介石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

杨森出击南线

红二十六军三团、义勇军北上陕北苏区期间，留守在陕甘边苏区的红一团、红二团、骑兵团以及第二、三路游击队坚持以南梁地区为中心，四处出击，牵制了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冯钦哉第四十二师、杨步飞第六十一师，使西南线的国民党军队既不敢深入陕甘边根据地的腹地，又阻止了其北进的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刘志丹、高岗等率领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根据地的作战。

留守陕甘边苏区的红二十六军三个团根据刘志丹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作战命令，红一团保卫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并阻击西线“进剿”之敌；红二团向北主动出击，打通陕甘边苏区与陕北苏区之间国民党占领的隔离区，向陕北根据地靠拢；骑兵团向东南主动出击，牵制东南线之敌，打乱国民党军队“进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作战部署；第二、三路游击队坚持在地方配合红军作战。

5 月初，红二十六军二团在杨清川伏击国民党警备骑兵连获胜。

5 月中旬，红二团奇兵奔袭宁塞川、五城镇，歼灭两地民团 200 余人。后又北进定边县，在韩家洼捣毁张廷祥的一个军械所。挥师南下途中，歼灭吴起镇民团。自此，吴起镇被解放，后成为中央红军到达西北根据地落脚的第一站。吴起由此而闻名并载入光辉的革命史册。

5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骑兵团在师长杨森率领下，再次出兵东进、南下，打到国民党的占领区，切断咸榆公路，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作战。骑兵团先由黑水寺经洛河川东进甘泉、宜川，在屯石崾岭歼民团 16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后接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北上配合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兵团攻打延川县城，当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时，延川县城已经解放。刘志丹为了扩大骑兵团，将缴获国民党军队的 100 余匹战马交给了杨森。骑兵团在

此基础上，新扩建了骑兵第四连。

6 月初，杨森率骑兵团离开延川县南下，在宜川县帮助地方建立了县赤卫队、宜川县红一支队和红十支队。攻打宜川县城未克，骑兵团挥师继续南下。与此同时，红二团受命调往陕北苏区，随西北红军进军定边县以东和靖边县以西一带，参加了镇靖城战斗，坚持近两个月的转战，部队得到了壮大。

不久，西北工委派高岗到宜川县，将宜川县赤卫队、红一支队和红十支队合编为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由黑志德任司令，赵正化任政委，杨开德任副司令。后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又改称为宜川县红十支队，并将宜川县红十支队、红十一支队、红十三支队，延长县红十八支队，肤施县红四支队，甘泉县红六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师(后改称第四路游击师)，由邵凤林任司令，杨凤岐任政委，队伍发展到 600 余人。10 月，改编为红宜独立营。

6 月中下旬，骑兵团南下洛川、宜君、白水三县交界一带，在观音堂歼民团一部，又向澄城、合阳、白水等县进军。骑兵团利用其作战优势，先在澄城县消灭民团 50 余人，后在合阳甘井镇消灭民团 60 余人，接着奔袭韩城，筹款近万，经黄龙山回师洛河川的下寺湾。

7 月上旬，骑兵团在邠县羊泉塬与红一团会合。杨森指挥骑兵团、红一团进军中部县，消灭隆坊塬杨相枝民团后，在郡县、宜君、中部等县消灭小股之敌，在这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在咸榆公路的物资运输能力。

7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红一团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到照金地区。

第七十三章

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

收编史文华

这时，在陕北大苏区之外的神府苏区，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中，由于中共神府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错误估计敌强我弱的形势，在反“围巢”斗争的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尤其是军事上采取集中兵力、孤注一掷的办法，冒险地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结果导致反“围巢”斗争接连失利，使神府苏区处于严峻的困难境地。

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中，神府苏区是国民党“围剿”的重点之一。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在神木县城设立了“剿共”司令部，由二五八旅旅长刘润民担任总司令，调集三个团、一个骑兵营和一些地方民团共 5000 余人，分别由府谷县向南、葭县向北分进合击“围剿”神府苏区。同时，黄河东岸山西保德县至临县一带由晋军布防封锁，内蒙古沿长城一线则由傅作义绥远军一个骑兵师布防堵截。国民党在战术上，修堡筑点，步步为营，合并村庄，编设保甲，制造谣言，胁迫自首。井岳秀企图以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革命策略，全部占领神府苏区，消灭神府红军和游击队。

当时，活动在神府苏区的红军独三团(原称红三团)有 300 余人、200 余支枪，连同神府新三支队、七支队、十一支队和二十一支队，共有红军武装 400 余人。

在反“围剿”开始，神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主张集中红军、调集大批赤卫队与国民党军队打硬仗。第一次攻打新寨子战斗就失败了。

新寨子在神府苏区边沿处，是刘润民部驻守的一个大据点。这个据点守军兵力较强，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此时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已成立)认为，先打下新寨子，然后再消灭花石崖等据点的守军，就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1935 年 3 月 26 日，独三团、游击队、赤卫队近 2000 人在九王村集结待命，准备攻打新寨子。但因大规模的行动暴露，新寨子守军秘密增兵加防，红军毫无所知。时隔三天，于 29 日拂晓，当红军向新寨子发起强攻，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增兵顽抗，红军冲锋几次未克。在这次战斗中，参谋长刘鸿飞牺牲，近 100 人伤亡，红军战斗力严重受损，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受到很大打击。

新寨子战斗后，刘润民部即从栏杆堡、瓦罗、马镇、合河、盘塘、沙峁镇一线向红军部队步步进逼，形势十分险恶。为此，中共神木县委于 5 月初在呼家庄召开了扩大会议，取消了特派员包揽决定一切的制度，成立了中共神府工作委员会(简称神府工委)，王达成任书记，贾令德任组织部长，张承忠任宣传部长。

同时，为了便于领导反“围剿”的斗争，将中共神木县委改为东、西、北三个县委，中共神东县委书记由王恩惠担任，中共神西县委书记由乔钟灵担任，中共神北县委书记由刘北垣担任，并派呼子文(后叛变)到府谷县担任中共府谷县委书记，带一批干部去府谷县坚持工作。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收编、利用史文华的部队。

史文华，又名殿臣，外号史老幺。他从小跟杨侯小当土匪，后被三边国民党军队收编为一个大队，因与旅长段宝珊不和，即把段宝珊打死，又拉出 300 余人的部队窜到甘肃、内蒙古一带。史文华的部队进入内蒙古地区，由于傅作义的绥远军队对他追剿甚紧，便跑到神府苏区来找红军合作，实为一时躲避。

当时，神府工委将史文华的部队改编为“中国抗日义勇军陕甘骑兵第一师”，由史文华任师长，王兆相任政委，下辖两个团，一团团长史文义，

是史文华的堂兄，二团团长袁占鳌，是个有正义感的军人。两个团的政委分别由贾怀光、刘世英担任，并另抽调 16 名红军干部到各连队任政治指导员。

收编史文华的部队后，征得史文华的同意，对部队制定了四条纪律：①不能反对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②遵守苏区纪律；③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不准调戏妇女，违者死罪；④没收地主财产，100 元以上归公，贪污者一律严惩。

史文华的部队到苏区十多天后，神府工委指示史文华的部队配合独三团伏击国民党在沙峁镇的驻军。根据作战部署，史文华的部队开到王家寨山上隐蔽，独三团在黄家塬埋伏，待歼从沙峁镇开出的国民党军队。当国民党沙峁镇的驻军蜂拥般地出了镇子，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后，独三团发起猛烈进攻，史文华却为保存实力原地按兵不动。在王兆相的几番催促下，史文华才不得不下令骑兵出击，但由于士兵都是乌合之众，没打一阵子就各顾性命，再也不往前冲了。两军形成对峙局势后，各自撤出战斗。

不久，神府工委即命令王兆相、史文华带一个骑兵团，经葭县、米脂县南下，打通与中共陕北特委的联系(当时神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已失去联系)。王兆相主张利用骑兵优势，急行军一天一夜，突破国民党设在葭米一带的封锁线，渡过无定河直达瓦窑堡。史文华却以人要吃饭、马要休息为借口，带着队伍每天只走几十里就停下来休息。

骑兵团一到白区，官兵驻下就开始抢东西、抓女人，扰得群众不得安生，使得王兆相整天忙于抓纪律。开到葭县阎家峁附近，遭到刘润民部的堵击，部队一触即溃。史文华再也不愿前行了，只好撤回神府苏区。

这时，刘润民部向神府苏区“围剿”的圈子越来越缩小，史文华自感苏区不可久留，提出要到白区去活动，借口“把国民党军队往外引一引”，带着部队经高家堡、古今滩进入白区草滩地区。史文华一进白区，就完全露出他土匪的本性，到处掳掠抢劫，为所欲为。一天，史文华对王兆相说，部队下面有些意见，要开个会，叫随部队来的红军人员不要参加。

会后，二团团长袁占鳌偷偷告诉王兆相，会上史文华决定把部队往南边拉，显然要去投降高桂滋。正在这时，傅作义部段幼庵的“黄马队”赶

来袭击。

史文华的部队根本不是段幼庵骑兵的对手，史文华损兵折将，半夜逃跑至乌审旗，才摆脱段幼庵骑兵的追击。

到乌审旗后，史文华找到王兆相说：“王政委，咱们走到这步路上了，你能不能带我们到三边去找刘志丹?”王兆相当即道：“我是奉神府党组织的指示来领导你们的部队，也是奉刘志丹的命令。你认为神府的老乡、党和政府对得起你，就把我们送回去；要是不送，我王兆相也是不怕死的，随你的便吧!”

“好!不枉我们交一回朋友。”史文华拍一下大腿，慷慨地同意把王兆相等十几个人送回神府苏区去。事后，袁占鳌告诉王兆相，史文华又单独开过会，会上还有人要把王兆相带给高桂滋做投降的晋见礼，是他和屈连长几人据理力争才挽回局面。

史文华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从乌审旗带着部队东返。经两天行军到达高家堡镇地界的一个村庄，史文华似有愧疚地对王兆相说：“老王，现在离苏区不远了，代我谢谢苏区党和政府，还有老乡们对我的好处。”说完后，给王兆相送上一支长枪、一支小手枪和一袋子弹。

王兆相等告别史文华走出村外，只见袁占鳌和屈连长在那里等着送他们。屈连长看了看史文华送给王兆相的小手枪不如意，立即把他腰问插的一支好手枪换给王兆相，并又送了一袋子弹。

分手时，袁占鳌、屈连长依依惜别，表示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回到苏区来的。史文华礼送王兆相等十几位红军干部离开部队后，不久果然投靠了高桂滋部。

柴瑞叛变

1935 年 5 月中旬，神府工委主要负责人仍然主张集中兵力，同国民党军队硬拼，并决定趁驻太和寨的刘润民部一个加强营立足未稳，向这个据点发起攻击。当独三团开到太和寨，发现守军早有戒备，立即改变了作战方案，未向太和寨进攻，转而突袭毛家洼守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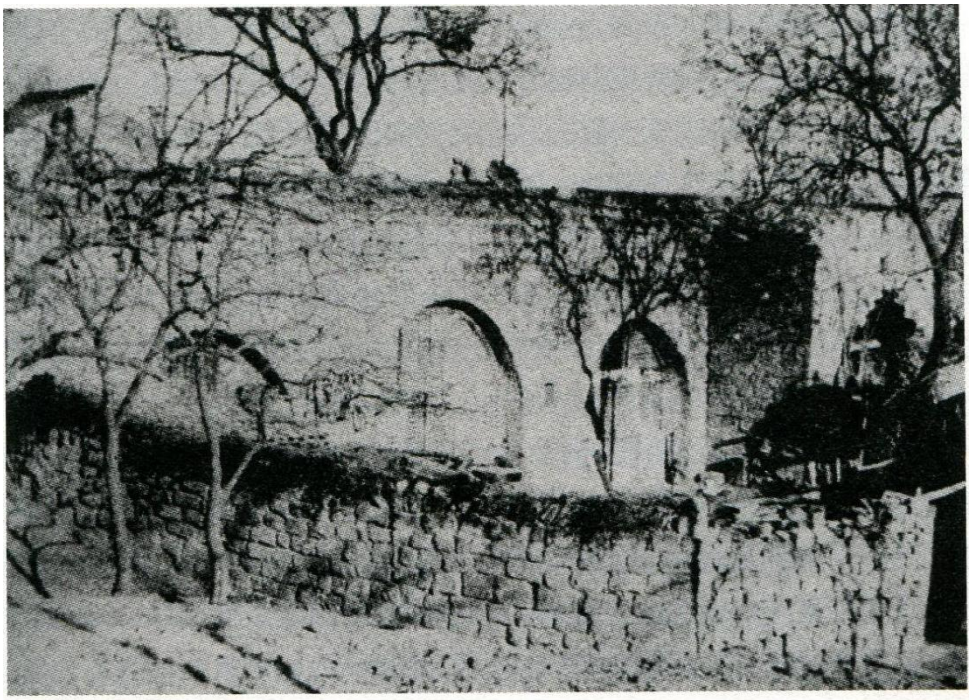
毛家洼驻守着刘润民部一个骑兵连。红军熟悉这里的地形，又有群众

基础，夜里秘密摸进村里。群众事先把守军住的院大门反锁起来，当红军发起攻势，守军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连骑兵四五十人像笼中之鸟全部被俘。

这一胜利，虽然鼓舞了士气，但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时，独三团多数领导主张分散向外线作战，消灭小股国民党队伍，而工委主要负责人一时间又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主张红军趁势再打几个胜仗，以扭转困难局面。

按照工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主张，决定让独三团乘胜出击，进攻窟野河东岸刘润民部守军据点瓦窑渠。

6 月 19 日晚，独三团在赤卫队配合下向瓦窑渠守军发起进攻。瓦窑渠是窟野河东国民党腹地的一个据点，驻有守军一个连，工事坚固，防守严密，其东南数里的马镇和西北十多里的瓦罗驻有守军一个连，西南 50 里的沙峁镇驻的就是刘润民的“剿共”总指挥部。这时，独三团虽说 200 多人，但装备极差，且不熟悉那里的地形，又未与当地群众取得联系，对打胜这一仗信心不足。



神木县呼家庄 1935 年夏中共神府工委机关旧址

次日晚饭后，独三团从石曹譬出发，约半夜时分，部队到了瓦窑渠北山梁上，各连按计划进入战斗位置，向守军阵地摸去。守军一发现，就用

密集的火力封锁了红军前进的道路，战斗进行得很艰难。三连刚接近守军阵地，连长刘增荣和通信员就相继牺牲；一、二连的部分战士冲到守军挖的战壕里，再难以攻进去。

天快亮时，王兆相担心附近国民党据点的驻军派兵增援，形成腹背受敌的危局，即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退到距瓦窑渠 10 里的阴寨子。部队退到阴寨子，正准备早炊，瓦罗驻军果真派出援兵打来，部队未来得及吃饭，被迫继续后撤。

红军刚撤过窟野河西，又遭到石窑和沙峁镇驻军派出的援兵堵截。由于受到前后夹击，经一天的激烈血战，红军虽突出重围，但一连指导员马尚千牺牲，部队伤亡重大。部队在窟野河突围后，经一夜的奔波，次日撤到王西沟一带。

6 月 26 日夜，独三团的骑兵连指导员柴瑞(原任连长)突然带着受蒙蔽的全连骑兵叛变投敌，团参谋长赵希贤也被裹胁在内。当骑兵连连长王进修和战士王忠赶来报告时，独三团领导和工委主要负责人带领的红军主力正陷于刘润民部包围之中，一时难以顾及，经研究决定暂且不管。

独三团西撤，避开太和寨、陈家坪国民党据点的驻军，赶天亮撤到何家沟。独三团在何家沟刚驻下，就接到赵希贤派人送来的信，说准备叛逃的骑兵连正在高念文村，要独三团快速去截击。政委杨文谟当即亲自带领两个连，迅速赶到高念文村，把骑兵连包围起来。骑兵连的战士多数是受蒙蔽的，真相大白后，立即倒戈，叛徒柴瑞当场被骑兵连的战士群起击毙。

屠杀吓不倒革命群众

当神府苏区二次反“围剿”的斗争严重受挫，尤其是红军部队在瓦窑渠战斗失利后，形势急转直下，处境恶化。苏区三分之二的区域被国民党占领，十分之九的村庄被编了保甲，国民党军队仅在苏区内就设立了 40 多个军事据点。国民党网罗了一大批地主豪绅、地痞流氓，特别是叛徒，组成肃反委员会，到处搜捕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革命家属，使整个苏区笼罩在血腥的白色恐阵之中。

在独三团战斗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部队一时间变成了收容队，许多

从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域逃出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甚至红军家属都跑到部队避难，随军同行。由于红军作战人员锐减，非作战人员与日俱增，队伍庞大，目标明显，秩序混乱，不易隐蔽。部队所转移之处，不但吃住十分困难，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与国民党军队遭遇。这时，神府工委主要负责人一下子由军事冒险而变为悲观失望，对依靠当地军民战胜国民党军队丧失了信心，把希望完全寄托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援助上。

1935 年 6 月下旬，神府工委在何家沟、任家山连续召开扩大会议，地方县以上和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围绕如何对付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这个议题，大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原先受“左”倾盲动思想影响的同志，这时却对继续坚持斗争变得悲观失望，认为要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只依靠神府苏区的红军力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甚至认为神府红军在苏区最多也只能坚持 20 天的时问了。有人提出，挽救神府苏区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南下请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北上驰援。

这时，因神府苏区南下的道路全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封锁，工委书记王达成主动提出，他是山西人，可以渡过黄河，经临县回离石老家，然后亲自去找中共陕北特委。与会多数同志表示，王达成南下去找特委取得联系是重要的，但却不能单纯地去等待外援，更不能撇开神府苏区，一定要坚持原地斗争，要与神府苏区生死与共。最后会议作出三条决定：①由工委书记王达成从黄河东渡山西，然后再从山西南下转绥德、清涧，到瓦窑堡寻找中共陕北特委(当时并不知特委已被取消)，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②缩编人员，把红军和地方干部缩编到 200 余人，将不带枪和中年体弱及家庭出身不好的战士、干部全部遣散回家；③将缩编后的部队和工委干部分编成九个小分队(一说六个小分队)，分散到各区打游击，并将红十一支队转移到山西兴县沿黄河地区活动。

当独三团的缩编名单公布后，有许多被遣散的同志痛哭流涕要求留下。政委杨文谟和各连队指导员反复多次做思想工作，要大家回去后，同地方群众团结一起，不要暴露自己，决不向国民党投降自首，在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坚持勇敢地斗争。那些被遣散的同志只得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这次会议后即派张胜斌护送王达成离开神府苏区，辗转山西，南下寻

找上级党组织。王达成走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神府党组织一直没有得到王达成的消息，完全同上级组织中断了联系。

8 月初，神府工委在谢家沟召开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认为神府苏区被国民党破坏严重，一时不易恢复，决定暂时取消神府工委和独三团，解散府谷红七支队；由王兆相、杨文谟、王进修、贾兰枝、贾如胜、贺道新各带一个游击小队，与工委和党的地方干部乔钟灵、张承忠、毛凤翔、李子川、贾怀光、刘长亮、刘北垣、梁士堂、薛荣亭等在一至六区分散活动；派原独三团团部和张德超带领的红十一支队，随贾令德一起东渡黄河，到山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再派张承忠离开神府南下，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请求指示，但张承忠途中因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出，又返回神府。

红十一支队到山西一个多月，因遭到晋军和地方民团的“追剿”，疲于奔波，到处躲藏。张德超、贾令德带着游击队避驻在兴县西南山的一个村庄里，被地方民团发现。游击队在转移战斗时，贾令德为掩护队伍被捕，被押回兴县城英勇就义。红十一支队因在山西无法立足，遂返回神府。

8 月底，神府苏区原有 23 个区，被国民党占去 18 个区，各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期，神府苏区遭到极大挫折。在菜园沟，鲁仰尼带着驻军一次用铡刀残杀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 18 人；在崔白家沟，樊志卿带着驻军一次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 12 人；在张家沟，常振民、赵四儿带着驻军两个连一次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 11 人；在马家沟，邬青云骑兵营一次杀害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 7 人。据统计，神府苏区原有 3800 多名共产党员、团员，仅剩下 400 多名；原有 500 多名共产党员干部，仅剩 100 多名；被国民党残杀的群众难以计数。

在神府苏区陷入白色恐怖之时，各地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屠杀所吓倒。在恶劣的环境里，分散到各地的共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及革命群众仍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许思忠、许发善、刘崇德、刘如邦、武开章、尚永信、白明举等均在被遣散人员之列。许思忠、许发善、刘崇德等被遣散后，又跑回部队，刘崇德还从刘润民部据点守军手里夺得一支长枪，带回部队；刘如邦、武开章等被遣散后，在地方上秘密恢复了十几个村庄的中共组织，坚持与国民党地方势力进行不懈的

斗争；尚永信被遣散回家后，拒绝向国民党自首，假装死亡出殡，躲过国民党的抓捕；白明举为躲避国民党抓捕，在黑龙沟隐居数月；妇女干部牛林英和张桂英宁可流落到内蒙古讨饭度日，也都不肯向国民党屈膝。但也有不少同志被国民党抓捕杀害，并有一些人被迫自首。

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尽管国民党采取合并村庄、家户联保，实行“通共”株连的屠杀政策，苏区广大群众为保护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红军战士渡过难关，仍对国民党“日投夜不投”“明投暗不投”，千方百计给在野外活动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红军战士送粮送物。郝家峁的群众把粮食放进棺材，假装出殡埋到地里，转移给红军；王家洼的王启运老汉把家里的毛毡和被子送给山沟里的红军战士。

在革命低潮的残酷斗争中，王家峁群众给红军送衣物时，被国民党发现，十几个青年惨遭杀害；王家坪有三名妇女，掩护妇女干部杨玉珍脱险，其中两名妇女和一名妇女的丈夫被国民党杀害；温家川群众温景慎、温景智、温亮余、温三宝等四人为掩护红军转移，用石头、砖块与国民党队伍硬拼，温景慎和温景智英勇牺牲；贾家沟妇女共产党员黄云爱及妯娌刘金珍、贺博芳三人，为保护隐藏在崖窑里的群众，将国民党队伍引到另外的山头，毅然跳下绝壁，壮烈牺牲。至今每当人们追忆起这一时期神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悲壮斗争，仍无不为之动容。

据王兆相、王恩惠、刘长亮、许发善、王道三等回忆，神府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时失利，使革命处于最困难时期，除中共神府主要领导人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外，在政策上有如下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

一是党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特派员权力至上。开会决定问题不是集思广益，而是主观臆断，个人说了算。如在提拔王恩杰和一个叫田英的西京寺和尚当中共区委书记、提拔柴瑞当指导员时，有的同志提出柴瑞不是共产党员，不能担任指导员，特派员却说柴瑞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只要介绍一下就行了，结果通过。后来柴瑞带着骑兵连叛变，王恩杰和那个西京寺和尚向国民党投降，这才说他们都还没入党。

二是在干部政策上搞唯成分论和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出身不好的干部，多数不予重用，有的被监视起来，甚至给监视者授予生杀大权。而

对一些所谓的“工农分子”，不论个人表现，凭其好恶提拔重用，如呼家庄呼子威、呼子文、呼子长三兄弟，虽出身好，但品行不好，却分别被委任为神木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府谷县委书记、政府财经负责人，后来一个个都当了叛徒。对王兆相、武开章、刘如邦等则是排斥打击，甚至毫无根据地认定武开章、刘如邦必然叛变”。事实证明，武开章、刘如邦虽被排挤遣散回家，但仍与国民党坚持斗争，刘如邦英勇牺牲，武开章成为根据地后期神府党组织的领导人。

三是肃反扩大化。对肃反政策没有统一规定，乡干部以至赤卫队都有杀人权。有些干部不会写杀人布告，就抄别人的，杀人时把名字在布告上一填，由于布告上的罪状与被杀者事实不符，引起群众非议，产生不良影响。王兆相的父亲、张秀山的父亲、毛凤翔的父亲和乔钟灵的叔父乔殿东(县苏维埃于部)及共产党员王善继、李登万、白浩义、温红则等都被无辜杀害，引起红军干部、战士和地方干部及其家属的极大义愤。当时，这种肃反扩大化在一些地方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只要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不论是贩卖日用品及收购农副产品的小商贩还是走亲戚的群众，不问青红皂白统统杀掉。如王桑村有个王孝威，曾给地主豪绅跑过腿，也为共产党散过传单、送过情报，后躲到山西，经地方干部动员回到神木县。谁知一到阎家堡，就被秘密杀掉。他的亲戚去收尸，竟也被杀掉。在刘家湾村，由于特委派来的特派员片面听信一些人的谣言，先后错杀 14 名无辜群众，当县委委员兼一区区委书记王善继表示反对时，也一并被错杀，闹得苏区人人自危。

四是脱离群众愿望。如发动群众放火烧毁庙宇，鼓励同村同姓而不同辈分的男女结婚，被群众认为是胡闹；在实行土地分配政策上，对普通地主“扫地出门”，实行“肉体消灭”，使一些原本可以团结的中农也被吓得跑到白区，形成树敌过多的现象。

第九部 ★

DISANCIFANWEIJIAO
JIXIBEIGENJUDI
CUOWUSUFAN

“ ”

第七十四章

陕北来了个“代表团”

第三次“围剿”

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围剿”后，蒋介石于 1935 年 7 月又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续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增调东北军的两个军七个师，总兵力达 15 万之众，“围剿”重点放在陕北苏区。

1937 年西北根据地部分负责人合影

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一线为晋军正太护路军孙楚第七十一师三个旅、李生达第七十二师二。八旅；北面的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府等县一带为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井岳秀第八十六师；西北陕宁交界一线为马鸿逵第十五路军的三个骑兵团；西南一线为东北军王以哲等两个军的七个师、何柱国骑兵第二军的三个师和一个独立团、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的一个旅；南面一线仍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杨步飞的第六十一师。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各路“围剿”军队的统一指挥，颁令成立了西北“剿匪”总指挥部，亲任总指挥部总司令，由晋军孙楚和李生达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直赴陕北督战。同时，派出国民党要员杭毅为督察专员，在绥德设立了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监督清涧、安定、保安、安塞、延川、延长、肤施等县的“剿匪”事务。

1935 年 7 月中旬，除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在陕北苏区占据北线外，担任南线“进剿”的杨步飞第六十一师已在洛川地区集结，东线“进剿”的晋军四个旅已在榆次地区集结，西线“进剿”的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一 0 五旅进驻环县。晋军李生达、孙楚迫不及待地命令方克猷为先头部队，抢先渡过黄河，对吴堡、绥德等县进行“围剿”，并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7 月 12 日，晋军先头部队方克猷指挥的 12 个连渡过黄河，进入吴堡县境。晋军的一个排刚在吴堡县西区尚家塬驻下，就被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团团包围。

时值大雨倾盆，道路难行。红二十七军二团调任第二五纵队队长的郭育仁和政委马万里命令红军战士脱去衣服，冒着大雨勇猛地向晋军驻地冲去，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晋军士兵个个脚蹬皮鞋，在泥泞的地上笨重得走不动，又无法展开火力，陷入被动怯战之势。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战斗，红军速战速决，消灭晋军一个排，缴获步枪 20 余支、冲锋枪 3 支、手枪 2 支。这一战，红军仅牺牲两名战士。第二五纵队顺利撤离尚家塬，安全转移。

高家塌战斗

1935 年 7 月初，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的西北红军主力在安定县北区一带休整。休整期间，根据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分布局势，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决策。经会议充分讨论，前敌总指挥部制定出了先针对晋军进攻陕北的态势打退东渡黄河的晋军，然后南下打击东北军的战略总方针。

刘志丹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在积极部署作战方案的同时，安排了陕甘边苏区后方的工作。先派黄罗斌带领一个团南下，配合地方游击队牵制、侦察东北军的行动。接着，王世泰伤愈归队接替了吴岱峰红三团代团长职务，派吴岱峰到陕甘边苏区领导后勤工作，将高岗妻子杨芝芳等一批家属安排到被服厂工作。这一期间，西北工委和军委机关从山沟里入驻永坪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也相继搬来。

7 月 10 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挥师东进，进入绥德县西川三皇峁一带。

7 月 12 日，西北红军主力行至王家沟和三皇峁，与国民党四九九团一营遭遇，进行了激战。这个营不堪一击，与红军主力刚一接触，就溃退到三皇峁的柳树塔制高点死守顽抗。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柳树塔包围一夜，于次日天亮前分兵两路，从西、南两侧发起攻击。红军主力攻占了柳树塔，正待围歼其残部时，由于张廷芝的骑兵营突然从侧后对部队偷袭，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到安定县北区蛇沟一带，暂时隐蔽，待机歼敌。

7 月 17 日，赤卫队派人报告：驻老君殿的国民党守军倾巢出动，前卫营已快到高家塌。驻老君殿的守军是高桂滋部五。一团一营、五。二团二营及张廷芝的骑兵营，由团长艾捷三(艾杰)坐镇指挥。对老君殿出动的艾捷三部，在未弄清楚其意图之前，刘志丹决定派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先到蛇沟北山侦察敌情，并嘱贺晋年若有战机，即可出兵打击，后续部队会迅速赶来增援。

蛇沟北山以北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川，大川中间是一条小河。小河的北岸是高家塌村。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先隐蔽在一个山脚下，然后亲自爬到山顶上观察艾捷三部的行动。这时，只见艾捷三的前卫营正在高家塌抢粮、

抓鸡、拉牲口，闹得鸡飞狗跳，村里一片混乱。其后便不再前行，准备向东撤回老君殿去。

贺晋年立即发出攻击信号，红一团分兵两路，向前卫营猛扑过来。开始，前卫营以为是小股游击队来袭击，纷纷从村里出来，蹬水冲过小河，向红军开枪射击。当前卫营越过小河，发觉是红军主力时，想逃已来不及了。红一团左右夹击，前卫营顿时乱成一团，很快被红军全部歼灭。

这时，刘志丹、高岗已率领西北红军主力抄到艾捷三大队人马的背后，朝着艾捷三的屁股打起来，形成腹背夹击之势。吴亚雄、刘明山带领第一、四纵队，杀声一片，及时赶来援战。艾捷三见势不妙，慌忙向老君殿方向撤退。

贺晋年带领红一团尾追不舍，沿着川道向东追击。在红军主力的猛烈追击下，艾捷三的军队像乱了的羊群东冲西撞，首尾不能相顾，朝着张家坪一带逃窜。艾捷三在撤退中被击伤，沿川道丢下一堆堆的尸体，顾不得收拾，只带少数残部脱逃。这一战，共歼俘艾捷三所部 300 余人，缴获 300 多支枪和一批战马，西北红军主力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序幕。

高家塌一战后，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向东挺进。吴亚雄、刘明山带领第一、四纵队，留绥德县西区，继续寻找机会与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在安定与横山两县交界的张家堋，驻有井岳秀第八十六师一个排，利用依山地势修筑了一个寨子。寨子上炮楼高耸，明碉暗堡，火力交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亚雄、刘明山经侦察认为，根据第一、四纵队的武器装备，强打硬攻显然不可能取胜，决定智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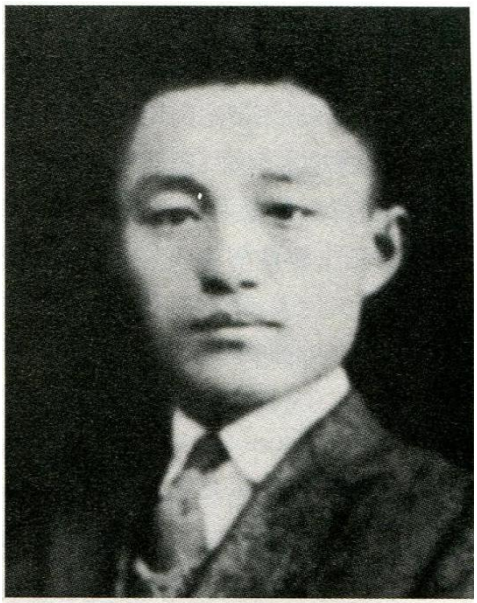
吴亚雄、刘明山想出一条妙计，让一些战士扮成赤卫军，佯装赶走了农民的牛羊，一些战士扮成当地农民，到寨子报告：“不拿枪的赤卫军抢走了我们的牛羊，只要老总们给我们夺回来，我们老百姓不会亏待你们。”

驻守寨子的排长一听有油水可捞，立即带着全排人马倾巢出动。守军打开寨门，望着远处可见的牛羊群，衔尾追人游击队设好的伏击圈。吴亚雄、刘明山分南北两路夹击，东西合围，全歼张家塬寨子守军一排，红军却无一伤亡。刘志丹听到第一、四纵队在张家飒打了一个漂亮仗，当即以

前敌总指挥部名义给予表扬。

永坪镇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

正当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在前线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的时候，在陕北苏区后方的永坪镇，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朱理治来到陕北，正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一场险恶的灾难悄然降临到西北根据地党组织和西北红军的头上，西北根据地面临一场重大的历史考验。


朱理治

朱理治，江西通江县人，生于 1907 年。1927 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郊区委书记。1928 年 8 月在北平被捕，先后押解南京、苏州，1930 年出狱后，在上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会长兼党团书记。1932 年 7 月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 1934 年 3 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

朱理治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朱理治从河北动身前，孔原对他说上海临时中央局也将派两人，与他共同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在没有取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身份之前，嘱咐暂时使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团”(即中代)和“中共河北省委代表”的双重身份。孔原交给朱理治一封长达 35000 字的指示信，经孔原、柯庆施、朱理治过目后签署，是朱理治主持西北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孔原和柯庆施还给朱理治写了一封 7000 字左右的军事指令。在这些文件和指令中，把陕北、陕甘边苏区内存在的“右倾取消主义”说得非常严重。

朱理治问孔原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严厉批评，孔原告诉他都是根据陕北郭洪涛的报告，说陕甘边特委目前?昆进了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张文华，一个是蔡子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受了这两个

“右派分子”的影响，要朱理治到陕北后首先孤立蔡子伟等人，然后镇压他们。孔原还送了一本由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陈昌浩编撰的《肃反》小册子，要他认真看看，并说：“郭洪涛回到陕北后已经初步执行了布尔什维克路线……可以信赖。”

朱理治从河北出发时与鲁贲同行。先到西安，见到时任共青团陕北特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铁轮。李铁轮，陕西石泉县人，生于 1911 年。在北平上学期间曾任少共北平市委秘书、少共河北省委宣传干事，1933 年随郭洪涛一起到了陕北苏区，与鲁贲早已认识。李铁轮给朱理治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临时中央局已派到陕北的中央代表张庆孚有几处可疑，一个是护送他来的特科人员不知去向，一个是张带来的用药水写的密信显示不出字来。张庆孚提出架设电台与周恩来直接联系，因西北苏区没有电台未果，所以，中共陕甘特委也怀疑张的身份。李铁轮主动向朱理治提出去天津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咨询，必要时到上海询问中央局的同志，查清张的身份。朱理治武断地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你不要去上海，可以去天津。”

朱理治、鲁贲到了耀县，见到时任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文。黄子文，陕西三原县人，1926 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于 1930 年曾在中共北方局工作过。谈及中央的一些事时，黄说：“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把一些小娃娃提到中央负责。我知道罗章龙、张慕陶都是反对四中全会的。”黄子文的此番议论，给朱理治留下很坏的印象。

1935 年 7 月初，朱理治到达西北工委驻地永坪镇。在朱理治离开河北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去上海，建议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员到西北协助朱理治的工作。根据孔原的建议，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聂洪钧、刘祚夫到西北苏区与朱理治一道组成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但刘祚夫因故未能同行，只有朱理治、聂洪钧先后辗转到陕北。

聂洪钧，湖北咸宁县人，生于 1905 年。1925 年加入共青团，不久被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年底返回湖北任省农协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1926 年 3 月被捕入狱，经董必武等营救获释后，同年 7 月被派往咸宁任县农协会执行主席。1927 年冬被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学习，1929 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农委和江苏省农委秘书长。1930 年 2 月奉派鄂北参

与领导红五月起义，同年 10 月调任中共京汉(信阳)特委书记。1931 年调赣东北，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组织部部长、红十军政委。1934 年 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同年 11 月任红十九军师政委，率部到皖南后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

聂洪钧离开上海之前，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贺昌炽找聂洪钧谈话说：“北方代表(即指孔原)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的对立；右派活动人物主要是黄子文、蔡子伟等；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思想很右。”并要求代表团去了陕北“要依靠郭洪涛解决好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反革命的问题，检举内奸，清洗党内异己分子”。

1935 年 5 月 30 日，聂洪钧从上海到天津，中共北方局(设驻天津)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一说是柯庆施)向聂洪钧介绍了陕北和陕甘的情况，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贺昌炽所谈情况并无两样。在聂洪钧的脑海里有了一个先人为主的印象，认定在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内是右派掌权，下决心要按照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和中共北方局的临行指示，到陕北苏区后抓出“右派”。聂洪钧离开上海不久，由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接连遭到国民党的破坏，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各级组织也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7 月间，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被迫停止了在北方的活动。

朱理治到达陕北后，对西北军委主要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和红二十六军领导不做深入调查，只以先人为主的偏见和听信郭洪涛的一面之词，认为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高岗是刘志丹的“谋士”，是一个“党棍”，习仲勋是个“老好人”，都没有能力；马明方执行的是“富农路线”，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个人英雄主义”；从太原、西安来的“来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张慕陶派来的”，有的是“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如李西萍在苏区搞破坏的事实等，都是刘志丹、高岗引进来并受到“包庇”。朱理治也承认，他到陕北后仅仅和郭洪涛一个人谈话，没有找其他人谈话，“所得资料是有缺点的”。于是，朱理治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的特权，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政策，排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领导人，并撤销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大批主

要领导人的职权，在后方策划起一场错误肃反运动。

朱理治在 1945 年 7 月 10 日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这样说：初到西北，人地两生，并不了解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历史，也不了解刘志丹、高岗、郭洪涛等人，对任何个人没有恩怨和亲疏好恶，但却是身负明确的组织任务而来；上级的具体指示和郭洪涛的介绍，“使我认同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内部政治面目不清楚。刘志丹、高岗一贯右倾，刘、高的品质很坏，不可信任”。

7 月 15 日，在未通知在前线打仗的刘志丹、高岗等西北工委委员的情况下，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即 1934 年 7 月 13 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1934 年 11 月 9 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5 年 4 月 5 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给陕甘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 5 月机密批示，1935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关于扩大苏区问题给陕甘代表、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信。前三封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后两封信是朱理治到陕北后才收到的，孔原在信中明确提出在陕北、陕甘苏区“必须无情地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这次会上，朱理治以这五封信为上方宝剑，首先撤销了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的职务，并把他在会上无端地批斗一顿后，贬到米西县(米脂县西与横山县交界处)当县委副书记，朱理治以代表团书记身份代替西北工委行使领导职能，指定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当时聂洪钧未到)，不设副主席，把刘志丹、高岗排挤在军委之外。

这次会议开了七天，几乎是朱理治的一言堂。他在宣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五封信后，发挥自己的“左”倾观点，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陕甘三次“围剿”

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两个决议的内容，主要是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表现得很尖锐，西北党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根据地，打通新疆和外蒙古的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胜利地发展着，国民党区域日益缩小，武装力量削弱，苏维埃区域已占全国四分之一；共产党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面前，对陕北反“围剿”，要红军全线出击，夺取绥德、肤施、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不让国民党军队践踏苏区一寸土地，要把神府和绥德、吴堡以南苏区打成一片，但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右倾取消主义；要以马栏、宜川、洛川各地为中心建立苏区，向四面发展，尤其向宁夏发展，打通国际路线云云。

会后，朱理治以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人将形成的两个决议送到前线。刘志丹、高岗看后，认为这两个决议对当前敌我力量不作任何对比分析、对红军主力如何部署没有具体措施，只凭理想主义高谈阔论，光说大话和空话，实是两个“左”得出奇的决议。当前，西北红军与游击队加在一起近万人，面对国民党 15 万人之众的“围剿”，实已处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夹缝之中，若要西北红军全线出击，攻打国民党军队固守的中心城市，那是一派胡言的瞎指挥!西北红军没有撒豆成兵的魔法，只有实施“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才能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七十五章

不听“左”倾瞎指挥

慕家塬战斗

西北工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结束后没几天，朱理治以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名义，派人给前方送来指示信，命令前敌总指挥部集中西北红军主力攻打米脂、绥德、清涧、瓦窑堡、肤施几个城市，再打通与神府苏区的联系。刘志丹、高岗接到指示，经研究认为，上述城市防守严密，工事坚固，兵力强大，据险固守，如果强攻，不仅难以攻克，还会自陷国民党军队的重围，造成红军的巨大伤亡。对西北代表团这种军事冒险行动的错误指示，刘志丹有点犯难，高岗则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

1935 年 7 月下旬，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东进清涧县，经川口镇东渡无定河，来到东区袁家沟。在袁家沟，前敌总指挥部召集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充分讨论了西北代表团的指示后，刘志丹、高岗在军事行动上未采纳朱理治提出的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主张，决定采取奔袭战术，沿黄河西岸北上，消灭吴堡县慕家塬的晋军，以有利于主力部队在这一带扩大回旋余地，机动作战。部队离开袁家沟，路经解家沟、花岩寺、石盘，进入吴堡县的宋家坡一带隐蔽。

8 月 10 日夜，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向慕家塬驻守的晋军发起进攻。慕家塬守军是晋军方克猷二。六旅的一个连，连长叫张武亭，据守在有一座龙王庙的土寨子里。寨子周围打起两丈多高的土围墙，围墙上筑有坚固工事，围墙外挖有三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土壕，土壕边又布了一

道铁丝网，防守十分严密。晋军在这个寨子里储有大量物资、粮食，弹药充足，虽在塬上没有水源，吃水十分困难，但连长张武亭从老百姓家抢来60口大水瓮，早逼着群众下塬到沟底，人担驴驮，把每口水瓮灌满，以防红军进攻时因水受困。

吴堡县慕家塬战斗遗址

这次攻打慕家塬寨子，由红二十七军一团担任主攻，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和第二五纵队及地方游击队阻击由宋家川、辛家沟等方向赶来增援的晋军。贺晋年带领红一团一到慕家塬，趁着天色未亮，组成突击队，把云梯搭上寨墙。正准备攀登云梯发起进攻时，守军发觉寨外有动静，忽然打出几发照明弹，顿时把寨子内外照得一片明亮。红军战士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慌忙向后撤退。接着，守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响起。

8月11日，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对慕家塬进行强攻，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和红二十六军三团投入攻寨战斗。是日下午，贺晋年、王世泰各在团里组成一支突击队，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架云梯从寨子的东北处强行攀登成功，两团红军部队很快冲进寨子，将晋军一个连全歼。慕家塬晋军一个连被歼后，周围据点的晋军因无通信联系，靠骑马报信，仍不知慕家塬的战况，驻守在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等处的晋军都纷纷赶来增援。

8月12日，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郭家崾等处的晋军共约一个营

和两个连的援兵，沿各条川道相继朝慕家塬赶来增援，分别被埋伏在慕家塬外围的红军、第二五纵队和游击队各个击溃。

宋家川、郭家崾前来增援的晋军刚爬上南塬畔，就中了红军的埋伏，被打得丢盔弃甲，四处逃命，向薛家飒方向败退，但一到薛家堋，又陷入农民赤卫队的包围，如同惊弓之鸟的 30 多个晋军士兵全部被活捉。

从辛家沟前来增援的晋军刚爬上车家塬的西塬畔，就被埋伏的红军一阵猛打猛冲，吓得没命地逃走了。

郭家沟和一步蠕前来增援的晋军刚爬上塬畔，埋伏在柳家坊的义勇军在郭宝珊的指挥下，发起一个冲锋，就把两连晋军压到团道峁沟底全部歼灭，义勇军战士每人挂着两三支长枪和几袋子弹得胜而归。

慕家塬战斗先后消灭晋军约四个连 600 人，缴获长短枪 600 余支。这是西北红军第一次与晋军交战，首战告捷。这次战斗中，王世泰腿部负了重伤，贺吉祥肩部负伤。

当红军主力部队从战场撤到宋家坡，当地群众成群结队地抬猪赶羊，提着鸡蛋、红枣，抱着军鞋，从四面八方赶来慰问红军。这时，有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听说红军在慕家塬又打了胜仗，部队转到了宋家坡，为亲眼见见陕北劳苦大众爱戴的革命领袖刘志丹，特地从几十里外赶来。

两位老人一到宋家坡，正好碰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政委张达志。他们一见到张达志就急着说：“我们能不能看看刘志丹?”

为满足两位老人的心愿，张达志连忙将他们领到刘志丹的住处。一进门，张达志告诉刘志丹说：“有两个老人看你来了。”

话音刚落，只见两位老人迎上前去，一把拉住刘志丹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两位老人颤着嘴唇说：“啊，你就是老刘吗?啊，你就是老刘……”

刘志丹也很激动，热情地连声回答：“对，对，我就是刘志丹。”

定仙塢“围点打援"

慕家塬一战，西北红军打得晋军惊慌失措，晕头转向。国民党误以为红军主力有挺进葭县、北上与神府苏区红军会合的可能，连忙调兵遣将，

在黄河两岸增兵布防，企图用重兵截断红军的北进道路。刘志丹乘机率领部队掉头南下，避开晋军主力，转移至绥德县东南的新庄一带隐蔽待命。

部队到新庄后，前敌总指挥部获悉：驻守定仙墙的晋军史泽波四一二团一个营和两个连被绥德、清涧两县游击队、赤卫军数千人围困，驻军断粮断水，频频告急，晋军正太护路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亲率驻守枣林坪镇的第六团前去增援，并派飞机助战。刘志丹、高岗决定抓住战机，实施“围点打援”的战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晋军的有生力量。

此时，朱理治派郭洪涛亲自送来指示信，命令前敌总指挥部改变作战部署和方案，要西北红军主力向北进军，打通葭、米、神府苏区。刘志丹等研究后认为指示不妥，仍没有执行西北代表团的命令，继续部署在定仙埝“围点打援”的战斗准备。

绥德县定仙墶战斗红军指挥部旧址

定仙墶是国民党军队从绥德县到吴堡县宋家川必经要道的一个重要护路据点。定仙墶的东北方向有两条山沟汇合在一起，叫尽绊拦沟。由定仙墶向东 30 里是枣林坪镇。刘志丹决定红二十六军二团配合第二五纵队和地方游击队、赤卫军由白条梁、中嘴圪土达附近围困定仙墶，进一步对驻守晋军施加压力，以促成枣林坪晋军马延寿快速增援。同时，将红军主力分别展开在定仙墶东北方向的两道山梁上，构筑工事，布下天罗地网。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在王家墙、老舍窟山梁隐蔽待命，红二十七军一、二

团配置在靠近定仙嫣的山梁上。另外，派出第二五纵队五支队向枣林坪方向侦察警戒。

1935 年 8 月 21 日上午，晋军第六团从枣林坪出发，沿川道和第一道山梁向定仙嫣增援。红二十七军二团迎面堵住了增援的晋军。晋军受阻，即用迫击炮集中轰击红二团的阵地，妄图与定仙堰的晋军会合。红二团依托阵地奋勇抗击，使晋军不能前进一步。晋军凭借其优势火力，经几次冲锋，终于突破红二团阵地，连续攻占了几个山头，向定仙堰逼近。

这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一团增援红二团，投入战斗。愚蠢的晋军指挥官将晋军援兵沿着一道山梁摆了一个长蛇阵，向红军进攻，因此不能展开兵力，只有前头的一个连向前冲锋。根据晋军的布阵格局，红一团以一部分兵力协助红二团从正面堵击晋军外，派出一个连绕到晋军侧后，大胆穿插，猛打猛冲，一下子打乱了晋军进攻阵容。由于晋军前后都被红军分割包围，多数晋军士兵纷纷缴枪投降，只有少数晋军士兵从南侧跳崖逃跑，因崖壁陡峭，有的被摔死，有的被摔伤。

红一、二团乘胜追击，连续夺回两个山头，残余晋军向东狼狈溃逃。东山头上晋军的一个当营长的指挥官气急败坏地命令督战队，用枪扫射溃退的士兵，逼着士兵朝前冲，晋军又像羊群一样卷来。就这样，在前击后逼的几次冲锋中，敌我占据的两座山头之间晋军士兵死尸成堆。

当时，晋军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士兵除枪支弹药外，还背有十字镐或工兵锹。晋军在占据的山头上构筑了野战掩体。当红军向晋军占据的山头发起进攻时，晋军士兵在指挥官的督战下，拼死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红军突击队几次冲到晋军阵地前沿，均因伤亡太大，又被迫撤下来。红一团团部传令队战士贺柏平冲进晋军阵地，乘晋军机枪换弹夹的瞬间纵身跳入晋军阵地掩体，把晋军的机枪手和机枪一起从工事里拖出来，不幸被另一个晋军掩体里的机枪击伤，身中数弹牺牲。战斗出现了僵持对峙状态。

贺晋年看到正面强攻不行，即派红一团的一个连绕到晋军侧后。晋军受到前后夹击，督战的晋军营长被当场击毙。督战指挥官一死，士兵顿时大乱，怯战自溃。红军乘胜向东追击，晋军士兵丢盔弃甲，只顾逃命。

这时，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也从另一道山梁压下来，向晋军展开

反击。晋军全线溃退。西北红军主力一直向东追出十多里，将晋军压到尽绊拦沟，除马延寿带着几个随从脱身逃走外，一团晋军全部被歼灭。

在定仙嫣战斗的同时，晋军出动一架飞机，飞过黄河轰炸助战，被红军用机枪击中，迫降在绥德县铁茄坪。当地红军游击队和赤卫队不但将飞机缴获，还活捉了两名飞行员。

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副团长齐汝英以下 200 余人，生俘晋军 1800 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其中有八二迫击炮 6 门、重机枪 12 挺、轻机枪 50 余挺、长短枪 1900 多支、骡马 80 多匹。战斗结束后，由于红二十七军一团缴获的武器弹药太多，每个战士身上横七竖八背的都是枪和子弹，后红一团在缴获晋军的重型武器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机炮连。

定仙墙一战使驻守枣林坪镇的晋军吓破了胆，当天夜里，马延寿带着残部慌忙渡过黄河逃到山西。这次战斗西北红军成功地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首次在一次战斗中全歼一个整团，侦察无误，判断准确，战场选择有利，兵力部署周密，火力配备得当，充分发挥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指挥才能和作战能力。同时，这次战斗也充分说明，地方游击武装和广大群众的有力配合和支持是红军打胜仗的根本保证。

这次战斗是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正确指挥西北红军挫败东线晋军的一场关键性战役，有力地保证了红军的战斗空间，增强了苏区军民对第三次反“围剿”的必胜信心。

在欢庆大会上，刘志丹这样总结道：“我们记取了过去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不盲动，不蛮干，一切从我们这个地区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红军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党，依靠老百姓，集中我们有限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没有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没有陕北苏区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援，我们是无法取胜的。我希望红军和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在胜利面前不要骄傲，要时时不忘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切实做到‘知己知彼’，紧紧依靠党，依靠苏区父老乡亲，为我们取得更大胜利继续战斗……”

对于西北红军在定仙墶“围点打援”的胜利，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

人头如切瓜，
人血打滑滑，
老百姓看见喜得很，
人人欢迎咱。
提枪一千九，
子弹骡驮拉，
盒子枪腰里十字挂，
威风走天下。

组建红军陕北战斗团

定仙塬大捷后，西北红军主力挥师西进。第二五纵队在纵队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的领导下，仍留地方继续与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坚持进行游击战争。由于西北红军主力在慕家塬、定仙嫣连续两战两捷，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广大群众对第三次反“围剿”的必胜信心，葭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等县的红军游击队迅速得到发展壮大，很快初具规模并有一定战斗能力。其中第二五纵队在配合红军主力的作战中是发展最快的一支地方红军队伍。

1935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大雾弥漫。郭育仁、马万里抓住天时，借早晨浓雾作掩护，决定采取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突袭驻守绥德县三十里铺的张廷芝部一个骑兵连。

三十里铺在绥德县通往吴堡县的交通大道上，是绥德县城驻军设在城区以东的一个军事据点。第二五纵队一到三十里铺，首先悄悄除掉村口的哨兵，村里骑兵连全然不知。当骑兵连正在一个院子里准备吃早饭时，第二五纵队将院子团团包围。冲入院子的战士个个高高扬起手榴弹，喝令骑兵连缴枪。

骑兵连猝不及防，全都乖乖举手做了俘虏，缴获战马 60 余匹、枪 60 余支。

三十里铺一战使第二五纵队声威大震，部队很快扩展到 200 余人。第

二五纵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战斗团(简称战斗团，后编入红二十八军)，由郭育仁任团长，王再兴任政委。战斗团继续活动在绥德、葭县、吴堡等县一带，有力地配合了西北红军主力打击黄河沿岸晋军的据点，使晋军轻易不敢离开据点外出。

9 月 23 日，战斗团在郭育仁、王再兴的指挥下，奔袭吴堡县慕家塬驻守的晋军。这时，慕家塬驻守的是晋军孟宪吉第一旅曲有成团的团部。团长曲有成自以为红军主力已向西进，可苟安一时，警戒十分松懈。

王再兴

是夜，郭育仁、王再兴带领战斗团秘密潜入吴堡县，挑选出 60 多名精干善战的战士，组成一支突击队，由薛英桂任突击队队长，出其不意地向慕家塬驻守的晋军发起攻击。突击队勇猛地冲入寨子，团长曲有成来不及组织抵抗，当即被击毙。晋军群龙无首，士兵纷纷缴枪投降。

在这次战斗中，战斗团大获全胜，缴获机枪和冲锋枪 10 余挺、长短枪 100 余支，还有迫击炮 1 门，武装了自己，受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经慕家塬一战后，战斗团很快发展成近千人的队伍。

12 月的一天，战斗团在绥德县婆婆寺遭到国民党吉镇驻军的突袭，激战一天，部队虽安全突围，但郭育仁腿部中弹。郭育仁在转入地方治疗期间，又因缺医少药得了破伤风，不幸牺牲，后由王再兴继任战斗团团长。

与此同时，活动在绥德县的红十二支队与清涧、吴堡、葭县新编的几支游击队合编为陕北红军警卫营，由雷高楼任营长、王季龙任政委，下辖四个连，300 多人、100 多支枪。活动在延川县的红九支队和红十七支队等游击队，合编为陕北红军第六纵队，由韩崇荣任队长，惠世恭任政委。

攻打横山县城

西北红军主力在定仙塬一仗粉碎了陕北苏区东线晋军的“围剿”后，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部队西进，南下到延川县文安驿休整。这时，安定县新编红四团派曹动之前来报信：横山县城国民党守军力量较弱，防守工事不严，且县城外的地区均被红军游击队所占。

刘志丹、高岗认为横山县群众基础好，如能歼灭横山县城之守军，既可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北线的“围剿”，又能减轻神府苏区的敌情压力，并可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的联系通道，同时使驻守石湾镇的高双城一个团孤立无援，有利于米西无定河上游两岸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得到发展。

新编红四团是活动在横山、安定两县的几支游击队和第四纵队在安定县店则峁河成立的一支地方红军部队(后编人红二十八军)，谢绍安任团长，吴亚雄任副团长，刘国亮任政委。新编红四团成立后，奉命与第三纵队在赤源县及北部周边几县的大理河一带活动，以防御北线国民党军队向苏区的进攻。刘志丹、高岗决定调新编红四团配合西北红军主力攻打横山县城。

1935 年 8 月 27 日，红军正待举兵北上时，朱理治亲自来到延川县文安驿 (一说是刘志丹派张达志请来的)。刘志丹首次见到朱理治，就把自己身上佩的一支心爱的手枪送给他，以表示欢迎。前敌总指挥部召集西北红军连以上的干部会议，由朱理治传达了永坪会议两个决议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的五封信，并用了两天的时间进行学习讨论。朱理治把永坪会议上讲的那套空话、大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认为当前西北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 “围剿”固然很重要，但“如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提高全军战士的革命思想、“永生追求布尔什维克的理想”，比打仗更重要千万倍。参加会议的许多同志越听越糊涂，在讨论中提出一连串疑惑不解的问题。朱理治非但不作解释，反而说是“右倾取消主义布置的挑拨阴谋”。

高岗是个敢想、敢说、敢干的“直筒子”，在讨论中与张秀山等直言不讳地向朱理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深得与会同志赞同。朱理治想“分化瓦解”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层，利用一派打一派，便找高岗谈话，要高岗和西北代表团站在一起“反对右倾取消主义”，被高岗顶回。高岗说：“我们这里就没有右倾取消主义!”使得朱理治大失所望。

在这次会议上，刘志丹、高岗主张，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西北红军应寻机打击南北线的国民党军队，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彻底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是当前任务的重中之重；而朱理治主张，在文安驿“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应压倒一切。在双方的激烈斗争中，西北红军广大指战员一致拥护刘、高的正确主张，否定了朱理治等人的错误意见。在这次文安驿的传达会上，朱理治第一次见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他对他们的印象很不好。

朱理治与随同的郭洪涛提出要西北红军去攻打瓦窑堡。刘志丹、高岗认为瓦窑堡国民党守军设防严密，碉堡林立，一时难以攻克，但在朱理治的强行主张下，决定攻打瓦窑堡。部队开到瓦窑堡附近，刘志丹在山上一察看城外的工事设置和火力网点，气愤地说：“敌人这样的据点，依我军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我不能做这个历史的罪人!”随行其他指挥人员众口一词主张不执行朱理治指示攻打瓦窑堡的冒险行动，仍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既定作战方案北上攻打横山县城。

9 月初，前敌总指挥部不顾朱理治的阻挠，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和新编红四团从文安驿出发，秘密集结在横山县城东南的鲁家河，部署攻城准备。

横山县城修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一座三面临沟、东面依山的石砌古城，位于古长城南侧无定河支流芦河东岸。县城外以南的清坪堡、威武堡，以北的波罗堡、响水堡，均有高桂滋、井岳秀部的军队驻守。县城里驻守的是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独立骑兵支队 300 多人，城东五里墩驻守一个连，城东南 30 里的五龙山、韩岔各驻守一个连。

9 月 10 日晚，红军主力开到离县城西 10 里的陈家洼等地时，刘志丹、高岗分别对参加攻城的部队作了战前动员讲话。凌晨，刘志丹命令红二十七军二团、新编红四团及游击队由城东进攻；二十六军义勇军攻占南山制高点；红二十六军二、三团一部攻占城北娘娘庙，一部阻击波罗、响水等增援之敌。

红二十七军二团、新编红四团抽出 30 名战士组成登城突击队，由连长吴瑞带领，摸着黑到东城墙下，把云梯架上城墙，突击队奋勇爬上云梯。谁知云梯太短，不但不能登上城头，且因战士登城心切，爬上云梯的人太

多，云梯被压折，云梯上的战士全摔了下来。

这时，城上的守军才发觉红军兵临城下。一排手榴弹随即从城墙上扔下来，突击队战士死伤多人。由于部队偷袭攻城未能成功，偷袭变为强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红军虽用迫击炮击毁了城头上的守军城楼，也未能冲进城内。

刘志丹气得红了眼，再命先锋连接着攻城。顿时只见 140 余名红军战士，个个脱掉外衣，像猛虎下山一样，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冲杀声中勇猛地向守军阵地冲去。城内守军成了惊弓之鸟，企图弃城东逃，打开东城门，一窝蜂似的骑马涌出。

刘志丹指挥十几挺机枪迎头猛烈扫射，前边出城的守军纷纷中弹落马，后边出城的守军慌忙龟缩回去。经过激战，城外制高点及南关据点均被红军占领，县城尚未攻克，双方伤亡很大。下午 1 时许，刘志丹当机立断，主动将部队撤出战斗，向南转移。

这次横山奔袭战，西北红军主力虽未攻克县城，但重创了横山县第八十六师独立骑兵支队。井岳秀急忙收缩兵力，被迫把神府刘润民二五八旅抽出一部，加强镇川堡、武镇几个重要据点的防御，以保榆林老巢不致受到红军的威胁，从而既减轻了神府苏区红军独三团的军事压力，也解除了北线的牵制，使西北红军争取到空隙南下打击其他国民党军队。

识破假起义

在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中，神府党组织总结前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放弃依靠地方力量对国民党斗争、坐等外援的消极被动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去山西开辟新根据地的想法也是行不通的，如再不乘国民党军队对神府苏区“围剿”松懈之机采取积极果断的军事行动，就会坐失良机，铸成更大的错误。

1935 年 9 月 7 日，神府苏区在神木县郑家洼召开了前后方干部联席会议，决定重新恢复神府工委和红军独三团。恰在这时，神府苏区与西北工委接上关系。西北工委派出康普仁辗转山西，给神府工委送来指示信。在指示信中通报了西北红军连续解放六座县城，并将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

连为一体的喜讯，要求神府红军独三团向葭县、米脂县方向移动(送指示信前尚不知独三团解散之事)。

9 月 12 日，在王寿梁村正式宣布恢复中共神府工委，由张承忠任书记，毛凤翔负责组织工作，乔钟灵负责宣传工作，刘长亮负责青年工作。同时，宣布恢复红军独三团，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独三团恢复后的当晚，部队即到太和寨接应李治洲策动的起义队伍。

李治洲，陕西大荔县人，是受中共甘肃平凉组织派遣打人甘军的共产党员，在甘军康子祥营部当马弁队长，一直在秘密搞兵运活动。随军从平凉移防神府后，与地方党组织接上关系，并积极组织、策划在康营起义。这次起义前，李治洲已经联络了数十人，正准备行动，不料被奸细陈青山告密，仓促中李治洲只带出刘章娃、张福儿二人。李治洲到独三团后任团参谋长。

9 月下旬，独三团根据西北工委指示，转向外线作战，集结到葭芦区逐步向南移动。部队开到申家里时，与邬青云骑兵营一个连进行了一场激战。

邬青云骑兵营是一股土匪部队，奸淫烧杀，抢掠财物，无恶不作。独三团事先探得骑兵营的一个连从毛家洼向申家里开来，即在申家里后山设下埋伏。待这个连快进入申家里村时，独三团突然发起冲锋，在两面夹击之下，重创该连，使国民党小股队伍再不敢向苏区窜扰。此一战后，红军恢复和发展了葭县、榆林交界南至金明寺、北到常乐堡新的游击根据地。

在此期间，神府工委又派出刘长亮等到山西岢岚、兴县、岚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同时，神府工委派出杨文谟、张江全南下瓦窑堡，向西北工委汇报神府工委和独三团恢复后的情况。杨文谟、张江全刚到瓦窑堡，正遇上西北代表团的错误肃反狂潮，杨文谟不仅受到了批判，还被停止党籍，说他在神府“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西安地下工作期间被国民党逮捕一事未向党组织交代清楚，责令其留在瓦窑堡交代问题。

李治洲在太和寨康子祥营起义后，仍有不少共产党员潜伏在营里。这时，驻太和寨的营长康子祥调离，由杨相枝继任营长。中共南区区委给营里的一个共产党员送联络信时，因收信人不在，信件被同在营里当兵的兄长收到，即将联络信件交给营长杨相枝。狡猾的杨相枝不露声色，利用那

个党员的名义先复信称要红军送几十两大烟土作兵变活动经费，后又来信称已联络好二三十人，约定在 10 月 15 日举行起义，以三颗手榴弹爆炸为信号，参加起义者一律不戴帽子、左臂扎白手巾为标志，里应外合消灭太和寨守军，并要求多赶些牲口，便于驮东西。

王兆相性情急躁，主张行动。接替了杨文谟政委职务的毛凤翔冷静分析，识破了杨相枝的阴谋，认为其中必定有诈。在部队出发前，王兆相按照毛凤翔的建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不准暴露团领导身份，服从统一指挥。

10 月 15 日夜，独三团来到太和寨山上。部队一到约定地点，王兆相先布置一连和新红三支队控制了山头，随即带着两个连下山，到太和寨接应起义部队。

半夜时分，王兆相带着两个连刚下到半山，太和寨的村里果真响起三声手榴弹爆炸声。随之，从村里走出三四十个人，均不戴帽子，左臂扎着白手巾，每人带着一长一短两支枪。一见面，他们就说：太和寨守军的营、连长都被打死，被俘的队伍随后就会全部带来。并催问：“王团长在哪里?”

王兆相指一指山上说：“团长在山上。”

他们一听，便立即朝山上奔去，一边跑一边喊：“王团长在哪儿?我们要见王团长!”

王兆相发现破绽，立即命令随带的两个连迅速上山，并喊话要太和寨出来的三四十个人集合起来，但他们不列队，围了一个圈。王兆相打发张德超去联系，要带队的来见，正好张德超与一个姓崔的队长认识，便领来见王兆相。姓崔的队长到了王兆相跟前，王兆相还没问几句话，姓崔的队长突然一转身就跑，喊道：“那个戴白帽的是团长!”

话音未落，杨相枝埋设在附近的伏兵打过来一颗子弹击中张德超，张德超应声倒地牺牲。此时，四面山头骤然响起激烈的枪声。独三团被杨相枝设伏包围。这时，多亏杨相枝布置在沟口庙里的一股伏兵未及时赶到，部队才冲出包围，顺着沟口撤离险地。

独三团撤到毛家洼后，发现除张德超、高育才、贾怀耀、王玺四名连干部牺牲外，还有一名战士被俘，丢失长短枪五六支。后来每当王兆相提

起杨相枝营的这一场“假起义”，总是赞誉毛凤翔遇事沉着冷静，头脑清楚，善识敌诈，使独三团早有防范，避免造成大的损失。

不久，因王兆相有病，王进成代团长，带领独三团在王元家村击溃国民党军队一个连，但在乘胜追击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10 月中旬，红十一支队队长刘德有个长兄叫刘世礼，在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任旅长，给刘德写信许以高官厚禄，诱惑刘德策动红十一支队叛变。当游击队在苏泥家村宿营时，刘德突然夜里紧急集合队伍，蒙骗不明真相的战士降敌，并派人下了政委武开章的枪，准备将其挟持带走作为晋见之礼。武开章和贺子明、张宗珍少数人乘着混乱之机，在一些战士的暗中保护下，从苏泥家村逃出。

至此，神府苏区虽仍未能与陕北、陕甘边的苏区连到一起，但打通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使神府苏区广大军民在最艰难的斗争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七十六章

红十五军团首战告捷

三军会师

前敌总指挥部率红军主力挥师北上，奔袭横山县城未克，回师赤源县玉家湾、黄家川一带休整，研究部署准备南下攻打东北军的作战任务。这时，西北工委派人送来《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通知陕北、陕甘边苏区各级党组织：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北上，经甘肃庆阳、合水地区，已到达延川县永坪镇附近，要刘志丹、高岗率领西北红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向永坪镇集结，与红二十五军会师。

得悉红二十五军从南方转战来到陕北的喜讯后，西北红军全体指战员无不为之鼓舞，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情绪高涨。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拟定《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刘志丹、高岗分别作了讲话，说红二十五军是南方来的红军部队，建军早、打仗多、经验广，是久经沙场的红军老大哥，要求上自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至每一个战士，都要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搞好团结，密切配合作战，共同南下，攻打东北军，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是张国焘 1932 年 10 月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出发西征后，于同年 11 月在鄂豫皖根据地重建的一支

红军部队。

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首先进入川陕地区，以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调遣几支国民党部队以“剿共”为名尾追入陕，其中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装备精良，人马最多，但部队到达陕南便停滞不前，观望四川的刘湘、田颂尧杂牌军与红军交战，以达到消除异己的目的。后蒋介石以换防为借口，把胡宗南的部队调往天水，令驻天水的孙蔚如第三十八军开到陕南“剿共”的最前线，妄图使第十七路军的这支主力军与红军互相拼杀，以便坐收渔人之利。杨虎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和排挤第十七路军的动作早有愤懑情绪，在杜斌丞和部队中一些中共党员的促成下，杨虎城委派孙蔚如为代表，寻求与红四方面军合作。

孙蔚如

从 1933 年 5 月至 1934 年底，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与孙蔚如先后有 11 次会面接触，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据有关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的接触主要有如下几次：1933 年 5 月中旬，孙蔚如亲笔在红绫上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写了一封信，派第三十八军高级参议武志平(共产党员，身份一直未公开)前往川陕的苦草坝，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曾中生、傅钟等进行了会谈，红四方面军决定派出红军代表徐以新，赴汉中直接与孙蔚如见面；1933 年 6 月初，孙蔚如赶到汉中，在总参议王宗山、武志平陪同下，与红军代表徐以新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以巴山为界的互不侵犯协定；

1933 年 6 月下旬，孙蔚如、武志平在汉中与红军代表徐以新等进行了会谈，双方在互不侵犯协定的框架下，又达成相互配合打击胡宗南部队和在红白交界设立交通线的协定。

在红四方面军与孙蔚如几次会谈期间，张德生、常黎夫等为促成双方互不侵犯协定的履行，通过杜斌丞也会见了孙蔚如，并由张德生负责汉中联络站的工作，通过联络站的交通线，孙蔚如供给红四方面军一定的医药和军用物资，潘自力等通过这条交通线进入川北革命根据地。

1934 年 9 月，江西中央苏区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红二十五军 2900 人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起，从河南罗山县出发，冲破鄂豫皖苏区国民党重兵的围攻开始长征，即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12 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境内的陕南一带，中共鄂豫皖省委在丹凤县庚家河召开会议，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徐宝珊任书记，常委为吴焕先，并确定在陕南创建鄂豫陕新的根据地。正讨论部队今后的行动问题，国民党第六十师紧紧尾追即至，会议被迫中断投入战斗。在庚家河，红二十五军与第六十师展开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这一战虽毙伤第六十师 800 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但红军部队也伤亡惨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

吴焕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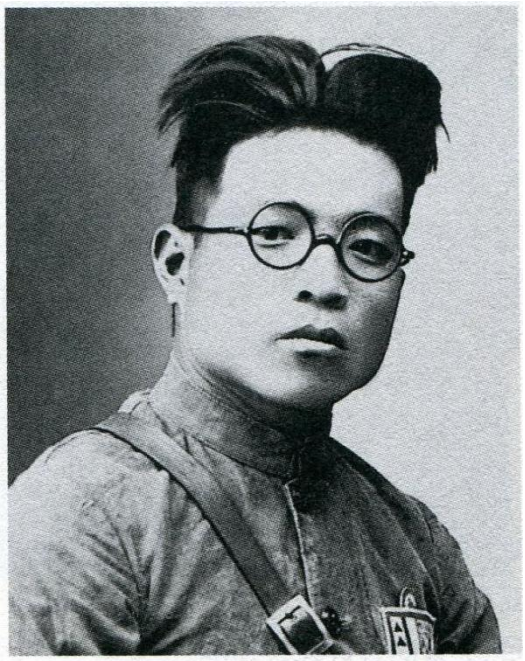
1935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以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

2 月，国民党军队向川陕根据地发动进攻，张国焘派人试图与活动在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时，获悉红二十五军已向北转移，即率领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地区，渡过嘉陵江，向红一方面军北上方向行进配合作战。

1935 年 2 月，杨虎城部刚升任警备第三旅旅长的共产党员张汉民得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即派张明远、马宗仁前去接头，并送去军用地图、电台、药品和其他急需物资。

张汉民，山西稷山县人，1925 年冬加人中国共产党。1929 年春到杨虎

城部队，历任杨虎城的随从副官、连长，教导大队中队长、陕西省政府卫士营营长、警卫团团长等职。1932 年下半年被中革军委任命为陕甘特派员。1935 年初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时该旅已有 200 名左右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委员会；连、排、班长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3 月，杨虎城电令张汉民阻击红二十五军，警备三旅的中共组织决定，如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


张汉民

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与红二十五军联系，一面率警备第三旅的两个团尾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保护。4 月 9 日，警备三旅旅部开近柞水九间房时，发现似有红军埋伏，将情况报告张汉民。张汉民认为，他与红二十五军事先有约，不会发生意外，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当先头部队进至九间房时，枪声大作，警备三旅两个团被红二十五军击溃，张汉民等被俘。张汉民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并说明了与中革军委、陕西省委和刘志丹、高岗及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可是长征路上仍掌握红二十五军“肃反”大权的吴焕先、戴季英把张汉民等 20 名共产党员以“反革命分子”处决。史称“九间房事件”。

此后，吴焕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称：“陕西党的阶级路线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分子有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民国二十二年加入法党，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我党而施行其反革命阴谋的破坏”。“我们不是神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就这样，红二十五军以对张汉民错误处理形成的假材料，给西北代表团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添了一把火，使朱理治、聂洪钧确信国民党已渗透到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之中，西北根据地的“敌情”非常严重。

4 月，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进入蓝田县葛牌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葛牌镇召开会议，总结红二十五军人陕以来的工作。会议上对中共鄂豫陕省委进行了改选，省委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同时，会上还批判了对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进行了组织处理。不久因徐宝珊病故，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

6 月，国民党军队向红二十五军发动进攻。7 月，中共鄂豫陕省委从报纸获悉：毛泽东等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有向陕北方向活动的迹象。省委决定率部队突破重围，向西转移，向红一方面军靠拢。

8 月 21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随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境内，没有寻找到红一方面军。在泾川战斗中，吴焕先牺牲，省委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书记，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二十五军进入人地两生的北方地区，上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下无群众基础，在弹尽粮绝、疲惫不堪，前无进军方向、后有国民党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到豹子川，一路与国民党甘军苦战。

部队在快进入西北根据地时，战士们身上背着的粮食全部吃完，全军两天多都没有饭吃，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地上。后来徐海东在回忆这段艰难经历时，一直难以忘怀红二十五军在饥饿之时，偶遇一个牧羊人，买到了一群羊，才使部队坚持走到陕甘苏区。

红二十五军一进入西北根据地，由于都是南方人，口音难懂，群众不清楚他们是一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后听说是南方上来的红军，和西北红军是一家人，习仲勋、刘景范等才在保安县境内找到部队，并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即速将部队护送到西北工委的驻地永坪镇。

徐海东

程子华、徐海东在转战陕北苏区的征途中伤病仍未愈，一路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当习仲勋、刘景范找到红二十五军，

部队与陕甘党组织接上关系时，喜从天降，全军指战员几乎都激动得落泪了。

9 月 13 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从玉家湾出发，于 14 日到达西北工委永坪镇驻地集结。

9 月 15 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胜利会师。9 月 16 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五军三军的团以上干部举行座谈会，相互介绍经验和情况。徐海东、刘志丹都在座谈会上讲了话，热烈庆祝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三军欢腾，鼓舞人心。

永坪镇联席会议

1935 年 9 月 17 日，朱理治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的身份在永坪镇娘娘庙里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这时，聂洪钧已于 9 月 1 日赶到永坪镇。刘志丹、高岗、徐海东、郭洪涛、程子华、郭述申、聂洪钧、张达志、崔田夫、杨琪、张秀山、自治民、史秀云、慕纯农、王月明、王达成、杨和亭等 30 多人参加会议。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朱理治不予评价陕北、陕甘边党组织已建立 29 个县级苏维埃革命政权，刘志丹、高岗等率领西北红军在短短几个月连续解放六座县城和苏区大片土地，使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连成一片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和功绩，而一味地批评刘志丹、高岗没有执行他主持下形成的西北工委决定，即指示红军去打绥德、肤施、米脂、清涧等中心城镇，却去攻打慕家塬和定仙嫣，是“抗命不遵”；指示红军去攻打瓦窑堡，却去奔袭横山县城未克，是“擅作主张”；把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和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高岗等主持和领导西北工委、军委期间的工作以及前敌总指挥部的一切军事行动都说得一无是处。

当时，从远道辗转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同志不明白真相，一时无法明辨是非。朱理治、聂洪钧等在红二十五军未到陕北之前，还怯惧刘志丹、高岗等在西北红军之中的牢固根基，不敢公然翻脸，也不敢对刘志丹、高岗等用过激的言词横加指责，怕西北红军发生变端，无法掌控。红二十五军一到陕北，朱理治、聂洪钧一下子壮了胆，横心实施在永坪工委扩大会议

上已明确提出的“肃反”计划。朱理治对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感激地说：“幸而二十五军来此就开始‘肃反’，不然陕北苏区与我们则(就)危险极了!”

程子华，山西运城县人，生于 1905 年。1927 年参加广州起义。1929 年后在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1931 年进人中央苏区工作，1934 年由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一说周恩来)派任红二十五军党代表，这时已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

程子华

在会上，高岗站起来要发言指责朱理治的无端批判时，被刘志丹制止。刘志丹认为：一切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要以共产党的利益为重，如这样唇枪舌剑地争论下去，只能造成共产党的内部分裂，造成对革命事业的损害，因此无论如何也应忍辱负重，不能让国民党高兴地看到“仇者快，亲者痛”的结果发生。

在会议上，由于红二十五军在朱理治等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不明真相的同志都站在朱理治、聂洪钧等的一边，意见形成一边倒。会议决定撤销原中共西北工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长。同时，决定将黄河以东的山西省境内的岢岚、兴县、岚县划人陕甘晋省的管辖之内，撤销鄂豫陕省委。

在会议上，朱理治正式宣布对西北军委彻底改组。由陕甘晋省委确认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在 7 月 15 日已任命)，戴季英任军委参谋长兼西北保卫局局长职务；撤掉了原军委参谋长朱子休和红军医院院长李向富的职务。在西北工委、军委的负责人中，除郭洪涛得到重用、原西北工委宣传部长张秀山改任军委供给部长及刘志丹挂一个“军委委员”的空衔，其余

几乎一个不留地被排挤出新建立的省委和改组的军委之外。侥幸的是对陕北省政府主席马明方、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暂未动作。至此，西北根据地完全陷入了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中。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像号角一样登在《西北斗争》刊革新号上，公开把反对右倾和“肃反”作为西北根据地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在党政军内响亮地提出。

同时，这次会议决定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红军部队改编为红十五军团。

1935 年 9 月 18 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成立红十五军团

9 月 18 日，在永坪镇石油矿的广场上召开了三军军人大会，正式宣布红十五军团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一说高岗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军团下辖三个师，即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七十五师，张绍东任师长，赵林波任政委，毕士悌任参谋长，周碧泉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任师长(后为田守尧)，张明先任政委(后为张达志)，下辖三个团和一个少共青年营：二三二团团长王富贵，政委黄罗斌，二三四团团长郭宝珊，政委马沛维，骑兵团团长康建民，政委高锦纯；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贺晋年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后为崔田民)，任浪华任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二。一团、二三六团、二四一团三个团，团长和政委分别是刘明山、李宗贵、李仲英、王国昌等。当时，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联合起来，形成。7000 多人的红军部队，真是人精马壮，

气势浩大。

红十五军团成立没几天，朱理治、聂洪钧等人又在红十五军团内对原西北红军的一些领导人采取了削减兵权的动作。高岗和许多同志想不通，向刘志丹谈看法。刘志丹毫无名利之争，劝大家都要从团结出发，以大局为重，以党和革命利益为重。

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突围出来，到陕北永坪镇时，兵员已减到不足 1200 人。由于长期行军打仗、疲于奔波，武器短缺，弹药匮乏，衣服破烂，个个面黄肌瘦。刘志丹、高岗主动抽出人力和物力补充红二十五军，给红二十五军送去大笔经费、粮食，从自己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里调出 500 多人，给红二十五军补充了兵员，还将西北红军的 60 挺机枪和几十门炮及长短枪、弹药、被服物资等调配给红二十五军，极大地改善了红二十五军的装备，充分地表达了兄弟部队对红二十五军红军老大哥的革命友情。

9 月 23 日，驻绥德县的国民党第二行政督察专员杭毅发电急告蒋介石：

> 高（桂滋）屡次损失已在四分之一以上。现在徐（海东）、刘（志丹）合股，应付军事已有手忙脚乱之状。高师士气大不如前，本人亦意志消极也。各地发现匪即在数里之地，驻军亦不敢出击，颓丧之气可概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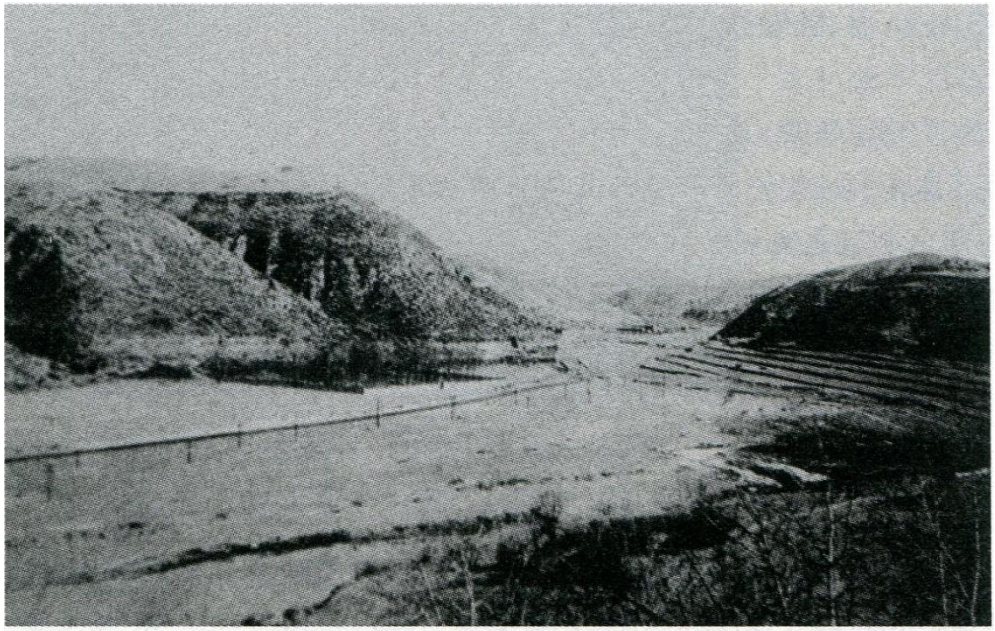
劳山战役

1935 年 9 月 19 日，改编后的红十五军团召开军事会议，对如何击退南线东北军“围剿”陕北苏区的攻势，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在会上，有的同志提议先打驻米脂一带的井岳秀或高桂滋师，北出横山，与神府苏区连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徐海东、刘志丹等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首先应打击进入苏区的东北军先头部队第六十七军，挫败东北军锐气，以促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会议按照徐海东、刘志丹等的主张，确定了红十五军团的战略方针后，徐海东充满信心地说：“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首先打响第一炮!”

9 月 20 日，红十五军团经三天的急行军，绕过肤施县城，到达肤施县

城以南 90 余里的甘泉县城附近，在王家坪等地秘密集结，伺机歼灭东北军。军团在这里召开会议，经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刘志丹、高岗建议，决定以佯攻甘泉县城内的东北军守军，诱驻扶施县城的东北军出兵增援，采取“围城打援”的战略，设伏大小劳山，将东北军的增援部队歼灭。

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有一〇七、一一〇、一二九三个师的强兵悍将。驻扶施县城的先头部队是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一〇七师随王以哲军部驻洛川塬上。这时，正好有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二营营长陈镇藩带五个连，随一二九师参谋长张文清及两个师的军需主任，从扶施县到甘泉县去，要接一批由西安运到甘泉县城的棉服等物资。他们一进甘泉县城，就连同城内原驻东北军被红军团团包围在县城里。徐海东、刘志丹、高岗等带着团以上指挥员立即到甘泉以北 15 里的劳山观察设伏地形。



甘泉县劳山战役遗址

劳山一带确实是红军隐蔽设伏、摆兵布阵的一个理想地方。这里山岭延绵，林木茂密，狭沟间正是西安直通榆林的咸榆公路，像一条张开的口袋一样。

军团部择好设伏地点，命令八十一师一部和地方游击队武装开始佯攻甘泉城，诱扶施县城东北军南下增援；八十一师一部在甘泉城以北的白土坡一带堵截东北军援兵；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各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大小劳

山，待肤施县城东北军援兵进入布下的口袋阵。

到大小劳山参加设伏的各路部队，在出发前进行了严密的组织，规定每个战士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设伏地区，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刘志丹亲自带着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和营以上干部到白土坡与八十一师设伏的接合部，仔细地观察了地形和听取了各战斗部队的汇报后，对全体指战员说："这次战斗是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一定要打好。同时，东北军是蒋介石对我西北苏区第三次'围剿'的主力军，打赢了这一仗，不但对整个国民党军队有影响，而且对争取东北军工作也会起很大作用。现在除把战场选好外，还要注意保密，要注意隐蔽……"

9 月 29 日，八十一师一部和地方游击队武装大造声势，开始佯攻甘泉县城。城内孤守的东北军惊慌失措，频频向驻守肤施县城的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呼救求援。

10 月 1 日，大小劳山设伏的各路部队等到下午时分，才看见从肤施县城出动南援甘泉的东北军一一〇师一个整师，像一群蚂蚁一样进入了红军布好的口袋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骑在高头大马之上，大摇大摆地率领着浩浩荡荡四路并列行走的大军，当进入红军伏击圈后，还以为穿过了红军可能设伏的地区。何立中对身边的参谋长说："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

话音未落，只听见天空一声信号枪响，八十一师从白土坡正面发起堵击。七十五师在党家河把退路截断，大小劳山的公路两旁，机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在长约二里路的东北军队伍中同时响起，震天动地，回荡在狭沟的上空。

东北军前卫部队到达白土坡时，早已等候在白土坡的八十一师，在师长贺晋年的率领下，全线出击，几分钟就把几路行军的东北军纵队打乱。一部分东北军负隅顽抗，大部分向小劳山逃跑。东北军先头部队组织一个前卫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向东山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一个营的阵地反攻，企图夺路向甘泉县城靠拢。贺晋年立即派二三六团第三营前去增援二四一团阵地，与东北军先头部队展开异常激烈的战斗。在堵截战斗中，二四一

团和二三六团的两个营伤亡很大。

高岗眼看东北军要突破白土坡八十一师的堵截防线，又看见好多战士一个个倒下去，王学礼、栾新春、谢四娃、杨玉清、李富贵等连以上干部伤亡，有的战士受伤后肠子外露，仍趴在地上坚持战斗，他顿时仇恨满腔，急红了眼，一把脱掉外衣，跳出指挥所，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向东北军发起冲锋。贺晋年、贺吉祥等师团领导也随着跳出战壕，带着部队向东北军冲杀过去。

东北军向甘泉方向突围失败后，八十一师向东北军发起政治攻势："不要给蒋介石卖命，打回东北去，消灭日本侵略军，不做亡国奴，收复失地，拯救东三省人民!"

东北军先头部队前卫团纷纷缴枪投降，一部分顽军退到大小劳山。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王富贵衔后追击顽军，在激战中牺牲。

这时，设伏在大小劳山两侧的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从两面大山向公路压下来。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带着二三四团把东北军师部与尾部之军在党家河从中切成两段。设伏在土黄沟和杨庄科沟的骑兵团冲出大川，将东北军师部围截。尾部的东北军企图拼命向师部靠拢，组成几股小集团队伍发起冲锋，均被七十八师打得溃败而退，逃回肤施。

八十一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三支大军在大小劳山紧缩口袋，把东北军前卫部队和师部严严实实地包围在山下的公路和大川。何立中带着师部和直属队拼命占领了公路西的一个山头，凭借山上的有利地形顽抗。八十一师二〇一团一个冲锋，就把何立中所带的东北军压到一个小山头。何立中先后组织十次冲锋，企图突破白土坡的东山阵地，朝南逃回甘泉县城。八十一师顽强截击，东北军终未获得成功。

最后，红十五军团各路大军在南至白土坡、北至五里桥的公路和大川里把东北军截成几段，分段围击。经近四小时的激烈战斗，到下午日落前，除东北军后卫团部分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俘。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洲被当场击毙，活捉团长裴焕彩、杨德新(后自杀)。

劳山战斗结束，红十五军团主力一边清理战场，一边在劳山附近休整。同时，军团又派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率部队，到羊泉侦察敌情。七十八师

虽经劳山战斗未及休整，部队十分疲劳，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非常旺盛。在杨森指挥下，乘胜连续作战，又将羊泉东北军一。七师一个营歼灭。

劳山战役是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仗、硬仗、胜仗，东北军被俘 3700 多人，被击毙 1000 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有各种大炮 12 门、轻重机枪 180 多挺、步枪 4000 余支，还有电台 1 部、战马 300 多匹。据说这次高岗“赤膊战劳山”成了传奇，一度还被编进了陕甘宁边区的小学课本。

这一仗，是第三次反“围剿”中又一关键性战役，红十五军团给予东北军一个沉重的打击，重创了其骄横气焰，打出了红军的军威，为以后共产党和张学良在洛川县首次举行和谈奠定了军事基础。

第七十七章

从鄂豫皖带来的“肃反”利刃

罗织“右派反革命"罪名

劳山战役胜利后，安定县驻瓦窑堡的张建南一营守军闻风丧胆，当天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悄然弃城而逃。瓦窑堡城解放。次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机关从永坪镇移到瓦窑堡城内。

1935 年 10 月 22 日，红十五军团挺军南下，攻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一部固守的鄜县榆林桥据点，歼该师六一九团四个营，活捉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的这个团是东北军一〇七师的主力。

高福源被俘后，一开始混在许多俘虏中未查出来。后来有个同志看见俘虏中一个人穿着漂亮，便走到跟前诈他：“你就是高福源!”这个俘虏连忙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说着慌张地朝旁边一位作暗示，原来他身边的就是高福源。

高福源曾在北京上过大学，东北讲武堂毕业。他和张学良关系甚好，有着强烈的抗日愿望。被俘后，受到红军格外优待，通过中共的宣传和影响，他认识到中共领导的红军是唯一抗日救亡的同盟军。后被释放回到东北军，积极做张学良和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工作，奔波于中共和东北军之间，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1937 年“二二事件”后不幸遇害。

榆林桥战斗一结束，红十五军团乘胜扩大战果，决定继续南下攻打张

村驿。张村驿是个小镇，周围有四个土围子，驻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 300 余人。部队一鼓作气攻下张村驿镇及周围几个土围子，缴获到大量的粮食。至此，陕北、陕甘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进入尾声。

9 月至 10 月期间，西北根据地笼罩着满天的黑云，腥风血雨的错误肃反使这块硕果仅存的苏区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

在红十五军团开拔劳山前线的第二天(9 月 21 日)，朱理治以中共陕甘晋省委的名义，向党、政、军发出“肃反”的指示，给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开始了抓捕、密杀行动。当时，刘志丹、高岗和不少在劳山参战的指战人员也被列入黑名单之内，只是未立即采取抓捕行动而已。

人们在事后才回想起：怪不得劳山战役一结束，在总结会上，随红十五军团在前线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借故当即把八十一师一个团长免职，并要当场枪毙作战勇敢的两个营长，经高岗和李宗贵(李赤然)求情才作罢。当时，西北红军全体指战员对红十五军团主要领导人的不正常举动愤愤不平，很不理解，到后来才完全明白。

李赤然

在劳山战役前，担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已接到朱理治以省委名义送来的秘密指示。信中密令徐海东在前线配合聂洪钧在军内实行“肃反”，抓捕刘志丹、高岗等列人黑名单的西北红军指战员。徐海东对刘志丹、高岗等虽了解甚少，但对省委的指示有看法，尤其他以前在鄂豫皖吃了戴季英的不少苦头，戴季英一当上西北保卫局局长，他就曾向省委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与东北军大战在即，临阵先行抓捕自家将领是兵家大忌，会造成军心浮动、丧失斗志，不利于战斗的进行。

在劳山与东北军大战期间，徐海东亲眼看到西北红军全体指战员与东北军英勇拼杀、浴血奋战的悲壮情景，特别是刘志丹、高岗等西北红军的主要领导者身先士卒、勇猛作战的形象，使他对省委的指示产生了许多疑惑，更不忍心对他们下手。徐海东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对省委的指示不得不执行又不忍去执行。在这种极端矛盾的心态下，徐海东在前方军团部还是抵制了聂洪钧坚持执行省委指示的主张，没有在军内贯彻朱理治的“肃反”指令，仍打算率领红十五军团西出环县、庆阳，寻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

朱理治和聂洪钧等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与刘志丹、高岗等执行的从实际出发创建红军和开辟苏区的正确路线格格不入。当朱理治、聂洪钧等的“左”倾错误未成气候之时，戴季英的发挥像在剧毒的药物中加进增效剂一样，加快了朱理治、聂洪钧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进度，并使力度迅速升级。

朱理治、聂洪钧在戴季英等的策划和参与下，很快构思出刘志丹、高岗等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创建者的罪名，由最初提出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张慕陶右派”一下子定为可杀头的“右派反革命”。戴季英在红二十五军内选拔、抽调出一批“肃反”骨干，协助在前线、后方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

对于刘志丹、高岗等的“右派反革命”，朱理治、聂洪钧与戴季英为之编织的“犯罪事实”可谓难以胜数。归纳起来，一是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中城市，是怯战的“梢山主义”；二是说在已建立的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中，不搞肉体消灭地主，而给富农生活出路，执行危害贫雇农利益的“富农路线”；三是说对民团、土匪、哥老会做争取工作，搞联合拉武装，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损害红军形象的“土匪路线”；四是说在外来知识分子中提拔领导，不把贫雇农出身的农民放到主要领导岗位，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五是说与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和其他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

朱理治、聂洪钧和戴季英等把错误肃反的重点指向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不论是从红二十五军带来的杀害张汉民案件的材料，还是在陕甘边抓起来的几个人的初审情况看，一切都印证在上级党组织的“预察”之中：原西北工委和军委的领导权主要把持在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手里，只有清洗了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这批“右派反革命”，才能达到“纯洁革命队伍”的目的。

鄂豫皖的“肃反经验”

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初始，西北代表团表面还装出尊重刘志丹、高岗的样子，先征得刘志丹、高岗的同意后才抓人。最早从陕甘边苏区拉开血腥的帷幕。西北保卫局在后方先把陕甘边反对查田运动的李西萍、黄子文及黄子文的交通员姜旭关押起来审查。接着说有人“发现张慕陶的通信员给另一个同志送信”，代表团找到了全面展开错误肃反的口实，即背着刘志丹、高岗又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蔡子伟等秘密逮捕，交由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突击审讯，硬说他们是“张慕陶右派”。朱理治早在永坪镇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上就点了蔡子伟的名，但当时认为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不准备动他，用朱理治的话说，“观察蔡子伟同志在工委中的表现，感到此人不像是坏人”，因而作为“在实际工作中对‘中代’所说的右派进行考察”的首批对象。

在开始抓捕人时，朱理治决定让郭洪涛与戴季英一起审讯，但后来戴季英审讯这些被抓的人时没有让郭洪涛参加。郭洪涛心生疑虑：是不是被抓起的人把自己也供出来了，组织上不相信自己了?他怕受到株连，决定采取消极的态度，也就不敢大胆过问“肃反”的事了。在 1942 年中共西北局高于会上，郭洪涛在讲到朱理治的问题时声明说：陕北“肃反”中朱理治“只同戴季英一个人谈……‘肃反’工作我没有参加，‘肃反’内幕我不清楚”。

朱理治发现戴季英没有让郭洪涛一起参加审讯很生气，曾责问戴季英。戴季英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肃反’审讯只能军委主席一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

戴季英，湖北黄安县(今红安)人，生于 1908 年。1925 年加入青年团。

1926 年加入共产党。1927 年 11 月参与组织领导黄(安)麻(城)起义，任中共黄麻县委委员。1928 年 5 月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兼共青团黄麻县委书记，并兼黄安地方武装总指挥。1929 年 2 月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12 月出席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候补委员。1931 年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鄂豫皖错误肃反时曾任审讯科

科长。1942 年，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戴季英承认陕北“肃反”是“我们带来了张国焘路线错误，二十五军领导要负责任，我应负大的责任，我运用了鄂豫皖‘肃反’错误经验如严刑逼供、指名问供等，但陕北‘肃反’错误的主要原因，应归咎于中央代表团和省委领导上的种种错误”。

到西北根据地后，戴季英对错误肃反初期被抓起的几个所谓的“张慕陶右派”，沿用鄂豫皖扩大“肃反”的那一套逼供信办法，相信重刑之下必吐真言。

张慕陶何许人?当时，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的许多同志根本不明其详。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化名镜英、马云程，陕西旬邑县人，生于 1902 年。1923 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1924 年加入青年团。1925 年转入共产党。1927 年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兼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同年 9 月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28 年 6 月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29 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1930 年春，中共中央曾怀疑其为托派，调离天津到上海进行审查，后派往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书记。1931 年，因参与罗章龙分裂党组织的活动，被开除党籍。不久，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1932 年 9 月，出狱后恢复党籍，同年冬季，派任中共张家口特委书记，后任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在天津等地从事反蒋活动。1934 年后担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1941 年 1 月，蒋介石令蒋鼎文在南郑将其枪杀。

据鄂豫皖根据地的有关史料记载，1931 年夏秋开始，王明等人把持的中共临时中央派张国焘为鄂豫皖的全权代表，并任命其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主持领导工作，戴季英积极追随张国焘，在鄂豫皖大肆实行扩大“肃反”。

当时，在湖北黄安组成的红四方面军，所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总兵力近 3 万人。张国焘到鄂豫皖后，仅 1931 年 11 月之前，在红四军内以“反革命”“AB 团”“第三党”等莫须有的罪名，先后杀害师长、师政委、团长、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团政治部主任及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和连排长多名。曾有人粗略计算，仅红四军内约有 2500 名红军将士被捕和被杀，占到红四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由于外遭国民党重兵的“围剿”，内受张国焘错误肃反的摧残，再无法在鄂豫皖根据地立足。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进入四川的川北地区。鄂豫皖苏区的错误肃反又侵害到川陕根据地。

1933 年 2 月，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6 月，在川陕地区，张国焘下令先后秘密处决了红四军前军长、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主任邝继勋和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余笃山等人，并软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

8 月，张国焘以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黄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有“托派”之嫌，将其逮捕，后用绳索活活勒死，对外佯称其“通敌叛变，掉进河里淹水身亡”。

毛泽东到西北根据地后，曾特意请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先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性命，并给以优待。为此代表团所切嘱。”但曾中生再也不能回来了，只有廖承志侥幸活了下来。

在徐向前和倪志亮所著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史》中，对这次“肃反”这样写道：“……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 200 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例如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麻

城)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及皖西通委书记方英，……至于群众中被捕杀的人更难于计算”。汪剑等在《历史的误区》一书中写道：“由于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得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被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和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红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日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在鄂豫皖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七十四师师长的徐海东多年后提起这一时期的“肃反”仍然深恶痛绝，记忆犹新。有一次，戴季英把第七十四师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 49 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绑在板凳上用刑问不出口供时，就叫人拉出去杀了。

徐海东急着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

戴季英答：“你不懂‘肃反’政策，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定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捆起的 49 个人都被杀了。在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的战斗中，部队在围城打仗，戴季英在后方“肃反”，又把很多干部和战士当做“改组派”“第三党”“AB 团”抓起来……所以，徐海东一直认为戴季英的个人意识不好。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与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所罗织的罪名虽有不同，但执行的都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是相同的。

严刑逼供

1935 年 9 月 17 日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后，在西北根据地后方被西北保卫局关押起来的李西萍、姜旭，由戴季英主审，聂洪钧的妻子宋涟负责记录，先“供”出张庆孚、蔡子伟等人。戴季英对李西萍、姜旭的供词远远不满足，遂把李西萍高吊起来，一吊就是半天，惨叫声不绝于耳，在场拷打的审讯人员都不忍看下去。戴季英却说：“对反革命就要这样。”李西萍、姜旭难熬酷刑之苦，在审讯中只要戴季英指供谁，就供出谁，并给供出的人编出一堆“罪状”。

戴季英逼迫李西萍、姜旭供出一批所谓“右派反革命”后，如获至宝，按鄂豫皖的“肃反经验”，立即在后方采取了大抓捕。除李西萍、姜旭、黄子文、张庆孚、蔡子伟等外，又先后把张秀山、张文舟、李启明、张仲良、胡彦英、赵启民、赵守一、汪锋、贺笑晓、刘汉武、张文华、杨玉亭等逮捕关押。在陕甘边苏区一次逮捕九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开始时，“肃反”对象的名单由西北代表团的负责人列出(朱理治说先由保卫局提出)，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 主席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再予以逮捕。习仲勋当时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后来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时说：第一次朱理治“开来了 30 多人的名单，我、景范都参加了会。那里面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

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捕了九个人，其余的人都是我硬担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来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恐慌”。

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张文华回忆说：“1935 年 9 月某日，省(应是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应是陕甘晋省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党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一次，在抓捕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时，戴季英亲自带着保卫局的几十个手枪队队员把懿子沟政府所在地严密封锁，然后找习仲勋谈话，逼着习仲勋把赤卫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张××叫到院里，以“看枪”为名将其佩枪下了。接着，命令习仲勋把名单上所有的“嫌犯”叫到院里，也一律缴了枪，个个捆绑起来。大家都莫名其妙，习仲勋只好对被捕的人说：“听从组织的命令，事情总会查清的。”这次抓走的有张××、冯树立、王居仁、张景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唯一的女干部)等人。

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习仲勋内心非常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竟出现精神上的严重过敏反应，每当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一些人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感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地对习仲勋说，还是暂时离开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被捕)的，我怎么能走呢?”

一天，红十五军团特务科长朱新来到下寺湾，叫习仲勋去十多里以外的王家坪谈话。来人带有前方领导人写的亲笔信。信中说：“仲勋同志，你对于这次‘肃反’，态度暧昧，非无产阶级意识，有跟你谈话的必要。”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身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洋和一支钢笔交给了刚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与自己一同去王家坪红十五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便让张策在懿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策说，如果他能回来，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已被捕。习仲勋到王家坪，刚一踏进军团部就被捕了。

10 月 4 日，劳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朱理治以省委名义给红十五军团送来密信，称后方已逮捕了几个人，供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琪、杨森、刘景范、张策等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指令前方的聂洪钧立即在军内肃清“右派反革命”。

这时，红十五军团从劳山战役中缴获国民党的电台电文中得悉，朱毛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有流窜陕甘边模样”。当时，在前方部队的聂洪钧

要徐海东按省委的指示，立即逮捕前线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提出：为避免弄错，在部队惹出乱子，最好等中央来解决较好。聂洪钧见徐海东如此态度，也就不敢在部队里轻举妄动了。

刘志丹、高岗等听到中央红军已到甘肃的陕州一带，向陕北方向进军，向徐海东建议召开军团部会议，研究计划出兵西进环县、庆阳，迎接中央红军人陕。军团部采纳了刘志丹、高岗的建议，一方面抓紧部署红军部队向西挺进的战斗准备，一方面积极写出报告向省委请示。

红十五军团出兵西进迎接中央红军入陕的作战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一直不予答复。徐海东、聂洪钧等给省委写信催询后，朱理治才来信指示：红十五军团只在甘泉、郡县之间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在信中严令阻止西北红军西出环县的行动，指出“这个行动可能发生变故，造成罪过。刘志丹、高岗等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助解决”。

红十五军团接到信后，原地待命，并写信催促郭洪涛快来。在前方部队的聂洪钧根据朱理治的来信指示，为防止在郭洪涛到来之前部队发生变故，命令红十五军团采取秘密手段，先将刘志丹、高岗分别隔离开来，并找借口把高岗和杨森等从部队调到安塞后方地区。根据聂洪钧的回忆，截至程子华来前方之时，以朱理治或省委名义先后给前方发过四五封指示信，多次点名要前方抓捕刘志丹、高岗等人，最后的一封就是刘志丹返回瓦窑堡半路看到的那封信，信里除指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外，还责备程子华不该迟疑。聂洪钧并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指责陕北错误肃反中所有负有责任的人时

说：“这是严酷的事实，怎么能够推卸得了呢!”

10 月 5 日，红十五军团没等来郭洪涛，来的却是程子华。程子华身带伤病坐着一个架窝子，以红十五军团政委名义前来执行任务。

在程子华来前方之前，戴季英主张在西北红军中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

朱理治犹豫不决地说：“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有功之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

戴季英又有理有据地大谈鄂豫皖“肃反经验”：“创造苏区?当初鄂豫皖的邝继勋、许继慎等人还不是苏区的创始人，可最后还不是证明他们是反动派。”

朱理治、郭洪涛缺乏“肃反经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朱理治说：“此事太大，材料尚不充实，需要搜集，慎重处理。”

程子华担心地问朱理治：“如前方发生了问题谁负责?”

朱理治说：“可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

最后，商定在前方先把刘志丹调离开部队，待刘志丹回到后方即软禁在省委机关的院里。

程子华一到红十五军团，立即与聂洪钧、徐海东、郭述申等研究对刘志丹的处置问题，但仍不敢在前方下手逮捕刘志丹。当时，红十五军团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有 6000 余人，而红二十五军连同陕北补充的新兵在内还不足 2000 人，更重要的是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官兵对刘志丹非常爱戴，就连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对刘志丹也有感情，怀有敬重之心。如在前方逮捕刘志丹，既不利于当时的紧张战斗，又怕引发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部队骚乱。所以，决定按省委的方案先把刘志丹骗回后方工作，然后再分别逮捕高岗、习仲勋、杨森、马文瑞、张策等一批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

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中还说道：“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备考察。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

程子华在 1945 年检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时痛心地说：“我们在‘肃反’(中)犯了盲从的错误。”

第七十八章

黑云总是遮不住太阳

“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在东北军从南线步步逼近陕北苏区，前方正处紧张之际，程子华借传达中共陕甘晋省委的指示，通知刘志丹离开红十五军团，调后方瓦窑堡开会。刘志丹接到程子华的通知后，立即骑马带着警卫员谢文祥(一说是魏德)，从前线动身返回后方。

1935 年 10 月 5 日，刘志丹从下寺湾的王家坪军团部驻地出发，一路朝着后方瓦窑堡的方向策马赶路。路过安塞县的真武洞时，省委紧急派出去红十五军团军团部送信的通信员与刘志丹相遇。这个通信员不知紧急信的内容，但认得刘志丹是军团的领导人，急忙勒马停下，将这封紧急信件交给刘志丹。

刘志丹拆开信一看，如同晴天炸雷般震惊，原来是省委指示逮捕他和高岗等几十人的名单，还有一封写给前方程子华、聂洪钧的密信。信中确凿地指出：“已确定刘为反动无疑，速调刘、高回来。”朱理治在后来辩解说，他与程子华事先商量把刘志丹、高岗隔离开，调刘志丹回瓦窑堡先软禁起来。结果戴季英违背他的意图，以省委名义写出的这封信，既没给他看也未请示，就派出通信员送往前线。在 1942 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大家驳斥朱理治的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朱理治不得不承认：“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下的命令。”

刘志丹看了这份逮捕名单后，对朱理治等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

陷害同志的行径非常气愤。刘志丹心里十分清楚，程子华这次通知自己去瓦窑堡开会，是朱理治等设下的圈套，这一去就是自投罗网，生死未卜，但他胸怀坦荡，以对共产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为了不使西北党的组织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国民党可乘之机，面对西北代表团利用手中的大权可能把西北根据地毁于一旦的关键时刻，还是毅然作出抉择：以革命大局为重，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镇定地把信封好，交给通信员说：“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

此时，刘志丹非常担心聂洪钧等在前线接到这封紧急信件后，会立即开始错误肃反，大肆逮捕西北红军将士，滥杀无辜，怕高岗这个“炮筒子”因早对西北代表团的所作所为愤懑不平，如在这种特别的时刻不能控制情绪，会与一些同志做出可能发生军事变故的蠢事。他连忙给高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把我写给你的信，看后交给军团长，绝不能让红军打红军。他把写好的信交给警卫员谢文祥，让他立即骑马送到高岗手里。

这时天近暮色，刘志丹翻身上马，只身单骑，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到瓦窑堡。次日凌晨，刘志丹到西北保卫局报到。刘志丹把腰间插的左轮手枪放到桌子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

朱理治在回忆录中说，刘志丹到达瓦窑堡后，既没去省委，也没有回家(家在沙家巷)，径直去了西北军委。戴季英很快派人把刘志丹带到保卫局关起来。郭洪涛得知刘志丹回到瓦窑堡，先赶到西北军委。西北军委秘书长范子文说刘志丹已被戴季英带走。郭洪涛又赶到保卫局要见刘志丹，被戴季英拒绝。戴季英将送往前方的密信被刘志丹看到的情况报告朱理治后，朱理治大为惊诧，他不理解刘志丹在半路上已看到逮捕自己的信，为何“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

刘志丹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原以为自己用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行为，会消除一些误会和疑心。然而，刘志丹的一切努力全都徒然，西北保卫局不由分说，将他抓起来关进牢房。戴季英为封锁刘志丹被捕的消息，遮人耳目，又立即派人通知前线，把知情的警卫员谢文祥关进牢房。

刘志丹被捕后，一开始，人们还见到刘志丹的坐骑。因为刘志丹的坐骑成天不下鞍，以为他忙着开会，很快要离开瓦窑堡返回部队去。随后，

西北保卫局的人把刘志丹的坐骑也藏起来，怕时间一长人们只看到坐骑，不见刘志丹的影子，会惹出事变来。

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听到刘志丹与徐海东率领红军在劳山打了大胜仗，满怀喜悦，盼着丈夫凯旋，天天带着五岁的女儿刘力贞打听刘志丹的消息。后来听有人传说刘志丹已到瓦窑堡，并有人见过他的坐骑。但却一直未见到，总以为在忙着开会，抽不出时间回家。

在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时，据有关资料说郭洪涛与朱理治有过争论。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陕北“肃反”中是一个人们长期持有争议的人物，原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同志，尤其是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同志对他的指责之词更强烈。

国民党军队驻瓦窑堡守军于 10 月 1 日夜撤走。次日，郭洪涛被派到瓦窑堡城里做接管工作。郭洪涛刚到瓦窑堡，代表团的朱理治通知，要他速返永坪镇。郭洪涛连夜赶回永坪镇，得知在他离开永坪镇后，朱理治与程子华旁观戴季英审讯张文华、蔡子伟时，把他们吊起来拷打，二人就供出刘志丹、高岗是“右派反革命”，放下来又翻供；戴季英主张立即逮捕刘、高。朱理治还告诉他说，张秀山被供出是“右派反革命”，已被西北保卫局逮捕，并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都是“右派反革命”。郭洪涛当即表示：“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程子华亦表示：“连郭洪涛也不同意，那么此问题必须慎重。”

朱理治对郭洪涛的表态非常气愤。他认为向代表团提供刘志丹、高岗等种种错误和可疑材料的人是你郭洪涛，现在把张秀山逮捕了，你又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都不是“右派反革命”，便对郭洪涛说：“过去你说这些人可疑，现在有了口供，你又说不是。”并厉声斥责：“现在就把你捆起来!已经有了证据，你还(敢)说他们不是反革命。”

郭洪涛也承认自己向代表团反映过这些人的一些问题和情况，但那都是属党内性质的事情，并“不是有意陷害他们”。用他在 1942 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原话，就是“我说他们的错误是有的，他们是右倾取消主义，一但不能说他们就是反革命”。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最后的关头，郭洪涛还是保住了底线。戴季英在 1942 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也证明了郭洪

涛的说法是真实的，他说：“他(指郭洪涛)对我只讲过刘志丹恐怕与右派有关系，他始终没有明确地向我说过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他对我们是暧昧的。”但这时的朱理治已经昏了头，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反而在戴季英的不停审讯下把错误肃反推向顶峰，并愈演愈烈。

在程子华去前方的当天，朱理治告诉郭洪涛，决定把刘志丹、高岗从前方调回瓦窑堡监视起来，在问题没有弄清之前，先软禁到省委院里。

郭洪涛担心地说：“把他们俩监视起来，红军就会出问题。”

朱理治无奈地说：“不监视起来，将来他们(在前方)暴动起来，出了乱子怎么办?”

10 月 6 日，当刘志丹被西北保卫局逮捕后，郭洪涛到朱理治的办公室质问：“原先你说刘回后方审查，怎么又把他逮捕了，到底有什么证据?”这时，正好团省委书记慕纯农有事找朱理治，听到郭洪涛正在说“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我死也不相信”，但当慕纯农进入朱理治的办公室，即打断了朱、郭的谈话。慕纯农离开朱理治的办公室，回到团省委机关后，还把听到的朱、郭谈话内容告诉了时任团省委宣传部长的高朗山。

在慕纯农离开后，朱理治拿出两份被逮捕者的供词记录让郭洪涛看，郭看后仍不相信。朱理治就要郭洪涛旁听戴季英对红二十六军的一位负责人的审讯。戴季英在审讯这位同志时，要他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这位同志见郭洪涛在旁坐着，当着面质问郭洪涛：“别人不知道，难道你郭洪涛还不知道吗?”

郭洪涛始终不说话，未予表态(按郭洪涛的说法是朱理治与他事先有约定，在旁听时不能说话和表态)。戴季英即令把这位同志吊起来拷打。这位同志看到郭洪涛这副漠然处之的态度，对他甚感失望和愤怒……对于西北根据地的这场错误肃反，郭洪涛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郭洪涛在 1958 年给中央监委的申诉书中自我检查说：“我应是错误肃反的政治上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我不仅是本地干部，而且还是当时陕甘晋省委主要负责人之

1983 年中央 28 号文件中说：“……我们相信，在逮捕张秀山同志后，郭洪涛同志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以后又说过‘不是有意陷害他们’的话。”

郭洪涛在刊于《百年潮》2004 年第 5 期的署名文章《关于陕北的错误肃反》中这样自责道：“在陕北错误肃反中，我是有错误的：一是我盲目地拥护了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报告和西北工委永坪扩大会议的错误决议。这个报告和决议，号召反对张慕陶右派，对错误肃反影响极大；二是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到陕北后，我向他(指朱理治)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虽然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是属于党内性质的问题，却造成了对红二十六军老干部的不信任。而且我当时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又是本地干部，因此，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

大抓捕

在后方，刘志丹被西北保卫局逮捕后，朱理治立即通知前方的聂洪钧督促红十五军团主要负责人迅速按省委排好的人员名单，在高桥镇、王家坪、三十里铺等地以“开会”“研究要事”等为名，分别将高岗、习仲勋、杨森、黄罗斌、马文瑞、张策、孔令甫、郭宝珊、刘景范、杨琪、任浪华、惠子俊、朱奎、王聚德、朱子休、高朗亭、王家娃、高锦纯等西北根据地党政负责人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负责人抓起来。

在前方，程子华接到戴季英以朱理治名义写的信后，把信中的内容告诉了徐海东。徐海东问：“这事是有具体材料，还是戴季英审问的口供?如是戴季英审问的口供，那是不可靠的。”

说话时，前方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中已经展开了大抓捕行动。只见高岗被几个战士捆绑着押到军团部来了。高岗一进门，就大声说：“海东同志，你们说我是‘反革命’这是亏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成木匠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

程子华训斥高岗。高岗不服，与程子华大吵起来。徐海东看到此景，悄然走出门外伤心地流泪了。逮捕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时，谎称各团营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会，当这些红军干部走进师部，就被一个个抓起来。这时，先被抓的郭宝珊正在师部受拷问，要他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承认自己也是“右派反革命”。

郭宝珊坚决地反驳说：“刘志丹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我就不会跟他，他不是右派，我也没有听说过红军中还有右派!”

在前方被抓的红军干部，由聂洪钧等人轮番审讯。前方由于战事紧张，采取最简单而又是最残酷的饥饿审讯方式，数天不给关押起来的人吃饭、喝水，威逼他们交代“右派反革命”问题。

刘懋功回忆说，他被“左”倾错误执行者在前方拷打，四天不给吃喝，快要饿死了。幸得在第五天有师长田守尧(杨森被捕后，朱理治、聂洪钧新任命的七十八师师长)从被关押的窑前路过，他喊了一声“师长救命”，田守尧才让给他送饭吃送水喝，并在第六天莫名其妙地被释放。

逮捕杨森、黄罗斌时，程子华、聂洪钧、徐海东亲自到高桥川。聂洪钧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现在北线吃紧，组织调你到北线任总指挥。”又对黄罗斌说：“瓦窑堡办了一个红军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这个学校任政委。”杨森、黄罗斌均表示同意组织分配，但黄罗斌心生疑惑：为什么找他俩谈话的现场没有刘志丹?为什么刚打完胜仗就这样大规模地调动主力部队的负责人?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意味着什么?他俩从高桥川动身刚到安塞，就被秘密逮捕了。

逮捕刘景范时，红十五军团部通知他到高桥川去开会。当时，刘景范正在病中，他接到通知当天从贺家湾陕甘边军委驻地一个人徒步 20 里走到王家坪区政府，已再也走不动了，第二天不得不返回贺家湾治病。到第三天，戴季英就派保卫局的手枪队到贺家湾，在病榻上把刘景范逮捕。

逮捕马文瑞等人后，在押解回瓦窑堡的途中遭遇敌机的袭击，押解人员四散跑开去防空，因马文瑞等被捆绑着连在一起，人人头上又罩着口袋，丢在路上无人管，任由敌机轰炸。

朱理治、聂洪钧等在前方大肆抓捕西北红军将士时，为了摆脱刘志丹、高岗等在红二十六军的影响，以防部队发生抵抗，便大力缩减红二十六军建制，削弱其兵力，竟把红二十六军原有的三个团缩减为一个团，并借口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不会使用机枪，下令将两个军的所有机枪收缴后全部交给红二十五军。直到东征时，红二十六军才恢复为原有的三个团。

蔡子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在多年以后回忆朱

理治和聂洪钧等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等能坚持执行正确的创建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路线时，还感慨地说：“‘左’倾兴盛时，不少人跟着跑，在当时，刘志丹不搞‘左’真不容易。”

前方正处在“肃反”的风头时，保安县民团的胡继云、高景山经刘志丹派人做策反工作带着70多人的民团武装队伍起义，从保安县来到下寺湾，找刘志丹、高岗投奔红军。白天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到晚上却以设宴招待为名，竟把民团起义中的大小10名头目全部逮捕起来关进监牢。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把陕甘边西区办事处主任张策从保安县骗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白天还是欢迎民团起义投诚大会的主持人，晚上却变成阶下囚，并与民团10个大小头目关在一起，弄得民团头目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共产党究竟是在耍什么花样?

更荒唐的是，在聂洪钧的指令下，红十五军团将这10个民团头目拉到驻地的一个沟里，挖几个土坑，竟全部集体活埋，从“肉体上消灭”。这一事件发生后，对红军分化、瓦解地方国民党的武装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使得一些可能被红军争取的地方民团武装宁愿死心与红军对抗到底，也不敢再相信红军“欢迎投降，优待俘虏”的政策，一时社会传说“现在的红军不红了”。

10月8日，戴季英到省委向朱理治紧急报告，说西北军委朱子休、高朗亭等五人要搞暴动。这一消息让朱理治大为震惊。朱理治感到事情已经闹大，局面完全无法收拾。他慌了神，竟将审讯中获得口供涉及的六七十人的名单 (包括朱子休及其妻子段秀珍和高朗亭等人在内)交给戴季英，下令统统抓捕起来。戴季英在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说：当时“朱理治还交代让我把朱子休枪毙了”。朱理治当场反驳戴季英是“说鬼话”，是否真有此话，只有朱理治和戴季英二人心里最清楚。

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要将抓捕的一大批所谓的“右派反革命”从红十五军团驻地和其他地方押送到省委所在地瓦窑堡，集中审讯。由于怕沿途群众发现和认出这些“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便在每个人的头上严严实实地罩上布袋，脚上钉上八斤脚镣，双手戴上三斤手铐，还用麻绳把双臂紧捆，装作是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列成长队，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

士监押下，一批又一批地送到瓦窑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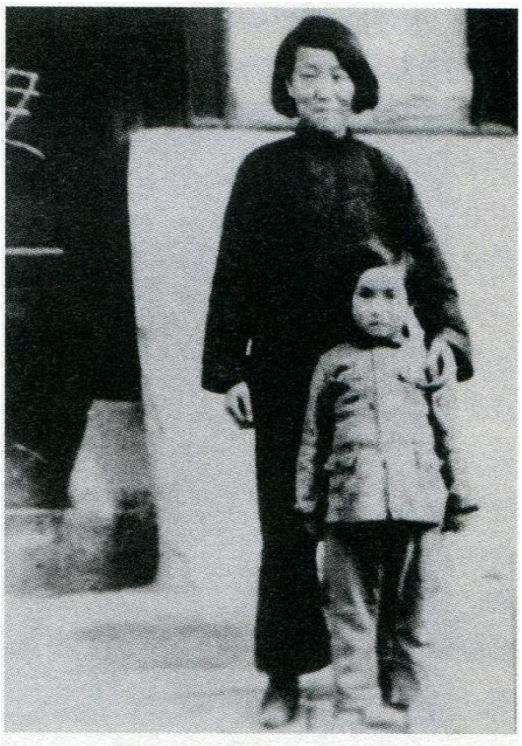
同桂荣很快打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人们传说从外边来的一个西北代表团搞起什么“肃反”，不仅自己的丈夫刘志丹和前线打仗的一些同志，还有苏区许多县以上的干部，在瓦窑堡被保卫局自己的人给抓起来，甚至不少人都被砍头、活埋了。

同桂荣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决定带着女儿刘力贞，亲自打探虚实。有不少人安慰同桂荣说：“你把心放宽，老刘是革命的，他们不会把他怎样!”

同桂荣先跑到省委询问，省委的人不说，又跑到保卫局，局里的人直摇头。她希望能找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看一眼丈夫，终归一场失望。同桂荣不禁自问：这西北代表团、保卫局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开刀下毒手呢?

一天，同桂荣抱着刘力贞走在大街上，正好有一长队头上罩着布袋的“囚犯”从旁走过。她仔细地观察着每个“囚犯”的身形步态，一眼就认出其中的一位正是刘志丹。

刘力贞欲喊一声父亲，同桂荣急忙用手捂住女儿的嘴。同桂荣知道，在这种不明情况的险恶环境里，一声呼唤都可能会给刘志丹惹出更多的麻烦。


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

刘志丹真有心理感应，他似乎感觉到家人就在眼前，连着咳嗽了几声。顿时，同桂荣的眼泪禁不住像泉水一样涌出，泪珠扑簌簌地落在刘力贞的脸上。

没几天，人们纷纷议论说保卫局的人在瓦窑堡城外挖开一个大土坑。有的人说要把瓦窑堡城里关起来的“囚犯”统统活埋到土坑里，有的人说为节省子弹打国民党军队，先要把“囚犯”们一律砍头后，再埋到土坑里。同桂荣带着刘力贞慌忙跑出城外，果真看到一个挖

好的大土坑。

一连几天，同桂荣带着刘力贞几乎每天要去看一次大土坑。到最后的一天，大土坑半夜被人填平了，谁也说不清大土坑里埋没埋“囚犯”、埋了多少“囚犯”。同桂荣不禁浑身发抖，双腿一软，坐到了地上，凝望着被填平的大土坑，好久不能站立起来。

同桂荣百思不得其解：丈夫刘志丹为了革命，走南闯北，出生人死，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他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她心里不住地在呼喊：“老天爷，快睁睁眼吧，不要叫自己人再整自己人了!”

不久，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被编人劳改队，限制了人身自由。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带着儿子虎子也被编人了劳改队。同桂荣坚定地站在刘志丹一边，曾做好了与丈夫一道去死的心理准备，她对女儿刘力贞说：“你父亲一死，就轮到咱娘俩了，国民党也没害得了咱，如今倒要冤死在保卫局的手里!”

在这次“肃反”中，后方究竟杀了多少人?按朱理治辩解：在后方没有杀过人。这种说法，在西北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及西北红军中，一直是没人相信的。

狱中劫难

西北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成了最大的一个忙人。朱理治、聂洪钧交给的任务太艰巨，要他不分昼夜、轮班突击审讯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为首的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人。戴季英急于邀功，不惜施加酷刑，给受审的同志双腿坐老虎凳，嘴里灌辣椒水，十指插竹签子，甚至烧红烙铁烫皮肉，抓紧时间不择手段搜罗“罪证”。

在瓦窑堡关押刘志丹、习仲勋等人之处

在审讯刘志丹时，戴季英等诬蔑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刘志丹已经知道自己要被捕，不但不逃跑，反而还要来瓦窑堡“自投罗网”是“欺骗党和群众的信任”；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连续解放陕北六座县城，“纯属是反革命的耍花招”。

据 1942 年 11 月程子华致中央的一份电报上说：“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处决张汉民后，张供词内谈他有不少学生在红二十六军，这使我、徐、郭、戴对红二十六军内混入反动分子，已有成见。”为此，戴季英等在拷打审问刘志丹时，为把张汉民说成是“反革命军官”，作为刘志丹等“通敌叛变”的证据，多次逼着刘志丹交代与张汉民是什么关系、有什么来往。当时在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中如吴岱峰等不少人都是张汉民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刘志丹为保护这些同志，说：“张汉民是个好同志，只有我一个人和张汉民有来往，别的同志根本不知道。”

张庆孚，江苏江阴县人，生于 1901 年。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第三十五军第二师、第十九军政治部主任。1928 年到上海以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作掩护担任中共上海组织的交通工作。1934 年受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遣，奉命前往陕北任陕北苏区中央代表。临行，时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王世英要他到陕北后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他一到陕北就以“左”倾错误思想指责刘志丹、高岗等是“右倾取消主义”。

后经耳闻目睹，他才认识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路线和做法都是正确的。由于张庆孚抵制西北代表团的错误行为，首先被抓起来。有关资料记载，张庆孚第一次见到朱理治，就直斥朱理治是“叛徒”。张庆孚的说法不是无中生有，他认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既然派自己来陕北根据地当中央代表，怎么在不通知自己的情况下再派出一个中央代表来呢?尤其是他多年在上海搞交通工作，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知道上海党的组织曾遭国民党特务的几次破坏，党内包括党的负责人出现过不少叛徒，对朱理治的身份怎能不提出疑问?朱理治却抓住张庆孚来时的交通员下落不明和所带来用药水写的密信显不出字来为由，先将张庆孚这个中央代表搁置起来。聂洪钧到陕北后，说自己才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中央代表，并说张庆孚不是中央代表，仅是当时派来的一个做文化工作的。对聂洪钧的说法，张庆孚更相信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出了问题，自己分明是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的中央代表，聂洪钧怎能胡捏乱编？他怀疑聂洪钧也是叛徒。所以，这也是朱理治、聂洪钧首先关押张庆孚的主要原因。有的资料中把王世英派张庆孚到陕北苏区当中央代表的这一重大行为说成是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对张庆孚一种“敷衍”之语，此说法不妥。张庆孚被关起后，戴季英骂他是“叛徒”，是刘志丹、高岗的“走卒”，在监狱中受尽酷刑拷打，终被整得精神失常。张庆孚回忆说，他在狱中除了戴脚镣，还外加一副手铐，因为和血肉凝结在一起，在出狱砸镣铐时，居然用了三四个小时的工夫。

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把刘志丹、高岗等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负责人关押在瓦窑堡监狱，日夜提心吊胆。他们担心这些人会越狱逃走，也害怕刘志丹、高岗所领导的西北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发现后劫狱。为防备事变发生，戴季英断然实施了新的防范措施。他立即把监狱中凡属陕甘边、陕北籍贯的看守人员、做饭打杂的人全部撤出监狱，秘密监控起来，并从红二十五军内调来南方籍的红军人员，接管了监狱，并连审讯人员也全部换成红二十五军指战员。在戴季英的要求下，新配的监狱看守人员对被关押的同志肆意虐待，只要听见牢房里稍有响动，持枪进来，就是一顿毒打。

高岗愤怒地质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又不是国民党蒋介石，

你们有本事去打蒋介石……”

看守人员冷酷地说：“你们就是蒋介石派进来的，打你们和打蒋介石一样。”

在每个牢房的地上只铺垫些谷草，没有一块被褥可抵御陕北早到的寒夜。窗上密糊着农家做的麻纸，别说晒不到一丝阳光，就连寒夜天空的星斗微光也不能看到。每天夜里不准走出牢房去撒尿，同志们只能夜里把吃饭的碗当做尿盆使用，白天又当做饭碗吃饭。好些同志因脚上钉着的脚镣太重，足踝磨得血肉模糊，请求弄块破布裹一下，看守人员都不予理睬。

在监狱后院，保卫局挖下一个大土坑。这个大土坑长三丈、宽八尺、深两丈，是把“右派反革命”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归宿之地。在监狱中被酷刑整死的同志，其尸体都被丢进土坑。

习仲勋曾回忆被关押在瓦窑堡监狱的那些日日夜夜说：“被押到瓦窑堡后，和刘志丹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了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开始说我是‘取消主义’，后来说成了‘右派’，并说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的书记’。上级亲自审讯我的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他们叫我自首。我说，这有什么自首的?我说我是革命的，你们说我不是革命的，我也豁出去了，说我什么也不要紧，就是你们不要用笨刀子杀我。”

在审讯刘景范时，朱理治指示戴季英：“拿下刘景范就是一大功。”戴季英就昼夜不停地拷打刘景范，直把他打得口吐鲜血。习仲勋看见刘景范身体不行了，要求送他到外边救治，戴季英不予理睬。

在朱理治、戴季英审讯张秀山时，张秀山不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也不承认红二十六军中有“右派反革命”。他们就把张秀山吊起来，念着从别人嘴里逼出的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为了摧垮张秀山的意志，动用的酷刑更厉害，给鼻孔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张秀山被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哭诉道：“你们把我杀死算了。我死了不要紧，二十六军创建

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二十六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不要全都冤死了。”

张秀山在酷刑之下的一番话，使在场参与审讯的全体人员都大惑不解：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都快要死了，而宁愿自己去死，还要替别人和红二十六军求情?同样也震动了朱理治。朱理治走出审讯室后对郭洪涛说：“肯定弄错了，这里恐怕有冤情吧?”朱理治要郭洪涛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的反革命证据，如前方也无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他还表示今后“宁肯被人骂，也不做亏心事”，准备开始纠正错误，对戴季英试图加以控制；并在程子华到前方之后，又调崔田民去红二十六军担任政委，以控制西北红军的稳定。

然而，事态发展完全不在朱理治的掌握之中，“肃反”局面已经失去控制。朱理治事后说：“那次错误肃反，我和刘志丹本无冤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他在《向党中央的声明》中这样写道：“(我)领导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在‘肃反’中误将刘志丹、高岗和陕北一批有功绩的干部逮捕起来，造成对革命极为痛心的损失。……最后证明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完全是冤枉的。”

张　策

张策在《我的历史回顾》一文中对监狱的情景回忆说：“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戴着脚镣，并用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在这所人间地狱里，哪里还有人道可言，只有等死而已。谁也没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会那样快地赶到陕甘地区。毛主席一到吴起镇，就发现了‘肃反’是一个严重错案，立即发出停止‘肃反’、等待处理的命令。这才给我们每人发了铺盖，虐待行为也告停止。”

这一期间，朱理治、戴季英在后方严刑逼供、指名问供中被供出的同志，一旦列入黑名单，就忙坏了保卫局的手枪队，马不停蹄到前方和各地去抓人，马队日夜穿梭，将抓到的人送到瓦窑堡。

在那阴暗可怕的日子里，不但后方有朱理治、戴季英等对已被逮捕的人施加酷刑，采取指供诱供审讯方式，而且前方的聂洪钧等也同样把正在前线指挥打仗的指战员甚至身负重伤的伤病员统统抓起，严刑拷打，指供诱供，背靠背地深挖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右派反革命”的所涉人员，还闹出了一桩使朱理治、戴季英哭笑不得的事。

聂洪钧在前方抓了几个红军指战员，要他们交代除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已被捕的人外，还有哪些人是“右派反革命”。酷刑拷打之下，这几个人实在不懂得什么是“右派反革命”，认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与朱理治、戴季英都是红军部队的领导和共产党的人，如果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是“右派反革命”，朱理治、戴季英也一定是“右派反革命”，于是同时供出朱理治、戴季英都是“右派反革命”。这一供词事关重大，聂洪钧对他们的交代材料不敢隐瞒，急报朱理治、戴季英。朱理治、戴季英一看报告，气急败坏地通知聂洪钧，立即将这几个“胡说八道”的红军指战员活埋掉，并将所供材料全部烧毁。

据许多资料记载，聂洪钧在前方主持“肃反”中，被集体枪杀、砍头、活埋的无辜的西北红军指战员达 200 多人；朱理治在后方主持“肃反”中，错抓错捕 130 多人。而在各地方党政军的“肃反”中，究竟多少人被错杀、错捕，当时特殊情况下很少有人知道，又没有资料记载，也许只能永远没入历史之中了。

有关资料证实，西北代表团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一直持续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前方逮捕西北红军指战员的行动仍未完全停止。那时毛泽东、彭德怀等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红十五军团还在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中逮捕了不少人。在前方把持红十五军团的一些领导人认为红二十七军最高指挥官中的“右派反革命”没有肃清，提出要逮捕张达志。张达志不得不写信给朱理治求救。后来这封信落到毛泽东的手里才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三边事件

由于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错误肃反的执行者滥杀无辜，西北红军和整个西北根据地一时被赤色恐怖笼罩，造成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使本来形势大好的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危机。为此，有不少红军战士离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干部脱党回家，有不少群众远走他乡，如红二十六军时任团长的刘约三为躲开“肃反”的迫害，以“筹粮”为借口远避他乡。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游击队反水，到国民党那边去寻求保护，如黄万英、杨占鳌带领的西靖边县红七支队和张克俭等带领的赤安县四区游击队所引发的“三边事件”“赤安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其中“三边事件”是当时对根据地危害最大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当时，西北代表团极力推行错误肃反政策，很快扩大和渗透到根据地的各个地方。刘景范在回忆陕甘边苏区的“肃反”时这样说：当时，中共陕甘边特委、政府的临时负责人和王铁锁因受到西北代表团的重用，极力效仿朱理治、聂洪钧等的错误肃反政策，认为在农村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划定得越多，农村革命越彻底，大多数贫雇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就越高涨，即把可团结的中农成分的农民甚至是贫下中农也统统重新划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一下子使地主和富农成分的农民在农村占到百分之十几，不少农村达到百分之二十多。只要划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的，就要把全家人扫地出门，一家一家的老小编入劳改队，说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把他们作为敌人来对待。在各地方游击队里也普遍展开错误肃反，甚至有些地方权力操持在坏人手里，胡作非为，到处滥杀无辜，造成地方游击队里人心极度恐慌。

西北代表团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等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即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苏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起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一带采取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配土地的群众运动。习仲勋在 1942 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到当时出现的问题时说：“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去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分人家的东西，闹得群众反了水。……

李景林更是这样，谁说张三是富农，他便说斗争去，谁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是斗争去。……在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根据地造成的混乱和严重危害，与刘景范一道奋起批评和抵制。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配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了惠碧海的职务。

中共陕甘边特委、政府的临时负责人在地方上推行西北代表团带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肃反政策，使一大批基层党政军干部和革命群众死于非命。

1935 年 11 月 16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政府责令由新城县(西靖边)政府派人给红七支队队长黄万英送去密信，要黄万英将“右派反革命”宗文耀、金铃等秘密逮捕处决。新城县政府立即派许占华把密信送到红七支队。许占华不知信中内情，到红七支队后，将信误送到宗文耀、金铃二人之手。

这时红七支队已是一支较有规模的地方红军队伍，队长是黄万英，指导员是杨占鳌，下辖三个警卫连、一个骑兵连，还有一个保卫大队，有 200 余人，宗文耀是警卫连一连连长，金铃是一中队队长。当宗、金二人看到密信后，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伏诛，要么反水叛变。

11 月 26 日，在宗文耀、金铃二人的密谋下红七支队召开紧急会议。次日，宗、金带着叛军，先下手将毫无察觉的新城县政府副主席王国庆、肃反委员郝文明和李白锁及第七区政府主席白登贵、宣传委员崔有发、劳动委员马占彪等六人抓捕，送交柠条梁张雨亭民团，其中五人惨遭杀害。

11 月 28 日，金铃又向黄万英提供假报告，采用“调虎离山计”，开枪打死红七支队队长黄万英和指导员杨占鳌。宗文耀听到枪声后，立即集合红七支队，胁迫战士叛变，并将抗拒不从的骑兵连连长白志清杀害。

11 月 29 日，宗文耀、金铃二人带着叛军，直奔新城县政府驻地沙洼沟附近的滴哨台。当时，中共中央刚派任三边特委书记的谢唯俊和其他负责人正在那里。由于新城县政府没有任何防范，遭到叛军的偷袭，致使谢唯俊和县政府主席殷云山等九人被叛军杀害，县政府的全部物资被抢劫，县政府关押的地主恶霸 30 多人被全部放走。

宗、金二人为隐瞒其反叛真相，还主动给陕甘边政府写了假报告，诬

称黄万英等叛变。之后，叛军又到各区施用枪杀、威逼、煽动等手段，解散了各区、乡政府，西靖边苏维埃政权组织全部被破坏。林伯渠获悉随中央红军长征刚到西北根据地即被派往三边工作的谢唯俊被叛军杀害的消息，悲痛赋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1936 年 1 月 19 日，杨琪、刘景范、崔宗山等刚从瓦窑堡的冤狱中获释，西北办事处任命杨琪为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长兼三边独立营营长，与中共陕北省委派到三边加强地方党政工作的特委军事处长刘景范、崔宗山等一同从瓦窑堡出发前往三边。当时，由于受宗文耀、金铃假报告的蒙蔽，对宗、金挟持红七支队叛变事发近两个月的情况，中共陕甘边特委和政府失察，毫无所知。

杨琪、刘景范、崔宗山等人出发时，向瓦窑堡汇报工作的三边特委副书记慕生桂带着特委秘书李育英，也一同随行返回三边。一行人一到三边特委机关所在地李家梁，因叛军刚进行过一场洗劫，只见全村一片狼藉。此时才知红七支队叛变时日已久。

杨琪、刘景范、崔宗山、慕生桂、李育英等因对周围复杂的情况不了解，不敢久留，立即离开李家梁绕道南下，朝刘景范创建的赤安(保安)县委驻地转移。当晚，刚住在李家嘴，就被宗、金的叛军包围。在突围中，慕生桂因视力不好，天黑路滑，掉下悬崖牺牲。杨琪、李育英乘夜脱险，急速返回瓦窑堡向省委汇报情况。刘景范、崔宗山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辗转找到中共赤安县委。

宗文耀、金铃二人叛变后，三边的地主豪绅、民团与叛军勾结一起，到处煽动群众说：刘志丹被杀了，高岗被杀了，习仲勋被杀了，杀人的是假共产党，杀人的是假红军，反吧，反吧，不反，陕北的百姓都要被杀完

的。在这种煽动之下，三边的几支游击队和地方群众被搅成一河浊水，究竟是哪些游击队叛变了、哪些群众反水了，真假难以分辨。宗、金聚集的叛军，一时多达 1000 余人，为害三边长达半年之久。

1 月 28 日，刘景范在赤安县写信给周恩来，汇报了红七支队叛变和中共三边特委被破坏的情况。信中报告：三边的靖边、赤安、定边三县，有 19 个区政府、35 个乡政府遭叛军破坏，地方党政军和群众干部被害 53 人，中共三边组织陷入瘫痪。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迅速指示：“……要马上找到独立营，把散了的游击队集合起来，清剿叛匪。”

刘景范在中共赤安县委的帮助下，找到三边红军独立营，并集合了已散的几支游击队，在甘洛游击队、保洛游击队和赤安游击队的配合下，经永宁山、三台山、保安城、哨前湾、安边等几次平叛战斗，击溃叛军。5 月底，宗、金被迫带着残败叛军潜逃到内蒙古。

这是发生在西北根据地的一段惨痛的真实历史。当时，在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及中共陕北、陕甘边党内一些积极追随者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开展错误肃反的狂飙中，不能说红二十五军某些领导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西北根据地这段灾难性的历史，许多当年负有责任的当事者总是避重就轻地推诿自己的过错，中共中央曾多次对这段历史作过结论，但他们还是一直有不同的说辞。历史终归是历史，自有后人为这段血腥的历史作出公正评说。

由于这场错误肃反的浩劫，陕北、陕甘边苏区广大群众怀疑朱理治、聂洪钧不是中共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的成员，而认为他们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派人陕北苏区的特务分子，并质疑红二十五军不是一支共产党的红军部队，群众说：“二十五军是白军，假装成红军来消灭西北红军。”

这场错误肃反所制造的赤色恐怖，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过去了 70 多个年头，但当年亲身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们，仍难以抹去心灵上的阴影，也难以抚平心灵中的创伤。当时，刘志丹面对着随时可能被枪毙、活埋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他对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是遮不住太阳。”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当年西北代表团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主持开展错误肃反，虽然他们无力纠正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路线错误，但有可能把这种错误路线引发的恶果降低到最小。他们只是一个执行者，却对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造成严重危害。

有资料记载，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关押在瓦窑堡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许多指战员和地方游击队及赤卫军内人心惶惶，人们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肃反”不理解，谁都难料自己的明天。他们悲观、彷徨，他们憎恨、愤怒，他们在怒不可遏之时，曾准备劫狱，救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甚至秘密串联，准备在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最后因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赶到陕北，才避免了一场劫狱行动甚至是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后来杨尚昆见到红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对他说：“如果中央不来，(西北红军)就要同红二十五军他们打起来了。”

有人这样说：如果当时中央红军不是适时赶到陕北，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及时制止这场错误的肃反，那么后来成为“落脚点”“出发点”的西北根据地很可能会毁于一旦。

第十部 ★

ZHOGNGUO
GEMINGDE
DABENYING

第七十九章

长征的落脚点

战略大转移

1934 年 10 月，由于党内“左”倾错误推向高峰，导致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在蒋介石第五次的“围剿”中陷落，中共中央率领各路红军部队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根据地，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为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首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从 2 月开始，就大张旗鼓地讨伐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说“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退却逃跑”“游击主义”“富农路线”，提出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锤将他粉碎”，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又批张鼎丞时，大家才知道罗明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地方红军和赤卫队，曾得到时任中共中央苏区主席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尤其是罗明说过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的一句话，惹下了祸患。博古等因要打击毛泽东，碍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影响和威望，不便直接批判“毛泽东路线”，抓了一个罗明来当替罪羊。

博古等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排斥毛泽东，说他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把四人的领导职务全部撤销，并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谭震林、张鼎丞、何叔衡、萧劲光等的领导职务撤销，还将萧劲光押上军事法庭判刑五年。

最终，斗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撤销了毛泽东中央苏区主席和红军总

毛泽东

政委的职务。用李维汉在《回忆和研究》中的话说，“‘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要使毛泽东的威信扫地”。

1933 年 9 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 100 万兵力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 50 万大军用于围攻江西中共中央根据地。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放弃了前几次江西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先是“全线出击”，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向国民党军队巩固的阵地进攻，继而又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实行“处处设防”“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使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1 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与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提出同红军合作。中共“左”倾领导人却把他们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又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争取到充足的时间、打败十九路军后，集中兵力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会议上，党的“左”倾领导人仍然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还荒谬地宣称什么现在的中国革命已进入“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

4 月中旬，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红军经 18 天血战，广昌失守。

10 月，苏区红军经近一年的苦战，虽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战略指导上的根本错误，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守，

粉碎国民党重兵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

博古、李德等因预先没有任何退却的思想准备，惊慌失措。在被迫决定放弃中央根据地时，先开始实行“大搬家”式的撤退，继而采取了流寇式的逃跑主义，使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组成的中央红军 8 万余人，在仓促中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出发时，博古、李德等为排挤异己，曾决定将毛泽东留下来坚持地方斗争，多亏王稼祥、周恩来等据理力争，毛泽东才参加到红军长征的行列之中。在长征的艰难险途中，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博古、朱德、邓发、凯丰、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及李德等。在这次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撤换了博古在党内的领导职务，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总责，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

行动。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时期开始走向成熟。

长征路上，在与分裂中央和红军的张国焘围绕“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前堵后截的层层封锁线，于 1935 年秋进入甘肃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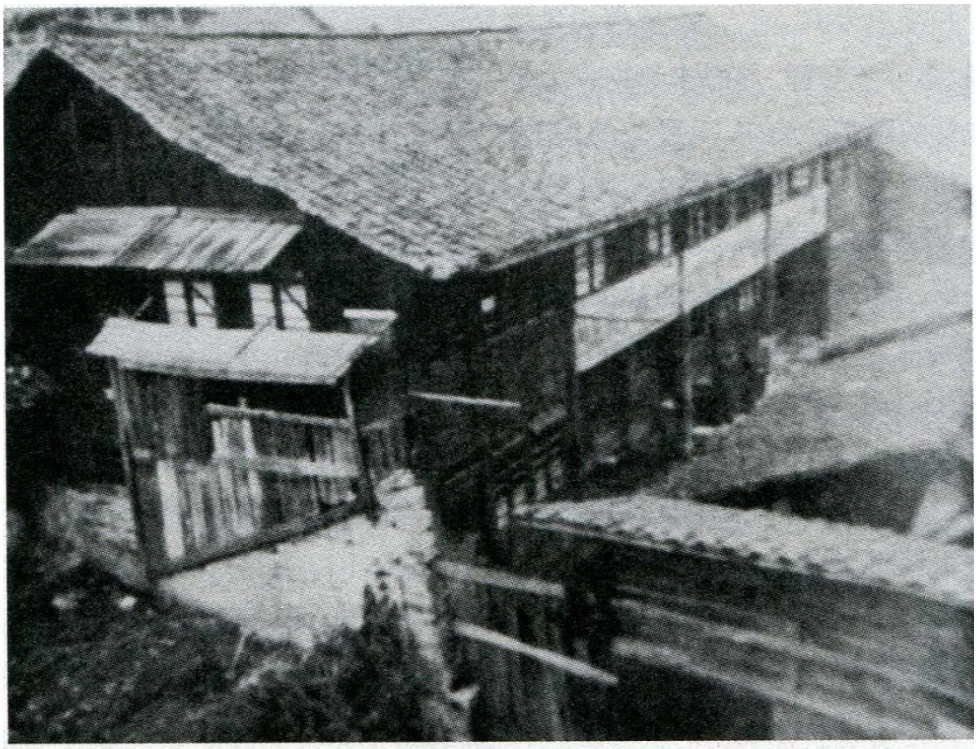
到达甘肃境内时，中央红军由于长期行军打仗，部队损失严重，由原来长征出发时的 86000 人，仅剩不足 8000 人，直到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总计已不足 30000 人。这时，部队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战士体质虚弱不堪，常有同志行军时倒在道旁死去。

“这里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在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在沿途经过的七个地区寻找一个立足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均因国民党军队围追紧迫且地方群众基础差等原

因，未能如愿。

第一次根据地选择在湘西北。开始长征时，中央红军避开与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计划到达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调集粤、湘、桂和中央军近 40 万大军，在通往湘西北之途设下四道封锁线。红军虽突破了四道封锁线，但在湘江一战，部队损失隆重，全军伤亡过半，如红军继续北上，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红军在黎平被迫改变了行军路线。



黎平会议旧址

第二次根据地选择在川黔边。1934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向湘西北前进的原定计划，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红军长驱西进，直入贵州腹地，强渡乌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于 1935 年 1 月解放遵义城。此后，蒋介石纠集各路军阀对红军进行合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大军合围之前，北渡长江。

第三次根据地选择在川西北。1935 年 1 月 20 日，红军司令部发布《渡

江的作战计划》，一渡赤水后，红军进入川南，准备在长江上游的泸州和宜宾北渡，但由于川、黔、滇军及中央军紧紧尾追，且川军又在长江北岸设置重兵严密封锁，如渡江不能成功，红军将在长江边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当机立断，暂缓渡江，集结部队于滇东北扎西地区待命。

第四次根据地选择在云贵川。1935 年 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宣布暂缓渡江向北发展的计划，提出“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的口号。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重人贵州，奇夺娄山关，再克遵义。3 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国民党军队尾追北上时，红军又掉头向东，一夜间悄然四渡赤水，由川南折回贵州。3 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占领息峰，佯攻贵阳，乘蒋介石派兵增援贵阳之机，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疾进，于 5 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把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甩开。

第五次根据地选择在川陕甘。1935 年 6 月中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会师，总兵力达 10 万之众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占取甘肃南部，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四川松潘附近的毛尔盖。但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卷起苏维埃的旗帜”，向川康边界退却，寻找借口拖延时间，按兵不动，红军失去向北发展的最佳机会，使川军杨森部与胡宗南部对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天险腊子口

第六次根据地选择在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地区。1935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制定了占领甘南洮河、夏河，建立以岷山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计划。8 月底，毛

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率右路军跨过千里草原，到达巴西、班佑一带，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又按兵不动，错误地坚持南下路线，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分裂红军。毛泽东力避红军打红军的危局，在巴西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中央红军北上。红军到达甘南时，已无力控制甘南，建立陕甘根据地无法实现。

第七次根据地选择在苏联边境。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原因，中共中央打破了原定的一切军事计划。1935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当时，部队既无行动的明确方向，又无一个落脚点，已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出《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这次会议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并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大雪山。

哈达铺镇红军纪念馆

翻过岷山后，毛泽东对革命局势发展曾做过最坏的思想准备，他找到“四老”(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

请予考虑。

9月17日，中央红军攻下腊子口，毛泽东派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到宕昌县的哈达铺镇执行侦察任务。次日，梁、曹二人带着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走进哈达铺镇，受到镇上的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和保安队长的迎接。这时，正好国民党部队驻岷山一个师的上校副官带着几骡驮的东西，刚从兰州回来路过镇上，听说中央军来人，也急忙前来拜会。梁兴初带领侦察连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哈达铺镇。

哈达铺镇红军司令部旧址

哈达铺是一个小镇子，有一条一里多长的小街道，是汉藏交界处的一个以汉、回居民为主的集镇。来哈达铺镇前，毛泽东曾叮咛梁兴初：要搞些国民党近期的报纸带回来。梁兴初先到邮局翻箱倒柜地查找，但翻来翻去只找到几张发黄的旧报纸。那个被俘国民党上校副官见状，开口对梁兴初说："长官，我从省城回来，带了一捆报纸，都在骡驮子里，不知贵军有何用处?"

梁兴初急忙打开骡驮子，除翻出一些药材、衣服、布匹外，里边真还有一大捆裹着旧年画的报纸。这些报纸里有的是天津《大公报》，有的是山西《晋阳日报》等，但是都是8月份的。梁兴初、曹德连打开所有的报纸，一张张细细地翻阅。

突然，《晋阳日报》上有一段报道映入眼帘：

> 陕北刘志丹、高岗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70万，拥有正规军队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20余万……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

梁兴初和曹德连如获至宝，为了让中央领导早点看到这个消息，连夜将报纸和那个国民党上校副官送到中央红军军团指挥部。聂荣臻看了报纸后高兴地说：“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聂荣臻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报纸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后喜出望外，连忙找来周恩来、张闻天，激动地用大手朝报纸上一拍，说：“陕北，这里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找来贾拓夫，询问陕北详情。贾拓夫是 1933 年 7 月陕西省委遭破坏后到上海给中共中央汇报情况，旋即随中央机关到江西。贾拓夫将陕西省委被破坏之前的陕北红军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别说陕北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

到达吴起镇

1935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宕昌县的哈达铺镇，在镇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去了，是国民党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振作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在通渭县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后正式确定：中央红军开到陕北去，把刘志丹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作为中央红军的立足点和中国共产党今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了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 1929 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

中央红军自从离开失陷的江西中央根据地，一路长征北上，早已与各

地方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没想到在这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还仅存党领导下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当毛泽东向全军宣布“陕北有咱自己的人，那里就是咱们的家”的消息后，红军将士无不欢欣鼓舞。

在这次会上，把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下编三个纵队，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彭雪枫为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叶剑英为第三纵队(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委。毛泽东动员大家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并告诉大家，从这里到陕北根据地只有不足千里的路程了。

9 月底，中央红军改编后的陕甘支队突破国民党军队在西兰公路上布设的封锁线，向东挺进。红军奔袭攻占了近万人口的通渭县城，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 300 余人后，在这里稍作休整。

10 月 15 日，陕甘支队翻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峰——六盘山，进入甘肃的环县后，部队分成三路纵队向陕北挺进。当毛泽东登上六盘山的峰巅，眺望着改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三路纵队即将进入西北根据地时，迎着高原冽冽寒风，顿感豪情满怀，随兴吟成千古不朽的诗句：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蒋介石察觉到中央红军向西北地区与西北红军靠拢的行动，急命第三十一军第八师紧追拦截，并出动飞机轰炸堵截。另外，调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毛炳文的骑兵尾追，行军掉队的红军战士都被国民党的追兵杀死。

10 月 17 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刚进入陕北地区的定边县境内，国民党第三十一军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尾追到张塬畔的大梁峁，与第一纵队交火，并有国民党飞机空中助战。第一纵队抢占有利地形，双方激战两小时许，因敌我力量悬殊，第一纵队被迫且打且退，傍晚撤至张塬畔，夜宿牛圈圪坨。第二、三纵队进入定边县境内，虽未与国民党的追兵遭遇，却遭到国民党的飞机空中轰炸，不少红军战士在贺家渠一带被炸死，并有几名红军战士因疲乏不堪，倒地而亡。

吴起镇

10 月 18 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陕甘支队三个纵队到达陕北保安县的吴起镇。

吴起镇是个小镇，只住了十几户人家。那天下午，镇上的老百姓突然见沿头道川的河谷来了一支军队，以为又是国民党军队，全镇的人几乎都跑到附近山上“藏反”，只留下走不动的老弱病残在家里。后来得知是南方上来的“朱毛”中央红军，“藏反”的群众才放心地返回镇上。当中央红军走进吴起镇，红军指战员们第一眼看到一孔窑洞门前挂着一块“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一种“回家”的辛酸和喜悦涌上心头，许多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有不少战士禁不住放声大哭。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历时 367 天，历经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 11 省，行程 25000 里，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了“家”，找到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此后，这里又成为八路军抗日斗争的出发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毛泽东在论述长征时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红军胜利、国民党失败的结果而告终。

自此，毛泽东在陕北度过了 13 年的难忘岁月，与热血浇灌的红色土地上的陕北人民结成血肉之情，共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辉煌，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

第八十章

毛泽东命令刀下留人

危急时刻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后，很快与地方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吴起工农民主政府和保安游击队及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的干部张明科、马福记、刘景汉等一听说中央红军来了，立即组织群众杀猪宰羊、筹物运粮、热情欢迎。

中央红军刚到西北根据地，战士们人人衣衫褴褛，个个面容黄瘦，脚上还穿的是草鞋，甚至有不少战士还赤着脚，但他们的纪律十分严明，每到一处，不损坏老百姓的一株庄稼，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当地群众最难忘的是：中央红军刚到吴起镇，正是老百姓挖洋芋的时候，一些战士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宁可到挖过洋芋的地里找丢弃的洋芋嚼着充饥，也没有人到群众家里要东西吃。老百姓把做好的小米饭端到他们面前，虽然相互问语言不通，但每个战士都摆手谢绝。有的战士实在饿得不行，在老百姓家吃上一碗，也非留下钱不可，即使未带钱，也要从身上掏出其他东西给予补偿。当地群众兴奋地奔走相告：“真正是红军队伍过来了!”

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毛泽东才从地方干部嘴里了解到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创建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干部，这时正被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驻北方代表派驻陕北的一个西北代表团以“右派反革命”罪名关

入共产党自己的监狱，许多人惨遭砍头、活埋，西北根据地处在严峻

的危急关头。

1935 年 10 月 20 日，保安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正在杨青川和中央红军开联欢会，秘密联络员刘景汉派人送来鸡毛信，说毛泽东在吴起镇，要他火速赶去。张明科快马加鞭，立即动身赶到吴起镇，刘景汉早已在街上等着他。刘景汉领着张明科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用湖南方言问：“你是哪里人？”

龚逢春

张明科说：“我是本地人，是刘志丹家中的长工，参加革命是刘志丹、刘景范叫来的。”

毛泽东又问：“你们游击队有多少人?多少枪？”

张明科说：“游击队不到 100 人，有五六十支枪，其余是大刀。”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游击队和政府关系好吗？群众纪律好吗？”

张明科回答：“我们和政府关系很好，和群众关系也很好。我们吃粮、打仗依靠的是群众帮助。”

毛泽东听后，说：“好!和政府关系要搞好，群众关系搞好了，群众就拥护，红军才能存在，苏区才能扩大，我们红军和群众是鱼水关系，你懂吗？”

张明科连忙说：“我懂得。我们游击队的伤员、病号都在农民家里养着，病好了，农民就送回部队来了，农民可好咧。”

毛泽东问道：“刘志丹同志现在哪里活动，你知道吗?”

张明科一听问到刘志丹，顿时浑身紧张起来，半天支支吾吾不敢说话。经毛泽东再三反复询问，张明科才低声说：“他被关起来了。”

毛泽东立即站了起来，吃惊地追问道：“为什么？什么时间关的？”

坐在毛泽东旁边留着胡子的周恩来也急切地说：“刘志丹现关在什么地方？”

张明科战战兢兢地说：“关在瓦窑堡，在那里听说已经关起好几百人。”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紧接着问：“这些情况谁最清楚?”

张明科告诉毛泽东说：“只有骑兵团(原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详细情况。”

毛泽东听后十分震惊，为详细了解情况，派出张明科骑快马，立即去找龚逢春。张明科找到被群众秘密掩护而幸免被捕的龚逢春，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通过和龚逢春的谈话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对西北代表团制造的这场错误肃反给西北根据地带来可怕的后果，心里忧愤不已。

中央红军历经磨难，刚踏上陕北这片红色的土地，就面临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开展错误肃反所造成的如此严峻的局面，毛泽东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中共中央接管西北保卫局

毛泽东在总结江西苏区根据地陷落和红军失败以及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后，万分担心西北根据地的局势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急情况。

1935 年 10 月 21 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师、第三十六师的四个骑兵团尾追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向中央红军发起进攻。毛泽东命令一、二、三纵队，坚决将尾追的国民党军队打退，不能把这些国民党军队带进苏区。在吴起镇，中央红军先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击败国民党追兵两个骑兵团。紧接着，又在杨子城以西的齐桥、李新庄问，分别打垮国民党追兵另两个骑兵团。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击败进入陕北苏区的国民党四个骑兵团的第一次战斗，史称“割尾巴”战斗。

10 月 22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行动的方针报告，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红军发展的主要区域。两个会议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一是目前红军的战略方针；第二是军事行动方向；第三是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和人事安排，确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和后方军事

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李维汉为组织部长，吴亮平暂负责宣传工作，王稼祥任红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负责工会，凯丰任少共书记，王首道负责保卫工作，同意李德回国的请求，但为其安全有保障，安排他在未出发前到红军学校工作；第四是立即遏制陕北错误肃反，确定速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三人从吴起镇出发赶赴瓦窑堡以制止错误肃反的继续蔓延。

这次会议的当天，中共中央即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 (贾拓夫时任总破坏部部长)三人带一部电台赴瓦窑堡，传达毛泽东“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的命令。

临行前，毛泽东郑重地对王首道说：“杀人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同时，要求王首道三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瓦窑堡，代表中共中央接管西北保卫局，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西北根据地的危情进一步恶化。

这时，下寺湾红十五军团的负责人获悉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程子华、郭洪涛立即从下寺湾出发，朝吴起镇方向赶来迎接。当程子华、郭洪涛行至稻草湾时，正好遇到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带着一连队伍，欲赶往瓦窑堡方向营救刘志丹、高岗等。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紧急命令，并将带着的一部电台交给红十五军团。程子华、郭洪涛利用这一电台，在下寺湾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红十五军团劳山战役的情况、红十五军团的情况以及西北红军、苏区的情况。

至此，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和西北根据地党内的一些追随者在苏区掀起的错误肃反黑烟才被吹散，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发展的转折点和新起点。张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说：“中央来了挽救了陕北，陕北也挽救了中央。从西北根据地而后所产生的作用看，也是挽救了中国革命。”

当错误肃反正达高潮之时，毛泽东力挽狂澜，及时地挽救了西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从牢房里有幸获得余生的习仲勋，多年以后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

许多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同志，每当回忆起这段腥风血雨的阴暗日子，都记忆犹新地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就要被整死的。”

下寺湾会议

193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吴起镇出发，由龚逢春、张明科等挑选雷海清带一支游击分队为向导，向甘泉县下寺湾方向挺进。离开吴起时，毛泽东非常感谢到西北根据地后第一个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陕北错误肃反危情的地方负责人张明科。

毛泽东派身边一个姓张的参谋把张明科叫到住处，从桌子上拿起一把德国造的手枪和用布包着的 30 发子弹，向张明科说：“我们要走了，这支手枪留给你作个纪念。”

张明科双手接过手枪和子弹，激动得流下眼泪，不知该如何感谢，只是敬礼。

毛泽东最后说：“你放心吧，中央已派人带电台去瓦窑堡了……”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保安县，于 11 月 2 日到达甘泉下寺湾。下寺湾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红十五军团的军团部也临时设在这里，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并在象鼻子湾将中央红军(时称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会师后的红军部队为 11000 余人。

毛泽东到达下寺湾时，徐海东正在前方指挥红十五军团部署攻打张村驿。徐海东突然接到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来的急件，听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下寺湾，立即骑快马从张村驿出发，策马加鞭，仅用三个小时行程 130 里，在当天下午就赶到了下寺湾军团部。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询问了前方战事情况，一起吃了晚饭。

徐海东返回前线时，毛泽东送他一部电台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

徐海东从来没见过电台，直言：“我不会用。”

毛泽东笑着说：“不用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络，你向电台工作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

11 月 3 日，毛泽东等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聂洪钧、程子华等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组建、劳山战役及“肃反”等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口头汇报。

张闻天

在会上，程子华汇报陕北“肃反”时说：不能说“肃反”全错了，“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郭洪涛说：“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后方已停止了审讯、捕人，前方也停止了捕人，但被捕的人尚未放出。我是反对逮捕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领导的。”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即批评了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严正指出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是错误的。他愤慨地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由张闻天兼书记；设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为主席，下设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部长邓发)、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夫)、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司法部(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部长邓振询)；设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统一领导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和陕甘晋省委领导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这次会议根据西北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态势，将西北地区的行政区域作了调整划分，以陕北的甘泉下寺湾为界，以南设为陕甘省，以北设为陕北省，并设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均分属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玉生，后李生华、朱开铨接任)，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辖甘洛、肤施、红泉、宜川、韩城、澄城、鄜县、中宜、华池等县委。中共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后马明方接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隶属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辖葭县、吴堡、米西、绥德、清涧、靖边、新城、安定、赤源、横山、秀延、保安、延川、延水、延长、安塞等县委。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三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为贾拓夫、李维汉、罗梓铭、张德生)，下辖安边、定边、靖边三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神府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下辖神木、府谷两县委。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后于 1936 年 1 月始建立关中苏维埃政府，由秦善秀任主席，习仲勋、张邦英任副主席，并成立关中特区司令部，江华任司令，贾拓夫任政委)，下辖新正(今甘肃正宁县)、新宁、淳耀、赤水、永红五个县委。

11 月 4 日，朱理治赶到下寺湾。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结束。朱理治向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李维汉汇报了工作。朱理治在汇报中说："这次'肃反'有错误，刘志丹和高岗等人不是反革命。"但他认为造成陕北"肃反"在"两方面都有错误，我们搞刘、高是错误；刘、高右倾并受右派利用也是错误"。而且他把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推到戴季英身上，说戴季英"肃反"盲目，作风蛮横，不宜做保卫工作。

戴季英后来反驳朱理治这种嫁祸于人的说法，称："是有朱理治支持我，如果不支持，我这个保卫局长早被撤了职。"

直罗镇战役

下寺湾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分两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到前线指挥直罗镇战斗；由郭洪涛随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瓦窑堡。朱理治留在下寺湾，负责筹建陕甘省委的工作。

1935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在离开下寺湾时，召开恢复建制红一方面军(11 月 7 日恢复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的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确定在直罗镇对国民党军队打一场包围歼灭战的决定，并就这场战役的部署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研究。为打好这一仗，毛泽东亲自与林彪等在战前带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几座山头观察了地形。

11 月 13 日，在部署直罗镇战役时，彭德怀召开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

军)干部会议，他针对红二十六军干部受整的情况说：“陕甘根据地很重要，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创造这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刘志丹、高岗是有功劳的。”

直罗镇战役遗址

11 月 18 日，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心中一直牵挂被关押在瓦窑堡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批西北根据地领导人的情况。他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已进入瓦窑堡的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查陕北“肃反”中的问题，明确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11 月 20 日，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指挥下，先行秘密将红一方面军隐蔽在直罗镇附近的张村驿地区。红军利用少量部队诱敌深入，从拂晓开始，打响了战役。直罗镇驻军是蒋介石从甘肃合水调集东进、企图向西北根据地南线“围剿”的东北军牛元峰一。九师一个整师的部队。

这一战役打得非常激烈，直到 24 日结束战斗，红军一举歼灭一〇九师一个师，并在追击中又歼灭一。六师一个增援团，师长牛元峰自戕。在这一战役中，毙伤 1000 余人，俘虏 53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500 多支、轻重机枪 176 挺、迫击炮 8 门、子弹 22 万发、电台 2 部。这一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1 月 30 日，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总结直罗镇战役

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重见天日

1935 年 11 月 10 日，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出发，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后，按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西北保卫局，由中共中央保卫局接管了一切工作。以董必武、王首道、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五人组成党务委员会，对陕北错误肃反中被关押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主要“案犯”进行了认真审查。

博　古

五人党务委员会从戴季英的手中拿过作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按照毛泽东“要慎重处理”的方针，立即进行调查访问。经全面了解刘志丹的情况认为，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看，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在西北红军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是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

五人党务委员会到牢房里连续提问几名“犯人”。当这些同志知道他们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派来的才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调查，证明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借“肃反”杀人依据的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严刑逼供、指名问供得来的。

党务委员会成员到牢房里看望了刘志丹。当时，刘志丹作为“首犯”，戴着手铐，还钉着脚镣。刘志丹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虽深受“左”倾错误的残酷迫害，刘志丹丝

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情操。

中共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五人党务委员会向张闻天、博古等汇报了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的审查情况。在审查期间，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仍然设置种种障碍，把真实情况完全隐瞒起来，歪曲历史，蒙蔽中共中央。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质问戴季英：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西北这块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面对这些问题，戴季英都回答不上来，但仍顽固地坚持刘志丹、高岗等有案卷，有口供为据。朱理治、聂洪钧竟然颠倒西北革命的历史事实，硬说是他们“创造了西北红军和苏区”，听了令人气炸心肺。

11 月 7 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及刘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等 18 人，终于从打开的牢门走出，重见了太阳。刘志丹回头凝望，许多被枪杀、砍头、活埋的亲密战友，再也不能与他一起走出这个打开的牢门了。大丈夫有泪不轻弹，此时此刻，他为这些含冤而死的战友，在被捕以来第一次流出了眼泪。

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释放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瓦窑堡城内外，传遍了整个西北根据地。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家家户户门前花炮齐放，如同欢庆新年，大家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释放之后，数百名蒙冤被捕的幸存者相继从牢房里走出来。至此，西北根据地“左”倾路线下的错误肃反终于结束，人们历经难熬的灾难，告别了那场血腥的噩梦。

在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刚到瓦窑堡，五人党务委员会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的审查情况，并提出了审查结论。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气愤，明确指出：逮捕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

第八十一章

“我们对党是忠贞不贰的”

平反

1935 年 11 月 7 日，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获释的当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瓦窑堡第二高小召开了平反大会。大会由张闻天主持，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参加。在平反大会上，由王首道讲了这次错误肃反的经过，公布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琪、杨森等无罪，立即释放，分配工作。同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

会上戴季英作了检讨。他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态度蛮横，百般狡辩，一口咬定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有据定案，就是“右派反革命”，并继续顽固地认定在陕北苏区执行的“肃反”政策是正确的。戴季英不思悔过的检讨，使与会的同志听了都十分气愤，纷纷站起来斥责、反驳他。

杨琪、杨森在会上，控诉了戴季英在“肃反”中严刑逼供、指名问供，对被关押的同志施行鼻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手段，讲述了他们在前后方杀害、活埋许多好同志的悲惨情景，引起与会同志的无比愤慨，发言的人和听的人都禁不住流泪，全场一片抽泣之声，会议几乎开不下去。

这时，刘志丹在悲愤交加的气氛中站起来，他以崇高的思想境界作了如下发言：一是陕北的同志们在错误肃反中受了委屈，现在中共中央到了陕北，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是中共中央领导着全国的革命斗争，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三是一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出狱后，一边需要休息，一边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

刘志丹讲完话，会场的气氛恢复正常。当张闻天让戴季英继续检讨时，戴季英依然毫无悔改之意，气得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厉声痛斥，制止了戴季英的发言。

会后，王首道以中共中央保卫局名义设便宴，邀请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王首道在席间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是创造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好同志，作战勇敢，工作积极，是无私无畏的指战员和革命干部，这次'肃反'是错误的，中央给你们平反，恢复你们的工作，并向你们道歉。"

刘志丹代表出狱的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得及时，解救了我们，如果来得晚些，我们大家就可能没命了。这次'肃反'扩大到我们的头上，主要是西北代表团偏听偏信，甚至只听右派分子为蒙混过关、保护自己、陷害好人、破坏革命而编造的假话，我们的话他们半句也听不进去，不相信自己的同志的斗争历史事实，以致造成这种混乱的局面。现在好了，党中央、毛主席来了，一切事情好办了。不要抱怨什么，教训大家都应该接受。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战斗。"

毛泽东接见刘志丹

1935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人。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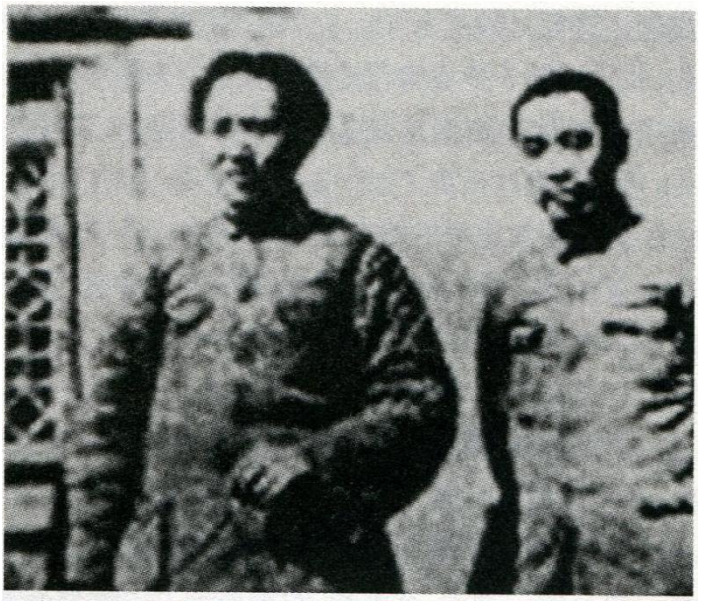
周恩来说："这个'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呀!"

刘志丹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您的学生。"

周恩来紧握刘志丹的手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

毛泽东对刘志丹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白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革命。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

刘志丹听后，喜悦万分，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毛泽东、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临别时，毛泽东诚恳地对刘志丹、高岗等说：“我们感谢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点。我们是来投奔你们的呀。……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

当天晚上，刘志丹激动得一夜睡不着觉。当时，刘志丹和几个刚获释的同志睡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安排的一孔窑洞里的大炕上。刘志丹对大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被关了几天，受了委屈。中央来了，把我们放出来了，救了我们的命，大家就再不要说啥了，好好工作吧!今后我们要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要在战场上英勇拼杀，让党在实践中考验我们，我们对党是忠贞不贰的!”

1936 年初，平反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即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受命率领部队东征抗日。开赴前线时，路遇从安定回瓦窑堡时任中央党校三班主任的习仲勋。

刘志丹一见到习仲勋，立即从马上跳下来，紧紧握住习仲勋的双手，恳切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

1936 年 4 月上旬，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渡过黄河，在山西临县

白文镇与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的张达志见面，两人谈及陕北错误肃反问题，刘志丹说：“要说总结经验的话，不能完全怪外面来的同志(指西北代表团)，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没办法和中央取得联系。外来的同志不了解我们西北的革命情况，也不了解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是左派，还是右派。要说责怪的话，主要是我们陕北党内‘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没有能够及时把我们西北的情况和我们这些人如实地向外来的同志说清楚，并挺身而出制止这场‘肃反’运动。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使外来的同志更多地了解我们，也许不至于造成这样的恶果。……现在问题总算弄清楚了，总算解决了。

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

此时的刘志丹尚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帽子，政治上未获彻底平反。他的一席话，忠于革命事业，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使张达志永生难忘。

“你们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毛泽东、周恩来从直罗镇前线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铸成这次错误肃反的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人。戴季英不服，还要强辩。周恩来说： “像刘志丹、高岗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们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据有关史料记载，戴季英在鄂豫皖、西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大搞错误肃反，可他并未因血的教训而收敛。1938 年，中共中央把戴季英从延安派到大别山根据地，担任新四军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他又与高敬亭闹不团结。

1939 年，由于高敬亭部下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投敌叛变，项英、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虽杨、曹叛变与高敬亭无关，但戴季英煽风点火，主持揭发高敬亭的问题，促成项英拍板将高敬亭逮捕。戴季英等对高敬亭进行残酷斗争，甚至又不惜动用酷刑。国民党曾悬赏重金要高敬亭的人头而不可得，此刻共产党自己却将高敬亭杀害。1945 年在延安召

开七大期间，毛泽东想起高敬亭，就问新四军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1977 年，中央军委为被错杀的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季英一度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才自尝到了“右派”苦果是什么滋味。

前方作战的徐海东闻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瓦窑堡获释平反的消息，由衷地感到高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出发时还有 300 多名红军战士被打成“反革命嫌疑犯”“改组派”“第三党”“AB 团”，随部队转战到陕北后，仍然没有摘掉帽子。徐海东找到毛泽东将这一情况汇报后，毛泽东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多少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

徐海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宣布为这 300 多名蒙冤的同志平反，恢复他们原有的党团关系。这些同志听后全都激动地哭了。

1942 年 12 月 12 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该决定指出，刘志丹等在 1934 年至 1935 年问陕北两条路线斗争时，在郭洪涛和朱理治等的高压和打击下，依然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且遭受了诬陷和逮捕，后来的一个时期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仿。同时指出朱理治、郭洪涛是“左”倾错误在陕北的执行者，并指出了他们本人政治品质上的问题。最后决定给予朱理治、郭洪涛严重警告及撤职处分。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很快把西北根据地党政军的大批干部从冤狱中救出，但对西北代表团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肃反余毒未及彻底肃清，因而其中许多人仍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帽子，未得到正常使用。李维汉在《回忆和研究》一文中说：“发生在 1935 年 9、10 月问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在中共中央到陕北后由于‘左’倾错误没有彻底肃清，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由陕北省

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有一定的责任。……1937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同志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1935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到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一个星期。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王稼祥、邓发、凯丰、郭洪涛等。张浩从莫斯科回国，也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制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亦称《八一宣言》)的过程。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策略、方针和以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史称“瓦窑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工人和农民不能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旧址

毛泽东讲到红军在江西中央苏区失败的惨重教训时，沉痛地说：把“中国共产党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军由 30 万人损失到 2 万人左右，我没有怪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

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在执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重大失误、红军在军事上濒临被国民党军队消灭的沉痛的失败教训，提出今后的指导方向。毛泽东认为，不能由外国人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按中国的国情自己决定，中国革命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党不能再犯过去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第三国际在党内的代言人认为“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农民领袖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甚至苏联人的身上，这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主义；对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不能混同于《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一样看待，在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中国革命要胜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千万优秀共产党人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使农民在革命实践中脱胎换骨跟党走，中国革命没有打不胜的道理”；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难之时，中国共产党要伸民族大义，以国家利益为上，重建统一战线，红军应不惜代

价，北上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作战。

根据瓦窑堡会议“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的精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了西北办事处，由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军委西北办事处主要负责在西北地区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三支红军部队，“扩红”运动迅速掀起空前的热潮。

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恢复工作之后，虽然头上的帽子没有完全摘掉，但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由于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信，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根据地人民积极响应“扩红”号召，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区干部带头参军，到处都是父送子、妻送夫踊跃参加红军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很快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

在这次“扩红”运动中，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涧县 512 名，瓦窑堡 219 名，赤源县 150 多名，吴堡县 150 多名，米西县 100 多名，神府 1000 多名，特别是仅在秀延一个县就有 2000 多名青年农民报名参军，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在“扩红”运动的同时，在井岳秀多年盘剥、群众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陕北苏区人民开展了“一切为战争”的自愿卖粮、借粮、捐粮运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陕北省就一次完成卖粮、借粮、捐粮任务 970 余石。仅几天内，秀延县群众就卖粮 130 石，借粮 40 石。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到 1936 年春，陕北省所辖各县群众卖粮 5850 石，借粮 3550 石，捐粮 960 石，保障了前线红军的粮食供给。

12 月底，绥德县成立绥德警卫营，刘子恭任营长，王季龙任政委，主要活动在义合、枣林坪、薛家峁一带；横山县先后成立三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横山县境内；米西县成立独立五营，薛宏亮任营长，朱明孝任政委，活动在米西地区一带；横山县红二十一支队改编为独立营，薛兰洲任营长，杨子珍任政委，活动在横山、安定县一带；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红二十三支队等合编为米西游击师，柴福俊任师长，魏国亮任政委，活动在横山、米西两县一带；吴堡县新红四支队及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独立营，薛英桂任营长，张驾伍任政委，后又扩编为独三团，活动在吴堡、葭县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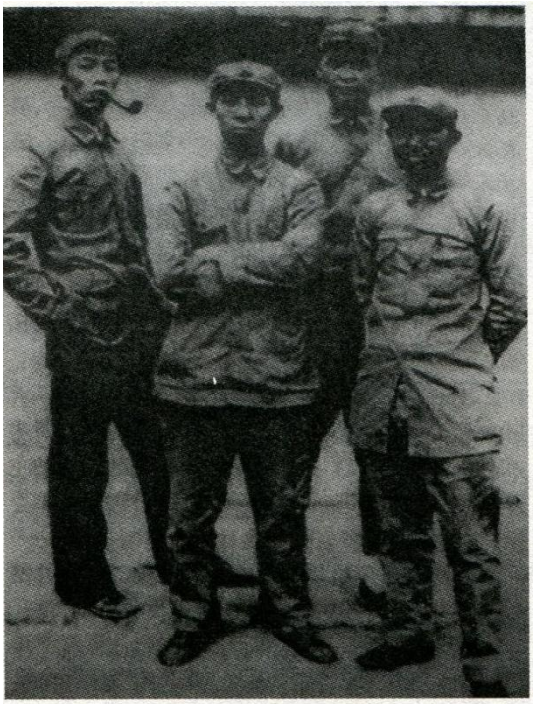
组建红二十八军

1935 年 11 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为牵制长城一线国民党军队向南对苏区的威胁，12 月 18 日，红军军委总部任命刘志丹为北路军总指挥，宋任穷为政委，由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等组成北路军，第二次北上攻打横山县城。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北路军从瓦窑堡出发，经三眼泉、石窑沟、韩岔到达张尔硷峁，与高岗带着曹动之、吴亚雄率领的蒙汉骑兵游击队会合。

12 月 30 日，红二十八军在横山县石窑沟正式组建，由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红二十八军是由陕北省的几支红军主力游击队组成，下辖三个团，将活动在绥德、吴堡县一带的战斗团改编为第一团，番号为二五 0 团；活动在横山、米脂县一带的米西游击师改编为第二团，番号为二五一团；活动在横山、安定两县的新编红四团改编为第三团，番号为二五二团。三个团全是陕北子弟兵，共计 1200 余人。

1936 年 1 月 16 日，红七十八师二营为先锋部队直抵横山县城外龙凤山国民党守军驻地。龙凤山守军闻风丧胆，仓皇渡过芦河西逃。

当天中午，红军将横山县城包围。下午 3 时，攻打横山县城的战斗打响，红军以三面围攻之势很快攻占了城外李家沟、五里墩守军的据点。红军北路军的这次作战任务，主要是牵制外线国民党军队，战略目的是给红军军委总部以充足时间筹划红军东征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因此，红军兵临城下，对县城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连续围困五天后撤去。驻守横山孤城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张子英部虽是虚惊一场，但自此龟缩县城之内不敢迈出城门半步。



1936 年春（左起）贾拓夫、郭洪涛、阎红彦、吴溉之在瓦窑堡

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军北路军北上，威慑北线国民党横山县城驻军后，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根据局

势发展，决定撤销赤源县的行政区域设置，将赤源县的三个区划归安定县管辖，八个区划归横山县管辖，并任命李合邦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高腾霞为中共横山县委书记。

到 1936 年 2 月，陕北、陕甘两省相继新组建起三个军的红军武装部队。除红二十八军外，又以陕北省其他几支红军主力游击队 600 多人为主，新组建了红三十军，由从莫斯科回国刚到陕北的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杨森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共计三个团；以陕甘省几支红军主力游击队为主，新组建了红二十九军，先后由萧劲光、李仲英、谢嵩任军长，甘渭汉任政委。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陕北省和陕甘省扩大红军近两万人，迅速壮大了红军的武装力量。

第八十二章

红军东征

践行抗日主张

1935 年 10 月至 11 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在河北省的香山等县策动汉奸暴动，占领香山县城，组织“维持会”，后又策动汉奸搞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鲸吞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成立第二个伪“满洲国”。

在国民党政府的默许下，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组织华北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制造了“华北事件”。“华北事件”以后，全国抗日形势迅速发展。

10 月 28 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对华三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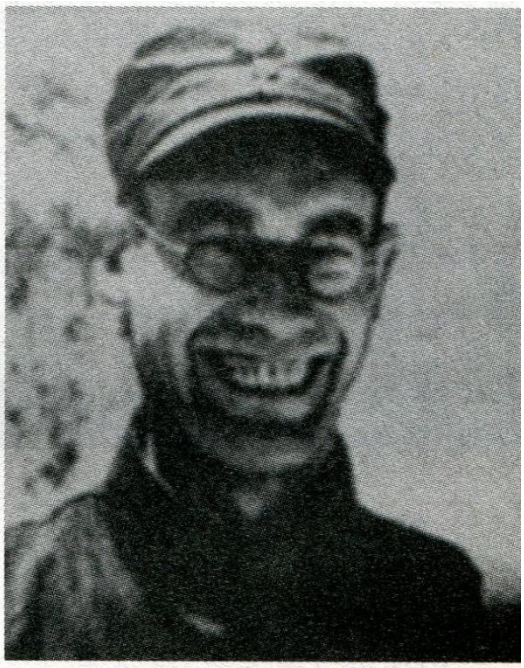
11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1 月 28 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

12 月 8 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亡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揭露蒋介石围攻西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土地的人民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进攻和日本

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2 月 9 日，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平学生 6000 多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封锁，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愤怒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等口号。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壮举，立即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支持和声援。10 天后，上海 8000 多学生相继举行了示威游行，引发了上海 80 万工人先后集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作战，挽救民族危亡，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李　德

1936 年 1 月中旬，为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中共坚持一贯的抗日政治主张毛泽东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北上奔赴抗日前线。当时对红军渡河作战，尚有不少争论。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李德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渡河东征抗日的主张：“什么东征抗日?这不行，这不行!不要说黄河天险难以突破，就是北面、西面、南面，我都认为不能贸然行动，更不要说是东征抗日了。”

当得知毛泽东率领东征大军穿过吕梁山向同蒲一线发展的消息时，留在陕北瓦窑堡红军学校的李德坐立不安地忙给毛泽东和红军军委总部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道：一是红军只能停滞在晋西一带活动，不能再“冒险”前进，如果红军继续北上靠近外蒙古边境，势必会影响苏联的和平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外蒙古造成“借口”；二是毛泽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亲日的卖国贼军队”的计划已经失败，中国内战的火焰重新点燃了，并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向华北扩大进攻的“借口”；三是倘若红军向外蒙古进行新的“长征”，中途受阻，主力不能及时返回，西北根据地就又有丢掉的危险。

毛泽东看完此信，回电周恩来批评李德：“此议不妥，是机会主义，不了解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红军的实力。”

李德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顿时目瞪口呆，摊开双手半天才缓过神来说：“这就是回答吗？”

除李德反对毛泽东的渡河东征主张外，从前线作战返回瓦窑堡的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渡河东征这一主张也产生过疑虑。其疑虑有二：一是怕红军渡不过黄河。当时，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部队十分疲劳，战士体质还很虚弱，包括刘志丹、徐海东的两部分红军，总计才有 13000 余人；而黄河以东沿岸的渡口重地，阎锡山派有晋军重兵把守，抢渡很难成功。二是怕红军即便抢渡黄河获得成功，也很难撤回西北根据地。因为红军兵力有限，东渡黄河后，一旦蒋介石出兵增援阎锡山，阻止红军北上抗日之道，红军作战失利，黄河天险势必挡住部队的退路，在没有建立起党群基础的国民党统治区，红军就会陷入不堪设想的危局。彭德怀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想法，同时表示：红军东征是必要的，但也是不能大意的，要保证能够撤回西北根据地。

彭德怀的想法和建议，虽反映了当时红军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途中红军没有根据地的沉痛教训，但引起毛泽东的不高兴。毛泽东很生气地对彭德怀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东征大本营

1936 年 2 月 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带着红军军委总部机关和东征准备工作先遣部队，从安定县瓦窑堡出发，经延长、延川两县来到清涧县东区的袁家沟。袁家沟距黄河西岸 30 里，村里住有 30 多户人家，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马义(白炳忻)等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是陕北较早开辟的红色村庄之一。

毛泽东到袁家沟后，认为把红军东征的大本营放在清涧县东区有诸多有利条件。这里不但是革命老苏区，创党建军早、群众基础好是第一先决条件，而且这里有由北向南近百里的黄河西岸线和十几处渡口的地理优势，

与山西晋西吕梁地区的柳林、石楼、中阳等县隔河相望，红军行动时有险山深沟可伏重兵，抢渡黄河时可展开兵力出奇制胜。同时，红军在瞬间即能控制晋西黄河东岸的广大区域，部队进则可直指北上抗日前线，退则可回旋自如。

中共清涧县委根据红军军委总部的布置，派黄石山挑选一批地方人员泅渡黄河，潜入河东，利用社会关系侦察晋军在沿河东岸的兵力设置和火力分布情况。时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的高峰按照红军军委总部的东征作战部署，连夜组织苏区群众赶造船只、筹集粮草、运送弹药、成立担架队，还动员了许多青年农民参加到东征队伍的行列中。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红军东征期间，仅清涧一个县首次就组织担架队 2000 余人，袁家沟一个村就有 20 多名青年农民积极踊跃报名参军。

到袁家沟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即骑马前往黄河沿岸视察黄河渡口部队的渡河准备工作。

此时天空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毛泽东踏雪登上黄河西岸高家塬的山巅，眺望陕晋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雄姿百态的崇山峻岭尽收眼底，面对满目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触景生情，诗意盎然，即兴吟成气壮山河的诗作《沁园春·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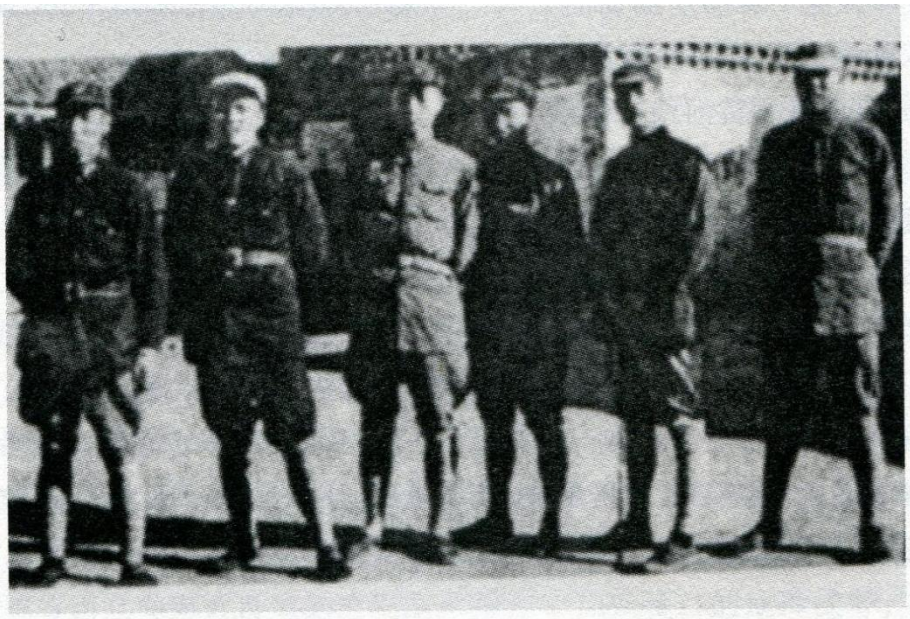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 月 17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在袁家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发出《东征宣言》，正式宣布红军东渡黄河东征、北上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东征宣言》呼吁国民党及各军阀即应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知识的献知识，各尽所能，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红军军委总部制定的《红军东征作战方案》，将红军主力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任组织部长，李涛任敌军部长，刘晓任民运部长，陆定一任宣传部长，杨立三、自如冰分任后勤部正副部长。

红十五军团为第一路东征军，总指挥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一军团为第二路东征军，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毛泽东在袁家沟向两路东征大军发布了北上奔赴抗日前线的作战命令。

2 月 19 日，毛泽东带着红军军委总部机关离开袁家沟，以黄河沿岸的高杰村为红军东渡黄河的前线指挥部驻地。这时，彭德怀骑着快马，带着侦察人员，北至绥德县的沟口，南至延川县的延水关，沿着黄河西岸亲临视察了红军两路东征大军的集结行动和渡河作战的部署情况。



1936 年 2 月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前部分红军将领合影（左起：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

1936年2月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前部分红军将领合影(左起: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在高杰村，毛泽东听取了彭德怀的视察汇报。彭德怀的汇报十分详细，从各路红军东征出发时的各条路线、各个渡口、渡河船只、船工组织以及群众的支前准备和粮食物资运输等情况，都讲得一清二楚。

彭德怀表扬了中共清涧县委和苏维埃政府，他高度评价说:“为了保证东渡的胜利，清涧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支援，赶造大船百只。这里的保密、支前、拥军以及后勤供应工作都做得很好。清涧县的工作不亚于中央苏区的模范县兴国县。”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后，根据各部队的集结情况认为红军渡河东征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当机立断，命令红十五军团迅速向高杰村附近的河口镇、辛关渡口一带运动，红一军团迅速向绥德县的沟口和延川县的延水关渡口运动，秘密隐蔽待命。

同时，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组成的第一路东征部队，率先过河入晋，并将第一路东征部队抢渡黄河的时间确定在2月20日晚8时。

毛泽东率先过黄河

1936年2月20日晚，毛泽东按照预定时间向第一路东征军发出抢渡黄河的命令。由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组成的第一路东征部队从清涧县东区的辛关和河口镇两大渡口展开了抢渡黄河的东征战斗。

在四里长的辛关渡口和五里长的河口镇渡口，拉开约十里地的黄河西岸线上，骤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先头渡河突击队乘着几十只渡船，在船工的号子声中像利箭出弦，瞬间成功地抢占了河东滩头阵地。驻守在河东的晋军惊慌失措，胡乱地向登上河滩的红军扫出几排子弹，就放弃抵抗，跑得无影无踪。

第一路东征部队抢渡黄河，一夜间就控制了黄河东岸。接着，急行军50里，经杨家洼、赵家塔、冯家嘴、李家畔等村，迅速攻占义牒镇，直奔石楼县城。

次日凌晨，毛泽东与随行工作人员一起和后续部队从辛关的房儿沟渡口踏上渡船，冲破惊涛骇浪，东进山西的石楼县境内。

2 月 24 日，彭德怀指挥红一军团组成的第二路东征部队，兵分两路，一路从北挺进到绥德县的沟口渡口集结，一路从南挺进到延川县的延水关渡口集结，在南北两线东渡黄河，以左右侧翼策应毛泽东指挥的第一路东征部队进军作战。

是夜，第二路东征部队分别在沟口、清水关两大渡口，相继向黄河东岸发起突击，抢渡黄河成功。从沟口渡口抢渡过河的红军部队，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一登上黄河东岸的坪上村即迅速南折攻占留誉镇。红军从留誉镇出发，又向三交镇挺进。三交镇驻守着晋军一个营，猝不及防，被红军一举歼灭。红军攻占三交镇后，随军工作组毛泽民、贺天云、贺建山、黄石山、黄光德等很快成立了三交镇苏维埃政府，推选民主人士李文才为主席，黄石山为副主席，杨立三为军事委员，李凤鸣为肃反委员，李文信为财政委员，黄光德为粮食委员。

同时，建立了中共三交镇地方组织，由贺天云任书记，贺建山任副书记。

彭德怀率领的东征部队攻占三交镇后，马不停蹄向东挺进，直指中阳县城，将县城团团包围。阎锡山急调汾阳、孝义一带的周原健独二旅出兵增援。

独二旅是晋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装备精良，号称“满天飞”。

2 月 25 日，周原健独二旅的先头部队李清华团和邸培甄连赶到关上村。关上村位于中阳县南 50 里处，是汾阳、孝义通往中阳的必经之地。当晚，红军对前来增援中阳县城的晋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彭德怀亲自指挥早已设伏的部队，向关上村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场激战，全歼李清华团和邸培甄连，团长李清华和营长岳俊峰、陈捷等均被击毙。

这次战斗共歼俘晋军 400 余人，缴枪 400 余支、迫击炮 3 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东征部队将士的抗日斗志。

毛泽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一军团从黄河东岸向晋西腹地挺进。晋军孙楚、李生达驻守在吴堡县境内的 5000 多人，惊闻红军两

路东征大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唯恐被截断其退路，惶恐万状地从吴堡县缩兵渡河东退，吴堡县城遂告解放。

2 月 26 日，毛泽东指挥红十五军团，势如破竹，攻占了石楼县城。毛泽东把石楼县城作为东征部队新的后方依托，红军向晋西吕梁地区的隰县、吉县推进，直捣汾阳。驻守贺家湾的一连晋军不战而降。

在石楼县，毛泽东令杨森、蔡树藩、赖传珠带领的一支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镇渡过黄河东岸，在义牒镇设立指挥中心，其主要任务为负责维护石楼、义牒、河口之间交通和渡口的畅通；拆毁晋军修筑在沿河东岸的堡垒工事，消灭溃散的小股晋军；发动地方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地方游击队武装。

同时，毛泽东命令戴季英在清涧县东区负责再赶造渡船 12 只，开赴河口镇的下游适当渡口备用；命令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加强与中共清涧县委及主要渡口各区苏维埃政府的密切联系。

红军攻占石楼县城后，随军工作队在县城内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随军工作队为开辟石楼县这块新区，胡耀邦担任义牒镇新区工作组组长，王达成担任潭庄新区工作组组长，白治民担任平底新区工作组组长，李富春担任沿河一带新区工作组组长。在石楼全县很快建立起 30 多个乡镇红色政权，并在县内组建起一支 400 多人的游击队。

红军两路东征部队进入晋西吕梁地区后，在短短连续七天之内，就击溃晋军五个团，俘虏 1200 余人，缴枪 8000 余支、子弹万余发、迫击炮 10 多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3 月初，毛泽东带着红军军委总部，随红十五军团从交口县到达孝义以西的大麦郊。阎锡山获悉红军东征部队进逼汾阳，慌忙调集晋军 12 个团到孝义县的兑九峪，准备向大麦郊推进，企图阻击红军北进。

3 月 10 日凌晨，红军两路东征部队首先对聚集到兑九峪的晋军采取三面包围发起攻击。战斗在数十里的一道长沟里展开，满沟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战斗进行得尤为激烈，双方交战一天，晋军虽伤亡很大，但两军形成对峙之势。毛泽东认为战局形成阵地战的变化不利于红军擅长

的游击战术，相持下去会造成部队重大伤亡，随即改变作战计划，主动撤出战斗。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郭家掌村主持召开了红军团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了红军东征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会上，毛泽东回顾了红军渡河以来所取得的胜利，讲述了红军东征的伟大意义。会议确定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兵分三路，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红军军委总部特务团和黄河游击师为中路军，转战于中阳、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孙楚、杨效欧的晋军；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为左路军，挥师北上直捣太原，以牵制太原晋军，诱逼阎锡山调动绥晋一线的兵力保卫太原，开出一条红军北上察哈尔的抗日通道；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长驱南下晋南平原，进行扩军、筹款，发动群众，伺机挺军上党，推进河北抗日前线。

郭家掌村会议后，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等率领红军军委总部特务团及黄河游击师 500 多人，进入晋西地区，与孙楚、杨效欧的军队兜着圈子周旋作战。

太原和南京的电台即借题发挥地吹牛：“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败，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毛泽东笑着对周围的同志说：“左右两路军已经胜利打出去了，我们中路军的队伍虽小，但我们要做大事情哩!”

阎锡山

太原和南京的电台正在吹牛的时候，红十五军团先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晋军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营，接着，向北挺进文水、交城，直逼太原，后又挺进到静乐县，宣传北上抗日；红一军团已进占孝义，向灵石、介休北扩张，威胁平遥、榆次、太谷、太原。

阎锡山乱了方寸，一边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出中央军入晋增援，一边加急电令进驻陕北绥德、米脂等县孙楚、李生达的晋军两个师星夜东调回晋参战。绥德、米脂两县的晋军撤离后，

无定河两岸苏区连成一片。

蒋介石获悉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征部队可能穿过同蒲铁路线，动摇着太原的安全，慌忙下令从洛阳、徐州等防地调遣十个师以上的兵力配合阎锡山的晋军和傅作义的绥远军，拦截红军的北上抗日去路。同时，为了迫使红军从山西撤军、回师陕北，以扭转山西的危局，又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从陕西南线出兵，向西北根据地发起新的“围剿”。

第八十三章

打通神府苏区

刘志丹带着红军上来了

1936 年 2 月下旬，周恩来待红军两路东征部队全部东渡后，即迅速赶到清涧县折家坪镇。这时，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早已集结在这里，整装待命。

周恩来

根据红军军委总部的部署，红二十八军要保证红军两路东征部队在山西作战进退自如，其首要任务是先扫清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之间国民党设在黄河沿岸的各个军事据点，打通两块苏区的联络通道，使之连成一片，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抗日后方基地，并控制黄河西岸以北地区各个重要的渡口，策应和配合红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的作战。

周恩来与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从清涧县折家坪出发，进入

绥德县，一起指挥击溃国民党驻守义合镇的一个团。在战斗中，三团团长杨琪带着部队攻打岔王庙冲锋时，不幸头部中弹牺牲。

战斗结束后，红二十八军护送周恩来从绥德县出发，一直沿黄河西岸南行，视察了黄河沿岸由阎红彦率领红三十军把守各个渡口的河防工作，从船只到船工的配备、从兵站到物资的运送均进行了认真的检查。

3 月 1 日，周恩来和随行工作人员从清涧县东区的马花坪渡口乘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毛泽民陪同周恩来沿黄河东岸北上三交镇，视察了这里的新区工作。黄河东岸渡口距三交镇有 20 多里的路程，大多是沿悬崖峭壁开凿的险径，如脚下稍有不慎，就会坠落到数十丈高的悬崖之下。

周恩来一到三交镇，走进三交镇苏维埃政府驻地，尚未歇息，就听取了李文才、黄石山等开辟新区的工作报告。周恩来对三交镇的新区工作甚为满意，指示李文才、黄石山及工作人员：“要注意敌情，及时掌握晋军的动向。在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中，不要动富农和工商业者的财产，一定要搞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要动员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

这时，蒋介石为使阎锡山全力阻截红军东征部队北上抗日的进军锐势，电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从陕西南线出兵，向陕北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周恩来接红军军委总部通知，从三交镇赶赴晋西大麦郊参加了前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晋西会议。根据晋西会议精神，周恩来与张闻天随即西渡返陕，共同部署和指挥陕北苏区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及各县地方红军部队，以防御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从南线乘机北进苏区。周恩来离开山西时，三交镇苏维埃政府将镇上各商号捐赠红军的数百块银洋交给周恩来带回苏区。

周恩来到西北根据地后，这是他第一次与刘志丹在一起作战，也是与刘志丹最后一次见面，虽相处时间很短，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随刘志丹的红二十八军来到清涧县后，周恩来目睹当地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纷纷前来看望的那种朴实而深厚的情感，他对人民群众信赖和爱戴的这位陕北革命领袖更生崇敬之心。在 1970 年周恩来接见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时，还深切地怀念说：“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是很值得纪念的。”

3 月 19 日，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经清涧、绥德、吴堡、米脂、葭县，一路与尾追的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姜梅生的六个骑兵连几经激战，进入神府苏区的葭芦县。

葭芦县设在神木与葭县两县的交界处。中共葭芦县委书记刘长亮主动派人与红二十八军取得联系，向刘、宋汇报了地方上的敌情。当天夜里，刘长亮立即派人到中共神府特委，送去刘志丹率领红军北上神府苏区的喜讯。

红二十八军一到葭芦县，县委书记刘长亮热情地把部队分别安排在麻堰沟、薛家会等村休息。当地群众一听说刘志丹带着红军上来了，高兴得腾窑烧炕、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家奔走相告，甚至几十里地外的群众都跑来看望刘志丹，部队的营地里挤满了前来慰时间问的人们。有一位 70 多岁双眼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棍颤巍巍地来看刘志丹。乡亲们笑着说：“大娘，你能看得见老刘吗?”

老大娘说：“我看不见，还摸不着吗?”

刘志丹立即站到老大娘的面前，拉着大娘的手，亲切地说：“大娘，我就是刘志丹!”

老大娘把刘志丹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激动地流着泪说：“你带领红军打敌人，你真是咱陕北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此情此景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动得流下热泪。

到抗日前哨去

在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到达神府苏区之前，中共中央先行派出杨和亭、张秀山、张江全、张汉武、邓万祥、刘明山、黄正明、白兴元、陈景堂等人进入神府苏区。

1935 年 11 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下寺湾会议，毛泽东对国民党封锁下陕北最北部的神府苏区的孤困局势非常关注。在这次会议上，为了使神府党组织和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充满必胜信心，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走出困境向南发展，结束长期被国民党分割的局面，与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抗日最前哨，决定把神府苏区改为神府特区，划

归中央直属领导。同时，决定派出一批能力强和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北上援助，尽快进入神府苏区，向中共神府党组织和独三团送去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喜讯和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2 月初，中共中央派杨和亭任特区特委书记，张江全任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谢绍安任特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及独三团团长，张汉武任特委常委兼团特委书记，作为党中央派遣北上的第一批干部，先行前往神府苏区。同时，中央决定从神府苏区调王兆相到瓦窑堡中央红军大学学习(后未去)，调张承忠到中央党校学习。

时隔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讨论神府苏区工作的专题会议。这次会议，除毛泽东、张闻天、李维汉、贾拓夫、邓发、张浩等出席外，王达成、杨和亭、张江全、杨文谟也参加了会议(谢绍安、张汉武因事未参加)。周恩来向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原神府苏区党的负责人王达成了解神府苏区的情况，王达成连说：“完了，完了。”周恩来责问：“全完了？怎么前几天我看到国民党的通报上还说‘有共匪在神府活动’，这说明没有完。”

在会上，毛泽东精辟而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变化，指出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中共的口号就是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政党、各军、各界、各团体要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在讲到神府苏区的工作问题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前哨!”并对北上神府苏区的杨和亭、张江全二人殷切地说：“你们去后，一定要把党员动员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要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但还会遇到困难，不要被困难吓倒，要坚持斗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杨和亭

会后，贾拓夫多次找杨和亭、张江全、谢绍安、张汉武，对他们去神府苏区后的具

体工作任务进行了详细安排。时在军委西北办事处的刘志丹特地找杨和亭，与他交谈了许多军事方面的问题，并指定由安定县新编红四团派出一个连担任护送任务。

12 月中旬，杨和亭、张江全、谢绍安、张汉武从瓦窑堡出发，行至高石崖后，由新编红四团派出第二连连长李秉万、指导员张林山带着一个连负责护送。在途经米脂县西区国民党统治区的范家高梁村时，因与投靠高桂滋部的史文华骑兵团两个连遭遇，谢绍安在战斗中牺牲。

范家高梁村一战后，为了在沿途让北上的同志易于隐蔽，减小行动目标，顺利穿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封锁线，杨和亭决定让随行护送的第二连停止前行，返回安定县，他和张汉武、张江全三人化装成收购羊皮的商贩，继续北上。杨和亭化装成老板，张汉武、张江全化装成伙计，赶着两头毛驴，从下盐湾过无定河，经崖窑沟、刘仓圾、打火店、木瓜树峁等村庄，辗转到榆林以北芦家铺，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刘济民取得联系，由刘济民带着进入神府苏区。

1936 年 1 月初，中共神府工委在神木县罗家墙召开会议，工委书记张承忠、独三团团长王兆相以及贾怀光、毛凤翔、刘长亮、贺伟、贾如胜、李治洲、王恩惠等神府苏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由杨和亭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指示。会上，正式宣布撤销中共神府工委，成立中共神府特委，由杨和亭任书记，张江全任宣传部长，贾怀光任军事部长，刘济民任白区工作部长，王恩惠任秘书长。同时，宣布了神府团特委的成立，由张汉武任团特委书记(后任独三团政委)。

这次会议，总结了神府苏区一年来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批评了原神府工委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讨论了在这段残酷斗争中一些干部由于意志衰退向国民党自首变节的肃反问题，决定对各区委以上干部严格审查，对破坏党的组织者实行镇压，对情节轻微者以教育为主，并把有过自首行为的部分人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白区工作，以接受考验。

在罗家塢开会的当天，附近国民党驻守的一个骑兵连和常备队 80 多人突然闯到罗家嫣附近的毛家飒村。当晚，独三团诱骑兵连和常备队到申家

里打了一个漂亮仗，歼俘骑兵连和常备队 60 余人，缴枪 60 余支、战马 20 余匹。第二天，在东沟召开了庆捷大会。

2 月间，中共中央又派张秀山、刘明山、黄正明、邓万祥、白兴元等第二批干部前往神府苏区。他们从瓦窑堡出发，到涧峪岔的刘家山村后，由中共米西县委书记杨彩霜派来牛岗带着米西游击队护送，沿无定河北上，路经镇川堡，绕榆林城东北进入神府苏区。经过榆林城东，在一个村庄吃饭时，村里有个反动分子偷偷跑到附近的驻军邬青云营告密。邬青云营是刘润民旅安在神府苏区边上的一个“钉子”，经常出动到苏区骚扰，抢劫掳掠，杀人放火，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恶名远扬。

邬青云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队。这个骑兵队刚要进村，邓万祥带着米西游击队抢占山头，控制有利地势，向骑兵队打了一梭子子弹。骑兵队见红军早有防备，又占据险要山头阵地，就再也不敢追来了。

行至毛谷川，这里驻着一个反共义勇队，站岗的哨兵燃起火堆，正围着火堆取暖。随行的许多同志认为这是个好战机，主张给义勇队来一个出其不意的突袭，顺手牵羊地缴获些枪支武器，然后再离开这里。张秀山认为这次北上的重要任务是保证瓦窑堡派出的这批干部安全到达神府苏区，沿途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只是迫不得已的行动。

在张秀山的说服下，同志们爬过一道山梁，绕开了毛谷川义勇队的据点继续前行。当翻过山梁后，正好遇到葭芦县的一支游击队，由这支地方游击队做向导，与米西游击队一起护送张秀山等进入了神府苏区界内。

在神木县毛家飒村，中共神府特委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对中共中央派到神府苏区的第二批干部表示热烈欢迎。在会上，张秀山、刘明山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及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喜讯，并听取了杨和亭对神府苏区的情况汇报。

在这次会议上，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宣布神府特委归属中共陕北省委领导，并对神府特委的领导班子和一些人事作了新的调整：由杨和亭任书记，张秀山任组织部长，张江全任宣传部长，刘济民任白区工作部长，贾怀光任军事部长，王恩惠任秘书长，张汉武任团特委书记，黄正明任保卫

局长。新的神府特委建立后，对独三团的领导也作了调整：由刘明山任团长，毛凤翔任政委，贺伟任参谋长，武开章任政治处主任，王兆相调任特委军事部副部长。

毛家圪会议后，刘明山带邓万祥、白兴元到独三团。当时，独三团下设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队。一连连长邓万祥，指导员许培仁；二连连长蒋安雄，指导员白兴元，共100多人、80余支枪。

3月15日，国民党驻沙峁镇守军一个骑兵连闯入九堋村，独三团决定攻打这个立足未稳的骑兵连。团长刘明山和政委毛凤翔从第二连抽出一个班，组织精干的尖刀队，直插九瓤村骑兵连的背后，主力部队从正面发起攻击。九堋村的骑兵连没有任何防备，枪声一响，士兵乱作一团，狼狈地朝村外逃窜。红军随后紧紧追击，正待全歼溃散不堪的骑兵连时，沙峁镇驻军派出的援兵赶来，红军撤出战斗。

独三团在九堋村一战后，转到毛谷川。正好毛谷川据点的反共义勇队30多人赶着八头毛驴驮着领取的军用物资，从榆林方向过来。刘明山带着骑兵队，一冲而上将义勇队截住，义勇队慌乱中钻到附近的一个旧寨子里，企图负隅顽抗。这时，独三团步兵像猛虎般地攻入寨子，很快将义勇队全部歼灭，缴枪25支、子弹1000余发，还缴获了八头毛驴驮子上的军衣和其他物资。

几天后，独三团从毛谷川继续北上，寻机与国民党驻军周旋作战。部队在行军途中，发现国民党有个新修的碉堡，只有十几个士兵驻守。碉堡上的士兵见红军部队冲来，弃了碉堡拔腿就跑。刘明山命骑兵队的快马绕到前头一截，后边部队枪声一响，十几个士兵都乖乖地举手投降。

独三团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使“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得到震慑，他们龟缩在据点里，再不敢轻易出动。

神府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1936年3月20日，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进入神木县的花石崖。当晚，部队在花石崖宿营。花石崖以北方向是高家堡镇，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刘润民旅在镇上派有重兵驻守。部队决定奇袭高家堡镇，歼灭该据

点守军。

3 月 21 日，红二十八军向高家堡镇行进的途中，爬上一座大山，刘志丹突然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原来刘志丹在马上用望远镜眺望，发现右侧山下一个叫柳条沟的地方，有 30 多人的一小股国民党军队正赶着一群骡马驮着东西，与部队同向前行。刘志丹断定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运粮排，毫无战斗准备，决定由参谋长唐延杰从随军机关人员中选拔一支突击队，去执行这一战斗任务。

唐延杰很快挑选出 60 人，组成一支突击队，并挑选十余人组成一个骑兵班，指定一位参谋为突击队长。当时部队马匹少，刘志丹主动把自己骑的马匹也充进了骑兵班，用于此次战斗。

按照刘志丹的亲自部署，突击队分成两路，一路从右侧山梁俯冲直下，堵住这个运粮排的后路，一路直接冲入沟底，把运粮排拦腰截成两段；骑兵班埋伏山腰间等候发起冲锋。当这个运粮排发现红军时，突击队已冲到跟前只有十几米的距离了。这次战斗进行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但当清点俘虏时，却少一个人。再仔细搜查战场，原来带队的排长被泥土掩埋在一个土坑里。裴周玉喊这个排长缴枪，他还企图顽抗，警卫员张娃勇猛跳下土坑，用手枪对准他脑门便要扣动扳机，这个排长慌得喊叫：“红军老爷饶命啊!”这一仗，运粮排 35 人一个不漏全部被俘虏，缴获长短枪 21 支、冲锋枪 3 支、轻机枪 1 挺、粮食 3000 余斤、骡马 19 匹。

战斗结束后，刘志丹拿着从运粮排长身上缴获的一支崭新的驳壳枪，高兴地对大家说：“蒋介石、高桂滋、井岳秀这样的运输队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今后来者不拒，有则收之。”

3 月 22 日，红二十八军得悉刘润民旅杨相枝营驻太和寨的两个连由一个副营长带队，正在杨家堰村抢粮拉牲口，骚扰百姓。部队决定南折行进，歼灭杨家蟋之敌。刘志丹命令一团沿沟隐蔽向杨家嫣靠近，正面抢占有利地形；二团从谢家沟绕到杨家埒侧后；三团在杨家沟山梁切断向太和寨方向的退路，在杨家塄形成一个包围圈。

当一团与村里杨相枝的两个连接上火时，带队的副营长还以为是独三团和地方游击队，气焰嚣张，妄图顽抗。一团一阵猛攻，用重机枪一扫，

就将这两个连压到一个庙宇附近。刘志丹命令吹起冲锋号，一、二团一齐发起攻击。带队的副营长见势不妙，想带着人马冲出村子逃回太和寨，三团从山梁上猛扑下山，一、二、三团顿时将这两个连压到村外土坡的沟里，使其全部缴枪当了俘虏。

这次战斗，毙俘杨相枝营副营长以下 300 余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神府独三团闻得枪声赶到杨家堰时，战斗已经结束。

3 月 23 日，红二十八军进驻陈家坪。当天，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张秀山和王兆相等在陈家坪组织党政军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红二十八军暨祝捷大会。特委秘书长王恩惠代表神府党政军民讲话，感谢党中央派红二十八军北上增援神府，欢迎红二十八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胜利到达神府，两战两捷。刘志丹、宋任穷也分别讲了话。

方圆几十里的群众听说刘志丹率领红军一到神府苏区，就连打两个胜仗，都兴高采烈扶老携幼地从远地赶来，有的抬着猪，有的赶着羊，有的手提鸡蛋筐，有的挎着红枣篮，慰劳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但人们更大的心愿是要亲眼看一看刘志丹。

大会结束后，王兆相到红二十八军军部，看望了久别重逢的刘志丹，二人见面格外亲切，一直长谈到鸡叫头遍方才入睡。在王兆相问及西北代表团在陕北“肃反”那阵子刘志丹等许多同志被关入牢狱险遭“左”倾错误执行者杀害的事情时，刘志丹说：“幸亏党中央来得及时，把我们放了，不然，我们的脑袋就搬家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陕北问题真是关心，处理得也好。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纠正缺点，跟着党中央干革命。中央刚到陕北，有些问题以后还会搞清楚的。”

第二天早饭后，刘志丹、宋任穷根据王兆相熟悉神府地区的地理以及了解敌我兵力部署和农村群众的情况，向特委书记杨和亭提出暂调王兆相到红二十八军当一段临时参谋，以提供当地情况，解决后勤供应等问题。王兆相又选了王道三、杨孝先做自己的助手。

在陈家坪，刘志丹决定攻打沙峁镇。当时，沙峁镇驻守着晋军孙长胜骑兵旅的一个骑兵大队和三个步兵连，还有一个“铲共义勇队”，有 300 多人，是插在神府苏区的一个“钉子”。

这时，姜梅生的六个骑兵连400多人尾追红二十八军已过万镇。为了保证红二十八军打好沙峁镇这一仗，引开姜梅生的尾追，使沙峁镇守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刘志丹派刘明山、白兴元带领独三团，声东击西佯攻万镇寨子，担任牵制任务，诱惑姜梅生南援。

独三团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到万镇，向万镇守军寨子发起猛烈攻击。万镇寨子驻守的国民党军队不多，尾追红二十八军的姜梅生正欲寻机与红军作战，闻得红军对万镇发动进攻，误以为是刘志丹的红军主力，慌忙带着六个连的骑兵倾巢出动，南返增援万镇。当姜梅生赶到万镇时，独三团已完成了牵制任务，迅速撤出战斗，抄小路向北转移到贺家川。

3月24日，红二十八军向沙峁镇发起进攻。刘志丹命令一团攻占沙峁镇的背后山头；二团经梁家仓占领沙峁镇对面的刘家坡村，切断镇上守军的退路；三团由王桑塌村沿河岸，正面对沙峁镇发动攻击。

凌晨，战斗打响。沙峁镇守军利用山高路险的优势地形以及构筑的坚固堡垒和战壕工事进行顽抗。红二十八军发动两次总攻都未能奏效，但都给予守军重创，另外还发现镇上守军有逃跑的迹象。据此，刘志丹与宋任穷分析后，决定部队暂弃强攻，利用守军逃跑之机，选择有利地势进行伏击。

次日拂晓，果不出所料，沙峁镇守军偷偷溜出镇子潜逃。守军非常狡猾，避开红二十八军在石畔上村的设防阵地，却由石角塌向红教寺方向逃脱。沙峁镇遂被解放。

在柳条沟、杨家堰、沙峁镇，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军队连续三战，极大地震慑了“围剿”神府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驻栏杆堡、花石崖、太和寨、龙尾峁、石窑等处的国民党守军闻风丧胆，纷纷仓皇潜逃回神木和府谷两县城，神府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当时，神府群众编了这样一首《信天游》歌颂红二十八军：

一杆红旗两杆号，
刘志丹的队伍上来了。
穷人听了好喜欢，

白军听了吓破胆。
三圪堪石头两圪哒砖，
刘志丹打开沙峁川。

第八十四章

第三路东征军

赶造渡船

1936 年 3 月 25 日，红二十八军进驻神木县沙峁镇。当天，刘志丹接到红军军委总部电令，命由红二十八军组成红军第三路东征部队，即迅速东渡黄河，从神府地区挺进山西，从北打开罗峪口和黑峪口，接应已过黄河的红军东征抗日部队，并将神府苏区作为红十五军团安置伤病员的后方。

刘志丹接到命令后，立即与宋任穷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共同研究部队东渡黄河的作战部署。

会后，刘志丹亲自带着各团连以上干部登上高山，用望远镜观察河东罗峪口镇晋军兵力的分布情况，选择红军东渡的渡口位置。经仔细观察，刘志丹作出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把红军东渡的主渡口选定在天台山下的山坡村。

山坡村住有十几户人家。这里的黄河河宽水缓，河东岸晋军防守力量较为薄弱。山坡村北就是天台山寺庙，每天都有陕晋两地的朝山群众焚香敬神，来往不绝，容易造成晋军的疏忽，有利于大部队的隐蔽。

红二十八军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确定后，如何解决渡河船只成了部队的最大困难。当时，整个河西岸没有一只船，河面上的渡船全被晋军抢到河东岸扣了起来。晋军错误地认为，在黄河天堑没有渡船，红军纵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渡过河东来。

为了尽快解决部队渡河船只的问题，刘志丹、宋任穷把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和王兆相叫到军部，交给杨和亭、王兆相一个艰巨的任务：必须在三五天内——至迟七八天，赶造出三五只大船。杨和亭正在犹豫之时，王兆相已满口答应：保证完成任务。

刘志丹听后，对王兆相说：“兆相，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最多只有七天时间给你。”

杨和亭、王兆相离开军部后，杨和亭担心地问王兆相：“兆相，七天内造出五只大船有把握吗?”

王兆相说：“你放心，我已派王道三回王家沟想办法搞船去了。那里人人都会放船，很多老乡会造船。只要红军有事，他们会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的。”

杨和亭、王兆相找到王道三，当夜，在王家沟召集附近几个村庄的干部开会。当几个村的干部听说限期赶造大船是刘志丹要率红军攻打黄河对岸罗峪口镇时，一致表示，一定按军部和特委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群策群力，保质保量提前完成造船任务。

散会后，参会干部立即回到各村，在各村连夜组织骨干、积极分子布置落实任务，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参加到造船的行动中。在王道三的组织下，许多群众踊跃地捐物捐料，有树的伐树、有力的出力，还有不少人干脆把自己家窑上的门板卸下，主动送来做船板用，大家情绪十分高涨。

刘志丹几次带着军部同志到造船现场询问进展情况，唯恐贻误东渡黄河的作战计划。一天黄昏，刘志丹在外面跑了一天，拖着疲倦的身体来到造船的现场。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一见到刘志丹，就向刘志丹诉起了苦：“老刘，你们来得正好，我老汉早就盼着你们来搭救我们老百姓啊!”他脱下衣服露出被晋军打得留下的伤痕说：“老刘，你瞧，为了祖辈留下的一只破船，我被那些王八羔子打成这个样!老刘，你说这天地问还有理吗?”

刘志丹对这个老人的遭遇深表同情，关心地问：“老翁公，你的船还在吗?”

老汉呜咽着说:“早被阎锡山的队伍抢走了!还有我的儿子也被他们抢走几个月了啊!老刘，你是清官，你得把我儿子和船夺回来呀!……老刘，你放

心，就是拼上我这把老骨头，也要保证提前把船赶造出来，我还要亲自把红军的第一只船渡过黄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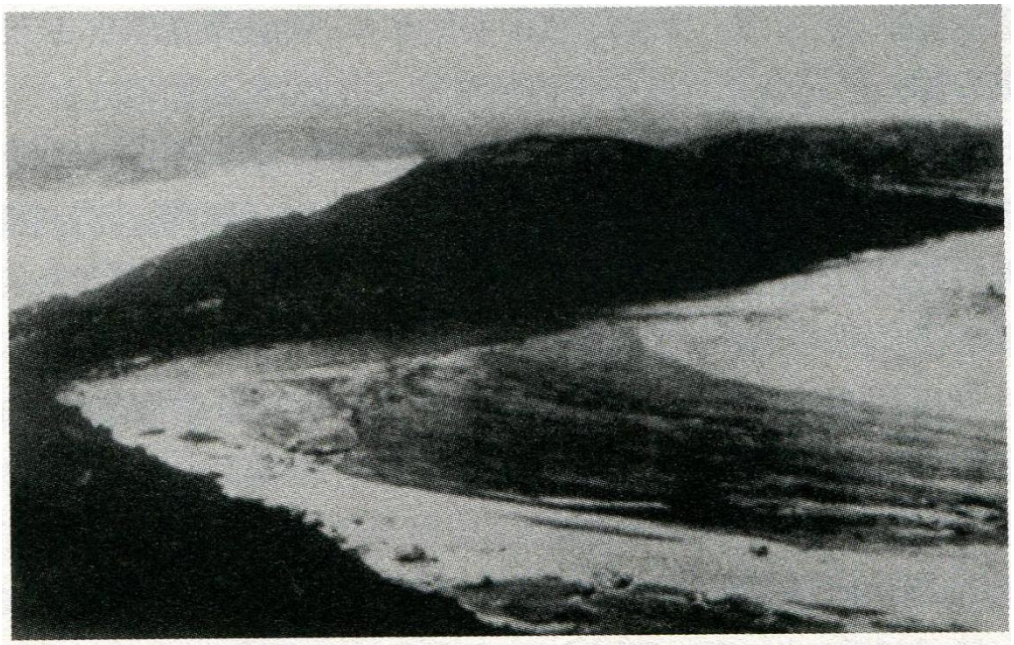
刘志丹被老人的一番诉说和表态所感动，安慰说：“老翁公，你放心吧，红军保证把你儿子还有你的船夺回来!”

神府苏区的群众不负刘志丹的急切期待，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拼命选料锯木，铺底排板，拉帮打簧，比原计划七天时间提前一天赶造好五只供红军渡河的大船。

罗峪口战斗

1936 年 4 月 1 日凌晨，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独三团、红三支队组成的第三路东征部队在神木县南区的刘家川、柳林滩、沙峁滩和山坡村等渡口集结。

在天台山下的山坡村主渡口，渡船即将离岸。刘志丹、宋任穷接见了全体自告奋勇赶来的船工，向他们每人端上一碗烧酒，感谢他们对部队的支援。刘志丹高举酒碗，鼓励他们不畏艰险帮助红军抢渡黄河。



兴县罗峪口镇战斗遗址

接着，刘志丹一声令下，红军各渡河部队分乘群众赶造的五只大船，冲破惊涛骇浪，开始了抢渡黄河的战斗。担任首渡突击任务的一团一连和二连一个班，从山坡村主渡口东渡出发，像离弦的利箭一样，飞快地向河

东滩头阵地驶去。

这时，天还未亮，驻守在河东岸罗峪口镇的晋军尚未发觉红军已登上岸。不料，后续渡船上的骡马一阵嘶鸣，惊动了镇上的晋军。

顷刻间，河东岸晋军的机关枪、追击炮一齐响起。机关枪的稠密子弹在天空发出爆竹般的啸叫声，一发发迫击炮炮弹落在河水中激起冲天水柱。抢先登上河东岸的一团吹起冲锋号，向罗峪口镇半山腰的寨子梁碉堡发起攻击。

寨子梁碉堡修在一个高岩顶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晋军一个连据守。一团的战士不畏山陡势险，像猛虎下山一样从山顶直扑碉堡，很快将寨子梁碉堡占领。

抢登河东滩头的第二、第三两个团奋勇向前冲杀。经激烈战斗相继攻下李家梁碉堡，突破罗峪口镇晋军的其他外围防御工事。

驻守在罗峪口镇的晋军营长见寨子梁、李家梁的碉堡失守，惊慌失措，一边派出护兵赶着两匹马，驮着金银财宝送往兴县城，一边给上司打电话，请示是守还是退。但因电话线早被红军切断，急得晋军营长变成了热锅里的蚂蚁乱转圈。

在天大亮前，红二十八军全军渡河登上东岸，刘志丹总攻令一下，一、二、三团直捣罗峪口晋军营部。死守营部的晋军，在红军密集的枪炮扫射之下，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逃的逃。当部队冲入营部时，晋军营长已被乱弹击毙，只见墙上挂着步枪和明亮的马刀，地上摆着百余箱的子弹和地雷，灶房里的蒸笼上冒着热气，打开蒸笼一看，里边全是白生生的洋面馒头。战士们一边吃一边开着玩笑说：“敌人还给我们做好了早饭啦!”

红二十八军、独三团、红三支队东渡黄河一举攻克罗峪口镇后，迫使晋军放弃了黄河东岸百里长的河防线，有力地配合了第一、第二路东征部队的作战。

在罗峪口镇，部队休整一天。第二天，阎锡山便派出飞机到罗峪口镇的上空进行侦察。刘志丹决定留王兆相、王道三与红三支队帮助地方成立苏维埃政府，独三团随部队主力迅速离开罗峪口镇，挥师北上，从黑峪口、兴县城、康宁镇一路横扫而过，又连战连捷。

罗峪口是个住有几百户人家的大镇子，正处晋陕交通要冲，镇内街市较为繁华。红二十八军一进人罗峪口镇，就由随部队行动的神府特委工作组在镇子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王道三任主席。王道三由于年轻，对保护城镇工商业者合法利益的政策理解不够，刚上任就发生了新政权没收商店货物的事，引起工商业者的恐慌。

刘志丹、宋任穷得知此事很恼火，立即将王道三关押起来。经王兆相求情和担保，刘志丹征求了宋任穷的意见后，放出王道三，但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的做法对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更多人起来抗日的主张所产生的危害性。王道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亲自登门向商店主人道歉，并归还了没收的货物。商店主人满意地说：“还是红军好。”

通过这件事，红军和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在罗峪口镇的影响扩大了。广大群众到处传说：共产党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当时，红三支队仅是一支 20 多人的游击武装。留守罗峪口镇期间，由于罗峪口镇和从神府赶来的青年农民都积极报名参军，红三支队一下子壮大到 100 余人。红二十八军攻占黑峪口、挺进康宁镇后，王兆相、王恩惠带着红三支队又转到黑峪口活动。

红三支队在黑峪口期间，刘志丹派人从前方送来指示信，告知晋军已到黑峪口以南，主力部队要奉命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命红三支队西撤，先返神府苏区。红三支队在山西活动半个月左右即返神府苏区，扩编为红四团，由王兆相任团长，贺伟任政委，下辖两个连，开赴府谷县郝家塌、武家庄一带活动，恢复了府谷县北部根据地。红四团进入府谷县武家庄后，中共神府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红军指挥部，王兆相任指挥，刘明山任副指挥，张秀山任政委。6 月间，红军军委总部将陕北地区分为五个作战分区，神府地区划为第一作战分区，由张秀山任司令，杨和亭任政委。7 月下旬，独三团、红四团与神木警卫连和神府六支游击队新编的红军独立一、二、三营合编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简称独立师)，王兆相任师长，张秀山任政委，李治洲任参谋长，王国昌任政治部主任，王海山任供给部长。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由原独三团改为第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邓万祥；原红四团改为第二团，团长贾兰枝，政委贺伟。全师 1000 余人，有轻机枪 20

多挺。不久，独立师又扩编了一个骑兵团，团长刘崇德，政委许法善。从此，开启了神府苏区抗日的新局面。

红二十八军离开康宁镇进入临县白文镇时，红军军委总部来电指示：为了配合南线东征部队进逼汾阳，威胁太原，靠近同蒲铁路，积极准备北上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并打通前方部队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命红二十八军立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晋军。

刘志丹接到电报后，立即率领红二十八军从白文镇出发，向三交镇挺进。在沿途，部队接连打败几小股晋军。

4 月 13 日，红二十八军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部队刚到留誉镇，接到彭德怀司令、毛泽东政委下达的消灭驻守三交镇晋军的作战命令。刘志丹接到作战命令，不顾疲劳，立即提上望远镜，爬上留誉镇的西山，观察三交镇方向的地形情况。

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的一个重要渡口，历来有“水旱码头”之称。镇子的南北两面环山，西面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原镇子上驻守的晋军一个营被红一军团歼灭后，阎锡山为重新占据河东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渡口，以截断红军退回陕北苏区的后路，派出一个团重兵进行反扑，又夺回镇子的控制权，并加强了镇上的防守工事。

三交镇的河西岸是陕北绥德、清涧两县苏区交界的界首村。刘志丹对随行的同志说：“越向南走，离中央红军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北苏区的联系。”

这时，一团送来一个从前方抓到的俘虏。刘志丹问了俘虏几个小时的话，甚至连晋军驻守三交镇一团中的军官年龄、嗜好都问得一清二楚。刘志丹掌握情况后，便匆匆返回留誉镇，根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与宋任穷共同制订了作战方案。

在留誉镇，军部召开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刘志丹全神贯注地静听着侦察科长介绍三交镇的敌情。当听到“敌人只有一个团，新兵又多，开小差的很多，战斗力很弱……”的话时，站起来严肃地说：“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我们千万不能轻敌，这是每个指挥员应切实注意的。要看到我们现在是

离开主力红军独立作战，周围都是白区，群众基础弱。我们对每一点情况、每个村庄的地形都要详细调查研究，客观地判断，任何麻痹疏忽都是不容许的。”

三交镇刘志丹牺牲

1936 年 4 月 14 日，这一天是西北根据地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

这天拂晓，红二十八军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部队指挥部设在三交镇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指挥部不远处，红二十八军一团向南山晋军守军发起进攻，二团向北山晋军守军发起进攻，三团为预备队，担任中阳县城方向的警戒和阻击可能前来增援的晋军。

刘志丹由于一个通宵没有合一眼，双眼充满血丝，但仍忙碌在指挥部里。随着战斗的枪炮声响起，刘志丹连警卫员几次送进的饭都忘记了吃，不是用铅笔在地图上标记号，就是在指挥部的窑洞里来回踱步，尤其是听到外面各个山头枪响之后，又静立侧着耳朵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似乎从杂乱的枪声中能辨出战斗进展的情况。

宋任穷

参谋长唐延杰劝道：“军长，你去休息一会儿吧，有事我叫你，这样你怎么受得了!”

刘志丹却回答：“不行啊，睡也睡不着，我们的战斗准备工作做得还是太不够，不得不操心啊。”

这时，唐延杰要到二团北山阵地去指挥战斗，刘志丹告诉唐延杰：“你去叫二团占了前沿阵地后，迅速向纵深发展，争取早和一团那边取得联系，两面夹击，不能让敌人喘过气来。”

唐延杰离开指挥部后，宋任穷政委从前沿阵地回来了。刘志丹听宋任穷说在南山进攻的一团，由于晋军守军占据有利地势，火力过猛，部队伤亡较大，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便让宋任穷留指挥部，他带着特派员裴周

玉、参谋和谢文祥等几个警卫员，亲自到一团阵地指挥战斗。

刘志丹到了一团指挥所，了解了一团战斗情况后，对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说：“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现在三交镇周围大部分阵地已经被我们占领，只剩下东北那个主要山头，敌人集中力量拼死固守，二团那边硬攻不易奏效，你们这面一定要设法积极主动，夹击敌人，使敌人士气动摇，我们好迅速地歼灭。”

为了战斗的顺利进行，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离开一团指挥所，提着望远镜，直奔伤亡最严重的一团二连前沿阵地。

二连的阵地在一个叫奥则圪土达的小山头，距晋军据守的寨子不到300米。寨子居高临下，守军凭借有利地势和坚固工事，还有一挺机枪，封锁了部队的前进道路。在寨子上，晋军不停地摇旗呐喊，气焰嚣张。二连大部分战士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前沿阵地上仅剩不足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着。

二连战士们一见刘志丹来到这最危险的前沿阵地，都异口同声地对刘志丹说：“老刘，我们离敌人太近，地势太低，目标太大，无法隐蔽，赶快转移吧!”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刘志丹好像根本就没听见一样。他伏在一个土坎后，沉着冷静地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身边的裴周玉说：“特派员，看见了吗?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等一会儿冲上去一定把它缴获过来，带给陕北老苏区人民作纪念。”

裴周玉

接着，刘志丹把随行参谋叫到跟前，手指着对面的寨子说：“你去告诉黄团长，要他组织突击队去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同时，分路向敌人的碉堡攻击。这样目标小，而且可以把敌人各个击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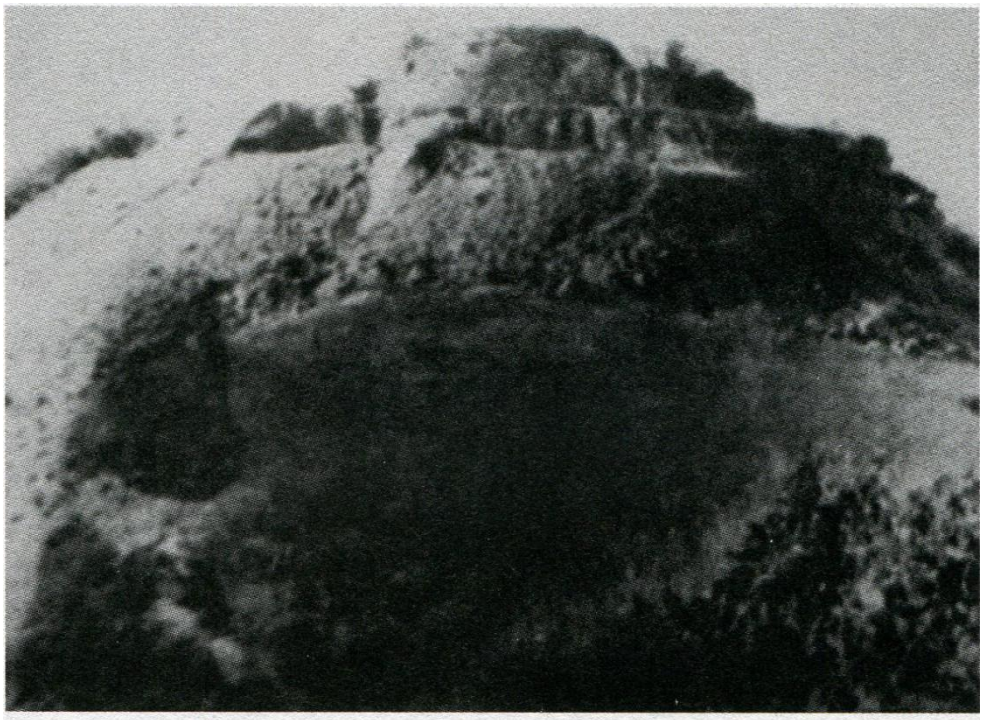
那个参谋领受任务后，即刻向一团指挥所飞跑而去。这时，这个土坎处只剩刘志丹、裴周玉、谢文祥三人。刘

志丹命令警卫员谢文祥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一支长枪，瞄准寨子上的守军射击。谢文祥的枪法好，一连将寨子上的守军打倒三个。

刘志丹迎风站在土坎的高处，把棉帽的耳扇用帽带绑起来，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不停地从衣兜里掏出唐延杰刚送的一块坏了表蒙子的旧怀表，看着战斗进行的时间。正当刘志丹将要指挥部队对三交镇晋军守军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寨子上的那挺机枪突然响起。由于刘志丹两手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来不及卧倒，只见他双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倒下去，裴周玉急忙抢上前去抱住他。

警卫员谢文祥立即将昏了过去的刘志丹背到隐蔽的地方。刘志丹的左胸部被子弹穿过，可能伤及心脏，伤口处虽流血不多，但面色迅速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当刘志丹清醒过来，仍以顽强的毅力断断续续低声告诉身边的裴周玉、谢文祥：“不要管我……快让宋政委指挥部队，消灭敌人……”刘志丹牺牲了，时年仅 34 岁。身边的战友们清点这位西北革命领袖的遗物，他的身上除衣服口袋里几份党的文件和六支香烟外，一无所有。

令人痛心的是，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刚到陕北，虽对西北代表团诬陷刘志丹“右派反革命”的罪名平了反，但至他牺牲之时仍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的帽子。



刘志丹在三交镇奥则圪垯山牺牲的地方

此次东征出发前，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牺牲的。”同时，同桂荣清晰地记得刘志丹在分手时还叮嘱说：“你要好好抚养孩子，让她将来好好念书，长大做个有用的人。明天早上出发，你带上力贞来送送我!”

刘志丹曾有多次出征，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让同桂荣母女为他送行。到第二天，因有一位老同志来访，耽搁了时间，当同桂荣母女赶去时，部队已开拔了，留给母女俩永久的遗憾。同桂荣在刘志丹牺牲后长久地回想着丈夫永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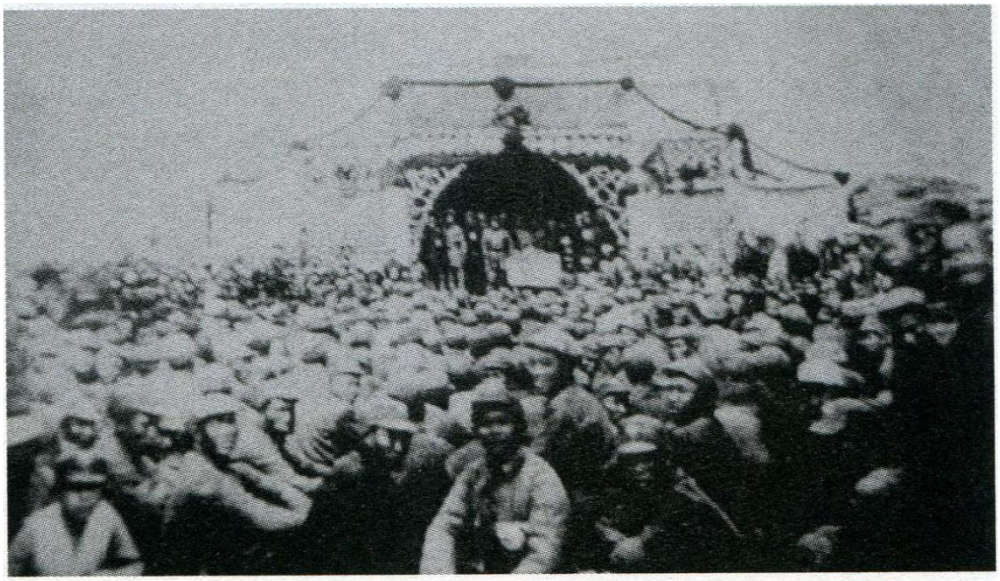
话语的沉重分量。事实上，直到 1942 年中共中央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错误，肯定了刘志丹是政治路线的代表，他才真正得到了彻底平反。

刘志丹牺牲的噩耗立即传遍红二十八军。全军上下无不为失去这位西北人民的革命领袖而痛哭流涕、悲愤万分，大家决心把悲痛化为力量，誓与晋军决一死战，为刘军长报仇雪恨。

当天黄昏，红二十八军向三交镇晋军据守的各个碉堡发起总攻，全体指战员个个怀着满腔仇恨，一杆杆枪口吐出愤怒的子弹，像猛虎一样拼命地朝着晋军阵地冲去。战斗进行得惨烈悲壮，经过一场血战，红军虽攻占了晋军大部分阵地，但由于晋军利用设在险要山头的制高点负隅顽抗，致使部队伤亡惨重，减员近半，全军仅剩 700 余人。入夜，因从中阳县城增援的晋军即将赶到，部队被迫连夜南撤到康城一带。

刘志丹在三交镇的突然牺牲，犹如晴天霹雳，对广大群众来说，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人们呼唤着敬爱的刘志丹：“老刘不能死，老刘不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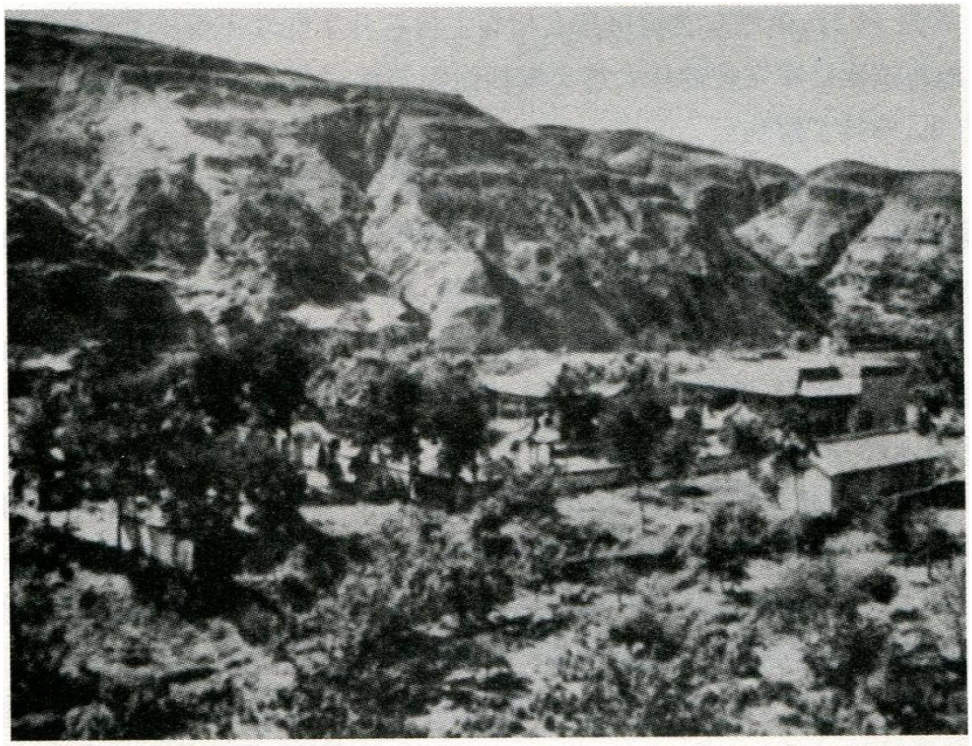
1936 年 4 月 24 日在瓦窑堡召开的追悼刘志丹烈士大会会场群众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深恶痛绝，许多人还没有从西北代表团所制造的那场赤色恐怖的阴影中摆脱，人们把刘志丹的死与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等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联系在一起，产生出种种质疑、揣测和传闻。



1936 年 4 月 24 日在瓦窑堡召开的追悼刘志丹烈士大会会场

4 月 20 日，刘志丹的遗体运回瓦窑堡。周恩来悲痛地流下泪来，对身边的同志说：“志丹是个好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

正患重病的同桂荣，听到丈夫刘志丹在东征前线阵亡的噩耗，立刻昏厥过去。



今志丹县刘志丹烈士陵园

4 月 24 日，中共中央及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红军代表和群众近 3000

人在瓦窑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博古先后致悼词和讲话。追悼会后，周恩来等亲自扶着灵柩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的一高坡之处。被担架抬到墓地的同桂荣，扑上棺木撕心裂肺地恸哭不止，在场的人无不?目如泉涌。同年，应广大群众之要求，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志丹县，以示永久纪念。

5 月 5 日，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三路东征部队全部从山西境内西渡黄河撤回陕北苏区。回师途中，红三十军担任后卫，参谋长杨森率两个连在三交镇完成阻击任务后被晋军包围。杨森在突围时不幸牺牲。这次东征，红军在山西境内虽遭到蒋介石、阎锡山派出重兵前阻后挡地进行拦截，未能达到北上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作战的军事目的，但红军在山西境内回旋作战十余县，毙俘晋军 4000 余人，扩大红军 8000 余人，筹款 30 余万，既显示了红军顽强拼搏的战斗力，又扩大了党主张抗日的政治宣传，并由于在许多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尔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5 月 14 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主持召开了红军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将这次红军东征的伟大意义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1943 年 5 月，刘志丹迁葬于保安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及李鼎铭先生等均为刘志丹陵墓题词。

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个好同志。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心间，不会磨灭的。”

周恩来为刘志丹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第八十五章

西进三边

高岗奉派赴伊盟

中共中央到达西北根据地后，由于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的干扰，高岗虽从狱中获释、平反，但与刘志丹、习仲勋等同样戴着“右倾取消主义”“对反革命自由主义”两顶帽子，实际上未能得到彻底平反和正确使用。

中共中央决定派贾拓夫到关中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当贾拓夫提出要高岗随行到关中军分区任司令员时，原西北代表团的人出面阻拦，甚至有人说高岗“没能力，做不了”。中共中央又设想让高岗任陕北省委书记一职，他们又在中央领导跟前嘀嘀咕咕说坏话。毛泽东气愤地说：“在实践中考验。他是真革命，会为抗战奋斗，为人民服务；是假革命，让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

高岗在瓦窑堡获释平反后，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先到各地了解陕北错误肃反造成的混乱局面，做善后稳定工作。当时，由于错误肃反余毒的影响，受历史条件和特殊环境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北代表团执行的“左”倾错误思想仍然禁锢着一些地方组织。

高岗奉命先后到赤源、靖边、横山等县了解情况，宣传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喜讯。当路经横山、靖边两县交界的麻城界区时，在区政府被关押的一群地主、豪绅中，高岗发现自己的高小同学谷奇峰、冯效章两人戴着脚镣也在其中。一打问才知道，原来横山国民党占领的白区里

有十几个青年要参加红军，推举谷奇峰、冯效章外出联系。谷、冯二人从白区跑到苏区找到区政府，满以为打出“高岗同学”的牌子定能如愿以偿，谁知那时高岗正被西北代表团以“右派反革命”关人瓦窑堡监狱，区政府一听说他们是高岗的同学，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俩关押起来。当时，国民党军队趁着西北代表团在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制造的混乱局势，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迫使区政府经常转移，居无定所，谷、冯二人以“反革命”嫌疑分子随着被关押的地主、豪绅一起转移了许多地方。幸得高岗在这里碰上，否则他俩还不知要被关押到什么时候。谷、冯二人被释放后，才实现了参加革命的愿望。

刘志丹、宋任穷率北路军攻打横山县城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的伊盟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高岗被任命为伊盟工作组组长，与张爱萍带着一个新组建的骑兵团，前往内蒙古开辟新区。当时，这个骑兵团名为中共中央军委直属陕北骑兵团，其实初期只有几十个人、20 多匹马，要扩充队伍还要靠自己，武器得从国民党军队的手里夺。用马文瑞 1942 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发言中的话说，实际上像苏武牧羊，把高岗“流放到沙漠草地”。

1936 年 2 月，高岗、张爱萍带着骑兵团先开到靖边县张家畔、龙洲一带活动。不久，与曹动之、吴亚雄带着的蒙汉骑兵游击队(亦称二十二支队)合兵一处，又从郝玉山、马腾保的游击队里调来一些人马和武器。当时，在张家畔驻守着傅作义的一支骑兵部队和一个民团。傅作义的骑兵部队因统一着黄色军装，当地群众称为“黄马队”。黄马队一听高岗的骑兵团进入靖边县境寻机与其交战，即不战自退，慌忙逃回绥远。

3 月中旬，高岗、张爱萍带领骑兵团和蒙汉骑兵游击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将孤守张家畔的奕幼樵、奕振兴民团包围。这个民团见傅作义的黄马队逃回绥远，人心惶惶，个个怯战，自寻保命。部队向寨子一发起攻击，无心恋战的民团就放弃抵抗，红军很快打开寨子，击毙团总奕幼樵、奕振兴以下数十人，缴枪 30 余支，部分团丁仓皇逃往柠条梁。

骑兵团攻占张家畔后，以张家畔为后方立足点，向内蒙古伊盟地区扩展。当时，在靖、横交界的黄大梁驻守着杨启荣、高怀德、白玉春的民团，

直接威胁着骑兵团进入伊盟地区的北上通道。为了扫除红军北上障碍，高岗决定拔掉这个民团据点。

黄大梁寨子修筑在杨家沟村的山梁上，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一天，杨启荣派其弟杨三去横山县城买东西，吴亚雄得到情报后，即派人从半途抓获。

当晚，借着月黑风高的夜色，高岗带领骑兵团和蒙汉骑兵游击队摸到黄大梁寨子下。蒙汉骑兵游击队押着杨三，吴亚雄用枪顶住杨三脑袋逼着叫开寨门。寨子上的吊桥刚落地，吴亚雄带着的骑兵战士一拥而入抢占了寨门，高岗、张爱萍带领骑兵团紧随其后攻人寨子里。这时，寨子里的民团团丁正睡得像死猪一般，一个个在被窝里当了俘虏。活捉高怀德、白玉春后，当即在寨子里镇压，只有杨启荣一人脱逃。

攻占黄大梁后，骑兵团和蒙汉骑兵游击队又相继攻占了掌高兔、雷龙湾、巴兔湾、纳泥河等地区，拔掉国民党在陕蒙交界的十几个驻军据点。在这一带恢复和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发展中共地方组织，扩大红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高岗乘胜带领骑兵团和蒙汉骑兵游击队很快开往内蒙古伊盟的乌审旗境内。

红军进入乌审旗地区后，在沿长城的思家洼，由高岗主持成立了第一个乌审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乌审县委，田万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赵成书任县委书记。

成立乌审县政府的情况上报后，中共中央立即命令撤销乌审县政权，认为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改旗为县是大汉族主义的做法，会引起蒙古族群众对共产党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指示在“蒙人中主要策略应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不急于赤化蒙地，意义在于使其成为一个缓冲地带以应付敌人……要把乌审旗作为一个模范”。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随即将乌审县政府撤销，原中共乌审县委改为乌审旗工委，受到蒙古族同胞的一致好评。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促进了蒙古族贵族和群众对共产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

在乌审旗王爷府有一个副官叫奇国贤，诚心想投靠红军，通过共产党员张金贵引荐来到骑兵团驻地，受到高岗的热情接待，奇国贤与高岗、张

爱萍、曹动之、吴亚雄、田万生等歃血结盟，拈香结为拜把子弟兄。奇国贤离开骑兵团驻地回王爷府时，将一匹大青鬃马赠给高岗留作坐骑。高岗代表骑兵团回赠奇国贤一头骡子、两支马枪和一些子弹。奇国贤对高岗说："草原上的人最善于识别狼和羊，成吉思汗的子孙懂得怎样与朋友交往。"

奇国贤回到乌审旗王府后，按照高岗交给的任务，向王爷奇德山和其部下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统战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高岗、奇国贤先后争取到王府保安部队副团长奇金山和保安部队中队长王悦及奇国华、营长那素等投身革命，并在后来拉出一个团的兵力，成为开辟乌审旗根据地的一支民族革命队伍。同时，在奇国贤的鼓动下，先后有赵玉山、存根等一批蒙古族牧民走上革命道路。

3 月下旬，高岗返回到横山县波罗开会，由张爱萍率骑兵团北开时，在胡石窑沟被国民党响水、党岔的驻军 500 多人包围。骑兵团奋起反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因敌我力量悬殊，且骑兵团在小山沟里无法展开作战，终被打散。

部分被俘的骑兵战士在被押送榆林途中夜宿鱼河堡镇。深夜，战士们将捆绑的绳子挣开，砸破门窗，打死看守士兵，脱险归队。

油房头战斗

1936 年 3 月 10 日至 16 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

这次代表会上，选出执行委员会执委 49 人、候补执委 10 人，选举马明方为主席，霍维德为副主席，艾楚南为财政部长，惠子明为经济部长，王海山为土地部长，罗成德为裁判部长，祁明珍为劳动部长，霍维德兼工农检查部长，高旭光为粮食部长，郭青廷为教育部长，钟赤兵为军事部长，刘子义为保卫局长，陈蓬飞为秘书长。

3 月 13 日，正当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第二次代表会期间，国民党横山驻军马志昌、方鸿成偷袭了横山县郑家梁七区苏维埃政府，将王月虎、胡振荣、胡斌等 11 名同志杀害。同时，国民党军队对米西、横山苏区发动了"围剿"。由于形势恶化，米西、横山党政机关被迫转移，人员转入地下进行斗争。

4 月 22 日，米西游击队和横山红二支队进入横山县，准备攻打国民党高镇驻军，当晚宿营在距高镇 10 里地的油房头。

油房头坐落在一条大沟的东西两个土坡上。西坡上建有一座天主教堂，坡下是平展的河滩，天主教堂附近是游击队的驻地。村里有个大地主叫侯宪德，偷偷打发人向高镇驻军报告了游击队的行踪。

次日拂晓，国民党高镇驻军倾巢出动，赶来油房头偷袭。此时，正好有一妇女早起出门，在蒙蒙天色下，发现河滩上有黑压压的人群朝村西坡方向跑来，并有手电光。这名妇女惊慌之中大声喊叫：“白军进村了，快跑!”

这时，放哨的战士也发现敌情，举枪朝着河滩上连放两枪，有一个士兵中弹倒地。顷刻间，从河滩上发出密集的枪声，一排排子弹扫射到天主教堂附近。游击队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战士们在睡梦中被激烈的枪声惊醒，立即提枪冲出窑洞，抢占西山梁最高地势。

游击队虽然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势，但因火力组织不好，且国民党军队又四面包抄截断退路，部队被分割包围在莫阴畔、七层月、新庄塙 。被包围在莫阴畔的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的激战，终因敌我悬殊，寡不敌众，被逼进一个四面峭壁的洪水沟。

这一仗，米西游击队政委白云祥、副队长拓世发等 30 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横山红二支队队长陈应福等十余人被俘。史称“莫阴畔事件”。

开辟三边根据地

1936 年 5 月，红军东征回师陕北苏区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剿共”政策，调集汤恩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十一师、第四师，晋军陈长捷第七十二师，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井岳秀第八十六师等共 30 多个团约 6 万之众，对陕北苏区红军发动新的“围剿”。“围剿”重点指向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安定、赤源几县。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将红军主力组成西征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挺进，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扩展和壮大红军。中共陕北省委根据局势变化，在陕北省成立中共东地区特委，由戴季英任书记；成立东地区办事处，由王海山任主任。

同时，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宁省委，由李富春任书记。当时，由于中共关中特委所辖的中宜、郝县、甘泉等县大部分地区被东北军占领，中共陕甘省委被迫北迁靖边县一带，中共中央为了集中地方红军游击队，形成优势力量，统一指挥，阻截南线东北军的不断进犯，决定撤销中共陕甘省委，将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司令部划归中共陕北省委领导。一直到 12 月，中共陕甘省委重新恢复成立后，中共关中特委、关中特区司令部才又划归中共陕甘省委领导，由李维汉任省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书记，张仲良任特区司令部司令。

5 月 18 日，中央红军军委总部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及骑兵团等 15000 多人组成西征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野战军开拔之际，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延川县太相寺联合发布《西征战役计划》。

西征野战军分成左右两路，由延川一带出发。左路军以红一军团为主，8000 多人，由左权、聂荣臻指挥，经永坪、蟠龙，从吴起镇向西挺进；右路军以红十五军团为主，6000 多人，由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经安塞、靖边、保安一线，向三边挺进。右路军途经靖边，包围了小桥畔民团，民团不战白降，打开寨门迎接红军。

5 月 27 日，红十五军团在高岗所率骑兵团的配合下，挺进靖边县的柠条梁。柠条梁是红军右路军西进的咽喉要道，国民党派有重兵把守。红十五军团和骑兵团与国民党柠条梁守军经一场激战，一举攻克柠条梁，首战告捷。

红十五军团和骑兵团旋即乘胜西进，包围了安边城。安边城是张鸿儒、张廷芝父子的老巢，碉堡林立，城防严密，工事坚固，红军几次攻打未克。

6 月 1 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七十五师撤出安边城外阵地，向定边县西南挺进，攻占了国民党定边守军的外围据点红柳沟。

6 月 6 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至定边之问地区是西北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 7 月半以前初步赤化。同时，电令红二十八军组成西征野战军中路军，即调北出，挺进三边，配合左、右两路红军部队西征。

6 月 17 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率领下，一举攻克定边县城，全歼国民党守军 350 余人，缴获大批枪械武器并得骡马 180 余匹。红军开进县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全城群众欢迎。

6 月 19 日，红二十八军在新任军长宋时轮和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接防定边县城。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和高岗所率的骑兵团挥师北上，直指宁夏盐池县城。

定边县位于陕、甘、宁、蒙四省区的要冲，在战略位置上尤为重要。为把定边县建成红军西出甘肃，北上宁夏、内蒙古地区的大后方，红二十八军接防后随即成立了中共定边县委、定边县苏维埃政府，刘悠安任县委书记，王文英任政府主席，隶属中共陕甘宁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管辖。

同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与高岗所率骑兵团北上进入宁夏境内，包围了盐池县城。部队一到盐池县城下，立即发起攻城战斗。

盐池县城工事坚固，防守严密，易守难攻，城内守军一个营，还驻有一个民团和一个县警队。激战两小时，因国民党城内守军借以城高壕深，火力猛烈，红军未能攻克。韩先楚、崔田夫、高岗决定停止盲目强攻，避免造成部队大的伤亡，即改变战术，对县城连续三天围而不打。

6 月 21 日，待红七十八师和骑兵团选好地形、摸清盐池城内各火力设置点后，集中火力向县城发起攻击，一举攻人县城，歼俘国民党城内守军一个营、一个民团和县警队等近 1000 人，缴获战马 200 余匹和大量枪械弹药及物资，还获一部电台，击毙了守军营长孙兆祥和县公安局长。

同日，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张云衢部从横山县石湾出发，步步向安定县逼近。中共中央瓦窑堡机关驻地的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迅速离开瓦窑堡，向西撤退，经前滴哨、石家坪、凉水湾、真武洞等地，后转移到保安县境内。

6 月 22 日，第八十六师张云衢部人占瓦窑堡城。三天后，在肤施县城的东北军一部赶走张云衢部，进驻瓦窑堡。留守安定县的县委书记李合邦和苏维埃政府主席强晓初带着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转入地下，先后组建起安定县西、南、中三区三支游击队，与进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周旋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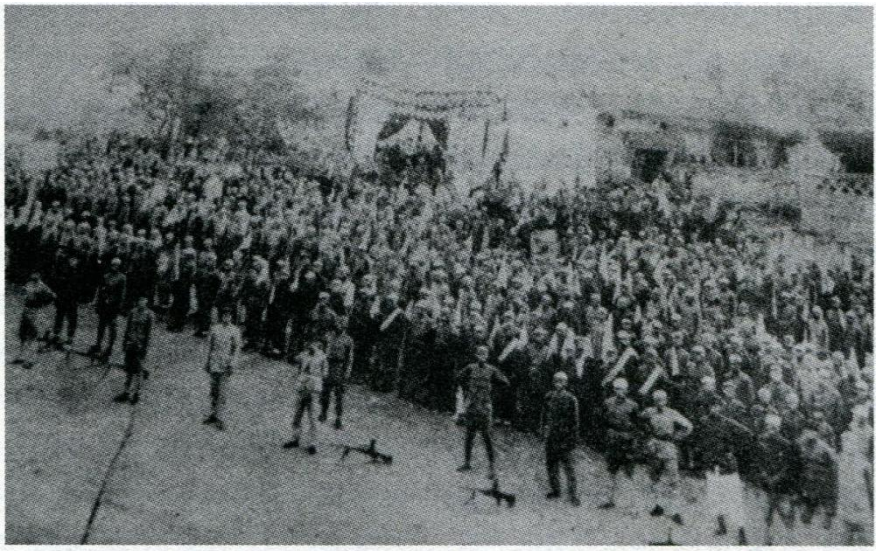
在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重兵“围剿”之下，米西苏区大部分相继丧失，吴堡、绥德、清涧、延川等县的苏区沦陷，陕北苏区进入新的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

中共陕北省委根据国民党军队向陕北苏区的“围剿”之势，在陕北清涧苏区成立了东地区游击司令部，由黄罗斌、慕生忠、赵启明先后任司令，统辖吴堡红军独立团(团长柴福俊，政委慕生忠)、绥清红军独立营(营长雷高楼，政委惠艾琛)、米西红军独立营(后改编为米西游击司令部，由惠子俊任司令兼政委)、横山红军独立营(营长薛兰洲，政委杨子珍)等地方武装。

在陕北神府苏区成立了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王兆相任总指挥，张秀山任政委，统辖神府红军独一师及吴堡、米东两个红军独立营。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王兆相、张秀山带领地方红军南援葭县、吴堡两县，与黄罗斌带领的地方红军，共同与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周旋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省委为了阻击南线东北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在洛河川成立了陕甘南路军指挥部，由曹力如任总指挥，欧阳钦任政委，统辖三个红军独立营和十几支游击队，坚持活动在甘泉、中宜、鄜县、甘洛等县边界地区。

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陕北东地区游击司令部和陕甘南路军指挥部所辖的地方红军部队，虽然与国民党军队奋勇作战，并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打乱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部署，但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之后，始得停止。



神府苏区抗日红军独立第一师庆祝八一大会会场

6 月下旬，中共安边县委在新安边成立，由慕纯农任县委书记，李维军任组织部长，师文灿任宣传部长，刘占良任统战部长，耿全胜任军事部长，贺春华任少共部长，刘克仁任工会主席，萧志珍任妇女部长。中共安边县委隶属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接着，成立安边县苏维埃政府，王兆英任主席。

至此，除张鸿儒和张廷芝父子的老巢安边城、阎家寨子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外，三边城乡一片红。阎红彦、蔡树藩率领红三十军转战到靖边县，驻守新城、乔家湾、崔界等地，主要任务是消灭土匪、地方民团和国民党军队的残留据点，保护和巩固三边苏区，配合党政机关干部发展新苏区。

7 月，中共中央在定边县成立蒙民工作委员会(简称蒙工委)，由高岗任主任，贾拓夫任巡视员。同时，派出由毛泽民、毛齐勋、秦力生、白茜、张玉英、曹建勋、张德生等组成的中央巡视团，到三边一带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指导各县党政组建工作，并决定将中央党校从保安县迁至定边县，由董必武任校长。

中共中央把三边作为新的后方基地，成立蒙古游击队指挥部，任命高岗为司令，再率骑兵团和曹动之、吴亚雄的蒙汉游击队，从定边县出发，向内蒙古鄂托克旗挺进，开辟绥蒙后套新的抗日根据地。骑兵团进入绥蒙后套地区，积极在蒙民中开展“抗日保蒙”“抗日救国”宣传，很快建立中共鄂托克旗工委，先后由金生华、张生智任书记。

高岗率骑兵团北上，转战到内蒙古鄂托克旗后，派出周仁山、田万生、曹步诚、慕生发等进出王爷府、喇嘛庙，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促成阿拉庙大喇嘛、鄂托克旗王爷、保安司令章文轩与红军达成不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的协议：一是相互来往，有事商量；二是章部允许共产党在鄂托克旗成立抗日救亡组织，发动和宣传抗日；三是章部允许共产党在汉人地区征收抗日公粮，杜绝保安部队挑衅事件；四是双方协议条款，对国民党方面严加保密。

毛泽东对高岗领导绥蒙工作的成绩曾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干革命，就要高岗这样的同志。”

9 月，中共中央决定进兵宁夏，夺取银川，把三边根据地向西北扩展。

同时，派出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前往定边县，组建了中共定边工委(亦称三边工委)，由李维汉任书记，高岗、宋任穷、贾拓夫、宋时轮为委员。

在定边、盐池一带成立了定边回民游击队(亦称回民救国军)，由马怀蔺任司令，李静波任政委，下辖两个支队。这支回民游击队成立不久，因战斗失利，游击队中少数队员受敌特分子的反动宣传和挑拨离间，于 1937 年 2 月叛变，该游击队遂解散。

9 月 22 日，中共新城县委在靖边县杜元峁正式成立，由白凤章任书记，白玉华任组织部长，吴长瑞任宣传部长，袁宗清任军事部长，白振武任统战部长，姬桂英任妇女部长。同时，新城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由王宝贤任主席，隶属中共陕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

10 月初，中共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领导三边工作，成立了中共三边特委，由张德生任书记，朱协辉任组织部长，贺级三任宣传部长，揭俊勋任团特委书记，高岗任军事部长，白茜任妇女部长，钱希钧任特委机关总支书记。三边特委下辖定边、安边、盐池三县，隶属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

10 月下旬，在定边县召开了蒙、回、汉三大民族联谊盛会。与会各族代表一致表示：亲密团结，驱逐日寇，为争取中国独立和各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奋斗。

第八十六章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打开甘肃、宁夏西大门

由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组成的西征野战军左路军，在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从吴起镇集结后，直向甘肃环县方向隐蔽前进。这时，习仲勋已从关中调回陕甘宁省委，随左路军行动。

1936 年 5 月底，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进至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咽喉要道，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也是西征红军要夺取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曲子镇，方圆约一公里，四周筑有两丈高的土城墙，设有碉堡，垣外有环城壕沟深达丈许。当时，城内驻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一〇五旅一部和环县保安大队王占英部共 300 多人。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是个大个子，十分剽悍，外号“野骡子”。冶成章为堵截红军西进，亲自带着一支骑兵队进驻曲子镇坐镇指挥。

6 月 1 日下午 3 时，红军突然将曲子镇四面包围，并向镇子发起猛烈攻击。镇子里的守军猝不及防，红军在镇子的城东南角很快打开一个缺口，一部奋勇冲进镇内，但由于缺口太小，部队无法全面展开兵力，战斗进展缓慢，形成对峙之势。

左权、聂荣臻亲临指挥，适时调整作战部署，红军大部队勇猛战斗，迅速攻占了曲子镇。晚 10 时许，战斗全部结束，俘获顽抗负伤的旅长冶成

章，毙、伤守军 100 多人，余部全被俘虏。

环县解放后，中共曲环工委即告成立，由习仲勋任书记。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来电指示：“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

左权、聂荣臻遵照中央首长指示，为了与马鸿宾第三十五师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不但对被俘的冶成章等负伤军官积极治疗，进行抗日思想教育，而且把他们相继放回宁夏。冶成章被送回宁夏后，便脱离了马家军，对党在回民军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6 月 3 日，红一军团从曲子镇出发，在马岭、阜城歼灭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步兵六个营，击溃骑兵两个营，俘副营长、连长以下 1100 余人。接着先后占领木钵、洪德等几个城镇，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通向甘肃、宁夏的西大门，迫使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困守区内，轻易不敢出兵和红军较量。

马岭、阜城战斗后，红一军团继续向西挺进，进入宁夏的固原、海原地区。当时，周恩来与张学良已举行“肤施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等问题达成共识，议定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

在固原一带驻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何柱国虽得到张学良电令，要求避免与红军发生摩擦，停止与红军作战，但仍无视红军的力量，曾派出骑兵部队向红军挑衅。红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一举打掉其四个骑兵连，何柱国才与红军趋于友好。7 月，红一军团与何柱国的骑兵第六师正式签订停战协定，使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得以稳固。

8 月间，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长征顺利北上，在甘宁边界的七营、清水河一带，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和高岗所率的骑兵团与左权、聂荣臻率领的左路军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会师。

红军左、右两路西征野战军会师后，又继续挺军向西运动。整个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左、右、中三路野战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三个团，俘获 3000 多人、枪 3000 余支、战马 500 多匹、银洋 45000 块，扩大了红军 800 多人，解放了环县、定边、张家畔、柠条梁、豫旺、同心、花马池、盐池等城镇，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 700 多里的新苏区，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合逼蒋抗日

1935 年 11 月，中共北方局为实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与西北红军停止内战，双方达成一致抗日的共识，指示南汉宸通过与杨虎城的个人关系做统战工作。南汉宸在 1932 年因受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被迫辞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一职，辗转到天津、上海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这时，杨虎城去南京，南汉宸即派申伯纯会见杨虎城，向杨虎城介绍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建议双方合作抗日。当时，杨虎城虽心存疑虑，但表示了赞同。

12 月 5 日，毛泽东派汪锋携带其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从陕北瓦窑堡出发，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商谈双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事宜。汪锋经长武县到西安后，先后三次与杨虎城会谈，在杜斌丞、邓宝珊的促成下，消除了杨虎城对共产党的误会和不满，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

1936 年 2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 20 人以红军将领的名义，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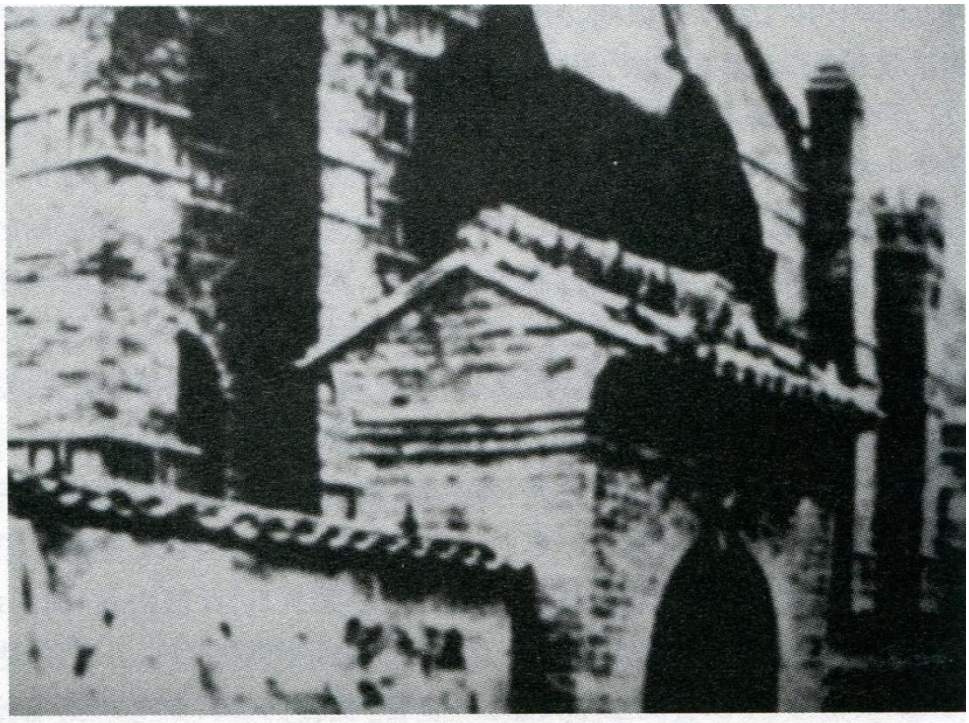
时隔一月，中共中央派出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五人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到洛川，与张学良委派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东北军广大官兵接受了中共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抗日，反对内战”的倡议，就红军与第六十七军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合作问题进行了协商，并达成口头协议：政治上，王以哲同意中共《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要求；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经济上，王以哲部放开几个口子，以利红军给陕北、陕甘苏区运输物资。

3 月 20 日，有个叫刘鼎的人从上海抵达西安，在张公馆面见了张学良，从此成为坚定张学良联共抗日主张的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据史料记载，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县人，1923 年参加共青团，1924 年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入共产党。早年留学法国和苏联，1929 年曾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任特科二科科长。1936 年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洛川会谈后，张学良接待了老朋友董健吾。张学良毫不隐讳地说：“我已向李克农指出希望中共派一

相当负责但不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我和各方面联系。”并恳求董健吾帮助在中共方面寻找合适的人选。

董健吾回上海后，将张学良的迫切要求报告了宋庆龄。当时，刘鼎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负伤，正在上海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养伤，被宋庆龄选中。从这时起，阚尊民化名刘鼎。董健吾将刘鼎的情况转告在上海的东北军旧部、原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经李杜的介绍，张学良派所部高级参议赵毅前往上海，将刘鼎从上海迎接到西安。



肤施会谈时的天主教堂旧址

4月，蒋介石部署在东、西、北三线的国民党军队步步向陕北苏区逼近，多次严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从南线向北进攻，张学良、杨虎城均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王以哲的部分东北军占据肤施县城，与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近在咫尺，却无烽火硝烟之迹象。

4月8日，张学良在西安发电，邀中共派人前往肤施县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从瓦窑堡出发，到肤施县面见张学良。次日晚，张学良、王以哲和刘鼎从西安乘飞机抵达肤施县。

当天夜里，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一行在肤施县城外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双方在坦诚的氛围中就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达成共识，并对逼蒋抗日的可能性进行了具体分析，通过讨论达成

协议：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以及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

会谈结束时，张学良慨然表示：“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恩来也恳切相答：“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

这次会谈史称“肤施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在西北地区实行抗日大联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肤施会谈”后的当天，刘鼎随周恩来一行回到瓦窑堡。三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做张学良和东北军联共抗日工作。临行，周恩来对刘鼎说：“中央派你去当代表，这对党和军队都很重要。你与张学良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要推动这种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你要忠诚地帮助张学良培养干部，有了抗日的干部，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抗日的部队，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好。”

刘鼎从瓦窑堡返回西安，张学良十分高兴地对刘鼎说：“今后你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

至此，刘鼎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军抗日义勇军代表，实际上成为张学良的随从秘书，住入张公馆东楼。张学良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长安县王曲镇办起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亲任训练团团长；在东北军中建立了由张学良、刘鼎、刘澜波等组织的“抗日同志会”，形成东北军中的核心骨干；把一大批“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从北平来到西安的400多名爱国青年招入由孙铭九兼队长的学兵队。

不久，为加强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共洛河川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此后，中共陕甘省委撤销，建立了中共陕甘工委，欧阳钦任书记。陕甘工委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这时，中共中央派由杨虎城资助到德国留学后回国的共产党员王炳南

到西安，在杨虎城部做具体统战联络工作。经王炳南向杨虎城陈述利害，并受周恩来与张学良“肤施会谈”的影响，中共与杨虎城达成协议，双方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西北军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西北军等。从此，中共与西北军确定了全面合作关系，并由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

据有关史料记载，有一次张学良在王曲镇太师洞时心绪烦乱地对刘鼎说：“我想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

刘鼎感到很突然，问及原因。张学良说：“我面前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毒蛇还毒的中央军，两面都在迫害我呀!我的队伍里矛盾重重，有些人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难。干脆我们和你们合在一起，将会大有作为!”同时，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催促刘鼎说：“请你向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派飞机送你去肤施，回来时，我在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他们的意见。”

张学良

7月初，刘鼎在张学良的授意下乘机飞抵肤施，徒步到安塞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克农等。刘鼎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毛泽东说：“我们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他们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要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的阵营中来。”并对刘鼎嘱咐说：“劝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究策略，不要太刺激蒋介石。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刘鼎回到西安，把中共的意见转达给张学良。张学良接受了这些意见。

此间，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由北

平经西安“闯入”陕北苏区。这名美国记者历经四个月，行程3000多里，走遍苏区各地，被采访者上自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下至战士和百姓，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离开陕北。于次年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一书，在美国发行，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富有神奇色彩的红军是战无不胜的军队。

7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蒋介石在英、美的压力下，对日本态度有所改变，并表示不能在日本强迫国民党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上签字认可。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中统特务机关的便衣特务在西安西北饭店，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东北民众救亡会负责人宋黎。在押送途中，幸遇杨虎城部宪兵巡逻队，将宋黎和便衣特务一起带回营房。张学良闻讯十分愤怒，立即派人将宋黎接回，并派军队包围了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和机密材料，缴获了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东北军300多人的黑名单。

事后，张学良立即致电蒋介石，说明特务所捕人员并非共产党，而是一般职员，并认为省党部不经与他商量即擅自捕人，是对自己的极不信任；同时表示，查抄省党部不无急躁鲁莽之处，“自请处分”。史称这次事件为“艳晚事件”。

蒋介石对此一事件非常气愤，认为如不设法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势必演变成一场叛乱。但因这时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两广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并挥师北上，与国民党政府形成对立，蒋介石一时无暇顾及西安。待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于10月22日急忙飞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出兵陕北“剿共”。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明确口号由过去的“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9 月 22 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抗日救国协定》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1935 年 11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恼羞成怒，纠集 100 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将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包围，妄图一举歼灭。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率领下，被迫从湖南桑植镇突围，开始了艰苦转战的长征。

1936 年 1 月 12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撤销另立的“党中央”。与此同时，到达毛尔盖后，随张国焘率领的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对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对张国焘严正指出：另立“党中央”和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中共中央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曾以“枪毙”威胁朱德，逼他发表反对毛泽东、反对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朱德大义凛然，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反毛，大家都认为朱毛一个人，哪有朱反毛的!”

贺龙（左）、任弼时（右）、关向应（中）合影

6 月 6 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带着部队南下战略方针的根本错误及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的不利，红四方面军转战数月，经天全、芦山和宝兴地区，向西败退康边甘孜，原 8 万之众仅剩 4 万余人，引起红

军全军上下将士的一致不满，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强烈反对。在中共中央和苏联归来的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另立的“党中央”。

7 月 2 日，经云南石鼓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甘孜，经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和说服，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张国焘放弃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由红二、六军团改编的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会宁城

10 月，由中共中央派出聂荣臻、左权等率领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从陕北西征人甘。在甘肃会宁县(今属宁夏)，红二、四方面军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三大长征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历经两年的全国红军的伟大长征，在会宁县胜利结束。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此会宁城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原 30 万人减少到 4 万人左右，红军从原 30 万人减少到不足 3 万人，但这些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华。

至此，统一的中共中央红军军委组成，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同样，历史也见证了中共陕北、陕甘组织和西北红军所创建的西北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历史性的伟大贡献。每当人们回顾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道路时，就会解读出中共陕北、陕甘组织和西北红军创建的西北根据地在党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

10 月下旬，中央红军军委为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命令红四方面军两万多人编为西路军，由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

委，李卓然为总政治部主任，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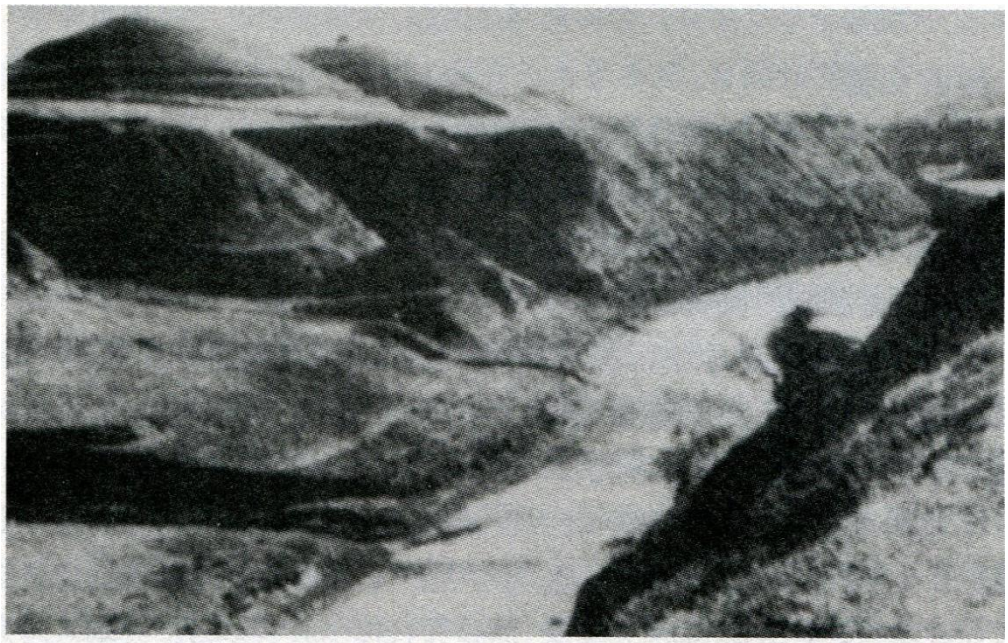
宁夏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后，这支西路军深人河西走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孤军奋战，董振堂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两路继续转战：一路由李先念等领导的 700 余人，经陈云、滕代远营救进入新疆，后返回到肤施；一路在祁连山地区进行了一段游击战争，仅部分人员陆续回到肤施。

西路军总支队骑兵队干部合影

据史料记载，张国焘长征到西北根据地后，中共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 年 4 月 4 日他提出要祭祀黄帝陵，临行时只带了自己的一个叫张海的警卫员。途中，当发觉张国焘要背叛党、去西安投降国民党时，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都不愿意跟着走，毅然决然地表示反对这种可耻的叛党行为，策马背道而驰返回肤施。张国焘到西安，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据说晚景凄凉，1979 年 12 月 3 日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的医院。

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县胜利会师后，蒋介石十分震惊，急命胡宗南的嫡系中央军为主力，从西南线直插甘肃，马鸿逵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第三十五师从西北线推进，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从东南线配合截击，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企图将三大主力红军一举歼灭在会宁地区。

张学良、杨虎城得到蒋介石进攻会宁地区的作战命令，当即秘密派人向中共中央传递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并申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有停火协定，虽有佯装进攻之举，但绝不会与红军发生冲突，建议中共尽快发起宁夏战役，打通与苏俄的联络通道。



山城堡战斗遗址

中共中央根据得到的情报，决定把进入会宁地区的胡宗南中央军作为重点打击目标，以挫其锐气。会宁地区地处高原，是个干旱地区，许多村庄没有水源，家家户户终年将雨水和雪水蓄到地窖里，供人畜用水。要找到水源，只有山城堡一处。山城堡地势险要，易于重兵设伏。红军发动群众把每个村庄的水窖子埋掉，逼使胡宗南的中央军为找水源，进入红军在山城堡张开的口袋阵。

11 月 21 目，胡宗南的中央军首当其冲，进入会宁地区。士兵得不到饮水，干渴难忍，听说山城堡有水源，像渴极的羊群一样，直奔山城堡的水源地。当时，胡宗南的中央军气焰嚣张，而且胡宗南本人也急功近利地想要在蒋介石面前表现，与红军作战心切，孤军深入。一进山城堡，胡部就陷入三大红军主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胡宗南急呼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赶快前往救援，而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虽有增援行动，但援兵故意行进缓慢。三大红军主力利用充足的战机，四面出击，在山城堡歼灭胡宗南中央军两个旅。

这一仗是三大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与国民党军队的首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西安事变

1936 年 11 月，上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史称“七君子事件”，激起各界强烈的愤慨和抗议。

同月，傅作义率北方国民党军队对进犯绥远的日伪军展开了坚决的抵抗。在绥远的抗战前线，全军浴血奋战，击败日伪军的联合进攻，收复百灵庙等处失地。傅作义英勇抗击日伪军之壮举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必胜信心。

12 月初，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陕甘一带“围剿”红军屡遭失败，且受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停止交战，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要求。蒋介石拒绝了张、杨的要求，并调嫡系部队约 30 个师至豫陕边境，逼迫张、杨进攻红军。

12 月 4 日，蒋介石坐飞机亲临西安，住入临潼县华清池督战，并让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 20 余名高级军政大员也到西安聚合。张、杨二人在非常险恶的情况下，要求联共抗日，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12 月 9 日，西安学联和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机会，发动西安学生举行请愿活动。西安近万名大中小学学生的浩荡游行队伍向张学良、杨虎城及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请愿。张、杨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呼声，蒋介石却下令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打伤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学生，激起学生们的强烈愤怒。学生游行队伍决定徒步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一边调派武装宪兵到西安十里铺，枪炮高架，摆开一场大屠杀的架势，一边给张学良打电话，令其设法制止。

张学良接到命令，立即驱车追赶，直到灞桥追上游行的学生队伍。张学良尽力劝阻，言明学生如去临潼，一定会发生流血惨案，但学生们不听，表示不到临潼誓不罢休。张学良为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感动，表示：“我张学良是国家的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作答复。”

张学良将学生劝说回城后，随即赴临潼向蒋介石报告学生请愿情况，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训斥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12 月 11 日，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召开军事会议，决定 12 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如果张、杨不服从命令，就解除职务；同时按照名单逮捕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张学良连夜驱车返回西安，直奔止园与杨虎城商议，并决定即刻发动兵谏，分头紧急准备。

12 月 12 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发动兵谏。在兵谏行动之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新城大楼会议室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完临潼捉拿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后，张学良请刘鼎代表自己起草了一份致中共的电文。电文云：“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迨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代表前来共商大计。”电文经张学良审核后，嘱刘鼎即刻发往在陕北的中共中央。

张学良的卫队营奉命闯入临潼县华清池。蒋介石听到枪声，从五间厅向后山逃跑，躲藏在一块周围长满荒草的石头后面，于次日拂晓被东北军搜山时发现。张、杨将蒋介石接到西安新城黄楼。

张学良的卫队营在临潼华清池行动的同时，十七路军按照杨虎城的部署，赵寿山指挥各部在西安城内、城外也开始行动，按计划扣留了住在城内的陈诚等军政要员和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西郊机场的数十架飞机，解除了宪兵队、警察局和保安团的武装，控制了城内外的局势。

同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改组独裁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全国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召开救国会议、一致抗日等八项救国主张。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一片混乱。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置蒋于死地，伺机夺取蒋介石的权力。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中心的亲英美派，则主张谈判救蒋，以免政权落入亲日派手中，危及英美在华利益。根据地军民基于爱国义愤，杀掉蒋介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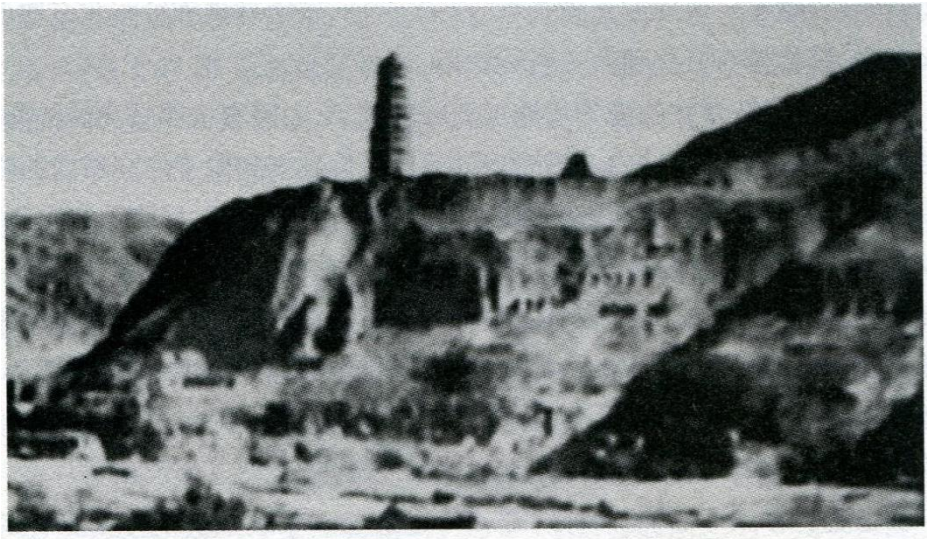
呼声很高。

中共中央认为，杀掉蒋介石，势必引起新的内战，那只能有利于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如能利用有利形势逼蒋抗日，放他回去，则有利于抗日救亡。因此，中共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团结抗日，力主和平解决，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之邀，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张子华、许建国、曾山等 22 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从保安县出发，徒步两天到肤施。刘鼎奉张学良之命乘张学良的专机前往肤施迎接周恩来一行。

12 月 17 日下午，周恩来一行飞抵西安。专机到西安降落时，天已黄昏，刘鼎陪同周恩来等在七贤庄一号稍许休息，即前往张公馆。张学良、杨虎城早在东楼门处等候。刘鼎将中共代表团成员一一介绍给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参加会谈的将领，会议正式举行。周恩来先与张、杨分别进行了会谈，就如何解决事变和处置蒋介石表达了中共的立场和态度，建议张、杨为争取团结抗日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来西安和平谈判，并确定了双方与蒋介石谈判的五项基本条件。

12 月 22 日，宋美龄、宋子文在蒋介石的顾问端纳的陪同下，从南京飞抵西安。



延安宝塔山

12 月 23 日上午，谈判正式开始，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三方代表就具体问题进行了谈判。中共代表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赞同中共代表提出的六项主张，宋子文也表示基本同意并答应转达蒋介石。

同日下午，三方举行第二轮会谈。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抗日战争揭开后再改造为抗日政府。双方就过渡政府的具体人选交换了意见，原则上取得一致，但在何时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而未果。

12 月 24 日，三方代表举行第三轮会谈，达成了九条协议，基本同意张学良、杨虎城在事变后发出的八条通电，也承认了中共、红军和苏区的合法地位。

当天下午，周恩来单独会晤宋子文。宋子文表示希望中共能成为支持他抗日、反对亲日派的后盾，主动要求中共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同日晚，蒋介石同意由中共代表提出并在谈判中议定的六项主张，但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协议。

12 月 25 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南京。由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国共两党启动了第二次合作。

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共陕西省委，任命贾拓夫为省委书记。以后相继派汪锋、赵伯平、朱理治、惠子俊、潘自力、崔廷儒等人参加了陕西省委的领导工作。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主动南退，撤离肤施县城。12 月 16 日，江华奉周恩来之命，率西北红军一个团进驻肤施县城内，并建立了城防司令部，司令白志文，政委江华。

1937 年 1、月 13 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进入肤施县城。县城内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秧歌队排成长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受到全城群众的热烈欢迎。

至此，肤施改名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也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并由此而闻名全世界。

洛川会议

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四项保证：(一)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三)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2 月中旬至 7 月中旬，中共派出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顾祝同等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

7 月 7 日，驻卢沟桥的日军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拒绝这一无理的要求后，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史称卢沟桥事变，从而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7 月 8 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

7 月 15 日，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救亡图存，中共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该宣言指出，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中国共产党愿向

全国同胞提出我们的斗争总目标:(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行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中共中央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7 月 17 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7 月 28 日至 29 日，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天津发动总攻，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8 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两党合作抗日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第五次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城北 20 里地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还有部分红军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 22 人。张闻天主持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

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的补充报告。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指出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会议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这次会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一)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二)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起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三)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四)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五)八路军的具体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会议在确定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基本原则一致的前提下，对八路军出兵的时机、数量及陕甘宁留兵多少、红军作战形式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为加强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 11 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对外称主席、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党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

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这次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在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宣言》。

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起来。

主要参考资料

一、书籍资料

1.《李子洲》，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刘志丹》，李建彤著，工人出版社 1979 年版。

3.《刘志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4.《刘志丹》，陕内资图批字(98)097 号，1998 年刊印。

5.《刘志丹纪念文集》，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6.《陕北烽火》，郭洪涛著，原载《革命史资料》第 5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7.《中共榆林历史》，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8.《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84 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9.《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5 卷，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0.《神府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中共神木县委党史办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11.《榆林英杰传选》，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榆林市民政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2.《延川英烈》，延川县政府编，1989 年刊印。

13.《阎红彦传略》，毕兴、贺安华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14.《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版。

15.《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蒋凤波、徐占权编著，解放军出版社 2008 年版。

16.《中国革命史常识》，总政宣传部编，战士出版社 1983 年版。

17.《榆林文史览胜》，榆林地区文化局、方志办编，1988 年刊印。

18.《清涧、旬邑等地的武装起义》，“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八)，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19.《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三)，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0.《横山文史资料》，横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8 年刊印。

21.《谢子长烈士专辑》，中共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子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5 年刊印。

22.《清涧起义》，清涧县《清涧起义》编辑组编，1987 年刊印。

23.《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第 1、2 集，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24.《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第 3 集，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8 年刊印。

25.《革命烈士和党史人物传略》第 4 集，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9 年刊印。

26.《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地区组织史资料》，中共榆林地委组织部、中共榆林地委党史办公室、榆林地区档案局编，1988 年版。

27.《中共绥德县委组织史专题资料》，中共绥德县委组织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28.《中共绥德特委组织史专题资料》，中共绥德县委组织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29.《中共米家沟、义合特支组织史专题资料》，中共绥德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30.《中共绥清、绥德、绥清中心县委组织史专题资料》，中共绥德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31.《中共清涧县委、绥清中心区委、绥清县委及绥清中心县委》，中共清涧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6 年刊印。

32.《中共榆林县委》，中共榆林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6 年刊印。

33.《中共神木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中共神木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34.《中共横山第一高级小学支部》，中共横山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6 年刊印。

35.《中共石谦部队军支》，中共清涧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36.《榆中 CY 小组、榆中党团支部和榆林党团特支》，中共榆林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6 年刊印。

37.《中共榆林地委》，中共榆林县委组织史资料征编办公室编，1986 年刊印。

38.《清涧四个高小党团组织建立和发展概况》，中共清涧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3 年刊印。

39.《红二支队与红二团的建立及主要战斗活动》，中共清涧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5 年刊印。

40.《高岗年谱》，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 年刊印。

4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42.《高岗文选》，薛俊富、安明文编辑，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年版。

43.《高岗在西北东北》，张思铨编著，香港大道出版社 2005 年版。

44.《毛泽东出兵山西》，王波著，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版。

45.《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46.《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47.《中国共产党榆林地区历史大事记》，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48.《李合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内资图批字(99)040 号，1999 年刊印。

49.《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集团军编，白山出版社 1994 年版。

50.《朱敏传》，榆林市史志办编，1997 年刊印。

51.《中共陕西历史简明辞典》，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52.《马明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53.《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年版。

54.《朱理治传》，宋霖、吴殿尧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55.《口述历史》，王俊义、丁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6.《红色清涧》，黄增辉编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57.《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潘星海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58.《张国焘传》，姚金果、苏杭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59.《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谢远学、郭山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60.《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谢远学、郭山文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61.《历史的误区》，汪剑、李全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62.《张闻天》，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版。

63.《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64.《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曲涛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65.《我的八十五年》，张秀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66.《贾拓夫传》，周维仁著，团结出版社 2009 年版。
67.《片断回忆》，张邦英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年版。
68.《忆高岗同志》，白锦国等编，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
69.《革命生涯》，张邦英著，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8 年版。

二、历史文献资料

70.《田伯荫档案》,《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2 年第 7 期。
71.《耿炳光档案》，原件存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
72.《杜嗣尧档案》，原件存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73.《李瑞阳档案》，原件存中共绥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74.《史唯然档案》，原件存中共中央档案馆。
75.《懋廷给安石的信》(1924 年 12 月 29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76.《绥德特别支部书记王懋廷给北方区报告第十一号》(1925 年 5—6 月)，原件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77.《青年团体调查表》(1925 年 12 月 10 日)，原件存中共绥德县委党史办公室。
78.《耿炳光给桂仁兄的信》(1926 年 6 月 14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79.《耿炳光给宗礼、柏桂的信》(1926 年 6 月 18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80.《白和对陕西问题的意见》(1926 年 12 月 15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81.《习棣方书记冯景翼给曾延的信》(1926 年 1 月 14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82.《冯景翼给曾延的信》(1926 年 1 月 17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 8 月第 3 期。
83.《陕西 CY 过去、现在与将来》(1925 年 2 月 25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4.《中共陕甘区委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1927 年 3 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5.《李子洲关于陕西工作开展问题向中央的请示》(1927 年 8 月 6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6.《与陕西代表李子洲谈话》(1927 年 8 月 6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7.《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1927 年 9 月 26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8.《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政治与党务》(1927 年 10 月 13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89.《政治通讯(第一次)》(1927 年 11 月 4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0.《陕西省委(给中央)报告》(1927 年 11 月 14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1.《目前军事行动决定案》(1927 年 11 月 26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2.《第一次省委全体会议经过及决议案》(1927 年 11 月 30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3.《省委给陕北函(第一号)》(1927 年 10 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4.《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1928 年 1 月)，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5.《党团两省委“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1928 年 1 月 31 日)，1982 年《陕西党史资料选辑》第 2 辑。

96.《陕西工作决议案》(1928 年 3 月 18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97.《“绥德县委”任子良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8 月 5 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98.《陕北代表团报告》(1929 年 5 月 4 日)，《陕西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5 期。

99.《陕西临时省委致陕北特委函》(1930 年 4 月 15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0。《陕北秋收斗争的策略路线》(1930 年 7 月 9 日)，原件存陕西省

档案馆。

101.《北方局对陕北特委的工作指示——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1930 年 10 月 18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2.《陕北特委对河北省委报告第一号》(1932 年 3 月 15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3.《陕北代表团报告第二号》(1932 年 12 月 13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4.《陕北代表团报告第三号》(1932 年 12 月 13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5.《陕北团特委报告》(1931 年 4 月 22 日)，1985 年《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 13 期。

106.《陕西省委给陕北特委的工作指示信》(1930 年 5 月 25 日)，原载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榆林地区历史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07.《目前陕北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1933 年 2 月 15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8.《陕北特委工作报告》(1933 年 10 月 20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09.《崔瑞生陕北工作报告之第一号》(1933 年 10 月 27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12 期。

1l0.《崔瑞生报告第二号关于陕北组织概况》(1933 年 12 月 4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11.《陕北崔瑞生报告第三号》(1933 年 12 月 5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12 期。

112.《崔瑞生报告第四号》(1933 年 12 月 16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12 期。

113.《陕北特委工作报告大纲》(1934 年 6 月 27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14.《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信——关于陕北游击队的工作与创

造新苏区的问题》(1934 年 7 月 13 日)，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15.《谢子长同志给中代的信》(1934．年 9 月 5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12 期。

116.《陕北特委代表的报告》(1935 年 1 月 24 日)，《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5 年第 12 期。

117.《高善亭逃回寄押》，杭毅 1935 年 2 月 2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18.《南沟岔失守》，高桂滋 1935 年 2 月 9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19.《毛侃率陕北参谋团赴绥》，何敬之 1935 年 3 月 18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0.《杨家园则遭伏击》，毛侃 1935 年 5 月 16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1.《马家坪损失惨重》，1935 年 6 月 6 日《匪情周报表》5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2.《敌八十四师动态》，1935 年 6 月 6 日《匪情周报表》5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3.《张家圪台等地军事动态》，1935 年 6 月 6 日《匪情周报表》第 5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4.《延川失陷》，毛侃 1935 年 6 月 1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5.《延长失陷》，肤施县长袁德新 1935 年 6 月 3 日呈折，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6.《高桥镇失陷，安塞县城被围》，1935 年 6 月 27 日《匪情周报表》第 8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7.《安塞被困》，高桂滋 1935 年 6 月 15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8。《剿匪方案第一期兵力部署》，毛侃 1935 年 6 月 20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29.《靖边失陷》，井岳秀 1935 年 7 月 4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

馆。

130.《三皇峁被攻》，1935 年 8 月 6 日《匪情周报表》第 12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1.《老君殿西高家塌遭袭击》，1935 年 8 月 6 日《匪情周报表》第 12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2.《慕家塬被围，援军受损失》，毛绩斋 1935 年 8 月 13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3.《慕家塬失陷，援军被缴械》，杭毅 1935 年 8 月 14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4.《定仙墙、枣林坪被围》，毛侃 1935 年 8 月 16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5.《横山战斗甚烈》，1935 年 9 月《匪情周报表》，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6.《高师损失惨重，士气低落》，杭毅 1935 年 9 月 23 日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7.《徐海东部到永坪》，1935 年 9 月 26 日《匪情周报表》第 16 号，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8.《晋军、高、井二师放弃数军事要点》，杭毅 1935 年 10 月 4 日给邵力子电文，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139.《杜衡自供》，《榆林党史资料通讯》，1989 年第 3 期。

140.《赵辑五供词》，摘自榆林县人民法院刑事案卷。

141.《何启泰供词》，摘自榆林县人民法院刑事案卷。

142.《马云亭供词》，摘自榆林县人民法院刑事案卷。

三、个人回忆文章、材料、书信、自传(按姓氏笔画排列)

习仲勋　王首道　王　英　王四海　王西林　王恩惠　王丕亮　王道三
王道广　王达成　王保成　王建平　王树堂　王全忠　王子宜　王子休
王　衍　王世泰　王世功　王海山　王再兴　王守山　王生前　王兆相
王元堆　王锦建　王文随　王治邦　王志福　王士英　王国瑞　王秀龙

王春华　王爱民　王应元　王桂业　王子庄　王儒林　王进峰　王季明
王生源　王森然　王尚业　王玉昆　王月明　马云泽　马锡五　马佩勋
马维良　马万里　马景林　马学颜　马文瑞　马明方　马子文　马洛川
马凌波　牛　岗　牛占彪　牛化东　白冠五　白超然　白应奎　白盛英
白云翰　白如冰　白栋材　白凤章　白世雄　白炳忻　史维法　叶贤英
叶玉福　田万生　田伯荫　艾楚南　艾龙飞　师永杰　刘金玉　刘居忠
刘尚达　刘约三　刘景明　刘景瑞　刘懋功　刘力贞　刘占江　刘北垣
刘北云　刘长键　刘崇德　刘长亮　刘长彦　刘青山　刘明山　刘义维
刘汉亭　刘智武　刘生富　刘振政　刘景范　刘万生　刘汉丁　刘临福
刘绍武　刘文山　刘柯荣　刘海瑞　刘澜涛　刘德禄　刘振威　同桂荣
冯景翼　冯学诚　冯世光　冯文江　任帮厚　任秀明　乔增武　乔鼎铭
吕正修　朱子休　朱佑铭　孔令甫　孙师策　孙静山　孙英俊　李象九
李瑞阳　李维俊　李赤然　李锦锋　李启贤　李启益　李生甫　李树茂
李生业　李岐山　李选益　李维汉　李　果　李子川　李旺昭　李文智
李景瑞　李万春　李景林　李向正　李明轩　李景亭　李尚德　李文芳
李文正　李腾九　李友兰　李树林　李占江　宋任穷　汪　锋　谷奇峰
杜松寿　杜洪章　何万龙　何宪政　何寓础　拓嘉彪　折仲恺　许发善
许思忠　苏佐山　苏耀亮　苏　杰　呼延震西　罗章龙　周自岐　周梦雄
张秀山　张　蓓　张家修　张毅忱　张维山　张如岗　张汉武张德忠
张耀武　张守忠　张存连　张步继　张　兴　张玉亭　张俊贤　张文华
张肇繁　张礼庭　张广远　张心斋　张　策　张怀仁　张明科　张邦英
张达志　张江全　张　林　张方海　学　英　杨彩彬　杨庆云　杨勤生
杨明轩　杨和亭　杨晓初　杨培盛　杨士敬　吴祥山　吴成业　吴生秀
吴步渊　吴岱峰　武开章　武国强　尚银武　林伯渠　林蔚森　陈云樵
陈思慕　赵通儒　赵伯平　贺晋年　贺树槐　贺治国　贺吉祥　贺建山
贺相堂　侯晋有　胡战彪　胡子堂　胡颖民　高朗亭　高树玉　高克恭
高长直　高长久　高明贤　高益林　高凌云　高增培　高宜之　高明镜
高锦纯　高克林　徐海东　阎红彦　阎揆要　阎圣云　屈　武　屈仲举
贾治华　贾如胜　贾怀光　贾海蓉　贾维立　郝玉山　郝德林　郝成德

党鸿魁　殷汉清　耿　红　姜兆莹　梁俊琪　梁士堂　梁介宾　常黎夫
常立德　常正荣　常翔锋　鱼振东　聂荣臻　郭洪涛　郭怀昌　郭志明
郭文荣　郭文华　郭世英　郭世长　郭秉金　郭步岳　黄罗斌　黄光生
曹怀文　曹志谦　曹丕侃　陆九锡　崔田夫　崔田民　崔正冉　崔凤荣
崔逢运　惠世恭　惠艾深　惠庆琪　彭德怀　温亮廷　韩继恩　韩　峰
韩名正　路茂财　路茂业　雷恩钧　裴周玉　谢文祥　谢绍明　谢保善
谢怀德　慕宗崇　慕生忠　薛俊高　薛占英　霍建雄　霍维德　霍建邦
霍仲年　魏　刚

后　记

我的家在清涧县的黄河岸边。这里曾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一块炽热的红色土地，也是陕西中共组织活动最早、农民运动最兴盛的地方，因而有着无数令人激动的故事，一直使我引以为自豪。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革命武装起义，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县里有许多进步学生和农民青年参加起义军，后来不少人成为西北党组织和西北红军的中坚。清涧起义虽然坚持两个多月后失败，但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此起彼伏地燃烧着，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二支队及其扩编的第红二十七军二团相继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家乡的大多青年农民都是这支红军队伍初创时的一员。这里曾涌现出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白寿康、白凤章、马义、黄景波、李景林、李合邦、唐洪澄、刘英勇、贺树槐、黄石山等革命功臣，更有白明善、白雪山、白志强、白锡龄、王聚德、张承忠、崔玉瑚、刘玉春等无数为革命献身的英烈，他们坚强勇敢的形象和震撼人心的事迹早已在当地群众中传颂，成为人们永久骄傲的话题。我就是从小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

1961 年 3 月间，从西安传回噩耗：爷爷的表兄唐洪澄(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因病在北京去世。爷爷对着表兄的遗像悲伤不已，感慨良久：“不该殁，不该殁，才是 56 岁的人，革命刚闹成功啊……”

是的，爷爷和唐洪澄关系甚好。爷爷因父母去世早，不到 10 岁就成了孤儿，随伯父一家生活。那时，爷爷的姑母家境小康，她对这个寄人篱下的娘家侄子十分疼爱，经常把他接到家里，与儿子唐洪澄形影相伴。爷爷从小就对唐洪澄言听计从。

唐洪澄原名贺生春，1927 年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接触马列主

义，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春受党组织指派返回家乡，建立中共清涧县大马家山支部并任第一任书记。爷爷是唐洪澄当时发展的农民党员。1928 年至 1933 年，唐洪澄在县里组织两次农民抗粮运动，爷爷和本家堂兄李合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李光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大连市政协副主席)都是抗粮斗争的积极参加者。爷爷曾指着家里一把秃了角的锄头告诉我说，两次参加抗粮，他都带着那把锄头。第二次到县城抗粮的那天，他正在山上锄地，唐洪澄派人通知他立即到指定地点集合，他连家都没顾得回，锄头朝肩上一扛就跑去了。

1934 年至 1935 年，爷爷是唐洪澄、李合邦组织的农民赤卫队队员，跟随谢子长、刘志丹参加了攻打河口镇、定仙墕的战斗；1936 年春，毛泽东到陕北率领红军东征，爷爷参加了支前担架队，后当了贫农会会长，参加过打土豪、斗地主和土地分配，亲身经历了那个火红的年代，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我的父亲是绥德省立四师学生，1946 年参加革命。父亲曾说，1947 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时，他受中共绥德党校派遣带着一个工作组赴三边开辟新区，路经横山县境，遭国民党飞机的空袭轰炸，一颗炸弹落在身边炸开一个大土坑，他因跌入水渠中才幸免于难。

1967 年 7 月，李合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四人帮”迫害，含冤离世，时年 55 岁。李光业曾发表一篇题为《深厚的情谊》的纪念文章，深切地讲述了他和李合邦、唐洪澄等在陕北那段难忘的艰苦斗争经历。李光业曾任陕甘宁边区少共部长，李富春很喜欢他，经常邀他到家里吃饭，还三次带他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他给毛泽东唱过陕北信天游：“正月里来是新春，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真勇敢，他带着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我儿时也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唱这支陕北民歌。大学时的一次晚会上，我唱的也是这支歌。在我的心目中，只有这支陕北民歌，才可涵盖陕北人的革命精神。

从 1978 年开始，作为从事法院审判工作的法官，我直接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后榆林地区各类历史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那时，我还没有

想写点什么的念头，唯一的追求是做好本职工作。在走访、调查中，有幸接触了不少从土地革命时期出生入死走过来的老红军和老前辈，得到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不由得对他们沉浮起落的人生轨迹感慨万千。特别是爷爷的本家堂弟、老红军李光印，作战勇敢，立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省农业厅工作，后被打成“右派”遭关押，据说到1957年这个省被打成“右派”的人竟达57000多。

关押他的那个劳改场里，最多时关押过数千“右派”。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劳改场里的“右派”多因饥饿出现浮肿而死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我的本家堂兄李彦章曾去探望过一次，他那魁梧的身躯已被摧残得骨瘦如柴了。他含冤多年，终获平反昭雪，有幸和少数活着的人一起走出了劳改场，被安置到一农科所工作。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对我震动很大，使我萌生了再现陕北、陕甘边土地革命历史，以告慰先烈、启迪后人的大胆构想。

20世纪80年代初，我写出20多万字的书稿，先送给原中共榆林市委党史办陈仕华主任一阅。他认为选材很好，但恳切地指出，还需充实大量的历史资料，对书稿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个别历史人物，中央尚未明确作出历史结论之前，有关进一步研究仍需时日。他还认为，要完成这部书稿的编撰，仅凭一个人的热忱和努力远不够，当时连榆林党史部门都还没有这样的设想和计划。

此时，我曾犹豫过，质疑自己是否应该放弃。陕北、陕甘边的土地革命斗争是一部浩瀚的史诗。我不曾专门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就自己的阅历和精力而言，要撰写这部纪实性书稿，犹如寓言中的愚公移山。

清涧县委党史办副主任黄增辉是我的中学老师，他鼓励我不要泄气，并几次送来清涧县委党史办保存的史料，要我继续写下去，若需要什么史料，只要有都可提供。黄老师还告诉我，他也正在写一点有关清涧党史方面的东西(2007年冬，黄增辉老师所著《红色清涧》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90年代，我进入写作的高潮。那时，白天要在法院紧张地审理案件，只能利用晚上回家的时间；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孔16平方米的窑洞里，除了

一盘土炕和灶台，家里连一张写字的桌子都放不下，就在胸前垫着枕头，伏在土炕上写。当时，小儿子刚出生，我每天晚上要写到凌晨两三点，烟蒂撒了一地。第二天爱人一边扫地一边数着烟蒂说："抽这么多的烟，坏了你的身体倒罢，小心给儿子熏出病来。"不料被她说中，小儿子真还被熏出一场肺炎，送到医院治疗了近半个月。

在撰写中，涉及全国党史、陕西党史上下近20年的历史，既有国民党统治区中共组织的活动，也有红军和游击队创建苏区的斗争，尤其是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二十五军的军史，还有中国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探索、纠正与发展，历史背景十分广阔。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手中的史料越来越显匮乏，常常使写作陷入停滞状态。这时，首先得到榆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文选的重视和支持，他鼓励我完成这部书稿。他曾任中共榆林地委副书记并分管党史工作，保存有许多西北地区的党史军史资料，任我挑选使用。此后又得到中共榆林市委党史办主任任德存、

副主任白泽生的大力支持。2000年后，在西安的本家叔叔李如山(李合邦之子)和婶娘刘玉兰(刘志丹之妹)夫妇等鼎力帮助，为我提供了大量有关陕甘边土地革命时期的翔实史料。这些支持使我坚持下来，克服困难，遍查资料，广泛涉猎，大量参考当事人回忆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多次采访刘景范、张邦英、贾拓夫、刘懋功、张秀山、黄静波、高岗、白明善等人的家属，并征求他们对书稿的意见。

本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坚持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以近30年收集、梳理、研究之热情和勇气，历经数十次修改，2006年秋，近80万字、共10部分86章的书稿终于全部完成。

2008年，书稿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新闻出版总署审读同意出版。2010、2011年，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文琦老师先后两次精心审阅书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陕西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蒋丽、何大凡老师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对书稿反复核阅，润色加工，四易其稿。该书有幸入选2011年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在此，谨对所有提供资料、参与审读、支持本书出版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亲友、同志及有关部门

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所涉内容浩繁，加之笔者掌握的历史资料有限，疏漏之处难免，诚恳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建雄

2012 年炎夏于榆林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本书首次以历史纪实的方式将整个陕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舞台上作全景式的展现，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始末详尽地解读给世人。书中以李子洲、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革命者的活动为主线，描述了土地革命时期在西北创建红军武装、发展革命力量、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斗争历程，生动再现了八十多年前西北革命斗争的风云岁月。

HONGSE SHANBEI

ISBN 978-7-224-10450-9

9 787224 104509 >

定价：98.00元（全2卷）